

多勃雷宁回忆录

IN CONFIDENCE

信
赖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 著
ANATOLY DOBRYNIN

● 世界知识出版社



K 835.127.5

0371

信 赖

——多勃雷宁回忆录

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1962—1986)

[俄]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 著
ANATOLY DOBRYNIN

肖敏 王为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036423

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1962—1986)

Copyright© 1995 by Anatoly Dobrynin

Published by Times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根据时代出版公司 1995 年版译出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版权所有

责任编辑:范建民

封面设计:丁 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俄)多勃雷宁(Dobrynin, A.)著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书名原文:In Confidence

ISBN 7-5012-0785-2

I . 信… II . 多… III . ①多勃雷宁—回忆录②美苏关系—史料 IV . K835.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489 号

图字:01-96-0836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华茵排版公司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25.75 字数:659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0

定价: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给亲爱的伊琳娜

她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并使本书的问世成为可能

致 谢

我要向所有将我引入外交领域的人表达深深的谢忱，是他们为我提供了绝好机会，使我得以在外交部门供职半个世纪，从而为我展现了外交和国际关系这一令人振奋的天地，而外交和国际关系正是本书的重点。我对苏联和俄罗斯外交部中各位同事的合作和友谊表示感谢。

我还要感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研究所和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学术中心凯南研究所，它们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支持。我的朋友杜瓦尼·安德烈亚斯和唐纳德·肯德尔的支持和浓厚兴趣也有助于本书的问世。

我特别感谢作家兼记者劳伦斯·马尔金，他在整理资料、撰写手稿并使之最终成书的过程中给予了帮助。他的热情始终如初，并提出了一些必要的批评意见，我十分感激他的帮助。在本书从构想到最终问世的过程中，我的出版商彼得·奥斯诺斯的指导意见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他不仅对本书的结构提出了很有见地的修改意见，还帮助使本书更具活力，更贴近读者。我还应感谢唐·奥伯多弗，他以专家的眼光仔细阅读了本书手稿，从而使我们双方都获益匪浅。我还要感谢伊琳娜·巴拉金娜，她不知疲倦地帮助我将本书译为英文。时代出版社的彼得·史密斯对本书做了出色的编辑，文卡·麦金太尔是本书的校对阅读员。所有这一切使得本书的出版成为一次愉快的经历，我对时代出版社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还要衷心地感谢威廉·海兰和罗伯特·列夫戈尔德，他们提出了深入而有益的意见和建议，还有对我的文字进行润色的莫顿·詹克洛，他总是能提出明智的建议。

目 录

致 谢 序 言	1
------------------	---

第一部 赴华盛顿任职之前

第 一 章 外交生涯的开端	11
第 二 章 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25
第 三 章 最高级会谈:从另一个角度看最高领导层	38

第二部 在华盛顿

肯尼迪总统时期:1961—1963

第 四 章 探索在华盛顿工作的方式	55
第 五 章 古巴危机	79
第 六 章 学会共同生存	108

约翰逊总统时期:1963—1969

第 七 章 开始了解新总统	130
第 八 章 莫斯科和越南	145
第 九 章 试图混淆和平与战争	161
第 十 章 苏联寻求稳定的政策方针	177
第 十 一 章 林登·约翰逊的下台	192

尼克松总统时期:1969—1974

第 十 二 章 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	219
第 十 三 章 攀援最高级会谈之山	240

第十四章	地缘政治中的三角关系·····	260
第十五章	最高级会谈·····	275
第十六章	在美国再次举行最高级会谈·····	306
第十七章	十月战争·····	332
第十八章	理查德·尼克松下台·····	349
	福特总统时期:1974—1977	
第十九章	寻找真正的杰拉尔德·福特·····	368
第二十章	缓和受到侵蚀·····	393
第二十一章	姑息右派使福特丢掉了总统宝座·····	412
	卡特总统时期:1977—1981	
第二十二章	吉米·卡特面临的种种矛盾·····	428
第二十三章	卡特一塌糊涂的外交重点·····	461
第二十四章	与卡特举行最高级会谈·····	476
第二十五章	阿富汗·····	497
第二十六章	卡特的失败:一份缓和的墓志铭·····	520
	里根总统时期:1981—1989	
第二十七章	自相矛盾的罗纳德·里根·····	544
第二十八章	里根的讨伐运动·····	568
第二十九章	“多做少说”·····	588
第三十章	解冻·····	618
第三十一章	冷战结束的开端·····	639
第三十二章	告别华盛顿·····	672

第三部 离开华盛顿之后

第三十三章	戈尔巴乔夫: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 总统·····	695
附录	·····	724
索引	·····	730
译后记	·····	812

序 言

3

作为一名外交官，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了我国及世界历史上一个独特而又重要的时期。我们知道，这就是冷战时期。我在苏联外交部门的工作经历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我刚从莫斯科外交学院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我的外交生涯，在苏联方面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下台；在美国方面则是从哈里·S·杜鲁门总统任内开始，一直持续到布什总统任内。总起来说，我和苏联外交的关系持续了几乎半个世纪，而且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担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美国大使。我参与了美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所有最高级会谈——从1955年日内瓦第一次最高级会谈到1990年布什与戈尔巴乔夫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是唯一完全目睹了国际关系中这些重要事件的外交官。我从1962年开始担任驻美大使，一直到1986年才卸任。这是苏联乃至革命前俄国外交史上担任此项职务最长的任期。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这项工作。

在长达1/4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两国的关系始终极不稳定。两国关系通常在最高级会谈之后得到改善，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危机时又趋于恶化。军备竞赛的速度远远快过旨在控制军备竞赛的裁军谈判。地区争端不断爆发。于是，使两国政府最高层人士保持秘密接触就成为我这个苏联驻华盛顿大使的首要任务。我认为我的主要工作是促使两国领导人展开恰当并且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且尽可能维护两国关系中积极的一面。我竭尽全力地抑制

由于外交挫折、相互误解以及我曾亲眼目睹的大量政策上的失败所引发的冲动情绪。

4 在撰写本部书时，我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记忆。我在莫斯科查阅了苏联外交档案以及我本人的日记，这些材料以前均未公开发表过。我与美国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以及政治家、社会知名人士所进行的最重要的正式会谈及私人会谈在本书中均有记载。此外，书中还叙述了我同莫斯科的上级及我国领导人的交往，包括我参加过的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我在书中重点叙述了我个人参与过的事情。我还试图尽可能地说明我依据什么得出了对那些我不曾参加过的会议和讨论的看法。

我试图以一种我认为独一无二的方式来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以及苏美关系的演变过程，因为无论是白宫还是克里姆林宫的大门都曾向我敞开过。本书除了回忆我早年在苏联外交部、联合国以及驻华盛顿使馆的工作之外，还对从约翰·F.肯尼迪到罗纳德·里根等六位美国总统的情况作亲眼所见的 firsthand 叙述。我曾多次会见过这几位总统。我也认识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布什总统。这些领导人的气质以及处理国家事务的知识和能力大不相同。其中有几位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

在国内，我曾在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年代仔细观察过他们，也观察了他们的每一位继任者，一直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在 1986 年把我召回莫斯科，先是我担任主管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后来又担任他的美国问题顾问。后来我退休了。但是在 1991 年 8 月 1 日，我又重新回到苏联外交部——后来改为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直到 1995 年初写作这部书时，我仍在那里担任顾问。

我希望这部回忆录能给所有对苏美关系的复杂历史感兴趣的人提供一些帮助，同时也希望本书能告诫人们提防本世纪令人悲哀的错误再度发生。我还希望本书能成为一部描述白宫和克里姆

林宫如何处理国家事务的亲历记。

我的美国对话者们一直怀疑我是否真的相信苏维埃制度。的确，罗纳德·里根不敢确定我是否真的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曾经是）。事实上，我是以一个公民、一个爱国者和一名外交官的身份，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我根据自己的判断尽力服务于国家的现实利益和历史利益，而不是为任何抽象的共产主义哲学概念服务。我将苏维埃制度——包括它的缺点和成就——看作是我国悠久历史中的一个历史阶段。直至今日，我对这一制度的伟大使命仍深信不疑。如果我在一生中有过什么重大追求的话，那就是使我的国家作为一个受到尊重并且享有平等地位的伙伴融合在国际大家庭之中。要实现这一追求，就必须考虑世界和本国的现实情况。

5

作为大使，我的日常工作是向政治局全面汇报情况，当然是直接向葛罗米柯汇报。我常常以他作为外交部长而不能采取的方式，代表他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与美国的一大串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当中包括迪安·腊斯克、威廉·罗杰斯、亨利·基辛格、赛勒斯·万斯、埃德蒙得·马斯基、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亚历山大·黑格、乔治·舒尔茨以及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等。我们看到过很多争执的产生，也看到了它们得以解决，这中间不可能没有紧张的谈判、要求和反要求以及激烈的争论。尽管如此，我们总是尽力保持良好的、事务性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有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

想起我的大部分美国伙伴，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温情。我也怀着喜爱和深深的感激之情回忆了我在使馆工作时的同事尤里·沃龙佐夫、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乔治·马梅多夫、弗拉登·瓦谢夫、奥列格·索科洛夫、维塔利·丘尔金、维克多·科姆普雷托夫、维克多·伊萨科夫——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驻外大使或高级外交官——以及其他一些在华盛顿与我们共同承担艰难工作的人。

我们大家一直在尽力使彼此间的联系渠道保持畅通，尽管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因两国关系的变化起伏而有所不同。苏美关系从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危险状态演变为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倡导缓和时期的友好、福特和卡特执政时期的不稳定和混乱、入侵阿富汗之后和里根搞军备扩充时期的僵冷。尽管如此，我幸运地发现，在冷战时期我本人受到双方领导机构的欢迎，并且能向双方提供帮助。在华盛顿，我可以接近上层人物。在他人看来，苏联大使享有这种特权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在莫斯科，我们的政府给了我前所未有的自由行动权利，尽管我必须说明我能够获得这种权利的一个原因是我本人常常要求得到它，而且我的上司显然对我的做法感到满意。

写作这部回忆录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回忆向读者及我本人展示我的工作方式。从这种工作方式中得出的教训之一是，人性和实实在在的人际关系如何深刻地影响着事情的结局。外交毕竟不仅仅是一种公开的职业技能，它还是一种非常隐蔽并且富有个性化的技能。

我相信我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打算与我交往，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乐意与我交往。我也乐意与他们交往，而且我公开表现出了这种愿望，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不论我们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有什么分歧——请相信这种分歧是很大的——我都把他们当成普通的人来看待。不过，我很想了解他们与我交往的动机，而且在讨论利害攸关的问题时，我决不会表现出可能会赞同他们的意图的样子。

从职业标准衡量，我从未想过应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尽管我总是尽力做到谨慎从事。这样做的结果是克里姆林宫越来越相信我的判断，虽然它并不一定总是采纳我的意见。在一个国际关系异常紧张的世界中，我试图成为一名能够消除双方疑虑的人物。

然而，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能会感到纳闷，美国政府内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同这样一个政府的代表进行坦率的交

谈——这个政府毕竟是美国在世界上的主要对手。这里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一般说来靠的是个性、相互尊重、职业作风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有一点儿幽默感也是有帮助的。

我从一开始即决定打破葛罗米柯留下的惯例，同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展不太拘泥于形式的关系。从斯大林时代起，会见外国人时要有一名见证人在场已成为一个传统，而我在拜访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美国官员时，却常常不带任何使馆人员。我认为单独举行会谈可能有助于增加相互信任，有助于抛开往往是僵化了的官方立场去探求新的看法。与此同时，我希望避免同我的美国对话者发生不必要的争执，特别是不要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执，以便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进而营造出一个较好的——不论是在两国关系稳定时还是在出现麻烦时——工作环境。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我总是试图在每位总统身边找到这样一名合适的人物，尽管不可能同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罗伯特·肯尼迪与其兄长的关系当然很密切，但与他打交道并非易事。他带来的总是总统表示不满的信息，仅此而已。于是，我试图找到一位像我一样热衷于通过相互妥协来解决那些使我们产生隔阂的棘手问题的人。这样，我们在必要时就可以分别向总统和政治局汇报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在这方面，肯尼迪政府的苏联问题专家卢埃林·汤普森，特别是后来的基辛格和万斯做得比较好。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担任林登·约翰逊的国防部长期间曾经邀我到他家中共进午餐。我们先下象棋，然后才进行会谈，并且在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授权的情况下逐渐开始坦率地讨论起裁军问题。他对这一问题有一些非常新奇有趣的想法。

我和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人也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此外还广泛结识了商人、国会议员、新闻界人士——这一切都有助于克服冷战期间我们在使馆里体会到的孤立感。斯大林留下的沉重遗产使驻其他国家使馆的外交部同事们不大敢这么开放。我还参加华

盛顿的社交活动和外交使团的活动。由于有长期供职的经历,我最终成为外交使团的团长。

但是,善于交际在我的大使生涯中并不占最重要的地位。同莫斯科的政治机关,首先是政治局以及共产党总书记(我曾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我认识主管政治和军事情报机关的官员;我当然也知道我国外交部就苏美关系正在讨论着的问题。我可以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进行坦率的交谈。

我与之建立起信任关系的那些华盛顿官员懂得,他们告诉我的事情将通过恰当的渠道送往克里姆林宫。他们告诉我的并不是国家机密,而是基本的政治情况、个人意见以及解决问题的一些想法。反过来,我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提供令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如果你只是提问题,而不告诉他们一些情况作为回报,那人家就不会再次邀请你了。

所以,我准备向他们透露一些将会令国务卿、国防部长或副总统感兴趣的我国的情况,这样他们就想再次会见我。我也因此可以自由地——尽管有一定的限度——探寻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可能被带到正式的谈判中并且对双方都有帮助。在和基辛格打交道时,我就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

莫斯科从未有人告诫我收敛言行,与美国人保持距离——我所认识的克格勃历任首脑都没有这样做,甚至连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也没有这样做。通过我充满诚意的会谈,他们得到了来自华盛顿最高层领导人的信息。我同美国人建立的这种关系在其他国家的首都是很少有的,因此也就无法从那里得到类似的信息。几乎没有几位苏联大使准备冒险去做超出交换官方情报范围的事情。虽然我也有些谨小慎微,但我知道我在国内的地位是相当稳固的。除此之外,我不是政治家,不打算在莫斯科取代任何人的位置。我对做一名大使相当满意。我的上级知道这一点。

8 我认为,作为大使,我的行为也合美国人的意。同我交谈的美

国官员们常常希望通过我的渠道,把他们的想法和建议以非正式的方式传达给苏联领导层。他们知道,每当我回莫斯科休假时,我不会只去克里米亚半岛,而是要在莫斯科停留,与政治局委员以及克里姆林宫其他高级官员谈话。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以开玩笑的口吻责备说,每当他想通过我传递某些紧急信息时,我准在莫斯科。他非常清楚,我频繁地回国参加磋商,参加党的会议或者休假有助于替他向克里姆林宫传递信息。我们两人都清楚,我们可以坦率地、相互间完全信任地探索解决我们之间存在的那些纠纷的途径,而且我们总是力求减少而不是增加这些纠纷。

我尽力使华盛顿明白,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美国政府通过我提出某项建议,那怕是非正式的建议,我肯定会将它报告上去,而且我有办法让外交部和负责决策的政治局获悉这一建议。我当然不能保证所有的建议都将被采纳,但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提出了某项建议,而且我们在华盛顿已经事先研究过这项建议,那么我至少可以有机会将它提交给莫斯科的高层领导,并且会得到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答复。即使这种答复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它通常会为我们继续进行对话留有余地。

这一切都是我们最终称之为秘密渠道这一重要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华盛顿和莫斯科为解决冷战时期发生的争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直到今天,这种方式所起的作用仍然未被如实地详细披露出来。如果我同总统、国务卿或国家安全顾问会谈时有他人陪同,那么交换情报、为谈判打基础以及事实上是替两国政府讨价还价等工作就很难做了。

当着基辛格手下人的面,我不能说——我确实对基辛格说过——这样的话:“得了,亨利,这是讹诈,是胡扯。你打算干什么?”当着我的人的面,他也不可能说出同样的甚至是更强硬的话,而且也不会议论我的上级。很久之后,我发现在我和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会谈时,他的一帮助手总是坐在一旁。我纳闷为什么我们两人不能单独会谈呢?过了不久我就明白了,在他任

职初期,他无权同我一道探求促进我们两国关系的新思想,因为总统当时对这种做法不感兴趣,其表现就是舒尔茨不愿单独和我进行秘密会谈。在里根第二届任职期间,我和舒尔茨合作得非常好。

我还知道,我接近华盛顿的上层人物使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们很恼火,因为很多非常重要的交易都是越过他们进行的。作为外交官,我同情他们的处境,但对此我也无可奈何。葛罗米柯根本不会透露那种可能为双方坦诚交换意见奠定基础的信息。而美国大使又能告诉沉默寡言的葛罗米柯哪些可能会令他感兴趣的美国情报呢?所以,大使们只能递交来自华盛顿的照会,并且当着双方在场的担任翻译、记录和观察会谈情况的众多官员的面,解释照会的内容。由于克里姆林宫有着极强的保密观念,由于我们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形式主义,想在莫斯科通过秘密交谈来交换内部政治情报是根本办不到的。

苏美关系的性质是很奇特的:它们是对手,因为它们竞相宣称自己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它们又是伙伴,因为它们对我们这个星球上一切生灵的命运共同负有责任——它们中的任何一方一按电钮便能够毁掉这个星球。回首往事,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我担任驻华盛顿大使的 1/4 世纪中,苏美关系大多处在对立甚至敌视的复杂状态中。如果当时能为我们两国之间打下一个相互信任的牢固基础的话,那么双方可以为两国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做多少事,并且还将可以做多少事啊!

虽然我们不能用今天发生的事情来评判过去,但过去留下的教训却应该记住。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数十年或许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第一次遇到没有强大的敌对势力对和平,对世界文明的存在形成威胁——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存在着这种情况——的形势。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维护这种形势。然而,这个世界仍然动荡不安,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混乱和危险应该被看作是双方正在为冷战而付出的代价中的一部分。

第一部

赴华盛顿任职之前

第一章

13

外交生涯的开端

从搞机械工程到搞外交工作

我是在25岁那年，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很意外地成为外交官的。1944年夏季的一天，一个电话突然打到了我担任工程师的那家飞机制造厂，我的一生因此而改变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我转天到它的总部去。以前我从未去过这么高级的权力机关，为此我一整天都在琢磨：为什么要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师——到那儿去。到了那里之后，我被直接带到了人事处。

一位面无表情、仪表堂堂的人板着面孔接见了，他很容易给我这样当时还很年轻而且缺乏经验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甚至还记得他的名字。他自我介绍姓“斯托博诺夫”，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人事指导员。显然他无意与我长谈，甚至不想就这件事情本身说些什么。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有一个意见，要送你到高等外交学校学习。”

我应该说明，俄语中“有一个意见”——从不明确是谁的意见——这一措词在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词汇中一直是很常见的。它涉及到秘密和权力：你不知道该向谁提出申诉，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意。

这项建议使我完全不知所措。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我一直在著名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雅克夫列夫领导的115飞机试验厂当设计师。苏联空军的战斗机有相当一部分是由雅克夫列夫

设计的。我喜欢我的工作，从未想过做一名外交官或者其他任何工作。

14 斯托博诺夫注意到我一点儿也没有为得知这一消息而激动，甚至还试图提出异议，于是他厉声说道：“现在是战争时期，党更知道哪里需要和如何使用它的人民。实际上这件事已经决定了。不过，今天你还可以考虑考虑。明天早晨我等着你的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最令我担忧的事情是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不论在苏共党内还是在政府中都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为什么挑选我做外交官？带着满脑子的困惑，我回家开家庭会议讨论这件事。当时，我的妻子伊琳娜——她也是一名航空设计师——即将大学毕业，由于连年的战争，她读书的那所学院已经搬到远在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去了。

于是我父亲成了我唯一的顾问。他是一个管子工。我母亲基本上是个文盲。她是一个家庭妇女，同时也在首都上演最好戏剧的莫斯科大剧院做领座员。我不仅通过她观看了在那所剧院上演过的所有俄罗斯戏剧，而且凭着一张证明我是她儿子和一名穷学生的便条，我可以进莫斯科所有的剧院。我的一个姑姑嫁给了一位数学家，我自己也爱好数学并获得过莫斯科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二等奖，它使我在1937年高中毕业后被推荐进入莫斯科大学。但是我父亲极力主张我进莫斯科航空学院。“噢，得啦，”他说，“上综合大学你只能坐在那儿读书，但是上了航空学院，你就能从事有益于现实生活的工作。”

因此，我父亲总是梦想他的儿子会成为一名工程师。他认为让我当外交官是胡闹，因而理所当然地持反对意见。他那一阶层的人认为外交官混迹于上层社会，不是窃贼就是骗子。他无法想象他的儿子会一辈子去干这一行。我读的书自然比父亲多一些，但是对外交官到底干些什么，我自己也只有模糊的印象。事情是明摆着的：我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因此不打算换工作。总之，当天晚上我已下决心拒绝接受这个奇怪的建议。

我第二天的答复使斯托博诺夫大为恼怒。他说我太年轻了，根本没有认识到被送到高等外交学校学习是多么大的荣耀，假如我不能理解他善意的劝告，那么我应该把这个建议视为战时的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于是，我转而向我的上司——亚历山大·雅克夫列夫总设计师（他有陆军中将军衔）——讨教。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知道他喜欢我，并且关注着我在工厂里的工作表现。他对情况发生变化表示遗憾，并表示他曾希望看到我在8年或10年的时间里成为他的副手。但他说拒绝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不可能的，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服从。

我就这样离开了工厂，离开了飞机设计工作。我从未放弃过对这项工作的热爱，即使在我当上外交官以后，我仍然密切注意着它的发展状况。应该说我在航空学院学习的岁月最终没有白白浪费掉。苏美裁军谈判涉及到多种类型的战斗机和导弹，而我所掌握的工程技术知识对我的外交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对我来说，掌握这一相当复杂的技术领域中的问题比那些未受过技术教育的纯粹外交官同事要容易得多。除此之外，我认为我受到的技术训练也有助于我形成重实际、轻意识形态的倾向，这是我研究外交问题和开展外交工作的特点。

在很多年中我一直在想，当初是谁的“意见”使我的一生出现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在我已担任驻美大使后，一个偶然的时机使我解开了这个谜。在约索沃——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地方，政府的很多高级别墅建在那里——度假的时候，我外出散步，很意外地碰见了曾经很有权势的前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自从1957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撤了他的职之后，他就一直住在约索沃。我们会面时莫洛托夫已经80多岁了，但是他的思维仍然很清晰，记忆力极佳。他依然信服他加入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并且极不赞成任何调整或其他改革；直到生命结束时，他一直在斥责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赞扬斯大林。

在谈话过程中,我回忆起1944年我“应征”进入高等外交学校(后来更名为外交学院)的事。我再次对尽管不认得党组织中的任何一位领导,却被选中从事外交工作表示困惑不解。莫洛托夫仍然记得过去发生的事情。在1944年夏天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完苏联红军在 frontline 发动的成功的攻势之后,斯大林突然改变了话题,谈起培养新的外交干部的必要性,因为希特勒很快将会被打败,苏联外交必须为迅速恢复外交活动作好准备。苏联将与很多国家建立起新的联系,战后许多问题也亟待解决。简单地说,苏联很快就需要组建大批的并且是完全合格的外交使团。尽管当时处于战争的紧要关头,几乎所有的年轻男子都被征召入伍,但斯大林仍要求莫洛托夫立即成立外交学校。

“可是我们从哪儿才能招到学生,”莫洛托夫问斯大林,“特别是那些学过大学文科和语言课程的学生呢?”斯大林回答说,没必要非从受到文科教育的人中招收学生不可,以后还可以学习那些课程。现在,他说,外交部可以从军工厂挑选年轻的工程师。他说一定要挑选那些与工人相处得很融洽的工程师:“工程师和工人一样,都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们只能得到700克的黑面包,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就住在工厂里,很长时间见不到家人。”斯大林解释说,如果一个年轻的工程师能够解决艰苦岁月中难免出现的日常工作中的难题和冲突,而且工人们仍旧尊敬他,那么他就是一名真正的外交官,或者至少具有成为一名外交官所必须的能力。

的确,我们第一个班将近50名学生都是年轻的工程师,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航空工业部门。战前,航空学院被认为是全国最有名望的院校,大多数有抱负的年轻人都想进入这所大学。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被“斯大林招入”外交界的情况,虽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回事。此外,斯大林还有更进一步的打算。尽管在战争即将爆发前老一代外交官已经受到清洗,但他仍下决心不让旧的思维方式重新恢复。即使像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前孟什维克,由于他在西方国家中交际甚广又享有声望,因此在与美国和英国结成战时同盟

期间,他是有用的人——那样一些免遭清洗的保守派人士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年轻的安德烈·葛罗米柯被送出国,在驻华盛顿使馆被培养成为参赞并协助李维诺夫工作。但是,李维诺夫一点儿也不喜欢葛罗米柯。外交部的老人回忆说,这位大使在年度人事报告中写道:葛罗米柯“不适合担任高级外交职务”。不管此话是真是假,反正档案里已找不到这份报告。

这些新生大多像我一样是技术人员,不可能受到旧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没觉得会轻易受到斯大林暴行的伤害,当时我们只是模模糊糊地听说过这些事。我们家族所有的人都是工程师或技术人员,除了我姑父不管怎样是个数学教授外,我们都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在斯大林时代,我们像其他人一样感到很安全。一旦听到召唤,你别无选择,你只有听从。不管害怕与否,你都要走下去。

跟李维诺夫学外交,跟沃尔孔斯基家族的公主学礼仪

高等外交学校设在离红门地铁站不远的一座二层小楼里。学校有两个系:西方系(学制二年)和东方系(学制三年)。主课是外语,因为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会讲俄语。我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学会外语,以便开始会话并能够阅读报纸和政治文献。我和另外七名学生被分在英语班。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在战争期间,英语国家已和我们结为同盟,此外,在航空学院上学时,我跟一位曾在美国工作多年的教授学过英文,并且非常喜欢这门课。

17

学校拥有许多出色的教授。有些语言教师是英国人,他们的俄语不够好,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相互理解。著名教授斯卡兹金、赫沃斯托夫、杰博林、列别杰夫以及其他一些老师讲授世界史和外交史。我们与当时杰出的外交官——如李维诺夫、特罗扬诺夫斯基、斯坦因、古谢夫以及其他一些曾出任过大使的人——举行的讨论会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来莫斯科出差的大使们偶尔也到我们学校讲演。他们并没有特意按照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

争的模式来教导我们，而是教导我们以传统的实用外交手段来处理不同国家的事务，即如何为了苏联的利益而坚持和调整政策。

与此同时，提供给我们阅读的主要是共产党国家的刊物，这对我们的英语学习很不利。主要的资产阶级报纸，如《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还有像《时代》和《新闻周刊》这样的杂志，只有经校长特批或毕业生写论文需要时才能借阅。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对待一切外国事物的态度就是如此，尽管设立这所学校的目的就是培养出国工作的人。难怪那些被派到驻西方国家使馆工作的学校毕业生会感到自己很难适应西方国家主要报刊及其读者们的语言和术语。

口语训练也是一样。我们的毕业生能够轻松自如地与我们的“朋友”——这是党内称呼外国共产党人时所用的隐语——谈论某个马克思主义的话题。然而，在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官，甚至与驻在国的平民百姓讨论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时，他们便感到不知所措。他们不得不抓紧时间自学，以便能够胜任他们在使馆中承担的工作。

我们在外交学校学习的第一年里还上一门外交礼仪课，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我们将很快作为外交官涉足的那个社会的行为方式和规则，对此我们只是从书本上有所了解。我们的课程很像是在演戏：我们必须想象自己正在出席外交招待会、午宴和晚宴，对此我们大家一无所知。指导我们上课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贵族夫人，她出身于著名的沃尔孔斯基公主家族。

18 我们通常坐在一张宽大而结实的桌子前面，桌上摆满了必需用的勺子、刀子、叉子和葡萄酒杯。一切都是真的，但有一样除外：不提供食品或葡萄酒（当时是战争时期，食品极为短缺）。扮成侍者的人假装给我们面前的真瓷盘里添菜，遗憾的是，盘子里是空的。

这时，站在一旁的那位贵妇人发话了：“现在开始喝汤。假设已经给你们端来了奶油浓汤。”接着，她又对这种汤和其他可能端上来的汤做了一番描述。随后又上来一道鱼和各种各样名称特别复

杂的荤菜。她还教我们如何使用这种或那种特殊的刀叉以及如何同我们的邻桌交谈。她特别强调,按照礼仪,要依次将鱼、肉、甜点或其他食物端上餐桌,并相应地给我们的杯子里假装倒各种葡萄酒——白兰地、波尔多葡萄酒、白葡萄酒和苏联葡萄酒。这一切只能勾起那些因食品配给不足而饥肠辘辘的年轻人的食欲。

1946年,经过高等外交学校两年的学习,我们即进入了结业考试。外交部副部长、前驻华盛顿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担任考试委员会主席并主考英语。他精通英语,口语流畅,但发音很糟糕。由于仅学习了短短的两年,可怜的学生们口语说得不太流利,而且在这样一位著名的外交家面前,他们往往显得惊慌失措。老师们常常走过来救我们一把,用比较简单易懂的英语重新解释一下他提的问题。李维诺夫对老师们试图帮助我们的做法显得很宽容,并且给我们打了高分。他说出国后的实际工作将“教会你们一切”。他以这种方式祝我们好运。

按照莫洛托夫的指示,这所学校的毕业生被分配到苏联外交部各个部门工作。只有我留校准备再读一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毕业聚会上,我和我的导师、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弗拉基米尔·赫沃斯托夫进行了一次友好的交谈。他虽是一名迂腐的学究,但为人很正派。由于聚会的气氛很轻松,他喝了些葡萄酒后便同我们这些学生聊了起来。这是一次非正式的、很随便的交谈。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历史学家和工程师这两种职业哪一种更难搞?我们的见解各不相同。由于在毕业聚会上美餐了一顿,我的心情有些激动,因此提出了一个和导师完全相反的观点。我极力证明我的第一个职业是多么的难搞,并且提出了一个自以为是很有分量的论据。我宣称虽然我是一名工程师,但是我能在一年的时间里写出一篇历史论文并通过答辩,得到历史学博士学位,而历史学家却不能在一年内在工程学领域取得这样的成就。大家开始喊起来,都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过了不久,我们大家就忘记了这场争论。

19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外交部长的指示在学校里公布了,毕业生被分到外交部工作。部长的指示说,多勃雷宁同学将留校再读一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我早已将那场争论忘了个一干二净,所以我跑去见导师。他狡诘地笑了笑,然后说道,他向莫洛托夫转达了我想再留校一年并准备进行论文答辩的“愿望”。他向我保证,他本人支持我的这一“愿望”。莫洛托夫破例同意了。

我没有退路可走。我必须在学校再呆上10个月并撰写我的论文。这篇论文是以我的毕业论文——关于俄日战争期间美国的远东政策——为基础写成的,并且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它着重论述了俄美在这场战争期间的外交关系以及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作为调停人所起的作用。这项工作使我开始研究美国的外交史。

一年以后,这篇论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但书上署的却是我的笔名多勃雷夫,因为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不能用真名发表作品。这本书的出版使我当上了助理教授,并使我在从事外交工作之余还可以到国际关系学院讲授美国外交政策史。我在外交部担任教育司司长助理,获得这一任命的原因是我有个博士学位。

我们这个司在外交部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外交工作可做。几个月过后,我发现自己陷进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手册里,所以开始讨厌这项工作。我早就希望有一天我能从事真正的外交活动。但由于同学校的那位导师进行了一场愚蠢的争论,结果使我干上了这份令人生厌的工作。

在外交部当学徒

一年过去了,新任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让我担任教育司司长的职务。一想到要在这个部门消磨我的余生或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时光,我心里实在感到害怕,因此我当即表示拒绝。我的回答惹恼了这位部长,因为他给我的是一个参赞的职位,在级别上相当于一名将军。于是他真的大发雷霆。维辛

斯基30年代曾在莫斯科的肃反审判中担任心狠手辣的检察长，他批评下属时态度之粗暴也同样是臭名昭著的。

“你只不过是一个新来的人！拒绝接受一个将军的职位！”他向我大声喊着，“你知道部里有多少人在抢着担任这项职务吗？” 20

他对我说了一些他的想法，然后大声喊道：“你可以走了！”他在我的任命备忘录上粗暴地打上叉，把它扔给人事司司长彼得·斯特伦努科夫，并指责他“十足的无能，竟提出这样愚蠢的建议”。

可以想象，在向这位令人生畏的部长表达了个人意见后，我的思想状态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回到教育司继续当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然而，过了不久我又交上了好运。几个月后，瓦列里安·佐林——我国最有经验的外交家之一——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他此前曾担任我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推翻战后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亲西方政府的过程中，他起了一定的作用。他需要有一个由职业外交官组成的他自己的秘书处。我们司的司长亚历山大·波波夫金和佐林关系很好。他得知我渴望成为一名外交官后，把我推荐给他的朋友。尽管佐林是一位雄辩家，在60年代担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时，他的这一才能已众所周知，但他是一个聪明而又和善的人。

到1952年，我已为佐林工作了五年，开始时是二等秘书，后来成为他的第一助手。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每当我将部内各单位送来的各种文件呈交给他考虑时，他总是征询我的意见，并且越来越相信我的判断。这就使我更加认真地审查这些材料。我效仿并学会了如何解决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呈送给维辛斯基、莫洛托夫、甚至斯大林等高层领导批示后又转交给我们处理的问题。因此，在提出和制定政策方面，我获得了广泛的经验。如果遇到弄不懂的问题，我就在适当的时候向佐林请教。他总是抽空向我解释，为什么要以特殊的方式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我必须说明，在那个时候，整个国家机器的运作都是以一种非

常奇怪和反常的方式——即“和斯大林一致”的方式——进行的。斯大林习惯于下午4点或5点开始他一天的工作(没人知道确切的原因)。与之相应,维辛斯基、莫洛托夫大约在下午1点或2点才出现在部里,他们的副手则比他们提前一个小时左右坐在办公桌前。我们这些在秘书处工作的人要轮班昼夜工作。第一助手早上9点或10点来上班,把新送来的文件分类并准备好。部长的副手和他们的助手们要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到4点钟,也就是说要工作到斯大林就寝为止。但愿别发生斯大林午夜打电话找某人,而他不在工作岗位的情况。我们,包括我们的上司都被搞得精疲力竭。我们只好和其他的助手们轮换着在办公室的长沙发椅上睡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工作。

作为副部长的助手,我们无法与斯大林单独接触。然而,他的名字令我们不寒而栗。我一生中只面对面见过斯大林一次。那天政治局要召开一次会议,事先已通知佐林参加。会议开始前,他发现还需要另外一些文件。因此,他从克里姆林宫给我打电话,要我立即从部里把文件送去。当我轻快地沿着克里姆林宫的走廊向政治局会议室走去时,突然看到斯大林和他的警卫人员从长廊的另一头慢慢地走过来。克里姆林宫走廊的天花板很高,但走廊本身又长又窄,门与门之间隔得很远。我飞快地先扫视一下左边,又扫视一下右边:既没有旁门也没有边廊让我隐蔽一下。所以我只好紧贴着墙壁,站在那儿等待斯大林走过。

他注意到了处于慌乱状态中的我。走到我面前时,他问我是谁,在哪儿工作。然后,他伸出右手的一个手指在我面前慢慢晃动着,加重语气说道:“年轻人不应该害怕斯大林同志。我是你们的朋友。”说着,他点点头,继续向他要去的地方走去。

当天夜晚,我把白天遇到的事情告诉了佐林。开始他很紧张,但得知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和蔼时,他才放下心来。随后他说道:“斯大林是个难以琢磨的人,最好还是离他远些。”

他对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斯大林时常对外交部的工作做出

一些极端的决定。我记得有一次佐林开完政治局会议回来后，神情十分紧张。他说他断定葛罗米柯和他要完蛋了，因为斯大林对他们大发雷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外交部与财政部联合起草了一份有关中国人民币与苏联卢布汇率的文件。当时，佐林正主管中国事务。他把文件呈送葛罗米柯（他是第一副部长，当时正代理部长职务）最后审定。葛罗米柯将此文件暂时搁置在一旁。一方面，他认为卢布—人民币汇率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他不想为此而打扰斯大林。另一方面，葛罗米柯生性谨慎小心，因而做事犹豫寡断。

中国政府和我国驻北京使馆再一次催促做出决定。佐林亦再次表示支持它们的要求。葛罗米柯最终批准了这一文件，但他很不情愿这样做，因为他对此事没有把握。这样做意味着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新政权做出了一个友好的姿态，而斯大林对此尚未置可否。过了不久，斯大林知道了这项决定，于是将它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会上，斯大林把葛罗米柯和佐林的所做所为说成是“骄傲自大的外交部官员公然越权”，并问政治局成员该如何处罚这两个人。由于没有人知道斯大林的真正动机，所以每个人都保持沉默。对葛罗米柯和佐林说来，那真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时刻。

22

斯大林在做了极为严厉的斥责之后，向政治局宣布，应该撤销葛罗米柯第一副部长的职务，将他派往（他在此停顿了一下）英国当大使；佐林应受到严厉的批评和警告。事情就这样决定了。葛罗米柯去英国呆了9个月，直到斯大林恩威并施，恢复了他先前担任的第一副部长的职务。佐林在接受口头批评后，也得以解脱。

每当斯大林不与任何人协商便独自作出“果断”决定时，事情就变得更为糟糕。那些决定——诸如走向冷战，在南斯拉夫对铁托采取行动，在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决定对联合国安理会实行抵制等——极大地损害了我们的对外关系。

然而，总的看来，斯大林对葛罗米柯还是相当偏爱的，并且非常重视他的意见。斯大林去世后，一贯非常保守的葛罗米柯在和我们私下交谈时以钦佩的口吻谈论起斯大林。他回忆说，斯大林总是

亲手准备所有的讲话稿,包括在党代会上做总结报告时的讲稿,为此他要参阅大量的资料。他还常常亲自为报刊写文章。葛罗米柯不无赞扬地回忆道,当外交部草拟的外交照会送政治局审议时,斯大林不仅提出意见,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他还口授他的指示,葛罗米柯当场便将这些指示记录下来。

葛罗米柯回忆说,在派他担任驻华盛顿大使时,斯大林向他提出一些建议。斯大林得知葛罗米柯不大懂英语,便建议他星期天去美国教堂听布道。他说,传教士讲的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语言,而且由于布道反应了教徒的日常需要和渴望,因此他可以通过这一途径了解美国国内情况。(斯大林显然是基于他早年曾当过神学院学生的经历提出这一建议的。)

当然,真到了华盛顿之后,葛罗米柯并不敢去教堂,但他后来承认,他长期从收音机里聆听著名传教士布道。

23 葛罗米柯回忆起1945年斯大林、杜鲁门和温斯顿·丘吉尔战后在波斯坦举行最高级会谈期间的一段插曲。杜鲁门收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电报后,小心翼翼地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一情况。他漫不经心地提到美国已试制成功一种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斯大林点点头,没有说话。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显然没有理解这一新闻的重要性。然而,丘吉尔错了。

斯大林回到他的总部后,立即给负责我国原子弹研制绝密计划的总指挥伊戈尔·库尔恰托夫打电话,向他通报了杜鲁门的谈话,并命令他加快工作进程。库尔恰托夫提出他遇到的难处:第一,此项计划正在消耗大量的电力资源,而我们这个受到战争摧残的国家当时的电力供应极端不足;第二,他没有足够的拖拉机开垦西伯利亚森林以建立核工厂。

斯大林当即做出决定。第一,切断一切庞大的居民区的电源——当地的工厂除外——以满足核计划的需要;第二,调两个坦克师归库尔恰托夫指挥,将这些坦克用作拖拉机开垦这一地区。

1952年初,我打算向佐林谈谈我今后的工作问题。我已经在

的秘书处工作了将近五年，很想去某个使馆工作。佐林同意了我的请求，他说一个真正的外交官必须有在国外工作的经验。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我国驻瑞士使馆很快将空缺出一个公使的位置，他打算推荐我担任这一职务。

按照当时的习惯做法，对驻各国使馆最高负责人的推荐要由外交部长当着他的所有副手和被提名者的面进行考虑。当天的紧要问题也是在这种会议上研究决定的。这种几乎天天都要举行的会议被称为“部长同副部长讨论会”。他们要到午夜才开会。在这些会议上，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实际上是唯一的发言人（他喜欢在这种场合讲话并引起大家讨论。在这种会议上，他能够展示他那惊人的口才）。

任命我到驻瑞士使馆去工作一事也是在这样的一次夜间会议中讨论的，那是我第二次与维辛斯基面对面地谈话。当会议开始讨论我的任命时，他立即想起了我就是曾经拒绝就任教育司那个受人尊重的职位的人。

“噢，是的，当时你告诉我，你想当一名活跃的外交官，到国外工作，”他以嘲讽的口吻说道，“我看你选择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地方——瑞士，只有领养老金的人或者是快退休的人才被派到那儿去工作。”

我解释说，我并没有选择那个国家，而是因为那里恰巧有个位置。我还说我准备去其他任何国家工作。

“那就不一样了，”他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送到哪儿，让他能干些工作而不是闲着没事呢？”

没有人说话。于是他像是刚想出一个高明的主意似的说道：“让我们把他送到我们驻华盛顿的使馆当参赞吧。我们和美国人的关系很糟，就让他试着去改善关系吧。”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我就是这样完全出人意料地置身于苏美关系领域之中的，对此我从未感到过遗憾。从1952年至1992年，我的外交生涯的绝大部

分都奉献给了这项事业。

当时，外交部官员不能乘飞机去美国，因为那样做花钱太多，所以只能乘船到纽约。我们乘坐的是“法兰西”号豪华海轮。我们将首次在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在学校里学习礼仪知识。一切都很顺利，只是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小插曲。我妻子和我走进餐厅时，得到了一份印刷精美的菜单，上面列着一长串的菜名，其中大多数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此外，所有的菜名都是用法文写的。我们仔细看了看菜单，然后点了几道不重样的菜，以便尽量多学点东西。点菜时我就感到有点不对劲，但服务员却不动声色地拿走了菜单。结果我喝了两份不同的汤。我们把菜单带回房间，借助字典彻底研究了一番。

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学习外交规则

1952年9月，我第一次到美国。作为职业外交官，我当然已大量阅读了有关该国历史、政治和经济制度、科技及文化的书籍。由于几乎天天都要阅读我国驻美使馆发回的电报，并且定期同负责美国事务的官员交换意见，所以我十分了解我国目前与华盛顿的关系。我知道，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多姿多彩、十分独特的生活方式，但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全面认识这个国家是不大容易的。

现实生活出乎我的预料。一个幅员辽阔、景色美丽的国家，宏伟的都市，高速公路上奔驰着很多小汽车，现代化的工厂，充满活力的生活节奏，很高的生活水准，活跃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报刊舆论的多样化——这一切构成了我对美国生活的第一印象。它与我自己的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因此过了很长时间我才逐渐适应了这个新国家，并且最终喜欢上了它。可以说，大约30年之后，美国的生活方式已成为我的第二天性。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走进这个新的世界既不轻松也不顺利。我是在冷战已进入高峰，实际上已非常接近于“热战”之际来到美国的。斯大林当时仍然在世，很多美国人为朝鲜正在进行的战争和全面的冷战而指责他。欧洲的分裂已经成为现实，这种状况甚至可能延续几个世纪。因此，苏共领导层和外交使团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上不可能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至于美国，我

到任时它正在举行总统竞选——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最终取得了胜利,据说当时他正在考虑在朝鲜使用核武器,而且全国上下都处在疯狂的反共、反苏的浪潮中。

26 所以,来到华盛顿对我来说实际就是走进了敌国的领土。我当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实信徒。我相信社会主义最终会战胜资本主义。我的头脑里装满了长年灌输的斯大林主义理论,装满了我们自己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装满了我们根深蒂固的信仰和观点,这一切导致我们错误地认为,美国的一切打算都具有侵略性质。

斯大林把美国的计划和行动看成是为进行一场全面的侵苏战争做准备。正如他的继任者尼赫塔·赫鲁晓夫后来回忆的那样,苏联领导层当时认为,拥有核武器优势的美国最终将同苏联进行一场战争。苏联外交深受这种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主义教条的影响,这种状况自然也会影响我们与美国当时的关系。然而,这一教条也是由于美国在战后长期持敌视态度并且对苏联毫不让步才得以强化的。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时期,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机会。不幸的是,曲解我们的对手及其意图是斯大林留给他的继承者们最为长久的遗产。克里姆林宫在转折时期不可能遗弃斯大林的对外政策。造成形势不稳及苏联领导人担忧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任命首席冷战专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为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的共和党新政府。美国政府的政策使已经怀有很深成见的苏联新领导人进一步认定,他们既不可以期待也无法改变华盛顿的反苏态度。结果,也是在我们自己的冷战专家——如莫洛托夫——的推波助澜下,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显然早已认定,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不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除了为避免同美国直接发生冲突并且将自己打扮成坚强有力、但比斯大林更加爱好和平的样子而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之外,他们决不冒险。结果,冷战因此而全面地延续下来。

1952年9月27日,我开始到我国驻华盛顿使馆上班。我们的大

使是格奥尔吉·扎鲁宾，他曾出任过驻加拿大和驻英国大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他的外表冷峻而严厉，反映出典型的“斯大林学派”的特征，但总的看来他还是一位文雅正派的人。他有一个他试图以一切手段来隐藏的秘密。尽管10多年前他即出任过一些英语国家的大使，但他对这门语言了解得非常差。然而他在部里却有个好名声。那里的人认为他的英语说得很流利。

正如我后来所了解的那样，大使为保守这一秘密而在使馆内部安排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工作日程。每天早晨他都要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开会。会上，我们要汇报各自被指定阅览的那些美国报纸的内容要点。这要占用几乎一上午的时间。我试图让大使相信，这样做纯粹是浪费时间，如果我们每个人独自研究报刊，挑选最重要的文章阅读，效果会更好一些。我的劝说全然无效，“集体”研究报刊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他的整个任期结束，其借口是外交官必须熟悉美国所有报刊，而不仅仅是某些报纸的内容。只是到后来我才明白，需要全面了解美国报刊内容的正是他自己。在那些“集体读报会”上，他常常会选择最令人感兴趣的题目，要求我们就此题目为莫斯科准备报告。

27

除了大使，使馆还有四名高级官员——公使衔参赞鲍里斯·卡拉韦夫和三位参赞。三位参赞中的两位——我和康斯坦丁·费多谢夫——来自外交部，另一位，弗拉德金来自情报部门。最初我不得不负责美国内政和经济问题。对此分工我不太满意，因为和所有年轻的外交官一样，我希望能负责对外政策这一关键性工作。但我只能服从安排。所以我被任命为使馆处理这些问题的部门主任。我必须承认，我后来很感谢扎鲁宾大使安排我一上来即负责处理大家都认为非常枯燥的美国国内问题。外交部的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了解程度都极为有限。在华盛顿，我能够全面彻底地研究这些问题，这对我后来的外交工作很有帮助。

然而，我作为对外政策专家的名声在使馆内部也越来越大。当莫斯科提出重要的要求，要我们提供情报或其他信息时，大使总要

和参赞们进行讨论。在讨论会上,很快即可看出,尽管我不像我的同事们那样熟知美国国内事务,但对重大政策问题我却非常在行。这得益于在莫斯科部长秘书处工作的经历。在那里,我们经常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重大问题。此外,在莫斯科,我们常常撇开正统的官方政策思想——在使馆中人们必须捍卫这些政策——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我习惯于从更广阔的角度(当然有严格的限制)考虑问题,尽管发表意见需要有勇气。总的看来,这种思想方式对我的外交生涯很有帮助。

有一次,大使接连收到莫斯科提出的两个重要要求,要使馆就我们与美国关系的现状提出意见。在讨论如何答复的过程中,我们的看法出现了分歧:我提出了一种选择,其他参赞提出另一种选择。大使两次站在我的同事一边。而后来莫斯科就这两个问题向我们发出的电报指示却几乎和我在会上提出的选择完全相同。

过了不久,大使又接到一份电报:斯大林直接命令使馆就美国总统大选提出意见。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因为斯大林的指令按程序通常会发给外交部,而不是发给使馆。答复在紧急地准备着。大使办公室的讨论又出现了与前两次相同的情形,我又一次成为少数派。权衡再三,大使决定用多数人的意见答复莫斯科。莫斯科的反应令人十分沮丧:“你们的意见考虑不当。”

这件事过去之后,大使邀我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他很想知道我何以能猜到莫斯科的意图。我说我真的没猜出来,而且这其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我长期目睹制定重要政策的过程,因此积累了直觉知识和经验。此后不久,大使便决定,所有发往莫斯科的电报草稿要在送交他之前都由我批示。1954年7月24日,我被提升为驻华盛顿使馆的公使衔参赞。当时我的年龄是34岁。

陪同莫洛托夫横跨美国

翌年,莫洛托夫来到美国,担任我国参加在旧金山——1945

年，联合国宪章在这座城市签署——举行的纪念联合国成立10周年庆典代表团团长。乘船抵达纽约之后，他决定坐火车去旧金山，并沿途游览一下这个国家的风光。他让扎鲁宾大使与他同行，扎鲁宾又带上了我，因为我已经熟悉了美国的情况，在旅途中可能有些用处。

这次火车旅行用了三天两夜的时间。尽管莫洛托夫的性格相当内向，但他对美国的企业以及工农业的发展规模却大加赞赏。当时，苏美关系根本算不上友好，冷战方兴未艾，这一切当然对公众舆论有很大影响。很多好奇的人常常聚集在火车站，希望看一眼“真正的莫洛托夫”。

我们很少在火车站停车，即使停下，时间也很短。幸运的是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人们仅仅是好奇，并没有表现出友好或敌对的情绪，只有一个地方——芝加哥除外，那里聚集了一大群情绪激动的人。芝加哥有很多来自斯拉夫和东欧国家的移民，他们对莫斯科的统治不满。这个城市也是很多工会的总部，而这些工会均对苏联持敌视态度。当莫洛托夫往窗外看时，人群中发出了讥笑声（并没有任何其他抗议行为）。火车开动后，莫洛托夫问扎鲁宾那些人在笑什么。

29

“那是美国人的一种欢迎方式。”大使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莫洛托夫显然大惑不解，他表示这真是一种欢迎外国人的奇怪方式。我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什么也没说，以免使扎鲁宾下不来台。

在旧金山，我必须时刻陪伴着莫洛托夫，并充当他的翻译。他自己的随行翻译、也是我的朋友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已经匆匆返回莫斯科参加他父亲的葬礼。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是在美国长大的，并且在美国学校上过学，所以他的英语无可挑剔。我必须承认，只是在我不得不顶替他时，我才认识到翻译工作实际上有多么艰难，尽管从表面上看，这项工作似乎很容易。会谈中所有的细枝末节都必须一丝不苟地准确翻译出来，因为它们往往具有

重要的外交和政治意义。虽然我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但我根本没想过会做专业翻译工作。总的说来,我的工作令人满意的。最难做的事是根据记忆写出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以便为他起草送交莫斯科的报告——和专业翻译不同,我没有速记的本事。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位信奉资本主义和基督教的道德家,正如莫洛托夫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样。在为他们两人不愉快的讨论做翻译时,我感觉到这几乎是一场聋子和瞎子的对话,尽管外交谈话的全部规则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守。这是世界两大意识形态体系的两位最杰出的代表极具象征性的对峙。显然,只要他们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们掌握着权力,冷战就不会结束,苏美关系就不会改善。他们对任何问题都没有一致看法,而且他们在谈话时所使用的是一种你从任何一张报纸——美国报纸代表杜勒斯的观点,真理报代表莫洛托夫的观点——都可以读到的毫无生气的语言。

他们根本不想摸清楚对方的真实意图,也不想用传统的秘密方式讨论细节问题。莫洛托夫和杜勒斯根本不愿采用传统的外交方式、平等地相互交换意见。通过传统的秘密外交方式,一方往往能够向另一方透露一些情况。但这不是莫洛托夫办事情的风格,而且他对待我们的态度往往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他这个人干巴巴的,干得像烤面包——后来的葛罗米柯也是如此,除非你非常了解他。

30 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可以反映莫洛托夫的思想状态。在纽约到旧金山的火车上,有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陪同我们,在旅途中他呆在自己的包厢里。他是位很有礼貌的人,从不打扰我们,并且总是给我们提供帮助。有一次,莫洛托夫对我们正在经过的一个地方很感兴趣,因此索要地图。不幸的是,谁都没有随身携带地图。他说了我们一声“没脑子”,就再不和我们谈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去找国务院的那位陪同,对他讲了我们遇到的麻烦。他告诉我不要着急,下一站我们就可以拿到一张地图。他真的很快给我们

拿来一张彩色地图，上面标有我们所走的这条铁路和沿途路过的车站。此外，地图上还标有庞大的军营、军事基地以及为它们提供服务的火车站的位置。

我们把这张地图交给了莫洛托夫。他看到那些军营和基地后吓了一跳。他说人家是有目的地给了我们一张秘密地图，这是一种挑衅，美国报纸就此可以写文章说莫洛托夫一路上一直在搜集秘密情报。他命令我们立即把地图交还回去，于是我就找到那位国务院官员，他笑着说，那根本不是秘密地图。相反，所有的火车站都会向“你们这样”的旅行者随便分发这种地图，它主要是用于帮助军人们找到他们的基地。没有人将他们的驻地当成是秘密。

到了下一个车站，他又从邮局给我们弄来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没有标出任何军营和基地。我们把它交给了莫洛托夫，他为他的“警惕性”而倍感自豪。我把原先的那张地图留作纪念而没有告诉他。

由于特罗扬诺夫斯基没有从莫斯科返回，莫洛托夫通知我陪同他乘坐《玛丽皇后》号轮船返回欧洲。这回我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因为莫洛托夫实际上一直呆在他的贵宾舱里，甚至连饭都是送到舱里去吃。他不大挑剔饮食，点的都是最简单的菜。早餐他只吃他的厨师从莫斯科带来并为他做好的谷类食品。船上厨师的职业自尊心多少受到了一些伤害，他提出做“莫洛托夫先生想吃的任何一种粥”，因为船上备有一切可以想得到的粮食。然而，我们的上司执拗地拒绝了所有的提议。

每天早晨，轮船走廊上都可以看到一排奇怪的队伍。这支队伍由三个人组成：我是第一个，以便应付可能需要与外界联系的情况。第二个是我们的厨师，手里端着他的水壶。莫洛托夫的卫士长亚历山德罗夫走在最后。我们的厨师将走进大厨房，船上的厨师们将盯着他，对他手里的水壶惊讶不已。然后，我们的厨师将用热毛巾裹上水壶，然后我们又一本正经地返回部长的贵宾舱。

回莫斯科做莫洛托夫的助手

将莫洛托夫送回莫斯科后，我又飞回华盛顿，回到我在使馆的工作岗位。然而，几个星期过后来了一道命令，任命我为莫洛托夫的助手之一，并指示我返回莫斯科。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在那个时候，这是很正常的事。坦率地说，我已经喜欢上了我在使馆的工作。我已和很多美国人熟悉起来，并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很多外交官建立了联系。我发现了一个崭新而又迷人的世界，根本不愿意重新回到外交部秘书处，与原来的那些同事一起按照刻板的日程安排工作。但是命令就是命令，我必须服从。

为莫洛托夫工作了一年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那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的关系日趋恶化。这使得莫洛托夫性情烦躁、疑心很重，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向为他工作的人克制自己的行为。

他是一个办事有条不紊、谨小慎微的人——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他为数不多的优良品质之一。他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分出八个部分，尽管这些部分的划分界限只有他自己知道（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他的助手们——把新送来的所有材料严格按照准备送给政治局、部长会议的、外交部的，依次放在桌上不同的位置。来到办公室后，他首先浏览放在最重要位置上的文件。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把某个文件或某份密码电报放错地方，那是绝对不行的。当他有空时，他总要躺在里间休息45分钟。一分不多，一分也不少。在他休息时，他的卫士长便站在门口，不让任何人打扰他。他接待来访者或要召见的人也非常守时。他不喜欢长篇大论或在会上争吵。他自己写的报告总是不动感情，简明扼要。

莫洛托夫在对外政策上完全坚持教条主义的立场。他不仅在斯大林在世时积极支持斯大林的政策，而且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实际上还是执行这一政策。当时，政治局就与奥地利签订一

项和平条约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签订这一条约意味着美国、英国和法国最终将从奥地利撤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结束，而奥地利则以此来换取它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和外交斗争中的中立地位。莫洛托夫反对签订这项条约，理由是苏军撤出奥地利有可能削弱苏联在欧洲中部的地位，并将使苏联失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大部分成果。但是，那时欧洲的政治气氛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促进战时盟国间关系的稳定已成为主要趋势，莫斯科对此不得不予以考虑。结果，莫洛托夫成了少数派，与奥地利的和平条约于 1958 年 5 月 15 日正式签订。这件事对莫洛托夫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威望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在此以前，所有决策实际上都是由他做出的。

32

随着与西方关系的不断改善，莫洛托夫变得越来越孤立，同赫鲁晓夫也更加对立。我们这些在秘书处工作的人很自然地感觉到莫洛托夫之星正在陨落。他最终被解除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尽管他仍保留着政治局委员的地位。赫鲁晓夫任命德米特里·舍佩洛夫担任外交部长。他是一个和莫洛托夫恰恰相反的人物：和善可亲、平易近人而且毫不教条。但是仅仅一年之后他便同联合反对赫鲁晓夫的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尼克拉·布尔加宁、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及其他一些保守派人士一道被撤职了。舍佩洛夫最初是赫鲁晓夫的追随者，但他错误地和那些人搞到一起并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反对派是在赫鲁晓夫做了著名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讲话，接着在政治上实行“解冻”并试图搞国内改革之后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内部斗争最终以赫鲁晓夫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赫鲁晓夫凭借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大多数人的支持将他的反对者全部清除出政治局。

赫鲁晓夫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对外政策观念，虽然他愿意接受新思想，经常凭一时冲动在这一领域里搞些即兴之作。他之所以挑选葛罗米柯做他的外交部长是因为看重葛罗米柯的职业作风。他认为葛罗米柯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官员。可以相信他会不折不扣

地执行赫鲁晓夫和政治局的命令,正如赫鲁晓夫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如果让他坐在一大块冰上,他真的会坐”。但这只是一半原因。另外一半原因是,在政治局里,葛罗米柯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日常管理人。在政治局内部或单独与赫鲁晓夫讨论时,葛罗米柯会毫不犹豫地表明并且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一旦做出最后的决定,葛罗米柯总是诚心诚意地、而且是非常固执地执行政治局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全部指示,决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偏差,尽管在谈判过程中客观情况常常要求我们表现出某种灵活性。

33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葛罗米柯有很强的纪律观念,并且不打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层中谋求其他职务,才使他能够在外交部长的位置上干了将近30年。他是完全称职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一种良好的直觉,这种直觉可以帮他推测出谁将在下一轮的权力斗争中获胜。即使在他的政治生涯即将结束之际,葛罗米柯仍能准确地选择获胜的一方。1985年,他以其著名的评语——“他是一个有着迷人的微笑和铁一般牙齿的人”——来支持任命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尽管戈尔巴乔夫的主张和葛罗米柯截然不同而且很快便抛弃了他。

在联合国短期工作

葛罗米柯把我留下做他的助手,而且我从一开始就和他相处得很好。他答应了我的请求,同意调我去做实际的外交工作。根据他的推荐,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任命我为负责联合国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与此同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我特命全权大使的官衔。我暂时脱离了苏联外交部的工作,像西方外交界的一些同行们一样,成了一名国际公务员。刚开始时,处理大量枯燥无味的联合国决议的工作显然令人不感兴趣,但葛罗米柯帮我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授予我撇开我们驻纽约和华盛顿的外交官,从纽约单独发回消息的权利。

当时，联合国秘书处大约有 150 名苏联雇员，虽然从国家的声望和承担预算经费的比重来看，苏联派驻联合国秘书处的人员应是这个数字的两倍。然而，准备派到那里工作的候选人明显不足，我们的职业外交官并不愿意去从事这项十分特殊的工作。冷战期间，联合国秘书处的西方官员反对雇用俄国人，尤其不愿让他们担任高级职务。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苏联的意见在最高层不被忽视。

我们派往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来自情报机构，这或多或少已是个公开的秘密。我们这些职业外交官彼此都非常了解，而弄清楚苏联工作人员中每个人的确切身份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尽管情报圈以外的人无法确切地知道情报机构在干些什么。这就将令人不快的阴影蒙在了在秘书处工作的全体苏联雇员身上。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消极因素。我们这些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苏联公民的收入比苏联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要高很多，为了“消除这种不公正”，苏联政府中的某个人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联合国的全体苏联雇员都要秘密地交给使团会计一笔钱，以平衡这种差异，虽然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享受诸如住房和汽车补助之类的额外津贴。每个月我都要从我的薪金里拿出一半多的钱上交。直到 1990 年，联合国的全体苏联雇员群起反对这种敲诈行为，这一做法才被终止。

34

莫斯科的保守主义在一件显然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上也表现了出来。联合国秘书处全体雇员的工资都是从纽约化学银行——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的联合国工资帐户上以支票支付的，我们自然也有支票簿。中央委员会人事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就炸了窝：联合国的苏联雇员居然像资本家一样有支票簿！我代表我的同事们为反对这种荒谬的指责而争辩了好几个月，最后我们终于得到允许，将支票簿保留了下来。

哈马舍尔德和我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私人关系。在他的副手中，我是唯一不把他当做雇主看待的人，因为我是从现任外交官岗位

上借调来的,而且随时都可能回到原工作岗位。所以,在每周五定期召开的他与副秘书长的碰头会上,我有时会委婉地表示不赞同哈马舍尔德的意见。有一天他向我吐露,在那些会议上,只有我提出过一些他无法做出明确而坦率回答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他提议,每当我遇到重大的问题或当他弄不清苏联的立场时,我们应该在晚上私下进行讨论。我当然表示同意,而且这种私人会谈成了惯例。有时他甚至阅读记载他的正式谈话情况的私人日记。很可能像这位贵族知识分子所预料的那样,这些谈话都有其值得讥讽的一面。这些谈话也使他和苏联领导层之间能够在我的任期内建立起联系。

鉴于哈马舍尔德的背景和品行,赫鲁晓夫并不太喜欢他,于是就引出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哈马舍尔德想访问苏联,因此我安排了对他的邀请。我建议他同赫鲁晓夫谈话时要简明扼要,特别是不要提出按照建立世界政府的模式重建联合国的激进想法。哈马舍尔德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我陪同他进行访问。在他们会谈时,赫鲁晓夫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联合国有什么新情况?”当我听到哈马舍尔德对未来的世界秩序以及联合国在其中的地位做了冗长而热烈的描述,以此来回答赫鲁晓夫的提问时,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的惊讶。

哈马舍尔德滔滔不绝地讲了大约20分钟后,性格粗鲁的赫鲁晓夫显然是生气了,他对翻译说:“问问哈马舍尔德先生是否想去厕所。”

35 翻译很犹豫。赫鲁晓夫叫他准确地翻译他的话,而且不要用“任何外交辞令”。大吃一惊的哈马舍尔德最后说,如果总理先生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不表示反对。

赫鲁晓夫随后建议休息一会儿,乘船去海上玩一玩(这一切都发生在黑海海滨)。哈马舍尔德以为是乘坐一艘大游艇,便欣然同意了。来到码头之后,他们看到的是一只四桨小皮筏。赫鲁晓夫拿起两只桨,把另外两只递给秘书长,但他根本不懂如何使用它们。

结果只有赫鲁晓夫一人划船。他带着哈马舍尔德在宽阔的海面上游荡了好长时间。卫兵们得到命令，不许靠得太近。一个小时后，小船返回了。赫鲁晓夫走下船来说：“我们进行了一场友好的交谈。”（赫鲁晓夫不懂英语，哈马舍尔德不会说俄语，而且翻译被留在岸上。）赫鲁晓夫肯定意识到他做得太过分了，因此，他们一边吃着丰富的早餐，一边以例行公事的态度讨论起联合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是，赫鲁晓夫的冒险行为仍然使哈马舍尔德震惊不已。

回顾在联合国的工作，总的说来我是满意的。我的英语已经说得非常流畅，我已经能够用英文编辑联合国文件。在纽约生活期间，我能够摆脱正规外交的束缚，在美国社会各界结识了许多朋友和熟人。这对我日后作为大使在华盛顿进行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至今我仍然能见到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样重要的是，我妻子和我在离苏联代表团很远的曼哈顿西部的上流社会居住区一所做住家用的旅馆里住了两年，我们逐渐适应了美国的日常生活。

我一直将我自己对美国政治生活的观察报告从纽约——我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送回国内。我后来得知我发回的部分电报已由葛罗米柯送政治局成员传阅。也许，那就是三年后——1960年初——将我从联合国召回并任命我为外交部部务委员会成员及美国司司长的原因。

返回莫斯科之前，我妻子和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以及我们存下来的美元）到加利福尼亚旅游了一趟。我们乘飞机到了旧金山，然后租了一辆汽车，沿着太平洋沿岸风景如画的一号高速公路驶向洛杉矶和圣地亚哥，从那里我们又去了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希望能看看科罗拉多大峡谷。但是，一场暴风雪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并且使空中交通陷于停顿，所以，我们只好搭乘一辆大客车，用了三天的时间横越美国，从凤凰城回到了纽约。我们仍然记得，在这个奇妙的国家里，不同的州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后来我当大使时，我走遍了这个国家，最后我们访问了整整 50 个州。

第三章

最高级会谈：

从另一个角度看最高领导层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

在苏美关系中，最高级会谈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参与了从1955年到1990年有苏联参加的所有最高级会谈。最高级会谈是终审法院，掌握着最高权力的国家元首们在这里可以进行解决国际关系中最困难问题的尝试。人们总是对这些会议寄予极大的希望。与此同时，最高级会议一旦失败了，将给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国际局势带来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双方总是试图通过发动宣传攻势来掩盖事实真相。这样做丝毫无助于改善两国的外交关系。

西方国家的某些人认为，莫斯科之所以对最高级会谈感兴趣，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因是最高级会谈能产生宣传效果。这只能说对了一部分。我可以证明，除非确信举行最高级会谈能够取得一些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具体成果，否则，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决不会同意与美国总统举行最高级会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准备在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议之前先等上一年或两年的原因。

赫鲁晓夫则有些不同。他总想取得积极的成果，但往往想不出取得这些成果的办法。他支持和平进程，但无法把他的承诺变成具体的协议。他好即兴演讲，他爱吓唬人，他的脾气很坏，但这一切全

部被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意识掩盖住了,这使得他和美国总统的讨论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激烈争论,虽然我还得说明,在这些争论中,赫鲁晓夫的对手同样也没有使和平进程变得更顺利些。也许是达成协议时机尚不成熟,赫鲁晓夫参加的最高级会谈——不管它们是多么的引人注目——成为苏美关系史上没有收获的里程碑。

1953年,朝鲜实现停战;1954年,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最后,奥地利国家条约于1955年签订。国际紧张局势的不断松弛使得举行和平时期的首次最高级会谈成为可能。“最高级会谈”这个词是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创造的,但首相任期的结束使他没有能够参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以来首次举行的最高级会谈。那次会议由1955年7月18日至23日在日内瓦举行。这座城市当时享有和平调停中心的美誉,因为战前它是国际联盟总部的所在地。我那时是莫洛托夫的助手,参加如此高级的会议,在我的外交生涯中还是第一次。

苏联代表团由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率领,然而他只能发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赫鲁晓夫作为共产党总书记,扮演着最为活跃的角色。美国代表团当然由艾森豪威尔率领,但是我们很清楚,其对外政策是由杜勒斯制定的。四大国中的另外两国是英国和法国,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划分德国和裁减军备。

艾森豪威尔主张在全民投票的基础上实现德国统一,然后将德国纳入西方安全体系之中。就我所知,赫鲁晓夫的确不相信在他有生之年德国会重新统一,他想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德分开,成为“一个工人国家”。这个问题直到冷战结束后才算彻底解决。

苏联提出了缔结削减军备和武装力量、禁止核试验、四大国承诺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等协议,其中关于不率先使用核武器一项在冷战期间一直排在东西方外交的日程表上,虽然1963年签订过一项有限禁止核试验的条约。

艾森豪威尔对军备控制一向很关心,他要求进行相互监督,以防止突然袭击——自从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以来,防止遭受突

然袭击几乎成为美国外交无法摆脱的主题。他建议苏联和美国互相交换有关各自武装力量所在位置的情报,并互派观察员现场核实情况。一个国家可以从空中拍摄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这就是所谓的“开放天空”计划。美国人非常清楚,这样严密的监查是绝不可能被苏联领导层接受的,因为它确信美国人是想利用这一机会搜集军事情报。这就造成了持续30年之久的恶性循环。我们的反对显然正合华盛顿的意,这样做至少使它在宣传方面成为赢家。

38 当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建议时,赫鲁晓夫坚持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在吓唬人,而且美国国会中不会有人同意允许苏联飞机飞越,比如说,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因此他建议我们接受美方提议并通过舆论宣传来监视白宫的举动。但是政治局根本不想听让美国飞机飞越苏联领土上空这类的话,因此拒绝采用赫鲁晓夫的策略。

即使陷入了这样的僵局,我国外交部还是对日内瓦最高级会谈持肯定态度,其原因部分在于这次会谈是在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中结束的,后来人们常常乞求用所谓“日内瓦精神”来帮助平息争执。

在我看来,美国方面的操纵者显然是杜勒斯。总统在对外政策问题表现出明显的无能为力,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把这些问题交给杜勒斯处理,而他本人对这些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艾森豪威尔感到,在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争论时,他自己往往处在一种困难的境地,而杜勒斯不得不一再从细节上帮助他。有一次,我们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谋求发动反苏战争的侵略集团。艾森豪威尔否认这一指责。赫鲁晓夫突然问他:“那为什么你们拒不接受我们加入北约呢?”

“你们已经提出申请了吗?”艾森豪威尔惊讶地问道。

“几个月以前提出的。”赫鲁晓夫回答说。

艾森豪威尔显然对此大惑不解。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不久以前,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并且

纯粹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外交部在致西方国家的一封照会中提出苏联是否有可能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不出所料，杜勒斯立即加以拒绝，但他懒得向总统报告此事。在日内瓦，他不得不低声向总统解释事情的经过，这时其他人在一旁交换眼神，竭力掩饰自己的笑容。为了给艾森豪威尔解围，赫鲁晓夫放弃了这个议题。

休会期间，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就个人生活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谈，会议结束时，他们显然相互产生了好感。艾森豪威尔接受了访苏的邀请，反过来，赫鲁晓夫从日内瓦回来后给艾森豪威尔以很高的评价。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不能判断艾森豪威尔是不是一位好总统。那要由美国人民去决定。但是作为父亲和祖父，我很愿意将我在学校和托儿中心的孩子们托付给他。”虽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赫鲁晓夫式的幽默，但他的确相信，艾森豪威尔决不会允许苏美之间出现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在这一点上，他像“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信任另一位老兵”一样地相信他。

但是，这种“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并不足以解决军备控制的首要问题——在整个战后历史时期，这一问题构成了苏美关系的核心。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双方都玩世不恭地利用了和平进程。所以，我们多年来的保密癖好使西方国家把控制和检查当作攻击我们的武器，他们借此向世界证明裁军事业是毫无希望的。当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时，美国人却向后退缩了，例如他们曾试图使自己的军舰逃避检查。

39

巴黎最高级会谈的失败

接下来的一次四大国最高级会谈被安排在巴黎举行，时间是1960年5月16日。当时我刚从纽约回来，在外交部担任美国司司长。我们忙着为会议做准备工作，这次会议将讨论裁军、核试验、与德国签订和平协议以及东西方关系等问题。

但是，直到会议即将召开之时，其前景如何仍无法预料，原因

是美国 U-2 侦察机于 4 月 9 日和 5 月 1 日两次飞越苏联领空。第二次飞入的那架飞机被我们的一枚导弹击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附近，飞机驾驶员——一名与中央情报局签有合同、名叫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飞行员——从飞机上跳伞并落入我们手中。我们知道，U-2 侦察机一个时期以来不断飞入苏联领空，但我们对它的入侵却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们的火炮当时还无法击落这种能在 8 万英尺以上高度飞行的奇特的飞机。

虽然 U-2 事件最终破坏了巴黎最高级会谈，然而，在此之前，这一事件就已经使苏联外交部中枢机构蒙受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耻辱。此事使著名的苏联外交官，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雅科夫·马利克受到了牵连。在 U-2 侦察机被击落，鲍尔斯被俘之后，赫鲁晓夫严禁任何人谈论此事。他希望美国人会认为飞行员已经死了，这样他们就会为飞入苏联领空一事编造各种谎言，以此来保全他们的面子。后来，赫鲁晓夫打算彻底揭露这一非法行动，通过鲍尔斯的口嘲弄美国政府。

几天来，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是，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马利克泄露了事情的真相。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立即得知此事，并从使馆发电通知了华盛顿政府。然而卢埃林·汤普森大使的电报到达华盛顿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华盛顿已来不及修改对这一事件的官方描述了。听说此事后，赫鲁晓夫勃然大怒，他立即撤了马利克在外交部的职务，并将他开除出党。整整三个星期，可怜的马利克一直在向他在莫斯科认识到的每个人表示彻底的悔悟。如果不是葛罗米柯亲自出面调解，劝说赫鲁晓夫原谅他那位多嘴多舌的副手的话，马利克再说什么也是没用的。

5 月 14 日，由赫鲁晓夫、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到达巴黎。我是代表团的顾问。美国代表团是由艾森豪威尔率领，陪同他的是克里斯琴·赫脱——他是在杜勒斯患癌症去世后接任国务卿的。

根据日程安排，四国政府领导人于 5 月 16 日举行了预备会议。

会上赫鲁晓夫第一个发言，他情绪激昂，大声要求美国政府首先应谴责本国空军对苏联“不可原谅的挑衅行为”，其次应公开表示今后不再采取类似的反苏行动。

“除非美国政府答应我们的要求，”赫鲁晓夫强调说，“否则，苏联政府认为不可能与美国政府在此次最高级会谈中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他接着说道，由于美国政府将美国飞机进入苏联领空的挑衅飞行公然宣布为国策，致使“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新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苏联代表团不可能参加任何谈判，甚至不可能参与对紧要问题的商讨”。赫鲁晓夫因此提议将最高级会谈推迟大约6到8个月，同时取消早先已同意的艾森豪威尔访苏的计划。他说这件事可以“等到条件具备时”再重新安排。

赫鲁晓夫情绪激动的讲话，特别是讲话的第二部分着实使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除此之外，还使他感到很不自在，因为这些话都是当着他的主要盟友——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法国总统、本次会议的东道主和会议主席夏尔·戴高乐——的面说出来的。

经过一段令人尴尬的沉默之后，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在声明中，他竭力为自己进行辩护，说美国飞机飞入苏联领空“并没有任何侵略目的，而是为了防止美国受到突然袭击”。艾森豪威尔说道：“最近的事件发生后，这类飞行已经中止，将来也不会重新恢复。”这种说法只能使赫鲁晓夫更为恼火。

赫鲁晓夫宣称，只有在“美国政府公开谴责这种行径，并且承诺不再对苏联领空进行间谍飞行”之后，苏联代表团才会参加会谈。

傍晚，美国代表团发表了一项声明——艾森豪威尔宣布，他已命令美国军用飞机不得继续飞越苏联领空。在与赫鲁晓夫私下交 41
谈时，麦克米伦和戴高乐竭力想让赫鲁晓夫相信，艾森豪威尔已经满足了他的要求。麦克米伦提醒赫鲁晓夫说他一共提出了三项要求：谴责这次飞机行动、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和公开谴责这种行

为。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已满足了赫鲁晓夫的前两项要求——“但是，试想一下，一国元首能斥责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吗？”

赫鲁晓夫回答道：“我们要求他谴责罪行。”

当天夜里，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了一次苏联代表团会议。他的情绪非常激动。他确信，如果不是艾森豪威尔本人，那就是总统那些亲密的助手想通过派飞机进入苏联领空一事向全世界证明他无力保卫自己的国境，以此来羞辱作为一个人和作为苏联政府首脑的赫鲁晓夫。他甚至回想起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对政治局说过的话：“我死后不久，傲慢的美国人就会像掐小鸡一样拧断你们的脖子。”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支持赫鲁晓夫采取强硬立场，他没有忘记，在U-2侦察机第一次顺利地飞过苏联领空后，他和苏联武装力量因没能摧毁飞机、阻止飞行而受到政治局严厉的批评。

葛罗米柯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他同意“得好好教训一下艾森豪威尔”的意见，但是他担心最高级会谈将会破裂，因此试图寻找一种解决的办法。但是，赫鲁晓夫的态度仍然很坚决，或许他仍然铭记着在最高级会谈即将举行前夕，他向政治局做出的“好好教训一下忘乎所以的美国人”的承诺。

应该说，赫鲁晓夫从一开始就确信艾森豪威尔不会允许此次会谈破裂，他会通过牺牲一名“做得太过分”的将军而找到出路。从这个角度看就更容易理解赫鲁晓夫的行为。但是，艾森豪威尔的行动使赫鲁晓夫的美梦彻底破灭了——他公然宣称，作为总司令，他对其武装部队的行动承担责任。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命令U-2侦察机飞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作家斯蒂芬·E.安布罗斯教授写道，事实上，U-2侦察机的每一次行动安排都是由总统本人批准的，他打算在最高级会谈开始之前停止飞行行动。但是他最后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请求，批准在最高级会谈开始前一个月再飞一次。尽管艾森豪威尔同意了，但是多云天气拖延了飞行日期，直到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飞行计划才

得以实施,而这一天正好是5月1日。)

5月17日,西方三国政府首脑聚集在法国总统官邸爱丽舍宫开会。由于没有得到此次会议是预备会议还是正式开始最高级会谈的明确通知,所以苏联代表团没有去爱丽舍宫。虽然赫鲁晓夫没有出席会议,但他仍然希望艾森豪威尔将会作出让步。

就在那天晚上,相互间的公开指责开始了。

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宣布,最高级会谈本应在当天开始举行,但由于苏联代表的缺席而未能实现。因此,美国总统认为会谈已经结束。赫鲁晓夫的新闻办公室立即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说“美国政府在最高级会谈即将开始时屡次侵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且顽固拒绝对这些侵略行为承担责任,因此,是美国政府阻碍了全世界人民满怀希望期待的这次会议的召开”。

由于1960年最高级会谈的破裂,苏美关系大为恶化。两国关系仅限于部分实施了一项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计划。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苏联之行未能实现。为他的访问而特意在美丽的贝加尔湖边建造的一幢狩猎小屋在当地被称为“艾森豪威尔小别墅”,但他却根本未曾看见过。

有些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赫鲁晓夫来巴黎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这次最高级会谈,这样他就能进行宣传。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我可以为此作证。就日程安排的每一个议题,代表团都得到了广泛和详尽的指示,这些指示都是由政治局经过积极慎重的考虑后批准的。所以,我们离开莫斯科时曾预计巴黎的讨论将是漫长而又艰难的。

赫鲁晓夫确实曾要求政治局授权他对美国在最高级会谈即将举行之际仍肆无忌惮地派U-2飞机入侵我国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抨击,而且他的请求也得到了批准,但政治局并没有指示他要求艾森豪威尔个人表示道歉。这种情况的出现完全是因为赫鲁晓夫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想以毁掉最高级会谈相要挟,迫使艾森豪威尔

道歉。他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四大国最高级会谈——战后四大盟国史上最后的一次——应该作为一次失去机会的最高级会谈载入史册。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

43 在赢得1960年总统选举后的第一次演讲中，约翰·F·肯尼迪宣称他的政府打算改善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关系，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苏联政府也在新总统宣誓就职的当天发电祝贺，并表示希望两国能够“彻底地改善关系”，并能“使国际局势全面正常化”。1月24日，新政府刚刚成立四天，华盛顿便发来一份正式照会。照会证实肯尼迪总统已下令禁止美国飞机进入苏联领空。显然，两国领导人都想尽早举行会谈以便讨论改善两国关系的问题。

1961年3月9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将肯尼迪写的一封信言辞恳切的信交给了赫鲁晓夫。肯尼迪在信中提议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经过简短的协商之后——我当时仍是外交部美国司司长——我们同意于1961年7月3日至4日在维也纳举行会谈。

就具体问题而言，肯尼迪希望双方在老挝问题上寻求和解。老挝是一个距离遥远的东南亚国家，在那里苏美两国政府因支持敌对派别而陷入对抗。他还希望寻求签订一项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条约的可能性。但最为重要的是，他想找出苏联坚持对柏林施加压力的真正动机，并想看看苏联是否准备为这座城市与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进行战争。赫鲁晓夫曾经警告说，他可能会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定一个和平条约，从而将苏联的占领权移交给东德，使美国、英国、法国等盟国继续在西柏林受到包围；这样，如果盟国打算维护自己的权力，它们就不得不动用武力。肯尼迪认识到，维护这些权力将是对美国的决心及其所信奉的价值观念的最大考

验——他甚至在维也纳也是这样对赫鲁晓夫说的。但赫鲁晓夫仍希望估量一下这位年轻的新总统——无论恰当与否,这位新总统即使在其国内也被认为是一个浅薄的政治家——的决心。

在3月份美国递交建议举行首脑会谈的照会后不久发生的一些事情使形势又变得复杂起来。1961年4月17日,由古巴反革命分子组成的登陆分遣队在美国军舰的保护下入侵古巴。大多数战斗是在猪湾展开的。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很多国家谴责了美国,肯尼迪不得不公开承认错误并承担了责任。尽管后来他在维也纳责备中央情报局提供了错误情报,但不管怎么说,古巴问题已经成为苏美关系中一个经常性的刺激因素,并且最终导致了翌年发生的导弹危机。

在维也纳会谈举行前大约10天,政治局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在最高级会谈中苏联的立场问题。我作为苏联代表团——赫鲁晓夫任团长,代表团成员有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当时的驻华盛顿大使米哈伊尔·梅尔申科夫——的顾问出席了这次会议。

44

赫鲁晓夫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了与肯尼迪会谈时他将遵循的方针。我必须指出,这项方针从一开始便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定之上,即迫于苏联军队对欧洲的压力,年轻而缺乏经验的美国总统会被迫做出让步,特别是在柏林问题上。美国记者从一开始——历史学家后来也是同样——就怀疑赫鲁晓夫去维也纳是想就重大问题,特别是德国问题,对肯尼迪总统尽可能多地施加压力。这种猜测基本上是正确的。赫鲁晓夫希望美国支持流亡分子入侵古巴失败后,美国政府会屈服于他的压力。

大多数政治局成员不太了解肯尼迪,而且对局势认识不清,因此支持赫鲁晓夫提出的策略。部长会议副主席阿纳斯塔斯·I.米高扬是唯一对此表示怀疑的人。他说,我们对这位年轻而思想开明的新总统的态度不应该建立在攻击和施加压力的基础上,而是应该与他进行理智的和建设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将会积极地促进苏美关系。他还进一步警告说,如果事实证明这位总统是一个具有坚

定性格的人，那么施加压力的政策可能会造成有害的后果。

赫鲁晓夫变得激动起来，他坚持认为形势非常有利，必须要加以利用。米高扬看到自己处于少数地位，便不再争辩，并说他“主张采取一种慎重的办法”。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我和葛罗米柯私下进行了谈话。我告诉他我认为米高扬是对的。但是他并不想讨论这件事，虽然我感觉到他自己对赫鲁晓夫的方针也有怀疑。

历时两天的最高级会谈于7月3日开始在维也纳举行。

肯尼迪指出，他被苏联极力废除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极力在那些传统上存在着美国影响的地方消除这种影响的事实搞得很不安宁。赫鲁晓夫回答说，苏联并不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或者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它们。他声称他反对输出革命，但也反对输出反革命。

肯尼迪表示“目前以中苏集团为一方，以美国和它的西欧盟国为另一方形成了某种力量关系的平衡”，这就是任何“明显改变平衡”的行为都将成为美国所“关心的问题”的原因。

45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德国问题既是会谈的中心问题，又是最为敏感的议题。赫鲁晓夫以其典型的坚定语气提出了他的解决意见。事实上，他已使肯尼迪陷进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者他们签订一项协议，承认两个德国的存在，或者他将被迫在12月之前与东德单独签订一项和平条约。此后，西方国家对柏林的占领权以及它们自由进入这座城市的权利将“不再存在。”西柏林仍然可以存在，但是它与世界的联系将控制在东德手中，而且莫斯科也将不再承认美国在柏林的权利。此事不能耽搁，赫鲁晓夫明确指出，西方国家干涉这一计划的任何企图都将导致一场军事冲突。

肯尼迪承认，西柏林和德国的局势总的看来是不正常的，但是还没有到按照赫鲁晓夫的建议采取行动以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呼吁赫鲁晓夫“不要改变现有的力量平衡”。总统坚持要求推迟考虑德国问题，而赫鲁晓夫则强调必须趁时间还不太晚赶快采取行动。

根据美国与会者所说,长时间就柏林问题交换意见以及赫鲁晓夫在谈话时所使用的放肆的、几乎带有威胁性的语气使肯尼迪很是不安,总统本人对此肯定深感忧虑。会议刚一结束,他便会见了《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后者写了一篇受到广泛关注文章。文章报道说,总统认为,围绕德国问题,他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场持久的危机。

我必须指出,赫鲁晓夫之所以表现出威胁姿态,一方面是因为他那易于冲动的性格,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试图想使肯尼迪相信,他认为柏林问题非常严重,只有按照莫斯科提出的方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当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些问题时,根本没有人想到可能要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我们的计划中绝对不包含这方面的内容。赫鲁晓夫的目的就是在维也纳尽可能大地向肯尼迪施加压力。这一策略是赫鲁晓夫自己的想法。而领导层中其余的人并不这么想,虽然除了米高扬之外,大多数人都附和了赫鲁晓夫的意见。赫鲁晓夫显然是在吓唬人,但他这样做是有意识的,还是因为他情绪化的性格使然,直到现在仍很难说。然而我必须再次说明,实际上赫鲁晓夫很害怕发生新的战争,而且他从未考虑过因德国问题或其他国际争端而进行战争的可能性。

对赫鲁晓夫性情的剖析从未被西方国家完全地理解。围绕柏林问题所产生的毫无必要的战争恐惧感,从肯尼迪本人开始,一直影响了美国外交很多年。这一问题一直像一根燃烧着的导火索,因此肯尼迪——他认为赫鲁晓夫的威胁是认真的——开始着手准备军事对策。赫鲁晓夫在不越过危险线的前提下,继续坚持相当强硬的立场。关于德国问题和西柏林问题的讨论陷入了极度的僵局,围绕这些问题产生的紧张局势持续了几个月,有时缓和些,而有时则形成了对抗的态势。

作为最高级会谈的目击者,我个人的印象是肯尼迪准备寻求一种妥协方案。美国方面的一位与会者后来也向我透露了同样的看法。但是赫鲁晓夫缺乏足够的耐心去寻求各种可能实现的解决

办法,而且一直强调他自己的建议。

在维也纳,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还讨论了禁止核试验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检查。他们就检查的次数和类型进行了争论。赫鲁晓夫首次表示,对苏联境内进行3次年度检查、对美国、英国各进行3次年度检查就足以检查协议的执行情况。肯尼迪坚决要求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并增加检查的次数。双方讨论了“全面”禁止核试验的主张,但没有达成协议。结果,在1962年只缔结了一个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这种核试验造成的放射性微粒回降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维也纳会谈(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赫鲁晓夫在一定程度上仍旧低估了肯尼迪捍卫自身立场的能力,虽然他对这位年轻总统的看法已经大大改变了。肯尼迪显然过高估计了赫鲁晓夫及他的助手就柏林问题采取断然行动的意愿——最富有挑衅性的行动也不过是在维也纳最高级会谈结束后两个月建起了一座柏林墙。直到1971年四大国签订协议,调整了这座城市的状况为止,苏美两国的关系因这座城市而日趋复杂并不断恶化。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这座城市的孤立随着德国的重新统一而彻底结束之前,这座城市一直是一座巨大的冷战的纪念碑。

惊讶:我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50年代末,赫鲁晓夫为研究对外政策问题的政治局会议引进了一种新的、比较开放的程序。在此之前,只有外交部长出席这种会议,但赫鲁晓夫提出应邀请与规定议题有关的外交部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他们一般都是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或中年人。

47 赫鲁晓夫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而且一律是在征求部长意见之前先征求他们的意见,以便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一旦部长发了言,他的部下中几乎就没有人再反驳他的意见了。赫鲁晓夫这种征

求意见的方法迫使他们必须独立思考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这些讨论通常是很有趣的。

有时我也会被问到主管的美国事务方面的问题。赫鲁晓夫常常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想法,特别是在周末过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周末期间他“一直在散步和思考”。他的这些想法有真正令人感兴趣的,也有不切合实际甚至稀奇古怪的。

要想向他证明他的某些想法根本不现实往往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有其他政治局委员在场时更是如此。我不得不使他从外交方面了解问题。比如,“您的建议令人很感兴趣,但我担心美国人不可能理解和接受它”。这样的回答常常使他不那么高兴,但是在收到华盛顿官员的答复后——由于我有在华盛顿工作的经历,所以他们的答复和我的想法十分相近——赫鲁晓夫仍旧会征询我的意见。

1962年1月,我应邀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要讨论一些外交政策问题。讨论结束时,赫鲁晓夫说还有一个议事日程之外的问题:任命一位新的驻美大使接替即将退休的梅尼希科夫。

我以为赫鲁晓夫会要求我提出一个继任者,并开始在心中反复考虑可能的候选人名单。然而,赫鲁晓夫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政治局委员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说他知道一个候选人,接着又半开玩笑地说道,最好能够任命一个能够猜出美国方面会对赫鲁晓夫本人的建议作何反应的人。他宣布了我的名字并问在场的人有何意见。

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并说他们赞成“这位候选人”。赫鲁晓夫祝贺我获得了新的任命。

我向他表示感谢,但是我不知还应该说些什么才好。我只有42岁,而且以前从未担任过驻任何国家的大使。我在此得到的是苏联外交使团中最重要的任命。

当我回到家,将此事告诉我的妻子时,她首先想到的是我在哄骗她。我自己也无法轻而易举地习惯于这一新的任命。只是当葛罗米柯往我家打电话,对我表示祝贺时,我们才开始意识到我们的生

活和工作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

我就是这样成为第九任苏联驻美国大使的。(前八任大使依次是：特罗扬诺夫斯基、乌曼斯基、李维诺夫、葛罗米柯、诺维科夫、帕纽什金、扎鲁宾、梅尼希科夫)。我当然不可能想到我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几乎1/4世纪——从1962年到1986年，我也不可能想到，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不仅是苏联外交史上，而且也是整个俄罗斯外交史上的一个记录。

我的一生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 二 部
在 华 盛 顿

第四章

探索在华盛顿工作的方式

莫斯科的指示

1962年3月初,在即将离开莫斯科之前,我去拜访了葛罗米柯,我想他可能会就赴华盛顿任职一事给我一些指示。他与我亲切地道别,并说他不打算给我任何新的具体指示了,因为在我担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的“最近两年中,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就美国问题交换意见”。但是他提出了某些个人建议:在判断美国政府的行动时不要仓促行事,即使这些行动的意图有时看上去非常明显也罢。

他解释说——正如我确实了解的那样——政治局委员有时会从不同的角度、甚至用情绪化的方式(后者指的是赫鲁晓夫)来看待苏美关系中出现的問題,所以,我的任务是向莫斯科提出重要的、确实的和实用的情报,无需探究不必要的细节问题,也不要夹带耸人听闻的描述。

虽然葛罗米柯以“铁部长”著称,在与华盛顿谈判时从不偏离中央决定一步,但是他的建议并没有使我感到惊讶。葛罗米柯从未热衷于支持与美国进行对抗,在可能的情况下他总是努力避免发生对抗。他非常重视苏美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应该给葛罗米柯以应有的评价:在和赫鲁晓夫私人谈话时,他能够坦率地阐明他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从未将个人意见的表达激化到激烈争论的程度,尤其是在苏联政府的其他成员在场时。

当然，在赴华盛顿就职之前，我还必须拜访赫鲁晓夫。他的指导方针是强有力的：坚定不移地保卫和促进苏联的利益，“遇到挑衅时不要受诱惑”。这段话引出了一条对他而说算是极不寻常的忠告：“不要自找麻烦”。他坦率地告诉我，我的脑子里应该总是想着和美国进行战争是不可行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52 接着，他回顾了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像往常一样，他讲起话来情绪激动并且滔滔不绝。从他的谈话中显然可以看出，他把德国和西柏林问题看成是苏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他希望按照他在维也纳会议上向肯尼迪提出的方针来解决这些问题。根据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要与当时处于分裂状态的两个德国——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西方国家被称为“西德”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西柏林将成为一座“自由城市”。这一措施可以使战后欧洲的稳定得到保证，并且在德国从战争废墟恢复的过程中能一定程度上减少美国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德国复兴是苏联领导人最为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因为他们担心德国获得掌握核军备的机会。

赫鲁晓夫还对美国竭尽全力获取战略核优势提出了尖锐的指责，因为——正如赫鲁晓夫所说——这将使美国变得“格外的傲慢”。他特别举例指出，美国将核导弹部署到了土耳其，“放到了苏联的眼皮下面”。尽管这些导弹解决古巴导弹危机时将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如果赫鲁晓夫已经想好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计划，那他在谈话时就决不会提这些事了。他谈到美国和它的核武器射程时说道：“现在到了削减他们的远程武器的时候了，”但他没有就此作详细阐述。

赫鲁晓夫还谈到了约翰·F·肯尼迪，其语气要比上一年他们首次在维也纳会谈前尊重多了。他承认美国总统虽然年轻，却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不过，他并没有隐瞒他的看法，即对肯尼迪施加压力会使我们获得某种成就。他认为与肯尼迪进行第二次会谈将会证明是有用的，虽然要为此进行全面的准备。

通过这次谈话可以断定,赫鲁晓夫显然并不认为在最近的将来可能与美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虽然他承认两国关系偶尔会变得紧张起来,其主要原因是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这个国家确实处于超级大国在欧洲对抗的第一线。不管怎样,赫鲁晓夫总的看来对我国当时和美国的关系并没有表现出过分忧虑的样子,他对我就任新职表示祝福。

秘密渠道

1月4日,梅尼希科夫大使离任;3月15日,我到达华盛顿。就在这一期间,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正在私下交换着意见。他们之间的这一秘密渠道已经建立起来,并且由在华盛顿的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和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以及总统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所掌握。虽然博利沙科夫名义上是塔斯社驻华盛顿分社的社长,但他也是我国军事情报机关的一名具有上校军衔的官员。除了操纵这条秘密联系渠道之外,他被严禁从事任何其他活动。他与总统的亲密助手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和他们打网球,去家里拜访他们。

53

博利沙科夫是一个工作勤勉的官员,他知道怎样为他的联系渠道保守秘密。即使是梅尼希科夫大使都不知道这一通道,因为博利沙科夫是通过我们的武官送出他的情报,并以同样的方式接受指示。但是博利沙科夫也有很大的缺陷:他不太了解我国和肯尼迪政府的外交关系,对某些谈判的细节以及我们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一无所知。除了充当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个尽职尽责的邮筒之外,他根本无法额外给我们提供有重大意义的情报,因为他不具备与罗伯特·肯尼迪和塞林杰进行交谈的相应的水平。有时他甚至错误地解释他们所说的话。结果,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经赫鲁晓夫同意,葛罗米柯指示我逐渐接管博利沙科夫的联系渠道,但在特殊的场合仍要继续使用他。葛罗米柯当然不愿意真的存在一个由

国防部而不是由他本人控制的特殊渠道。

让我就秘密渠道问题再说上几句，因为它将在本书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而且直到现在从未以文件的形式完全公布或加以解释。秘密渠道指的是白宫和克里姆林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撇开美国国务院和我国外交部之间现有的正常外交渠道，直接交换情报和意见时所使用的办法。美国人多半是通过基辛格的回忆录才知道秘密渠道的，当时，秘密渠道在超级大国的外交中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理查德·尼克松利用秘密渠道避开他极不信任的外交官僚机构，甚至绕过他自己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他之所以依靠我们的秘密渠道，是因为我有着一份很不错的履历。“我知道你有一个优点，”在就任总统之初他对我说，“你没有泄露过一点儿秘密。”

在我担任大使期间，这种联系方式存在了许多年，并且不断得到加强。虽然在里根时代它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当时所有的接触都通过国务院进行。那些曾经使用过这种联系方式的人私下一般称它为“渠道”或“秘密渠道”。它为私人间的秘密接触——这是外交的基础——提供了自由，而且使开拓外交工作中的未知领域成为可能，这恰恰是为打破对峙——它已成为冷战的特征——所需要的。

54 这样，在我的华盛顿工作的头几个月里，仍然存在着两条秘密渠道：一条是由博利沙科夫掌握的原有渠道，另一条则是由我掌握的正在开始发挥作用的新渠道。很快，我掌握的那条渠道在通过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探求解决古巴危机的办法时以及后来在我担任大使的整个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所举行的谈判中都成为主要渠道。

博利沙科夫的渠道缺乏系统性。他的密码电报(通过我国驻华盛顿的武官发出)在莫斯科只能被苏军军事情报局局长接收，然后再由情报局局长将这些电报直接上报给国防部长。由于部长们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明争暗斗，所以国防部长总是把博利沙科

夫的电报上报给赫鲁晓夫本人,与此同时只跟外交部长口头说说简单的情况,或者根本就懒得告诉他。结果,赫鲁晓夫批复了电报并就此向国防部长做出指示,国防部长再把赫鲁晓夫的批示传达给博利沙科夫。在某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会和葛罗米柯商量问题;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当赫鲁晓夫认为情况已经清楚时,他就不和葛罗米柯商量了。葛罗米柯自然不会赞成存在这样一条渠道,所以试图通过我来改变它。

除此之外,博利沙科夫休假或因公回莫斯科时,总要拜见赫鲁晓夫内部圈子里的人;他同阿纳斯塔斯·I.米高扬和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的关系相当好。他们总是乐意指点他如何同罗伯特·肯尼迪或总统的其他亲密助手打交道。米高扬时常把他的建议与赫鲁晓夫的等同起来,有时甚至通过博利沙科夫把部长会议主席的口信转达给总统的助手。按规定,外交部,包括部长本人,几乎都不了解这些情况。尽管博利沙科夫总是将他和罗伯特·肯尼迪之间的最重要的谈话通报给我,但我却不清楚他的情报到底有多准确。难怪我们的行动有点缺乏协调性。

这种做法产生的后果是:白宫最初通过两个互不相干的渠道获得情报,而这些情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有出入的。我怀疑在古巴危机前夕,我国情报机构频繁利用博利沙科夫的渠道(我可以认为这样做是得到赫鲁晓夫准许的)是为了向肯尼迪政府提供有关我们在古巴进行军事准备工作的错误情报。然而,我必须承认,苏联领导层实际上也利用正式的外交渠道做了同样的事,从而使这些外交渠道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古巴危机之后,为了重新得到信任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大使生活

55

1962年3月15日,我作为苏联大使来到了华盛顿。从纽约坐上火车后,我发现,在那么多人中,可以说,我偏偏成了中央情报局局

长艾伦·杜勒斯的旅伴,虽然我们没有进行交谈。当我们在华盛顿下火车时,我看到有一大群记者在月台上等候着。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们是在等待杜勒斯。虽然杜勒斯肯定也这样想。然而,记者们看来是在等待苏联新任大使。杜勒斯表现出失望的神色。接下来我所遇到的是新闻界对我的第一次考验。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我早先在华盛顿任职时曾结识了一些记者,并且同他们相处得还挺不错。结果,他们提问的语气都很友好。

我生活和工作的使馆位于白宫北面仅三条街区远的第16号大街上,是一座陈旧的四层楼房。在地理位置上,它比其他使馆离总统府都要近。从政治上讲,哎呀,它却好像远在地球的另一端。

使馆大楼是沙皇政府早在1913年就从美国著名的铁路卧车制造商乔治·普尔曼家族买下的。对于规模不大的沙皇使馆来说,算得上是相当宽敞了。除了一名大使(当时挂公使衔)之外,使馆只有一名参赞和两名秘书,此外还有一名车夫和几名仆人。到我就任时,使馆却住着大约100名外交官和技术官员。这有多么拥挤呀!除了大使之外,只有他的副手——公使衔参赞享有单独的办公室。其他房间都要容纳5到7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好多年。

我自己的办公室远够不上豪华。在大约30年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我们两国刚刚恢复外交关系,当时这间办公室有两扇大窗户,向外望去,可以越过一片草坪看到大街上。但是在冷战时期,相互监视的癖好已经演变成一场特工战,于是宽敞的窗户被从里面用砖砌得严严实实。从外面看,它们仍然和镶着玻璃的普通窗户一样,但千真万确,它们是一点儿也打不开了。在旧办公室里又建了一个新房间。里面两层墙之间有一个磁场,可以防止外面的监听。采取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使这间办公室成为一个保护区。我从来没在这个办公室里接待过任何外国来访者;我只在外面的接待室里接待他们。

我不知道这些防护措施能起多大作用,但我不得不在这个没有窗户、被不间断的磁辐射围困着的小房间里工作了几乎1/4个世

纪。且不提这种长期的单独禁闭所造成的心理反应(我简直分辨不出黑夜和白天),它对身体很可能也有影响。然而,由于这一切都没有得到科学上的证实,所以这种状况仍被允许存在。

大使办公室在二楼。三楼有一套简朴的大使公寓,包括三间居室和一个厨房,厨房紧挨着隔壁邻居的房顶。这所房子不属于使馆所有,闯入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我们的公寓。在我来华盛顿之前6个月,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个人从邻居的房顶窜进了公寓,偷了些东西,临走之前还在大使的卧室里点了把火。幸亏使馆的一名卫兵及时看到了火焰,使馆人员才把火扑灭了。

后来,使馆周围和楼内都安上了用来监视的摄像机。警卫岗哨也加强了力量。出事之前,外交部为节省硬通货,一直没有按照使馆人员的要求为使馆提供特别的保护。那名纵火犯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此后再没发生过这类事件。这正如俄罗斯谚语所说的那样:“雷声响了,农民才担心雷劈在自己头上。”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华盛顿有10多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警卫员。我出门时通常只带一名司机。周末我经常打发走司机,自己开车带上我夫人——数年后还带上我的孙女——出城或购物。然而,美国的反苏运动越来越猛烈,苏联驻华盛顿和纽约的机构几次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拉比·迈尔·卡亨集团尤为残暴)。因此,我国政府为我配备了一名警卫,每当我离开使馆外出,他都要跟随着我。我拒绝接受他的保护,因为我很清楚,带一名警卫不会使情况发生任何变化。此外,他的出现稍微令人感到有些尴尬,而且只会使我感到不舒服。当政治局了解到我没有使用警卫的时候,便给我发来一封不寻常的电报:“你并不属于你自己,而是属于国家。作为一名大使,你对国家是有用的。所以,请执行政治局的决定。”我只好服从命令。

对苏联所有的对外使馆来说,工资过低都是一个令人大伤脑筋的问题。国家非常注意节约外汇,这样就使我们使馆的工资受到影响。与美元汇率和其他使馆的工资相比,我们的工资要低得多。

57 大多数国家驻华盛顿大使的工资都高于我2到3倍。(顺便说一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工资比我的工资总高出4到5倍。)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使馆中,我们和保加利亚一道属于工资收入最低者。此外,工资标准也没有因通货膨胀而增加。

在我担任大使的1/4世纪中,我们只增加了一次工资。甚至连这次长工资也是破例的。70年代后期,我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做例行的述职报告。当时的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认可,然后问使馆是否需要什么帮助。我告诉他我们需要的唯一帮助就是增加工资。我又说,我们向外交部和财政部提出的请求屡次被它们以颇具权威性的说法——“没有外汇”——拒绝了,尽管斯大林在讨论战后使馆财政开支时曾经说过“至少驻美使馆工资应该加倍”。我直接了当地说,最近罗马尼亚使馆的工资增加之后,其大使的司机挣的和我们的参赞一般多。同罗马尼亚人的比较最终起了作用,我们的工资增加了25%。下一次长工资则是90年代的事了。

我一到使馆就投入了工作,着手在开会时熟悉使馆工作人员,并准备向莫斯科汇报我的最初印象及意见。由于我以前在使馆呆过,所以我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比较顺利。我已经了解了这个国家,熟悉了它的主要制度、风俗习惯和新闻媒介,结识了很多美国朋友和熟人。作为一名大使,我认为我的主要任务是与肯尼迪政府(我对它是不熟悉的)、外交使团、商业圈以及华盛顿的一般机构建立最广泛的联系。

然而,在向肯尼迪总统递交国书之前,我还不能正式履行大使的职责。在此之前,我不得不会见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他担任设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时以及我在联合国工作时,我已经见过他几次。因此,3月29日我们第一次在国务院的会谈是非正式的;腊斯克说他很高兴见到老相识。他承认没能和我的前任米哈伊尔·梅尼希科夫建立起私人联系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这样就不可能在特殊情况下以非正式的方式讨论问题。但他希望能够同我

建立起私人联系。我们可以在国务院以外的地点进行会谈，比如可以在傍晚时到他的住所会谈，有时甚至可以在总统的游艇上度周末。除了正式对话外，这种谈话也是很有好处的。

我完全赞成他的建议。在我向总统递交国书之前进行的首次谈论中，我们尽力避免讨论任何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样，我和迪安·腊斯克以官方身份和非官方身份所进行的积极和密切的合作持续了几乎7年的时间，直到林登·约翰逊政府结束为止。在此期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越南战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我们的裁军尝试——但是我们总是尽力保持我们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这就使我们在必要时随时可以进行坦率的、非正式的交谈。

腊斯克的观念很保守，而且固执己见——其固执程度丝毫不亚于葛罗米柯，此外他还缺乏想象力。他教条而且顽固。腊斯克提不出新思想，他把这项工作留给总统去做。他确实从不匆忙地改变他对外交事务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渠道对腊斯克说来真的是没什么用的。然而，他从不搞虚伪的宣传和骗人的诡计。他的话是可信的。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他总要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此外，他处事非常谨慎，尽力不让不必要的对抗取代合理的争论。总而言之，他是一位佐治亚州的真正绅士。

拜会肯尼迪总统及华盛顿其他政治要人

3月31日，我向肯尼迪总统递交了国书。我必须承认，在仪式——在我的外交生涯中，这是第一次——开始之前，我有些紧张。在莫斯科，递交国书的仪式很隆重。我国的主席^①和副主席在克里姆林宫最漂亮的大厅里来接见新任外国大使。出席仪式的外交部官员全部穿着由斯大林规定的用金线镶边的礼服。递交

^① 指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者

国书之后,还必须与大使举行通常是礼节性的谈话。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讨论重要的事情。

我从国务院得知,白宫的仪式相当简单。情况确实如此。到了白宫之后,礼宾司长接待了我,他陪同我从两名行礼的海军陆战队员面前走过,径直进入总统办公室。总统已经在那里等待。他的举止轻松而且友好。递交国书时通常要采用的那些礼节被取消了。他只是接过国书,说了声他已经读过了(按照惯例,国书的副本已经递交给国书院)。因为背痛,所以他坐在一把摇椅上,并邀我坐在他身边的长沙发上。他是独自一人,我也是独自一人进来的。

59 由于我来时没有带翻译和外交顾问,所以打破了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长期因袭下来的一个传统。形成这一传统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我的前任大多不能流利地讲英语;第二,在斯大林时代,和外国人交谈时如果没有证人在场一直被认为是不妥当的。我没有受这些限制的束缚。最为重要的是,没有官僚机构做记录的人在场,我们的谈话将会轻松一些,坦率一些。后来,我与美国政府大多数高级官员谈话时都是这样做的。良好的记忆帮了我的大忙——一回到使馆,我便能够根据记忆逐字逐句地记下谈话内容。无论如何,在供职华盛顿的长期岁月中,人们对我描述对方观点的准确性没有提出过一次疑问。

喝咖啡时,肯尼迪直接切入了正题。我转达了赫鲁晓夫的问候和衷心祝愿之后,他立即做出同样殷切的反应,并开始兴致勃勃地谈起他们于一年前在维也纳进行的“令人感兴趣的会谈”。我当时也去维也纳参加了那次会谈。总统说他希望再次与赫鲁晓夫会谈。他又说眼下还难于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定下具体的日期。目前他很希望看到至少事先能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或者为下次最高级会谈时国家元首签署某些文件做好准备。

我问他应当为下一次最高级会谈做哪些准备,肯尼迪回答说,这还要再看看,但他认为下次会谈无论如何也会讨论德国和柏林问题。他说他希望下次会谈能尽早在当年举行。他说显然需要举行

这样一次会谈。我对他的想法表示赞同。

总统没有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只是说我们往后可以这样做,并表示在我担任大使期间,我可以得到他的合作。他还要我转告莫斯科,他非常感谢莫斯科对他父亲病情的关心,他父亲已接受了我国最出色的医生提出的医疗意见和详细建议。

会议结束时,总统把我引到他的主要助手——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国内事务顾问西奥多·索伦森以及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的办公室。总统讲着俏皮话,把我分别介绍给他们。他还向我展示了一些他在不同场合收到的礼物,并指给我看赫鲁晓夫送给他的一只用海象牙做的轮船模型。在绘画作品中,我认出有两幅小油画是俄罗斯杰出的海洋风景画家艾瓦佐夫斯基的作品;这两幅画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他以都市风光为主题,描绘了圣彼得堡冬天的景色。这两幅油画是一位私人收藏家借给白宫的。^①

和去年在维也纳相比,肯尼迪总统现在看来已经是大权在握。通过我们的谈话可以断定,他非常了解苏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与白宫的某些前任截然不同。所以,我向莫斯科报告:“在美国方面,我们正面对着一个名副其实的对手。”

60

我在会见过任何一位美国重要官员之后,都要立即写出电文并用密码发给莫斯科。我尽力报告最重要的会谈内容,有时要把三小时的谈话压缩成两页纸的文字。我不向速记员或某位外交官口授电文,而是亲自起草电报,这是我一贯的做法。这样做也有助于保守谈话的秘密。只有一位公使衔参赞——我不在时他必须担任代办——完全了解内情。(后来,那些公使衔参赞——其中有格奥

^① 罗伯特·肯尼迪通过博科沙科夫提出过一个索要美术品的请求,我认为这一请求提得不恰当。被宣判犯有间谍罪的苏联情报官员鲁道夫·伊万诺维奇·阿贝尔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中画过一幅十分出色的约翰·F.肯尼迪肖像。阿贝尔先生会同意将这幅画送到白宫吗?罗伯特·肯尼迪还说阿贝尔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画家。我回答说他们应该直接向阿贝尔先生提出请求。这幅画毕竟是他的财产,而不是我们的。

尔吉·科尔尼延科、尤利·沃龙佐夫、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弗拉登·瓦谢夫、奥列格·索科洛夫——都成了杰出的外交家。)然而,某些私人电报只有大使才有权处理。如果有要求使馆方面采取行动的电报或谈话,我便向一位外交官作出口头指示。

递交国书之后,我便作为一名正式就任的大使开始履行职责。我和肯尼迪政府的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几次礼节性的会谈。在会谈中,我们常常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总的说来,那些会谈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苏美关系既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也没有取得进展的任何指望,虽然双方一直就某些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讨论。

在努力寻找走出僵局的办法的过程中,双方都试图在本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帮助下扩大相互间的联系。在上一年年末,赫鲁晓夫曾通过博利沙科夫收到了肯尼迪总统提出的一项秘密建议——总统准备派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去莫斯科进行非正式会谈。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与此同时,阿朱别伊出访华盛顿一事已得到安排并很快成行。但是,罗伯特·肯尼迪的行程却一再被美国人推迟。1月中旬,肯尼迪终于遗憾地通知赫鲁晓夫,罗伯特·肯尼迪原先准备秘密访问莫斯科的计划已经被美国新闻界透露了,目前他正受到美国强硬派的错误攻击。因此,他打算暂时推迟这项访问,但不准备收回他的承诺。(在我向总统递交国书并首次与他会谈时,总统就曾向我抱怨过美国新闻界。“就这一点而言,我很羡慕苏联领导人,”他说,“不管我做什么,80%的美国新闻媒体都会出来反对我。”)

61 到那时为止,我仍未见到过罗伯特·肯尼迪,虽然我了解总统通过他送出的那封信的内容。实际上,我们两人当时都想撇开博利沙科夫那条渠道,建立直接的联系。

5月3日,总统在白宫举行宴会,招待外交使团。这种招待会在华盛顿的政治生活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肯尼迪家族善于组织并且乐于举办这些活动。宴会期间,总统带着他的弟弟来到

我的身边，开玩笑地介绍他是“和苏联进行秘密接触的专家，”我“应该更多地了解”这个人。我以同样的语气回答说，我一定听从他的建议。

一个星期后，罗伯特·肯尼迪邀请我妻子和我去他家共进便餐。他的漂亮住宅坐落在波托马克河对岸属于弗吉尼亚州地界的一个名叫麦克利的富人居住区里。席间根本没有谈及政治问题。我们被他那拥有几乎一打孩子的庞大而异常热闹的家庭围住。当我们提起此刻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正在油煎从波托马克河钓的一条大鱼准备野餐时，肯尼迪夫人显出很吃惊的样子。她解释说这条河的河水被污染得很厉害，吃了从河里钓上来的东西有危险。我赶紧打电话转达她的告诫。哎呀，那条鱼早已被吃光了，而且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没有人得病。

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私人交往就这样开始了。他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经常发脾气；每逢这种时候，他的举止往往显得蛮横无礼，使人讨厌和他打交道。然而，在受到挫折之后，他通常能够控制自己，并且很容易就可以振作起来。这就是与他进行会谈为什么总是不顺利而且常常破裂的原因。虽然他对外交政策问题没有深刻的认识，但他显然把自己看成是这方面的专家。这样就常常使对话变得复杂化，尤其是他代表总统讲话的时候。但是，他同其兄长之间显然十分亲密的关系又使他成为一条极有价值的联络渠道。

罗伯特·肯尼迪从未去过苏联，虽然他曾多次与我们讨论过这种可能性。我认为他未能成行的主要原因是他自己优柔寡断。一方面，他极力想向我们、向总统周围的人以及向美国公众证明他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然而，在内心深处他显然不敢肯定他是否能够完成这一复杂的使命，特别是他的会谈对手是因装腔作势、夸夸其谈而在美国享有坏名声的赫鲁晓夫。

我认识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他是华盛顿知识精英中最受尊敬的长者，对美苏关系持稳健且现实的看法。总统经常同他进

62 行对话。这些精英人物在观点和认识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分歧,特别是在苏美关系上,强硬地反对共产主义往往使他们不能得出清醒的认识。这种倾向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艾尔索普兄弟,约瑟夫和斯图尔特。

另一位著名专栏作家德普·皮尔逊态度的变化令人颇为惊讶。长期以来,皮尔逊一直是美国最顽固的反共分子中的一员。但是,经过两次访苏(其中一次是在《华盛顿邮报》老板的遗孀、对我国持友好态度的阿格尼丝·迈耶的陪同之下乘游艇去的)以及两次会见赫鲁晓夫之后,皮尔逊对苏联的态度变得比较同情了。这种转变在他通过报业辛迪加同时发表在多家报纸上的文章中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

那年夏天,当我去他的农场参观时,皮尔逊带我看了一小块豌豆地,豌豆种子是赫鲁晓夫送给他的。旁边的一块地里种的是美国豌豆。皮尔逊笑着说:“我是第一个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美国人。顺便说一句,苏联豌豆至少从外观上看长得更好一些。”

说到这儿,我还得讲讲另外一个与此相似的故事。在我担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期间,美国驻华盛顿大使卢埃林·汤普森试图在农业方面展开一场和平竞赛。有一年的7月4日,他在大使官邸里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独立日招待会。客人们在他的小花园里散步时,长势良好的一小块玉米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出席这次招待会的赫鲁晓夫也不免注意到了这块玉米地。玉米是赫鲁晓夫最为偏爱的东西,他试图在俄国每一处有条件的地方,甚至在条件不适宜的地方都种植玉米。莫斯科的气候条件的确不适宜种植玉米,苏联专家已经向他讲过这一问题,但是他不相信他们的话。

赫鲁晓夫一看到汤普森的玉米地,就把农业部长叫了过来。部长会议主席立即开始训斥他。当着一大群客人的面,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对这位不幸的部长说,这个汤普森——顺便提一句,他不是农民,而是一位外交官——正是在首都想办法种出上等的玉米,与此同时,农业部长却一直在向他保证,在莫斯科地区种植玉米是不

可能的。

招待会结束后,汤普森微笑着对我说,这块漂亮的玉米地——每一株玉米!——都是使馆的农业顾问栽培的,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有机会时让赫鲁晓夫大吃一惊。这个机会终于在那个7月4日出现了。

汤普森被肯尼迪召回了华盛顿。肯尼迪非常看重他的意见,任命他担任国务院参事和苏联问题首席顾问。我们两人相识已有很长时间,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自由地交谈。在莫斯科,汤普森受到苏联领导人的尊重,他们愿意在国宴上和他交谈。他是一个能体谅人、令人愉快的人;他懂得如何说服别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是一位有才干的职业外交官。他真心赞成促进两国关系的思想,和许多美国大使相比,他很少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我认为在整个冷战期间,他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中最好的一位。

63

围绕德国和柏林问题出现的外交僵局

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显然是在围绕着一个由德国和禁止核试验问题而形成的永恒的圆圈而转动。德国和柏林问题的阴影笼罩着一切;当然,德国在历史上是欧洲中心的平衡力量,也是我们历史上的敌人,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祸源,现在是冷战的主战场,而柏林——毫不夸张地说——则处在战场的最前沿。德国和柏林问题是我同腊斯克国务卿频繁会谈中的长期议题(也是汤普森被召回之前同葛罗米柯在莫斯科会谈的长期议题)。但是,双方的立场显然没有前进或改变。在会谈进程中,这些立场观点只是一再地被重申。

每隔两三个星期的周末,腊斯克都要在完全非正式的氛围中——“不打领带,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与我会谈,以便讨论所有的问题。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我就是这样学会喝他所喜爱的波旁酒的。)我们在国务院或者在他家里,在游艇上,在我

的住所举行会谈。这些会谈对深入理解某些问题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在德国和西柏林问题上,我们彻底陷入了僵局。我们一再地重复自己的论点和反驳意见,好像想让对方记住这些观点似的——最后,它们的确被记住了——乃至重复到令人厌倦的地步。有一次腊斯克开玩笑地建议说,我们双方可以给每个问题和每个答案编上号码,这样就可以节省讨论的时间了。他解释道:“比如,我说‘我问问题5’,你就答‘答案6’等等。这样就能够给国内寄回一份详细的报告,我也可以向总统汇报会谈情况了。”

腊斯克的玩笑是善意,但是它反应出在西柏林问题上我们已走入困境。4月10日,腊斯克本人向一个由第一流专栏作家组成的私人团体提供了一份秘密的情况简介,这份情况简介充分表明了美国政府本身对形势的估计,它的详细内容很快传遍了这座城市。64 腊斯克坦率地说,美国政府认为苏联最近提出的缔结一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集团互不侵犯的条约的建议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只有就欧洲现状——包括就西柏林问题签定协议——与苏联达成某种谅解之后,缔结这样的条约才是可行的。但他尚未看到签定这样一项协议的前景。腊斯克说,美国显然必须进一步增加拨款以改善军备并使之现代化,他希望这样做迟早能使两国达成一项协议,因为谁也不能无限期地承受如此巨大的军备负担。

这个讲话并没有使我感到惊讶。我个人对美国立场的估计和腊斯克的十分相近。显然,就柏林问题而言,还没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紧张局势仍将继续存在。肯尼迪总统准备认可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的事实——他已经暗示,假如柏林问题得到解决,他可能在3到5年内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是他反对改变西柏林的现状,因为那样做将导致美国军队像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那样撤出这座城市。他认为,这种撤退将会被西方社会和美国看作是他软弱无能的标志。我就是这样向莫斯科汇报的。

但是,莫斯科当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肯尼迪总统准备就欧洲现状达成谅解。果真如此,那将是苏联外交最大的成就之

一,并可能成为战后时期缓和的开端。但赫鲁晓夫认为,他有机会通过柏林问题使欧洲现状变得对他更为有利。于是,苏联领导人对肯尼迪政府施加了压力。这是一个只能使国际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更为加剧的错误战略。

5月,赫鲁晓夫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提出警告说,进一步施加压力这一做法增加了出现新一轮柏林危机的可能性。6月3日,罗伯特·肯尼迪试图通过博利沙科夫向我们表明,总统不可能改变他在西柏林问题上的立场——他真的“不可能那样做”——但是,如果莫斯科能认识到这一点,尚有可能就其他重大问题达成协议。总统的这位兄弟小心谨慎地探问苏联政府中是否有人打算和美国摊牌,哪怕这样做会引起战争。

回答是不存在这样的派别,反过来他被问道,美国政府中是否有鼓吹和苏联摊牌的人。“不,政府中没有这种人,”罗伯特·肯尼迪回答说,但是五角大楼军方有一些这样的人——虽然“不是麦克纳马拉本人”(这里指的是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过了不久,博利沙科夫转告罗伯特·肯尼迪,莫斯科敦促总统管一管“五角大楼那些热情过头的头头们”。罗伯特·肯尼迪强硬地坚持说,那些人对政府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和五角大楼其余的人一样都处在白宫的严格控制之下。他建议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冻结柏林问题,或者暂时达成一种谅解——口头或书面的都行——让美国军队在西柏林再呆上一段时间(显然,要呆到总统再度当选之后)。然而,莫斯科仍然坚持它提出的条件,于是,柏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在柏林实际上已处于相互对峙的状态。

7月13日,腊斯克提醒我注意苏联舆论频繁地暗示美国可能针对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并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相信这样的宣传,那他们就生活在一种十分危险的幻觉之中。我告诉国务卿,莫斯科到处都传播着这种对美国的恐惧,但是苏联领导层并不担心遭受一场突然袭击,尽管它确实在关注美国从事的军备竞

赛和柏林一触即发的局势。腊斯克则回答说,美国对苏联针对柏林问题新施加的压力感到恐惧。

这就是双方因在柏林问题上的对抗而产生的忧虑。许多年过去之后,这件事看上去似乎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脚注,但当时它却被看成是极为严重甚至恐怖的问题。它对我们的外交关系和行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两个月后,柏林墙建起来了,它成为造成欧洲分裂的冷战最为臭名昭著的象征。

腊斯克还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非常微妙的问题”——因为我们俩一直是单独谈话,所以他才可以这么说。很多美国人——包括肯尼迪身边的人——都认为他作为国务卿在与苏联打交道时使用了“过分温和的语言”。腊斯克承认,他的确不赞成使用强硬的语言。但后来,苏联对待美国的态度变得日趋强硬,腊斯克说他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他把自己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他本人开始担心苏美对话可能会再度使用“杜勒斯时代”的冷战词汇,对此他腊斯克一直是不赞成的。由于秋季中期竞选的言论越来越激烈,这种情况确实可能发生,因此必须加以提防。

66 我必须承认,腊斯克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我们的官方语言越来越受赫鲁晓夫的影响,他选用词汇不大讲究,在公众场合激动起来时更是如此。麦克纳马拉告诉我,赫鲁晓夫曾经生动地评论说,苏联的新型导弹能“击中太空中的苍蝇”,这句话使美国情报机关认认真真地做了一番调查,以便弄清楚苏联是否在技术上取得了某些突破性进展,但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葛罗米柯不喜欢这种语言,但很少加以抵制,因为他不敢和他的上司顶牛。赫鲁晓夫给美国总统的电报和信函通常是由外交部起草的。这些电报和信函从法律上讲非常精确,用词恰当而且符合专业要求,但文体冗长乏味,这一切充分反映出葛罗米柯的个性。

赫鲁晓夫生性活泼,喜欢讲通俗的语言,经常挖苦他的外交部长,常常轻蔑地称他是“一根干枯的木头棍”。他偶尔会用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重新编写已经准备好的文本。赫鲁晓夫不喜欢向速记

员或助手口授信件,他根本不擅长此道。他也不会写作。他无所畏惧地开始谈话,声音很大并且频繁地打着手势,好像正在对总统本人讲话似的:“亲爱的总统先生,我不能同意您的观点……”他滔滔不绝地讲着,犹如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对话。他信口讲出俄罗斯的民间传说和其他一些相当生动而又通俗易懂的词句,这种做法有时超出了外交通信的限度。重新起草信函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尤其是在赫鲁晓夫回忆起他曾讲过的话,对修饰了他的语言的那些“官僚们”大发脾气的时候。他渐渐地开始懂得必须按照外交规范起草信函。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依赖葛罗米柯准备的文本,但是,这些文件里面仍然保留着不少赫鲁晓夫的原话,其调门高得难以让腊斯克这样的职业外交家所接受,我本人对此同样也不满意。

肯尼迪总统决定中止这场激烈的外交辩论,亲自出面坦率地表明自己的立场。6月17日,他邀请我到白宫与他单独会面,以便告诉我他对赫鲁晓夫就德国与柏林问题所提出的建议将做出何种反应。

“如果我们美国同意撤离西柏林,”他说,“那么没有人会继续相信华盛顿所说的话,而且我们对其他国家所承担的一切义务都将变成一纸空文。如果我们最终被迫撤离柏林,我们对西欧做出的所有保证都将失去意义。这将影响到我们的基本利益,因为与西方国家的联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我希望赫鲁晓夫总理能够正确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我们不想使去年的柏林危机再度重演,我们相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次危机耗费了我们30亿美元,苏联也一定耗资巨大。”

接着,总统把古巴和柏林做了一番比较——过不了几个月,古巴问题就会变得突出起来。肯尼迪又说道:“我要是能够把卡斯特罗的古巴从鼻子底下除掉那该多好啊,但是我不得不容忍它的存在,就像双方都必须容忍各自不喜欢的其他一些事物继续存在一样。柏林问题的每一次严重恶化都会导致西欧国家再次提出自行

发展核武器的要求。但是，美国和苏联一样，反对在欧洲建立‘独立核力量’的思想。”

与总统进行的这次有关柏林问题的讨论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特殊效果。克里姆林宫仍在坚持要求赋予西柏林“自由城市”的地位，它甚至打算同意让这座城市的居民享有自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但是要有一个条件——所有西方国家的军队必须撤出去。肯尼迪明确表示他不同意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条件，情愿为此而同我们形成直接的对抗，尽管他没有阐明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莫斯科完全相信总统的决心，但是赫鲁晓夫个人错误地希望，不断施加压力最终会迫使肯尼迪屈服。指导柏林政策的这一总方针所导致的主要后果就是造成了长期的、最终是毫无必要的紧张状态。

肯尼迪总统接着又问道，在苏联完成了目前进行的一系列核试验之后，赫鲁晓夫是否会同意签定一个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条约。我回答说，赫鲁晓夫的立场是禁止一切形式的核试验，并且由各国自行监督本国核禁试的实施情况。（这显然是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甚至就是一种宣传，因为显而易见华盛顿是不会同意的。）

总统注意到，赫鲁晓夫最近对预计能击中太空苍蝇的那种新型导弹所做的评论已经使美国军方和科学精英就苏联的整体军事成就以及最近的试验，特别是高能量和高空的爆炸所产生的效果展开了一场新的争论。总统以一种调解的口吻结束了这次谈话，他表示希望两国尽快能就禁止核试验问题达成谅解。

这次谈话使我清楚地感觉到，总统非常关注在德国问题上施加新一轮的压力，但他仍明确表示，如果他能在这一地区保留足够的军事力量，这种分歧就不会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冲突。这就是自1962年与赫鲁晓夫进行了艰难的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以来他所奉行的新政策，他决心继续遵循这一政策。

8月下旬,我和总统的私人助手西奥多·索伦森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他告诉我,他在白宫的主要职责是观察政治风云的变化,提高总统的个人声望,为他的政策寻求支持,并研究总统应采取何种策略支持民主党赢得此刻正在紧张进行着的国会选举。

索伦森说,苏联如果就柏林问题进一步施加压力,可能会对选举的结果产生潜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总统采取什么行动,其结果都会使共和党额外多得些分。他的意思是说肯尼迪希望苏联在选举期间能保持中立。这样做可以为选举结束后与赫鲁晓夫再次举行会谈铺平道路,如果其间不能就某些具体问题签定协议的话。

这一呼吁显然非同寻常,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莫斯科的注意。几天之后,我通知索伦森,我们的谈话内容已向赫鲁晓夫作了汇报。我对他说,苏联方面对“总统的愿望”表示理解,并且不会在选举前夕采取任何可能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并使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行动,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

索伦森特意提到了那封电报的重要性。只是就古巴问题而言,他说,那份电报稍微来得晚了些,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作战问题。在选举期间,总统将被迫在古巴问题上采取比他原先设想的更为积极的立场。

当时我并不知道苏联正在进行着那些最终将导致导弹危机的秘密准备工作。所以说赫鲁晓夫所做的在选举前夕不使国际局势复杂化的承诺是在蓄意骗人。赫鲁晓夫因此仍在进行着一场赌博。

古巴危机步步逼近

9月4日,当我和罗伯特·肯尼迪进行单独会谈,讨论赫鲁晓夫在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上的最新立场时,古巴问题被再度以更为强烈的方式提了出来。罗伯特·肯尼迪非常焦虑地把谈话内容转移到苏联对古巴进行军事援助的问题上。他说,美国政府对苏

联不断增加对古巴的军事援助以及苏联军事人员抵达古巴等情况越来越感到忧虑。

69 美国政府尤为关注在古巴出现的地对空导弹,尽管这些导弹目前仍被控制在苏联军事人员手中。但是,罗伯特·肯尼迪说,这些导弹一旦被“易于冲动的古巴人”掌握,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又说,如果事态沿着下面的逻辑轨道发展,美国自身的安全将面临严重的问题:那里是否会出现威力更大并能从古巴本土射到美国境内的导弹?这些导弹是否会携带核弹头?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美国政府肯定不会让古巴现政府来决定美国的安全。罗伯特·肯尼迪最后说,上述这番话只是为了强调美国政府极为关注苏联对古巴的军事援助。

在解答他的疑问时,我强调指出,古巴拥有保卫自己的权利。至于核弹头问题,苏联完全赞成尽快缔结一项防止核扩散条约。与此同时,我避开了普通导弹和军事人员的问题。我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有关的报道,因为直到大约六星期后,也就是古巴危机正式开始之前,我对这方面的情况确实是一无所知。

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竟会在古巴部署核导弹。我同时也设想过这些导弹的射程达不到美国本土。然而,我深刻地意识到罗伯特·肯尼迪所提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我急切地向莫斯科请求指示。莫斯科草率地回答道:“在与美国人谈话时,你应该明确表示古巴只有苏联的防御武器。”^①这是全部的指示。无论是对美国人还是对我本人都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此外,刚刚从国内休假归来的博利沙科夫也受命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向罗伯特·肯尼迪转达同样的话。所以,在危机于10月份爆发之前,我一直在向美国官员重复莫斯科指示我说的那些话。直到危机爆发时,我才认识到莫斯科对“防御武器”这一措词的理解和华盛顿完全不同。

^① 这是一个带有欺骗性的回答。在我们的军事用语中,“防御”意味着用一切武器“保卫古巴”,而美国则以为这个词指的是可以用来抵抗对古巴的入侵,因而只能在古巴本土或其领海内使用的武器。

9月18日,我向罗伯特·肯尼迪转达了赫鲁晓夫致肯尼迪总统的一个新的口信。这个口信写在纸上大约15页长,它非常详细、非常明确地阐述了苏联领导层在古巴危机即将爆发之前是如何看待同肯尼迪政府的关系的。

对这一“口信”——在外交实践中这是常有的事——的实质需要做一些解释。使用它的目的是为了通信联系少一些官方的或正式的色彩,更加接近于口头语言。口信原文有时用打字机打在一张纸上而不是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送给对方。有时则不送书面材料,这样听取口信的一方应该自己做笔记。

在赫鲁晓夫时代,与肯尼迪总统以这种方式交换意见是常见的事,因为这样做可以使赫鲁晓夫自由地口授他的电文。赫鲁晓夫的这种做法使他的电报拉得很长,所以在没有请示莫斯科的情况下,我事先把这些电报译成了英文,这样,我就能够先向收信人口头叙述一下,然后再把一封绝对非正式但是非常完整的“口”信文本交给他。这很合腊斯克、罗伯特·肯尼迪以及总统的心意。他们回答问题时不会提及书面文本(从形式上说,它并不存在),而只是提及我传递的那个比较灵活的“口信”。

70

赫鲁晓夫的电报评论了肯尼迪总统对苏关系的忧虑,并坚持认为“两国关系恶化不是我们的过错”。他把两国关系的恶化首先归咎于柏林的“非正常局势”,但他允诺在选举结束,对话重新开始之前先将这些问题搁置起来。他以其特有的摇摆不定的方式又转而谈到他和斯图尔特·尤德尔——美国内政部长,曾与他的诗人朋友罗伯特·弗罗斯特一起访问过莫斯科——进行的“令人愉快的谈话”。“我不希望看到的,”赫鲁晓夫说,“就是您会在这个非常时刻要求国会同意征召15万后备役军人。”他坚持认为在美国提出“海盗式的要求”,要对苏联驶向古巴的船只进行检查的同时,苏联却没有做任何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事情。

当我手持这份电报去见罗伯特·肯尼迪时,我曾设想这次会谈将不会令人感到愉快,甚至可能发生激烈的争吵。所以,当他

只是表情阴郁地表示当天即会把这份电报转给他哥哥时，我反而感到十分惊讶。他没有和我讨论任何具体问题，只是说两国在国会选举之前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包括不就柏林问题采取行动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次谈话以及我和卢埃林·汤普森——他成功地结束了驻莫斯科大使的使命，刚刚回到美国——的另一次谈话使我意识到，在距古巴危机发生只有 10 天时，肯尼迪政府显然仍将柏林问题，而不是古巴问题，看成是苏美关系的主要威胁。

在回首往事时，我经常自问，围绕柏林问题出现的紧张局势是否是赫鲁晓夫为转移人们对古巴危机的注意力而故意造成的。从我们的档案里我没有找到具体证据，但是我怀疑他脑子里一直想借这两件事向肯尼迪总统施加压力，希望以此迫使他做出让步。这个幻想很快就破灭了。

第五章

古巴危机

赫鲁晓夫向古巴提供核导弹，卡斯特罗接受了

古巴导弹危机是我在华盛顿任职的 1/4 世纪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冷战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这场危机将两个大国最大限度地拖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因此它成为人们推断两个大国的对抗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的界石，同时也告诉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防止核战争。在此后的 30 年里，古巴危机期间的某些做法成为核游戏的规则和界限，同时也成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重要的、反复无常的、危险的关系中的规则和界限。

重新审视一下我们怎样因这个距离美国大陆 90 英里的小岛而走上了战争的边缘可能是有意义的。自从 1961 年 4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古巴流亡者进行的入侵行动失败后，美国一直在对古巴施加压力。1962 年 1 月，美国一手操纵将古巴驱逐出了美洲国家组织，并且对古巴实行贸易封锁。1962 年夏季和秋季，加勒比海的局势更为恶化。许多艘美国军舰驶向古巴沿海，这个岛国的上空昼夜有美国的军用飞机在巡逻。正如人们后来所知道的，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已经制定了一项被称为“曼古斯塔”的秘密计划，目标是削弱和彻底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这项计划已得到肯尼迪总统的批准。在对古巴加强心理压力的同时，美国还展开了一场宣传活

动,告诫苏联不要冒险向古巴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11月11日,苏联通过塔斯社提出一项严正声明,声明谴责了美国的宣传攻势,并且警告说:“这次如果有人攻击古巴,他必将受到惩罚。”

72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的是,5个月前,即1962年5月,苏联领导层已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达成了重要的秘密协议。苏联驻古巴使馆的参赞、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阿列克谢夫出人意料地被从哈瓦那召回莫斯科,并且受到赫鲁晓夫的召见。阿列克谢夫会讲西班牙语,而且和卡斯特罗建立了友好且相互信任的关系。卡斯特罗宁愿和他打交道也不愿和我们的大使谢尔盖·库德里亚夫采夫打交道。大使没有能够和古巴领导人建立起恰当的联系,莫斯科注意到了这一点。

阿列克谢夫到达莫斯科后,赫鲁晓夫立即通知他,已经提名让他担任大使。数年之后,阿列克谢夫让我看了当时他写的一些笔记,并且说赫鲁晓夫曾告诉他:“你的使命是和我们决定在那里部署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联系在一起的。这是防止美国全面入侵古巴的唯一办法。你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会同意我们采取这样一个行动吗?”

阿列克谢夫大大地吃了一惊,他犹豫了一会儿才回答说,卡斯特罗在他本人以及古巴与其他拉美国家团结一致的基础上,已经建立起保卫古巴革命的完整战略,因此他不大可能同意采取我们建议的行动。即使他同意了,美国也会以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存在为借口,使他和他的政府完全孤立于其他拉美国家。

第二天是个星期日,赫鲁晓夫仍然召来了政治局成员、安德烈·葛罗米柯和几位军队领导人。他邀请他们到他的夏季别墅“喝杯茶”。阿列克谢夫对我说:“赫鲁晓夫说道,‘我们的决定会使菲德尔·卡斯特罗感到恐慌,他可能不同意部署导弹。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并且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不应告诉卡斯特罗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而应该公开宣布,为了挽救古巴革命,迫切需要采取一个大胆的措施,同时还应宣布,由于该地区的力量组合对我们不

利,所以苏联政府甚至可能考虑在得到卡斯特罗认可的前提下,在古巴部署苏联的导弹。”

赫鲁晓夫继续说:“我们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悄悄地运送和部署导弹,以便给美国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如果我们不想让那里的局势恶化,那就必须保证在11月4日美国国会选举结束前不把消息透露给新闻界。一旦选举结束,选举的紧张空气缓和下来,美国人除了吞下这颗苦果之外将别无选择。我们对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导弹不也是无可奈何吗?”

赫鲁晓夫进一步指出,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考虑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和手段防止古巴革命受到美国的全面侵略。当他在瓦尔纳——保加利亚的一个海滨胜地——休假时,他就有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想法。

促使赫鲁晓夫做出这一决定的仅仅是他保卫古巴的愿望——这种愿望的确是真诚的——吗?对此我表示怀疑。这一行动是一项内容广泛的地缘政治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实施这一战略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不仅对苏联参加柏林问题的辩论有帮助,而且对它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也有帮助。^①但是在那次会议上他们只讨论了古巴问题。

73

阿列克谢夫返回古巴时,陪同他的是谢尔盖·比留佐夫元帅,他和另外几位导弹专家一样在旅途中隐匿了真实身份。使这位新大使十分惊讶的是,卡斯特罗对在古巴部署我国的导弹的建议反应很平静。他稍停了一会儿说道:“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动。在采取行动之前,我必须和我最亲密的助手商量一下。但是,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对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我想我们会同意把苏联导弹部署在我们这个岛上。我们可能是和美帝国主义摊牌的第一个受害者!”

^① 当时,战略力量的平衡对美国有利。苏联以300个核弹头对付美国的5000个核弹头。赫鲁晓夫希望将我们的中程导弹转移到一个可以打击美国的地方,以此来调整核力量平衡。

阿列克谢夫再次强调提出这个建议的唯一原因就是防止古巴受到美国可能发动的侵略。

6月份,劳尔·卡斯特罗——菲德尔的弟弟及国防部长——对苏联进行了一次工作访问,在那里他与国际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草签了一项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的秘密条约。后来,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他从卡斯特罗打游击起就是他的一名亲密助手,并且是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的主要发言人——接替了劳尔·卡斯特罗的工作。格瓦拉根据卡斯特罗的建议,对这项已经草签但还没有正式签署的条约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赫鲁晓夫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些修改意见,但是由于此后不久便发生了加勒比海危机,所以双方从未正式签订过这项条约。

根据阿列克谢夫大使和参与谋划和指挥古巴行动的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将军所说,在古巴共部署了42枚中程核导弹以及大约4万苏联军人。导弹能够袭击美国的主要城市,直至加拿大边界。这些核弹头的爆炸力和摧毁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相当。所有的导弹都由苏联人严格控制着,并且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以防止古巴人掌握它们。格里布科夫将军说,用来向古巴运送人员和物资的船量超过了85艘,经过伪装之后,这些船只从不同港口共开行了183次以上。

74 苏联使馆被排斥在圈外

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所有这些危险的活动不仅对公众保密,而且也对苏联外交机构保密。即使是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瓦列里安·佐林和担任驻美大使的我对这些情况也绝对是一无所知。更有甚者,我们不断收到内容相同的一般性指示,它要求我们在回答有关古巴导弹的问题时只能说苏联仅仅向古巴提供了“防御性武器”,而不要涉及任何细节。我们曾设想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不具备发射到美国本土的射程。但是我们没有得到莫斯科的

正式认定。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葛罗米柯都从未对我的答复做过更正。

为了保守秘密，莫斯科不仅没有将它已计划在古巴部署核武器这样重要的情况通知我，而且实际上把它的大使当成了不自觉的欺骗工具，因为我一直在固执地对美国人说，我们在古巴部署的仅仅是防御性武器。佐林感到他自己处在一个更为窘迫的境地，因为他一直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讲着同样的话。

几年后，迪安·腊斯克告诉我，当美国对古巴的侦察照片显示出有我国导弹的存在从而将这场危机挑明时，白宫内部立即展开了一场争论，内容是政府是否应以“蓄意欺骗”美国政府的名义，要求莫斯科把我召回去。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我不了解详细情况，因此指责我进行欺骗是不公正的。

在事后对我们造成的这场历史性危机所进行的许多调查分析中出现了一个荒唐的插曲。1989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古巴危机苏美讨论会。与会者中有葛罗米柯和我。有一个美国人直截了当地问我事先是否知道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我说不知道，并且请葛罗米柯作出解释。葛罗米柯回答说：“你不了解情况当然会令人感到奇怪，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没有什么事情会对你保密。”

葛罗米柯没有说真话。不告诉我们真实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整个古巴行动都非常保密，因此莫斯科可能决定不用电报向佐林和我传达任何有关情况，因为电报可能会被监听并被破译。更带有讽刺意味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事实，就能更好地为政府错误的古巴战略进行辩护。这种政府蓄意利用自己的一位大使欺骗美国政府的做法，在后来很多年中对我都是一种精神打击，而且使我以更为谨慎的批评态度对待来自莫斯科的情报。

现在我相信，当美国政府通过空中侦察比我早几天得知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时，它和我一样感到极为惊讶。白宫在危机发生前夕的基本态度完全可以从10月中旬肯尼迪总统为评论国际局势的

一批重要编辑人员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看出来。他特别强调柏林——而不是古巴——可能成为危机的根源，并说除非古巴确实侵犯了它的西半球邻国，否则将不会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迫使苏联尽可能多地为古巴问题付出代价，而且不会以放弃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基地为代价来换取苏联放弃它在古巴的基地。

由于几天之后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因此肯尼迪不得不对古巴问题重新做出评估。10月14日，美国空军飞行员驾驶的 U-2 飞机准确地测定并拍摄了古巴境内的中程导弹发射场。10月16日，经过照像侦察得到的照片被送交肯尼迪和导弹专家，这些专家肯定辨认出部署在古巴国土上的导弹是我们的。白宫成了总统亲自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处理危机小组——后来被称为执行委员会——频繁召开会议的场所。大多数鹰派成员都声称他们赞成立即轰炸导弹发射场，接着便由美国军队登陆古巴。据说有些将军甚至提到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我相信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几经考虑之后，总统终于明确作出决定：在施加必要的军事压力的同时，应该优先采取外交、对话及和解的办法。

76 虽然我的政府当初曾将我置于圈外，但根据华盛顿的要求，我成为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与莫斯科联系的主要秘密渠道。由于博利沙科夫被认为没有能力掌管两国政府间重要而又微妙的通讯联络，所以他那条联系渠道实际上已被取消。罗伯特·肯尼迪和我在危机期间几乎每天都要举行会谈。他不断向我暗示，在总统处理危机小组成员中存在着紧张情绪。有时他显然过分强调了军方要求苏联撤走导弹的压力以及总统对这种压力的抵制。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确切地反映了白宫内部的紧张空气。我向莫斯科报告了这些情况，这有助于使赫鲁晓夫了解他一手造成的这种局势有多么严重。这些急电显然都到了他手里并且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因为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地引用了其中几份电报的内容。

与此同时,肯尼迪总统开始与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和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进行一系列的协商。在与盟国进行秘密协商期间,总统于10月18日会见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葛罗米柯已从纽约——他在那里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秋季例会——来到了华盛顿。

我出席了这次非常特殊的会谈。很多年后,葛罗米柯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在48年的外交生涯中,他曾与九位美国总统举行过多次会谈,这次会谈很可能是其中最为艰难的一次。谈话中常常出现突然转移话题或者疏漏某些问题的情况。肯尼迪和葛罗米柯都很紧张,虽然双方都在竭力进行掩饰。他们围绕着苏联和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和古巴问题本身讨论来讨论去。总统一一直在暗示,由于苏联向古巴运输军事装备致使局势正在不断地恶化,然而他的态度并不特别过分。他甚至一再承认——最初在维也纳就承认过——上一年入侵古巴是错误的。

围绕在古巴部署的是“防御性”还是“进攻性”武器而展开的这场对话颇符合传统的外交谈判模式——双方根本没有提到过导弹这个词。葛罗米柯重申苏联将不会向古巴输入进攻性武器。总统完全没有提及苏联导弹已经部署在古巴一事,虽然我们后来才知道,空军拍摄的导弹发射场照片当时就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所以我没有必要回答这些武器是不是部署到了古巴的问题,”葛罗米柯后来就是这样向他的回忆录读者为自己辩解的。葛罗米柯此后一直坚持说,他没有被专门问及导弹问题,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谈论这一问题的原因。这是否像肯尼迪总统及其幕僚们后来所说的那样是在故意骗人?请读者自己做出判断。为什么总统本人也没有提导弹的事呢?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但我认为当时他还没有制定出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因此他不想与葛罗米柯进行毫无意义的讨论。

在会谈过程中,葛罗米柯代表苏联领导层建议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肯尼迪表示赞成,但是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葛罗米柯接到了腊斯克的一个电话。腊斯克在电话中说,如果在下个月举行会

谈,就不会有足够的时间为取得积极成果而进行准备。在没有拒绝举行最高级会谈这么一个建议的同时,华盛顿以此方式无限期地推迟了最高级会谈的开会时间。例如,肯尼迪和葛罗米柯只是泛泛地谈了谈德国问题。

总的来说,葛罗米柯对此次会谈感到满意。他完全误解了肯尼迪的举动,这一点可以从他会后立即拍发给政治局的一封充满乐观情绪的电报中得到证实。葛罗米柯写道:“根据我们对美国对古巴问题所持立场的了解,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的看来,形势相当令人满意。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一部分美国官员的正式谈话,包括肯尼迪总统10月18日与我们会谈时的讲话得到证实,还可以从我们的外交官从非官方渠道了解到的一系列情报中得到证实。有理由相信,美国目前没有侵略古巴的计划。与此相反,它打算在古巴与苏联的经济联系中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以此破坏古巴的经济,在这个国家中造成饥荒,从而煽动对政府的反抗。”

接下来他不无骄傲地说道,美国人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华盛顿对“苏联打算援助古巴的大胆行动”感到惊讶。他写道,美国政府推断,莫斯科不仅仅意识到了美国人极端重视古巴这个国家及其地理位置,而且也意识到了古巴问题已经严重到令美国大伤脑筋的程度。但是,如果苏联在已经了解这一情况之后仍然决定向古巴提供援助,那么,如果美国入侵古巴,苏联就更会下决心进行抵抗。据葛罗米柯称,尽管舆论对苏联在哪里抵抗或如何进行抵抗说法不一,但没有人怀疑苏联会这么做。

葛罗米柯继续写道,美国的反古巴运动已略有减弱,为了转移公众对古巴的注意力,舆论的重点已经转向柏林问题——白宫肯定从中起了作用。葛罗米柯报告说,甚至有谣传说苏联已经表示愿意缓和它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条件是美国在西柏林问题上也得这样做。然而,他又告诫说,尽管目前还不能保证美国不对古巴采取粗暴的行动,但所有的客观情况及官方保证均证明美国没有制定入侵古巴的计划——这样做无疑会束缚华盛顿的手脚,因此可

以断定美国几乎不会在古巴进行军事冒险。我竭力劝他谨慎做出估计，但他不愿意听。显然他想博得赫鲁晓夫的欢心。

危机爆发：处在解决问题的中心位置上

10月22日，星期一——命运攸关的那个星期的头一天——我飞往纽约去送葛罗米柯乘坐专机返回莫斯科。他仍然没有谈论我们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我必须承认，我也没有详细地问他，对我来说，知道我们的武器是“防御性”的就足够了。）中午时分，他的飞机刚刚起飞，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官员就在机场上交给我一封腊斯克的邀请信，要我当天下午6时到国务院见他。当晚我已在纽约安排了一个事务性约会，所以我问腊斯克的信使能否将会谈推迟到第二天。他显然得到了国务卿的明确指示，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当晚去华盛顿见面。虽然腊斯克的信使说他不知道会谈的议题，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一定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以前腊斯克从没有如此坚决地限定会谈的时间，相反，他总是在半道上碰见我时商定我们的会谈时间。所以，我感到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但却不能确定这件事和古巴有关还是和西柏林有关。

我立即乘飞机回到华盛顿，并在约定的时间——10月22日下午6时——走进腊斯克的办公室。腊斯克的表情异常的严肃。他说总统命令他通过我向赫鲁晓夫转交一封有关古巴问题的私人信函，此外还将把总统将在当晚7时通过电视和收音机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的讲稿交给我，供我们参考。腊斯克预先告诉我，他已得到指示，这个时候他既不能就这两个文件回答任何问题，也不能对它们作出评论。

“文件中都讲到了。”他说。

那天晚上，肯尼迪在向全国发表讲话中告诫国民，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已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并且宣布“将对正在用船只运往古巴的所有进攻性武器进行严格的检查”。总统在他写给赫鲁晓夫

的私人信件中指出,就像在德国问题上一样,他早已公开表明,如果古巴的形势发生了某种变化,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卫自己及其盟国的安全。尽管如此,苏联还是着手在古巴设立了远程导弹基地,并部署了其他进攻性武器。总统写道:“我必须告诉你,美国决心消除这个威胁我们这半球安全的隐患。”他又说,他仅采取了“最为必要”的行动,并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抑制自己,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以免加深原本已非常严重的危机,这样将有助于以和平的方式,通过谈话来解决问题。

我对腊斯克表示了我的惊讶:无论是总统还是腊斯克在四天前刚刚举行的会谈中都没有认识到有必要与葛罗米柯讨论这些问题;现在美国政府正在通过猛烈的宣传活动来制造一场严重的危机。腊斯克的精神状态显然十分紧张,他说眼下他们还不打算公开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的私人信函,虽然不能排除这样做的可能性。我们的会谈实际上到此即结束了。

我们与美国的关系现在分明正面临着—场重大的、十分险恶的危机。我立即回到了使馆,但我先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呆了大约15分钟,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尽可能准确地估计了一下形势。我感到极为困惑,因为我没有从我的政府那里得到任何指示或事先警告。我毫不拖延地向莫斯科汇报了我与腊斯克的谈话,并且完全意识到继葛罗米柯那份令人宽心的电报之后,我的这份电报将引起巨大的、令人不快的震动。在此之前,经验丰富、办事谨慎的葛罗米柯从没有做过如此错误的预测。

当然,致命的错误预测是赫鲁晓夫本人做出的。他预先没有想到他的冒险挺进将会被及时发现,致使肯尼迪能够组织起猛烈的反击,包括进行直接对抗的威胁。他没有制定在遭受挫折时用来应付局面的退却计划,因此被迫采取临时措施,结果搞得非常狼狈,并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终提前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感到非常害怕,以致于没有打出他手中的一张好牌——肯尼迪同意从土耳其撤出美国的导弹。其实本应该将此事公之于众,以此为筹

码,以美国人撤出他们的基地作为我们撤出基地的条件,肯尼迪和腊斯克只能将此当作最后一着来接受。如果赫鲁晓夫做出这些安排,这场危机最终就不会以如此不光彩的撤退来得到解决。

然而,他大大低估了他的对手的心理素质。如果他事先征求使馆的意见,我们将会预先说明,一旦他的冒险行动被发觉,美国必定做出强烈反应。值得一提的是,卡斯特罗明白这一点。他曾向赫鲁晓夫建议,哈瓦那和莫斯科应该通过签订一项合法的协议,正式公布同意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就像美国在其欧洲盟国的土地上正在做的那样。但是赫鲁晓夫想使华盛顿大吃一惊;当他的秘密最终暴露时,大吃一惊的却是他自己。

80

我一发出与腊斯克会谈的电报,就立即召集使馆高级官员开会。我要求他们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同时强调了局势的严重性,这可能会使使馆自身面临复杂的情况。外交官要24小时守候在使馆。住在使馆外面的外交官家属要特别小心。我还单独召开了高级情报官员的会议,讨论即将发生的危机以及如何协调我们提供给莫斯科的情报。使馆的气氛当然不轻松,但没有出现任何恐慌和混乱。使馆仍像正常情况下一样在有效地运转。某些西方评论家报道说,我们烧毁了文件——这是两国关系即将破裂或战争迫在眉睫时的典型做法——但那不是真的。

10月23日,星期二,赫鲁晓夫复电肯尼迪,指出总统采取的措施是对古巴和苏联的侵略,是对古巴内部事务不可接受的干预,侵犯了古巴“抵御侵略”的权利。电报否认美国拥有在国际海域控制海上通行的权利。赫鲁晓夫表示希望取消肯尼迪宣布的那些措施,以免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就在我们使馆给莫斯科打电报的同一天,全美各地在总统讲话发表后都展开了运动,从而使局势更加动荡不定。麦克纳马拉在星期一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如果苏联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的船只拒绝遵守美国军舰发出的命令,美国将毫不犹

豫地将它击沉。根据我们通过私人关系及技术侦察得来的情报,在总统就古巴问题采取行动之前,美国政府高层人士曾秘密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总统身边的人越来越相信,国际力量均势正在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倾斜,因此,为了防止莫斯科得出华盛顿已不愿在世界各地抵制苏联压力的印象,一定要扭转这一状况。我们报告说,他们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古巴使用武力而强迫苏联退却从战略上讲是否对美国更为有利。对古巴使用武力将使美国在柏林问题上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同时还会获得较为明显的地理和军事战略优势。他们敦促肯尼迪总统对古巴问题持强硬态度,要表现出他的个性。

81 驻华盛顿使馆还报告说,整个首都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我们注意到,美国人正在紧张不安地等待着苏联第一艘船只驶近古巴。很多美国人直接向使馆询问,第一次武力较量的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华盛顿时间下午2时,当总统发布的对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的船只进行检查的命令正式生效时,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非常不安,因为我还没有从莫斯科得到有关如何对待这种检查的任何指示或任何消息。^①

10月23日晚上,罗伯特·肯尼迪来拜访我。他处于一种激动不

^① 10月22日,苏联中央军事情报局上校、同时又为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充当间谍的奥列格·潘科夫斯基在莫斯科被捕,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此事。此人虚荣心极强,他坚决要求获得美国的上校军阶;在因公去伦敦和华盛顿出差时,他要求得到伊丽莎白二世和肯尼迪总统的接见。据布鲁金斯学会的雷蒙德·L.加特霍夫——他刚开始为政府工作时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位苏联问题分析家,最后担任了美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后来所说,潘科夫斯基的美国后台老板拨给他两个密码电号信号,一个用来通知他面临着立即被捕的危险,另一个则用来通知苏联即将进攻美国。被捕之前,潘科夫斯基尚有几分钟的时间发出信号,他发出了那个用来警告进攻即将开始的信号。显然他决定让全世界陪着他走向灭亡!

潘科夫斯基的中央情报局老板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得知潘科夫斯基被捕的消息并立即做了汇报,但他们压根儿没提他发出了战争即将来临的信号这回事。这样做使他们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但他们也充分认识到他们的代理人夸大了他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如果潘科夫斯基的老板不了解这个人,并且把他发出的警报转达给他们的上级,那么在古巴危机达到顶点时,真难以想象会出现多么可怕的灾难性变化。

安的状态中，他所说的显然是过去已说过的那些话。这些话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他主动来见我是为了解释造成目前的严重事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最为关注的问题是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的私人关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这种关系原本是非常重要的。总统曾经公开表示，苏联援助古巴的那些武器纯粹是防御性的——尽管某些共和党人提出过不同意见——从而“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苏联就古巴问题所做的保证上。现在，古巴出现了苏联的中程导弹，其射程几乎可以覆盖美国全境。这些中程导弹肯定不是大使、葛罗米柯、苏联政府以及赫鲁晓夫所谈论的那种“防御性”武器。总统认为这是一种蓄意的欺骗。这种行为使秘密渠道也受到了损害，因为“甚至连苏联大使——就我们所知，他受到本国政府的完全信任——都不知道能够打击美国的中程导弹已经被运往古巴，而且这些导弹也并非用于保卫古巴，使它免遭即将来临的攻击。此外，甚至连大使本人在我们上次会谈时都没有得到可靠的情报”。他说的是对的，我除了承认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真实情报之外，再没有别的话可以回答他。谈话的气氛很紧张，而且令我相当窘迫。

82

临告别之前，他显然已经冷静下来。因此他有点漫不经心地问道，自总统发表讲话及颁布了隔离检查令——这项命令已扩大到使用武力制止更多的进攻性的导弹运到古巴——之后，开往古巴的苏联轮船的船长们接到了什么命令。我回答道，我听说早就发布了严格的指示：船长们不得屈从任何在公海进行搜查的非法要求，因为这有悖于保障海上航行自由的国际法。我又说，就我所知，那些指示仍然有效。罗伯特·肯尼迪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了结，因为美国将着手使用武力阻止我们的船只前进。

“但那样做将是一种战争行为。”我提醒道。他摇了摇头走了。

我犹豫了一下，随后把罗伯特·肯尼迪严厉的谈话，包括那些全然不会令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高兴的言辞原原本本地向莫斯科

作了汇报。我希望使莫斯科认识到总统周围的人的确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中。我认为这样做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克里姆林宫想象到在华盛顿弥漫着的紧张空气。(葛罗米柯的助手们后来告诉我,葛罗米柯指示他们不要把我的报告交给苏联领导层的成员传阅,因为他打算亲自呈送给赫鲁晓夫。接下去发生了什么事目前仍不清楚,但是他从未把我的报告交还给他的助手们,我也没有在档案中找到它。)

在古巴危机期间,为了使我们的会谈严格保密,罗伯特·肯尼迪与我通常把会谈的时间安排在午夜以后,大约从凌晨1点到3点之间。我们会谈的地点或者在使馆,或者在司法部他的办公室里。当他来拜访我时,我常常在门口迎接他,然后一起上到三楼我的起居室,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除了我们俩人之外,再没有第三人。我妻子通常为我们送上咖啡后便去就寝。这一切使得会谈的气氛有点儿神秘,同时也反映出华盛顿当时的紧张空气。由于罗伯特·肯尼迪根本不善于社交而且缺乏适当的幽默感——一旦讨论变得复杂起来,适当的幽默感常常会起很大的帮助作用,而当时的讨论确实很复杂——从而使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此外,他容易感情激动,而且过于敏感。但我们还是尽力使我们的谈话——一般说时间总是拉得很长——有条有理地进行。

即使到了那个时候,莫斯科仍然没有告诉使馆任何情况。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后来对我说,我得不到确切情报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及其同僚在其秘密计划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之后完全陷入了手足无措的慌乱状态中。

我与罗伯特·肯尼迪首次进行会谈之后,总统于10月23日又给赫鲁晓夫发了一封电报。总统在电报中表示,希望赫鲁晓夫能立即命令苏联船只服从隔离检查的要求。同一天赫鲁晓夫回电说,苏联政府把违反在公海及国际空域自由航行的做法视为“一种将人类推向核导弹战争深渊的侵略行为”。因此,苏联政府不会命令它的船只服从正在封锁古巴的美国海军力量的命令。电报说,不言而

喻,“对美国船只在公海上的海盗行为,我们将不会袖手旁观。那时我们将被迫采取我们认为必要而又适当的措施,以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拥有采取这些措施所必需的一切手段”。

10月24日,星期三,这一天可能是我担任驻美大使期间最难忘的日子。那些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还能回忆起我们大家在使馆里观看美国电视播放的一条苏联货船越来越靠近那条假想线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极度紧张的心情。如果这条货船越过那条线,就意味着闯入了在古巴周围划定的隔离区,这样美国军舰就可以阻止这条船前进并且把它扣押起来,如果船长拒不停船,美国军舰甚至还可以开炮射击。

电视播音员用一种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的嗓音倒数着在美国军舰和作战飞机监护下的那条苏联货船距离假想线的英里数。4英里,3英里,2英里,最后只剩下1英里——那条船会停吗?最后那条船越过了隔离线,驱逐舰却没有开炮。这时,所有的人——首先是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些货船——那些装载着核武器的船——已经折回并且停在隔离线以外。我们没有从莫斯科得到有关通知。使馆是从美国电视上得到这一消息的。

这样,在海上发生直接冲突的威胁被暂时解除了,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积极探索还在继续。后来,当危机发展到顶点时,所有的苏联船只都停在离检查线不远的地方,以免引发危险的冲突。与此同时,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的工作却仍在继续。

但我们仍然向我国政府汇报说,华盛顿的绝大多数人担心危机进一步升级。据新闻媒介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通过大规模轰炸摧毁正在建设中的导弹发射基地。有消息说,罗伯特·肯尼迪、邦迪,还有那些军人是政府中的战争贩子,他们坚持主张表示出强硬的态度,以便除掉古巴的导弹基地,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入侵这个岛国。我们在电报中指出,这一消息很可能是官方散布的,

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向我们施加压力。但同时我们还警告说，总统本人就像一个赌博者一样，实际上正在把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声誉以及在1964年重新当选的机会全部押在这次危机的结局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排除——特别是在已知总统周围尽是一些好战分子的情况下——可能出现诸如空袭古巴导弹基地甚至入侵古巴这样一些不顾后果的反应，尽管后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显然要小一些。

使馆还指出，由于新闻媒介推波助澜，美国各地的气氛已越来越紧张。新闻媒介报道说，各州正在使其民防系统和核炸弹掩体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并且正在为其居民储备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我们还报告说，腊斯克当天把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新闻记者召到国务院，对他们说，某些报纸宣称，紧张局势已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缓和（在苏联第一艘货船越过封锁线之后），这种说法与事实有出入。腊斯克强调说，政府将使用“一切”手段消除古巴的导弹基地，这一决心从未改变过。他还否定了颇有影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发表的报道，即肯尼迪政府正在权衡是否以从其他国家——如土耳其——拆除美国的导弹基地来换取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尽管这种交易必定会成为解决这场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在那个场合腊斯克不想对我们或对美国公众舆论表示出这种妥协态度。

星期四晚上，我们收到了肯尼迪写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肯尼迪在信中声称造成古巴局势紧张的始作俑者不是美国，因为苏联已经提供了军事援助，尽管它们一律被称为防御性武器。但那些可以袭击美国的导弹证明了他最近对古巴采取的行动是正当的，同时他还呼吁“将局势恢复到以前的状况”。

10月26日，星期五。整整一天使馆都在报告说，美国新闻媒介显然得到了政府高层人士的暗示，因此不断地发布消息说古巴仍在建筑导弹基地并且使导弹进入了发射状态。那天傍晚，国务院和

白宫发表了正式声明,明确表示这种状况可能迫使美国对古巴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尽管新闻界坚持说入侵古巴仍然是可能的,但它更加强调轰炸导弹基地的可能性。

有些美国作家认为,博利沙科夫曾经向罗伯特·肯尼迪传达了米高扬的一个口信,米高扬在口信中坚持说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根本打不到美国。我在我们的档案里没有发现这一口信的记录。但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尤其是在他遇到压力的时候,这样的事是可能发生的。如果有过这样一个口信的话,那它确实是错得一塌糊涂,但罗伯特·肯尼迪从来没对我提起过它。

据我国驻哈瓦那使馆发来的一份报告说,菲德尔·卡斯特罗星期五晚上到过苏联使馆,并且一直呆到星期六,即10月27日凌晨5时。他为看不出这场危机将如何得到解决而忧心忡忡。双方都不愿改变自己的立场。卡斯特罗认为美国有可能轰炸古巴。他甚至建议我们的大使与他一起撤到他的指挥所的钢筋水泥地堡中去——这个指挥所设在哈瓦那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卡斯特罗在发给赫鲁晓夫的一封电报中建议,苏联在与美国进行谈判中应以使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威胁手段来击败美国对古巴的任何威胁。

但是,赫鲁晓夫的态度远没有这么强硬,卡斯特罗的电报只不过更坚定了他寻求妥协以避免核战争的决心。在莫斯科于星期六收到卡斯特罗的电报之前,这个决定无论如何也已经作出了。在星期六之前,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已经将赫鲁晓夫发来的一封内容十分详细的电报交给了肯尼迪。这封电报重申运到古巴的苏联导弹纯粹是防御性的,而且是应古巴政府的请求才运去的。赫鲁晓夫再次批评了美国的隔离检查命令,并且向总统保证,正在开往古巴途中的苏联轮船没有运载任何军用物资。苏联没有进攻美国的意图,因为苏美两国之间如发生战争将无异于自杀。意识形态的分歧应该通过和平手段加以解决,所以“让我们使我们的关系正常化吧”。

赫鲁晓夫呼吁双方都应表现出通情达理的态度。他建议苏联宣布开往古巴的船只没有装载任何军用物资,而美国则宣布不对

古巴进行武力干预并且不支持任何侵略势力。赫鲁晓夫暗示，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将会完全消除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理由。这一重要的暗示表明，赫鲁晓夫正通过他的第一封求和电报寻求政治妥协。

86 星期六是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的一天。赫鲁晓夫没等美国人对星期五的信函做出回答就又给肯尼迪发出一封急电。他在电报中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妥协方案：苏联方面愿意从古巴撤出被肯尼迪说成是进攻性的武器，以换取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同样的武器。相互间的承诺将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两国政府的特别代表加以认定。

在这两封函电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意图？赫鲁晓夫预料美国随时都会对古巴的导弹基地进行空中打击。起初他一直担心坚持要求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会使尽快解决古巴问题的努力变得复杂化。但是，在某些同僚的逼迫下，经过重新考虑之后，他最后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尝试——以撤除部署在古巴的苏联导弹为筹码，换取美国撤除其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然而，这张牌他打得太晚了。

肯尼迪在星期六所做的答复中故意不理睬赫鲁晓夫在第二封电报中提出的从两国的保护国撤除导弹的建议。总统显然觉察到了赫鲁晓夫的内心慌乱和犹豫，因此根本不想在此时此刻讨论土耳其的导弹问题。肯尼迪在回电中对赫鲁晓夫愿意尽快寻求一种解决办法表示欢迎，但是他坚持认为首先应该把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的所有工作都停下来，而且应该在国际监督下将部署在古巴的所有进攻性武器置于无法使用的状态。与此同时，他表示愿意在下列基础上，就永久解决古巴危机问题达成一项协议：苏联将从古巴撤除所有的导弹及其他进攻性武器；美国将取消封锁，并且保证无论是美国还是西半球其他的国家都不会入侵古巴。

一次及时的问答打破了僵局

星期六深夜，罗伯特·肯尼迪邀我到司法部与他进行一次紧急的私下会谈。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谈话，它给了赫鲁晓夫一个信号，即他最终可以通过在古巴和土耳其之间进行一次导弹交易来保全面子。^①

总统的弟弟在谈话一开始便指出古巴危机正在迅速恶化。刚刚收到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一架非武装飞机在古巴上空进行侦察时被击落，现在美国军方正要求总统允许进行报复。罗伯特·肯尼迪解释说，美国不可能停止这类飞行，因为进行飞行的目的是为了及时了解那些威胁着美国国家安全的古巴导弹基地的情况。但是以牙还牙的做法将会引起难以遏制的连锁反应。

87

在处理关键的古巴导弹基地问题时也同样会遇到这种情况。美国政府决心除掉基地，并且已准备在出现最坏情况时将这些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基地炸掉。但罗伯特·肯尼迪同时也承认，轰炸这些基地可能使苏联人遭受伤亡，这无疑会引起苏联政府在欧洲实施报复行动。那时将会爆发一场真正的战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和俄国人将会死亡。美国方面无论如何也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他相信苏联政府也会这样做。然而，如果迟迟找不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可能造成局势失控的重大危险。为了强调这一点，他附带着指出，有许多失去理智的美国将军——而且不仅仅是这些将军——“一心想打一仗”。

罗伯特·肯尼迪继续说道，这就是总统为什么认为赫鲁晓夫10月26日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以及10月27日那天发出的复电为解决这场危机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基础的原因。对美国人来说，重要的事情在于尽早使苏联政府同意停止一切在古巴进一步建设导弹基地

^① 对这次会谈的叙述是根据我当时的报告而写的，这份报告被保存在我国档案中。由于报告是在会谈后立即写成的，因此被认为颇具权威性。

的活动,并同意采取国际监督的办法使导弹不可能点火发射。作为回报,他说,美国政府将不仅愿意取消对古巴的隔离,而且将保证不再入侵古巴。美国同时还肯定西半球其他国家也将会愿意做出同样的保证。

我稍微思考了一会儿。这一妥协办法——以及总统27日那天的复电——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沒有包括“导弹基地对导弹基地”的交换条件。我仍然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有关指示,而且还没有从莫斯科收到赫鲁晓夫第二封电报的全文,因为电报在当天才被交给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所以我决定提个问题:如何处理土耳其导弹基地这个问题?

果然,罗伯特·肯尼迪对此问题早有准备。总统已授权他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尚未告诉赫鲁晓夫。他回答说,如果土耳其导弹问题成为按照刚才提出的条件解决危机的唯一障碍的话,总统认为这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的主要问题是难以公开宣布:在土耳其设立导弹基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采纳的一项正式决定的结果。总统现在宣布单方面决定从土耳其撤出导弹势必会损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结构,并且会削弱美国在北约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肯尼迪总统仍准备就此问题同赫鲁晓夫达成协议。

“我相信,”罗伯特·肯尼迪说,“美国可能用4~5个月的时间从土耳其撤走导弹。根据北大西洋组织内部的程序规则,这是政府所需要的最低时间限度。有关土耳其的全部问题可以在你我之间继续进行讨论。然而,总统眼下还不能公开谈论土耳其问题。”

他警告说,他对我们讲的有关土耳其的问题是绝对秘密的,华盛顿只有两个人——除了他哥哥和他本人之外——知道此事。他最后说,这就是总统要他转告赫鲁晓夫的全部内容,而且总统还要求赫鲁晓夫在次日——星期天——之前通过我们的秘密渠道给他一个明确的、实实在在的答复,而不要进行只会是延误时机的复杂争论。遗憾的是,目前的形势非常紧迫,已没有时间全面解决问题了。罗伯特·肯尼迪说他哥哥希望苏联政府首脑不要误解他的意

思,以为美国是在发出最后通牒。很简单,时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我们分手之前,罗伯特·肯尼迪留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这样我就可以直接打电话到白宫找他。在整个会谈过程中,他都显得十分紧张。的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个样子。他甚至没有像平常那样竭力就各种问题与我进行争论;他只是一再说时间越来越紧迫,我们不该浪费时间。会谈结束后,他立即驱车去见总统。他曾经说过,现在他几乎一天到晚都和总统呆在一起。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明确指出,我就这次会谈所写的报告改变了莫斯科的态度。他将这次会谈称为“危机的顶点”。当时,有关美国计划轰炸古巴导弹基地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报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苏联情报机构得到消息说,轰炸行动据说定在了10月29日和30日,即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在莫斯科和华盛顿,紧张气氛不断加剧。我发出汇报我同罗伯特·肯尼迪会谈的电报不久即得到消息说,总统希望最迟在第二天,即10月28日,星期天,得到莫斯科的答复,这就使他们更加紧张不安。

这场冲突已经达到了顶点。正如米高扬后来告诉我的那样,克里姆林宫此时此刻正笼罩在美国可能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的“巨大忧虑”之中,而且在发狂般地寻找着解决危机的办法。星期六晚上,政治局在赫鲁晓夫的别墅召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星期天。赫鲁晓夫收到我的报告后,立即对政治局委员们说:“同志们,现在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体面的方式来摆脱这场对抗。”当时就决定毫不拖延地接受肯尼迪总统的建议,其原因主要在于肯尼迪总统同意逐步从土耳其撤走导弹,由此可以证明我们的撤退是有道理的。

89

10月28日,星期天下午4时,我收到了葛罗米柯发来的紧急电报。电报说:“立即和罗伯特·肯尼迪取得联系,告诉他你已经将你们之间的谈话内容转告给了尼基塔·S·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随此电作出以下紧急答复:‘罗伯特·肯尼迪根据总统指示提出的建议得到了莫斯科的赞赏。对总统10月27日的来电将在今天通过广播电台做出答复,而且答复的内容将是极富建设性的。’对困扰总

统的问题,即在国际监督下拆除古巴导弹基地的问题,没有异议,这一问题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将得到充分说明。”

我必须承认,读完这封电报后,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军事摊牌的可能性解除了,这些天来的剑拔弩张的态势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烟消云散了。显然,这场冲突的关键时刻已安全渡过,我们可以放松一下了。

我随后立即给罗伯特·肯尼迪打了一个电话,我们立即着手安排会谈。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向他转述了赫鲁晓夫的答复。他聚精会神地听完后对我表示了感谢,然后他说他打算直接去白宫,将苏联政府领导人的这个“重要的答复”告诉总统。他不由自主地说,这个消息使人“大为欣慰”。“我终于能去看看孩子们了。噢,我几乎忘了回家的路了。”自危机开始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他笑了。

显而易见,罗伯特·肯尼迪获悉赫鲁晓夫的答复后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十分激动。分手之前,他再次对在土耳其问题上达成的协议要求我严加保密。我回答说,除我之外,使馆里再没有人知道我和他在前一天进行的谈话。

就在这个星期天的晚些时候,根据赫鲁晓夫的直接命令,莫斯科电台用英语播出了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复信;与此同时,复信的正文交给了美国使馆。采取这种非同寻常的措施是为了阻止赫鲁晓夫担心即将进行的对导弹基地的轰炸。这次讲话是对肯尼迪10月27日来电的回答。在赫鲁晓夫冗长的讲话——其目的部分在于为苏联政府在古巴危机中的所作所为进行公开辩护——中所包含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苏联方面接受美国总统提出的解决危机的条件。然而,讲话没有提到土耳其问题。肯尼迪几乎立即做出了反应,赞誉赫鲁晓夫的信是对和平事业的重要贡献。苏联公民对电台广播的赫鲁晓夫的信感到大惑不解,因为整整一个星期里他们根本没有从官方听到过有关我们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消息。

10月29日,星期一,我将赫鲁晓夫致总统的一封秘密信函交给

了罗伯特·肯尼迪。苏联总理说,他知道公开讨论拆除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对总统来说将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因此他同意不进行公开讨论,而是通过罗伯特·肯尼迪和苏联大使继续就此问题进行秘密讨论。信中着重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苏联领导层是在总统同意解决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问题之后才同意接受解决古巴问题的有关条件的。信中表示希望就土耳其问题达成的协议将成为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步骤。

第二天,即10月30日,罗伯特·肯尼迪通知我说,总统肯定了关闭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的协议,我们肯定会就此问题采取适当的措施,与此同时,总统将不会把公开他的决定和围绕古巴问题出现的一些事情联系起来。他说白宫不准备签订协议,即便通过秘密信函的形式也不行,而且美国方面不想就如此敏感的问题互通任何信件。罗伯特·肯尼迪极为秘密地补充说,有朝一日——谁知道是哪一日?——他可能会竞选总统,如果有关土耳其导弹的秘密交易被泄露出去,他的前途可能会受到影响。

我向莫斯科转达了肯尼迪的答复。两天后,我告诉罗伯特·肯尼迪,赫鲁晓夫同意这些想法,并且完全相信总统将会恪守诺言。

在这次与肯尼迪就协议的可靠性进行的对话中,有一个问题令人感到惊讶,这就是在这场危机的关键时刻,总统本人曾经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公开宣布请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出面充当调解人。多年以后,腊斯克透露说,当罗伯特·肯尼迪前去与我进行星期六的会谈后,他本人立即与总统单独进行了谈话。腊斯克建议——总统表示同意——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可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腊斯克将给安德鲁·科尔迪耶——他的一位密友,并且是联合国副秘书长——打电话并交给他一份将由秘书长亲自发表的声明的文本。吴丹的声明将包含一项建议——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美国从土耳其撤走导弹。科尔迪耶只有在收到腊斯克本人发出的特别信号后,才能把声明交给吴丹。然而,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以上计划变得没有必要了,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同意达成一项秘密协议。通过吴

丹进行“基地换基地”的整个想法成为只为总统、腊斯克和科尔迪耶所知的一个被深藏起来的秘密。其详情好多年过后都没有被泄漏出去。

赫鲁晓夫没有坚持要求肯尼迪做出公开保证使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肯尼迪被誉为这场危机中的大胜家是因为没人知道那笔秘密交易。赫鲁晓夫从古巴撤出了我们的导弹而没有取得明显的收获，因而大失脸面。事实上，对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来说，为解决危机而达成的最后条件既不是巨大的失败，也不是重大的胜利。肯尼迪实现了他的主要目的：使古巴局势恢复到以前的状态，虽然他不得不接受在那里驻有苏联军事人员的现实。赫鲁晓夫虽然没有实现使战略平衡态势更有利于我们的目的，但是他不仅得到了华盛顿做出的不侵略古巴——这是他和卡斯特罗一直追求——的保证，还得到了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这也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保证。

危机过后：教训及评注

直到1963年1月7日——在紧张的外交谈判和高级首脑通信联系结束了几乎两个月之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阿德莱·史蒂文森联名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建议从安理会议程中取消古巴问题，因为古巴危机已得到解决。

此后历届美国政府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明，它们愿意遵守1962年的协议。另一方面，美国人又一再向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试图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解释已达成的协议，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试图利用那些协议从未形成文字的事实。由于卡斯特罗当时拒绝让美国人监督从基地撤出苏联的进攻性武器，所以肯尼迪也没有将他做出的不进攻古巴的承诺以书面形式正式确定下来。赫鲁晓夫不得不满足于达成这样的协议，即除非苏

联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武器,否则美国将不得对该国实施攻击。

11月29日,米高扬在访问古巴途中,在华盛顿做了短暂逗留,并与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会谈。他们的谈话持续了大约3个半小时,谈话的全部内容实际上都是古巴问题。尽管讨论的气氛总的看来是比较紧张的,但与会者最后还是以一种和解的态度分手告别。

米高扬向政治局报告说,总统认为古巴正在变成“苏联实现其破坏拉丁美洲局势政策的跳板”。肯尼迪强调指出,他对古巴本身并不怎么在意——“它能给我们造成多大的伤害?”他主要关心的是苏联企图通过改变现有的力量平衡而扩大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他的目的非常明确:美国希望苏联将其行动限制在本国之内及其国内社会建设上,美国也愿意这样做。

总统继续说道:“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极大的矛盾:虽然我们两国没有直接向对方进行挑战,但我们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冲突,由于我们处在一个核时代,因此这种冲突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革命的第一颗火花不论在哪个地方刚一闪现,你们立刻就会出来说,‘我来啦!’我们双方应当避免使地球每一个地方的形势出现恶化。对于赫鲁晓夫和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相互理解。”

米高扬回答说:“我们赞成解决问题,而不是将问题搁置起来。你所说的‘革命火花’指什么?最初我们和古巴没有任何联系。(肯尼迪表示同意。)革命一直存在,今后也将一直存在。革命最终将在美洲国家中取得胜利,而且在这里——美国,革命也将胜利。甚至有一天,你可能发现自己成了卡斯特罗的同路人。卡斯特罗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正领导着古巴走向社会主义。”

总统笑道:“不会是我,但我弟弟真有可能。”

接下来,米高扬和肯尼迪就美国所做的不入侵古巴的保证的措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显然,美国人不想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肯尼迪坚持认为应该由两国政府首脑分别发表声明,列出所有已解决的问题和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不应发表一项联合国的共同声明。但是当米高扬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时,总统断然表示,

美国将不会侵略古巴，并且不会背离它在古巴危机期间所采取的立场。“我已经说过，”总统说，“美国不打算进攻古巴，而且也不允许其他国家这么做。赫鲁晓夫和我是互相理解的，我将履行我做出的承诺。”

除了古巴问题以外，对米高扬来说这次会谈最为重要的是肯尼迪总统表示——这不是第一次——希望维持所谓的全球现状。93 米高扬是一个谨慎的人，在有关这次会谈的报告中，他没有就总统的这一想法做出评论，但是他没有忘记在一年之内总统两次建议签订维持现状的协议。然而，刚刚在古巴问题上由于鲁莽从事而吃了苦头的赫鲁晓夫还不打算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他的脑子里还存在着一个错误的思想观念：他认为在苏联领导下，社会主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而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正在走下坡路。但是他的确没有想到战争。

我不能过分强调古巴危机给苏美关系后来的发展带来的重大影响。在那些日子里出现了两个大国直接进行武装对抗的极大危险，幸亏双方对其灾难性的后果有了及时而且痛苦的认识，这场对抗才在战争的边缘上停了下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使用政治方法解决危机成为可能，而且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直接秘密渠道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即使在许多年过去之后的今天，两国共同达成的政治和外交解决办法仍可以被看作是成功地解决危机的楷模。它表明世界上1/3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古巴危机也造成了一系列极为消极的后果。苏联领导层不可能忘记，当它被迫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从古巴撤出导弹时，它的声望受到了近乎于耻辱的打击。我们的军队利用这一经历为其自身求得了一个新的、大规模的核武器发展计划。这就使美苏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它所造成的影响长达近30年之久，尽管人们也做出了限制军备竞赛的种种尝试。

此外，此次危机也对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影响，并且促使他最终下了台。1964年，当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同意免除赫鲁晓

夫的职务时,很多代表严厉地批评了他个人在制造古巴危机中所起的作用。

但是,双方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了缓和紧张关系的必要性。1963年,莫斯科和华盛顿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在两国首都之间建立一条“热线”,以保证高层领导能够直接迅速地互通信息的协定。除此之外,就另一个充满危机的紧张地区——柏林——所进行的讨论,不论是在1963年还是后来,都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局势。两年前建起的柏林墙以其反常的方式确定了肯尼迪在这一地区寻求的稳定,尽管没有人能够公开承认这一点。古巴也再没有遇到过美国侵略的威胁。

秘密渠道的重要性同样也得到了证实。如果没有进行过这些接触,我不知道古巴危机将如何结束;如果古巴危机的结局很糟,其结果真可能是灾难性的。这次经历也为我今后的外交活动确立了基本准则,在我1/4世纪的大使生涯的剩余时间里,我一直遵循着这一准则。我尽力成为在最高领导层之间不断发挥作用的秘密渠道的参与者,为的是确保两国领导人能够进行坦率的——即使不总是令人愉快的——对话。我不揣冒昧地设想,这条秘密渠道看来有时会成为防止冷战发展成热战的唯一途径。本书叙述的两国关系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94

使秘密渠道发挥作用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条渠道必须能够长期发挥作用,而且它的直接参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外交、政治经验和知识。最为重要的是,这条秘密渠道决不应被某个政府用于传递错误的信息。当然,外交游戏总是要做的,但决不允许蓄意传递错误信息,因为这种情况或迟或早总会被揭露出来,秘密渠道将因此而变得毫无价值。

博利沙科夫——过去常与罗伯特·肯尼迪一起负责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秘密联系——碰巧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古巴危机过后,我们使馆获悉一位与肯尼迪兄弟关系密切的新闻记者查尔斯·巴特利特和一位重要的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正准

备写一篇关于古巴危机的文章。文章将首次披露博利沙科夫和罗伯特·肯尼迪所进行的会谈。博利沙科夫跑去找罗伯特·肯尼迪，要他阻止文章发表，因为这篇文章将会使他的秘密渠道失去作用。不料，肯尼迪对此做出了极为愤怒而且粗暴的反应：“我们认为，在古巴危机中所有的人——包括你——都在欺骗我们。如果你还想继续使用这条渠道，那么从现在起就该轮到你上当受骗了。”文章发表了，博利沙科夫立即被召回国内。临别时他去拜访了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在与“他的朋友”告别时表现得极为虚伪。他对博利沙科夫的离职表示遗憾，并请求博利沙科夫让他知道他在莫斯科“过得怎么样”。博利沙科夫回国后又在国内继续工作了20年，后来退休了。

此外还有一个被美国新闻界深信不疑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一位名叫约翰·斯卡利的电视台记者在解决此次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据说此人十分了解白宫的情况，和我国情报机构驻华盛顿的代表亚历山大·福明(他的真名是费克利索夫)有联系。福明与斯卡利进行接触是因为他把他看成是——不管对不对——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重要特工人员。在古巴危机期间两人举行会谈的那家华盛顿饭店里，颇有魄力的饭店老板甚至挂出了一块招牌，上面写着，这就是那个“地方”。由于福明同时还是使馆的一名参赞，因此他把他与斯卡利之间的联系向我做了简要汇报。我觉得由于我与罗伯特·肯尼迪经常进行直接的对话，他们之间的联系相对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情报机构与肯尼迪总统的心腹之间没有任何重要的、定期的联系，而且驻华盛顿的克格勃机构在古巴危机期间也没有获得过任何重要的情报。福明本人不久就被召回国了。

古巴危机平息之后，罗伯特·肯尼迪曾向我抱怨说，苏联方面不应该撇开他去寻找其他的联系渠道。他说斯卡利是在没有得到白宫方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进行活动的。斯卡利和福明都声称是对方先寻找自己进行接触的。12月14日，肯尼迪总统在写给赫鲁晓

夫的一封信中重申了他弟弟的看法,指出通过新闻记者来建立秘密联系是一种冒险行动,因为双方谁都不知道可能会有什么情报被突然公之于众。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这一切后面隐藏着的原因正是双方的情报机构在古巴危机期间一直在寻找彼此间的接触。不管怎样,福明—斯卡利事件到此就算结束了,而且类似的事情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很多年以后,当他们在一次由古巴危机参与者参加的讨论会上偶然相见时,他们的关系甚至说不上友好,两人对他们在危机期间举行的会谈也描述得各不相同。

在1962年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外交使团招待会上,我和总统聊起了古巴危机,他表示对整个危机正在平息下去感到满意。他把卢埃林·汤普森叫过来,指着他说道:“现在我有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办事谨慎而且经验丰富的苏联问题顾问。”

我说,既然有这么能干的顾问,那就应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第六章

学会共同生存

建立“热线”

古巴危机过后，我们同肯尼迪政府的关系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现实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的是联系、讨论、谈判以及在这两个已开始被看成世界超级大国之间出现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不断进行的调整。古巴问题仍然很敏感，卡斯特罗政府在拉丁美洲以及后来在非洲进行的冒险行动更是如此。但是，尽管美国公众几乎一致希望除掉卡斯特罗，美国政府却不愿意为此而冒同苏联打仗的风险。此外公众中还出现了核战争的恐惧，这是我在古巴危机前所未曾看过的。

显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对双方的通讯系统进行检查并使之现代化，其目的是为了能够及时地消除下一次对抗。这种现代化的通讯方式被称为“热线”——苏联和美国政府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直接联系的一条渠道。

现在的人几乎想象不出，在古巴危机那段恐怖的日子里，我们使馆与莫斯科的通讯联系手段是多么的原始。每当我想给莫斯科拍发急电，汇报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重要谈话时，首先要把电报译成密码（开始用手工，后来才用机器）。然后我们给西部联合电报公司打电话。电报公司便会派一位信使来取电报。来取电报的一直是同一名年轻黑人，他骑一辆自行车来到使馆。然而，等他带着我

的紧急电报蹬着自行车离开后,我们使馆的人只能祈祷,盼望他能毫不耽搁地把电报送到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办公室,千万别在半路上停下来和某个姑娘聊天!

这种原始的通讯手段就是赫鲁晓夫在那个关键的日子——10月28日,星期天——为什么要采取极不寻常的方式将他的紧急答复送交给肯尼迪总统的原因。由于克里姆林宫知道最后期限已到,古巴危机结局如何将有赖于他的答复,因此,赫鲁晓夫不仅用密码电报给我发来了他的紧急答复,并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送去电报的副本,而且指示莫斯科电台立即用英语全文广播他的答复。赫鲁晓夫的助手率领的车队一路鸣着警笛,速度飞快地从赫鲁晓夫的别墅驶向广播电台,电台立即广播了给肯尼迪总统的信。我本人也是从广播中——而不是从两小时后经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转到使馆的电报中——得知赫鲁晓夫答复的全文的。

97

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也以我们和莫斯科联系的同样方式,即通过商业电报和华盛顿进行联系。长期以来,双方使馆一直被禁止安装无线电通讯所必需的巨型屋顶天线,因为双方情报机构都担心对方可能会利用这些电线在本国首都窃听政府及其他机构内部的无线电谈话。正如多年以后我们了解到的那样,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之所以坚决拒绝搬到另一处更为宽敞、风景更加秀丽的地方(苏联当局曾建议相互提供建立较大的现代化使馆楼的地址),原因之一即是旧使馆楼坐落在加里宁斯基大街——莫斯科主要的公路——附近,我们的头头们从他们的别墅出来,正是沿着这条公路坐汽车上班的。在他们的汽车后部安装了无线电话——但没带扰频器,赫鲁晓夫,特别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主席,在他们上班路上经常和他们的同事们谈话,讨论公务或闲聊。由于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就坐落在他们上班路线的附近,因此他们不用大型屋顶天线——它可能泄露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就能窃听并录下这种无线电通讯。在华盛顿,由于我们的使馆离白宫只有6个街区,所以我们的情报机构也曾尽力想从附近空域查寻能测听到的一切无线电通话,但

美国人在技术领域显然把我们甩在了后边,因为美国政府的无线电电话绝大部分都是加密的。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注意到了在古巴危机的紧要关头突然暴露出来的通讯问题,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尽快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6月20日,在日内瓦签署了一份建立“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通讯热线备忘录。

98 备忘录规定在两国首都之间设置一条经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伦敦传递紧急电报的全天候电报线路。与此同时还安装了一条从莫斯科经丹吉尔到华盛顿的全天候无线电通讯线路,这条线路被用于补充通讯联络以及在两个终端站之间进行协调联系。后来,由于一位芬兰农民在种地时无意中砍断了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电话线——这件事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极大不安——所以又铺设了第二条电话线。最后,莫斯科和华盛顿安装了一条由卫星传送信号的无线电话线。

老问题重新出现

然而,老问题——德国和柏林问题、寻求缔结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以及我们长期争论的其他一些问题——又重新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3月12日,即古巴危机过去大约6个月后,罗伯特·肯尼迪和我私下共进了一次时间很长的午餐,其时回顾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在谈话中提到了一个十分令人感兴趣的历史插曲:约翰·肯尼迪刚一当上总统就建议他的弟弟罗伯特学习俄语,因为他想任命他驻莫斯科大使。这个冒险计划后来被放弃了,尽管罗伯特·肯尼迪并没有说明其原因何在。

罗伯特·肯尼迪说,总统衷心希望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子孙后代”。他认为缔结这样一个条约将有助于使国际形势正常化。他还提出是否可以再次举行最高级会谈,以讨论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留在古巴的苏联军

队等问题。两国领导人可以讨论其他的、更为复杂的国际问题，例如德国及柏林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最高级会谈解决，而不能通过一般外交方式解决。

当我汇报了我们的会谈之后，莫斯科问我肯尼迪兄弟对举行最高级会谈到底有多大的诚意。我回答说，他们确实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但在我看来，总统考虑这件事的着眼点首先是在国内问题上。如果最高级会谈最终获得成功，哪怕只是被描述成开得很成功的样子，那它肯定能使肯尼迪在1964年的大选中获胜。与此同时，我还告诉莫斯科，罗伯特·肯尼迪在谈到德国及柏林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要在最高级会谈中或在其他任何场合做出妥协的意思，因此我向莫斯科建议我们应该等待腊斯克或汤普森这样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做进一步的澄清。

但是，赫鲁晓夫仍然顽固地试图在德国及柏林问题上自行其事，尽管他为摆脱古巴危机已使自身地位受到了削弱。虽然我认为由于赫鲁晓夫的过分要求，讨论举行最高级会谈之事很可能失败，但我仍得到着手进行长时间的并且是复杂的讨论的命令。不过，外交对话本身还是可以为消除对立情绪提供机会的。

99

3月26日，这场讨论以与腊斯克进行的一次深入交谈而拉开了帷幕。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我向他阐明了我们的立场，这一立场是以赫鲁晓夫提出的那个众所周知的建议作为基础的。听过我的阐述之后，腊斯克指出，虽然许多人认为讨论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有多大的意义，但肯尼迪总统仍准备继续寻找一种解决办法，至少也要找到消除这一问题所带来的危险的方式。

接着，腊斯克开始详细询问我们的观点，并向我再次保证在德国问题上缓和紧张关系是真的。最后他直接了当地问我：难道我们不认为“时间将会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危险将会渐渐地自行消失吗？确实，这就是美国人解决德国及柏林问题的基本思想——它打算保持现状，等待时机，看下一步该做些什么。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明确指示，我该如何回答他呢？

腊斯克和我就这样又开始了新一轮马拉松式的会谈。这些会谈很快变成了异常乏味而又不断重复的仪式，腊斯克因此开玩笑地把我们的问话和答话编上了号码。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的关系变得比较密切了。尽管我国政府不愿让外国人观看苏联发射宇宙飞船的情况，但我却应邀在卡纳维拉尔角观看了一次激动人心的发射实况。经肯尼迪总统特批，我还到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工程师们正在这里研究登月技术——参观了严格保密的设备。我被允许坐到了登月车的座舱模型里。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工程师，美国的技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向莫斯科也是这样汇报的。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

苏美关系在 1963 年期间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就禁止核试验问题展开了谈判。肯尼迪之所以寻求达成一项彻底禁止核试验的协议，部分原因在于他比他的前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核扩散的危险。在核大国之间缔结一项禁止核试验的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阻止核武器扩散到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去。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大气中进行核试验而造成的放射性尘埃的危害，两国舆论界对此正进行着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尽管相比之下，苏联舆论界批评的激烈程度要弱一些——苏联的核试验是在更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100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也开始考虑停止核试验的可行性和实际利益。在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危机以及在危机期间发生的所有过分行行为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了两个核大国的存在。两国之间缔结一项停止核试验的条约，在某种意义上将再次肯定苏联拥有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此外，苏联的一些科学家和军事领导人认为，进一步的核试验只能有利于美国提高其核武器的质量，而不能帮助苏联赶上去。

但是,缔结条约的关键性障碍仍然是为确保双方停止核试验而进行监督的问题。赫鲁晓夫对此有很大的疑虑,而且他深受其顾问们的影响。他们没有能够从下述条件中做出选择:利用国家手段实行监督,这意味着自行监督;有限地利用两国境内的自动观测站(即所谓的黑匣子);或者由那些被允许以观察员身份巡视缔约国领土的外国专家进行监督。此外,还存在着一个技术性问题。尽管可以利用科学手段,从落在其他国家的放射性尘埃中探测出在陆地、海洋或外层空间进行的核试验,但记录地下核试验的信号可能和记录地震的地震数据混淆起来。如果想弄清楚是否违反了协议,有时必须派一名专家前去检查地震仪所记录的震动发生地点,以确定已经发生的究竟是地震还是核爆炸。问题的要害正是现场检查。在赫鲁晓夫看来,是否允许检查人员进入我国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

古巴危机刚一过去,赫鲁晓夫便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他以一种和解的态度,通过秘密渠道——现在完全由罗伯特·肯尼迪和我操纵——通知肯尼迪总统,苏联政府将第一次同意每年可以在每个核大国境内进行2至3次检查。

遗憾的是,肯尼迪政府非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反而就增加检查次数问题展开了漫无休止的争论。美国方面没有意识到首次决定允许即便是为数很少的几名外国观察员进入苏联境内使莫斯科承受了多大的心理负担,而且是多么富有创新精神(很多政治局委员根本就不同意这样做)。

于是,总统回答赫鲁晓夫说,他对苏联同意现场检查表示欢迎,但他指出美国希望每年的检查次数不是2至3次,而是8至10次,对此赫鲁晓夫以次数过多为由予以拒绝。

3月份我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及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如J. 罗伯特·奥本海默、利奥·西拉德和总统的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进行了数次开诚布公的谈话。麦克纳马拉对我说,美国的核物理学家们已告诉总统,他们预计在最近一段时期内不会制造出

任何名副其实的新型核武器,所以从军事和技术的角度看,继续进行核试验竞赛显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从政治角度看,麦克纳马拉继续说道,国会和公众仍然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就此问题进行的激烈的争论造成的——继续进行核试验将使美国保持在核武器方面不可取代的领先地位。十分荒谬的是,他说,政府自己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因古巴危机而加深的对核战争的恐惧反而支持加强核军备和继续进行核试验,尽管存在着对放射性尘埃的担心。这一切正在被共和党人以及像爱德华·泰勒这样的支持共和党人的科学家巧妙地加以利用。

奥本海默和西拉德曾先后对我说过,他们对这种情绪感到忧虑。他们敦促我们为达成协议而寻找一种合理的妥协办法,并且强调指出,如果我们打算阻止为研制更为复杂、更为可怕的核武器而进行的一场核竞赛,那么“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威斯纳暗示5至6次检查次数是可能得到美国同意的数字。

4月初,汤普森私下告诉我,他为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关系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并且说他正考虑提出建议,让总统派他的亲密助手——可能是腊斯克、罗伯特·肯尼迪或无任所大使 W.埃夫里尔·哈里曼——去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晤。我喜欢这个主意,并且告诉他我准备对它表示支持。在我看来出访莫斯科的最佳人选是腊斯克。

汤普森说,对于总统来说,选举成败的关键在于他能否解决几个具体问题,那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人认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其中最有希望做成的一件事,接下来就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于8月或9月举行会谈,届时他们将互换批准书,讨论国际局势,或许还将签署诸如民航协议之类的双边条约。此外还可以讨论德国和裁军问题,以便为双方的谈判人员指明方向。肯尼迪在4月11日致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大体采纳了上述意见。

几天之后,腊斯克交给我一份将由四个核大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签署的联合声明的草案,声明保证既不直接也不间接地

通过军事联盟向任何无核国家转让核武器，同时还保证它们将不会帮助无核国家生产核装备。4月29日，我向肯尼迪转达了一个口信——赫鲁晓夫准备接见总统的特别代表，以便非正式地交换意见。

但是，通往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道路并不平坦。大约在同一时候，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见了美国和英国的大使，两位大使带来了肯尼迪总统和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内容完全一致的口信，敦促他同意将检查次数增加到3至7次。

“这么说你们是想让我们单方面地向外国情报机构开放我国所有的地区了？”赫鲁晓夫答复道，“即便苏联政府同意每年进行2至3次检查，西方大国仍然会想方设法地把差不多半个国家都纳入受检查的范围之内。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对自己同意在苏联境内进行2至3次检查已深感不快。现在我认为我们应该收回这一建议。为了进行完全必要的监督，建立2到3个自动地震监测站就足够了。都是由于你们我才愚弄了自己，因为我们刚一提出建议就得到了要求同意每年进行8至10次检查的回答，现在又说是一年进行7次，对此苏联是不会接受的。我们将不会对肯尼迪再做出任何让步，但可以向（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其他‘鹰派人士’做出让步。”

（曾经领导过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格伦·西博格是美国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他后来曾不无遗憾地告诉我，说服肯尼迪为进行更多的检查而讨价还价的正是他；每年进行8至10次检查是他首先提出的。他曾经确信双方将会取中，在每年检查5次或7次这个范围内达成某些妥协。西博格对我说，如果他当时知道赫鲁晓夫甚至可能收回每年进行2至3次检查的建议的话，他肯定会劝说总统接受赫鲁晓夫的建议。）

不过，互派私人代表的计划仍在进行，而且总统决定派腊斯克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这个选择也得到了汤普森的赞同——虽然他7月28日才能到。与此同时，关于禁止核试验条约的

谈判将在莫斯科重新开始，总统挑选哈里曼出任他的代表。哈里曼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莫斯科和赫鲁晓夫本人都十分尊重他。

103 哈里曼是一位可以信赖的谈判者，他能够直接接触上层人物——在如此复杂的谈判中这往往是一个有利条件。在谈判的最后一天，由于葛罗米柯在一个特殊问题上坚持他的立场，所以哈里曼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场争论实际上并不涉及原则问题，美国可以满足苏联方面的愿望。接着他要求立即接通肯尼迪总统的电话。谈判是在阿历克谢·托尔斯泰大街外交部的一所房子内举行的。哈里曼的要求在那里引起了一场骚动，因为此前还没有从莫斯科直接往华盛顿打电话的先例。然而，一个半小时之后，他们接通了总统的电话。仍然坐在谈判桌前的哈里曼解释了一下情况之后便请求总统同意他提出的解决方案。肯尼迪问了两个问题，随后便同意了他的建议。美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速度给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肯尼迪总统非常尊重哈里曼，而哈里曼也像父亲一样关心着肯尼迪，并且总是给予他有力的支持。他与我们打交道的长期经历可以追溯到战争时代，那时他是罗斯福的驻莫斯科大使。他以此资历在我国赢得了极大的尊重和喜爱，后来的领导人也同样尊重和喜爱他，直到他寿终正寝为止。他享有这种尊重是当之无愧的：尽管他是一个真正的公民和爱国主义者，但他却在尽力寻找能够使我们两国团结起来的共同点，而不是把两国隔离开来。然而这从未阻止他坦诚地表达他的不同意见。这种做法反而使他更加受到苏联领导人和肯尼迪总统的爱戴。因为他总是坚定地捍卫自己的信念，所以总统和朋友、亲密的助手们在一起时，总是开玩笑地称哈里曼是“鳄鱼”。总统曾经送给他一个刻有鳄鱼字样的小青铜鳄鱼，哈里曼为此深感骄傲。

我妻子和我是哈里曼家的常客。他家住在乔治城，此地以华盛顿政界要人，比如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外交官、新闻记者以及知名人士和政治家，在首都聚会的一个永久性地点而闻名。在夫人去世

之后,他又和温斯顿·丘吉尔儿子的遗孀帕梅拉结了婚。帕梅拉是一个聪明、充满活力而且十分迷人的女性,她不仅很快加入了美国国籍,而且成为民主党最积极的捐助人。我们十分珍惜与哈里曼夫妇的友谊。

在莫斯科领导谈判的是葛罗米柯、哈里曼和英国保守派政治家黑尔什姆爵士。这场谈判持续了大约两个星期,最终达成了一项在三个范围——大气层、陆地、海洋——内部分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但地下核试验除外,因为在无法进行现场检查的情况下,只有这种试验是难以监控的。该协议于8月5日在莫斯科签署。

7月15日,赫鲁晓夫与哈里曼和黑尔什姆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谈。赫鲁晓夫在会谈中以其特有的粗鲁风格阐述了苏联的观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检查这一问题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104

“苏联将不会同意进行检查,即便是建议只进行2次或3次检查也不行,”他说,“我们准备同意停止一切核试验,但只能使用‘黑匣子’这种手段进行监督,但不能进行实地检查。我们将不会同意以任何形式进行检查,哪怕是一次也不行。至于在那些不需要进行检查便可核实的范围内搞的核试验,我们可以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关于间谍活动,看来我们对其含义有着不同的概念。我们很难认同西方国家在此方面的观点。当猫承诺它将只抓老鼠而不碰猪油时,很可能它的确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但毫无疑问,在没人看着时它也会偷猪油。”

由于现场检查问题没有解决而未能就禁止地下核试验达成协议,因此核大国丧失了一个至今仍未重新得到的重要机会,这也是在漫长的苏美关系史中所丧失的众多机会中的一个。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议对限制军备竞赛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多弹头——也叫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和核弹头巡航导弹也许不会出现,因为它们的新弹头不可能得到试验。回过头来看,这一失败表现出那个时期我们的部分领导人的极度轻率,他们不准备搞得如此开放。

现在，根据不同的条约每年都要在外国领土上进行数百次的检查。

8月5日，《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这是放慢军备竞赛速度并且使世界免受放射性尘埃危害的第一个具体步骤。腊斯克参加了签字仪式，然后前往高加索地区黑海岸边上的比祖达——赫鲁晓夫正在此地度假。他们进行了愉快的谈话，然而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突破——没有人指望在刚刚签定了禁止核试验条约后便出现什么新突破，但是当腊斯克提出举行最高级会谈时，赫鲁晓夫对此建议表示支持，同时又说对此次会谈应进行充分的准备。

在比祖达举行的会晤显然是非正式的。使摄影师喜出望外的是他们甚至在一起打了羽毛球。我妻子伊琳娜——一个家庭摄影迷——脱掉鞋子站在谈判桌上为比赛拍照。赫鲁晓夫笑着说她肯定吸收了美国人的冒险精神。

我与约翰·F·肯尼迪最后的会谈

8月中旬，赫鲁晓夫委派我同肯尼迪总统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一次详细的讨论。他在一封由我转交给总统的特别信件中说明了对我的委派。8月26日，我和肯尼迪在白宫进行了单独会谈；这将是我同他进行的最后一次会谈。会谈一开始他即询问了赫鲁晓夫的健康情况，但是还未等我做出回答，他便又笑着说，从腊斯克对他和赫鲁晓夫的羽毛球比赛所做的生动描述看，我的提问显然是多余的了。

肯尼迪表示他对在莫斯科签定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很满意，但是当我们谈到参议院为审批这一协议而召开的听证会时，他便有些黯然神伤。“对(爱德华·)泰勒或戈德华特参议员这样的人我又能怎么样呢？”肯尼迪说，“他们和戴高乐一样不讲道理，满嘴的奇谈怪论。然而我想指出的是，政府和我本人都盼望能成功地签定这

项协议,我将尽一切努力这样做。你可以让莫斯科放心。”

我转交了赫鲁晓夫的信。他在信中阐述了巩固两国关系的必要性。总统同意条约一经批准之后,首先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应该就防止突然袭击的措施、发表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试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声明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交换意见。

根据得到的指示,我再次提出了以和平手段解决德国问题的想法。我说道,在我们看来,虽然自修筑柏林墙和在东西德国之间划定边界以来的两年时间里局势有所缓和,但是,苏联政府认为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仍然成问题。我说,实际上每个人都认为现有的边界不能通过战争来改变,总统对此点头表示同意。既然如此,最好是大家协调一致并且从法律上承认这一边界,因为世界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人们可能会失去耐心和希望。我提醒肯尼迪,他本人曾经私下告诉葛罗米柯他承认现有的德国边界已是既成事实,所以让我们采取下一个步骤,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吧。

肯尼迪肯定了他曾对葛罗米柯说过的话,但是他说美国政府尚不准备同意发表一个正式的声明。它最多可以承诺不使用武力改变边界。肯尼迪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美国的盟国——特别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国——的立场。在与我讨论互不侵犯条约中,总统同样试图把责任推到他的盟友——首先是波恩和戴高乐,特别是戴高乐——身上。他说,法国总统反对签订任何类似的条约,并且很难和他谈到一块儿,因此法美关系仍然是紧张的。

106

肯尼迪主动提出了另外一些问题,看来他显然是想改善与我们的关系。他说他希望扩大两国间的贸易,并且已经指示国务院和商业部立即着手处理此事。他还让我告诉赫鲁晓夫两国在外层空间进行更加积极的合作对双方都有利,这样做可以共同分担我们付出的巨大投资;在适当的时候苏美可以联合进行登月飞行,虽然他是随意提出这个建议的。

接着,肯尼迪总统把谈话转到了古巴问题上,并向我打听驻扎在那里的苏联军事人员的情况。我说我们的军队已经撤出,只有教

练和其他军事专家将留到古巴人掌握了我们的军事设备的使用方法为止。他问赫鲁晓夫将访问古巴是不是真的,我告诉他是真的。总统小心翼翼地说出了一个期望,即当赫鲁晓夫与古巴人会谈时,当他在那里公开发表讲话时,他应该记住这一切在美国都是极其敏感的,特别是他还面临着下一年的再次竞选问题。会谈结束时,总统请我转告赫鲁晓夫及其夫人,感谢他们对他的新生儿子帕特里克的夭折所表示的慰问。随后他提议我们在向新闻界通报这次会谈的情况时应统一口径,应该透露赫鲁晓夫在信中表示的希望禁止核试验条约能够促成更多的协议的意见,肯尼迪强调说他也抱有同样的希望。我对此表示同意,我离开白宫时,实际上就是以这种方式向新闻界简单地介绍了我们的会谈。

显然,美国政府在那一年的秋季一直对苏联实行了一种积极和解的外交政策。汤普森曾试探过我对在国际检查站的监督下逐步撤军的意见,这些检查站不仅应设在苏联和西欧领土上,甚至应设在美国东海沿岸各港口中,以保证不会再次发生入侵古巴的行为。这是一个十分有诱惑力的想法,但由于莫斯科因一贯不喜欢被检查而对此意见置之不理,所以肯尼迪对它也失去了兴趣。与此同时,美国建议签订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核武器的协议,这一建议得到了经联合国大会一致批准的一项苏美决议案的支持。11月15日,罗伯特·肯尼迪根据总统的旨意私下对我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良好的私人关系以及他的兄长与赫鲁晓夫之间的相互理解,并且说如果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能花上两天或三天的时间,“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所有的问题”,那么他们再次举行会谈将是很有益的。

在古巴危机爆发后的那一年里,这是美国首次提出有可能举行最高级会谈。罗伯特·肯尼迪还建议进行互访,并说总统或许在下一年年初将首次访苏。但是这一计划却没有实现。我们的会谈结束一周之后,约翰·肯尼迪就对达拉斯进行了灾难性的访问。

肯尼迪总统遇刺

11月22日，我向莫斯科发出了一封紧急而又悲惨的电报：“收音机刚刚广播肯尼迪总统在得克萨斯州遇刺受伤身亡。约翰逊自然成为美国总统。”

那天发生的事情颇具戏剧性。我一大早就预约了我的牙科医生。当我坐在牙科医生的椅子上时听到旁边一间屋子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放音乐。接着音乐停止了，只听到一个激动的声音反复提到肯尼迪的名字。我听不清收音机里正在说什么，便请医生把音量放大些。他刚一过去便又返回来说——虽然相当冷静——总统被暗杀了。说完之后，他要我再次张开嘴，以便让他继续工作。

不用说在这种时候我根本顾不上看我的牙了。我必须立即返回使馆。令我大为吃惊的是，牙科医生一边说“总统被杀害真是太糟糕了”，一边又说，他不是肯尼迪的支持者，因为总统过分关心黑人的权利，并且“把他们惯坏了”。他说这件事是种族不和造成的。他希望新总统不要过分“玩弄民主”。后来，一家美国报刊了解到这位牙科医生的情况后写道：“美国特工机构将从这个笨蛋的嘴里得到一切。”他们并不知道牙科医生到底说过些什么。

事态发展得极为迅速，并且对我们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影响。11月22日，总统遇刺当天，得克萨斯州警察当局以涉嫌谋杀总统的罪名逮捕了一个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24岁的美国人。据说奥斯瓦尔德是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的一个地方分支机构的主席。收音机还报告说奥斯瓦尔德在此前某个时候曾去过苏联，并且与一位俄罗斯女子结了婚。11月23日，奥斯瓦尔德被正式指控谋杀肯尼迪。

随着反共、反古巴运动在美国愈演愈烈，显然，我们将作为这场阴谋的参与者受到怀疑，即使事实并非如此也罢。忧心忡忡的腊克斯立即与林登·约翰逊讨论可能造成的国际影响。使馆收到了一些恐吓信。关于苏美关系陷入新的危机的谣言开始流传。尽管形

势变得越来越令人恐惧，但我确信苏联与美国发生的这场戏剧性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即使与这件事有着微不足道的牵连都将动摇苏美关系的基础。

我立即召来了使馆的情报首脑。他向我保证他们与奥斯瓦尔德没有任何联系，我与美国当局谈话时可以讲明这一点。（多年以后我在莫斯科得知，当奥斯瓦尔德第一次来苏联并在明斯克住下时，国家安全机构曾对他产生了某种兴趣。然而，因为他平平庸庸而且缺乏教养，他们很快就不再理会他了。在他工作的无线电厂里，他被看作是无用之辈，尽管他声称自己是技术专家。奥斯瓦尔德积极参加工厂射击俱乐部的活动，但是每次比赛他都是最后一名。由于他好争吵而且缺乏才能，所以当他决定回美国时苏联官方并没有正式提出反对意见，我们使馆里后来也没有人与他保持任何联系。）

我把这些情况迅速告诉了莫斯科，特别强调由于奥斯瓦尔德而使苏联意想不到地卷入了这一事件中，美国方面对刺杀肯尼迪事件所进行的戏剧性报道中正是这样说的。我还报告说，根据我们使馆领事部门的报告，奥斯瓦尔德曾在明斯克住过几年，并且在那里与一个名叫玛利亚·普鲁斯科娃的人结了婚。1962年7月，他们一块回到美国。1963年3月——在肯尼迪遇刺仅仅9个月前——奥斯瓦尔德的妻子及其女儿提出了重返苏联的申请，他本人也想陪她们一同回去。由于苏联方面没有人想因为他们而招惹任何麻烦，所以他们的申请没有被批准。领事部门保留了与奥斯瓦尔德的所有通信，而且这些信件的内容无可非议。我向我国政府建议应让美国人了解这些信件的内容，莫斯科很快表示同意。

我们立即把通信的复印件交给了腊斯克，他对我们积极主动的做法表示感谢，并询问是否可以把这些复印件交给以大法官厄尔·沃伦为首的正在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委员会。我告诉腊斯克一切由他本人决定。

国务卿显然没有想到我们会做出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而且

他毫不掩饰他满意的心情。腊斯克显得十分疲惫,两只眼睛由于缺乏睡眠而熬得通红——“一夜睡不到三四个小时,”他说——但是他仍然精神抖擞,情绪乐观,看上去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充满了自信,尽管换了一位总统。他采取了一切能够采取的措施以维护我们在肯尼迪执政时期苦心建立起来的关系。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根据它得到的情报,无论俄国、古巴,还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与这起暗杀事件无关。塞林杰告诉我,腊斯克为了尽可能不使国际局势复杂化而批准了这一声明。

肯尼迪遇刺后的第二天,我同汤普森进行了交谈,发现他的情绪极度低落。他说,肯尼迪去世对我们两国关系,特别是对我们两国领导人之间独特的秘密联系——其价值已被证实——是一个重大打击。汤普森说他不知道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还建议说,为了安全起见,米高扬——他将作为我国代表与众多其他国家的高级代表一起出席肯尼迪葬礼——事后不可在华盛顿逗留。我本人已经以个人的名义向杰奎琳·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及腊斯克发出了唁函。

第二天,11月24日,我与汤普森再次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告诉我尽管约翰逊总统听说过很多有关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私人通信的事情,但他并不知道所有的情况。比如,他不知道在古巴危机期间他们就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问题达成的口头协议。约翰逊曾多次出席总统主持的对外政策会议,并且在某些场合发过言,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保持沉默。

汤普森期望在对外政策领域约翰逊和腊斯克之间的关系能像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一样密切。然而,腊斯克不是杜勒斯,约翰逊也不是艾森豪威尔。约翰逊比艾森豪威尔更为强硬,更为雄心勃勃并且性子更急。他推测约翰逊将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国内政策以及政府和国会的关系上来——他曾经是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我还被告之,约翰逊已明确决定1964年要竞选总统,现在他正在为竞选做准备。汤普森听约翰逊说他或许会考虑挑选罗伯特·肯尼迪

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与他一起参加竞选,但是眼下谈论这些还为时尚早。腊斯克刚刚告诉汤普森,约翰逊指示他要坚持贯彻肯尼迪对外政策的主要路线方针,而且汤普森将仍旧担任腊斯克的苏美关系首席顾问。他个人担心的一件事是,他在担任驻莫斯科大使时曾批准奥斯瓦尔德返回美国,他希望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会被人提出来并给他招来麻烦,事实上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肯尼迪葬礼于11月25日举行。大批极其悲痛美国人前来观看送葬的队伍。很多人在哭泣。灵柩后面跟随着总统的亲友、由总统和总理率领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众多代表团、外交使团成员、内阁和国会成员、知名政治家以及军事人员。米高扬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

那天晚上白宫举行了一个悼念会。平时用作举行节日招待会和官方庆典活动的大厅,此刻十分肃穆而且充满了悲哀的气氛。外国代表团依次向总统的遗孀表示慰问。她很少说话,只是点点头;她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沉着镇静的神态给所有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当米高扬和我走近杰奎琳·肯尼迪并向她转达赫鲁晓夫及其夫人的深切哀悼时,她眼含热泪深情地说:“我丈夫被杀害的那天,他在一清早还未吃早饭之前,在我们下榻的旅馆里突然对我说,应该尽一切努力发展和俄国的关系。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说这些话,但是它们听起来像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我相信赫鲁晓夫总理和我丈夫寻求和平的努力会获得成功,他们俩人都在追求和平。现在,我国政府必须继承这一事业并且把它进行到底。”

我们——米高扬和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对于我来说,肯尼迪夫人叙述她丈夫关于俄国的一席话听起来就像仅仅一个星期前罗伯特·肯尼迪代表总统对我说过的那些话的下文一样。

接着,肯尼迪夫人后来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提到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尊重以及对核战争的担心,并且非常令人感动

地表示她本人坚信约翰逊将会继续她丈夫曾坚定奉行的“控制和抑制”政策。赫鲁晓夫深受感动,并且让所有的政府官员传阅了这封信。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任内悲剧性历史的最后一页。

重新审视肯尼迪时代

肯尼迪遇刺对苏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电视台转播了葬礼情况。报纸上充满了悼念文章。眼含热泪的人群排成长队等候在美国使馆外边,为的是在吊唁簿上签字。那段哀伤的日子在苏联人民中间营造出某些关于肯尼迪的神话,虽然从政治上说,肯尼迪时代在促进苏美关系方面并不是大有作为的。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秘密通信情况;他们之间的秘密渠道是绝对保密的。

111

留在我记忆中的总统正值盛年,看上去非常乐观,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在与他接触的两年中,我亲眼看到作为国家的行政首脑,他的进步有多快。入主白宫仅几个月,他在与我谈论苏美事务时便表现出对主要问题有着深刻的了解,在这一点上他比另外几位美国总统明显强一些。他很熟悉欧洲的情况,并且乐于讨论有关军备控制的复杂问题。然而他对苏联的认识却相当保守。他懂得在谈话过程中如何控制自己的感情。与他弟弟罗伯特不同,他常常在谈话中建立感情,以免出现过分紧张的情况。与此同时,在就各种国际问题进行积极的对话时,他总能巧妙地坚持其立场。

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发生很多重大而且复杂的事件——古巴危机、禁止核试验条约、围绕西柏林问题出现的紧张形势以及就老挝问题达成协议,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两国的关系从核战争边缘到首次达成限制令人诅咒的核武器的协议经历了巨大的起伏。

尽管如此,苏联公众对这位总统却普遍持赞许的态度。在我看来,造成这种自相矛盾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古巴危机以及他遇刺

身亡的个人悲剧。世界濒临战争边缘长达一星期之久,我们两国都处于极为痛苦的紧张状态中。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所以,成功地解决古巴危机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极大的宽慰。它逐渐营造出一种期望和乐观的气氛。这种期望和乐观的气氛可能为获得更多的成就奠定了基础,而肯尼迪总统也成了这种期望和乐观的象征。总统遇刺使这一切突然中止,除了人类怜悯和同情的自然情感之外,它还给两国人民造成了深刻的心灵创伤。人们下意识地认为(特别是在苏联)这位可爱的年轻总统是在努力改善国际形势,尤其是在改善与苏联关系的时候倒下的。

苏联领导层对他的去世持什么看法呢?根据赫鲁晓夫的命令,克格勃准备了一份绝密报告。这份报告的基本结论是,这次暗杀行动是美国的极端保守派和政治恐怖分子策划的一场阴谋造成的,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政策中反动的和富有侵略性的一面。

112 如果肯尼迪还活着——我们这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经常这样想!——我相信两国间的关系确实会得到改善,如果最高级会谈在下一年召开了的话就更是如此。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一样,期待着这次会谈。此外,像肯尼迪一样,他不希望令人痛苦而又带有破坏性的1961年维也纳最高级会谈再度出现。与美国总统进行两次不成功的会谈肯定有损于他自己的政治声誉。他必须表明已取得了某些成就,这样才能得到国内公众舆论的支持。

这就是赫鲁晓夫最终秘密指示葛罗米柯要为同肯尼迪举行新的成功会谈打下基础的原因。葛罗米柯向我下达了同样的指示。对葛罗米柯和赫鲁晓夫来说,肯尼迪遇刺对他们的政策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为他们已经建立起私人关系,而且一方采取的行动已逐渐能够被另一方所预见。换上一位新总统,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

那么,肯尼迪时代的苏美关系是否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人们必须承认,肯尼迪的外交政策保持了其前任们的主要倾向,即与苏联进行全球性对抗。这一方针一直受到保守分子的积极拥护。这些人打下了冷战的基础,并且一直是改善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

然而，世界潮流在逐渐发生着变化。50年代末，美国丧失了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因此，在此形势下与苏联进行严重的军事对抗不仅会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同样也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种危险性，肯尼迪总统才逐步接受了由于两国核力量日益均衡所造成的现实，即人们后来所说的大体上的“恐怖平衡”。

基于这种认识，肯尼迪总统得出了结论：为防止我们两国间的对抗演变成一场核冲突，必须针对苏联采取一些防护性措施。肯尼迪知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在两国有着共同利益的某些特殊领域中与苏联进行合作。在就任总统之前他曾写到，这些领域可能是禁止核试验、控制核武器扩散以及单纯的双边冲突。在冷战高峰时期，这确实不是美国人的惯常看法。

赫鲁晓夫事实上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肯尼迪的主要对手对华盛顿战后第一次承认莫斯科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核大国的确很满意。此外，华盛顿显然要寻找两国利益相同之处，这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思想很相似。

肯尼迪甚至走得更远。他谨慎地提出建议：战略和政治现状不得改变；双方均不得损害对方的根本利益，以免使东西方的力量平衡发生明显的倾斜。肯尼迪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会谈时以及在华盛顿与米高扬会谈时都明确提到了这一点。

113

这个原则本身显然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当代现实政策领域中，它是难以付诸实践的。美国仍在竭力推行一项以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为基础的政策。苏联则竭尽全力做它认为是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事情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推行其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因为它认为未来是属于这些思想观念的。因此，两国间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对抗仍然是显著改善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

同样，将维持现状原则运用到那些双方认为涉及到各自根本利益的地区——尤其是在欧洲——是相当困难的。肯尼迪为了维护位于欧洲心脏的德国的现状，特别是为了在西柏林问题上有所收获而拼命地进行斗争，因为这样做可能使整个欧洲错综复杂的

平衡关系发生变化。30年后,当柏林墙倒塌,平衡被打破,德国重新统一时,事实终于证明了这一点。当肯尼迪同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谈论维持现状的重要性时,他首先想到的常常是柏林和德国。但是,当时的现状已不再符合莫斯科领导人的意愿了,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两个德国,这样就可以使德国的分裂固定下来并使其合法化。

总而言之,维持现状只能是有选择性的。在冷战的环境下,无论是肯尼迪还是赫鲁晓夫都认为很难使苏美关系问题与其他事情割裂开来,或很难使两国外交政策中两个最为重要的而又相互对立的方面——一方面必须消除核战争的威胁并寻求和解,另一方面两国都希望通过除了核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扩大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协调起来。尽管在此后的1/4世纪中,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领导人接了一茬又一茬,但这一矛盾始终是苏美关系的基础。

114 两国的特殊政治形势在这方面起着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苏联方面没有在苏美关系方针问题上产生过特别的争议——莫斯科认为这一方针的主要目标是缓和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但美国却不是这样。古巴危机之后,美国社会政治力量两极分化的情况变得更为明显。在对苏政治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公开分歧更为加剧。在人权和犹太移民问题方面出现了敌对性运动。两国都强调特殊的核战略和一般的军事战略是政治战略的一部分。在古巴遭到的失败使苏联加快了建立核军备的步伐。苏联核军备已经逐渐赶上了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正逐步对我们的盟友——北越人——实行军事对抗政策。

这一切或多或少地一直在削弱我们两国关系的基础,直到8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才趋于稳定,其原因部分在于就控制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达成协议这一问题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苏联的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

以90年代的眼光回过头看肯尼迪时代,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类,特别是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大国的行为,说得婉转些

也是相当缺乏理智和责任感的。两国在军事力量方面耗费了无数资金。1993年初,美国和俄国为了达成一项影响深远的协议,将其军事力量大幅度削减2/3——也就是说,回到大体和肯尼迪—赫鲁晓夫时期相等的水平,不得不克服由于核潜力迅速增长而带来的重重国际危机。如果我们在经历了漫长而且耗资巨大的跋涉之后必须重新回到我们的起点的话,那我们为什么非要坚持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呢?

许多机会被浪费了。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机会,那么即便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我们也可以大大缩短这一旅程。但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情况依然如此,正如我们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将会看到的那样,两国以及它们在克里姆林宫和白宫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心理上以及最高权力上的分歧极大地阻碍了这一进程。虽然决定性因素最终是我国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大约过了1/3世纪之后,两个主要的参与国才认识到了冷战的腐朽性和毁灭性,才认识到结束冷战的紧迫性,并开始为转向相互理解、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而努力。

第七章

开始了解新总统

约翰逊的外交政策

作为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一直被排斥在肯尼迪的核心圈子之外。面对一系列重大事件，他只能做一名旁观者，这种状况令这位生气勃勃的人非常烦恼。由于发生了总统遇刺的灾难性事件，约翰逊的苦恼和忍耐得到了命运的报偿，但结果证明他的命运是不可思议的。作为制定国内政策和在国会玩弄幕后交易的大师，他试图以“伟大的社会”计划和民权立法将全国团结起来。他显然相信激发他做“全体人民的总统”的那种单纯的良好意愿无论如何也会在外交事务中产生同样的魅力。但是在越南，这种单纯的愿望却使约翰逊陷入了泥沼，使他本人处于窘困的境地，并成为他总统任内的悲剧，也成为这个国家的悲剧。

莫斯科和华盛顿最初都希望扩大由肯尼迪开始了的对话，实际上，我们就裁军问题的对话仍在继续，我们还签订了几个双边有限协议。但是约翰逊错误地认为他可以将越南问题与我们有关的其他国际问题——比如军备控制和欧洲安全问题——分隔开来。随着美国军事干预的扩大，他和我们进行的对话几乎变成了呼吁苏联充当越南问题的调停人的绝望请求，但他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双手几乎被我们自己的思想信仰牢牢地束缚住了，就如同他的双手被他对这种思想信仰的极力反对牢牢束缚住一样。苏联领导层

几乎像华盛顿一样对河内的决定和遮遮掩掩的做法感到气恼，虽然美国遭受的损失比苏联大得多。

当约翰逊接任总统职务时，部署在南越的美国军队大约已达1.5万人。在越南这场接力赛中，他已从肯尼迪手上接过了接力棒。但是与肯尼迪——他似乎一直在考虑撤出军队——相比，受竞选、党内好斗的保守分子以及五角大楼推动的约翰逊更深地卷入了这场冲突，并且希望以强硬的立场来解决它。另一方面，莫斯科对北越持同情态度，因为它“正在进行一场解放战争”。除此之外，莫斯科不想对胡志明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以免将他赶到中国人的怀抱里。虽然约翰逊和赫鲁晓夫都试图把越南战争与苏美关系范围分隔开来，但这样做越来越困难了。

116

但是，为什么双方听任各自的保护国将自己纠缠住，而不愿努力组成某种外交阵线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至少摆脱这个问题——并着手处理比这更为重要的裁军问题、欧洲安全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呢？首先，双方以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待围绕越南统一问题而产生的这场争端：它是像苏联方面看待的那样是一场解放战争？还是像美国方面看待的那样是一场侵略战争？统一后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是地缘政治的：华盛顿正试图在东南亚划出一条反对共产主义的界线。

在约翰逊担任总统期间，我反复琢磨是什么原因驱使他非要把越南战争打到最后胜利不可。实际上，当他出乎意料地成为总统时，他并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因对越南做出过承诺而受到束缚。此外，美国军队的军事卷入相对来说是有限的；除了华盛顿和纽约制定公共政策的精英人物之外，这一问题尚未引起美国公众的特别关注。作为一名新总统，约翰逊完全有机会不把这个国家进一步拖入越南的军事行动中。我看他未必会因为退却而受到指责。

然而，出乎许多人的意料，约翰逊迅速并且是自愿地充当了越南保护人这一毫无把握的角色。他一进入白宫便立即对此事做出

了承诺,虽然美国在这个前法国殖民地国家并没有重大的利益。J.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向我吐露,就在举行肯尼迪葬礼的那一天,新总统曾坚定地对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表示,他“不想失去越南”。

约翰逊不像他的前任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那样牢牢地控制着军方,他非常相信他们的能力,并且越来越依赖他们以及他的那些主张用军事手段解决越南问题的密友们的意见。约翰逊开始坚定地,甚至顽固地沿着这条用武力解决问题的道路走下去。

用什么理由才能解释这种行为呢?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他确信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将会在越南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因为他想表明他和他并不很喜欢的肯尼迪一样具有坚强的意志并且像肯尼迪在古巴危机时一样有能力接受和战胜来自越南的挑战?还是因为他容易冲动的性格以及他缺乏洞察越南战争全部后果的能力?

117 答案显然不是单一的。每一个因素肯定都产生了作用。随着战争的拖延,越南战争对他来说逐渐成为个人的事情,成为一种自我考验。谁能获得胜利呢?是约翰逊还是胡志明?是约翰逊还是毛泽东?我的确几次听他说过这样的话。这场战争正在变成他个人的战争。既然已经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他就再不能背离它了。此外,约翰逊容易冲动的性格以及他的执迷不悟进一步推动了在越南进行的这场毫无意义的冒险行动。结果,这一冒险行动使他没有能够连任总统,使国家蒙受了严重的创伤,使苏美关系受到了损害,使裁减军备的机会大大地减少了。

除了越南问题之外,约翰逊最初并不太关心外交事务,而是指示腊斯克——约翰逊让他继续担任国务卿(腊斯克曾向我预言约翰逊可能会这样做)——继续遵循肯尼迪的外交政策方针。实际工作主要由腊斯克来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肯尼迪政府留任的另一位官员麦乔治·邦迪也参与这项工作。国务卿的影响力大大增

强了,在对苏关系方面,他背地里比另外一些总统顾问,甚至比约翰逊本人都更趋于保守。冥顽不灵、政治观点极为保守的腊斯克对越南的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后来,他颇为勇敢地承认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并非总是正确的。

12月,我和邦迪进行了会谈,他表示对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感兴趣,条件是它能够导致达成某种协议,以免会谈失败给约翰逊在下一年的竞选活动带来危害。他还告诫我们不要期待他们撤离越南,因为“这等于是约翰逊的政治自杀”。但是,在我和腊斯克举行会谈时,他从未提到过举行最高级会谈的事,所以,邦迪显然是自作主张进行试探,虽然他这样做得到了约翰逊的事先批准。在莫斯科方面,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对举行最高级会谈颇感兴趣,但葛罗米柯却不是这样,他担心赫鲁晓夫可能会感情用事,因事先没有进行认真的准备而彻底毁掉两国关系。

邦迪在新年之际告诉我,总统在大选之年实在没功夫参加最高级会谈,而且在没有在职副总统的情况下他也不能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后来得知是腊斯克或多或少地鼓动约翰逊不要参加最高级会谈:国务卿认为他尚未做好参加会谈的准备。这个插曲决不是此类事件中的最后一桩,它清楚地表明约翰逊容易感情冲动的天性以及他没有能力预测他的行动最终会得到什么结果。他最初显然很想和赫鲁晓夫会谈,但过了几天他就开始犹豫了,随后他对此事不再感兴趣并且把它无限期地推迟了下去。莫斯科——说得婉转些——则对这一做法大惑不解。这两位领导人从未进行过会谈,这又是一个被错过的机会。

118

我把进一步了解约翰逊的个性当成了我的工作,在他担任总统职务的最初几个月中,我从他的亲密助手那里听到了一些深刻的描述。

阿贝·福塔斯——约翰逊20多年的朋友及私人法律顾问——对他的心理状况做了一些介绍。福塔斯说,约翰逊在50年代曾两次

心脏病发作,因此尽管他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内心深处却十分害怕再次遭受心脏病的打击。这是患过心脏病的人的典型症状,这种病留下了后遗症。约翰逊本能地回避那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决定下来的、复杂的问题以及那些后果难以预料的重大问题;他往往拖着不办这些事情。与此相反,他很乐意做一些能提高他的声望的“比较令人愉快”的事情,或者做一些不需要耗费体力和精力的事情。为了就一个复杂的或者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决定,他需要舒舒服服地进行考虑的时间和机会。如果出现困难的形势,例如发生了国际危机,他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求他在关键时刻做出紧急决定,在这种时候——福斯特说——约翰逊可能会失去控制,做出他以后将会后悔的事来。

约翰逊最亲近的助手杰克·瓦伦蒂(他曾说过他晚上之所以能够平安地睡觉是因为他知道约翰逊当了总统,这句话后来使他出了名)对我说,约翰逊把他能否竞选成功押在解决国内问题上,与此同时,共和党人则把重点放在对外政策方面。这就是总统为什么至少在目前要尽力维持国际现状,在可能的情况下改善一下两国关系,但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恶化国际局势,从而使共和党人受益的行动的原因。

皮埃尔·塞林杰指出,越南和古巴是影响约翰逊当选的最具有潜在危险的对外政策问题。他说,在南越遇到的主要威胁可能会使形势出乎意料地出现逆转,它将迫使约翰逊在竞选活动达到高潮时做出痛苦的政治决策。塞林杰认为美国已被“牢牢地困在了”南越,但是出于竞选的考虑,约翰逊也感到除了遵循目前的方针之外别无选择;他确信撤出越南将会使他输掉这场选举。塞林杰说,约翰逊不喜欢主持大型的,特别是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因为他担心某个他不甚了解的外交政策问题会使他陷入困境。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党人一直向他提出挑战,要求同他进行电视辩论,而他却不急于应战的原因。

不久之后便接替塞林杰担任新闻秘书的乔治·里迪告诉我,

约翰逊阅读了大量的报纸，其注意力集中在国内栏目上。他不喜欢读书。瓦伦蒂白天总要向他报告重大新闻。作为国家安全顾问，邦迪的任务是让总统及时了解外交政策的最新发展情况，但后来总统开始直接和腊斯克——他经常到白宫来同约翰逊共进工作午餐——讨论这些问题。然而，约翰逊总的说来和肯尼迪不同，他认为白宫无须介入联邦政府各部门的基本日常工作。

第一次与约翰逊单独会谈

4月17日，应总统的邀请，我第一次与他在白宫进行了单独会谈。我们在同一间椭圆形办公室——我曾和肯尼迪在此会谈——里进行私下交谈，但办公室的格调已经变了。前任总统所钟爱的海洋纪念品以及他本人的那种高雅情调都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出自美国西部的一些并不高级但色彩浓重的装饰品。

约翰逊非常友好。他请我转达他对赫鲁晓夫70岁寿辰的良好祝愿。总统领我观看了白宫花园和他的爱犬。他告诉我打猎是他的业余爱好，而且他知道苏联总理是一个运动健将：“和他比赛狩猎一定很不错。高尔夫球不适合我，我喜欢骑马和狩猎。”他的强壮身躯使我相信了他的话。

随后，我们回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在这里约翰逊告诉我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想和苏联大使谈谈我们两国的关系。他说，总的来看，他对苏美关系是满意的，然后他问道：“你的看法呢？”

我同意促进国际形势和苏美关系发展的“一些前提条件”确实已经具备，但是，我们需要继续做出努力，尤其是要限制军备竞赛。我说，我猜想目前没能这样做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正忙于选举。

约翰逊立即表示赞同：“噢，是的。目前美国外交政策正是基于这些考虑而决定的。”他说，仅在几天之前，他公开表示欢迎赫鲁晓夫所做的和平声明的时候，芝加哥一家主要报纸指责他尽管费尽心机，结果还是“公开拥抱了一名共产主义分子”。而且这不是唯一

的例子，约翰逊补充道。他还遭到了戈德华特及其盟友的猛烈攻击。白宫的民意测验表明，舆论赞同我们两国之间发展更好的关系，但很多人仍然听戈德华特、理查德·尼克松以及共和党右翼分子的话。这些人反对和苏联签定协议，实际上他们赞成把两国关系搞得更糟一些。他说，他们的影响不可低估。

120 约翰逊总统说，他愿意宣布采取某些行动，即使是微小的行动，以此向美国公众表明他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因此他想向赫鲁晓夫传达这一个新的信息，建议削减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裂变物质的生产。非常凑巧，我已带来赫鲁晓夫类似的提议。赫鲁晓夫建议把另外两个西方核国家法国和英国包括进来，但是约翰逊承认他对“巴黎的那个家伙”（指戴高乐总统）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他请求赫鲁晓夫同意做出双边的承诺，而不必等候其他国家参加进来。一份表明这类意思的联合声明很快被起草出来。

约翰逊还提出与赫鲁晓夫在两国互相进行电视讲话，并且对我们抱怨美国飞机正在侵入苏联边境进行挑衅以便探查苏联防空设施的位置一事做出了答复。他说美国空军已经得到了不得入侵苏联领空的严格命令，并且提出如果美国飞机因“无意过失”在边界上空飞偏了，请我们“不要采取极端措施”。（赫鲁晓夫在5月15日的答复中对他的回答表示满意。）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会谈几乎没有提到过越南问题，尽管约翰逊总统相当健谈，这一点与我认识的其他几位总统确实很不一样。他谈话时经常打手势，而且在谈到最重要的问题时，他习惯把脸靠近与他正在交谈的人的脸，实际上碰到了对方的鼻子。约翰逊直视着他的对话者的眼睛，常常拉着对方外套的翻领使其靠近自己，竭尽全力想说服他。他真正有兴趣谈论的是诸如国内政治及国会——对此类问题，约翰逊很有辩才——这样的一般性问题，对外交问题（显然，他很讨厌这类问题）则不愿多谈。他总是表现得很友好，而且避免进行尖锐的争论，尽力使谈话双方彼此感到满意。

但是，他无疑把他的全部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他的选举上，而

且他是从同一面政治反光镜中观察国际事件的,这就意味着苏美关系的主要问题的解决不得不等待时日。汤普森坦率地对我说事实确实如此。

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想为等待选举结果而耗费整整一年的时间。6月5日,他给约翰逊发出一封内容详尽而又坦率的信件——该信件由我口头转达给汤普森。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相互减少驻扎在欧洲的军队问题、美国进攻古巴的问题、德国问题以及东南亚问题。

“我知道这对我们双方都是一个不愉快的话题,”赫鲁晓夫在他的信中说,“但是每个人都同样需要和平。”他认为必须消除紧张局势,特别是南越和柬埔寨的紧张局势,根据1954年和1962年日内瓦协议而建立的体系,在这一地区正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信中还谈到,德国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两国的武装力量都集中在那里并相互对峙。如果德国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在约翰和伊万之间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对抗了”。赫鲁晓夫继续表示说,他坚信西德决不可能成功地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使资本主义制度100年后仍然存在,他们——复仇主义者——也不可能获取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即占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是现实,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它。”显然,赫鲁晓夫不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

121

但是,赫鲁晓夫仍在步步紧逼。6月10日,他委派我秘密通知约翰逊总统,苏联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决定签署一项名为“友谊、合作及互相援助条约”的协议。我把这一情况转告给腊斯克——他并不打算掩藏他的不满情绪。他只是挖苦说苏联的外交政策——正如他长期以来一直怀疑的一样——显然可以归结成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我的东西是我的,你的东西则要分给我一半。”

但事实上,仅在几个月之后,即10月份,在我和邦迪一边共进晚餐,一边以“以同行的身份”谈论约翰逊政府时,我听到了全然不

同的观点。他十分谨慎地承认，美国政府中对外政策的策划人设想，德国只有成为北大西洋联盟之外的中立国家才能统一，因为他们认识到莫斯科决不会同意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出现统一的德国。他们搞不明白为什么苏联不赞成建立一个中立、统一的德国，因为这样做至少将会使莫斯科在宣传上多得几分。（的确，波兰外交部长亚当·腊帕茨基因提出与此极为相似的建议而使她本人及他的国家名声大噪。）

对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做出回答了，其内容极为简单：赫鲁晓夫绝对不同意德国重新统一，因为他把他的政策全部押在了一个独立的“德国工人国家”之上。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同样也没有认真讨论过德国中立化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但是，德国和欧洲安全当时并不是美国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美国政府将其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了东南亚问题上。在我转达了赫鲁晓夫的紧急口信之后，腊斯克反过来又向我转达了约翰逊关于老挝问题的口信。约翰逊在口信中指出，就老挝问题达成的协议表明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总统个人之间达成的谅解，现在必须迅速、全面地履行有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在各派力量之间分配权力。腊斯克为美国在老挝采取的军事行动进行了辩护，他说美国想向巴特寮共产党人和其邻国的河内政府表示，它们不可能接受这个国家。

所有这些——约翰逊的口信、腊斯克的论证以及在东南亚扩大军事行动——都是枝节问题如何干扰了苏美关系的发展、如何造成了紧张局势、如何拖延了解决真正重要问题的时间的典型例证。

7月12日，在我即将乘飞机回莫斯科渡假前两个小时，邦迪把我请到白宫，向我提供了“某些情报，供你在莫斯科和苏联领导人会谈时使用”。戈德华特显然将成为约翰逊的竞选对手，但是邦迪

想使我们相信，总统不打算放弃要与苏联达成谅解的想法。可是他想让我提醒克里姆林宫，约翰逊在同戈德华特进行辩论时，可能不得不说一些令莫斯科感到不快的话。因此，莫斯科必须认识到约翰逊在竞选达到高潮时所使用的措辞决不说明他的对苏立场发生了变化。此外，邦迪还暗示，如果苏联方面在某个时候对约翰逊也提出批评，约翰逊阵营的人将不会在意，虽然他要求这种批评能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以内”，免得过分尖锐的攻击对我们的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十分清楚这一类反共言论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而且我学会了如何理解它，这样便能够断定什么时候它是认真的，什么时候它仅仅是做个样子。但是，向莫斯科解释这一切有时却比较困难。我向莫斯科讲了邦迪的忠告——这显然是一场竞选活动的组成部分（在美国这是司空见惯的），其目的是保护约翰逊，免得戈德华特从侧面指责他“同情共产主义”。虽然莫斯科的人可能存有疑虑，但他们承认我对美国政治有所了解，所以总是同意我的判断。

一名苏联外交官的生活

回忆起当年我们曾生活在那样严密的控制和孤立状态之中往往令人感到痛苦难忍，那种孤立状态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部分是东道主出于猜疑而强加给我们的。我曾经竭尽全力试图摆脱那种压抑，作为一位大使，我的生活故事如果在讲述我是如何处理重大的政策问题和外交问题——这些是本书的主要内容——的同时，不涉及我是如何处理这一类属于另一层次的问题的话，那它就是不完整的。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我们在华盛顿的使馆小楼过分拥挤。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苏联政府终于决定拨款在美国首都买一块地建造新楼。

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地址就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我们多次遇

到了房地产主和他们的邻居们的反苏歧视,他们大吵大闹地起哄。他们抗议他们将要被迫生活在苏联人周围;他们设想苏联人会将其使馆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使馆周围将站满荷枪实弹的士兵,受过训练的狗会乱咬美国人的孩子——典型的好莱坞式对苏联制度的看法。

有关我们如何野蛮和恐怖的故事在广泛流传。最为恶劣的是说我们使馆里有自己的原子弹,而且这一传闻竟然传到了总统那里。在肯尼迪遇刺30周年时,《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由其60年代驻白宫记者休·赛迪撰写的回忆文章。文章回忆说,肯尼迪曾私下向出席晚餐会的客人透露了一个消息,说我们利用外交邮袋运来的零件装配了一枚核弹。“如果战争爆发,他们就按动电钮摧毁华盛顿,”肯尼迪在1961年与赫鲁晓夫进行了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之后来到佛罗里达渡假时,在棕榈滩举行的一次晚宴上对惊恐万分的客人们这样说。赛迪有比编造这类离奇故事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且他并没有在当时发表它。虽然这个故事肯定是编造的(从来没有人费心向我打听此事),但是,单单是它的存在以及它被人们得意洋洋地到处传播,就表明了我们的苏联外交官在冷战高峰时期生活在多么紧张的氛围之中。

在我们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地皮之后,我们的律师和不动产代理人不得不两次控告那些反对这笔预计可以成交的土地买卖的人。我们在地方法院的判决中获胜,但是邻里协会又继续上诉并成功地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决。有些争执的确令人十分好笑。一位在弗农山国家公园(乔治·华盛顿故居所在地)旁边拥有一块地产的人同意把他在波托马克河附近的一块地卖给我们。这位地产主没有好争吵的邻居,而且他本人对苏联也没有敌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艘驱逐舰上担任舰长,负责为满载重要作战物资驶向摩尔曼斯克的船队护航。多年来他一直想把这块土地出售给国家公园管理局,但该局却以资金困难为借口拖拖拉拉不愿协商此事。当这位地产主刚一通知公园管理机构,说他将要把这块地卖给

苏联使馆时，公园购买这块土地的资金像变魔术般地立即筹集到了，于是我们又一次空手而归。

此后，我们试图在麦克莱恩附近，也就是远至波托马克河弗吉尼亚一边的郊区寻找一块合适的地皮。这回出来干预的是中央情报局，它声称这一地点离它的总部太近了。

公正地说，美国政府——无论是肯尼迪政府还是约翰逊政府——都试图帮助我们。当我们的案件交到上诉法院审理时，国务卿给法院写了一封信，为我们进行了辩护。哎呀，那封信同样没有帮上忙。

124

我们准备向更高一级的法院提起诉讼，但腊斯克建议我们不要这样做，他说，此案已经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而且新闻媒介已把此事渲染成了一桩丑闻。后来美国政府允诺在联邦的地产中找一块地皮。但是，很长时间过去了，最后直到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才在威斯康星大街上给了我们一个建馆地点，旧联邦阿尔托山医院就坐落在那里。苏联政府随后在莫斯科拨了一块地，供建造新的美国使馆之用。新的使馆大楼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按时建成，但是，由于在建筑过程中双方使馆楼都被秘密安置了麦克风和发报机而引起了丑闻，在问题首次被提出后的很长时间内，两座新使馆都没有被使用。

我们的监听设备在莫斯科美国使馆楼的建筑结构中被发现后，美国国会便立即严令禁止使用那里的新馆设施，并且阻拦继续建造华盛顿的苏联新使馆。两座使馆都被关闭，（而且还展开了一场要求苏联对莫斯科的美国使馆建筑——美国说它根本不能安全使用——提供赔偿的激烈争论。）

我离开华盛顿之后，曾于1991年12月在莫斯科与罗伯特·斯特劳斯——他是我在华盛顿的老相识，当时正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共进午餐。他神秘莫测地微笑着，要我猜一猜当天早些时候他刚拜访了哪位苏联领导人。我想了片刻后说猜不出来。他一本正经地说：“我拜会了巴卡京，克格勃的头儿。”我有些吃惊，便

问他们谈了些什么。

“你永远也猜不出来。”他回答道。他说克格勃允诺要提供有关苏联在新的美国使馆大楼里安装的窃听设备的设计和位置的全部情况,显然,这是苏联公开化新政策的组成部分。他说华盛顿对此感到相当惊讶,“但无论如何这种做法也是受欢迎的”。

“那么,对这一恩惠的回报是什么呢?”我问大使,同时也间接提到了我们在华盛顿的新使馆里也有美国人装的窃听仪器。他对此付之一笑,并说美国人暂时还不准备实行开放政策。事实上,这个问题没过几年便得到了解决。当我于1994年为写作本书做准备而访问华盛顿时,我终于能够住进坐落在乔治城正北、威斯康星大街阿尔托山的新使馆大楼——从我最初开始寻找建设新馆地址起已经过去了30多年。

125

相对于我们与美国极为紧张的关系而言,我国一些世界著名的音乐家、芭蕾舞团及歌剧团的访美活动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例外。他们中间有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里克特、芭蕾舞主要女演员玛亚·普利谢茨娃和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洛波维奇及他的妻子、女高音歌唱家加林那·维什涅夫斯卡娅;有莫斯科大芭蕾舞团、列宁格勒歌剧暨芭蕾舞团、莫伊谢耶夫舞蹈团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团体。它们无一例外地获得了巨大的、同时也是理应获得的成功。这里面也有来自革命前俄国的一位美国经纪人索尔·赫罗克的一份相当大的功劳。

我仍然记得里克特的来访,不过不是从艺术观点的角度(虽然他的演出夸不胜夸),而是联想到当时我国艺术家们出国旅行、访问活动中一直存在的羞辱性的习惯做法。在所有这些出访旅行中,特工人员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乔装打扮跟踪着他们。这些人的任务就是暗中监视这些艺术家,观察他们的交往,制止他们定居国外的企图,顺便提一下,这种监视活动根本没能阻止住那些真想外逃的人。

绝大多数演员是爱国的，因此这种监视是对他们的污辱。里克特极为敏感，并且受到高等教育，他也是那些特别不能容忍这种监视行为的艺术家中的一个。他被一名“政府官员”伴随着，此人探听里克特的一切事务，甚至打探他的私生活。（里克特的母亲住在西德，他常常给她打电话。）

我妻子和我觉察到我们十分熟悉的这位艺术家几乎快要神经崩溃了。因此我向莫斯科发出一份紧急电报，坚持认为他的“同伴”必须回国，里克特应该单独留下。莫斯科的那些人看来理解了这种情况，所以把监视里克特的那名特工召回去了。当我告诉他可以在他想去的美国任何地方继续举行音乐会并且没有任何“陪同”时，他那种如释重负的表情令人大为感动。过了些时候，我妻子和我与里克特同乘一架英国班机回国。当飞机飞到大西洋中部时，我妻子收到了他订购的——大束玫瑰花，以此感谢我们的殷勤款待以及帮助他摆脱了官方的监护。

但是，所有苏联公民出国——不论是短期旅行还是被长期派驻使馆或贸易代表团工作——都要受到众多权力机关的全面检查。最终的决定是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专门部门作出的。每个出国的个人都被叫到这个部门，以便审查他或她的公开立场和私生活以及他们对“苏联公民在国外行为规则”的理解情况。这些规则是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它们以书面指示的形式出现，因此每一个出国人员都必须耐着性子读完对该规则的解释，并在一份说明他已阅读并理解了这些规则的声明上签字。

126

大部分规则列举禁止或不赞成苏联公民在外国做的事情。它们被想象为能够防止我们在大街上、商店里、影剧院中，在参加招待会以及其他我们可能被邀请出席的场合“被外国情报机构煽动或吸收为成员”。实际上，列举出允许做的事项比列举出所有的守则或许更容易些。违反规则便意味着或者立即被遣送回国，或者再也得不到出国许可。

这些规则有时会造成极为荒唐的事情。一位新任命的大使的夫人应召就这些守则问题进行例行谈话。她曾跟随她的丈夫多次

出国。当指导员向她宣读了所有的规则并要求她在表示她已理解如何去做的声明上签字时，这位女士非常气愤，并问他是否出过国。得知他不曾出过国后，这位女士拒绝接受审查，并且坚持说她不想听只是从书面指示中了解生活的官僚主义者讲话。这件事传到了上级部门。这位女士被告诫“在中央委员会总部要自我克制一些”，而那位指导员则被告之他对召来一位大使的配偶进行审查有点“过分热情”了。幸运的是，我知道她丈夫的前程没有受到影响，因为这位女士就是我妻子。

有一个令人十分好笑的事件牵扯到这个特殊部门的头头出访巴黎的事。这位名叫巴兰尼科夫的高级官员跟随某个代表团到巴黎旅行。当他抵达巴黎后，他向大使^①吐露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去看一看“疯狂的牧羊女”这间夜总会。但是，那些臭名昭著的规则是严禁光顾这种地方的。大使偷偷地建议巴兰尼科夫隐姓埋名地去看看“疯狂的牧羊女”里面著名的歌女，并派他的助手——此人十分熟悉巴黎——给他做导游。这名助手费尽心机买了前排的票。在演出中，一位舞女从舞台上走下来，走近这位部门领导，邀请他与她共舞。她拉住了他的手，而巴兰尼科夫完全被震惊了，他把手猛地抽了回来。舞女耸了耸肩离他而去。这件事似乎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大使和他的那位担任要职的客人对此都非常满意。

过了两个星期，莫斯科外交部法国司收到了一个定期从巴黎寄来的报纸邮包。法国司的外交官们从其中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一张那位中央委员会部门领导和酒吧舞女在一起的照片。他的名字没有被提到，文中只把他说成是某个“行为怪异的外国人”。

127 外交部官员最初认为这是一起挑衅行为，发表这张集成照片是为了诋毁一位重要的共产党员的名誉。他们甚至打算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驻巴黎的大使不得不介入此事并向部长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此事被压了下来，从未向最高层汇报。但是，这位“行为规则”专家着实让外交官们大大开了一心。

① 指苏联驻法国大使。——译注

第八章

莫斯科和越南

莫斯科宫廷政变

1964年10月，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阴谋活动获得成功，尼基塔·赫鲁晓夫被强行解除了职务。这是一次真正的宫廷革命。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是在赫鲁晓夫被从休假地召回，并被迫在一次主席团会议——后来被称为政治局——上宣布辞职后才召开的。召开中央全会仅仅是为了批准该项决定并为它披上合法的外衣。

在那个时候，赫鲁晓夫已经丧失了威信；他所做出的许多决定已经被证明是肤浅的，他制定的政策产生了微不足道的结果。尽管他揭露、批判并试图克服斯大林主义，但是他不打算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赫鲁晓夫无法想象除了建立在共产党统治基础上的制度之外，还有其他任何制度能够在他的国家存在。他也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

发动这场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以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他们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支持。他们既不是因为拥有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团结起来的，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相反，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出于个人利益——首先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想获得并保住权力，或者是出于害怕丧失他们的高级职位。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根本没有

建议做任何改变。新的领导人为了巩固他们在国际上的地位,毫不迟缓地采取了行动。我接到了一项紧急指示,要求我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会谈,对形势做出解释。

10月16日,我一大早就去白宫拜访了总统,向他通报赫鲁晓夫已经辞职,勃列日涅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列克谢·柯西金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按照给我的指示,我说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将不会改变。

129 对约翰逊来说,就像对其他任何人一样,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立即询问了赫鲁晓夫的命运。他这样做从很大程度上说并不是出于他个人对赫鲁晓夫的同情——他从来没有见过他——而是出于正常的好奇心。他更为感兴趣的是苏联的新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政策方针;苏联领导人紧急命令我与他进行会谈并向他保证他们渴望与他发展良好关系一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他对此表示赞赏并祝愿他们成功。

接着,他表示他个人愿意扩大和苏联新领导层的关系,并要求我转达他个人的想法——他用他本人特有的那种朴实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想法。他重申他将奉行肯尼迪的和平政策。他说,如果能够重返白宫^①,他期望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他想明确无误地表示:“我们不想埋葬苏联,但同时我们也不想被消灭。”(这是指赫鲁晓夫关于压倒和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著名恐吓。)他说,无论哪一方都没有任何理由害怕对方,他“准备在苏联大使的房里住上一夜,枕头下不放手枪”——他相信大使也会这样做。问题是使我们两个国家都相信这一点,这样,公共资金便可以用于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上,而不是用于军事方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放弃过去的对抗”。他进一步表明他准备去任何地方,同任何人进行会谈,只要这样做能够取得积极的结果。

谈到越南问题时,约翰逊表示他相信苏联与那些想统治这个

① 指竞选成功,再度担任总统。——译者

地区的人(也就是说,与中国人)产生的矛盾将比同美国产生的矛盾更多,但是这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事。他脑子里肯定想着的事情之一是中国第一个核装置正好在那一天爆炸成功的新闻,但他并没有直接提及此事。

他把中国与越南问题联系起来并试图把我们也卷进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8月份,赫鲁晓夫就曾发出一份照会,询问假如北越人袭击美国在东京湾的驱逐舰——总统将它用作扩大战争的法律依据——美国将怎样看待。总统回答说,苏联所能采取的遏制北越或北京进一步实施不负责任的行动的任何步骤都将是有益的。这是越南战争对我们两国关系第一次产生的明显影响。

最初,新的苏联领导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构成人员的名单上。赫鲁晓夫担任的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位现在被政治老手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取代了。勃列日涅夫作为主席团成员之一本已经在党内占据了重要的领导地位,虽然他还没有当上第二把手。第二把手的位置属于“灰色的红衣主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然而,苏斯洛夫从没有渴望成为第一把手;他宁愿躲在暗地里当一名拥立国王的人,而不愿意当国王。苏斯洛夫是一个非常乏味、非常教条、在意识形态方面思想狭隘的人。但是多年来他把持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整个机构,这是他真正的力量所在。他不喜欢进行改革,而且他总是试图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会使国内形势出现不稳定的惊人举措。他对赫鲁晓夫——他的同事们认为他在决策过程中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主观愿望——的下台负有主要责任。

130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与他的前任完全相反。他是一名通晓通往克里姆林宫权力之路的政客;他是一个善于与别人合作的人,而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勃列日涅夫做事谨慎,不慌不忙,惯于倾听同事的意见。他既没有赫鲁晓夫的天赋,又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容易感情冲动的改革者。他尽力避免突然出现的转折和激进的改

革,宁愿保持可以预料的稳定。人们不会称他是一位伟人、一位强有力的人物,甚至不会称他是一位个性坚强的人。他从一开始即表现得仅仅像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他希望受到人们的喜爱,他爱讲故事,并且喜欢与老朋友一起饮酒。

成为总书记之前,勃列日涅夫在赫鲁晓夫领导的政治局中主管军事工业联合企业及军工生产,他对这一领域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勃列日涅夫喜爱军人,军人们也喜欢他。如果他们想向他展示某种新的成就,他们就会邀请他去工厂,他也总会兴致勃勃地前去视察。外层空间项目也归他掌管。他为在战略武器方面取得与美国平等的地位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这一竞赛将国家的经济资源消耗殆尽。他对自己身着陆军元帅制服的样子颇为自豪。有一次我去他家里看望他,他让我坐下喝杯茶,而他却走了出去。他再次出现时穿了一身华丽的制服,上面挂着他的全部勋章。他问道:“我看上去怎么样?”我回答说:“漂亮极了!”——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勃列日涅夫不太关心意识形态问题,但他坚定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他百分之百地正统,因此从不干涉苏斯洛夫主管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对外交事务也知之甚少;起初,这一领域之所以吸引他,主要是因为它表面上的礼仪性的一面——仪仗队、在克里姆林宫欢迎外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充满阿谀奉承的宣传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他希望有人为他拍照,并将照片收入他的影集;他喜欢向别人展示他的影集。他愿意出席签署最后文件的盛大仪式,而不愿参与拟定文件的工作。但他基本上赞成与美国建立较好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

每当我回到莫斯科时,我都要单独向勃列日涅夫详细讲述美国的情况(他对美国总是很感兴趣)。然后我总要问他“对今后工作的指示”。勃列日涅夫则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说:“你需要什么指示?你比我更知道怎样和美国人打交道。让那里保持安宁,这是最主要的。”

从他担任总书记开始直到结束,勃列日涅夫在有关外交政策

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依靠葛罗米柯,只有削减战略武器问题是个例外——他在我国军事工业部门工作过的经历使他在这一问题上很有经验。葛罗米柯对他的影响就像当年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的影响一样大,然而,我们这位精明的部长并不想在政治局的同事中表现出他的优越地位。安德烈·葛罗米柯即使在跻身于国家最高权力层——这只不过是强调他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特殊地位——时仍然保持着一名外交官的身份。与赫鲁晓夫相反——赫鲁晓夫时常把他的意志强加给葛罗米柯(同样也强加给他的其他同事们),勃列日涅夫则对他的外交部长完全放任,因为他知道葛罗米柯与他相比显然是一位更为出色的国际问题专家。除此之外,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是朋友。这一友谊是建立在他们(实际上每个星期)一起去距离莫斯科大约120公里、位于扎维多沃村的勃列日涅夫别墅狩猎的基础上的。葛罗米柯以前根本不喜欢打猎,有些不怀好意的饶舌者称他为了接近勃列日涅夫,在50岁的年纪成了一名“酷爱运动的人”。

尽管如此,葛罗米柯对勃列日涅夫的影响总的来说是积极的。作为一个聪明人,他巧妙地满足了总书记奉行稳健的、而不是赫鲁晓夫那种感情宣泄式的外交政策的愿望。人们可以不同意葛罗米柯的某些观点,但是公平地说,他制定的政策总是具有连续性和预见性。亨利·基辛格曾经半开玩笑地称这种政策是“一部固执地开往目的地的沉重的压路机”。只要目的正确,这句话甚至也可以被看作是溢美之辞。但是,葛罗米柯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主要特点在于他一直在尽力阻止他的国家卷入和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去。尽管没有人指责他公然表明这一政策,但是他内心总是喜欢促进与华盛顿的关系,同时又不允许自己逾越意识形态这一主要障碍。

约翰逊和勃列日涅夫从来没有见过面。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两人很相像。两个人的年龄相仿,都出身于平民家庭,两个人都是精通国内政治策略的能手,而且对外交政策问题都缺乏深入的

了解——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没有引起他们注意的弱点。两个人都喜欢打猎和开快车,都对读书不感兴趣,都看过很多的电视节目,都喜欢美国西部电影和足球,两个人都不反对干上一两杯,两个人都喜欢讲笑话并且公开(或在对话的人面前)炫耀,而且两个人都试图引导会谈,这样每一方都是满意的。他们都是急脾气(虽然并不公开表现)并且容易产生积怨,然而,他们都喜欢表现出他们是善良且充满同情心的。

两个人都喜欢公开露面,喜欢拍照供报刊发表。约翰逊甚至对电视摄影记者发出一项专门的指示,要从左侧拍摄他,因为他认为那样他会更上相。苏联报纸摄影师知道勃列日涅夫希望他胸前佩戴的大量的勋章和奖章能在照片上看得清楚。约翰逊由于渴望在电视上显得更加吸引人而把普通眼镜换成隐形眼镜,并且使用舞台专用化妆品和一种电子提词机。勃列日涅夫没有用此类道具,但并不是因为他对此不屑一顾。当时苏联还没有这样一些东西。当勃列日涅夫一了解到约翰逊为什么不必看着讲话稿讲话并且能够直视观众时,他立即命令他的助手买来一台讲话提示器。(后来,美国企业家阿曼德·哈默——此人称他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列宁——作为礼物送给他一台讲话提示器。)但是,勃列日涅夫从未能够习惯于用这种方式进行电视讲话,很快又重新手拿讲稿发言了。

约翰逊和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区别在于美国总统的行为追求的是宣传个人。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年中,约翰逊在电视上露面的次数比肯尼迪在白宫大约三年的时间里上电视的次数还多。约翰逊在五年中举行了126次记者招待会,其中大多数是在他任职前两年——在越南战争的局势对他不利之前——举行的。勃列日涅夫则坚决拒绝举行任何记者招待会。他知道他的举止笨拙,而且离开讲稿就不敢讲话。同时他喜欢发表内容广泛、书写清楚的讲话,而且喜欢有个好名声。

他们两人都喜欢大众新闻媒介发表他们的讲话。勃列日涅夫

在苏联这样做当然没问题,但在国外情况就不同了。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们挑选了对他们的上司最有利的文章和照片,甚至连了解勃列日涅夫这一弱点的大使们也常常从外国的期刊上剪下赞美文章寄回。他总是阅读这些文章并且有时在政治局会议上引用。约翰逊所处的环境却不是这么简单,因为美国新闻是独立的,所以他总是试图制服记者以期他们将会以称赞的目光介绍他。他邀请选拔小组到白宫来,向他们展示其令人生畏的个人魅力。在实行“伟大社会”计划以及民权运动的初期,他将这一技巧运用得非常成功。但随着越南战争的进一步恶化,这种做法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他为此受到了谴责。

很难说这两个人之间的个人会谈能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然而,我认为它可能比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的会谈更为成功。简而言之,这两个人都是相当有魅力的人物,但是勃列日涅夫把持最高权力的时间太长了。他的晚年时光过得并不愉快,但那几乎是20年以后的事了。

133

约翰逊竞选获胜

由于约翰逊对勃列日涅夫执掌政治局权力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勃列日涅夫感到非常高兴,于是决定甚至在约翰逊参加选举前就对他表示明确的支持。(克里姆林宫总是关注着美国大选及其他重要选举以便不会因为支持落选者而陷入危险境地。)11月3日,也就是大选投票之日,我把苏联政府给总统——他正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的照会文本交给了汤普森。照会表示理解约翰逊关于削减军事开支的意图。为什么双方没有能够同时进一步削减军费,甚至在一年多前没有能够达成一项正式协议呢?苏联政府进一步提出双方相互削减在欧洲的军队,但双方仅仅削减了他们大约一个师的兵力。照会还说苏联政府确信尚有很大的潜力促进在诸如裁军和欧洲安全这样的领域中的发展。照会指出,所有的国家——

大国和小国，你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朋友——都能够从缓和中获得好处，这是问题的实质。（在俄国，我们不用法语“detente”（“缓和”）一词，西方国家喜欢用这个词，我们宁愿使用俄语中意思相同的“减轻紧张局势”这个词。）

照会结尾写道：“我们愿意重申，苏联政府珍惜它与约翰逊总统相互信任的关系，并且认为保持和发展这一关系——包括通过建立秘密通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汤普森告诉我他将毫不耽搁地把这一照会转交约翰逊，因为总统一定会特别欣赏苏联领导人在大选结果尚未揭晓之前就表达了他们的心意的做法。莫斯科有些人怀疑，在尚不知道选举结果之时发出这样的照会是否明智，但是勃列日涅夫想给予约翰逊精神上的支持。勃列日涅夫成功了，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约翰逊第二天以160万张选票的绝对优势战胜了戈德华特。

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越南战争升级

1965年1月14日，汤普森交给我一封总统的私人信件，此信是
134 对大选前夕他收到的那个令他十分兴奋的苏联政府照会的答复。他的确为减缓军备竞赛速度增加了赌注——他通知克里姆林宫，在新的财政年度里，美国政府在申请军费拨款时将少要20亿美元。他还建议让苏联领导层中的某位成员来美国访问，以便面对面地全面讨论问题。汤普森以外交方式表示，希望这封信不会被理解成是美国政府急于促成访问的一个轻率行为，他解释说，约翰逊使用了“苏联领导层”这样一个宽泛的词汇，其目的在于让苏联方面决定究竟谁将来访。后来双方又交换了意见，苏联领导人表示更希望约翰逊访问莫斯科，其原因部分在于他们之间无法就谁去访问华盛顿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在越南的对抗突然加剧，访问华盛顿很快就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问题。

但是，总统含糊不清地向“苏联领导人”——而不是向勃列日

涅夫和柯西金个人——发出邀请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赫鲁晓夫辞职以后，约翰逊收到的多封发自莫斯科的信件都没有署名，因此，他的顾问们不知道怎样把总统的信发给莫斯科与他地位相当的人物。

他们之所以困惑不解，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为了谁在给外国领导人的信函上签字而在幕后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柯西金认为这一荣誉是属于他的，因为根据国际礼节，他作为政府首脑有权向外国政府首脑发出信函。勃列日涅夫渴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但是柯西金认为，勃列日涅夫作为党的领导人，不能取代他作为苏联国家的公开代表和发言人的作用。最后，柯西金在苏联领导层内部占了上风，并且被授权签署政府信函，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葛罗米柯暗地里支持勃列日涅夫。他私下指示大使们要审慎地向他们驻在国的领导人介绍苏联领导层中“谁是最有影响的人物”。结果，勃列日涅夫逐渐占了上风，但是在约翰逊政府期间，信函仍然发给柯西金。

这里要稍微谈一谈阿列克谢·柯西金的情况。对西方人来说，他一直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而且常常被看成是一个缺乏幽默感、性格阴郁的人。这种看法和真实情况相去甚远。但是，作为斯大林时代一名幸存者，柯西金已经学会了如何保守秘密，而且不愿意和任何人过于接近。他没有在党的机关工作过，只在政府机构担任职务，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政治地位。

柯西金是一个诚实、聪明并且极有见识的人，处理政府事务的能力非常强，而且精通经济、工业和财政。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即可看出他在行政管理方面表现的聪明才干和深谋远虑。苏联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将核爆炸和平利用于某些非常诱人的工程项目中的可能性，例如使充沛的西伯利亚河水倒流向干旱的中亚地区，而不是流向北冰洋。核科学家和水利专家将有说服力的投资和效益评估报告提交给由柯西金领导的部长会议。但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一位科学家的敦促下，柯西金提出要对比较温暖的河水不再

流入冰冷的海洋对大气温度和整个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准确的预测。没有人能够确切地回答这个渔业和矿业资源丰富的地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柯西金命令将这一方案退回去“修改”。幸运的是，这个方案再也没有上报，因为真正的缺陷在于核爆炸带来的致命的放射性尘埃将会在未来数年中污染土壤。

从本质上讲，柯西金不是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这一点使他在党内和全国上下得到了尊敬。他不是一个外交事务专家，但由于他具有丰富的—般性知识，使得他能够比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除了葛罗米柯之外——更好地把握与外国对手的讨论和谈判，当然比勃列日涅夫把握得好。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内心嫉妒柯西金，并且不喜欢他。但众所周知，柯西金不想成为总书记，爬上党内权力的顶峰。他不介入政治斗争，因此勃列日涅夫才容忍他担任总理。

在黑海避暑胜地，我曾两次应柯西金之邀——他也正巧在那里休假——出席纯私人性的晚宴。宴会之后，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轻松的谈话，一直谈到深夜。他直截了当地向我询问了许多有关美国的问题：它的社会和人民，它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他是一名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他又是一个相当坦率的人。在他的别墅里，他向我描述了我国的最高层领导人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

2月10日，一支强大的越南共产党武装向驻扎在南越波来古城附近的美国军营发起了突然袭击，出于巧合，柯西金于2月初也正好在河内访问。约翰逊命令大举轰炸北越，以此实施报复，而柯西金此时尚未离开那里。后来，富布赖特参议员私下告诉我，约翰逊曾为是立即轰炸北越还是等柯西金离开后再进行轰炸而犹豫不决。他的很多顾问都建议立即开始进行轰炸。他们认为尽管这样做无疑将会使美苏关系暂时恶化，但与此同时，空袭将向北越、中国以及苏联表明美国的决心。此外他们还认为，形势急剧恶化将会使通过谈判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达成一项更有利于美国的解决方

案变得更为容易。约翰逊对他的助手们重申，他反对把和莫斯科的关系搞糟。但是，富布赖特说，他还告诉他们：“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他必须反对中国和毛泽东本人对美国意志的挑战。”

当我和腊斯克会谈时，他已完全意识到了局势的敏感性。所以他一直对我说，总统不想损害我们的关系，他希望两国关系得以改善，如果河内停止干预，美国准备从越南撤出来，等等。我拒绝接受这些辩解。事实是我国总理在那里访问时，他们轰炸了这个国家。

事发之后不久，苏联政府即向约翰逊总统发出了一封措辞十分强硬的秘密信函，信中谴责了美国在越南采取的行为。柯西金对他在越南访问期间发生的轰炸事件极为气愤，并转而反对约翰逊，虽然以前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他对约翰逊持较为赞赏的态度。

北越人的做法也有点不合适宜，他们恰好在柯西金访问河内期间发动了进攻，事先又没有通知我们。实际上，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制造不和。局势变得十分荒谬。一方面，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越南人正在打什么牌，知道越南人正在背后诅咒他们，特别是勃列日涅夫，他和葛罗米柯一样，不想无缘无故地使苏美关系恶化起来。当然，我们也希望因美国卷入了东南亚问题而能够转移华盛顿对欧洲的注意力，但是归根到底，由于莫斯科坚持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因此它将无情地驱使我们的国家沿着一条错误的、变化无常的路线走下去。

我们的古巴朋友同样也不让我们得到安宁。他们试图通过我国使馆给白宫施加压力。应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秘密请求，莫斯科命令我就“美国对古巴进行的挑衅行动”次数的不断增加，包括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它设立在古巴岛的一块美国飞地上——采取的一些军事行动等问题，向汤普森再次发出正式声明。

总而言之，我们的盟国——越南和古巴，这是我们与美国关系中引起麻烦的两个主要地方——的行为自然而然地阻止了我们对两国关系中其他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进行理智的讨论。

华盛顿的主战派

137 3月21日,我和腊斯克再次举行会谈。他极为不安地说,通过与北京及河内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接触,有一个问题已经弄清楚了,即河内不打算停止它在东南亚采取的行动。现在它正在利用老挝领土向南越渗透,从而违反了日内瓦协定。苏联对保证日内瓦协定的贯彻实施负有部分责任。我们一直指责美国干预东南亚事务,但腊斯克却顽固地把问题归结为北越干涉了南越。

与此同时,华盛顿内部正进行着一场争论,很多高级官员从更为广泛的、更具有威胁性的地缘政治角度看待这场战争。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受尊重的亚洲问题权威麦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对我说,主张美国对越南实行干涉政策的策划者和主要倡导者是麦克纳马拉、邦迪兄弟(威廉·邦迪是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五角大楼里的这伙人认为,中国直接介入越南问题将为炸毁中国的核设施,从而把中国无限期地排除在核大国行列之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富布赖特参议员也告诉我,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已在华盛顿联合组成了一个“主战派”。自选举以来,富布赖特说,总统已变得难于交谈,尽管他们是老朋友。约翰逊几乎不听与他谈话的人所说的话,而是打断他们的话,只顾自己夸夸其谈,竭力想向听者表明他有充足的事实依据,有富有说服力的辩术以及出色的政治家才能。他只听取五角大楼的军事专家以及国务院某些高级官员——主要是腊斯克,开始还包括他的副手乔治·鲍尔那样一些人——的意见,在总统的私人顾问班子中,乔治·鲍尔一直反对战争升级,直到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失败并且辞职为止。

富布赖特对总统的立场做了如下描述:约翰逊想趁为时还不算太晚先阻止住中国的行动。放弃南越非但无助于亚洲的稳定,而且会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因为中国领导集团不会停止在越南采取行动。因此在中国还没有成为重要的军事大国,而且它在亚洲的

扩张能力还相当有限的时候,西方国家必须毫不迟缓地进行“挑战”。河内完全听从于北京,实际上,它对东南亚以及东南亚以外地区未来发展与北京的看法一致。因此,约翰逊认为,美国必须利用空中轰炸继续施加军事压力,直到越南接受一项建立在1954年维也纳协议框架之内的和平解决方案为止。当然,这就是越南失败将波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臭名昭著的“多米诺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戴高乐驻纽约代表的法国大使埃尔韦·阿尔方与法国总统的关系十分密切,他试图让约翰逊和腊斯克牢牢记住他的国家因卷入越南战争而留下的惨痛教训。但是他告诉我,约翰逊认为他本人参加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全球斗争中,这确实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划定了一个界限,就像在两大阵营之间划出一条分裂欧洲的界限一样。他告诉我,白宫相信,由于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对抗正在加剧,莫斯科在越南问题上将不敢冒从根本上恶化它与华盛顿的关系的危险。

3月12日,在与休伯特·汉弗莱副总统共进私人午餐时我又追问起这个问题。汉弗莱说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北京将美国看成是“纸老虎”,中国人和北越人因而赋予越南冲突地缘政治的性质,对此美国政府再不可忽视。因此美国不允许自己在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政治解决方法的情况下被迫撤退,这就是华盛顿为什么断然拒绝河内提出的在进行谈判之前美国军队先撤离南越这一先决条件的原由。

总统所持的立场归结起来就是进行一场交易:如果河内停止其针对南越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即停止它针对北越采取的行动;然后谈判可以开始。约翰逊政府准备接受南越的任何政府,即使它最终转向社会主义也罢,他说,但对美国政府来说,主要的问题是美國不能屈服于北京的压力。他又说,总统准备采取和平解决办法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避免苏美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点与阿尔方所说的不一样。阿尔方说美国政府认为我们之所以没有附和它是因为我们害怕中国。)尽管约翰逊同样意识苏联不得不向北越提供军

事援助,但是他知道,这只能导致苏联和美国在更大程度上卷入越南问题。北京为了避免莫斯科和华盛顿建立友好关系,因而希望进行战争。

我一边听汉弗莱谈话,一边想他的分析是对的。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结束战争,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确实符合苏联的真正利益。然而,河内顽固地拒绝接受这种解决办法,特别是拒绝停止它为了把南方“从美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并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整个越南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河内进行了10多年的紧张斗争。他们是否能够通过接受1964年协议尽早并且更容易地实现这一目标呢?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139 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腊斯克以极具试探性的、非正式的、私人的方式,向我做出了和平的姿态以试探我的反应。5月8日,在国务院为招待外交使团而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招待会上,他和我谈起了越南问题。他强调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应受其伙伴的束缚,想通过这种办法使我认识到我们两国可以联合起来(不公开地)达成一个分阶段的解决方案。他说,假定华盛顿和莫斯科可以就越南问题私下达成一项秘密协定,这样,如果苏联同时郑重向北越做出反对美国轰炸的军事担保的话,美国将不会把它看成是一种挑战行为。这些进展大体上可以看作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即将发生对抗的情况下达成的妥协。与其他情况相比,这将是中国受到的一大挫折。

腊斯克谈到两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地依赖于它们的盟国,此话说得实在是太对了。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尽管美国政府大谈特谈其对地缘政治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它已经开始担心越南危机正在陷入僵局。在发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我强调了腊斯克对我说的这番话的重要性。

两天之后,腊斯克要我紧急通知苏联政府,作为对我们提出的呼吁的答复,美国对北越的空袭暂时停止一段时间,他称其为有限

的观察阶段。华盛顿希望河内将相应减少它在南越的军事行动，如果河内不这样做，美国将重新发起攻击。

毫不奇怪，勃列日涅夫对腊斯克的想法很感兴趣，并且要求葛罗米柯认真加以考虑。葛罗米柯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腊斯克的建议很难付诸实施。北越拼命反对在与美国人谈判时有第三者进行调停；河内想直接和美国人打交道。如果华盛顿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可以转告河内。腊斯克后来又提出过类似的建议，第一次是5月中旬在维也纳参加奥地利国家条约签订10周年紀念会期间他与葛罗米柯会谈时提出的，第二次是通过驻莫斯科大使富耶·科勒提出的。葛罗米柯直截了当地说，苏联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就越南问题与任何国家，其中包括美国进行谈判。

我们自身的越南综合症

7月3日，临休假之前，我与腊斯克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他说东南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苏联对此问题的态度让美国政府捉摸不定，莫斯科没有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美国搞不清楚莫斯科是否自愿接受了河内的否定意见。他指出，葛罗米柯告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除非美国停止轰炸北越，否则就不会有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但是，当科勒询问如果空袭停止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时，葛罗米柯所说的只是这样一句话，“你们先停止空袭，然后我们将考虑考虑。”

140

腊斯克想让莫斯科知道，美国试图与河内建立秘密渠道以讨论和平解决方案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美国方面意识到，莫斯科像华盛顿一样有自己的头疼事，但是，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然坚信战争与和平的命运归根到底掌握在苏联和美国手中。看来双方都对通过解决越南问题而逐步改善两国关系感兴趣。

然而，根据我得到的指示，我把刚刚从莫斯科收到的分析意见告诉了腊斯克，这就是在最近几个月里，美国政策已经变得极为糟

糕,并且根本不符合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原则。我必须承认,这种批评完全没有什么根据,而腊斯克显然被这种比较刺痛了,他认为这种比较缺乏根据并且是错误的。在肯尼迪时代,围绕柏林和古巴问题出现过极为严重的紧张局势,腊斯克急于证明(不是没有理由)我们之间的很多争执,包括越南问题本身,都起源于肯尼迪时代。总的说来,此次会谈使我们两人都感到很不愉快。

在莫斯科休假期间,我参加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并且同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及其他一些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全都认为越南问题以及它对我国与美国关系的影响是我国对外政策遇到的重大问题之一。然而,我们的领导人一致承认,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是第一位的,而越南问题并不涉及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苏联公众对这个遥远的国家根本就不大了解。因此,我们的政治路线应该是明确的,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大因素——“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际团结”——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思想中。它一直影响着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不时损害着我们自身的根本利益。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很多苏联领导人在与我私下谈话时都承认这一点。但是,一旦要采取实际行动时,苏联则患上了自身的越南综合症,这一综合症一直是我们与美国关系的沉重负担,而且多年以来一直妨碍着我们两国关系的缓和。

第九章

试图混淆和平与战争

约翰逊把他的总统职位押在结束越战上

到了1966年，美国在南越的武装力量已经急剧增加到约40万人，美国军队最终成为对付越南国内抵抗力量的主要力量。对北越的轰炸正在扩大，对河内和海防进行的空中打击很快便接踵而至。

由于美国使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与此同时它还增加了它的核军备及导弹力量，以保证它的全球优势，因此，防止因越南问题而削弱苏美关系就变得很困难了。尽管如此，苏美关系中的一些特殊问题还是得到了解决，或者至少在探讨解决的办法。两国政府恢复了它们秘密交换信件的做法，并且在考虑诸如利用原子能开发矿山和土地资源以及和平开发月球和外层空间这样一些想法。在拖延了很长一段时期之后，1966年底我们签署了直接开通两国空中航线的协议。1967年1月，我们又就开发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原则签订了协议。但最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为了反击某些国会议员和军事工业联合企业要求在军备竞赛中采取新措施而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对签订一个限制两国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约翰逊实际上已经开始意识到，除非在1967年结束越南战争，否则他就很难指望在下届大选中重新当选总统；随着战争的扩大，全国各地随之出现了反战活动。富布赖特对我解释说，这就是为什

么总统感到必须对北越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从而推动越南问题得以解决的原因。6月初,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他越来越激烈地反对总统的战争政策——在他家中与我共进午餐时告诉我,约翰逊和腊斯克现在不再对和平解决越南问题感兴趣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用军事手段在1968年大选之前结束战争上。

142 我还听说在总统的核心圈子中还有一位积极主张扩大战争的人。5月末,在哈里曼家共进晚餐时,他提醒说新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他接替了邦迪的职务)是政府中最危险的鹰派人士。他总是无条件地赞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并且要求扩大空袭范围,其目的正如哈里曼所说是为了“使河内深切认识到美国就是要这样干”。在麦克纳马拉的支持下,约翰逊没有接受扩大空袭的要求,但他对腊斯克提出的应该继续奉行有限轰炸的政策表示赞同。他打赌地面战争能够取胜;为了使美国能在下一年打败越共军队的主力,1966年将按计划向越南派遣更多的军队。

6月初,我初次结识罗斯托,在一起共进了午餐。他说话的语气听起来相当乐观。他认为越南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他承认他们想直接得到中国人的帮助以达成和平解决越南问题方案的一直努力都失败了;在美国和中国驻华沙大使定期举行的会谈——这是两国政府间唯一的直接接触——中,这一问题已经被提了出来。但是他强调,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美国不会进攻或轰炸中国大陆,中国起码不会使其军事力量介入越南战争。中国领导层表面上在“大叫大嚷”,实际上“对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问题却极端谨慎”。罗斯托说,中国正在进行的潜在的权力斗争——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中国未来的外交和国内政治方针起着决定性作用。

约翰逊总统同时还密切注视着欧洲形势的发展以及与苏联的关系,罗斯托说,但是他意识到只要越南战争仍在继续,“人们就很难期待”欧洲事务取得更大的进展。这位国家安全顾问显然对裁军问题不感兴趣,而且在我们以后举行的会谈中他也从未对这一问

题表示出任何兴趣。总的说来，我得出这样的印象：他很警惕，不急于向苏联大使透露更多的东西。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次，罗斯托想把一封约翰逊总统写给柯西金总理的秘密信件交给我，并要我在夜里11点去他家取信。他住在华盛顿郊区的某个地方。到了他家，我从头到尾读了这封信后，发现其中有段话的意思非常模糊。我向罗斯托指出了这一点，并问他，“应该怎样正确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才不会引起莫斯科的误会？”罗斯托回答他无权解释总统的信件。我告诉他我不要求做出解释，而是要求澄清它的含义。但他坚持不说。由于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我要他给总统打电话，在电话中澄清此信的含义。罗斯托拒绝了，他说时间太晚了，不便打扰总统。

我请求使用他的电话。拨通了白宫值班员——我认识这个人——的电话后，我问他总统是否已经就寝。我的决心给罗斯托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从我的手里抓过听筒，问对方总统在做什么。值班员回答说约翰逊正在看电视。

143

罗斯托跟总统通话时显得非常勉强和胆怯。约翰逊让罗斯托把听筒交给我。我请总统说明信中那段话的意思，他表示非常愿意这样做。“罗斯托太喜欢玩外交游戏了。他不会用坦率的语言和外国人讲话，”约翰逊说，“他完全知道我这封信的意思。”

接着，约翰逊把他在白宫的私人电话号码给了我，这样在遇到紧急问题时我就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而不必通过罗斯托了。后来，我不得不几次使用这个号码给他打过电话，最重要的一次是在一个星期天安排了一次紧急约会，通知他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事。

莫斯科关注越南问题

莫斯科不像华盛顿那么担心越南战争会影响苏联和美国，实

际上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很多政治局委员在与我私下谈话时以及他们自己在私下交谈时都诅咒美国人、中国人和越南人不愿为解决越南问题而寻求一种妥协办法。勃列日涅夫曾经气愤地对我说,他不希望“陷入越南这片沼泽中”。尽管苏联领导层对约翰逊试图把美苏关系同他在越南问题上顽固坚持的政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区别开来的想法表示欢迎,但它仍旧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原则,对河内给予援助。它根本不可能接受美国政府试图不顾越南战争的存在而实现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办法。

144 当1966年5月我作为一名代表参加第23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时,我感受到了我国政府的窘困。政治局在准备大会报告时特别注重对苏美关系立场的阐述。大会在总结报告中指责美国应承担这场战争的责任,但又指出“我们曾经一再表示准备发展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现在我们仍然坚持这一立场。但这需要美国停止实行它的侵略政策”。于是,我们依旧对一个为了国家重新统一而向一个实力强大的超级大国挑战的社会主义小国表示了基本的、公开的同情。但是,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就与美国的关系问题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政治局懂得这一点,但却找不到摆脱困境的明确方法。

不用说,华盛顿对这次党代会极为关注,汤普森向我转告了美国对会议结果的分析,即苏联政府没有改变其外交政策,并打算把精力集中在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建设上。

腊斯克本人对这次党代会颇感兴趣,并且说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谈到越南问题时措辞很尖锐。他向我建议:“莫斯科应该考虑到,河内没有给美国留下选择的余地,因此它只能奉行现行路线。”在我们最近的一次会谈中,腊斯克谈到越南问题时差点发起脾气来。我不禁感到美国政府内部在越南问题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而腊斯克不得不在找不到摆脱困境的明显出路的情况下天天应付这种压力。这种状况表明了这位一贯性情平和的人的心境和情绪。

10月10日,葛罗米柯和约翰逊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照例在白宫举行了会谈。会谈一开始,他们两人就争论起造成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应由谁来承担,约翰逊说苏联,特别是苏联报纸对他的人身攻击使他极为烦恼。

当会谈气氛相对平和下来时,约翰逊说他将很高兴在美国接待苏联领导人,或者亲自访问苏联,“我们见面的次数越多,对我们双方就越有好处。”他说。

约翰逊再次说到他仍准备和北越进行谈判,并且要求苏联帮忙把它的朋友拉上谈判桌。葛罗米柯回答说,美国要求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的所有声明,只要包含着前提条件就会使对方根本无法接受,因为它们完全意味着投降。

“问题在于,”葛罗米柯神情严肃地继续说道,“如果美国继续执行这条路线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其他的国家,包括苏联,当然会向越南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苏联,将会发现自身陷入了这种发展状态中。是历史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就是如此吗?尽早结束战争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中。它取决于你们的政策。”

他坚持认为,美国首先应做的是停止轰炸北越。但是,令人非常难以理解的是,除了提出这一简单的要求之外,苏联政府对解决这场冲突没有制定出任何明确的计划。它只能依靠河内,而河内却不向莫斯科披露它的具体计划。像以前一样,这次会谈结束后仍未就结束越南冲突的条件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总的说来这次会谈起到了帮助华盛顿和莫斯科回顾各自的观点并思考潜在的危险的作用。

会谈结束时,约翰逊强调说需要经常举行高级会谈。他说:“我们会谈的次数越多,对我们大家就越有好处。”

尽管在越南问题上陷入了僵局,约翰逊仍然表示他对签定诸如文化交流、利用外层空间、捕捞以及航空等一系列协定很

感兴趣。

1966年11月签订了一项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开辟直接航线的协议。从莫斯科直接飞往纽约的首次航班是由著名飞行员鲍里斯·布加耶夫——后来他成为勃列日涅夫的私人飞行员，再往后又担任了苏联民航部长——率领的一个苏联机组飞行的。鲍里斯·布加耶夫的领航员被认为精通英语。当飞机临近肯尼迪机场时，领航员和美国机场指挥塔取得了联系，并且要求准许飞机降落。他得到的命令是和其他飞机一起按秩序进入着陆位置。

领航员没能领会这一命令的意思，而是兴奋地通过无线电回答：“很好，我正在降落。”他再次被告之按秩序等待，但他仍然没有听懂这一命令。他更为响亮地重复说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正在进行降落。惊恐万状的航空调度人员命令着陆航线上的所有飞机立即“为发疯的俄国人”让出跑道。着陆本身完成得非常精彩，机舱内的每一位乘客都显得兴高采烈，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死里逃生。

当晚为庆祝此次飞行举办了一次宴会。客人们相互交谈、祝酒。气氛十分友好，几乎没有人想到曾经发生的事。但是美国航空交通管理部门的头头笑着对我描述了这段插曲，随后非常严肃地建议我们的飞行员和领航员进行一个星期的无线电英语通讯的训练。

起初，机组人员根本不愿意听取这类意见。作为出色的飞行员和领航员——他们确实很出色，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无需接受任何额外的训练。我不得不与莫斯科联系，并建议命令机组人员进行专门的语言训练。莫斯科迅速做出了反应。我得到命令对美国提出的提议表示感谢，机组人员得到指示，要他们立即开始接受培训。全体机组人员随后即飞往纽约接受这种训练。

人们常说漫无止境的裁军建议、讨论和谈判是表明苏美关系

基本状况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天气晴朗的时候，关于控制军备的谈判就有进展，否则这次谈判会因自私自利和相互猜疑而布满阴云。让我们想一想那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以曼斯菲尔德修正案而闻名的提议吧。这一提议要求把美国驻扎在西欧——当时这一地区是北大西洋联盟和华沙条约组织的主要力量有可能发生对抗的最危险地区——相当数量的军队遣送回国。在那里一旦发生战争，将不仅仅是远方丛林中的一场冲突，它很可能会摧毁整个人类文明，虽然自60年代初围绕着柏林问题出现了数日的紧张状况之后那里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了。

曼斯菲尔德参议员以紧张财政以及越南战争的需要为理由，要求从欧洲撤回一些美国军队，其建议赢得了他的同事们的极大支持。约翰逊政府则反对减少美国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力量。和历届美国政府一样，它认为这样做同时将意味着削弱美国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在这一问题上，约翰逊政府首先得到了波恩最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普遍支持。然而，美国的公众舆论越来越倾向减少驻在欧洲的美国军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财政上的因素，而且在于美国对越南的干涉行为引起了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

为了解释他的提议并寻求莫斯科对这一提议的支持，曼斯菲尔德拜访了我，并向我讲述了上述情况。如果苏联能够宣布它准备从东欧撤出一些军队的话，参议员说，他肯定参议院将会通过他的提议，其结果必将有助于苏美关系的改善。后来，参议员埃德华特·肯尼迪和迪克·克拉克又分别给我打电话，提出了同样的请求。

当然，我把这一切向苏联领导层做了汇报，政治局讨论了这一问题。政治局最后决定不做任何支持曼斯菲尔德参议员的议案的表示，其主要原因在于苏联政府担心如果苏联从东欧撤出一些军队，可能会使那里并不稳定的局势出现恶化，而且美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会反对这一议案的。然而，曼斯菲尔德又在后来的几年里一再

提出他的修正案,但是始终未被通过。

147 为了核查两个大国的军备竞赛情况,我们还定期交换情报。其背景可以追溯到约翰逊总统任职的最初几天——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姿态,腊斯克曾于1963年12月9日请我通知莫斯科,美国政府打算在1964—1965年财政年度削减1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削减幅度为2个百分点。

三天之后,即12月12日,莫斯科答复说,苏联政府也打算在1964年削减6亿卢布的军费开支。这与美国的削减幅度差不多,但是,比较两国削减军费数额的真正难题是两国政府计算军费预算的方法不同,双方在国民预算的某些方面都隐含着军事开支,苏联尤其如此。

同一天,腊斯克提醒我曾向葛罗米柯提出过一项建议,要求双方拆毁各自的B-47级轰炸机群。他补充说,他们还准备讨论在双方商定的地点相互销毁其他类型的武器。我回答道,我国政府指示我说明,这样的相互销毁并不能表明是向共同裁军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为每一方都可以销毁它已过时的武器,而立即用新的、更尖端的武器取而代之。苏联仍然认为双方应该共同商定一个旨在全面而且彻底地进行裁军的计划,每一方都应该明确它自己及对方在每个阶段所承担的义务。

坦率地说,我不赞成这种要么就全面裁军,要么就不裁军的方针,我对葛罗米柯也是这样说的。哎,多年以来,他在这一领域所喜欢谈论的话题恰恰就是这项“全面、彻底裁军”的政策——这只不过是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联盟就曾进行过的一种宣传。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甚至不可能考虑采取一些较小的、不太连贯的措施,更不会采取通过外国人在我国领土上进行检查来核实军备状况的行动。事实证明,这就是造成很多裁军倡议难以实施的障碍。

但是,最根本的事实是,苏联领导人,尤其是赫鲁晓夫非常怀疑在进行军备竞赛的那个时期采取实际的裁军措施是否能够产生

效果。他们不相信这样做真的有可能实现裁军，而且他们也没有对此做好思想准备。因此，在赫鲁晓夫当政的年代中，他们浪费了开创共同裁军进程的现实机会。他们认为，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相互削减一些军费开支。

1966年10月，苏联领导层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在防止核武器扩散上，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讨论在其成员国内部发展共同的核力量的想法，其目的在于使它们感到自己也能利用核武器，而不要认为美国独家掌握着它们的命运。然而，值得称道的是，或许正是这种对美国势力自我否定式的限制，使我们警觉到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的手指已经靠近了核按钮。所以，我代表我国政府告诉腊斯克，这一想法是阻止达成防止核扩散协议的主要障碍：苏联准备就限制核武器扩散问题进行谈判，但是美国政府必须在签订防止核扩散协议和发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力量之间做出选择。

148

就签订防止核扩散条约进行的长期谈判是在1967年底结束的，正式签署的时间最后于1968年7月1日，在三个条约保存国——苏联、美国和英国——的首都同时进行。在华盛顿签署这项条约的有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苏联及英国驻美大使以及50多个国家的大使。庄严的签字仪式是在白宫举行的，出席仪式的有总统、政府高级官员、国会议员以及新闻界人士。莫斯科和伦敦在同一天也举行了签字仪式。

到1968年底，已有83个国家在该条约上签了字，而且签字国还在继续增加。这一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控制核武器扩散，虽然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印度和巴基斯坦、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然而，核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寻求制定控制核武器的有效办法，这项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核时代减少核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一个基本协议。

签字仪式结束后，约翰逊总统发表了一个庄严的声明。他说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已经达成了一项关于开始讨论减少战略核武器的发射系统和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

遗憾的是,由于约翰逊固执地要求把进行这一讨论和与苏联领导人进行最高级会谈联系在一起,同时也由于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外交气氛变得令人不愉快,因此在约翰逊政府的最后阶段,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没能在1968年得到美国的批准。这一条约不得不等到转年尼克松政府时期开始后才得到批准。

但是,在约翰逊政府时期以及后来的几年中,我们在裁军领域倾注了主要精力的问题是要不要建立一个庞大而且昂贵、但其有效性尚未得到证实的反弹道导弹(ABM)系统。在60年代中期,苏联研究人员已在研究在莫斯科周围和苏联西部爱沙尼亚的塔林附近部署第一个反弹道导弹网络的方案。在莫斯科看来,防御导弹——特别是为了保护平民——是合法的事情,这种做法在国外不应该受到怀疑。

149 这一计划开始引起五角大楼的注意。美国军方人士坚持认为,美国必须部署一个类似的系统以抵销据说已经部署完毕的苏联反弹道导弹系统。然而,美国政府认为,与其建立一个耗资如此昂贵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应付苏联的挑战,倒不如和莫斯科达成协议,相互限制导弹制造为好,特别是因为没有人能够确定反弹道导弹系统是否真能阻止入侵的导弹。此外,某些高级官员认为,对美国来说,改进和加强进攻性核导弹力量,使其能够比较容易地穿过反弹道防御体系是一件更为合算的事。有趣的是,提出放弃反弹道导弹计划的竟然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而不是外交官腊斯克。腊斯克从没和我谈论过反弹道导弹系统;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越南问题上。人们应该记住,麦克纳马拉是在美国首先全面提出限制战略武器主张的人。

美国政府内部就反弹道导弹系统所进行的秘密讨论自然没有向我们透露。但是,美国方面私下还是进行了一些试探。1964年1月16日,即约翰逊宣誓就职不足两个月的时候,麦克纳马拉的心腹、

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威廉·福斯特在与我共进午餐时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争辩说两国放弃建立一个较大规模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是可行的，他估计此项开支至少需要15亿到20亿美元。福斯特认为，如果在两国政府首脑之间能够达成某些初步的秘密协议将表明向前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鉴于约翰逊总统尚未公开表态，这样做就显得更为重要。没有时间可浪费了，福斯特最后说道。他微笑着向我提出警告：“别公开谈论这件事，否则我会被召到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那里去。”在整个1966年期间，福斯特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提及此事。

1966年12月初，卢埃林·汤普森向我透露，美国对有关苏联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报告感到惊讶。这些报告重新激起五角大楼和国会支持美国部署类似系统的情绪。甚至麦克纳马拉——虽然他没有向我们提出正式建议——在白宫的一次招待会上与我谈话时也提到这一问题。当时我们已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他的意思大致如下：据报告，研究和发​​展反导弹系统的工作有望获得成功，而很多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经劝说接受了这一看法。他们走访了他们在国会山的朋友们，并且赢得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国会议员的支持。但是，在对此计划进行研究之后，麦克纳马拉发现这一计划耗资巨大，而且从根本上说它不可能产生什么效果：只要增加新的导弹数量，反弹道导弹系统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击破。因此，相互克制看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150

我向莫斯科发出过许多有关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报告，但是没有得到正式的反应，其托词是我与华盛顿就此问题所进行的接触都是非官方和非正式的。与此同时，我们使馆获得了可靠的情报，断言美国正在大力发展一种反弹道导弹系统。我向莫斯科提出了一份详细报告。同时，我极力向政治局提出建议，我们至少要明确我们的立场，以免使我们自己走入更加激烈的军备竞赛的新阶段。

在莫斯科，政府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以柯西金为首的一些部

长们认为,反弹道导弹系统分明是用于保护人类安全的,所以不需要通过谈判证实这一点。人们怎能拒绝保护人类免遭导弹袭击呢?我国军工联合企业则持赞成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意见。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和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列夫·斯米尔诺夫认为,苏联第一个反弹道导弹计划看来有望成功;如果苏联沉缅于没完没了的初步讨论的话,它就可能落在美国的后面。

但是,熟悉国防和工业问题的勃列日涅夫指出,麦克纳马拉通过增加进攻性导弹数量可以制服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话是有道理的。然而,勃列日涅夫并不愿意完全放弃我们研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又说,为了对付美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挑战”,我们必须寻求做出一种相应的明确反应。葛罗米柯提出继续坚持我们的那个众所周知的观点——要么要整个面包,要么什么都不要,即实行“普遍而全面的裁军”。这个建议实际上等于是一种敷衍。

在政府进一步讨论的过程中,莫斯科提出了比较现实的意见,即把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结合起来谈。其基础是我们要达到在战略武器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主要目标。结果,1966年3月18日,我受命向福斯特亮明这个观点。我告诉他,反弹道导弹系统应该得到我们的关注。这个问题可以和核发射装置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

对此,福斯特合情合理地说道,就反弹道导弹系统达成的协议没必要包括任何关于控制和检查的条款,因为此系统上巨大的反导弹支撑设备、寻的装置以及跟踪雷达都不可能藏匿起来。但是,进攻性核武器却不是这样,它需要受到密切的监视。福斯特同时还
151 明确表示,对美国人来说,任何关于不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都不会影响对此进行的研究和开发。

我们就是这样首次接触控制导弹和反导弹系统问题的,这个控制军备的过程使两个超级大国陷入了一场持续了一代人的对话之中。1966年6月27日,约翰逊托人向莫斯科转交了一封信函,信中

建议在日内瓦举行一次“最高级”官员的会谈，讨论相互限制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问题。信中提出了建立一种“相互可以接受的、可以通过国家控制手段进行检查的稳定的力量平衡”，从而实现控制战略武器竞赛的想法。已经回到莫斯科再次担任大使的卢埃林·汤普森递交了这封信函并且补充说，美国政府接受苏联提出的此次会谈应该包括讨论尽早停止部署额外的战略性武器以及反导弹防御设施问题的建议。美国准备把注意力放在建立自我控制的国家检查体系上，尽管它没有排除现场检查的可能性。而且在谈判期间，任何一方都不能对自己的战略体系进行任何重大的更改，否则另一方也可以这样做。

这封信代表着约翰逊政府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华盛顿几乎只对反弹道导弹感兴趣，而莫斯科则只对战略性武器感兴趣，所以，双方进一步交换意见的工作进展一直很缓慢，直到1967年才由约翰逊和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上直接讨论这一问题。

麦克纳马拉、核战略及反弹道导弹

就反弹道导弹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加深了我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个人之间的友谊。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非常善于调整自己的观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他又是一个不受意识形态摆布的实用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习惯于随时会面。我特别记得1967年4月11日——约翰逊和柯西金举行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前的几个月——在他家共进私人午餐的情景。我们的整个会谈几乎都在谈论战略核导弹以及对其进行控制的手段问题。

麦克纳马拉解释说，美国军事理论的基础是美国应该准备在承受核导弹的突然袭击的同时保存自己的反击能力并使敌人受到无可挽救的损失。就他所知，麦克纳马拉说，苏联的军事理论也是建立在同样的原则基础之上。他确信双方都具备这种能力。正是这

152 一因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维护了稳定的局势并充分保证两个超级大国中的哪一方都不会攻击对方,因为它们各自都十分清楚攻击对方即意味着自杀。这一理论当然是很有道理的,我得到的印象是,麦克纳马拉坚信保持恐怖平衡——正如某些人所说的——的确是在维持和平。

但是,麦克纳马拉坦率地承认,美国拥有的核武库已超出了维持这一理论的需要,专家们知道这一理论的含义是“相互确保摧毁”——按其首写字母也可非常恰当地写为 MAD。然而,美国发现自己拥有的导弹数量超过了足以保证实践其军事理论的导弹数量纯粹是偶然的。肯尼迪上台后,由于他曾极力指责共和党听凭“导弹差距”不断加大,从而使美国落在苏联后面,所以他的政府决定集中精力迅速发展本国的核导弹。这一决定建立在美国对苏联导弹潜力所做估计的基础之上。但是,对这种潜力的估计显然过高了,因为苏联政府虽然曾决定把资源大规模地从民用转移到军事需求上,但它实际上并没有像它所说的那样进行资源转移。然而,1961年的柏林危机加快了美国的导弹发展计划,而当时苏联建立导弹力量的速度并不像美国情报机构认定的那么快。这种状况导致美国拥有比苏联数量更多的核导弹,而苏联也拥有足够的核导弹可以使它按照相互自杀的理论确保自己的安全。

反弹道导弹系统将引入一个全新的因素。麦克纳马拉,根据他所掌握的资料,他完全相信建造一个可靠的反导弹体系是不可能的。如果对方在这个项目上领先,那么美国为了保证相互自杀的基本理论行之有效,只能决定增加新型进攻性武器的数量(这样做开支更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作为对苏联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反应——在考虑部署其自身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之前先增加其战略核导弹潜力的原因。

麦克纳马拉强调说,华盛顿充分认识到相互谅解或者进一步达成具体协议是很困难的。由于两国的主要目的不同以及缺乏相互信任,因此出现这些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认为我们无论如何

也应该做出尝试。概括地说，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不可能很快地或轻而易举地就反弹道防御体系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尽管有这么多的困难，美国仍然希望达成相互间的谅解。

麦克纳马拉准备前往莫斯科会见苏联方面与他职位相当的官员，然而他清楚地意识到，由于越南战争正在进行，他“不是此行的最佳人选”。但是，如果需要的话，麦克纳马拉将派他的助手和汤普森大使一起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因为他们都非常了解这一问题。他还表示他准备继续在华盛顿就这一问题与我进行对话。但与此同时，美国希望至少得到莫斯科对他在这次午餐谈话中所提出的有关问题的一个初步反应。

这确实是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首次直接向苏联大使谈及——尽管是非正式的——他对限制核武器这一重要问题的看法。但是，莫斯科没有对此做出反应。我们的会谈再次引起苏联领导层内部就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甚至在几个月后，当约翰逊和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进行会谈时，这场争论仍在继续。两位领导人没能达成一项协议。然而，这些会谈为后来的、以东西方重要的联系渠道而闻名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或称 SALT^①——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回顾过去，我必须承认莫斯科拒绝就尽早禁止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同美国达成一致是犯了一个重大的而且代价高昂的错误。苏联所犯的另一个严重的而且同样代价巨大的错误是决定在欧洲部署我们的 SS-20 导弹，这件事使我们与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在欧洲部署中程核武器——或称 INF^②——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并且十分激烈的争论。这一问题直到90年代初签署了一项销毁所有中程导弹的条约后才得以解决。

不幸的是，1968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破裂几乎未引起人们

① SALT, 即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译者

② INF, 即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中程核武器)。——译者

的关注。战略武器的性能和威力正在发生重大的实质性变化,如果当时能够达成一项相互间的协议,这一变化有可能被阻止住。过了很久以后他们才产生了共识,但为时太晚了,已经不能阻止军备竞赛进入另一个阶段,这就是分导式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导弹),多弹头导弹,或者就简称为 MIRN^①。一枚分导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导弹)能够取代多枚战略导弹;它能够增加一个核武器库的进攻潜力而不被另一方察觉。

只是到了尼克松政府时期莫斯科和华盛顿才小心谨慎地同意开始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双方最终认识到必须为放慢耗资巨大而且极其危险的核武器竞赛速度而做些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拒绝对技术发展做出限制,它只愿意限制武器的数量。参谋长们说服了尼克松总统,军方的这种观点构成了美国在限制核武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态度。1968年美国开始试验海神式和民兵式分导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导弹),第二年苏联试验了它的 SS-9 三弹头导弹。这标志着分导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导弹)时代的到来。25年过去后,美国和苏联在1993年宣布,发展这样的武器是一种荒唐行为,它破坏了战略平衡,这类武器大部分应该被销毁。耗资巨大而且极其危险的战略武器螺旋式上升状态就这样停止了。如果我们从葛拉斯堡罗会谈就开始着手限制战略武器,那我们也许就能够阻止或至少大大放慢这一轮危险的竞赛。谁能说得清呢?无论如何,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和苏联外交机构当时对提出这样大胆的建议都没有做好准备。

^① MIRV, 即 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able Reentry Vehicle (分导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译者

第十章

苏联寻求稳定的政策方针

柯西金努力调解越南问题

1967年2月初，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讨论英苏之间的主要问题而出访伦敦。但此行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此。河内曾秘密地请求我们利用哈罗德·威尔逊首相——支持约翰逊越南政策的为数不多的欧洲人之一——领导的英国政府给华盛顿施加压力，以实现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苏联领导层也非常重视这一问题。约翰逊政府方面也渴望利用柯西金在越南问题上进行斡旋。它一直在急切地寻求能够接近河内领导层的国家和个人作为中间人来安排一种解决办法。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将约翰逊写给胡志明的一封信交给了我们，信中提出一项新的建议，即美国停止轰炸北越和集结军队，以换取越南民主共和国保证不再向南越派遣军队。我们得知这一建议已经被转交给河内，但腊斯克抱怨说华盛顿没有得到答复。

根据威尔逊的请求，约翰逊的建议通过莫斯科，由柯西金本人转达给了河内。这意味着威尔逊本人对约翰逊政府的建议持支持的态度。柯西金在给胡志明的函件中附加了一封说明信，以个人的名义劝说胡志明一起来寻求结束越南战争的妥协方案。出于个人地位的原因，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提出这一倡议不太高兴，但不管多么不情愿，他还是让柯西金继续做下去，免得让人认为他是在阻

绕越南问题的解决。

156 在等待越南做出反应期间，约翰逊再次宣布暂停对北越的轰炸。但是，当停止轰炸的期限已到，而北越仍没有做出任何答复时，他拒绝了柯西金提出的延长停止轰炸的期限以等待河内方面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的建议。这样，苏联总理的调停活动便以失败告终，虽然在伦敦的国际新闻界面前，威尔逊——在柯西金的支持下——曾经几次颇富戏剧性地公开请求约翰逊延长暂停轰炸的期限。当柯西金在伦敦出席一次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时，约翰逊传话说他希望苏联总理采用“恰当的措词”来回答提问，以免激怒美国国内越来越好斗的右翼势力。腊斯克试图以一直存在着某种“误解”这样一个难以令人信服的解释为美国恢复对北越的轰炸进行辩解。

柯西金为这一切感到苦恼。他本以为前一年他在塔什干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总理所进行的成功调停会再次重演。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任何进展，这种情况使莫斯科坚信在越南和美国之间进行调停不会取得任何结果。它将通过向河内提供军火来履行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这就够了。不久，腊斯克就越南问题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苏联愿意考虑双方互相“减少”对越南的军火供应的话，美国则可以考虑停止轰炸北越。莫斯科对此建议根本就没有做出反应。

政治局提出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使国际舆论对美国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批评，美国国会也对约翰逊总统可以不受限制地派遣军队的权力提出了质疑，约翰逊“伟大的社会”计划随后亦遭破产。由于造成我们两国之间大多数不幸的原因是一场冒险——这场冒险被看成是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全球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形成稳定关系显然是一种反常的现象。但是，两国

的长远利益不允许苏美关系走上极端，这一点可以通过在本书中首次公开的1967年初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提交的一份重要报告来说明。这份报告构成了我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并且表明了我们为驶过充满惊涛骇浪的外交海洋做出了多大的努力。

在莫斯科，我国领导层试图对苏美关系做出评价，因此指示外交部提出一份能够成为我国未来政策基础的详细分析报告。1967年1月13日，葛罗米柯代表外交部将此报告提交给政治局。这一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不是为了让公众了解或为了进行宣传而准备的，而是供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仅供他们——内部做出评价并批准的，他们的确这样做了。研究苏联政策的人将会认识到——或许带有几分惊讶——这份报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和我们已经公开阐明的政策是一致的。

但是，当时曾认为苏联在实施一项旨在征服世界的计划的那些人以及现在仍然可能持有这种想法的那些人如果那时能够读到这份秘密备忘录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感到迷惑不解的。

157

尽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将北越对南越的攻击看成是共产党人征服世界的总计划的开始，但我们的官方分析却没有为这种军事侵略行为进行过辩护。这份备忘录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它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会取得最终胜利充满了信心——历史证明这种信心放错了地方。但是，那些想找到苏联为推行其社会制度，甚至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而筹划战争的证据的人肯定会枉费心机。

这份备忘录开宗明义地指出：“总的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不符合苏联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要求维持和平。在缓和的状况下，更有利于巩固和提高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

这份文件讲到了外交政策中所有重要的政治和地缘政治问题。文件中表现出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表明了我们在“同帝国主义做斗争”的同时推行社会主义思想的愿望。但是，这份文件强调了苏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并且指出“全球性核导弹战争是否会爆

发完全取决于苏美关系的状况”。

此外,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还被看成是阻止中国领导人的“冒险计划”的一种保障;是中国领导人——而不是莫斯科——认为华盛顿想发动战争。至于苏联,文件指出,“我们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国内问题上,这完全符合列宁的论断,即创造一种新的、极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将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基本保证。”

下面就是莫斯科对美国干涉越南所持的态度:

至于美国侵略越南及其对双边关系产生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应继续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全面援助,以加强其击退侵略的防御能力,同时也不要直接卷入这场战争。我们必须让美国人知道,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升级将迫使苏联向这个国家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摆脱目前局势的唯一途径是在尊重越南人民的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协议。此外,结束越南冲突无疑会对苏美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将为解决某些国际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158

我们不应回避就某些与我们利益相关的问题同美国达成协议,只要这些协议同我们对待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不相矛盾即可。不言而喻,我们应该避免出现我们将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也就是对中国和美国——作战的局面。将苏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将是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诸多因素之一。

外交部的这份备忘录得到了苏联领导层的批准,并且成为约翰逊总统任期内苏联对美外交政策的基石。这份备忘录提出的各项原则成为指导我和我国驻华盛顿使馆工作的基本方针,但是,保持我国与美国的关系以及稳定国内强硬派人士的情绪对我来说仍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六日战争

苏联与以色列的关系史颇具戏剧性,而且彼此都抱有很深的成见。起初,苏联对以色列的态度并不带有偏见。在反对纳粹的战争中,俄罗斯人和犹太人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因此我们彼此相互同情。1947年,莫斯科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甚至先于美国表示同意承认以色列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此后不久,两国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在两国首都设立了使馆。

但是,由于实行了反对犹太人移民,并且把任何移民要求都看成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天堂表示不满的证据这样一种完全错误的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深厚的友好关系逐渐化为乌有。任何人如果轻率地表示想离开苏联都会被看成是对这个国家的一种恶毒的侮辱!更为糟糕的是,苏联领导层没有把苏联犹太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想逃避现有的政治体制到以色列去——问题和像大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以及在战争时期曾担任官职,坐过苏联内务部劳改局的监狱,后来成为作家并且是对苏联制度,特别是人权问题最有影响的批评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这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混为一谈。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及其盟友与犹太人组织或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没有联系,虽然在克里姆林宫的很多人看来,这些人全都混在一起成为苏维埃国家——这是斯大林留下的一大宗遗产——的敌人。

苏联当局禁止犹太人移民的政策致使苏联与以色列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而且引起了美国国内激烈的反苏运动。反过来这又使苏联政府采取了报复行动,进一步坚定了其禁止犹太移民的立场:苏联领导层把对这一立场的任何松动都看成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种让步。结果,任何苏联公民——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得移民,甚至不得以任何理由出国旅行,只有官方批准的商业和文化交流例外。

正如后来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反共政客们——最有名的是

华盛顿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与美国的犹太人组织联合起来,把犹太移民问题变成了踢来踢去的政治皮球。他们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而极力阻挠莫斯科和华盛顿实现缓和。我们最大的失误在于妄自尊大,不允许很多想离开苏联的犹太人移民。如果放他们走,我们几乎不会付出什么代价,反而可以获得很多的收益。与此相反,我国领导层却把它变成了一次意志的较量,结果还是我们失败了。

反对亲犹太人主义在俄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革命时期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一半以上的革命领导人是犹太人,其中包括列宁的一些亲密同事。在国内战争的岁月里或者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都没有出现反亲犹太人主义的情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在长期搜寻敌人的过程中发现了“世界性阴谋”才造成了这一问题。后来的政策也一直是错误的。60年代中期,苏联的反犹太人,特别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倾向发展成为一种对西方国家,尤其是对美国支持苏联犹太人的示威和宣传运动的回击。某些犹太人长期以来直言不讳地要求离开苏联去以色列,再加上某些“被当局禁止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的名气使得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他们在苏联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公愤:为什么在谁都不能出国时他们能够出去?

此外,以色列和美国的战略关系渐渐地变得十分明显;并且受到了苏联政府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强烈批评,尤其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1967年进行了六日战争——它唤起了全世界的犹太人,包括苏联的犹太人的自尊和激情——之后,对以色列和美国关系的批评越来越激烈。自以色列国家建立起来,任何促使苏联犹太人要求移民的动因都莫过于以色列取得战争的胜利,因为它使苏联犹太人相信祖国——以色列国——的安全和长期存在是有保证的。只是到了80年代中期,局势才开始逐渐地正常化,现在实际上已不限制任何人办理出境签证。由于俄罗斯和以色列建立了很多的商业和文化联系,以色列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最频繁访问的国家之一。

六日战争对苏联处理中东问题的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在肯尼迪总统任内以及约翰逊政府执政的第一年中中东的局势一直很紧张，但它没有发展成一场涉及到两个超级大国的严重冲突。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没有就地区性事务正式交换过意见，而且中东问题也不像欧洲和东南亚问题那样在苏美关系日程表上占有显著位置。

1967年春季，中东局势开始恶化。3月27日，柯西金致函约翰逊，要求他制止发生一场军事冲突，并且指出他认为这是约翰逊能够办到的事情，因为，他说，以色列是否做出进攻阿拉伯国家的决定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如果以色列开始采取军事行动，他警告说，苏联政府将向“遭受侵略的一方”提供援助。

6月5日，星期一，以色列开始了军事行动，在埃及要求联合国军队撤离沙姆沙伊赫，有效地堵住了以色列从南方出海的通道之后，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袭击，将埃及空军摧毁在机场上。随后，约旦和叙利亚相继参战。苏联政府宣布支持阿拉伯国家；为使战斗停下来，它指示苏联驻联合国大使呼吁召开一次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呼吁约翰逊总统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约翰逊总统于6月6日答复说，美国正在运用它的一切影响呼吁停止战斗。6月7日，安理会一致同意要求首先实行无条件停火，但是，军事行动仍没有被抑制住。

由于以色列正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莫斯科于6月10日断绝了与耶路撒冷的外交关系。这一举措很不明智。从长远看，这种做法肯定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它实际上使苏联在解决中东问题时不能发挥任何重要的作用。同一天，柯西金通过热线与约翰逊紧急通话，要求以色列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数小时之内无条件停止其军事行动。苏联政府宣布，除非以色列执行安理会决议，否则苏联方面将采取必要的制裁措施。柯西金向约翰逊总统发出的呼吁暗示了苏联甚至可能采取军事行动。这一呼吁引起了白宫的警觉。驻扎在地中海的美国第6舰队奉命急速驶向爆发冲突的地区。

正如约翰逊总统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在形势变得相当紧张的时刻，约翰逊和柯西金通过热线电话进行了一次更为认真的交谈。这次通话使白宫和克里姆林宫有可能控制住日益危险的局势，并且使紧张状况逐渐缓解下来。在形势极其严峻的那一段时间里，约翰逊、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以及他们的主要助手一直呆在白宫的情报室里。在莫斯科，政治局一直在开会。“热线”对保持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不间断的联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防止了一方认为另一方正在极为危险地打算突然采取轻率的行动以支援各自支持的国家。实际上，克里姆林宫确实没有打算对以色列采取任何明确的军事行动。它只是考虑应阿拉伯国家的请求，进一步向它们空运军事装备，而且我们这样做是和西方国家早在战争爆发第二天就开始向以色列提供新的援助是一致的。

6月10日晚，以色列在全线停止了军事行动，并签署了停火协定。六日战争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并且使克里姆林宫陷入了窘困的状态中。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威望由于其保护国的失败而受到相当大的损害，因此它必须制定一项新的中东政策。这项政策再次倒向阿拉伯国家一边，因为苏联领导层想恢复它在中东的地位，防止美国控制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但是，这一政策使我们失去了灵活性，因为我们经常盲目地追随我们的阿拉伯盟国，它们反过来又利用我们扼杀了很多和平解决争端的倡议。

7月17日联合国大会就中东问题召开了紧急会议，苏联和美国代表开始合作，以便达成一项妥协。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努力劝说埃及外长穆哈默德·法齐接受以正式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来换取归还被占领土的妥协办法，但是，法齐的态度非常强硬。由于没有希望达成一项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美国在以色列撤军问题上的立场开始变得强硬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和美国政府中的亲以色列官员——包括阿瑟·戈德伯格

和罗斯托兄弟——游说的结果。联大会议暂时停止，由于意见分歧问题被移交给安理会解决，美国故意拖延了谈判进程。我与戈德伯格多次举行会谈。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草案在我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我向莫斯科做了汇报。

经过同阿拉伯国家政府进行长期、复杂的协商，莫斯科接受了戈德伯格提出的妥协方案，我将此情况通知了他。但随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突然坚持说他没有提出任何方案；那种说法完全是“令人遗憾的误会”。我一直保留着一页笔记，上面记载着戈德伯格亲笔写下的他所提出的妥协方案的内容。我把这页笔记拿给腊斯克看，腊斯克承认这是那位大使的手迹。但是，戈德伯格说他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写过这些文字，腊斯克则在暗中支持他。

盛怒之下，莫斯科通过柯西金给约翰逊发出了一封电报，要求在更高级别上举行对话。1967年11月22日，我们终于通过了安理会第242号决议。根据这项决议，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应该以被占领土换取安全保障，即后来所说的“以土地换和平”。

162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隐藏住一个事实，即在此后的许多年里，苏联实际上被排除在中东外交之外。勃列日涅夫逐渐认识到我们的一边倒政策走得太远了。我私下与他谈过多次，竭力使他相信苏联1967年和以色列断绝关系是错误的。许多人并不知道，70年代后期，勃列日涅夫曾经提出过一项逐渐恢复与以色列关系的建议，并要求首先恢复两国间的磋商。政治局同意责成外交部审查这一问题。但是，葛罗米柯和苏兹洛夫当时正在休假。他们度假回来后强烈反对对我国政策做任何改变，除非中东问题得到彻底的和平解决。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做出让步。有一段时期，葛罗米柯对我所起的作用很是恼火。只是到了80年代中期，局势才开始趋于正常，苏联恢复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这实际上等于承认苏联在1967年断绝同以色列的关系是错误的。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

柯西金出席联合国大会为他与林登·约翰逊——他仍然希望借助莫斯科的力量与河内开始谈判——举行最高级会谈提供了一个意外的机会。约翰逊总统同时还特别希望使苏联政府牢牢记住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危险性。

美国人得知柯西金将要来纽约之后立即提出了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建议。出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双方就会议的地点问题进行了数日的讨论。约翰逊总统通过汤普森大使邀请柯西金访问华盛顿。已经抵达纽约的柯西金立即征询政治局的意见。苏联领导层，特别是柯西金的对手勃列日涅夫对此做出的反应相当冷淡。莫斯科一方面表示举行一次会谈是可行的，一方面又发出一封电报说举行会谈的地址必须“在纽约，最起码也应在纽约周围，同时应明确表示约翰逊将来此拜访苏联总理，而不是 A. N. 柯西金去总统那里进行会谈”。

约翰逊理解柯西金不愿去华盛顿的原因——“他考虑的是阿拉伯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更别说北京的反应了，”他对汤普森这样说。但是，总统本人同样对外交礼节很敏感，所以他拒绝去纽约会见柯西金。

163 后来美国方面建议在新泽西州的麦圭尔空军基地举行会谈，从曼哈顿开车去那里大约需要1小时。柯西金断然拒绝在任何军事基地举行会谈。经过认真的考虑，在新泽西州州长理查德·休斯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一个折衷办法，决定在距纽约60英里远的一个名叫葛拉斯堡罗的小学院城举行会谈。

葛拉斯堡罗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小城镇。学院院长托马斯·罗宾逊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他为这一不平凡的事件以及新闻界的极大关注而激动不已。最高级会谈结束之后我和他进行了交谈。当我提出来了这么多人可能会给学校的建筑或财产造成一定

的损失时,他说情况恰恰相反。他对苏美最高级会谈在他的学院举行感到非常的高兴。院长承认政府除了进行广泛的宣传以外,还出资对学院房屋进行了彻底修缮,并且另外安装了电话线。学院本身根本不可能负担如此大的开支。总而言之,他对客人表示毫无保留的欢迎。

柯西金在葛罗米柯和我的陪同下,于6月23日上午11时稍过,便从纽约到达了总统的住处。严重的交通阻塞使我们在路上耽搁了。那是一个炎热潮湿的夏日,大楼外面有一大群当地居民、记者以及其他一些好奇的人们在等待我们。他们已经等待了好几个小时,渴望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小贩们在卖着热狗和冷饮,我国总理饶有兴趣地观看着这幅典型的美国风景画。

约翰逊总统在其下榻寓所的走廊欢迎柯西金。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邦迪及沃特·罗斯托陪同总统一起在此迎接。会谈即将开始之前,他们和总统夫人以及柯西金的女儿一起合影留念。当约翰逊和柯西金发表讲话时,人群中爆发出热情的掌声。这一场面再次被拍了下来。最后,全体与会人员进入室内。

约翰逊建议先进行一次只有翻译人员在场的短暂的单独会谈。柯西金表示同意。其余的人坐在另一间屋里,一边交谈一边等待两位领导人会谈结束。他俩谈得非常投入,以至于原先安排的“短暂会谈”一直持续到吃中午饭的时候。

柯西金在会谈开始便对美国的政策倾向提出质疑。他指出美国政策目前致力于实现军事目的:军费开支大幅度增加,扩大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以及使中东的军事形势出现恶化。他警告说,美国已展开了一场其他国家必定会加入其中的军备竞赛,这一切可能使整个世界面临核战争的威胁。

约翰逊对此表示异议。他有些激动地说到,美国丝毫不想造成一种可能会导致战争的局面,不管它的政府过去做过些什么,其动因都是为了提高其防御能力,而不是为了提高其进攻能力。他又说,他把美苏关系看成是最重要的问题,并且采取了一些具

体措施和平地发展两国关系，而且他一直希望避免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

柯西金“注意到了”约翰逊做出的保证。在随后两天的会谈中讨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主要议题是越南问题、中东问题及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然而在这些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柯西金特别重视战后中东问题，强调应通过联合国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约翰逊并不打算为以色列的政策辩护，而是重申美国赞成以色列撤军，以此换取对该地区所有国家领土完整的保障。

约翰逊最为关心的是越南问题。双方再次就轰炸北越及美国军队撤军问题重申了各自的立场观点，约翰逊政府紧接着直接了当地问道，一旦美国与越南人开始谈判，苏联是否能够帮助美国。他希望我们在解决越南问题时充当第三者的角色，这样就可以使美国撤出它的全部军队。

柯西金没有就此做出承诺，因为他没有得到授权。他只是说美国和北越应该直接谈判。（当柯西金向莫斯科汇报会谈中的这部分内容时，他承认他本人不敢肯定河内是否打算谈判，即便美国停止轰炸北越也罢。）

在会谈的第二天，约翰逊带来了一项新的建议。该建议不再要求北越人做出在南越停止军事行动的保证。他说如果河内愿意立即开始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将停止空袭。

柯西金根本不了解北越领导人的态度；他们正在打自己的算盘，很少让我们知道他们对达成一项合理的妥协方案到底持什么看法。所以，柯西金只好坚持苏联的立场，即除非美国停止轰炸北越并从南越撤出其武装力量，否则冲突将不可能得到解决。（大约一个月后，腊斯克询问我们是否得到了河内方面就约翰逊在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上提出的开始谈判的建议所做出的反应。我回答说河内已经拒绝了这项建议，理由是驻在越南美军部队仍在不断增加。后来我从哈里曼那里获悉，虽然华盛顿想进行谈判，但是只要河内拒绝谈判，美国将继续集结其军事力量。）

于是,双方显然陷入了一个可悲的恶性循环之中,虽然我能够促使对它实行重要的军事上的限制:我提出在越南是否会爆发原子战争的问题,并且得到哈里曼以及其他一些总统身边的人做出的保证,即约翰逊不会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或入侵北越。莫斯科知道这些私下做出的保证,尽管它们从未被正式公布过。

在与柯西金会谈时,约翰逊对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明确表示他宁愿将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时间向后推迟。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公众,一种办法就是宣布将很快与苏联代表就此问题交换看法,比如说,在一个星期之内。他准备派麦克纳马拉去我们希望他去的任何地方,而且麦克纳马拉将得到讨论全面削减军事预算的问题的授权。约翰逊总统说他已经将决定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时间推迟三个月。将此会谈公之于众将有助于他继续抵制军方及其在国会中的同盟者施加的沉重压力。

柯西金在回答中阐述了苏联的基本观点,即,从理想主义的观点出发,冻结防御性武器的最好办法是削减进攻性武器或一揽子讨论裁军问题。为了驳斥约翰逊在反弹道导弹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捍卫自己的立场,他险些发起脾气(发生这种事是很反常的)。他声音宏亮、语气坚决地说道:“防御是合乎道德的,侵略则是不道德的!”不过他并没有就拟议中的会谈给约翰逊一个明确的回答,因为他需要得到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同意,而且他知道莫斯科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

约翰逊提出让麦克纳马拉作为他的主要代表参加会谈并不是偶然的。在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开始前两天,麦克纳马拉告诉我让他与约翰逊和柯西金私下单独谈话将是非常有益的。他说他准备带来最新的美国秘密科学和军事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证明反弹道导弹系统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我问柯西金他是否打算听麦克纳马拉的陈述,他回答说可以。在最高级会谈的第一天,麦克纳马拉一直紧张不安地等候在接待大厅里。但约翰逊始终没有召他进会议室。中午,约翰逊设宴招待柯西金,邀请下至礼宾官的全部陪

同官员参加。总统看见了麦克纳马拉,突然想起他的承诺,于是建议麦克纳马拉当场介绍他的想法。麦克纳马拉对此没有准备,因为在场的许多人并没有得到接触他在情报介绍中将透露的那些秘密材料的安全许可。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他已经提出要向两位领导人秘密介绍情况,以免使他的立场公之于众。否则的话,那些正在逼迫政府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人肯定会对他进行公开指责。

麦克纳马拉被搞得有些慌乱,不安地开始整理他的文件,试图从文件夹中选出最不保密的图表和表格。他的主要论点是,进行一场防御性武器军备竞赛只能加速进攻性武器的发展,以便突破更为复杂的防御体系,这样就会破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十分脆弱的核威慑力量平衡。但由于他的汇报是临时重新组织的,所以缺乏连贯性,没有说服力,不能引发人的兴趣,事实上,那天晚上柯西金对我说,他对麦克纳马拉的谈话感到失望。他在吃晚餐时对麦克纳马拉的谈话进行了一番评论,指出苏联在莫斯科和塔林周围建立的导弹防御系统旨在保卫苏联公民的生命安全,我们首先应该就减少战略体系内的进攻性导弹达成协议,而不是通过谈判取消导弹防御系统。

尽管转天约翰逊试图提出让麦克纳马拉做情况介绍以弥补他处理问题的愚笨,但是,柯西金不准备就反弹道导弹问题开始谈判;当时莫斯科首先寻求的是在战略性进攻武器方面取得核平衡。

9月中旬,美国政府宣布打算部署一个部分反弹道导弹系统。腊斯克向我陈述了三个理由:第一,设计有限系统是为了抵消中国的核威慑,对我们两国之间相互的核威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第二,国会和共和党正在指责约翰逊“缺乏主动性”;第三,美国建议就此问题进行讨论,但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就这样,苏联政府错过了这个历史性的机会,反而做出了在莫斯科和塔林周围加速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反应。直到几年之后下一届美国政府执政时才开始进行这场谈判,事实证明这些谈判进行得很困难。我确信当时我们有可能就反弹道导弹问题与约翰

逊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特别是在他宣布不再竞选下届总统的决定之前。我们本可以避免一场使苏美关系的其他领域蒙受损失的争吵。然而,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首次促成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些谈判最终使双方于1972年缔结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这次会谈还导致苏联和美国在1968年共同提出了一项联合国决议,这项决议转过来又使这两个超级大国和其他60个国家一道于7月1日签署了防止核扩散条约。

总的来说,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进行得很顺利。约翰逊是一个不错的东道主。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并进行了周密的论证。会谈全部结束时,他表示希望一年至少举行一次这样的苏美最高级会谈。柯西金讲话不多,但其讲话条理分明,态度明确。他向政治局报告说:“约翰逊和他的助手们对我们十分友好,十分重视我们的意见,并极力表明他们迫切希望找到解决重要问题的办法。”

167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显然没有产生具体的结果,这一事实也可以用会议召开得太仓促来解释;由于会议安排得过于草率,所以很难期望它会取得重大的进展。但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是不具备在任何重要的问题上获得突破性进展的真正的潜力,而且勉强出席会谈的柯西金并没有从政治局得到就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就反弹道导弹问题进行有建设性谈判的指示,而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却希望在这一问题上有所收获。柯西金最为关心的是让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逼迫它从六日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上撤退以及美国撤离越南问题。葛拉斯堡罗会议也是唯一一次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没有出席的最高级会谈,勃列日涅夫不太愿意促使柯西金取得成功。但是,这次会谈确实使政治局找到了一个比较稳妥的接触约翰逊的办法。遗憾的是,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再也没有举行过最高级会谈。

第十一章

林登·约翰逊的下台

越南战争变成了“约翰逊的战争”

1968年伊始，战争成了华盛顿谈论的话题；在所有的官方会议、外交会谈以及社交场合中，人们谈论的大都是这场战争。肯尼迪政府留下来的人纷纷离职而去。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1967年底告诉我他打算辞职，去担任世界银行行长。他直截了当地说他太累了，再也不愿意与他的高级将领们打交道了。越来越多的总统助手都在想方设法摆脱自己与政府在越南奉行的灾难性方针的干系。只有总统本人因在越南采取的冒险行为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而承受着指责，虽然制定这些政策时一直有人在支持他。

最初已决定放弃对本党在位总统进行个人政治挑战的罗伯特·肯尼迪告诉我，他正在“痛苦地思考着”是否同约翰逊竞争总统职位。1966年他竞选代表纽约的参议员并取得了胜利，但是1968年3月16日，也就是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在新罕布什尔民主党总统预选中以反战的纲领赢得了42%的选票，从而使约翰逊总统在政治上大失脸面的四天之后，肯尼迪宣布他将竞选总统，不料刚过三个月，他便在加利福尼亚参加竞选活动时遭到暗杀。这使得副总统赫伯特·H.汉弗莱成为最有希望获得提名的人选。

实际上，很久以前——即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以及肯尼迪前三届政府执政期间——就已经埋下了干涉越南问题的根子，虽

然前几任总统很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在这一地区为了“把越南从共产主义制度下挽救出来”而采取的政治、军事及心理行动造成的最终结果。约翰逊继承并且发表了这一方针，却没有注意它们产生的后果。起初，美国两大政党都赞成军事升级政策，尽管到了1968年，很多自由派民主党员转而开始反对这一政策以及约翰逊本人。共和党人——包括将要接替约翰逊入主白宫的理查德·尼克松和当时担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在尼克松之后担任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顽固地支持对越南轰炸的不断升级，尽管他们提出了一项限制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的政策——即著名的“越南化”政策，以此表明美国军队的惨败与他们没有关系。对于约翰逊而言，这一切的结果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越南战争变成了约翰逊的战争。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哈里曼气愤地告诉我：“很难相信，经过几年的战争之后，约翰逊竟没有一个摆脱这场战争的明确计划。”哈里曼还说，约翰逊也没有制定改善对苏关系的战略方针，只有三个接近总统的人了解苏美事务中的某些问题：他们是汤普森、哈里曼本人以及查尔斯(奇普)·波伦大使——此人于1968年初回国担任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富布赖特告诉我，约翰逊的一些政治顾问正竭力说服他对北越正式宣战，而富布赖特则极力劝说约翰逊不要那样做，因为无论如何都很难使国会通过这一提议。这些顾问们争辩说，对越宣战将会使这场战争变成一个爱国主义问题，而且最终将使约翰逊赢得总统选举。约翰逊对此举棋不定，一直在征求他的老朋友们的意见。富布赖特把这一计划称为冒险主义。

1月5日，我和腊斯克进行私人会谈，对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他首次正式提出了一项关于两大对立阵营各自削减其军事力量的建议。根据这项建议，美国将大幅度——他将这个词重复了两遍——削减它在欧洲的军队，如果苏联也打算这样做的话。此外，美国将不会把从欧洲撤下来的军队派往越南，这样，中国就不会批

评苏联签署这项协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议。我立即向苏联领导层做了汇报。早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苏联领导层就已经提出过削减驻德军队的类似建议。但是，这一次苏联领导层却没有做出答复。正如我后来所得知的那样，苏联政府对苏联大规模撤军后能否维持东欧的稳定没有把握，而且它怀疑腊斯克的建议是专门为了削减苏联驻东欧的军队而故意提出的。

我们再次进行会谈是在2月份。腊斯克就我们最近抗议美国多次轰炸苏联在海防港口的船只做出了答复。他向我保证那都是些偶然事故。他再次希望利用我们作为中间人，以了解“河内最起码的想法”；这或许会使完全停止轰炸成为可能，约翰逊总统总不能“不明不白地”停止轰炸吧。他回顾了普韦布洛事件，当时北朝鲜人在他们的海岸线俘获了一艘美国船只，在我们的安排下，全体船员获得释放，那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还提到塔什干^①，在那里苏联充当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调停人。腊斯克最后直言不讳地说道：“为什么莫斯科这次不能再安排一次解决越南冲突的塔什干会晤呢？”

我怎么可能告诉他越南人将不会接受我们或其他任何人的调停呢？所以我只能重复我们说过好多遍的话，即这件事需要由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通过谈判加以解决。莫斯科对这次会谈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它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

事实上，莫斯科对北越领导集团内部就继续进行战争还是结束战争的战略方针可能产生的分歧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从表面上看，北越领导集团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波兰大使耶日·米哈伊洛夫斯基对我讲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他被任命为驻华盛顿大使前，他曾在越南和老挝国际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是根据日

^① 1965年9月6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因克什米尔纠纷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激烈的战斗进行了17天后停止。在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调解下，印巴两国总理于1966年1月4日在原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会晤。经过谈判，双方就解决武装冲突及恢复和平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塔什干宣言。——译者

内瓦协议建立起来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当时仍经常访问河内。1968年2月,根据波兰政府的指示,他被派到越南,向他在那里结交的很多朋友了解第一手情报。在私下会谈中,范文同总理明确地对他说,由于战争进行得越来越艰难,他倾向于考虑承认南越成为“类似柬埔寨一样”的中立国,尽管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他的“内心想法”,而不是整个领导层的决定。其他与米哈伊洛夫斯基谈过话的领导人则仍旧坚持美国必须撤出南越的观点,这也是北越人在莫斯科一贯重申的政治方针。他们敦促我们在与美国打交道中支持这一方针。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辞职策略未能奏效

在这种越来越糟糕的形势下,我意外地被邀请于3月31日下午6时——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间——到白宫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会谈。我被带到二楼的总统起居室,这就更是非同一般。约翰逊夫人端给我一杯咖啡,并说总统很快就会回来。不久总统走了进来。他看上去面容疲惫,而且紧张不安。

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总统告诉我当天晚上他将就越南问题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但是在讲话之前,他想把他个人的打算以及为了减少在越南的流血已经采取的措施向苏联政府做一些额外的说明。他希望他采取的措施能够开创和平进程。接着,他首先从苏联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角度,其次从苏联作为日内瓦协议两主席之一的地位的角度,向我们发出呼吁。他说:“我们期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解决这一问题发挥积极的影响。”

171

随后,约翰逊总统告诉我他正在采取使冲突降级的第一个步骤,这就是单方面大规模减少军事行动——包括空军和海军的军事行动。有90%的北越人口及大部分领土将不会受到轰炸。即使继续进行的轰炸——它的规模也将大规模降低——也可以在很短的

时间内停止,如果河内对华盛顿的克制态度也做出克制反应的话。

约翰逊说:“我请求日内瓦会议两主席竭尽所能将我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演变成真正的和平。我准备派我的代表出席任何会谈。我任命哈里曼作为我的个人代表去参加这样的会谈或讨论。我希望胡志明将做出积极的反应。”他确信苏联政府对解决这场冲突可以起到不同凡响的作用,在塔什干充当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调停人的事实说明苏联具有潜在的影响力。

他说,他并不打算非要用军事手段解决越南问题不可,此外他意识到了苏联在防止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军事冲突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即使在目前进行越南战争的困难时期——这场战争使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疏远了——他也在尽力与苏联维持最低限度的正常关系。“我将继续坚持维护美苏关系的方针,”他说,“我希望苏联领导层持有同样的观点。”

最后,约翰逊强调说,苏联对越南问题负有特别的责任,并且起着特殊的作用。“如果不是你们的支持,我们的对手不可能坚持那么长时间,你们的支持使他们应付自如。但是,我们欣赏你们的原则立场。现在我们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对此并不是无动于衷,绝对不是的。我们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可能会犯——而且显然已经犯了——某些错误。但为了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我们现在的确准备进行认真的对话。请把这话告诉莫斯科。我急切地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毫不拖延地认真考虑我的建议。”

当然,这显然是请求苏联政府帮助结束发生在越南的这场军事冲突,然而基本上还要按照总统提出的条件。我对他所提到的措施中不包括全面停止轰炸表示遗憾。约翰逊立即紧张地回答说,他不能听任驻扎在南越,特别是驻扎在非军事化区附近的美国驻军和据点受到在那一带作战的大约5个北越师的蹂躏。如果美国军队被北越的那几个师消灭将会在美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应,美国将难以保持态度,它必定要动用在越南的全部军事力量。总统说,他

不希望事态朝那个方向发展，所以他不得不将轰炸局限于军事化区以北的那一块地区，尽管这种轰炸也将保持在最低限度上并且纯粹是为了军事目的。“我别无选择，”他情绪消沉地说。

当我们分手时，他把电视讲话的文本交给了我。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对约翰逊总统、对这个国家的命运将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随后我去了白宫西楼拜访了沃尔特·罗斯托，与他讨论了一些日常事务。我们一起呆了大约一个小时。

当我离开他的房间，沿着走廊走出来时，我碰见了约翰逊总统。总统叫住了我。他犹豫片刻之后说道，他想非常秘密地告诉我，在电视讲话结束时他打算宣布他将不再竞选下一届总统职位了。他希望他做出的退出竞选的这一艰难决定将有助于平息竞选期间围绕越南问题进行的激烈论战，有助于解决整个越南冲突。

“我想向他们表明，我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迷恋权力。我想用我的余生为国家服务，而不是为党派服务。”约翰逊说道。

总统又说，我是第一个得知他的决定的外国人，到目前为止，只有四五个美国人知道这件事，其中包括他的夫人。约翰逊说起话来显得很艰难，几乎掩饰不住他的伤感。他的气色很不好。显而易见，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他经过了长时间的痛苦思索。他想必已经认识到，由于这一决定是在距他的总统任期届满差不多还有一年之前做出的，因此在剩下的一段执政时期内他对国内外事务的影响力必将大大下降。看来，这是一个绝望的举动，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尝试，其目的是为了向那些指责他残酷地进行战争纯粹是为了保全他自己的面子并确保他再次当选的人们证明，他准备以牺牲再次担任国家最高职位为代价平息公众的不满，进而努力使越南问题得到体面的解决。

总的看来，约翰逊能否在下届总统选举中获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怀疑。事实最终表明越南战争是一座陷阱。实际上，约翰逊试图通过宣布拒绝当总统候选人来放松紧张的神经——他的神经显然已紧张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他看上去非常像是一个

做出了艰难、重要然而又是痛苦的决定之后感到浑身轻松的人。

173 晚上9点,约翰逊在白宫的书房向全国电视观众发表了放弃参加竞选的戏剧性讲话。他的家庭成员在现场陪伴着他,但他们站在镜头外边。演说的第一部分并没有使全国7500万电视观众感到惊讶。只有少数知道他做出戏剧性决定的白宫官员和我怀着极大的不安等待着他演讲到最后部分。他停顿了片刻,似乎是在坚定他的决心,然后向美国公众宣布,他既不打算再次竞选,也不接受本党提名他作为下届总统的候选人。

这次电视讲话引起了轰动。事实证明,越南问题对约翰逊的总统生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此外,第二天去芝加哥出席全国广播协会的一次会议时,他在讲话中神经质地指责该协会成员要对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负责。总统宣称他们鼓动起整个国家来反对他。不用说,这次讲话没有给他带来荣誉。

从个人角度说,我对约翰逊总统做出的决定感到惊讶。莫斯科也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决定使预计将同约翰逊举行的最高级会谈几乎变得毫无价值了。从另一方面讲,约翰逊的这一决定更加坚定了北越领导人战斗到底的决心,尽管他们仍然希望美国人在真的开始谈判时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美国商业界把约翰逊的讲话看作是一项破产声明,它表明约翰逊承认他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越政策失败了。股票和商品市场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一时间约翰逊甚至重新赢得了他以往的声誉,虽然反战运动仍在激烈进行着。

第二天,我应哈里曼的邀请,与他共进晚餐。我们进行了热烈的交谈,谈话内容很自然集中在总统做出的那项令人惊讶的决定上面。哈里曼认为这项决定不是一个政治计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最终决定,尽管做出这一决定是非常痛苦的。他在那天早些时候已经得知,只有总统的妻子伯德夫人、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腊斯克以及新任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事先得到了通

知。甚至连罗斯托和哈里曼都不知道。哈里曼惋惜地说，要不是越南战争的纠缠，约翰逊很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

哈里曼认为约翰逊做出不谋求连任的决定将会促使汉弗莱参加竞选。然而他当选的可能性并不大。他不会得到全国和党内的广泛支持。由于汉弗莱“不只是百分之百，而是百分之一百三十地”支持约翰逊的对越政策（哈里曼说：“这是他为了表明忠于总统而采取的夸大其辞的说法），所以他失去了党内自由派的支持。与此同时，他也没有赢得党内具有影响力的保守派人士的支持。哈里曼怀疑约翰逊是否真的会支持汉弗莱，尽管出于面子，他很可能说一些支持他的副总统的话。那天早些时候，约翰逊本人已告诉哈里曼他不愿为支持汉弗莱而使自己卷入党派斗争或竞选活动。哈里曼从上述情况中发现了一个积极因素，那就是不管谁在11月当选，他确信“顽固的腊斯克”和罗斯托都将被迫辞职，他认为他们是“美国的拉斯普廷”。^①

174

几天后，哈里曼通知我河内已同意与美国开始进行谈判；他将在赛勒斯·万斯协助下代表美方参加谈判。北越人显然想通过试探美国政府来确定约翰逊做出不竞选总统这一决定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是，因为双方都没有改变立场，在巴黎举行的这次谈判从一开始就陷入僵局。

当莫斯科向河内询问有关情况时，河内回答说，在美国继续轰炸越南的情况下，此次谈判不可能取得成功；但如果轰炸停止，它的立场可能会变得更为灵活一些。莫斯科再次误入歧途，虽然苏联领导人完全知道试图在河内和华盛顿之间进行调停是毫无意义的，扮演那个角色的确是毫无意义的。

7月15日，我奉命将柯西金的一封信函转交给了约翰逊。信中说：“我的同事和我都相信——而且我们的信念不是凭空产生

^① 拉斯普廷（1872？—1916）是沙皇时代的一个农民“神医”，因治好了王子的病而得宠于沙皇尼古拉二世，后因干预朝政被保守派谋杀。——译者

的——美国完全停止轰炸以及其他一切军事行动可以彻底扭转局势，并且可以在巴黎谈判中为和平解决……开辟新的道路，那里的谈判至今仍未取得任何进展。”

白宫在起草约翰逊的复函时，对柯西金的来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约翰逊复函的核心内容是美国政府认为不可能全面停止轰炸。哈里曼告诉我，克利福德、万斯和哈里曼本人坚持要求对柯西金的来信做出积极的答复，而腊斯克、罗斯托和邦迪却拼命反对。美国政府做出的这一反应降低了莫斯科原本可能充当调解人的热情。巴黎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汉弗莱谢绝莫斯科提出的帮助他竞选的秘密建议

4月23日，在白宫举办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休伯特·汉弗莱私下告诉我，他打算在总统选举中碰碰运气，并且很快就会宣布参加竞选。汉弗莱说，他一直认为美苏关系是影响到战争与和平前景的主要因素，而且他一直在努力改善美苏关系。他要我把他的话告诉莫斯科，附带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表示他个人的问候。几天之后，苏联领导层指示我向他表示祝愿他竞选成功。莫斯科认为，就与华盛顿的关系而言，汉弗莱将可能成为当时最好的总统。

在谈话中，汉弗莱饶有兴趣地回忆了他对苏联的一次访问；那次访问变成了狩猎探险。在莫斯科，他对我国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提起他非常喜欢打猎。酷爱狩猎的格列奇科立即建议他们一起去打野猪，汉弗莱同意了。汉弗莱对我说，当他们来到狩猎的山林小屋时，格列奇科招待他吃了晚餐。元帅提议为约翰逊总统，为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为他们两位的夫人，为改善苏美关系，为他们的部长们的健康，为部长夫人们的健康，为狩猎成功，等等干杯，每一次祝酒后格列奇科都坚持要汉弗莱喝干杯里的酒。总之，他们为打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汉弗莱能够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格列奇科的将军们小心翼翼

地伸手搀着他走进卧室，“在打猎前稍稍休息一会儿”。第二天早晨汉弗莱醒来时，他们郑重地递给他一件纪念品，并且称这是格列奇科和他捕杀的野猪头。后来，这件纪念品被送上了汉弗莱的飞机。

在竞选总统的活动中，汉弗莱曾经寻求肯尼迪家族的支持。特德·索伦森告诉我，只有汉弗莱的确表示反对轰炸北越，并且赞同在南越组成一个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在内的联合政府，肯尼迪家族才会支持他。汉弗莱回答说，尽管他赞成这项政策，但他不可能公开表示这种意见，因为他是现政府中的一员，此外，像这样改变立场将会在民主党候选人提名大会上遭到排斥。总而言之，索伦森说，汉弗莱的处境极为糟糕。

这种情况所导致的一种极为荒谬的后果是，只要北越能够促使巴黎谈判取得某些进展，它就有可能使汉弗莱在竞选中获胜，帮助他当上总统。这种情形在很多方面与吉米·卡特的遭遇相似，卡特能否连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人对待美国人质的态度。人质危机是卡特竞选连任时始终存在的问题。

在一次喧嚣吵闹的民主党大会——这次大会痛苦地表明了战争给美国社会造成的创伤——上，汉弗莱获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此后，他在8月份对我说，约翰逊并没有向他提供明显的支持；总统遵循他所做的保持中立的承诺，不介入竞选活动。但是，约翰逊就这场战争做出的公开声明也使得汉弗莱在越南问题上无法采取较为灵活的立场。“我甚至不知道约翰逊究竟愿意让谁担任下届总统，是尼克松还是我！”汉弗莱讥讽地说。由于他在本届政府中干了四年，所以他和政府，尤其是和越南问题的关系是清清楚楚的，事实证明这将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对他产生致命的影响。

在莫斯科看来，汉弗莱肯定是比理查德·尼克松更可取的人选，后者已经把反共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并且被认为是一个极端反苏的人。我们领导层越来越担心尼克松会在选举中获胜。结果，苏联最高领导人采取了一个苏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非常举措，即在竞选活动中向汉弗莱秘密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包括财

政援助。

我收到了葛罗米柯亲自给我下达的绝密指示，但我竭力劝他不要搞如此危险的冒险行动——一旦被发现，它肯定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使汉弗莱必败无疑，更不用说它会给苏美关系造成多大的麻烦了。葛罗米柯简单地回答说：“已经做出决定了，你执行吧。”

不久之后，我恰好去汉弗莱家与他共进早餐。我们很自然地谈起了竞选，所以我试图借此机会尽可能巧妙地执行给我下达的命令。我先是问他竞选活动进展如何，然后运用外交辞令将话题转到他的竞选经费问题上。我必须承认，汉弗莱不仅是一个非常理智，而且是一个非常机敏的人。他马上明白接下去要发生什么事了。他告诉我，对他来说，得到莫斯科良好的祝愿——对此他十分感激——就足够了。事情得到这样的解决使我们俩人都感到释然，此后我们再没有讨论过这件事。

这件事以前从未被披露过。由于美国总统选举对苏美关系具有潜在的影响，所以，政治局对此一直密切地加以关注，并且通常持有某种倾向，但极少表现出来或通过提供外交或其他方面的帮助来支持某位候选人。就我所知，这是莫斯科唯一一次试图直接介入竞选，帮助一位自己偏爱的总统候选人——结果是一无所获。

大使们当然有责任对一场选举可能出现的趋势及时提出意见。尽管我尽力做出可靠的引导，但是我认为自找麻烦做出肯定的推断不仅不必要，而且不明智。我们一位驻伦敦的同事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在哈罗德·威尔逊首相落选离职——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失败是出乎意料的——前不足一个月时，他告诉莫斯科接受他进行选举前的访问是没有风险的。这位大使因提出了这一轻率的意见而被解除了职务。

约翰逊迫切希望举行最高级会谈,布拉格事件使之化为泡影

177

自从约翰逊宣布放弃在白宫再当一任总统之后,他便令人不可思议地开始为与柯西金再进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展开了活动。7月2日,即签署防止核扩散条约后的第二天,腊斯克要我向柯西金报告,总统有意举行一次会谈,而苏联方面却认为没必要举行会谈。

莫斯科面临的问题是它不相信和即将离职的总统能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尽管约翰逊试图将自己置于政治斗争之外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他错误地希望他将因此而被看成是一位更有价值的对话者。此外,不仅是我国的领导层无法断定是否能够就重大问题做出任何决定,而且勃列日涅夫也不想再给柯西金一次在国际事务中表现自己的机会。约翰逊一直是和柯西金,而不是和勃列日涅夫进行通信联系的,这种情况使得勃列日涅夫很难接受约翰逊提出的和他的对手进行会谈的请求。

出于这些原因,莫斯科迟迟不做答复,但它又不想直截了当拒绝这一建议。情况一直让人捉摸不定,也让我相当难堪。腊斯克一再问我柯西金的答复是否到了,而我不得不一再告诉他还没有到。

7月份共和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尼克松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非正式请求,苏联政府对此表示同意,这就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了。我受命将此情况通知约翰逊和汉弗莱,我决定请腊斯克披露这一新闻。腊斯克十分沮丧地说,如果莫斯科准备接待尼克松——他指出尼克松“还没有当上总统”——那它也应该同意与仍然是美国总统的那个人进行会谈。他补充说他自己是在开玩笑。而约翰逊却的确是认真的。总统愿意去日内瓦、甚至愿意去列宁格勒,腊斯克请求只要莫斯科对总统提出的举行会谈的建议一做出答复,我应亲自直接给他打电话,“无论何时,无论是往办公室还是往家里”。10天之后,腊斯克再次问我是否收到了对总统发出的那封“极为重要的秘密信函”的答复,然后他对在过去两周内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表示不满,他原本指望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能够收到一个“起码是出于礼节”而做出的答复。

我又一次无言以告。我把我和腊斯克的谈话向莫斯科做了汇报,并且指出有必要以某种方式做出答复,因为这影响到约翰逊个人与莫斯科的关系,而且他至少在未来六个多月内仍然掌握着权力。

178 7月25日,当我把柯西金建议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内举行核武器谈判的一封信函交给腊斯克时,他再次问我:“嗯,主要的问题怎么样了?我能对约翰逊总统说些什么呢?”

我回答说,我还没得到莫斯科就与约翰逊会谈下达的指示;这一回答显然使腊斯克很生气。国务卿对我说,在尼克松和约翰逊最近进行的一次会谈中,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极为秘密地”告诉约翰逊他打算访问莫斯科,约翰逊回答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腊斯克不无讥讽地补充说,约翰逊至少对先从我这儿得知尼克松要访问莫斯科,而不是先由尼克松本人告诉到他这件事感到满意。

与此同时,我还非正式地从国务院那里获悉,约翰逊很乐意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限制战略武器的第一阶段双边会谈。虽然约翰逊显然是急于提高他的国际声望,但是国务院对他亲自参加这些技术性谈判反应冷淡。

8月15日,腊斯克再次提醒我说,总统仍在等待对他提出的举行最高级会谈的秘密请求做出答复,于是我又一次给莫斯科发出紧急电报,要求给予回答。这次我大胆地向政治局提出了我个人的意见,即我们的沉默越来越使人尴尬,而且正在超出正常外交关系的界限。

两天之后,终于传来了邀请约翰逊访问莫斯科的肯定答复。腊斯克非常高兴,随后他对我讲了他本人对尼克松及其政策的看法。他预言道,尼克松将会小心谨慎地避免同苏联进行任何对抗,尽管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主动为促进两国关系而采取任

何措施。尼克松支持加强美国的武装力量,但是,根据他在访问得克萨斯约翰逊的一个农场时对约翰逊所说的一番话来判断,如果他当选,他将继续和苏联进行战略核武器会谈。这不是一位“新尼克松”——像他正在广泛标榜的那样——腊斯克说,因为他在信仰上是一个天生的保守主义者。但是,他开始意识到随着世界的变化,对国际问题需要采取新的处理办法。腊斯克说,尼克松究竟对这种变化有多深刻的认识以及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则是另外一回事,还需要等等看。实际上,尼克松和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顾问及执行者基辛格比腊斯克和约翰逊更能适应这些变革。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对地缘政治的上述看法和精心做出的政治分析都被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彻底推翻了。1967年,随着反对斯大林主义在文化、政治、经济及其他诸多方面进行统治的情绪不断高涨,在布拉格,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为首的一批改革者们试图提出他们的“有人性的社会主义”观点。不幸的是,“布拉格之春”恰好遇上了苏联保守主义势力加强其国内统治政策的时候。

179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使该国和华沙条约组织其他成员国产生了严重争执。但是,采取军事行动推翻改革派政权的做法在克里姆林宫内并没有得到一致赞成。性格优柔寡断的勃列日涅夫甚至当军队已做好进攻准备时,对是否应采取军事行动仍没有把握。柯西金也对此表示怀疑,但是,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大多数成员都坚持反对布拉格改革派的强硬路线。政治局全体委员,其中包括彼得·谢列斯特、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基里尔·姆斯祖佐夫、安德烈·基里连科和阿尔维德·佩尔谢,中央委员会书记德米特里·乌斯基诺夫、康斯坦丁·卡图谢夫及彼得·杰米契夫,最后还有几乎所有的元帅——他们都是中央委员——都表示赞成出兵。亚历山大·雅克夫列夫——此人后来成为戈尔巴乔

夫最信赖的助手之一——当时领导着中央委员会宣传部，该部为苏联镇压改革派的全部行动提供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支持。作为驻华盛顿的大使，我事先并不知道我国的计划，但是，在我看来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这场入侵肯定会毁掉与美国进行最高级会谈的计划，并将全面破坏我国与西方的关系。

华沙条约组织的入侵行动是在8月20日上午11时开始的，那天是星期日。那天清早，我吃惊地收到了莫斯科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我安排与约翰逊总统会面，解释我们采取行动的原因。（我收到了我们的正式“解释”的文本。）由于入侵行动发生在周末，因此使形势变得十分复杂，一接到通知就要在当天与总统会面实在是太困难了。此外，我得到的指示是将与总统会谈的时间准确地安排在华盛顿时间下午6时至8时之间，或者说恰好安排在坦克即将开进布拉格的时候。

180 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决定不通过正常途径提出会见的正式请求。通过正常途径提出请求可能会被耽搁下来，尤其是在星期天。我决定直接和总统本人联系。我记得几年前拜访沃尔特·罗斯托时，总统本人曾给了我他的私人电话号码“以防万一”，但此前我从未用过它。这件事确实紧急，应该给他直接打电话了。约翰逊也没问个究竟便立即同意见面，并建议我中午就来。但我必须严格遵守莫斯科规定的时间表，所以我以必须翻译我将要交给他的电报为借口，要求他在下午6时以后接见我。他同意了。

晚上8点我来到白宫。约翰逊在内阁会议室接见了我们。我们在一张表面非常光洁的长桌旁坐下，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默默地坐在一旁。总统首先回顾了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的情况。他刚刚看过一部有关那次会谈的纪录影片，并且高兴地谈到当地居民对与会者给予了友好的欢迎。

接下来，我宣读了莫斯科的电报，电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一个由国内外反动势力组成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集团”，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组织盟国对布拉格政府寻求帮助的呼吁做

出了反应。“因此，”电报继续说道：“苏联军队已奉命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毫无疑问，威胁安全的现实危险一旦被消除，他们将立即撤出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电报最后说，莫斯科保证不会损害苏美关系，“苏联政府极为重视这一关系”。

约翰逊总统仔细地听着，但他显然没能迅速理解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他对此全然没有做出反应，只是感谢我通报了这一消息，并说他将于次日上午与腊斯克及其他一些人讨论这一声明，如果有必要，将给我们一个答复。

接着他又谈起了另外一个话题——对此他显然更感兴趣。他说，他正等待我们对打算宣布将出访苏联的计划做出反应。宣布这一计划的时间已经定在次日上午10点。（几天前，莫斯科已表示原则上同意他的访问，但现在实现访问计划的希望自然是非常渺茫了。）

总统又说，他已邀请他的一些朋友明早来白宫共进早餐，届时将宣布他访苏的消息，随后还要向新闻界郑重宣布这件事。由于约翰逊仍然一点儿没有意识到布拉格此时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影响，所以他要求我们在次日早晨聚会前——或不迟于上午8点至9点——对他访问莫斯科的计划做出答复。

他看上去很高兴，并且说他极为重视即将与苏联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他希望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其中包括越南问题和中东问题。约翰逊指出，这一次他“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并且期待会谈取得切实的成效。

接下来约翰逊又把话题转到他与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进行的会谈上。他仔细回顾了他仍然记着的一些细节问题，并且对整个会谈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他递给我一杯威士忌（在那个时候我当然愿意喝点什么！）并开始给我讲起有关得克萨斯的各种有趣的故事。他很善于讲故事。

在总统滔滔不绝地谈论未来的访问、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以及其他一些令他高兴的事情时，罗斯托——此次会谈的唯一目

击者——阴沉着脸坐在那里，他没有打算打断总统的谈话。当我们分手时，约翰逊的态度非常友好，并且再次提醒我正等待着我们的答复，以便使他能够宣布他将访问苏联。

我回到使馆后向莫斯科紧急报告了我们的谈话情况。我极力建议接受他提出来的宣布他将访问苏联的建议，因为——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我断定腊斯克和罗斯托毫无疑问现在正竭尽全力迫使总统重新考虑这次旅行计划。政治局几乎没有料到约翰逊对布拉格事件的反应竟然如此平和，因此立即发出了他极其渴望得到的邀请。数小时之后我便得到了答复。然而事态的发展还是太快了。

就在那天深夜，腊斯克把我请到了国务院。他告诉我他刚刚从白宫开会回来，总统要他传达一个口信，即他不知道布拉格事件是否和非共产党国家有关，也不知道布拉格是否公开请求提供帮助。“最后，”口信中提到：“我们感到应该对宣布我们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可能性重新进行认真的考虑。我们将就此事与你保持联系。”

腊斯克按照笔记宣读了这个声明。然而他并没有表现出美国方面改变了对拟议中要举行的这次会谈的态度。总的说来，腊斯克表现得沉着镇静，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即他对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行动绝对持否定态度，而且他将不遗余力地促使约翰逊总统像他一样坚决地反对这种做法。但是，这项声明以及这一整夜华盛顿的事态发展最令人瞩目之处是约翰逊不顾一切地仍然希望去莫斯科参加会谈！

三天之后，我再次去国务院拜访腊斯克。他在那里对我说，他早先和总统讨论时曾说过，他“可以断定苏联不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他请求我私下告诉他入侵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随后他又十分出人意料地说道：“下一个会不会是罗马尼亚？那就太过分了，而且我们根本不可能控制住公众舆论。”由于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约翰逊的日子已经相当不好过：就在那天一大早，他会见了

大约20位国会领导人,并且“忍受了”他们对他在对待苏联入侵问题上所持的温和态度而提出的尖锐批评。

腊斯克强调指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对两国关系的前景已经没有把握,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总统的极大关注。约翰逊同样也不得不顾及目前的公众情绪——它不可能理解或接受总统目前在东西方关系中表现出的主动性。到目前为止,总统和美国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袖手旁观,期待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在约翰逊政府剩下几个月的执政期内已经没有时间实现这种好转了。我觉得与腊斯克进行的谈话表明了美国政府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混乱状态,这种印象被我在后来几天中获悉的情况所证实。

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5天以后,专栏作家德鲁·彼尔森对我讲了总统私下会见国会领导人的情况,立法和行政机构试图通过国会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做出适当的反应。约翰逊对国会指责他对苏联入侵行为没有采取更为激烈的反对态度十分恼火,他说:“你们是不是建议我们把美国军队派到那儿去?”进行军事报复是“根本不可能的”,总统告诉国会领导人,除了进行宣传之外不可能采取其他任何行动。怒气冲冲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接着,汤普森又对我讲了总统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的另一次会谈的情况。这次会谈就美国不能使用武力反对苏联的入侵行动达成了一致。此外,总统命令,除了约翰逊和腊斯克已经对苏联做出的批评性声明之外,不得再进行公开的谴责。约翰逊甚至半开玩笑地对高级军事官员说:“真希望莫斯科能认识到我们不是美国这个地方的恶棍。”

但是,紧张的气氛仍在持续。8月28日,腊斯克紧急召见了。他说他听到在24小时之内苏联军队将沿罗马尼亚边界展开非同寻常的积极行动。西方国家已经推测苏联有可能入侵罗马尼亚,其主要根据是罗马尼亚拒绝和其他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一道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联合行动。的确,莫斯科对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

奥塞斯库非常恼火，苏联军队也确实在罗马尼亚边界附近实施了示威性战术行动。但是，莫斯科并不是真想入侵罗马尼亚，因为它一直坚信那里的共产党政权是稳固的。

183 然而，苏联的军事行动受到了西方情报机构的密切追踪，有关情况很快送到了约翰逊总统手里。约翰逊当时呆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里，打电话将此情况通报给了腊斯克。当我到达国务院时，腊斯克已经把发给苏联政府的电报准备好了。这封电报极具感情色彩。“我们代表人类，”他说，“请求你们不要入侵罗马尼亚，因为其后果是无法预料的。我们还希望不要对西柏林采取行动，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引发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我们希望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一切对苏美关系和整个世界都将是一场灾难。”

我急切地建议莫斯科紧急做出答复以稳定局势，很快我就带着莫斯科的答复回到了国务院。

“我奉命通知你，”我对腊斯克说，“有关苏联军队对罗马尼亚将要采取行动的报道是某些人为误导美国政府而刻意编造的，这些报道与事实完全不符。有关西柏林问题的报道也同样如此。”

听到这一消息，腊斯克显然松了口气。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逐渐缓和下来，但是这场入侵行动使我们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捷克斯洛伐克公众的情绪突然变得和我们对立起来。抗议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甚至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也首次公开站出来反对政府。在西方报刊上和某些西方官员中间还出现了他们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揣测。虽然在莫斯科的政治局会议上从来没有宣布过，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样的政策，但是，决不允许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入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的决心实际上真实地反映了那些掌握着苏联命运的人的思想情绪。

苏联政府并未正式制定一项外交政策原则，但是，在为召开共

产党代表大会或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做准备时都要对外交政策纲要进行十分细致的审查。政治局将会讨论总书记所做的总结报告草案以及准备提交给大会的决议草案，这其中总有一部分涉及到外交政策。这两份文件经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批准之后实际上就构成了苏联共产党的“总路线”或原则，并且自动成为政府的指导方针。

然而，在相隔5年才举行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期间，每逢遇到紧急情况就需要对国际形势做出分析。在这种关键时刻——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是如此——外交部通常要准备一份专门的分析报告提交政治局讨论。一旦得到批准，这份文件就成为此后一个时期的外交政策指导方针。

1968年9月16日，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题为“外交政策方针及苏美关系状况估计”的报告。这份文件实际上详细阐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份文件得到政治局的认可，它确定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针和今后几年苏美关系的发展范围。这份文件表明了这样一些新的思想，即未来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要与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西方经济和安全机构展开竞争，这是苏联领导层首次明确宣布这一目标，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是关起门来秘密宣布的。文件要求和美国打交道时要把“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并且指出美国领导集团正利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另一方面，苏联在处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时所采取的果断行动使得美国领导人对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力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使他们再次看到了我国领导层捍卫苏联根本利益的坚强决心。”

由此看来，苏联领导层如何判断西方国家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做出的比较软弱的反应是很清楚的；它使莫斯科相信西方政府不准备在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这种判断对克里姆林宫在10年多一点儿后决定对阿富汗发动一场新的入侵行动时起了推动作用。

这些事件对我国外交事务产生的消极影响并没有它对国内的影响大。原因之一可能是当时越南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当中。在西方公众中，政治行为的道德标准被降低了，其原因部分在于越南战争使得美国总统自己无法用道德准则来衡量其他国家的行为和动机。

约翰逊总统固执地要求举行最高级会谈

185 当美国政府进一步提出约翰逊访问莫斯科的迫切要求时，我国领导人肯定没有考虑这件事，他们原以为入侵事件发生后美国人会放弃这一计划的。然而，使我大为吃惊的是，9月9日，罗斯托与我私下共进晚餐时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约翰逊总统首先想知道的是，苏联政府是否认为最高级会谈能够在三个关键性问题——导弹问题、中东问题、越南问题——上取得成果。我指出，尽管这些问题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美国方面看起来是要确定某些先决条件，或试图事先得到使会谈获得成功的保证，用这种方式对待最高级会谈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只有进行充分的准备才可能确保最高级会谈取得具体的成果。

但是，罗斯托对我的观点不感兴趣。他只是重复总统的“主要想法”：约翰逊希望与柯西金进行的会谈能够取得进展，以便在美国产生重大的政治反响，从而使尼克松无法攻击最高级会谈是民主党进行竞选的骗人把戏。罗斯托又说，任何人——甚至包括腊斯克在内——都不知道我们的谈话。第二天，罗斯托打电话通知我他不再管这件事了，总统已经委托腊斯克处理此事。看来，约翰逊对罗斯托的外交能力评价并不太高。

9月13日，莫斯科做出了答复。腊斯克当时不在华盛顿，所以我将这封电报交给了罗斯托。电报说道，莫斯科仍然愿意与约翰逊总统举行一次会谈，希望这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准备就总统提出的三

方面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进行讨论。电报甚至拟定了一个预想的讨论日程。

我们正在谈话当中，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总统本人打来的，他听说我在罗斯托那里，因此想知道莫斯科是如何答复的。我把电报的大致内容告诉了他，总统请我转达他对迅速得到答复而表示的谢意。

此后，我有一个月的时间没和约翰逊进行联系。显然，美国政府内部仍然在讨论这一问题。10月14日，腊斯克私下告诉我，约翰逊总统还没有做出决定。腊斯克认为在进行选举以前最好不要举行什么最高级会谈，他甚至毫不隐晦地表示，现在举行最高级会谈为时已经太晚了。

整个10月份，腊斯克、罗斯托和我就越南问题以及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积极地交换了意见。苏联总理敦促约翰逊停止轰炸北越，以促进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巴黎进行的谈判。约翰逊犹豫不决。他不愿作为一位找不到摆脱越战困境办法的总统而留名史册。最后他终于决定接受河内在我们全力支持下提出的条件，完全停止轰炸，同意南越作战各方，包括越共在内，全部参加谈判。

总统选举的日期已经临近，而汉弗莱在民意测验中落在后面，其主要原因在于他认同了约翰逊处理这场战争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腊斯克于10月31日打电话通知我说，总统将宣布从次日开始全面停止对北越的轰炸。那天深夜，腊斯克给柯西金发去了约翰逊的正式电报：“现在已经停止了对北越的轰炸，因此我希望并且期待苏联利用其全部影响打破僵局，尽可能快地给东南亚带来可靠而持久的和平。”第二天，柯西金对约翰逊的做法表示了赞赏。但是，美国对越政策改变得太晚了，已经挽救不了汉弗莱的失败，尼克松以微弱多数赢得了总统选举。

186

11月24日，我应尼克松的助手罗伯特·埃尔斯沃思的邀请，与他共进私人晚餐。他非常庄重地对我说，尼克松要他告诉我，他，埃

尔斯沃思,受权就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与苏联大使保持正式联系。虽然尼克松还不是总统,并且深知政权交替带来的敏感性问题,但他仍想打开一条与莫斯科进行秘密接触的便捷渠道,“以便”能够就他宣誓就职后我们将面临的问题交换意见。

埃尔斯沃思显然为他担负的使命而感到自豪,但是对这一使命所包含的责任可能有些畏惧。他接着又向我提起了尼克松在迈阿密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即苏美关系现在到了从对抗时代走向谈判时代的时候了。这不是为了拉选票,埃尔斯沃思宣称,是反映了尼克松总统的基本态度。

因为尼克松知道我将要回莫斯科就下一届美国政府的情况进行磋商,所以他派埃尔斯沃思来请求我试探一下苏联领导层对越南和中东问题,另外还有裁军问题和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看法。埃尔斯沃思说,我从莫斯科回来后就可以开始同当选总统讨论某些具体问题,并可以使尼克松和苏联领导通过互相传递口信和信件的方式秘密交换意见。

187 腊斯克也想和我谈谈我的莫斯科之行,并且再次提出了拟议中的最高级会谈问题。约翰逊直到这个时候还惦记着举行最高级会谈,这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腊斯克说,如果最高级会谈能够在12月中旬——离约翰逊离职大约只有一个月——举行,它必将产生积极的效果,会谈的主要议题应该是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苏联政府确信会取得积极的效果吗?莫斯科能够为推动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的进步做些什么呢?”显然,腊斯克对他认为是被延误了的最高级会谈表示怀疑。

我对他说,两国领导人已经反复讨论了这一问题,没必要再进行新的讨论。腊斯克点点头,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

几天过后,埃尔斯沃思请我再次去他那里讨论华盛顿正在流传的有关即将离职的总统和即将上任的总统可能一道参加与苏联领导人举行的最高级会谈的谣言。他说,尼克松对此极为反感,因为他认为约翰逊的真实目的是想提高他的历史地位,而不是促进

美苏关系,而且这样做只会损害两国关系。埃尔斯沃思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为举行战略武器谈判进行认真的准备了,然而举行最高级会谈却会提高人们的期望值。约翰逊留在白宫的日子只有40天了,而尼克松则要在白宫呆上4年,如果最高级会谈失败了,他将不得不承受人们的愤怒指责。至于尼克松本人,埃尔斯沃思向我保证说,他的态度是积极认真的,但不想草率行事,同时他要求我把这一切转告给苏联政府。(后来,我从约翰逊的回忆录中了解了很多情况:大选之后,他确实试图说服尼克松与他一道或派代表参加和苏联领导人进行的最高级会谈。尼克松拒绝了。)

莫斯科此时已经明白不可能和约翰逊举行最高级会谈了。一个星期后,我向埃尔斯沃思转达了莫斯科的答复。莫斯科表示尼克松可能还不知道想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是约翰逊总统,因此“美国方面应该表明自己对召开这样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态度。而我们则不打算为了暂时的利益而改变自己的看法。”约翰逊为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所做出的反复无常、摇摆不定的尝试最终就这样结束了。

我对在美国发生的这种荒唐的情况不得不表示惊讶——经过总统选举已经被这个国家抛弃的那位总统根据宪法仍然要留任近三个月的时间。尽管他仍然是正式的行政首脑,但他的决定和行为已受到限制。怪不得这类官员在美国被称为“瘸脚鸭”呢。^①

随着约翰逊的总统任期接近尾声,越南战争葬送了总统实现“伟大社会”的希望,这项计划作为美国的道德和政治写照甚至受到了本国公民的极大怀疑。腊斯克离职后,我在他即将前往亚特兰大之前举办了一次私人晚餐为他送行。腊斯克是开着他的旧汽车来赴宴的。他颇为苦涩地说道,在他担任国务卿的8年期间有各种各样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供他支配,而现在他不得不重新学习驾驶

^① 指任期届满而又未被重新选上的官员。——译者

188 汽车,而且还得亲自预定机票。他的退休金微薄,也没有什么积蓄,因此雇不起工作人员。但是这种困难的过渡决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他再也不能够忙于重要而又令人感兴趣的国际事务了,他公开承认这一点——虽然他以前曾对我说他对长期担任国务卿一职已经感到极其厌倦了。

在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表现得非常达观。他承认,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任内,的确犯过一些错误,而且他对这些错误负有很大的责任。他自己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但是,“覆水难收”,而且他也不打算寻找借口。这就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写回忆录的原因。让历史做出判断吧。我陪他走出大门。我们在使馆外分手,当我站在那里看着那辆旧汽车发动、开走时,我不禁想到它象征着约翰逊政府的完结。腊斯克在他的老家佐治亚州定居后成为州立大学的一名教授。他的儿子终于说服了他,两人共同合作写出了一部回忆录。直到最后他仍然忠实于他的信念,虽然他并未试图把它们强加于其他人或公开宣扬它们。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多年以后,我参观了得克萨斯州的约翰逊纪念图书馆。这位前总统已经逝世。当我仔细观看展品,特别是看到那些分阶段记录约翰逊总统任内活动的陈旧褪色的照片和其他展示苏美关系的状况、林登·B·约翰逊的荣辱的物品时,我感到自己的内心充满了忧伤和悲哀。这一切都在讲述着那个破灭了的希望。参观的人寥寥无几。其中有一个人沉思着说到:“他死的时候非常伤心。”

在苏联,约翰逊的名字一直和美国对越南进行的军事干预——这件事决定了苏联对他的态度——联系在一起。在其他方面人们对他知之甚少,而且对他不大感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约翰逊在苏美关系中是一位有点被人遗忘的不太重要的政治人物。然而,在和我们打交道时他决不是一位糟糕的总统,至少不比美苏两国历史学家一直以赞美的语言来描述其品格和成就的约翰·F·肯尼迪差。如果不是因为越南战争,苏美关系的缓和甚至可能

在尼克松入主白宫之前,即早在约翰逊时代就已经实现了,尽管这一点现在已无法确认了。

早在担任副总统期间,特别是在50年代,约翰逊就以坚决支持对苏采取立场强硬的政策而闻名。但是,甚至在他与戈德华特竞选总统期间,他还是非常现实地支持阻止而不是增加核战争危险、促使苏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不是使之恶化的政策。作为总统,他努力把对和平至关重要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与其他的国际问题区分开来。无论这些国际问题有多么复杂,但除非它们恰好与东西方的根本冲突联系在一起,否则就不会形成令人同样恐怖的威胁。

的确,把肯尼迪和约翰逊推行的实际政策进行一番较为细致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一个与通常的认识不同的有趣的差异:在约翰逊时代,在苏美关系中没有出现过诸如柏林对峙、在欧洲示威性地集结武装力量或者古巴危机等严重的冲突。此外,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可能造成不稳定的事件也是以比较平静的方式进行的。我们正是和约翰逊政府达成了防止核武器扩散和禁止在外层空间进行核试验的重要协议;我们正是和约翰逊政府就限制反弹道防御性武器展开了谈判,并且着手准备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我们正是和约翰逊政府一起做出了扩大美国与东欧国家的贸易的尝试,(而美国国会却用这一计划来钳制我们在其他领域的政策。)除了苏美领事协定外,我们还签订了包括了直接开通航线、宇航员援救、利用核能脱去水中盐分和捕鱼等方面的协议。

正像约翰逊本人在其回忆录中颇为自豪地指出的那样,在他从1963年至1969年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和苏联在各个领域所签订的协议,比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30年来所签订的协议还要多。作为总统,他本人对促进苏美两国关系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且他从未向彻头彻尾的反苏主义让过步,虽然冷战观念一直主宰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加快了战略军备竞赛的步伐,并且自然而然地使美国下决心把越南战争当作是它在全球范围内与共产主义进行对抗的一个组成部分。

190 由于越南战争必然失败已成为越来越明显的事实,约翰逊的主要目的便成为不失脸面地撤出越南。他试图诱导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向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施加压力,逼迫它接受美国的条件。他不可能充分认识到苏联领导层在意识形态上盲目坚持“国际团结”的思想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使得莫斯科本身所做的任何调停努力都失去了作用。这些半心半意、凭一时冲动而做出的努力时而使人们看到了希望——这些希望最终都化为泡影,时而使双方遭受到重大的挫折,因为当时正在进行着一场可以说是资本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战争,双方领导人都感到自己无力制止这场战争。这种僵持局面显然说明,在跨入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两国的外交政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新的认识。

第十二章

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

70年代的苏美关系

70年代因缓和的出现而在战后苏美关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70年代中期，最高级会谈就限制两国战略核武器增长达成了协议，从而使缓和达到了高潮。

苏联和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如何描述在理查德·尼克松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年代促使紧张局势得到缓解的国际环境看法不一致。政策专家们在谁迫使谁走向缓和这个基本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在美国政治文献中有不少看法都认为缓和的出现是因为苏联对美国的态度的变化，它们推测苏联态度的变化是缓和得以实现的唯一原因。这种推测只对了一部分；美国方面的态度同样也发生了变化。但还是让我首先考查一下苏联对美态度的演变过程吧。

苏联的外交政策总是与共产党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直是党的全部政治纲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17年革命之初开始，在国家领导人和党的领导层中间就围绕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及外交政策方针展开了斗争。列宁和托洛茨基分别是这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

极端主义分子鼓吹说，俄国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并且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对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胜利——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将证明革命战争是正确的。实际上,在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上,为了实现那些最高目标,甚至可能需要暂时牺牲一些革命成果。想一想党多年来一直在呼喊的一个口号吧,这个口号译成英语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192 列宁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自己的国家里进行革命,使其变成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和不断获得成功本身将是俄国履行其对全世界无产者所承担的责任的最好方式。资本主义可以与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但是,历史最终将对这两种制度的优劣做出评判。

后来,这两种观点在国家领导层和共产党员的脑子里奇妙地结合了起来。尽管列宁主义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另一种观点从来也没有被完全放弃,因为它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显然是该观点能够吸引人的主要原因。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吸收了新的、不那么好斗的战争与和平概念。但是,昔日的遗产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其方式是试图保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并显示党的革命正统性。因而,战争并非绝对不可避免的这一新的观点,在添加了战争危险仍然存在的这类套话之后便可能为人们所接受了。总之,这种思想观点认为,如果发生战争,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而这一胜利将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之上。

虽然这种赞扬和平共处的观点被承认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但它是在做出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即把和平共处说成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之后才变得比较受欢迎的。理论家们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把“国际主义”——其定义是与国外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团结一致——和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结合在一起,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劳动人民同样也在进行斗争。这种新政策强调,它不打算放弃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苏联向全世界宣布,它决不会拒绝向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全面的援助。

东西方的对抗实际上是苏联领导层试图把这两种思想原则结合在一起,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而造成的结果。但是,这种做法也导致我们毫无必要地与美国在第三世界进行一场超级大国间的对抗。这一切还使得我们一度与中国人展开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

毋庸置疑,在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决定政策方针时总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勃列日涅夫算不上一名理论家,但是,他经历过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毫无疑问,他知道我国人民把和平看得重于一切。自从担任总书记职务以来,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小心谨慎地观察着国际事务复杂的运作情况。但是,直到约翰逊任职中期,确切地说是到了尼克松总统任期开始的时候,他才开始相当坚定地相信有必要促进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尽管他对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被认为是十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表现出了恰如其分的尊重。

193

促使勃列日涅夫以及党和国家最高层官员调整其外交政策观点的是下列一些因素。

第一,核战争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正如古巴危机曾经明确证实的那样。第二,军备开支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尽管在约翰逊刚一担任总统时双方便试图削减军费,但却未能获得成功。第三,如果美国加以阻挠,通过所谓的柏林协议改善苏联与西欧,特别是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系的进程将会变得极为复杂化,而美国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进展情况。第四,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苏中关系急剧恶化,因此有必要阻止或抵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进行的任何勾结。第五,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无疑会巩固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苏联国内的威望。

应该承认,苏联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临时的设想,而不是按照某个宏伟规划制定的。要证明这一点,只需回顾一下自1962年古巴危机到中东战争以及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时期内所发生的重大危机就足够了。

对于我国的外交人员而言,当时最主要的困难在于不太了解实际情况,没有为进行裁减军备的重要谈判做充分的准备,这样就很难在这个涉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的主要领域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国务院及其工作人员的准备工作和我们相比要充分得多。他们的外交官和谈判人员与五角大楼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两种部门中都设有处理裁军问题的专门机构。而我们则没有这类机构。苏联外交部的官员们只能自行其事。他们甚至连一个能够使其在裁军问题发挥专长或施加官僚政治影响的组织或专门机构都没有。起初,这一题目被委托给外交部的美国司的一小部分人来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接触到有关我国核武器及其生产情况的任何情报。他们所知道的大都是从美国的公开出版物中看到的。作为大使,我能够与美国官方与我地位相当的人及美国科学家直接交往,所以我的情况稍微好些。

194 这种状况造成了某些不合理的现象。在重要的谈判开始之后,我们的外交官不得不重新提起裁军问题的细节以及在美国军界、外交界及科学界已经反复讨论了好几年的那些极其复杂的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的人在公开场合或自己人之间一直用美国英语的缩写词来表示美国和苏联的战略系统。最为令人惊讶的是,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一协议最终于1975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①最高级会谈中得到了勃列日涅夫和杰拉尔德·福特的批准——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没有主动提出过苏联的军事数据,尽管在适当的时候,反应我方立场的数据将必须成为任何一个协议的组成部分。美国方面不仅对他们的武器装备,而且对我们的武器装备提出限定数额,而我们只是表示同意或提出修正意见。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和我国军方建立起应有的联系,并且在莫斯科成立了适当的合作机构,以便为谈判做准备。

与此同时,尽管速度相当缓慢,但我们的最高政治领导层还是

^① 即海参崴(俄罗斯海港城市)。——译者

在逐步掌握军工生产以及有关裁军问题的详细情况。在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我们的国防部长们——格奥吉尔·朱可夫、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以及后来的安德烈·格列奇科全都是拥有苏联元帅军衔的军人——对这些问题比较熟悉。但是,甚至连他们了解的情况也不够全面,因为作为一名国防部长通常是不太懂得军工生产的具体情况的,更不必说把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运用到裁军过程中去了。只是到了福特政府上台初,由季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此人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开始和兵器打交道——接替格列奇科担任国防部长之后,这一缺陷才得以弥补。然而,季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并不赞成搞裁军,因而他必须时时受到勃列日涅夫——他对军工企业十分内行——的督促。

对于美国来说,这个阶段证明是对冷战的准则进行痛苦的重新估计的时期。美国与苏联发展比较正常的关系也有着一些客观原因:苏联的核导弹潜力此时已和美国并驾齐驱;以西德和法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越来越寻求实行更为独立的政策,并且试图发展它们与莫斯科的关系;国家在越南进行的冒险活动使美国社会和经济问题严重恶化,美国不可能既拥有大炮又拥有黄油,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了。此外,尼克松政府显然渴望大肆渲染其在对俄、对华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成就,其目的是为了减轻其未能结束东南亚战争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而在1972年的总统选举中增加重新当选的机会。

尼克松—基辛格政府试图实现美国外交政策上的某些重要的短期和长期目标。这些目标是:以最小的代价结束越南战争,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解决诸如西柏林问题这样一些比较具有爆炸性的战后问题;通过限制军备以及建立一个能够使双方在处理某些地区性突发问题时采取克制态度的苏美协商机构来减少苏美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危险;重新组合美国和盟国的力量,以便维持现状并满足美国的利益需求;通过实现苏美关系正常化以保证美国能够更为随意地调整与其盟国的关系,进而巩固它在全球性东西方对抗中

所占据的协调地位；最后是防止国内出现两极分化和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现象。可以想象，所有这一切将会提高尼克松及其政府在国内外的声望和权威。

推动这一进程的美国主要领导人当然是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这两个人都是美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能够理性地看待问题，而不是被一些不太重要的枝节问题搞得无所适从。他们两人对全球外交策略和强权政治规则都颇感兴趣。此外，基辛格是一位出色的谋略家，这一点在直接的和受其幕后操纵的谈判（我亲眼目睹过这些谈判）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总的说来，他们的政府在冷战时期既为推进苏美关系尽到了责任，又没有忽略美国的利益。

但是，当我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根据他们两人的回忆录以及评论家们所写的大量书籍及论文，根据我对他们的所做所为进行的全面分析来确切评价他们的活动时，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实际上并不打算在苏美关系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也不打算结束冷战和军备竞赛。

他们的对苏政策基础是威慑与合作的结合，短期考虑和长远打算的汇集。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实际上都没有为限定和苏联进行战略军备竞赛的界限，从而加强对战略武器的控制，限制发展更加尖端的武器而做出努力。他们试图造成一种比较稳定、比较容易控制的战略态势，同时又不削减高水平的武器装备数量；这种做法成为一种本质上依靠军事实力，同时又能根据他们的需要调和国家利益的政策的基础。他们为控制军备而做出的努力因此而成为这种实力政策的伪装，只不过这种伪装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罢了。从本质上说，无论是总统还是他的亲密助手都没有能够冲出冷战的影响范围，尽管他们比其他几位白宫的冷战斗士表现出更注重实效、更现实的态度。

尼克松1968年当选总统引起了苏联相当大的警惕。政治局一致认为，他一贯坚持的反共态度预示着苏美关系将进入一个困难时期。我国驻华盛顿使馆最初也持有类似的想法，而且理由非常充分，这是无需隐瞒的事实。尼克松入主白宫时已经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机会主义在美国政界根深蒂固，尼克松也不例外。他的经历中充满着反苏、反共和好战的色彩。他非常善于对他的政治对手以及另外一些他认为有懈可击的人进行不负责任的煽动性攻击，借此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

作为美国政治生活一个重要特征的反共运动是冷战的产物。在冷战时期，苏联及其思想理论被看作是对美国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直接威胁。但是，使我一直感到惊讶的是在美国出现的这场反共斗争的规模和狂热程度，虽然这场斗争的对手显然是根本不存在的。上至拥有庞大情报网的强有力的联邦调查局，^①下至大群志愿坐探和真诚的爱国者都在全国各地——从好莱坞到华盛顿、从时代和生活大厦的高层人物到遍布东海岸的码头装卸工人工会——到处找寻颠覆分子。这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搜捕共产党人的行动除了发现极个别共产党人在密谋推翻美国制度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然而，与欧洲相比，当时的美国共产党人为数并不太多。一些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拥有大批的追随者，政治上很有势力。即使在缓和的年代里，美国共产党也不过拥有1万或1.5万名党员，而且莫斯科对美国共产党领导层提供的这一数字甚至也表示怀疑。我们认为他们人数最多也只能是这个数字的一半。我可以向读者保证（因为我在莫斯科担任过两年负责国际事务的共产党中央书记），在整

^① 基辛格有一次对我开玩笑说，美国政府从财政上维持着美国共产党的运转，因为其50%的党员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他们用从联邦调查局得来的钱缴纳党费。

个战后时期,莫斯科从未把美国共产党真正看成是一支政治力量。莫斯科对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支持我党政策的强有力的演说感到非常满足,这是我们要求它承担的唯一责任。作为大使,我一年里总要有两三次在纽约我国驻联合国使团设午宴或晚宴款待他,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他总是避免不谈美国共产党员的准确数字,我觉得他试图夸大美国共产党在劳动人民中的影响作用。虽然我从未就党的事务向他提出过建议,但我很有兴趣听他对国内形势和这个国家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价。

在苏联领导层中,没有一个人——包括共产主义最热忱的支持者——曾经认真谈论过共产主义在美国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子。不用说,我根本不相信共产主义在美国能有什么发展,其原因主要是我在美国生活了许多年。即使做最大胆的设想,我也仅仅认为在遥远的将来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合起来。尽管当代人所持有的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以庞大的公共机构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组织的出现而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但当时它在莫斯科仍然属禁忌之列。

然而,尼克松究竟是真的认为美国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还是仅仅把宣扬这种威胁当成爬上政治阶梯的便利手段?在我想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在他走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他渐渐地不再把共产主义的威胁看成是存在于美国国内生活中的现实情况,而把它看成是与反对共产主义世界,首先是反对苏联和中国的斗争的外交政策有关的因素。于是,反共便从一个国内问题逐渐转化成一个国家间关系问题。这种变化的出现确实提供了与新总统展开对话,甚至同他达成协议的某种可能性,尽管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这就是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时我的想法。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9年,当时我担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而他作为副总统来莫斯科主持一个美国家庭展览会的开幕仪式。就在这次展览会上,他同赫鲁晓夫就两国社会制度各自具有的长处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当时,赫鲁晓夫正因美国国会刚刚通过的一项有关东欧各

国“被控制民族”的反苏决议案而恼怒不已，而且这位总理把他的不满情绪毫无顾忌地发泄了出来。辩论结束后，赫鲁晓夫陪同尼克松乘坐摩托艇游览风景如画的莫斯科河。那天是个周末，摩托艇停靠在一片沙滩上，赫鲁晓夫把尼克松介绍给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普通公民。随后他以开玩笑的口吻大声问他们是否觉得受到了压制。回答当然是一片哄堂大笑。在整个游览过程中，他一直在教训和取笑尼克松。尼克松被这位虚张声势的主人搞得很不舒服。

不用说，当我在尼克松高就新职后首次和他会谈时是不会向他提起我们过去的那次会见的。1967年2月17日，在宣誓就职大约四个星期之后，尼克松在白宫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接见了。自约翰逊离职后，这间屋子已经彻底装修过，地毯和窗帘都换成了金黄色的。墙上挂着总统女儿制做的一幅漂亮的绣制品，上面绣着美国的国徽。办公桌两旁摆放着国旗和不同颜色的军旗，它们象征着总统拥有军权和行政权。总统说他特别喜爱这张办公桌，因为自第一次被选举担任公职以来，他就一直在使用着它。

198

感谢尼克松总统，是他使我们对那间椭圆形办公室仍旧保留着一种家庭般的温馨记忆，那就是我三岁的孙女带着一种煞有介事的神态坐在总统办公桌前留下的一张绝妙的彩色照片。照片上有尼克松总统亲切的题词。拍摄这张照片最难的是让她安安静静地坐着，并且不能让她一心只顾着拉开美国最高级官员的办公桌抽屉并把手伸进去。

我受命向尼克松阐述了我国政府对苏美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以此方式来建立我们与这位新总统的关系。莫斯科对他仍持有戒心。

我告诉他，苏联赞成和平合作，如果美国也愿意遵循这一原则，那么解决紧迫的国际问题将大有可能。在我们看来，主要的目标是实施防止核扩散条约，寻找一种能导致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政治解决办法，双方为解决中东争端而交换意见，将我们对欧洲的行

动和政策建立在保持战后现状的基础之上,继续使苏美就战略武器问题交换意见,以便使两国的军备竞赛得到控制。

尼克松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些目标,并且认为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意识到两国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必须防止这些分歧达到尖锐化的程度。他还希望避免在苏美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之外,即在第三世界和其他地方因地区性冲突以及类似的问题——我们称之为“边缘问题”——而发生对抗。

199 尼克松建议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但是他说这需要做全面的准备,需要有时间比较全面地了解国际事务以及一些特殊问题的细节。我本人对他提出的召开苏美最高级会谈的建议表示欢迎,虽然我知道莫斯科要接受这个想法也要花些时间。第一次举行最高级会谈是两年多以后的事了,但是在此后的三年中——1972年、1973年和1974年——又史无前例地接连举行了三次最高级会谈。

接下来,尼克松总统又谈起了通过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建立一条秘密渠道的事。后来的情况表明,这条秘密渠道被使用的广泛程度在我的经历中,或许在外交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除了我同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进行例行的官方接触之外,总统还希望能够和苏联领导层紧急、秘密地交换意见,而且他想通过我和基辛格之间的联系来做这一工作,基辛格将与我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只向总统汇报情况。

尼克松似乎想尽力证明这种双重联系的安排具有某种非同寻常的意义。他说,通过罗杰斯——虽然他“非常信任这位国务卿”——进行联系的不利条件是双方交换意见的情况将会被一大批官员知道。这种情况有时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泄密。但有些问题只能让极少数人知道,有些事情则只能让总统一人知道。总统将通过基辛格和多勃雷宁的渠道获得情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我们两人可以不用翻译而进行秘密谈话。

我表示愿意重新开通这条秘密渠道。尼克松已经得知早在其他几位总统任职期间这条渠道就曾以各种形式而存在。他对苏联

使馆从未泄露过有关秘密渠道的情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总的说来,他表现出友好的态度,没有提出任何有争议的问题。这次会谈坚定了我的信心——我们可以和他开展对话。

四天以后,即2月21日,基辛格提议我们在他的白宫办公室举行会谈。像我与尼克松所进行的大多数会谈一样,我和基辛格所有会谈都是单独进行的,没有翻译和秘书在场。这意味着除了我们自己保留的笔记之外,会谈没有留下正式记录。尽管这样做常常会导致对实际说过的话以及真实的意思做出不同的解释(因为与会者都可能禁不住想把自己的表现描绘得尽量好一些,特别是日后在他们的回忆录和自传里),但是,在实际谈话和谈判过程中没有因前次会谈中到底说过些什么而产生异议和争论。我们对在正式场合所说的话总能达成明确的谅解,它和我们在一种比较随意的情况下所说的话截然不同。在这种场合,我们可以在个人的基础上探索新的观点和见解。这使得我们能够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坦率地交换看法,并且在谈判中保守秘密。这就是我们建立的联系渠道对两国政府具有极大价值的原因所在。它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200

按照尼克松的指示,基辛格强调说总统希望进一步改善我们两国政府间的关系,其中包括解决我已经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至于更为紧迫的越南问题,基辛格说,新一届美国政府准备根据两项原则进行谈判:第一,美国不能接受一个看起来像是军事失败的解决方案;第二,尼克松政府不准备接受一个会直接导致越南政府更迭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样做将会使政策发生突然性变化,虽然他们不反对循序渐进的变革。

他还表示,尼克松认为不应该改变战后欧洲关系的格局,莫斯科和华盛顿应该继续就中东问题交换意见。

我提出了——莫斯科也同样提出了——一个被遗漏的问题,即基辛格忽略了我们提出的重新开始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交换意见——自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它已中断了数月——的建

议。当我向基辛格指出这一问题时，他说尼克松政府稍后准备讨论这一问题，但没有做详细说明。

这次会谈使我对基辛格产生了一个良好的印象。他谈话有条有理，不含糊其词或回避某些具体问题。当我们后来着手进行认真的谈判时我体会到，虽然他能把你搞得非常头疼，但他很机敏而且极为内行，从未表现出头脑迟钝或官僚主义的样子。在此后几年中，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这条秘密渠道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一直发挥着作用。我们通过相互邀请私下共进早餐或午餐的方式来利用这条秘密渠道，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我通过供工作人员进出的大门进入白宫拜访基辛格。我们举行会谈的地点通常是在和总统办公室相邻的他的办公室里，在就越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展开旷日持久的谈判之后，会谈地点则换到一楼庄严、宁静的地图室里，富兰克林·罗斯福战时常常是在这里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的。后来，由于我们的接触变得更加频繁，几乎每天都要举行会谈，所以总统下令在白宫和苏联使馆之间架设一条保密的直接电话线，供基辛格和我专用；我们不用拨号，只要拿起电话筒就可以谈话。

201 多亏这条秘密渠道才使苏联领导层与尼克松总统建立了稳妥且可靠的联系。在政治局内部，由于讨论和会议记录绝对秘密，所以更能够保守秘密。这条渠道还能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某些时候摆脱国会和公众舆论的压力。因此，白宫不仅制定美国的政策，而且能够在不受国会和公众——它们根本不知道这条秘密外交渠道的存在——干扰的情况下直接将其贯彻实施。

回顾过去，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条秘密渠道，就一些复杂而且有争议的问题达成许多关键性协议是决不可能实现的，围绕柏林、古巴或中东问题而形成的严重的紧张局势也不会很快地缓和下来。就限制战略武器达成的基本协议以及最后为准备最高级会谈而进行的最为敏感的谈判全都是通过我们的秘密渠道进行的。这条秘密渠道是我们与尼克松和基辛格政府之间的独特关系的起点。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既是对手，又是维持和平的伙伴。

与基辛格建立的良好私人关系的基础是我们都愿意倾听对方的意见和相互谅解,愿意为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而寻求某种令人满意的办法或妥协方式,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克服或减少我们在正式接触或谈判中遇到的困难。当然,我们也曾就某些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是这种争论从未变成私人间的对抗。我一直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亨利极富幽默感,对此我总是尽最大努力以同样的方式作答。幽默毕竟有助于打动你的伙伴的内心情感。

与尼克松政府进行谈判

根据尼克松、基辛格及其他一些美国谈判人员的回忆录判断,尼克松在担任总统职务的最初阶段并没有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看成是极为重要的事。在美国安全委员会1969年春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不是美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当时优先考虑的是越南问题、中东问题及军事政策问题,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总统的认可。这种情况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直到1972年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达成的全部协议中成为最关键的协议,它才逐渐成为比较重要的问题。

促使尼克松政府采取不慌不忙的前进步伐的原因是莫斯科给人留下了比华盛顿更急于达成一项协议的印象。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迫切需要争取时间协调他们的谈判立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拖延了开始会谈的日期,希望通过把会谈和其他一些问题联系起来的办法迫使莫斯科做出让步。至少,我的印象是这样的。

7月10日,葛罗米柯向最高苏维埃提交了一份外交政策报告,强调苏联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位外交部长照例提到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深刻的阶级矛盾”,但是他也说:“就维护和平而言,苏联和美国能够找到一种共同语言。”然而,新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保持着沉默,于是莫斯科决定尽力与华盛顿展开对话,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确切的迹象表明尼克松政府正在主动向中国做出姿态。

10月20日,我拜访了尼克松总统,告诉他苏联政府已准备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正式讨论。与此同时,我含蓄地暗示我们反对美国试图利用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当时这已经成为一个实际问题。尼克松理解了这一暗示,并且向我保证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是针对苏联的”。这话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因为总统的对华政策——在基辛格的推动和积极执行下——使美国能够在由莫斯科、华盛顿和北京组成的战略三角关系中占据主动灵活的位置,而中国牌则是这种战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个人认为,由于我们向新政府显示出对中国的忧虑,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

会谈结束时,总统表示同意就限制战略武器展开讨论。10月25日,双方宣布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于1969年11月7日在赫尔辛基举行。国务卿公开强调说,美国不打算把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方面取得的进展与其他方面的政治发展状况联系起来。这番话据说是在我们逼迫下迫不得已才说的,然而,这项连锁政策——这是它后来得到的称谓——在一直延伸到福特和卡特政府时期的此后若干年中实际上都是美国战略和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什么尼克松同意开始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呢?我认为除了探索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对美国安全具有内在的重要意义之外,还因为尼克松已经认识到可以将这些谈判用作与苏联在其他领域展开外交活动的重要手段。他就职已经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他不曾坐到谈判桌前,这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此外,时间变得越来越紧迫;他已经渡过了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的四分之一,而苏联领导人在任的时间比他可能会长得多。

我们两国之间就限制核武器展开的长期会谈就此开始了。在许多年当中,这些谈判成了我们同美国关系的晴雨表。尽管这些会谈经历了上下起伏,并且经常延期、耽搁或休会,但它们毕竟是我们两国一直在直接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尼克松—基辛格政府执政期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

结构是前所未有的。会谈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的,11月公开宣布的只是双方正式代表团构成的那一个层次。赫尔辛基预备会议从1969年11月17日开始到12月22日结束,共持续了五个星期。经过短暂的休会,历时30个月的另外7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接着又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轮流举行,直到1972年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为止。

通过基辛格—多勃雷宁秘密渠道进行的谈判是在1969年初开始的,几个月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才开始在欧洲正式举行。与此同时,我们在华盛顿以极为秘密的方式也在进行着谈判。不管是普通公众,还是美国国务院和苏联外交部的外交官,甚至包括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举行会谈的谈判者们都丝毫不知道这些秘密交谈正在进行着。除了政治局的高级官员、葛罗米柯和苏联外交部美国司司长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些情况。在美国也只有总统和基辛格属于知情者之列。

通过秘密渠道交换意见使两国领导层能够越过正在进行的谈判,干预并解决很多重要而又争执不下的棘手问题。另一方面,在两个不同层次上同时举行的谈判在进行过程中有时会造成某种混乱和偶尔的误解。美国代表团发现他们比我们更难应付这种状况,因为谈判正式说来是由国务院主持的,但美方的一切事务实际上都是由基辛格在幕后操纵的。尽管他具有出色的外交才能,精通为官之道,但他却不可能切实掌握所有的细节和谈判中出现的细微的差异。

苏联代表团的处境大体也是如此,但我们监督和引导谈判的方式却截然不同。莫斯科单独有一个小组向我们的谈判代表和秘密渠道提供帮助。但是,单独操纵谈判的基辛格却不得不处理所有的复杂事务,通过严格限制使用秘密渠道的情报而将参与谈判的所有外交和军事人员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美方代表团团长杰勒德·史密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是偶尔地发现存在着这条秘密渠道的。他和负责在谈判中与苏联密切联系的代表团成员雷蒙

德·加特霍夫对这种平行谈判方式即使没有表示愤怒,肯定也会感到不满。不论是苏联外交部还是像国防部等参加正式谈判的部门,没有一个人乐意让这条秘密渠道成为两国政府间主要的谈判途径。但是,由于用高度集中和保密的方式来操纵谈判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主意,所以莫斯科也就接受了这一主张并付诸实施。

204 相比之下,基辛格对中东和平谈判表现得并不积极。他显然认为在中东地区取得实际进展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他不愿意将自己卷进去。从本届政府执政之初,他就很策略地将这一荣誉让给了罗杰斯国务卿。我猜测基辛格肯定知道在那一阶段举行的谈判将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声望,于是他的机会将之来临。负责外交政策事务的这种双重结构——即罗杰斯掌管的正式机构与基辛格和我之间的秘密渠道——在华盛顿名人基辛格和说话很中听的企业律师罗杰斯之间造成了长期的对立和摩擦。每当基辛格知道我去过国务院之后,他总要提醒我记住罗杰斯还不知道这个、那个,或者正在讨论的问题的其他某些方面,而我确实不会告诉罗杰斯这些情况。

美国政府在中东问题上有着双重的考虑。它一方面加强对以色列的援助,一方面却试图阻止苏联对阿拉伯国家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并防止苏联在今后政治解决中东问题时扩大影响。我们主要向埃及——它的军队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军事装备——提供援助,在送去物资的同时还派去了顾问,甚至派去苏联飞行员驾驶我们的米格战斗机。我们应纳赛尔的请求前去保护开罗和其他主要城市免遭以色列的空袭,但他们并没有飞过以色列和埃及军队互相对峙的苏伊士运河。

尼克松和柯西金就这些情况交换了意见。3月25日,罗杰斯建议我们重新开始举行秘密谈判,并提出谈判应在我和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这一级举行。秘密谈判从4月1日开始,就我所知,从未出现过有关这些谈判的报道。这项复杂的工

作进展得十分缓慢,但是在数周之后,我们还是设法通过了12项条款。由于以色列通过西斯科指责埃及利用谈判为其军事行动进行辩护,谈判工作突然停止了。(纳赛尔不明智地单方面将他的防空炮兵部队向前推进了两三公里,进入了非军事化区。)

7月19日,西斯科通知我说,美国打算采取新的主动行动,即建议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和以色列的代表在“某个城市或某座建筑物中”举行间接会谈,由瑞士大使贡纳尔·雅林充当会谈的中间人。我问我们在以前的会谈中所取得的成果该怎么办?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这个问题以后再处理。第二天,罗杰斯向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加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和苏联发出呼吁,要求给予支持。这一建议被吹捧为“罗杰斯计划”。与此同时,美国推迟了苏美就中东问题进一步展开谈判的时间。

当我应邀去罗杰斯的寓所吃晚饭的时候,他说莫斯科无法想象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的政府给美国施加了多么大的压力,梅厄认为苏联空军飞行员出现在埃及意味着苏联决心要摧毁以色列。她恳求华盛顿不要让以色列“和苏联进行面对面的较量”。这位国务卿显然急于从我们这里得到我国的军事人员将不会过分靠近苏伊士运河的保证,因此我告诉他我们的飞行员已经得到不要飞越运河区的命令。

这种权力分割的状况使葛罗米柯非常恼火。我当时正在和西斯科打交道,此人精明、博学同时又极为固执。他从躲在幕后的基辛格那里接受了所有的命令,尽管从表面上看他是为罗杰斯工作的并尽可能迁就罗杰斯。当葛罗米柯来出席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时,我向他报告说,西斯科和我在拟定一份可供发表的中东问题声明的文本时陷入了困境。葛罗米柯决定在吴丹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交部长安排的午餐会上直接和罗杰斯商谈这一问题。葛罗米柯事后对我说,他发现罗杰斯是一个相当通情达理的人,因此肯定能够找到一种妥协办法。他想把这种好印象报告给政

治局。

我建议他不要匆忙给莫斯科发电报，至少要等到第二天——已经安排为罗杰斯、葛罗米柯、西斯科和我四个人在那天共进午餐——再说。他勉强同意了推迟发报的时间。

在午餐会上，葛罗米柯率先解释他的立场，罗杰斯表示“基本上”同意。

我非常清楚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我将不得不和西斯科单独坐下来正式起草协议——这时将会真的开始出现分歧。

所以，当着葛罗米柯和罗杰斯的面，我转过身对西斯科说到：“乔，我们今天的工作非常简单。我们只要坐下把我们的部长已经同意了的事写出来就行了。”接着，我把葛罗米柯说过的话概述了一遍。

西斯科急忙说到：“我的印象是葛罗米柯先生并没有完全理解罗杰斯国务卿所说的话。”

我看了看葛罗米柯。

葛罗米柯十分生气：“我到这儿来是和国务卿谈判的。我不想听你的。”

午餐结束后，葛罗米柯问我：“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向莫斯科报告些什么呢？”

206 “现在什么也别报告，”我回答说，“让我们等着和总统进行会谈吧。”

这时，葛罗米柯真的动了肝火。“这是什么国务卿？”他说。

第二天，葛罗米柯和尼克松进行了会谈，他很自然地发现罗杰斯对他说过话既不反映总统的政策，又不反映基辛格的政策。他事后对我说：“你建议不发电报是对的，但我对整个事情很不满。我首先和国务卿谈话，然后同基辛格和总统谈话，然而，他们的观点和罗杰斯的却截然不同。”

不用说，就中东问题发表声明的协议没有达成。后来，当我对基辛格谈起此事时，他笑了笑，但什么也没说。我正在学着适应美

国政府内部这种反常的状况,但葛罗米柯却不是这样。他想知道:“我回国后应该给华盛顿的哪个人写信?是罗杰斯,还是基辛格?”

1970年的华盛顿和莫斯科:观望和怀疑的一年

事实表明整个1970年是坐以观望、小心谨慎的一年。虽然旷日持久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仍在进行之中,但是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和苏美关系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主动行动。它表现的既消极——例如在阻止召开欧洲安全会议问题上,又不合作——例如在中东问题上。它正在向中国发出信号,试图同它建立关系。总统还接待了德国、法国及英国的总理(首相),同他们重新建立了私人关系,并且表示希望抑制他们与苏联进一步扩大合作关系的愿望,尤其是在维利·勃兰特总理提出与德国战时的敌对国改善关系的新东方政策的情况下。

必须结束越南战争自然是尼克松政府在国际事务方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尼克松政府实际上已放弃了用政治方式解决越南问题的想法。自1970年5月29日美国入侵柬埔寨起,美国政府便强调要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包括打着“越南化”的旗号,让南越人自己承担主要的作战任务。

尼克松对苏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它包含着两种相互对立同时又密不可分的思想观念。一种是为了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而一贯坚持的敌视态度;另一种则是避免冒使两国关系极度恶化的风险,以便保持接触,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尽管他们在具体问题上从未表现出打算这样做的明确愿望。这种政策只能把两国关系搞得更僵。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苏美关系没有出现过一次重大危机。尼克松认识到与苏联关系的极大恶化以及实行对抗政策将有悖于美国的利益,并可能使这个国家陷于惊恐之中。这就是他为什么要重申他的格言——“是谈判而不是对抗的时代”,但是,和1969年相比,他在1970年公然宣称“谈判不一定意味着达成

协议”，从而使那条格言的含义更加清楚了。

苏联领导层准备等待尼克松的下台，因为他的政府的真实倾向尚不明朗。莫斯科为此采取了措施。4月6日，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概括说明了我们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其主要观点是：对我们有利的做法是让美国意识到实行与苏联对抗的政策是没有希望的，也是无利可图的，同时还应让它认识到我国准备在相互都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发展苏美关系。一年来我们与尼克松政府交往的经验表明，这一方法是正确的。政治局批准了这项政策。

在尼克松政府执政的头两年里，我同基辛格接触时多次涉及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的问题，但是，只是到了下一年，即1971年中期，它才成为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声称，苏联方面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它对在1970年期间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提出的条件是莫斯科和华盛顿结成事实上的反华同盟，召开一次欧洲安全会议以及按照苏联的条件签署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他写道，尼克松不愿意答应任何一项要求，因此苏联“一无所获”。

我不记得苏联提出过任何有关建立反华同盟的要求，我也不记得他根据什么做出了“串通起来共同反华是苏联为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而提出的实际条件”这种耸人听闻的结论。苏联领导层并没有那么天真。我们不可能设想与美国，特别是与以坚持反苏立场而闻名的理查德·尼克松领导下的美国结成反华同盟。至于达成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双方在1970年，甚至在1971年都没有做此准备；直到1972年举行最高级会谈时才达成了这样的一份协议。

我还知道当时不可能就举行最高级会谈做出决定，因为谁——勃列日涅夫还是柯西金——将代表苏联领导层参加会谈仍不明确。在尼克松担任总统的头两年中，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之间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直到勃列日涅夫凭借他作为总书记——柯西金从未想过担任这一职务——的权力，利用党获得了突出地位之

后,他们的内讧才告一段落。柯西金也不准备为取得掌握我国高层外交活动的权力而同勃列日涅夫进行斗争。

尼克松政府令他的支持者们感到迷惑不解。戴维·洛克菲勒告诉我说,总统给他的银行伙伴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一心想着在全球范围内与俄国人竞争”,而且尼克松认为我们正在“以一切可以想象的方式”向他挑战。亨利·福特二世——1964年他陪同我参观底特律装配线时我第一次同他见面——路过莫斯科曾和我一同进餐。他打算在卡马河畔建造一座汽车厂,但他回国后才知道这个项目已经被政府否决了,其原因可能是苏联对美国入侵柬埔寨做出了强烈反应。

哈里曼也告诉我说,基辛格和尼克松因我们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而觉得受到了不友好的对待,他们对苏联海军在古巴周围进行活动感到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坚持反对莫斯科的强硬立场无论如何也不会对共和党在11月国会选举中的结果产生不利影响,虽然他们并不打算挑起一场直接冲突。总而言之,美国政府在1970年并没有真的把发展苏美关系当成一项需要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明显的证据就是除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之外,基辛格在这一领域几乎没有采取过积极行动。秘密渠道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第十三章

攀援最高级会谈之山

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想做成一笔艰难的交易

1971年新年前夕，莫斯科对尼克松越来越感到恼怒和不耐烦了。他已经任总统两年了，但是他对苏联究竟持什么打算仍然不明朗。葛罗米柯和克格勃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就苏美关系问题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交政治局进行讨论。两位作者当时对两国关系很快能得到改善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更不用说能变得友好起来了。

这份备忘录警告说，在尼克松担任总统的头两年里，其对外政策只是反应出它特有的性质和策略上的拖延，同民主党前任相比没有重大的变化。“美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对抗显然将持续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备忘录宣称。它强调指出，尼克松政府“必须认识到西方国家需要对苏联的利益加以认真的考虑”，并且列举了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其中包括保持苏联的军事实力，以便使“美国统治集团”相信，奉行避免同苏联进行直接对抗的外交政策是“符合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的”。与此同时，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提出我们应坚持与美国实行和平共处的方针，并且强调达成符合我国利益的协议的必要性。

苏联领导层批准了这一政策，他们认为尼克松为了在下一年的选举中再次当选，肯定希望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以提高其政治声望。苏联领导层也希望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因为——正如备忘

录中所说——证实进一步发展苏美关系的可行性“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尽管这种关系一直是不稳定的”。因此，政治局做出了要更加积极地同尼克松打交道的重要决定。

作为大使，我对这些外交方针已经考虑了好几个月，而且我建议莫斯科在处理最高级会谈问题时要坚持同样的方针。领导着强大的苏联海外情报机构的安德罗波夫当时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已经非常活跃。他渐渐地同葛罗米柯一道成为准备提交给政治局的重要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之一。葛罗米柯对此丝毫没有介意，因为它能确保他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得到批准。他们的个人关系不错，因为安德罗波夫非常谨慎，从不干预葛罗米柯对外交政策的日常管理工作，葛罗米柯则很尊重安德罗波夫在政治局里享有的越来越大的影响。

政治局的政策变化与尼克松本人的竞选政治计划出现了奇妙的巧合。尼克松开始对两国关系以及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重新产生了兴趣。越南战争仍然是一个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对总统说来就更加重要了。

基辛格随之也对两国关系，特别是对与我就限制战略武器和安排最高级会谈问题交换意见表现出了比较积极的态度。秘密渠道渐渐繁忙了起来。政治局认为，尼克松既然想让莫斯科同意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那么这种愿望将会促使美国政府寻求就柏林问题达成新的协议，并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采取更加积极的立场。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对能否举行最高级会谈并没有把握，但他们认为值得试一试。尽管我对这件事也拿不准，但我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也许这是因为我比葛罗米柯还赞成举行这么一次最高级会谈。

总之，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制定的战略不仅有助于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而且有助于解除对美国援建卡马河汽车厂的限制，这些限制曾经使亨利·福特二世感到十分恼火（虽然福特此时已经失去了兴趣）。双方为促进双边关系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就

苏美热线现代化以及就降低发生核事故的危险达成了协议，葛罗米柯和罗杰斯后来在华盛顿签署了这两项协议。当然双方还达成了于1992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协议。

1971年1月9日，我和专程从南加利福尼亚海岸圣克利门蒂尼克松度假别墅飞回的基辛格举行了会谈。他要我把总统的想法转告给苏联领导层。他说，尼克松同意苏联领导层的看法，认为我们两国关系还有许多有待改善之处，他现在感到他可以在1971年——在他把注意力转到竞选活动之前——这一年当中尽力改善两国关系。

接着，基辛格提到了有待讨论的主要问题：柏林问题（总统建议通过我们的直接渠道极其秘密地交换意见），中东问题（总统提议恢复双边对话，以达成一项解决方案），以及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总统建议首先就防御性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然后再准备就进攻性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基辛格特别强调了举行最高级会谈对解决上述所有问题的重要性。

他随后提出了一个“很微妙的请求”：美国方面强烈希望，如果苏联准备就国际问题提出重要建议，他们应该直接向美国政府提出，而不要通过缅因州民主党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提出。马斯基很快就要访问莫斯科，并打算在下一年和尼克松竞选总统。

我得到的印象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已经在圣克利门蒂进行了重要讨论，他们一致认为需要恢复苏美对话并使之向举行最高级会谈方向发展。不管怎样，他给我带来的信息确实表明他们已开始尝试认真做这件事。我把我得出的结论向莫斯科做了汇报，并且建议我们应该做出积极的反应。选举因素已经在起作用了！

莫斯科很快做出了答复。1月23日，我通知基辛格莫斯科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并建议会期定在当年夏季的后半段。总统提出的议事日程是可以接受的，根据我们的理解，它应该包括欧洲问题，西柏林问题，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解决中东问题的合理方案以及印度支那战争。简言之，苏联的反应为我们两国这一年的关系

直接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5天之后,基辛格告诉我总统已经同意了苏联提出的建议,但他又说,对他们两人来讲,同时就三个重要问题——西柏林问题、核武器问题和中东问题——进行预备性会谈“实在困难”。基辛格随后建议“眼下”我们应利用秘密渠道集中精力讨论前两个问题。他把中东问题慷慨地留给了罗杰斯和国务院去解决,因为他非常清楚那是一个很难砸开的硬果子。我们对这样的分工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反弹道导弹和最高级会谈

正是从1969年11月及1970年这一年开始,我国代表团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了长期、复杂的讨论,但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涉及到两种不同类型的战略力量:即进攻性核武器系统和防御性反弹道导弹系统。苏联方面首先提出了以欧洲为基地以及以地中海和北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为基地的美国飞机问题,但华盛顿拒绝讨论。美国战斗轰炸机可以利用这些所谓的前进基地系统进入我国领土。这些问题最终在1972年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签署之后开始的后几轮谈判中得到了讨论。

谈判在进攻性武器问题上陷入了僵局。进攻性武器种类繁多,而两国核力量结构的不同又使这类武器系统变得更为复杂。我国的核力量主要依靠陆基重型导弹,而西方则有着地面、空中和水下“三位一体”的导弹体系。此外,由于正在研制更加先进的导弹,所以军事技术的发展已经走在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前边。例如,广泛、公开的讨论已进行了较长时间,却忽略了重要的多弹头导弹,即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问题,这种导弹一旦到达目标区域,便可以向一些不同方向的特定目标发射多枚弹头。这一问题最初并没有拿到谈判桌上讨论,虽然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和

212

反弹道导弹系统实际上是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美国方面首先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上取得了技术突破,因此尼克松政府试图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它的优势。到1970年时,美国已在准备部署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而苏联此时甚至还没有开始进行试验。所以,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期间,美国对讨论分导式多弹头导弹问题并不热心,而且他们肯定也不愿意禁止使用这种武器。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基辛格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建议禁止制造你们没有而我们已经有的武器,真是够聪明的。”

所以,当美国方面开始寻求对洲际弹道导弹——包括我国的重型导弹——做出明确限制的时候,莫斯科正式提出了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问题,因为简单地计算导弹数量而不将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计算在内将会使美国取得明显的优势。后来美国同意了计算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但是却相当巧妙地提出了一个尼克松政府(特别是基辛格)知道莫斯科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即把禁止制造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和现场检查禁令的实施情况联系在一起。不出所料,这个建议立即遭到苏联方面的反对。此外,美国提出的减少洲际弹道导弹数量的建议隐含着这样的条件:大幅度减少苏联的而不是美国的主要重型导弹。

美国对其技术优势的自信在核裁军的整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对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争论一直到罗纳德·里根梦寐以求的星球大战防御计划,很容易看出美国渴望在某种最尖端的武器方面确保对苏联的优势,而不管这种愿望可能是多么的虚无飘渺。军备竞赛的整个历史表明,任何一方都不会让另一方走到自己的前边。美国在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方面的优势只保持了两三年的时间,随后苏联便制造了自己的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213 美国拒绝禁止制造这种导弹是它在整个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过程中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事实证明,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没有

认识到努力使双方相互放弃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必要性，从而失去了及早控制苏美战略军备竞赛的又一个机会。尼克松政府没有做出这样的努力。直到 90 年代初期，也就是 20 年后，两国政府才在 1993 年达成的协议中认识到这一点，使销毁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成为两国全面裁减战略军备的一部分。

因为限制生产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弹头或全面禁止生产此种导弹，势必受到五角大楼及其右翼政治支持者的反对，所以尼克松和基辛格逐渐决定只寻求对反弹道导弹系统实行限制。与此同时，白宫期待着达成某项协议，以表明它准备继续寻求对战略武器进行限制。由于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陷入了僵局，因此秘密渠道为了在最高级会谈上能够达成军备控制协议相应地加快了工作节奏。

我代表莫斯科向基辛格提议，先单独把反弹道导弹问题列出来，集中精力解决这一问题，以便当年达成一项协议，同时把陷入僵局的控制进攻性武器问题先搁置起来。但是，基辛格想就进攻性导弹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卢埃林·汤普森告诉我，除非就进攻性武器至少达成一项有限的、哪怕是象征性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否则尼克松将不签署单独的反弹道导弹协议。这至少是给美国代表团下达的指示。

关于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讨论也并不简单。是将它们全部取消，还是允许它们用于保卫首都、国家指挥机构及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由于两国政府内部一直在就此问题争论不休，所以使它变得更为复杂和混乱。在莫斯科，有些政治领导人准备就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向美国人提出无选择建议。但是，军方大多数首脑人物反对全面禁止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他们认为该系统已经开始部署在我国首都周围，尽管对这种系统存在着技术上的反对意见，即该系统并不完善，而且进一步部署将耗资巨大。军方的反对使得苏联领导层未能做出决断。

美国方面自身也存在着意见分歧，而且无论如何它也把苏联

方面本来已经十分混乱的想法理解错了。结果，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后，就反弹道导弹系统提出的无选择建议也被放弃了。最终产生的协议允许双方各有权建造一个保护首都和——如果愿意的话——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基地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对双方而言这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因为在未建造之前就将反弹道导弹系统断然放弃将能够解决一个最为关键的裁军问题。要想理解我们丧失了一个多么重要的机会，只要回想一下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想法怎样在大约 10 年之后发展成为罗纳德·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就够了。

基辛格和我为建立一个外交体系，以便达成双方在政治上均可接受的裁军协议而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在谈话过程中，我们达成了“一种谅解”，这一谅解最终形成了把反弹道导弹系统和对洲际弹道导弹的某种限制联系在一起的想法。这一想法成为未来的特别谈判的议题。两国政府决定通过尼克松和柯西金秘密交换信件把我们的谈话结果变成正式的协议，在 5 月份期间基辛格和我一直在推敲着文件的措词。

1971 年 5 月 20 日，华盛顿和莫斯科同时公布了这个突破性进展。公告指出，美国和苏联同意努力制定一项反弹道导弹协议，和制定某些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措施。协议和限制究竟是什么样的将留待在最高级会谈之前举行的进一步谈判决定。

罗杰斯对基辛格和我为拟订这项协议而进行的多次会谈又是一无所知。当他得知公告即将发表时，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根据总统的办公厅主任 H. R. 霍尔德曼在回忆录中所说，罗杰斯问霍尔德曼：“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正在做这件事？你们大可不必让我参与这件事，但无论如何也得让我知道啊。”

基辛格派去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人员也对此恼怒万分。他们后来指责基辛格为了尽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渲染在他们看来是尼克松非常想举行的最高级会谈而出卖了他们。我不能为他们或美国代表团进行辩护，但我个人得到的印象是双方都不想

过分拖延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时间。造成一种一切成果都是通过秘密渠道取得的印象是不公正的。代表团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经过好几个月的艰苦谈判,代表团帮助分析、澄清和系统阐述了双方的具体立场观点。但是,秘密渠道为两国政府在僵持的问题做出相互妥协,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做出最后决定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两国代表团团长气愤地感到秘密渠道的参与者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成果的原因。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气愤,特别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非常努力地工作。

有一个小插曲可以说明这种双重谈判方式的复杂性。5月中旬,我接到基辛格打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说的是出席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杰勒德·史密斯回到了华盛顿。史密斯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有关他和苏联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在日内瓦湖上划船时进行的长时间谈话的备忘录。这份秘密备忘录概述了谢苗诺夫的建议。按照史密斯所言,谢苗诺夫的这些建议最终为达成协议开辟了道路。

215

使总统和基辛格大为吃惊的是,谢苗诺夫在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竟然包括了总统本人通过秘密渠道和苏联政府交换意见时提出的主要观点,而他们认为史密斯和他的代表团根本不可能了解秘密渠道的情况。基辛格强烈指责苏联方面对秘密渠道不负责任,并且无视总统渴望与苏联领导层保持秘密接触的心情。他说,苏联方面更愿意采取正常的外交联系方式,虽然它已经充分意识到这种做法可能会泄露消息,从而给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造成困难。“我们很可能停止使用秘密渠道,”他警告说。

我回答说,任何一方都可以决定是否使用秘密渠道,但我相信这一偶然事件是由于误会或处理不当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双重谈判的困难条件下是很难避免的。

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的: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的谢苗诺夫从他在莫斯科的朋友那里得知了秘密渠道以及它的运作情况,因此决定按照同样的思路主动提出一项建议,当然他没有向任何人

泄露他知道秘密渠道的情况。他希望以他的即兴发挥给莫斯科一个惊喜，并能够获准继续按照同样的思路进行谈判。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而且，葛罗米柯在莫斯科进行了一次秘密调查，试图搞清楚谢苗诺夫的消息来源，但没能查清楚。不管怎样，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仍在继续，谢苗诺夫仍然担任我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不了解通过秘密渠道正在交换着的情报。

显然是为了鼓励我们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继续进行磋商，基辛格于5月24日通知我，尼克松决定从需要商业部事先批准的项目清单上将出口给苏联的小麦和其他谷物删除掉。与此同时，他们取消了另外一个要求，即全部小麦的一半要由美国船只（他们的货船的载重量要比我们的大）运载。美国政府在11月同意向苏联出售价值1.36亿美元的谷物。

216 这里还需要澄清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最后一个敏感问题，这就是有关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更准确地说，是有关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问题。早在1970年1月，当基辛格和我第一次讨论反弹道导弹系统与可能冻结战略导弹的关系时，我问他从海上发射的导弹是否也包括在内。他说美国准备同时采纳这两个方案。我表示我个人认为苏联不愿意把这种导弹也列入被冻结的范围之内，我们的讨论就是这样结束的，我把讨论的结果向莫斯科做了汇报。

2月4日，我向基辛格进一步证实，政治局同意把签定反弹道导弹协议和“停止部署进攻性导弹”联系起来意见。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问题没有被单独提起，因为莫斯科认为基辛格已经接受了我们对此问题的立场。这次，基辛格还是没有向我提出这一问题。

事实上，直到1971年5月20日，也就是苏美就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初步达成的协议发表联合声明的那一天，我们所达成的谅解仍然是有效的。但是，后来的情况表明，只有苏联方面和基辛格承认这一谅解，因为五角大楼和参与正式会谈（不是通过秘密渠道举行的会谈）的其他美国谈判人员认为，将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纳入一项全面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

国当时已经在战略潜艇方面取得了优势，而苏联仍在组建潜艇舰队，企图追赶上去。总之，通过正式协议冻结潜艇发射的导弹将对美国而不是对苏联有利，因为这样做可以使美国保持军事优势。这就是为什么在和基辛格讨论这一问题时，我首先对这一观点提出反对意见的原因。

我不知道基辛格是否还记得这一切（他脑子里还装着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也不知道他是否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限制陆基战略导弹上——他们认为这种导弹是苏联整个战略武器库中最危险的武器。总之，在谈判的最初阶段，他没有给予海上发射的导弹应有的重视。直到1971年底他才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不顾我们的反对竭力调整他的立场。只是在1972年4月他出访莫斯科期间同勃列日涅夫为准备举行最高级会谈而进行谈话时，他才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双方的分歧。

基辛格访苏的结果是达成了一项停止建造新型导弹潜艇的协议。美国历史学家把这项协议看成是基辛格取得的重大成就。事实的确如此，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在同意停止建造新型导弹潜艇的同时，苏联方面还同意接受一个最高限度，这个最高限度保证苏联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建造一些已经列入计划的潜艇导弹发射装置。基辛格也知道这一点。但双方却不愿公布这件事。

为举行最高级会谈而施展策略：与中国建交在即

当我正准备以代表身份回莫斯科出席党的第24次代表大会时，基辛格要我向苏联领导层转达尼克松的一个口信。这是他们施展的一个很有典型性的巧妙策略。

坦率地说，基辛格说道，总统想让莫斯科知道，他感到很难描

217

问题却反应过于迟钝。另外，苏联方面对他在2月中旬发出的一封对苏联潜艇日益频繁地在古巴港口进行维修的活动表示关注的信函没有做出反应。

总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也许，基辛格说，这种感觉是错的——这就是拟议中的最高级会谈笼罩着“一层不稳定的阴影”。尼克松仍然相信，如果双方在——比如说——7月份就西柏林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并能在大约同一时准备出一份反弹道导弹协议供最高级会议签署，那还是有益的。最后，尼克松还提出有可能在1972年最高级会谈期间召开一次欧洲安全会谈，而且他还准备讨论中东问题。

尽管这些提议是非正式的，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尼克松表明他已经为在1971年——甚至在他出访中国之前——举行一次苏美最高级会谈做好了准备，尽管很多美国历史学家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尼克松是为了加强他对莫斯科的影响才打出中国这张牌的。转达这一口信的目的无疑也是为了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苏联领导层施加影响——这次党代表大会将讨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事实上，克里姆林宫对他的这个口信非常赞赏，此外，它还加强了勃列日涅夫改善对美关系的愿望。但是，这个口信仍不足以使最高级会谈能够尽快举行，直到1972年，最高级会谈才得以举行。莫斯科试图逼迫美国在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前就能够在西柏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这反而促使尼克松更快地访问了中国，这些情况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而且也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次党代表大会从1971年3月30日开到了4月9日，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党来说，它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苏联领导层认识到国家正处在困难的形势下。苏联经济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例如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和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地下出版物的出现表明不满情

绪正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滋长。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急剧恶化以及与美国关系的不稳定致使军备开支大幅度增加，从而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党的精英们渐渐开始认识到必须比较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并且要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缩小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但是，党仍不准备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来解决国内问题。持不同政见者被视为政权的敌人，那些在国外发表作品的作家遭到了报复。不墨守陈规的人仍然受到排斥。总之，我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世界其他国家的现实情况以及我国国内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促使苏联领导层下决心改善同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我国对外政治宣传的基调也逐渐建立在与这些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基础上，尽管它们的社会制度与我们的不同。在克里姆林宫内部，这种观点因与尼克松就举行最高级会谈进行的对话而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因此，召开这次党代表大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宣布党的和平计划，而且呈现在这个国家面前的也是这样的结果。

改善我国与美国的关系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之一。与此同时，我们仍然经常对美国在各个地区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并且声称“资本主义危机在不断加深”。但是，党的总书记在总结报告中还是首次强调要在新的五年计划中优先考虑消费品的生产。他还强调指出，苏联将继续致力于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党代表大会本身提供的支持使他感到，他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安排他和尼克松首次会谈方面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

党代表大会结束后，政治局开会听我转达尼克松的口信，并且讨论我们应做出的反应。我发表意见说，尼克松提出的条件为举行最高级会谈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柯西金支持我的观点。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也开始倾向于同意这一意见。但使我大为惊讶的是，葛罗米柯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利用尼克松急于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心理，首先解决西柏林问题。不管这一问题对苏联来说有多

么重要，反正它是“上届美国政府遗留给下一届政府的问题”。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认为“和尼克松的会谈可以等一等”，尤其是在印度支那战争正在进行以及美国总统选举日益临近——这当然是尼克松想举行最高级会谈的确切原因——的情况下。

219 除了和外交事务有关的少数人——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柯西金、安德罗波夫及军方代表——之外，政治局委员中很少有人真正了解美国。他们对美国的看法仅限于从《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读到的东西，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听上去非常像是从这两份报纸的专栏上摘下来的。他们可以收到我的电报，但对我提出的问题却置之不理，除非这些问题确实要在会上进行讨论。对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来说，美国和外交政策并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有自己的管辖范围，他们不欢迎另一位政治局委员进来干预，所以对于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外交工作，他们都采取一致的行动。他们大都发表最正统的观点，很少提出有影响的建议。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支持总书记提出的外交建议。

在西方国家中，很多人认为共产党总书记是不对任何人负责的真正的独裁者。对斯大林而言，事实的确如此，但对他的继承人而言，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勃列日涅夫也不例外。他的确是领导层中的第一把手，然而，即使作为地位相当的一班人中的第一把手，他也不能总是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政治局成员。政治局的每一位成员都有权对列在每周例会——通常在星期二举行——议程表上的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需要讨论紧急问题时可以随时召集会议。

所有的会议都是在克里姆林宫里一间被称作是政治局会议室的房间里举行的。这间屋子相当宽敞，但陈设简朴，丝毫没有克里姆林宫那种华丽的格调。委员们按事先排好的次序坐在一长会议桌的两侧，这和白宫的内阁会议非常相似。在会议桌的首席坐着主持会议的总书记。当他宣布会议讨论的议题之后，便由提出

议题的委员或代表总书记准备议题的委员发言。接着进行一般性讨论,有时讨论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且进行得很热烈,例如讨论当尼克松仍在轰炸北越的时候,我们是否还应和他举行会谈时就是如此。讨论由总书记宣布结束并做总结性发言。一般说来,决议都会得到一致通过,投票表决的情况极为罕见。如果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总书记一般会推迟到下次会议再做决定,这表示他要趁两次会议间歇的时间和他的每一位同事在幕后进行私下会晤,以便找出一项妥协办法。任何一位总书记自然都会有很多能够使他的意见得到政治局批准的说服办法,但他始终小心翼翼,以免不必要地引起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对抗。他们毕竟可以反对并撤换他,就像他们对待赫鲁晓夫那样。

关于所有重要的国际问题,外交部长——在我从事外交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葛罗米柯一直担任此职——必须提出一份意见草案,供政治局讨论、批准。为了获得支持,他通常事先要和总书记以及政治局中某些有影响的委员讨论他提出的建议。有时,政治局

220

会邀请大使们汇报各自驻在国的情况,我就被邀请过很多次。当勃列日涅夫打算出国访问或同外国领导人进行会谈时,他本人或者外交部要向政治局提交一份他将遵循的基本指导方针的书面草案,以求得批准。这份草案是在葛罗米柯的协助下起草的。尽管他有机动的余地,但基本上还得遵循政治局批准的指示方针。此后,总书记一般要将口头或书面报告提交给政治局审议。其他政治局委员接见外宾或出国参加谈判也要遵循同样的程序。

美国总统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拥有较大的自由。他们没有义务告诉任何人他们与外国领导人会谈的细节。但是,我们党的总书记也可以用不止一种办法来推行他们的政策,虽然得不到政治局的同意就不能做出实质性的决定。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勃列日涅夫私下对我说,虽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同意立即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意见必须得到尊重,但我提出的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意见是正确的,应该“沿着这条路线走

下去”。他又说：“最高级会谈很可能在明年举行。”他向我透露说，他非常愿意访问美国，而且希望在尼克松访问苏联之后做这件事。他以我们通常进行友好交谈的方式很随意地命令我“继续按同一方针办”。

对我来说，这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我的外交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由于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不得定期同华盛顿的最高级官员进行会谈；我也因此从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晋升为中央委员。

回到华盛顿后，我于4月23日在白宫会见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莫斯科发生的事情。他们当然已经听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公开讲话，基辛格说总统欢迎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对两国关系应该持建设性态度的观点。我告诉基辛格，苏联政府准备就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与总统互通信函，他评论说：“这是有助于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步骤。”

221 接下来我说到了举行最高级会谈的问题。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我告诉他尽管尼克松总统已经得知苏联政府基本上持积极的态度，但是，我声称“我个人对能否举行这次会谈存有很大的疑虑”，除非我们能够首先就西柏林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基辛格显然非常吃惊，随之做出了十分激动的反应。他强硬地表示他不可能接受苏联方面的最后通牒，以签订一项有关西柏林问题的协议为代价来换取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这将使总统除了放弃最高级会谈别无选择。

我对他说他没必要如此气愤。这决不是一项最后通牒。如果西柏林的紧张局势仍在持续，那么很多国家的——包括我们国家的——公众都将对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疑惑不解。我完全知道基辛格为什么很不高兴，但是我必须服从政治局的决定。我们在柏林问题上做出的强硬反应迫使尼克松调整了他的政治目标，在访问苏联之前访问了中国，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这是葛罗米柯在

政治局提出的建议造成的直接后果。

4天后,应基辛格的邀请,我再次与他举行了会谈。他说,总统指示他讨论三个问题:最高级会谈问题、西柏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

他说尼克松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注意到苏联领导层对最高级会谈问题一直表现得犹豫不决,不管莫斯科私下里有什么原因,他觉得再不值得提出确定举行最高级会谈日期的问题了——他也不可能接受把最高级会谈和其他问题(指西柏林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的意见,虽然他准备讨论其他任何国际问题。所以他将无限期地把举行最高级会谈问题搁置起来,虽然他准备在莫斯科愿意的时候再次讨论这一问题。

关于西柏林问题,基辛格说,很遗憾,谈判的进展显然比预想的要慢得多,然而,总统准备为寻求达成一项协议而继续做出努力。基辛格本人已和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负责东西方关系问题的私人助理埃贡·巴尔进行了讨论。埃贡·巴尔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协议。(巴尔为改善波恩和莫斯科的关系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基辛格用了几天的时间平抑并否定——尼克松知道这一情况——美国新闻媒介做出的政府出于反苏的目的正在同北京发展关系的推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通过互派非官方代表团和运动队——第一支访美运动队是以“乒乓外交”而闻名的——已经升温。看来,白宫正在努力消除因它主动与北京接触而对苏美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它决不会停止和我们玩外交游戏。

6月10日,基辛格邀请我到戴维营——总统在华盛顿以北山区的休养所——和他进行非常随意的会谈。这是对一位外国大使做出的最不寻常的友好姿态。我们俩人乘直升机飞抵那里。基辛格说,根据总统的指示——尼克松当时没在那里——他愿意从从容容地回顾一下我们两国在某些特殊问题上的关系。我们俩人很轻松地谈了6个小时,双方在谈话中对几乎所有的问题显然都持

222

积极的态度。最后，基辛格再次提出尼克松期待的出访苏联的问题。我始终觉得基辛格兜了这么个大圈子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谈话引到主要话题——最高级会谈——上来。

基辛格说，总统愿意讨论双方就欧洲问题提出的具体动议，以便“着手解决”欧洲问题。基辛格继续强调说，总统对中东问题极为重视，并且希望能够将它提到议事日程上，这样总统和勃列日涅夫就可以在没有其他美国人在场的情况下（他甚至愿意只让一名苏联翻译在场）讨论这一问题。如果通过这种坦率的会谈能够和苏联领导层达成绝对秘密的协议，基辛格说，那么总统将会千方百计保证履行他答应的条件而无需向任何人做出解释。

遗憾的是，莫斯科没有利用尼克松对找到一个双方均可以接受并且有利于解决问题的重要步骤所表现出来的兴趣。这是一次机会，因为华盛顿对苏联向阿拉伯国家提供军事援助感到担忧。我们刚刚和埃及签定了一项友好条约，并且继续向叙利亚提供战斗机和地对空导弹；我们还派去了军事顾问。但是，我们同阿拉伯国家之间过分紧密的关系使我们难以在中东实行更为灵活的政策，并且不能与华盛顿采取一致行动。

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让我转告苏联领导层尼克松计划访苏的日期，假如克里姆林宫认为这一访问在原则上是可行的话。他说9月份是最为合适的时间（看来，尼克松仍然希望把最高级会谈安排在1971年——尽可能在他访问北京之前——举行）。另一个可以接受的日期是1972年3月至5月期间。

我本人则向他提供了我们对西柏林问题的详细意见。在柏林举行的随后几轮会谈中，西柏林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后来在波恩又结合着勃兰特访问华盛顿一事讨论了这一问题。基辛格指出，苏联、美国和德国在柏林举行的会谈既关键又非常秘密。美国方面只有三个人直接参与此事，他们是总统、基辛格以及美国驻波恩大使肯尼思·拉什。拉什曾是尼克松在杜克大学读书时的法学教授，故被看成是圈里人并且受到信任。国务院——包括罗杰斯国务

卿在内——一点不知道有关秘密交换意见的情况，并且仍在继续执行由西方四大国批准了的指导方针。

后来，我听基辛格和西德驻美大使罗尔夫·保尔斯秘密地对我说起与维利·勃兰特就西柏林问题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保尔斯对我说，尼克松告诉勃兰特，他对西柏林问题比勃兰特上次访问时更为乐观。总统的乐观态度建立在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苏联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但是，在柏林会谈上取得的进展很可能是和最高级会谈必然联系在一起而得到的结果，在政治局秘密会议上已经这么做了。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于6月底拜访了尼克松，向他详细说明苏联呼吁五个核国家举行会议，讨论核裁军问题的声明，并将声明文本交给了他。总统表示他将认真考虑这一建议，但他又说他想提出一些坦率的，然而却是极为秘密的初步意见。他强调说，他希望这些意见能引起苏联政府的注意，但是不要让有关记录出现在美国国务院和我国外交部之间的正式谈判中。

“我不想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尼克松说，“我和苏联领导人一样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世界上只有两个真正的核大国，他说，它们当然是苏联和美国。就核潜力而言，其他三个国家是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的。尽管它们用不恰当的方式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但它们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弥补这一差距。考虑到这种状况，他提出，召开这样一次五国会议的结果难道不是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削减两个核超级大国的核军备上，而对其他三国产生不了什么重要影响吗？甚至在讨论削减它们为数并不太多的核武器之前，它们就可能首先要求把苏联和美国的核力量削减到和它们一样的水平上。最后，他建议我们继续通过秘密渠道交换意见。在我看来，他的论点是站得住的。

总统接着又把话题转到苏美关系上来。他认为两国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虽然改善的程度仍不十分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说，我们两国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充满考验和机会的新的重要时期，鉴于我们双方都有良好的愿望，在美国将精力集中于明年年中举行的选举之前，苏美关系将有可能取得进展。

224 “目前，”总统继续说道，“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两国关系存在着两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就西柏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还存在着另外的一些问题，比如中东问题，但这不是轻而易举能够解决的。”

谈到中东问题时，他说，莫斯科和华盛顿应该注意避免爆发新的武装冲突。接着，总统明显带着几分犹豫神色说道，苏联领导层应该理解最近基辛格根据他本人的指示向苏联大使转达的他本人就“一个重要问题”提出的建议（尼克松显然指的是最高级会谈问题，但他避免用这个词）。他希望苏联领导层能像对待他就其他问题——包括柏林问题——向莫斯科提出的建议一样，对此建议给予充分的关注。总统最后说，总的说来，他相信在竞选前的几个月中美苏关系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我表示我个人同意他的看法。

我们没有讨论同北京的关系，它已经成为令人伤脑筋的地缘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华盛顿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政府一直在隐瞒它与中国人进行的接触。这些接触是由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最高领导层秘密进行的。只有有限几位密友参与了此事。

然而，美国政府内部却展开了一场全面的讨论。仍然在白宫和国务院担任顾问的卢埃林·汤普森6月中旬私下对我说，在美国领导层内部——包括国务院的最高级官员——就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及其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展开了争论。

美国领导层内部基本上存在着两大派别，汤普森说，一派倾向于优先考虑同苏联达成协议，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因为苏联和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另一派的观点则是要优先考虑打开中国的大门——自1949年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美国同中国几乎

没有进行过官方接触,也没有建立任何正式关系。这一派认为,中国可能有助于尽快结束越南战争,其原因部分在于它可以向苏联施加压力。他们推测莫斯科几乎不可能做出同时与华盛顿和北京处于紧张状态的选择。汤普森通过和总统私下交谈得到的印象是,尼克松眼下正在尝试同时保留两个机会。

此后不久,基辛格便去了亚洲,他甚至还在6月30日请我去谈论了此次访问的情况。此行的目的据说是去了解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日益严重的紧张关系,也许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巴基斯坦后来成了他秘密访华的起点站,访华自然才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他对此保持缄默。

225

在基辛格出访的时候,莫斯科终于将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时间定在11月或12月,这样实际上便将会谈拖到了年底。我把这封电报转交给基辛格的副手亚历山大·黑格,他显然对这一所谓的“好消息”感到高兴,并且说他要立即向总统和基辛格报告此事。鉴于美国和共产党政府领导下的中国有着长期不和的历史,所以,莫斯科根本没有想到两国之间当时正在秘密商议恢复邦交的可能性。当克里姆林宫得知尼克松计划——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在他与勃列日涅夫于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前先去访问中国的消息时,再没有谁比它更为惊讶,更为迷惑不解了。

第十四章

地缘政治中的三角关系

走进中国

1971年7月15日上午9时，我被召到白宫，通过保密电话与基辛格——他刚从亚洲回来，现在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总统度假别墅和总统呆在一起——进行谈话。这个电话来得非常突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基辛格说，总统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将宣布基辛格已于7月9日至11日访问了北京，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这与总统本人的愿望完全一致——于1972年3月前访问中国。总统“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基辛格的声音听上去显得十分兴奋，它显然是在暗示我们对总统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的请求表现出的拖延态度使中国得到了好处。在内心深处我只能同意他说的话。他继续说道，尼克松总统要求他向苏联政府转达一个口信，这显然是要抵消突然宣布他访华的新闻对美苏关系造成的不利影响。

尼克松在口信中说道，苏联政府知道在他宣布访华之前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美国政府已经一再申明其外交政策的要点，总统愿意重申和强调基辛格于6月10日在戴维营及6月30日在华盛顿对多勃雷宁大使讲话的精神。总统宣布他的访华计划并不是直

接针对任何第三国的，两国关系最近出现的积极发展的势头如果有任何的倒退，无疑将对我们两国造成严重的后果。总统希望苏联政府不要误解他的访华意图。总统通过基辛格转达说：“您，大使先生，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我们在这两年里为发展两国关系所做出的努力，特别是了解我们将安排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基辛格坚持认为我国领导人最近做出的拖延最高级会谈的决定促使尼克松把他与中国人的会谈提前了，但是，这并不会给美苏关系造成什么影响。双方现在都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方面，双方可以迅速推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很多问题得到解决——美国方面特此宣布它愿意这样做；或者，双方可能倒退回去，对我们两国的关系重新做出估价。尼克松准备接受任何一种选择，但是“我们更愿意遵循我们现行的方针”。

227

7月19日，基辛格刚从圣克利门蒂回来便邀请我去白宫吃饭，并在总统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把他的意见告诉了我。他显然想为尼克松访问北京的计划进行辩解，虽然我本人并不打算提出这一问题。

他的话归结起来就是，美中协议并不会直接违背苏联的利益。他重点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尼克松曾经一再提出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的问题，而他们一直未给予一个明确的答复，对此我不能予以否认。我感到我们无可奈何地听任美国人和中国人击败了我们自己，虽然我肯定不会让基辛格知道这一点。

基辛格强烈地抱怨道，由于存在着“心理上的”困难，所以很难在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个人谅解，也很难对双方的动机做出不带偏见的估计。他说，他们之间关系的特点是双方对相互做出的保证“极端地不信任”，这有损于整个事业，因此双方应该克服“心理上的障碍”。他说，总统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继续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而且他对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态度仍

然没有改变。他希望最高级会谈能在 1972 年 4 月或 5 月举行。

基辛格还对我详细介绍了他此次访华的情况,很明显,他想借此消除我们的疑虑。据他说他们几乎没有谈及苏联,他甚至觉得中国最担心的实际上并不是苏联,而是日本。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经济力量的迅速增长以及它正在成为一个核大国的前景表示不安。他们还详细讨论了东南亚战争,但基辛格不愿对我细说此事。他只是说两国政府还要进行长期的对话。尽管双方在东南亚问题上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但是他仍然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即可以通过使该地区中立化并防止外部势力进行干预的方式使问题得以解决。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而不是东南亚问题。基辛格对我说,他打算让“苏联政府自行判断”,是否在同河内进行讨论时尽量利用他提供的情报。

在谈判结束时,基辛格大度地说,如果莫斯科对他的中国之行有什么问题的话,他奉总统的命令将给予“坦率的”回答。但莫斯科后来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7月27日,尼克松再次向莫斯科做出善意的表示,即通过基辛格提出就减少意外爆发核战争的危险缔结一项协议。在历时10年的裁军谈判期间,美国曾经拒绝过我们提出的类似意见,但是现在尼克松建议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协议来签定。9月30日,在苏联外交部长访问华盛顿期间,葛罗米柯和罗杰斯签署了这项协议。

尼克松开始同勃列日涅夫进行对话

做出这些友好姿态之后,基辛格代表总统提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要求。尼克松第一次想直接给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写信,目的是同他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在此之前,尼克松和他的前任们一直按照传统的外交礼仪,通过作为总理的柯西金给苏联领导层写信,因为从官方角度讲,柯西金的级别比党的任何官员都要高。当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中为充当能与外国首脑打交道的角色

而进行斗争时，葛罗米柯悄悄地帮了他一把。他给苏联大使们下达了特别指示，并且专门指示我跟基辛格私下谈谈，向他解释这些情况。我接到了要我说明将总统的信件交给勃列日涅夫“更为适宜”的指示，我遵照执行了。

基辛格说，这封信中没有直接说明尼克松提议要和苏联领导层举行会谈，因为他希望不要显得过于强求了。然而，他说，在尼克松明年实现访华之前宣布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的日期和日程将是有利的。因此，信中就我们两国关系提出了“一些看法”，并且强调了它们的重要性。这些看法中包括华盛顿理解苏联在东欧的特殊利益。信中还解释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且肯定美国对推动苏美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西柏林问题、中东问题以及东南亚问题展开对话很感兴趣。

信中谈到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基辛格说，就是尼克松特别希望能从宏观的角度讨论一些问题，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上。这些问题可以而且应该在最高层领导人之间达成原则性协议之后由有关部门进行详细讨论。尽管这封信颇有感召力，但信中表达的观点却难以为当时的苏联领导层所接受。勃列日涅夫相当缺乏对外交政策的理性认识。因此他只能把全部信心寄托在葛罗米柯身上，但相比之下，葛罗米柯更愿意处理具体问题和执行具体决定，他始终都在根据国内政治的需要调整外交政策。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对外交事务知之甚少，因而难于站在理性的高度展望未来，或者难于筹划并随后实施复杂的策略行动。这种状况促使葛罗米柯形成了上述工作作风。由于勃列日涅夫给外国领导人的所有信件必须得到全体政治局委员的批准才行，所以葛罗米柯认为很难起草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信件并使之获得通过。相比之下，尼克松亲自起草信件或者只同基辛格商议，这样他就能制定出具有战略和策略水平的政策。

尽管说美国的民主是不完善的——它确实存在着很多缺陷——但我必须承认，比起勃列日涅夫来，尼克松在推行他的政

策方面更具独立性，在处理外交事务过程中也享有较大的自由，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更是如此。或许这种情况听起来令人感到惊讶，但事实确实如此。

如果了解尼克松在白宫进行日常工作的某些细节，便可以得知他和苏联领导层为什么不可能具有相同的战略思想。基辛格解释说，总统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他不受琐碎事务的拖累，这样他将能够有时间去关注重大问题。尼克松——一个学究式的人物——坚持不懈地遵守这一原则。每天晚饭后他都要回到没装电话的私人小书房里，花上两三个小时思考主要问题。在他自己独自思索的时候，任何人——甚至包括他的助手——都不能打扰他。

如果把不重要的问题或极具体的事情报告给他，便会招致他发火，并且严厉地指责那些自己不能解决问题的下属。这就使得白宫外面有些人对尼克松产生了不满，认为他在各方面都给了他的助手们太多的权力，这些助手中当然包括正在向我解释总统的日常工作情况的这位亨利·基辛格。

230 这里举柏林问题为例。总统知道谈判的主要方针，但仅此而已。当苏联领导人向他提出柏林问题时，他拿出了白宫所谓的“原则性决定”：美国应该在有利的情况下，按照合适的期限达成一项积极的解决方案。于是，对总统来说问题到此就算“结束了”。随后出现的一切附带问题都留给基辛格处理，“其中包括同埃贡·巴尔以及苏联驻波恩大使瓦连京·法林举行会谈，”基辛格直截了当地说。接着，基辛格将代表总统就在波恩举行三方会谈问题做出适当的决定。只是在个别的情况下，他才和总统就特别重要的问题进行磋商。

由于苏联领导层不断向总统提出柏林谈判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并且逐渐地把它们与最高级会谈联系在一起，总统开始不耐烦了。在他看来，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莫斯科不断提出要求只能表明苏联方面不相信他说的话，不相信他做出的柏林谈判最终将会

达成一项具体协议的承诺。

但是，据基辛格说，“不论是好是坏”，尼克松在他喜爱的全球性问题方面称得上是一位专家，而且他总是愿意在没有一大群官员和顾问参与的情况下独自做出重大决定。如果总统认准了某件事，那他就会大幅度地改变他的政策。中国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总统根本不会让国务院参与进来，甚至不和它进行商量，因为国务院众多的官员很可能会把他的倡议变成微小的、互不相连的步骤，结果是仍然因袭原有的方针。但总统要独立做出决定，并把它变成实际要求，国务院除了贯彻实施外别无选择。

总统愿意以同样的态度和苏联领导层打交道，基辛格说，但这丝毫没有用。尼克松屡次要求莫斯科就中东问题安排一次宏观讨论，他还希望莫斯科能帮助安排与越南——它是苏联的盟国——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双方未能就其中任何一个问题进行过重要的讨论。每一次都是因为长时间的拖延或因提出虽然重要，但并不影响总方针的具体策略问题而使得尼克松的提议不了了之。苏联领导层的集体领导方式不可能激发其成员的想象力和灵活性，他们很难按照非常有助于重新归纳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来实施外交政策。

基辛格指出他不只一次地试图用比较富有理性的措辞同葛罗米柯交谈，但他的苏联伙伴总是闪烁其辞。显而易见，不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都没有弄清楚莫斯科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实际上，他们正在寻求的重大决策不可能是在没有政治局同意的情况下，由葛罗米柯或者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做出的。这就是为什么葛罗米柯不能非常自由地谈论苏美关系问题的原因。他之所以言不尽意，既不是因为无知，也不是因为不愿意讲，而是因为他没有必要的权力。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小心谨慎的葛罗米柯决不会进行危险的临场发挥。

远离祖国使我享有较多的自由，因为在某些场合我可以说我是在发表个人见解。这使得我能够向美国人说出我的看法，同时

231 又不致于使我自己或我国政府承担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我被允许在有限的范围内即席发表意见，这可以使莫斯科拥有更多的选择。莫斯科一点一点地适应了大使有时可以逾越下达给他的指示的情况；我对他们构不成威胁，这很中他们的意。这有助于使葛罗米柯在政治局严格的束缚下获得一点儿灵活性。在我国的外交部门，甚至在我国整个的官僚机构中都非常缺乏这种渴望临场发挥的精神，而我却渐渐地更敢于临场发挥了。这很可能就是我为何能够在华盛顿长期担任大使的根本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讲，有时我敢于说一些不能向我的上司们说的话，这有助于莫斯科采取一些新的做法，因为我可以根据同美国最高级官员进行的非正式会谈向政治局提出新鲜的建议和意见。

这样，我向莫斯科提交的报告就比一般的外交电报具有更丰富的内容。我的大部分电报(除了极其秘密的电报之外)都要在政治局委员中间传阅。当我提出一项建议时，葛罗米柯要做出两种选择：或者就我提出的问题拟定一个答复草案交政治局批准，或者等待其他政治局委员提出意见。我完全清楚这一做法，所以在我的电报中总要有这样一段话“除非另有指示”，否则我将按照我们建议的方针工作。大使们的电报一般都是以“听候您的指示”这句话结尾的，但我的表述方法却是：如果葛罗米柯同意我正在做的事，那么他要做的就是在我的电报被传阅时保持沉默。其他政治局委员即使想提出质疑或反对意见也很少主动为自己的发言做准备。他们当然可以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问题或发表反对意见，但很少有人这么做。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愿意涉足外交领域，而且，他们也根本不了解我们与华盛顿关系的具体情况。由于政治局并不是每次都要做出正式批准，所以这种不正规的程序有助于加快我们的工作进程。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尼克松 8 月 5 日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葛罗米柯给我下达的某些指示才导致

尼克松写了这封信。在葛罗米柯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雅各布·比姆仅有的几次会谈中，有一次他强调说勃列日涅夫本人对和华盛顿建立关系有极大的兴趣，并且就此问题谈了他的一些想法。据比姆说，葛罗米柯认为总书记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尼克松和国务院不会无视葛罗米柯做出的这个异乎寻常的表示，它确实引起了尼克松的注意。

罗杰斯命令国务院为比姆准备一个答复葛罗米柯的意见，白宫对此没有表示异议，因为这个答复只是泛泛而谈。与此同时，尼克松通过基辛格发出了他自己的密信，基辛格请我向莫斯科解释这一“敏感的问题”，以免勃列日涅夫被华盛顿两封不同的信件——一封是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的，另一封是通过国务院转交的——搞糊涂了。他要我强调只有尼克松8月5日通过基辛格和我传递的那封信才具有权威性——它提出在最高级会谈中可能与勃列日涅夫进行对话，比姆和罗杰斯对此信件全然不知。然而，除了把国务院排斥在外，总统，特别是基辛格也不愿让葛罗米柯知道内情，因为不能让他和同样被排斥在圈外的比姆大使讨论我们两国关系中的某些最重要的问题。外交部长几乎难以抑制他的愤怒，因为他自己作为中间人和谈判者的作用因此将失去价值。当然，葛罗米柯知道正在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的情报，但是他自己不能像基辛格那样为此目的而利用美国大使。

232

8月5日的信函——它是尼克松或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首次写给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实现了预期的效果。勃列日涅夫很快同意宣布将举行最高级会谈。8月10日，我接到特别指示，要我告诉基辛格：根据尼克松的愿望，他可以于1972年5月或6月访问莫斯科，具体日期很快将确定下来。

一个星期后，基辛格通知我，尼克松提议在1972年5月22日举行最高级会谈，一旦苏联同意了日期，他和我必须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安排好会谈议程。至于国务卿，基辛格说，总统将于9月7日——届时，尼克松将从加利福尼亚西部白宫返回——通知

罗杰斯。国务卿对如此重大的事情一无所知是前所未有的，这确实使莫斯科感到非常奇怪。基辛格说他将同尼克松一起乘飞机去加利福尼亚。我们应设法保持联系，如果需要的话，就通过白宫里的政府通讯线路进行联络。作为最后一招，我还可以使用白宫的飞机——该机每天往返于华盛顿和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住地。

233 基辛格于8月底从加利福尼亚返回。我们用了几天的时间讨论尼克松访苏的公开声明，因为最初我们的意见不能统一：究竟是说明尼克松将应苏联政府的邀请访问莫斯科呢（像尼克松本人希望的那样），还是使用一个中性的词（莫斯科希望不要提邀请这个词，因为在尼克松的访华声明中就没有提到邀请一词）。最后我们决定发表一项简短的声明，指出去年一年的会谈取得了未曾特别提到过的进展，并宣布“已经达成了将于1972年5月下旬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谈的协议。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将本着进一步改善两国间双边关系并巩固全球和平的目的，讨论所有的重要问题。”10月20日，这项声明同时在两国首都发表了。

漫长的谈判终于结束了，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两天后，我转交了勃列日涅夫对尼克松8月5日来信的答复。这位苏联领导人表现得很理智。“坦白地说，”他写道，“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我们对那些决定着国家政策——特别是那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政策——的重大问题是否具有相似的看法。最终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他对双方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大加称颂，然而他又说诸如裁军问题、中东问题、越南问题和中国问题等特殊问题“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且美国的某些观点也使我们迷惑不解”。但他最后仍表示希望最高级会谈“能够成为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因为莫斯科感到有足够的积极因素能够使这次最高级会谈成为一次重要会议。

最高级会谈的预演

在声明即将发表之前,苏联政府于9月13日签署了1971年最为重要的一项协议,这就是由苏联、美国、英国及法国就西柏林问题达成的所谓四国协议。回顾过去,我们可以说,在葛罗米柯的敦促下,政治局通过拖延同尼克松的会谈最终赢得了这笔长期以来一直想得到的交易。然而其结果却是迫使尼克松先去了中国。究竟值不值得搞这种拖延战术呢?这很难说。我一直认为尽早解决柏林问题,消除这一可能会引发灾难性危机的永久性隐患是非常重要的。四国协议使自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时期便开始的、断断续续进行了多年的艰难谈判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签署协议的最后准备工作在8月底尼克松仍住在加利福尼亚时就已经完成了。在波恩举行最后阶段谈判时又耽搁了些时间,对通过秘密渠道做出的安排一无所知的罗杰斯此时插手谈判并把事情搞乱了。尼克松不得不把拉什叫到圣克利门蒂,亲自给他下达了最后的指示。

四国协议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妥协性方案。它为柏林西半部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提供了一条自由走廊,为西柏林和东柏林,西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提供了比较便利的通讯条件。该协议包括了一系列切实可行并且合乎法律的规定;这样,经过多年的争论之后,最终确定了西柏林的合法地位。

葛罗米柯在来美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期间,于9月29日与尼克松在白宫讨论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出席会谈的还有罗杰斯、基辛格和我本人。但是,总统一开始只与葛罗米柯进行了单独交谈。尼克松说,首先要指出把他说成是对苏联不友好的人是错误的。他尊重苏联和苏联人民,并认为稳固的和平只能建立在苏联和美国共同合作的基础之上。两国应该避免对抗,并在最大程度上寻求就更多的问题达成协议。他说,至少在25年内有必要采取这种维持和平的方式。随后他又谈到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同勃列日

涅夫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并且表示他完全了解勃列日涅夫作为总书记所占据的首要地位以及他在决定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后来，在罗杰斯、基辛格和我在场的情况下，尼克松和葛罗米柯讨论了一些问题。他们主要讨论的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此外还谈到了欧洲安全问题、中东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对抗以及我们两国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正准备离开时，看到很多汽车开进了白宫。尼克松解释说他要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团，并且半开玩笑地问苏联是否打算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葛罗米柯回答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上去最符合亿万富翁们的利益，“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在那里占有一席之地”。他几乎没有想到20年后俄罗斯将寻求加入这个富翁俱乐部。

10月中旬，在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回来之后，我在使馆请他吃晚餐，并交给他一封勃列日涅夫写给尼克松的私人信件。勃列日涅夫在信中表示他对举行最高级会谈感到满意。基辛格“以友好的态度”指出苏联的一个舰艇编队——其中有潜水艇——正从大西洋中向古巴方向移动，美国新闻界正在大肆渲染此事。他希望苏联方面能够尽力避免发生任何可能使最高级会谈蒙上阴影的事情。

我必须承认，苏联的海军演习有时会带来外交和政治上的麻烦。每一年度的军事演习安排是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制定的，并且每年向最高国防委员会报告一次。整个政治局中只有两名委员，即外交部长和情报机构的首脑同时兼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由党的总书记——当时是勃列日涅夫——主持，总书记还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

235 当演习计划呈交最高国防委员会批准时，葛罗米柯便要就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内进行特殊的演习是否会影响到那里的政治局势发表意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年当中在世界的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将不可避免发生新的情况，而葛罗米柯则很容易忘记

已经定下的军事演习计划；这是一项绝密计划，为了安全起见，不在外交部存留复印件！然而，除非总书记根据葛罗米柯或国防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劝告阻止并否定演习计划，否则总参谋部将严格按计划实施演习。在这些问题上难以协调一致也给外交工作带来了麻烦，因为大使们根本不知道演习的事。

我们还讨论了中东问题，因为基辛格对葛罗米柯说过他正在参与这一地区的事务并且要挤掉罗杰斯，虽然基辛格到目前为止对解决该地区问题的可能方案只有一个大概的想法。后来，我同西斯科——罗杰斯命令他为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做准备——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西斯科希望能够直接得到基辛格的指示，因为只有基辛格能够明确下达有关白宫实际要求国务院做些什么的指示。

西斯科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他并不知道白宫对中东问题已经改变了看法，当我们于11月份和罗杰斯举行私人会晤时，事实显然变得更为棘手了。国务卿说，他认为由他前往莫斯科为最高级会谈做前期准备是个好主意，虽然听起来他并没有什么把握，因为他还没有和总统谈过此事。第二天，我又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这次是和基辛格会谈。相比之下，基辛格说得更为直率，他说总统想让他1月份去莫斯科做准备工作。

几天后，莫斯科来电表示不反对基辛格来访。基辛格显然对莫斯科的答复感到满意，但他又说，他和罗杰斯的私人关系将会变得更为复杂；他必须要就此事与总统谈谈。基辛格再次击败了罗杰斯。莫斯科同样愿意利用“基辛格渠道”，特别是就重大的秘密问题，因为克里姆林宫根据经验得知这条联系渠道比国务院更为有效。

印巴战争

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1971年印巴冲突期间，他首次运用了他和尼克松创立的利用莫斯科和北京矛盾的均

势外交。这种做法导致基辛格明显地向巴基斯坦一方“倾斜”。但是，这场新的战略游戏并没有能够阻止东西巴基斯坦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分别两个单独的国家。

236 基辛格最初公开做出了保持中立的样子。印度驻美大使 L.K.哈杰告诉我，基辛格在前往中国途中途经德里做短暂停留时曾突如其来地对印度领导人说，美国对在亚洲保持“必要的力量平衡”很感兴趣，并说万一中国进攻印度，德里可以指望从美国得到全面援助。印度政府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它从未提出过这个问题。它猜测美国做此表示是想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在亚洲采取的当时仍不为亚洲人所知的某些行动在德里造成的不利影响——当基辛格出访中国的使命昭然于世的时候，他们才发现美国所采取的那些行动的实质。德里也很担心美国向巴基斯坦增加武器援助，看来这是因为基辛格安排尼克松秘密访华时，巴基斯坦帮助他同北京保持了非正式的联系，所以尼克松向它提供了酬谢。

夏秋时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局势逐渐发展成苏联支持一方，美国和中国支持另一方的样子。8月，莫斯科和德里签定了一项友好条约，尽管英迪拉·甘地此时寻求的并不是互助条约。由于印度仍然呆在核俱乐部之外，所以苏联领导层一直在考虑向它提供核保护，以抵御中国的核威胁，但它最终还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别忘了苏中关系在那段时间里非常紧张。从1968年到1972年间，驻扎在蒙古边界的苏联军队从15个师增加到45个师，甚至比驻在中欧的军队还要多。）

由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在10月份进一步恶化，因此我们一直在通过秘密渠道频繁地交换着意见，但最后仍未能阻止冲突的爆发。美国政府在暗地支持着巴基斯坦。当巴基斯坦军队未到达指定位置时，它极力敦促苏联进行干预，对积极支持东巴基斯坦分离主义运动的印度进行遏制。从基辛格的言行判断，白宫因为没有找到对其盟国——它所实行的报复性政策以及它在东巴基斯坦采取的惩罚性行动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不满——进行有效

的军事援助的适当借口而显得紧张不安。但是，白宫也不愿意毁掉它同印度的联系。

从12月6日至10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频繁地交换着意见，双方都在设法避免发生军事对抗，但同时又急于援助自己的盟国。对于白宫来说这尤为重要，因为它感到巴基斯坦在军事力量上是很脆弱的。12月10日，尼克松要求我们和他一起联合发出全面停火的呼吁。显而易见，尼克松是想向苏联和印度施加压力，为此，他向苏联领导层透露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秘密。他让基辛格极其秘密地告诉我们，在美巴协议中有一项秘密条款（该协议是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起草的，并由美国大使于1962年11月5日交给了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它规定美国政府将援助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侵略。

237

为了施加压力，基辛格告诉尤利·沃龙佐夫（我回莫斯科磋商期间，他担任临时代办）美国军队已经奉命开始准备以重新部署海军力量的名义——包括从东南亚派去一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援助巴基斯坦。苏联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从印度洋舰队中派出一批军舰向北进发。

基辛格明确表示，美国最关心的是印巴西部前线，华盛顿害怕它会失陷。正如基辛格后来所写的那样，他认为甘地夫人打算进攻克什米尔地区中被巴基斯坦人据守的那一部分，使之归还印度，并通过让巴基斯坦蒙受失败的耻辱加速使仍控制在巴基斯坦手中的西部阵地土崩瓦解。（在东部，白宫不得不承认印度实际上已经打赢了。）作为整个策略的一部分，基辛格请沃龙佐夫转告莫斯科，白宫并没有就此次冲突同北京进行接触，尽管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很密切。他同时建议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解决。

12月12日，我从莫斯科回来后，紧张的局势立即得到了缓解。莫斯科给尼克松发来一封特别重要的信件：“我们和印度总理甘地进行的接触表明，印度政府无意采取任何进攻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基辛格明显地松了口气，他说这可真是个好消息。与此

同时,他抱怨印度的保证不够明确,因此提出我们要继续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密切磋商。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为报答巴基斯坦帮助他们打开与中国联系的大门而站在了巴基斯坦一边,所以他们不得不相信莫斯科所说的印度不会进攻西巴基斯坦的话。

238 就这样,苏联通过进行外交干预,致使这场军事冲突没有发展到导致西巴基斯坦全面失败和崩溃——不只是割让距其1500英里以外的东部省份——的地步。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巴基斯坦在刚开始发生冲突时所表现出的傲慢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基辛格通过外交操纵造成的。基辛格的外交活动给人造成的印象是,美国将永远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因为它帮助了美国。但是,尼克松政府辜负了巴基斯坦军政权对它所抱的极大的期望。结果,巴基斯坦——它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盟国——失掉了它的一半领土。这是尼克松政府外交史上最不光彩的一件事。

1月份,当我们开始与基辛格一道为最高级会谈做具体准备工作时,他对这一阶段的外交活动进行了总结。他承认他对苏联在印巴战争期间的意图过于敏感了,这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他在那个时期采取了某些“不理智的做法”。他承认我们在那个关键时刻做出的印度不打算进攻巴基斯坦的保证是结束战争的关键所在。对他说来,做出这种表白是非同寻常的,但是,他没有把它公开讲出来。

第十五章

最高级会谈

基辛格和我开始为最高级会谈做准备

1972年1月17日，勃列日涅夫在写给尼克松的一封信中建议我们开始着手为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准备议事日程。勃列日涅夫说，最紧迫的问题是柏林问题、欧洲安全问题、越南问题、中东问题、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以及我们两国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这真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议程表。

越南问题占有特殊的地位。尼克松和基辛格从第一次与我们进行会谈时就开始强调它的重要性。但是，实际对话却进展缓慢。双方都有结束战争的愿望，然而，各自可以接受的条件却完全不同。最为重要的是，它们把解决问题的着眼点全都集中在准备让河内做些什么上了。不过，华盛顿和莫斯科在这场战争期间始终保持着联系。双方并不指望在最高级会谈期间讨论越南战争问题时能取得什么成果，但它们仍然想继续对话。尼克松一直希望尽可能使莫斯科成为华盛顿和河内之间的调停者。然而，当他宣布10月份将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时，他仍特意命令增加对北越的轰炸，因为他害怕右翼分子指责他与共产党人妥协。北越在接下去的一个月里突然中止了对话。1月份，尼克松要我给勃列日涅夫带个口信，请他转告河内，美国政府准备恢复对话。

国务院和罗杰斯国务卿一心期待着参加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为此，罗杰斯打算与我举行几次会谈。

240 这一情况促使基辛格于2月初与我会谈，讨论一个他称之为“非常敏感的问题”。我对此颇感兴趣。他说他想极为秘密地告诉我，国务卿对苏美关系，特别是苏联大使和白宫之间交换意见的情况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因为国务卿“知道得很少”。他要我在同罗杰斯交谈时记住这一点，避免谈那些他并不知道的事情。即使是勃列日涅夫写给尼克松的私人信件，在给罗杰斯看之前也要做剪辑，所有涉及秘密渠道的语句都要被删掉。有些信压根就不给他看，其中包括一些涉及最高级会谈议事日程这一敏感问题的信件，这些问题只是在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的私人通信中讨论过。另一方面，最高级会谈中所有双边问题的准备工作均由国务院和罗杰斯完成。

这真令我惊讶不已。在我的外交生涯中，这种事还是头一次遇到——总统的助手暗地里告诉一位外国大使有关我们与总统进行联系的秘密情报，总统的国务卿了解哪些，不了解哪些。当我第二天与罗杰斯谈话时，显然他确实不知道我同基辛格秘密会谈的事。（在1972年一年中，我们共进行了130余次会晤。）显然，白宫将会对一切与最高级会谈有关的重要问题保守秘密，不让国务院介入其中。有了这种非同寻常的约定，面对罗杰斯，我感到很不自在。这种做法对尼克松的外交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我不得而知。然而，尼克松宁愿最大限度地严守秘密，而且特别担心把它泄漏给新闻界和国会。

此外，尼克松传统的反共态度也是一个问题。它导致了政府官员敌对情绪的爆发，白宫对此是否采取了纵容的态度，我们从不知道，但总统肯定没有加以制止。

2月底，勃列日涅夫致信尼克松，对美国在对苏关系中采取“双重标准”表示出一定的不满。信中指出，当“热烈的、富于建设性的对话”正在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着的时候，尼克松政府中的某些

成员,例如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却在哇啦哇啦地发表反苏言论。“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勃列日涅夫问道,“当然啦,认识水平不一样是没法打交道的。提出那种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是不现实的。应该对这个重要的问题有一个一致的认识。”

当我把这封信转交给基辛格时,我对他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基辛格没有就此进行争辩,但他强调我们只应该相信总统本人所说的话。一个星期后,基辛格向我转达了尼克松对勃列日涅夫来信所做的充满调和色彩的答复,并保证今后将小心行事。

三角外交

尼克松访华无疑是总统和基辛格的个人外交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它表明包括美国、苏联和中国在内的三角外交战略模式正式形成。这种战略模式的首次显示是中国于1970年4月邀请一支美国乒乓球队前往中国进行比赛。接待基辛格访华的协议是在1971年5月秘密签订的,7月份宣布了尼克松准备访华。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访问了中国。不用说,尼克松访华并不能“改变世界”,尽管他在北京的欢迎宴会上以其特有的夸张语言讲了这番话。他的访问也不能使美中之间的外交关系完全正常化(双方直到1973年才互派外交使团,1979年才相互正式承认)。

241

然而,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对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交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不再把自己当成是激烈竞争中的天平两端仅有的两只有分量的砝码。第三股力量已经加入到均势之中。它不仅对另外两股力量发出了挑战,而且为它们实施更为灵活的外交策略提供了机会。中国当然也非常愿意参加这场游戏。尼克松访华回来后私下里对国会领导人说,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受两种因素的驱动:第一,他们急于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第二,他们同苏联的关系不太好。

陪同总统访问中国回来后,基辛格向我承认他们没能就越南

问题与中国人取得一致的意见。尼克松总统清楚地表明，如果北越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谅解态度，那么河内基本上能够得到它在这两三年中一直想得到的东西。尼克松暗示有可能像河内所寻求的那样对南越政治结构进行某种变革，当然这不能以损害美国的威望为前提。他告诫中国人，尽管河内在军事上尽了一切努力，但它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即使北越人无限期延长这场战争也罢。历史证明尼克松错了。在美国人民越来越反对这场战争的巨大压力下，最终他被迫首先做出了让步。

尼克松从中国回来以后，基辛格安排我们到白宫赴宴。来到白宫后，我惊喜地发现：总统本人和我们一起参加了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他首先说道，在今后两个月中，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是为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做准备，他希望这次会谈能够获得成功。他强调指出，他很高兴能与勃列日涅夫坦率地交换意见，并且说同他与中国人进行的会谈相比，他在莫斯科的会谈将无须从最初级的水平起步，而且可以立即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苏美关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242 我请尼克松谈谈他对最高级会谈的想法。总统答应了，随后指着坐在他身边一直没有说话的基辛格说：“这该由我完全信任的亨利来说。不管他说什么都直接代表着我的意见。在政府中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权代表我讲话。这是真的，比尔·罗杰斯是我的老朋友，而且拥有一名国务卿所必须拥有的一切必要的权力。但是，他同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联系在一起。他的官员无法控制，也不能严格地保守秘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通过基辛格做这种事情的原因。”

尼克松说，有两个非常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要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讨论，这就是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和中东问题。美国将通过基辛格就第二个问题大胆地发表意见。但是，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将是衡量我们两国今后关系的标准，特别

是美国舆论判断两国关系的标准。如果我们能够就此问题达成协议,那么它将被看作是一个良好的象征,它表明我们两国的关系已经建立在一个新的、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人们将把最高级会谈看成是一个大失败,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只能就第二个重要问题,即中东问题达成一个初步的秘密协议,因为如果公开在美国讨论这个问题,那就太容易造成人们情绪上的波动。我同意他的看法。

现在是做出政治决定的时候了,尼克松继续说道。他准备在战略武器问题上建立起均势关系,虽然这一想法不太容易让美国一些有影响的组织所接受。所以,他说:“让我们在不损害我们两国的防御利益的情况下从政治立场出发看待形势的发展。”他希望立即达成一项根本性的协议,以免双方决定进一步建立新的战略体系,这种体系能够决定70年代剩余几年中的军备竞赛规模。

与尼克松总统进行的会谈给莫斯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特别是他准备同意与苏联建立战略均势——这是苏联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勃列日涅夫写信就最高级会谈的议事日程问题做出了答复。他认为议事日程中应包括欧洲问题、西柏林问题、中东问题和越南问题。他说莫斯科已具体考虑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他写道,双方在反弹道导弹系统和陆基导弹发射装置方面的意见已经相当接近,并说苏联正在研究美国提出的冻结潜艇发射的导弹的建议。

当我把这封信交给基辛格时,他说总统越来越觉得他与苏联领导人进行的会谈将可能成为他的政治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当然,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外交辞令,但它同时表明尼克松总统越来越认识到苏美关系的重要性。好像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基辛格提出了另一个“敏感的问题”。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结束后,尼克松总统将前往伊朗,在此之后,他将应邀访问波兰。考虑到“东欧是苏联的特殊利益范围”,基辛格说,总统想事先同总书记进行私下磋商,因为他对华沙的访问将紧接着访问莫斯科之后进

我代表苏联签了字（我现在仍然保留着那支笔）。仪式结束后，尼克松把我拉到一旁说，他同意基辛格前一天就越南问题对我说的那一番话。他只想补充一点，即在经受这场危机的过程中，他希望我们两国政府能够自我控制，尽可能别让苏美关系受到损害。虽然总统没有明说，但我离开时已经感觉到白宫正在准备对北越发动新一轮猛烈进攻。

几天后，基辛格通知我说，鉴于越南局势严重恶化，总统认为基辛格应该对莫斯科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与葛罗米柯和勃列日涅夫进行会谈。随后，基辛格将从莫斯科飞往巴黎，与河内代表进行秘密会谈。这次莫斯科之行要绝对保密，甚至不能让美国使馆知道，因此，基辛格抵达莫斯科后应住在苏方提供的住所内。

尼克松政府正试图把莫斯科拉进它与越南进行的外交游戏中去。看来，莫斯科很愿意参加进去，它以为自己能够帮助解决这场冲突。4月13日，我通知基辛格我们同意接待他，并帮助完成他所肩负的秘密使命。基辛格说，如果北越人愿意的话，他很想在北京会见他们（北越人表示他们更愿意在巴黎进行会谈）。他向我简要说明了美国的基本立场，但河内领导人却没让我们知道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两天之后，基辛格代表尼克松再次约见我。他并不打算掩饰他的气愤。他没有做任何解释，而是直截了当地说到，北越人刚刚通知美国人，说他们取消了他进行会谈的安排。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向非军事区南部地区展开军事行动，这促使总统下令对河内—海丰地区的非军事目标进行轰炸。如果河内同意于4月24日或27日举行会谈，轰炸将会停止。基辛格警告说，如果河内继续寻求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并且在把林登·约翰逊逼下台之后“试图推翻另一位总统”，美国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几天之后，河内和华盛顿匆匆忙忙地通过莫斯科就基辛格同北越人谈判的日期进行了讨论，最后，基辛格告诉我，他准备前往莫斯科讨论越南危机并为最高级会谈做准备。我将和他一道去。

4月20日,基辛格乘飞机前往莫斯科。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我于深夜时分驾驶一辆使馆的小汽车来到预先安排好的地点,那里有一辆白宫的小型客车在等候着我。这辆车将我拉到了华盛顿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基辛格也是秘密到达这里的。在飞往莫斯科途中,我们在位于英国的北大西洋组织空军基地停下来加了油。基辛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不要走下飞机活动,如果他们看到苏联大使在他们的秘密基地走来走去的话,他们会惊慌失措的。为了严守秘密,他本人也没有下飞机。

基辛格在莫斯科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由于美国的炸弹正越来越多地落在越南的土地上,与尼克松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主意此时丝毫引不起苏联领导人的兴趣,这种情况迫使尼克松表现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基辛格说,美国正在尽力克制自己,但越南“过分的侵略”行为很可能迫使美国政府采取“更为猛烈的行动”。

就最高级会谈问题本身,讨论首先集中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正如我曾经提到的那样,双方达成了一项停止建造新的导弹潜艇的协议。

按照基辛格所提出的严格保密的要求,他被安置在列宁山一座单独的小楼里,而且只让苏联工作人员为他提供服务。无论是美国使馆还是大使本人都不知道基辛格在莫斯科。直到最后一天,他才提出要同美国大使谈话。这位大使被带到政府宾馆后发现基辛格呆在那里,这不禁使他感到大为惊讶。

回到华盛顿后的第二天,基辛格告诉我总统对他在莫斯科讨论的结果表示“非常的满意”,并希望继续缩小我们之间的分歧,确保最高级会谈获得成功。另外还有一件事:总统想知道他在莫斯科时是否能够去教堂做一次礼拜。这样做并不完全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而是为了国内政治目的;他参观莫斯科的教堂将在国内进行全国电视转播,因此他对被美国人称为“不信上帝的共产主义”国家

的首都所进行的访问将会给人们留下良好的印象。我说,我们绝对不反对尼克松去莫斯科的任何一座教堂。

随着最高级会谈的日益临近,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越南战争很可能会毁掉这次会谈。5月初——离规定的会谈日期还有三个星期——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之间的书信往来十分频繁。5月1日,勃列日涅夫致信尼克松,要求美国在越南采取克制态度,特别是要减少空中轰炸,因为美国的轰炸行动对苏美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基辛格回答说,总统认为——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河内一心想利用最高级会谈实现它自身的目的:首先是实现其军事目的,同时还要实现其外交上的目的,这就是煽动莫斯科和华盛顿彼此不和。“但愿他们的努力不会获得成功,”基辛格拖长了声音说道。

第二天,总统向勃列日涅夫通报说,同越南人进行的谈判“非常令人失望”。基辛格说,北越的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尼克松应该停止同莫斯科讨论越南问题,应该并且只能直接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谈判。“这个人非常傲慢,好像他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似的。”基辛格说。

246

5月6日,勃列日涅夫又发来一信,再次呼吁美国在最高级会谈举行前夕要采取克制态度。基辛格表情严肃地说:“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就越南问题进行的讨论没有使该问题取得半点儿进展。我们没有向苏联方面提出这方面的要求。美国将尽力促成最高级会谈的举行,并使其产生良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只能根据军事和政治形势的需要在越南采取行动。”

基辛格还进一步证实了美国曾试图在越南问题上取得中国人的帮助,但中国人指出与越南的军事行动利益相关的不是北京,而是莫斯科,以此来回绝美国提出的请求。他们告诉基辛格,苏联想向华盛顿施加压力,迫使它在欧洲和中东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是苏联在最高级会谈上向美国讨价还价的一部分。这当然是无稽之

谈,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越南问题放在第一位。

5月8日,尼克松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郑重宣布将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切断对北越的武器援助。在通往北越港口的通道上将布雷并对它们加以封锁,铁路网将遭到轰炸,对其军事目标实行的空中和海上打击将继续进行。讲话还表示极为关注与苏联的关系。尼克松指出,北越人之所以能够发动侵略,其原因就在于它从苏联及其他国家得到了军事援助,但他也列举了最近苏美关系所取得的进展,在讲话结束时,他呼吁莫斯科把它与华盛顿的关系置于它与河内关系的前面。

在电视讲话发表前一小时,我被召到了白宫。基辛格将尼克松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私人信件交给了我。总统在信中提到北越在谈判中毫不让步以及它对南越采取的军事行动,并宣布他已决定“剥夺侵略者实施侵略的手段”。他说他即将宣布美国的军事行动,但只要在整個印度支那地区实现国际监督下的停火,这些军事行动马上会停止实施。信中还进一步要求在这个“展示政治家才能的时刻”,要尽力维护我们的关系。基辛格代表总统对这一呼吁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247 我尖锐地批评说,美国采取的军事行动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包括在公海上自由航行的准则。基辛格极力为之辩解,并且说苏联的船只不会受到攻击。总的说来,谈话的气氛十分紧张,特别是当我坚持要求删除尼克松声明草稿中极富攻击性的一段话时就更是如此。坦率地说,我开始为最高级会谈感到担忧。

两天后,我受命向基辛格提出抗议,强烈谴责“美国空军的犯罪行为”杀害了在北越水域航行的一些苏联船只上的船员。我们还要求美国保证苏联船只和苏联船员的生命安全。这一抗议立即被上报到总统那里。

10分钟后,基辛格回来了。他说总统请我向勃列日涅夫转达他本人深深的歉意,特别提出愿意向那些伤亡人员提供赔偿。他

保证他将命令军事指挥部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政治局多次讨论了越南的复杂局势。它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想阻止美国的轰炸，另一方面它又要着手准备同下令进攻北越的尼克松总统举行最高级会谈。它难于做出决断，所以苏美之间开始了紧张的讨论。第二天，我转交了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此信对尼克松宣称对北越将实行军事升级的来信做出了答复。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充满了指责之辞，完全袒护越南，并指出军事升级对我们两国关系造成了危害。“总统先生，在这个苏美关系和整个世界局势都非常紧张的时刻，我和我的同事们期望美国方面尽其所能避免对我们两国关系的现在和未来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信中丝毫没有提及最高级会谈，这是一个不详之兆。基辛格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那么，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怎么办？总书记一点儿也没有说到它。”在谈话过程中，基辛格以各种方式反反复复地提出这个问题。最后，他问我们是否同意白宫发表一项声明，宣布它已经收到苏联领导层肯定最高级会谈仍将举行的答复。

我说，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双方的书信来往中并没有直接谈到最高级会谈问题。

基辛格随后又问道，他是否至少可以对总统说苏联政府肯定准备按计划举行最高级会谈。我不得不再次说道，从双方的书信来往中看得很清楚，我们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基辛格向我断言，总统对能否在我们已经确定的日期举行最高级会谈深感忧虑。他代表尼克松要我转告勃列日涅夫，美国将采取严厉措施，避免使停在北越港口和在公海上行驶的苏联船只遭到任何意外事故。此外，美国准备在最高级会谈举行期间减少对北越的轰炸，并完全停止轰炸河内。这些保证并没有减轻我们对最高级会谈的忧虑，这一点我们双方都感觉到了。

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问题确实前途未卜。政治局仍在认真地讨论当美国正在轰炸苏联的一个事实上的盟国的时候，是否应

该在莫斯科接待尼克松。以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军方领导人反对举行最高级会谈，波德戈尔内主席也持这种意见。柯西金和葛罗米柯赞同举行最高级会谈，而首席理论家苏斯洛夫以及党内很多著名领导人却举棋不定。勃列日涅夫犹豫不决，尽管出于他个人的原因，他渴望和美国总统进行首次会谈。此外他完全知道，如果他拒绝接待尼克松将会对我们两国的关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

响。这场争论终于因下述事实而有了结果。河内领导集团——虽然是我们意识形态方面的盟友——拒不告诉我们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长期计划以及他们的对美政策，尽管我们向他们提供了相当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结果，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往往令我们感到意外，并将我们置于困难的境地。实际上他们并不十分在意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关于他们同华盛顿谈判的情况，我们从美国人那里了解到的消息要比从他们那里得知的多得多。这一切引起了莫斯科的恼怒。政治局最后的结论是着手准备最高级会谈，因为政治局委员们认识到，在迫使美国停止轰炸和尼克松举行最高级会谈之间做出选择等于给了河内否决我们同美国关系的权利。

政治局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还有一些与越南毫不相干的原因。首先，在尼克松到达的前几天，苏联同联邦德国达成的一些协议将得到批准，因此，取消最高级会谈可能会导致苏德关系恶化，并且使西德极右势力得到反对这些协议的借口，从而使协议无法得到批准。莫斯科完全清楚这一点。此外，莫斯科还认识到，拒绝接待尼克松来访将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使我国同美国政府的关系变得复杂化，例如无限期地推迟最高级会谈，无法就反弹道导弹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并促成新一轮军备竞赛等。而且，我们拒绝与尼克松会谈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助于越南人民；相反，美国甚至会在更大程度上增加其军事压力，包括对北越进行轰炸。

249 正是为了稳妥起见，苏联领导人秘密决定将问题提交5月份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大约有200名中央委员和政

府领导人出席的这次会议通过了按期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决议。事实证明，这次最高级会谈在我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进一步巩固了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且为促进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开辟了道路，尽管我们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异，而且我们信奉“受帝国主义压迫者加强国际团结”的理论。让意识形态分歧服从于如此重要的问题，这或许还是第一次，虽然这种分歧并没有完全消除并且在其他问题上还会表现出来。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识到，当他们的飞机正在轰炸我们的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盟友的时候，让担当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莫斯科同意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并非易事，而且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苏联可能会取消这次最高级会谈。所以，当我带着最后的答复来到白宫时，基辛格想用开玩笑的方式来掩饰他和总统的担心。他提出用一箱子香槟酒打赌，他能猜出我们的答复。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他所猜想的答复内容并把它握在手里。我随后告诉他我们准备在已经商定的日期举行最高级会谈，没有做出任何变动。他猜测的答复是：“最高级会谈不会取消，但要推迟，具体日期日后商定并能够达成一致。”我现在仍然保留着这张纸条，把它当作那个非凡时刻的纪念品。当然，亨利从不愿意赌输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双方对最后的结果都感到满意，因为我们曾经为准备最高级会谈做出了艰苦的努力。苏美关系的缓和已成功地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但是，基辛格仍然欠着我的香槟酒。

危机解除之后，基辛格和我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工作会谈，就最高级会谈的安排进行协调，并且尽可能完善已经准备好的协议和文本。我们还达成了一些友好的秘密协议。他告诉我他准备接受葛罗米柯建议使用的某些措词，但条件是只有在莫斯科与葛罗米柯会谈时才正式公布这一点，其目的“只是为了让他高兴”。他遵守了他的诺言。此外，在一些协议的措辞上，基辛

格对葛罗米柯做出了让步。为了就某些大的问题达成广泛的协议，他尽量迁就苏联的表达习惯。他知道当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汇报时，措辞方式对他是很重要的，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只要问题的实质可以接受，如何措辞是无所谓的。

250 在为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做最后准备时，总统本人采取了非同寻常的做法。他邀请我于5月18日通宵留在戴维营，全面讨论所有的细节。尼克松表现出很轻松的样子。这是一次重要的而且是令人愉快的会晤。我们自始至终一直是在单独进行会谈。莫斯科指示我向总统指出，我们认为最高级会谈很有可能会取得有助于促进我们两国关系并改善世界局势的实际成果。所以，我对总统说：“为了使最高级会谈获得成功，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最有效地利用今天的机会，无疑将取决于最高级会谈时双方所持的立场，也取决于会谈时的气氛。”

这决不仅仅是外交辞令。莫斯科仍然担心尼克松可能向越南发动新的打击，虽然苏联领导人认识到他和他们一样盼望最高级会谈能够取得成功。此外，正是莫斯科同意接待尼克松访问的事实使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因为这很可能使河内陷入外交上的困境。然而，美国人同样害怕河内在最高级会谈期间发动一场大规模地面行动，正如尼克松夫人在同我妻子伊琳娜讨论她的访问计划时所说的那样。

在戴维营，尼克松带我参观了小木屋——我认为它们是“乡间别墅”，他期待“苏联领导人第二年回访时”能在那里下榻。随后，他带我来到他的私人书房。书桌上摆放着一些有关苏联问题的厚厚的卷宗，有两个文件夹标着“勃列日涅夫”的字样，一个放着勃列日涅夫和基辛格的谈话，另一个是勃列日涅夫重要的公开讲话的选编，开头一篇即是他在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发展经济和实现国际和解的政策。

在长时间的谈话过程中，我们详细讨论了最高级会谈的主要

问题。公道地说，他非常清晰并且十分在行地阐述了他对这些问题以及可能达成的协议的看法。

尼克松对我说，他认为，当这些协议按照我们的愿望在莫斯科签署之后，白宫与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之间的秘密接触会变得更加频繁。他又说道，他们正在考虑在我的使馆办公室和基辛格的白宫办公室之间安装一条直通秘密电话线。这条新的热线——它不需拨号，而且不用通过普通电话网——是在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后安装的，基辛格和我一直在使用它。这条热线的存在直到今天仍是个秘密。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

251

5月22日下午4时，尼克松总统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伏努科沃机场，他开始了历时8天的国事访问。陪同尼克松来访的有罗杰斯、基辛格以及其他一些官员。尼克松到达的时候，天上正下着蒙蒙细雨。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按照礼节主持了正式的欢迎仪式，但总的气氛却显得有失诚意。莫斯科的街道上冷冷清清，没有欢迎的人群出来迎接这位总统。

美国代表团最初不敢肯定勃列日涅夫会如何对待他们。他们显然担心他一开始就会因轰炸越南而教训他们，特别是教训尼克松。这将会使尼克松处于尴尬的境地，而且真的会使整个会谈受到损害——这样的事曾在1959年发生过，当时赫鲁晓夫因为间谍飞机飞越苏联领空的事教训了艾森豪威尔，从而导致巴黎最高级会谈的失败。当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第一次面对面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谈时，美国人的担心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时只有一名苏联翻译在场。双方代表团都忧心忡忡地等候在外面。罗杰斯紧张不安，基辛格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稍轻一些。他们焦急地询问隔壁大厅里的苏联与会者勃列日涅夫究竟在对尼克松谈些什么。然而，结果表明这些人的恐慌是没有根据的。勃列日

涅夫和尼克松谈得非常顺利。它为在莫斯科进一步进行成功的谈判——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也参加了——开辟了道路。尼克松还到基辅和列宁格勒进行了短暂的访问。

事实证明,这次会谈是苏美关系中的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表明双方都渴望开始缓和的进程。会谈涉及到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联系以及限制战略武器问题。5月31日,也就是尼克松走后第二天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表明我们两国的关系得到了稳定发展。我认为在最高级会谈中产生的所有文件中有两份最为重要,一份是关于我们两国关系的准则,另一份则是关于军备控制。

5月29日——最高级会谈的最后一天——在克里姆林宫大厅庄严的气氛中,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题为“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关系的基本原则”的联合文件上签了字。这份文件是按照苏联的倡议而制定的,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它是奠定新的缓和政治进程基础的重要政治声明。苏联领导层赋予这一文件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公开地共同确立了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国际行为准则。首先,它指出核时代的相互关系只能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之上。它还承认“平等的原则是两国安全的基础”。从广义上说,这次最高级会谈及会谈产生的文件象征着美苏作为两个大国已互相承认彼此拥有平等的地位。

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来说,这件事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声望,而且将苏美关系置于一个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这一文件在苏联得到了广泛的宣传,甚至在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出现新的冷战的时候,这一文件在苏联还经常被引证。虽然在莫斯科宣布的这些原则是正确的,但文件存在的主要缺点是,尽管它宣称这些原则是多么的重要,但它并没有提出如何贯彻这些原则,也没有制定确保这些原则得到实施的措施。在此后几年中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这一文件在美国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美国政府并没有特别认真地对待它,大概是因为它是苏联不屈不挠争取到的结果,而且美国政府本身并不敢肯定美国舆论是否会接受它。不管怎样,这

一文件得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基辛格持和解的态度。他是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的唯一一名美方谈判者，而罗杰斯则是在最后一刻才知道有这么一份文件的。后来，基辛格公开称这份文件是一个哲学概念，而不是指导具体工作的方针。

我同基辛格的认识是一致的。美国政府没有抛弃这一文件，主要是因为它在文件上面签了字。的确，文件承认了我们的平等地位，但实际上这只是在相互安全和军备方面的平等。至于其他一些说法，比如“和平共处”，它们不会对美国方面造成任何特别的伤害，但特别为苏联领导人所喜爱，这首先是出于国内原因。因此，这项声明在苏联人民中间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他们的政府在这一重要原则问题上最终战胜了美国——尽管我们早已将这一原则当成是战争或和平的基本问题，但长期以来美国都不愿意接受它。由于签署了这一文件，尼克松本人被苏联公众看成是比较值得称道的人物。

这份联合公报的全部重要性就在于它为我们两国的关系营造了友好的氛围，一种与纯粹的对抗完全不同的合作的氛围——它很快便以缓和时代而闻名。它为在尼克松政府期间签署一系列的协议打下了基础并且扫清了道路。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取得的另一个基本成就是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其中包括限制双方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而且首次就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的某些步骤达成了临时协议——这是经过好几个月的谈判才获得的成果。临时协议规定用5年的时间继续就削减远程武器进行谈判。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是向军备控制迈出的前所未有的第一步，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进程提供了双方一致同意的具体条件：在国际控制下对核军备先限制，后削减。这就是缓和的具体基础。

253

在尼克松访苏期间还签署了一些特殊的双边协议：关于和平利用空间；关于进行科学、技术、医药及公众卫生合作；关于防止海上突发事故；关于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合作，等等。尼克松是对

的。第一次最高级会谈使双方克服了相互间的严重猜疑，使双方建立了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虽然它们在国际竞争舞台上仍在追求各自的目标。

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几乎都是美国人造成的。清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租借美国物资所欠债务问题的谈判是和双边贸易协议谈判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尼克松允诺要采取行动为建立苏美贸易关系创造更加正常的环境，并且取消商业和财政上的歧视性待遇。具体事宜交由一个苏美专门委员会处理，后来这个委员会达成了一揽子协议，包括两国将取消特别关税并且相互给予所谓的最惠国贸易待遇，而且美国将通过进出口银行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租借债务解决得比较迅速和顺利。

两国对债务的估计存在着将近 10 亿美元的巨大差异。美国坚持说债务总额达 12 亿美元，而苏联方面则说是 2 亿美元，并且声称本国在那场灾难性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它已用鲜血偿付了债务。代表苏联方面处理这一问题的柯西金提出以比较务实的态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并说苏联准备额外支付 1 亿美元。尼克松当即同意讨价还价，把美国的索赔相应地减少了 1 亿美元。然后，在房间里一片静悄悄的气氛中，他们仿佛展开了一场拍卖活动，柯西金叫出增加 1 亿美元，尼克松就减少相同的数额。他们花了 1 分半钟的时间便就这一持续了一代人的争执达成了妥协。他们相互向对方的要价靠拢，最后决定赔偿 6 亿美元。

254 虽然这种解决办法并不具有戏剧性，但是，我们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的气氛是富有建设性的，没有发生尖锐的冲突。尼克松总是代表美国方面就每个问题发言，清晰、简要地阐明美国的基本立场。基辛格接着便同苏联方面展开讨论，并且进行大量的谈判工作。尼克松在关键时刻也参加讨论，但总的说来，基辛格在谈判桌上显然享有真正的自由。他们两人当然要在策略上协调一致，尽管尼克松在莫斯科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作为外宾，苏联人给

了他罕见的待遇，让他住进了克里姆林宫。由于害怕有窃听装置，所以尼克松总统觉得不能同基辛格在克里姆林宫住所进行商谈。相反，他们把自己锁在总统的轿车里——它被空运到莫斯科并且就停在克里姆林宫内。

苏联方面有自己的工作分工。柯西金主管经济问题，勃列日涅夫负责军事和政治问题，葛罗米柯积极协助他处理具体的外交问题。因此，谈判常常变成葛罗米柯和基辛格两人之间的双向讨论，他们当着各自上司的面讨论问题，他们的上司只是偶尔插几句话。

当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指示军事工业部副部长列昂尼德·斯米尔诺夫帮助葛罗米柯。斯米尔诺夫十分熟悉战略武器问题，并负责就此问题同基辛格进行谈判。基辛格肯定会注意到葛罗米柯通常是阐述苏联的官方立场，而斯米尔诺夫则进行具体的讨价还价。与葛罗米柯恰恰相反，斯米尔诺夫对所有的武器都很了解，但没有外交谈判的经验。为了最后定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苏方在同尼克松谈判期间还额外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秘密会议。

双方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国际问题上，虽然在对中东问题、朝鲜问题、古巴问题以及欧洲安全与缓和等问题等进行广泛讨论的过程中并没有解决具体的问题。我们紧接着提出在尼克松同意的时间内召开欧洲安全会议；他同意会议在下一年度举行。

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对尼克松说，中国领导层试图在国际关系中挑拨离间，利用苏联同美国以及同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尼克松仅就个别问题说了几句他本人对中国立场的看法。苏联方面指出重申双方继续承认并履行其 1962 年关于古巴问题的协议是非常重要的。尼克松没有表示异议，于是就这样向菲尔德·卡斯特罗做了通报。在联合公报中，双方重申了它们对越南战争的看法，但是，这一问题在全体会议上几乎没有得到讨论。

为了不破坏友好认真的谈判气氛，政治局决定在政府乡间别墅最后一次宴请尼克松，与他秘密讨论越南问题。他们试图使尼

克松改变或调整他对越南人的看法，但是由于他们提不出新的建议，因此他们自然未能获得成功。然而，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能够向河内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报说他们已经做出了努力，这样他们在越南人面前就可以问心无愧了。

尼克松打算用一天的时间游览列宁格勒的风光。他来到莫斯科机场，那里有一驾专机在等候他和陪同他参观的柯西金。他们走进机舱后闲聊了 10 到 15 分钟，白白等了半天，飞行员也没有出现。柯西金命令把飞行员叫来。飞行员终于来了，他窘迫地红着脸报告说，有一个引擎失灵了，他们不得不换乘飞机。柯西金大为尴尬，把飞行员大骂了一通。

尼克松问他出了什么事。柯西金做了解释，并说驾驶员将因为没能使飞机做好飞行准备而受到惩罚。尼克松请他冷静下来，并说飞行员应该受到奖赏而不是受到制裁。大惑不解的苏联总理弄不明白飞行员为什么要受到奖赏。总统便讲起在非洲发生的一起类似的事情。一位美国飞行员知道有一个引擎运转得不正常，但没有报告他遇到了麻烦，而是指望能够侥幸完成这次短暂的飞行。但是，引擎坏了，飞机被迫紧急降落在沙漠中，尼克松总算是死里逃生。尼克松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们的飞行员应该受到奖赏的原因，因为他说了实话。”驾驶员显然很感激尼克松为他说情。柯西金对驾驶员恩威并施，并下令换备用飞机。

在列宁格勒，当尼克松向皮斯卡廖夫公墓敬献花圈的时候，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在这所公墓里埋葬着大约 100 万列宁格勒居民，他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对这座城市实行的几乎长达 3 年的残酷围困中被枪杀或饿死的。特别是一个小姑娘的日记使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个小姑娘记述了她的家人因饥饿一个接一个死去的情形。她记下她妈妈的死亡之后，自己也死去了。

基辛格也有值得他个人关心的事情。因为他在莫斯科期间恰逢他的生日，所以克里姆林宫制做蛋糕的厨师准备了一个大个儿

生日蛋糕。当他早晨起来走出卧室的时候，一位负责克里姆林宫安全保卫工作的克格勃将军把蛋糕送给了他。苏联和美国官员们纷纷祝他长寿。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向他表示祝贺。回到华盛顿，他的工作人员送给他一样礼物——一个正在踢足球的木制熊（基辛格是美国少有的足球迷之一，而且可能是一位最有名气的足球迷）。两国最高级领导人也互送了礼物。勃列日涅夫送给尼克松一只水翼艇。尼克松在重新当选总统的第二天携其夫人、女儿及女婿首次驾驶这艘汽艇在佛罗里达州比斯坎湾要隘他家附近的水域里兜风。这条船非常安全，很适合航海，因此特工人员破例违反总统安全保卫规定，允许他亲自驾驶这条船。尼克松事先得知勃列日涅夫喜欢驾驶大型高速卧车，所以他送给他的东道主一辆崭新的凯迪拉克牌汽车。

256

5月30日，当尼克松离开苏联前往伊朗访问之后，政治局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次访问的情况。政治局对这次访问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苏联领导层感到自己对尼克松的偏见减少了，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把他看成是冷战的急先锋，认为他的反苏思想根深蒂固，想就重大问题同他达成协议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莫斯科达成协议一事表明他是一个办事有条不紊而又讲求实效的人。这些协议标志着我们两国关系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你能够和尼克松打交道，”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概括他所得到的印象的。“现在是准备回访美国的时候了。”

勃列日涅夫对基辛格的印象也不错。在莫斯科谈判期间，基辛格以其独特的作风和魅力尽力寻找对待勃列日涅夫的正确方式。葛罗米柯没有像勃列日涅夫那样称赞基辛格是“精明的亨利”。他欣赏作为职业外交家的基辛格，但是不喜欢他这个人，其原因部分在于基辛格在国际新闻界中非常出名，而且他对自己很容易就能引起新闻界的频频关注沾沾自喜，这使得性格执拗的葛罗米柯感到不舒服。

我认为此次最高级会谈获得了重大的成功，它改善了我们两国的关系，并且确立了缓和政策。我必须承认，我们把许多美好的希望和这项政策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冷战的包袱还没有完全卸掉，所以我必须坦言，我禁不住对莫斯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感到疑惑。它真的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缓和紧张关系的开端吗？或者这仅仅是使一代人陷入相互猜疑和仇恨的对抗中的又一段插曲？它意味着尼克松政府渴望在两国之间建立更加务实的关系，并且实行互利合作吗？寻找问题的答案在当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全明朗。尽管我仍抱有一定的乐观态度，但我必须承认我的乐观缺乏真实的根据，我只是凭着职业经验和直觉而形成了这种看法。

确实，这次最高级会谈结束之后，苏美之间诸如此类的会谈成了加强我们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而且使两国关系没有出现失控局面。当6月8日我回到华盛顿时，基辛格交给我一封尼克松写给勃列日涅夫的私人信件。像勃列日涅夫本人一样，总统在信中表示他已经在考虑再次举行会谈的问题。探讨了一些在莫斯科尚未解决的问题之后，尼克松写道：“由于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多重大分歧，通往下一次最高级会谈的道路无疑是不顺畅的。但是，现在257 在我们知道了如何为它做准备，因此我们能够加快这一进程。”勃列日涅夫在回信中完全赞同总统所做出的积极评价，他写道：“苏美关系的迅速发展已经具备了稳固的基础。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坚定地履行我们的协议。”

然而，基辛格对我说，从现在直到11月份，尼克松必须集中精力再次竞选总统。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地位是极其稳固的，当然除了越南问题之外——这一问题无疑将是竞选辩论的中心问题。基辛格要我理解，为了推动越南问题的解决，总统将不惜与中国人玩把戏，并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成功当成一张王牌，向越南人施加更大的压力。

此后不久，基辛格应中国的邀请再次访问北京。我们还得知，

因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即将访问河内——我们已经向华盛顿通报了这一消息——所以总统特别命令停止轰炸河内和海丰港，并减少美国空军在北越上空的行动。但是，我们想扮演中间人的意图却没有实现。勃列日涅夫很快给尼克松写信说，波德戈尔内对越南领导人略述了美国关于结束这场战争的立场。但是，河内仍然要同美国在巴黎进行直接谈判，并且让波德戈尔内告诉华盛顿，河内的首席谈判代表黎德清将很快回到巴黎的谈判桌前。

基辛格的北京之行不很顺利。他回来后对我做了简要介绍。显然，他没有能够和中国人就越南问题达成协议。由于对日益临近的11月份总统大选的结果没有任何把握，所以美国人不得不重新与北越人展开直接的谈判。

置身于缓和的气氛中

7月12日，我因公到旧金山我国领事馆出差时，基辛格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尼克松很高兴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到圣克利门蒂的西部白宫休息几天。我们沿太平洋海岸线向南驾车行驶在如诗如画的加利福尼亚1号高速公路上，像很多美国人一样，我们尤其被卡莫尔小镇以及该镇的作家和画家迷住了。我们在那里停留了半天。

到达圣克利门蒂后，尼克松带领我们参观了他那幢墨西哥风格的漂亮的房子。这幢名叫“卡萨·帕西菲科”^①的房子坐落在海滩上，可以俯瞰大海。他还领我参观了供他和他的白宫工作人员工作之用的办公室。他带我参观了他同华盛顿、美国境内和世界重要地区的美军指挥部以及最重要的使馆进行直接联系的通讯设备。尼克松能够通过电话在两分钟内同上述部门的任何人取得联系，并且能够收到传真文件。当时这全都是些非常先进的通讯设备，因此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尼克松夫人还带我妻子参观

258

^① 西班牙语“和平之屋”的意思。——译者

了这所房子。我妻子和我都很喜欢这所房子，我认为这个地方很适合用作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来年举行秘密会谈的场所。

在不拘礼仪的气氛中，我和尼克松及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我们首先回顾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成果，接着尼克松便谈到了主要的问题。他说我国政府现在应该集中精力为另一重要步骤，即在华盛顿举行最高级会谈做准备。当然，他首先得赢得选举。他说：“我不愿被人看成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吹牛家，但我想我要设法战胜麦戈文。”（来自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是主张和平的总统候选人，他受到自由派人士强有力的支持。他是尼克松的民主党竞选对手。事实证明，尽管尼克松做了比较谦虚的预言，但他的失败比尼克松预言得还惨。）

接下来尼克松以非常自信的语气谈起对下次最高级会谈的设想。他提议在1973年5月或6月举行会谈，并且要提前宣布举行会谈的日期。他认为这将对今后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提前进行准备，美国和苏联将签署一些重要协议，虽然很难达到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签署协议的数量。作为最高级会谈的一部分，他建议勃列日涅夫在美国进行广泛的参观访问，亲自看看美国的情况。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取得的成功最终向总统表明，举行一连串的最高级会谈是可行的。他建议定期举行最高级会谈，并且表示如果重新当选总统，他将不反对1973年在美国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后，每年继续进行互访活动。

尼克松说，准备工作可以在基辛格9月份访问莫斯科时展开，尼克松直接安排的议事日程是这样的：欧洲不会出现重大的麻烦，因此他同意就欧洲安全问题召开一次东西方会议，因为很多欧洲国家都在寻求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莫斯科对此也表示支持；他确信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会得到批准，所以他建议我们要开始通过秘密渠道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交换意见，美国还要就限制常规武器问题试探其盟国的态度；在莫斯科开始进行的有关贸易和经济的讨论应该继续下去，因为这些讨论有希望获得成功，但他又

说它们有可能会在国会遇到阻力；他还打算就中东问题和越南问题，尤其是就后一问题采取联合行动，因为从刚刚开始竞选来看，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尼克松还请我向我们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转达他本人的邀请，请他在他方便的时候访问美国并和美国军方人士举行会谈。尼克松认为在两国国防部之间建立联系是很重要的，然而，莫斯科并不打算这么做，其主要原因是格列奇科本人持保守态度。

我清楚地记得在太平洋岸边圣克利门蒂与尼克松无拘无束地进行交谈的情景。这和我们在白宫进行正式会谈时的氛围大不相同。私人谈话非常容易产生相互影响。总统本人非常轻松自在。他谈吐随意，语言诙谐，而且准备以非同一般的坦诚态度发表他个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他对进一步发展苏美关系的构想内容广泛而且富于想象力。他的言论表明他正在思考的问题和建立苏美共管制度的思想是十分接近的。我丝毫不了解这一制度的情况，但尼克松关于每年进行一次最高级会谈以及两国政府最高层领导进行经常性接触的计划不仅会推动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且将会对整个国际关系——每当两个超级大国就其中任何问题采取相同立场的时候——产生深远的影响。

尼克松的整个设想并没有因为出现水门窃听丑闻而受到重大影响——在当时，水门事件只不过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一团阴云。然而，对于他的国内的反对派——他们已经在指责他试图建立一个总统制帝国——来说，这一设想太过分了，因此他们不能接受。

工作之余，基辛格和我安排了一天半的短暂休假。我们躺在海滩上，甚至在加利福尼亚温暖日光照耀下的沙滩上睡了两个小时。此情此景准会使驻华盛顿的外交使团大为震惊，更不用说尼克松的右翼政治反对派了：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和苏联大使只穿着游泳裤，躺在一起睡觉，一位安全警卫看管着他们的文件和私人财物。

基辛格带着我们去了好莱坞，在那里我们参观了电影制片厂，

观看了电影制作过程和惊人的表演。基辛格看来和电影明星们很熟，我妻子和我被这个我们以前一无所知的世界强烈地吸引住了。我们被请到折迭椅上坐下，好像我们是著名导演似的。我们此时住在莫斯科的公寓里却仍能回想起我们参观好莱坞的情景。

260 在一所电影制片厂，我们应著名悬念大师艾尔弗雷德·希区科克的邀请和他一道共进午餐。这位大师提出想在克里姆林宫拍一部惊险影片。他认为这部电影将会获得巨大的成功。我不怀疑成功的可能性，但是我担心莫斯科领导层是否能够充分认识这一想法的深刻性和独特性。“时机还不成熟，”我沉吟着说。我不能告诉他拍这部影片到底要等多长时间。但是我们彼此能够理解。

那天晚上，我们同以喜剧大师鲍勃·霍普为首的一些著名电影演员共进晚餐。事实证明，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非常令人愉快且聪明机智的人，远不像他们的媒介描绘得那个样子。霍普是一个机智诙谐的人，肚子里有一大堆奇闻轶事和滑稽故事，但他确实不太善于谈论他遇到的新的不太熟悉的话题，这种时候显不出他有聪明过人之处。他十分坦率地告诉我，他有一个作家班子为他写滑稽故事。

基辛格还邀请我妻子和我到旁边一家很小的墨西哥餐馆吃饭，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尝试了用13种配料制成的玛格丽塔葡萄酒。我们三人喝了两大罐这种厉害的鸡尾酒。这是一次美好的聚会，特别是因为我们没有谈到一句有关政治的话。

回到华盛顿后，我收到了一封尼克松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信中概述了他在圣克利门蒂与我会谈时提出的想法，并且对苏联领导层通过波德戈尔内访问河内、帮助重新恢复美国和越南的巴黎谈判表示感谢。信中强调了秘密渠道在创立“一种新的合作精神”时所起到的作用，这种合作精神现在成为两国关系的特征，并且将推动两国关系在未来的岁月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莫斯科、华盛顿以及越南战争的结束

当基辛格与越南人在巴黎重新展开谈判的时候，美越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似乎也开始缓和下来。基辛格告诉我，黎德寿在攻击美国时已经不是那么苛刻和无所顾及了，基辛格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应归功于波德戈尔内访问河内产生的积极影响。到了10月中旬，他对我说谈判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甚至极有可能在11月7日——美国大选之日——以前达成最后的协议。他极为秘密地告诉我，他和黎德寿已就结束战争协议的初步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尼克松已命令基辛格把长达14页的秘密草案连同他写的说明通报给勃列日涅夫。而越南人却没有告诉我们有关这份草案的情况。

10月15日，基辛格交给我一封尼克松写给勃列日涅夫的紧急信件，信中提出，“鉴于有关越南问题的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因此要求了解苏联的武器援助政策。尼克松想知道，如果美国同意采取一项限制美国向南越进行军事援助的和平解决办法，苏联是否还会继续向北越提供军事援助。

261

对此，我谈了我个人的看法：把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谈判与苏联单方面承担的义务联系在一起，好像它们是达成一致意见的唯一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这样做为时尚早。我们没有参与谈判。我们不能因为对白宫同越南人进行的谈判做出承诺而使自己受到束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强调说，“我们不愿意促成越南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恰恰相反，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基辛格仅表示总统感谢我们做出的努力。

从10月19日到23日之间，莫斯科和华盛顿就越南问题频繁地交换着信件。与此同时，基辛格在巴黎和北越人进行着深入细致的谈判。美国方面一直在秘密地向我们通报谈判的详细情况，从而使北越人失去了利用美国人实际上已交给我们的那些宝贵资料的机会。

在美国大选前夕，河内采取了强硬的态度。10月23日，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并告诉莫斯科河内最后做出的反应听上去非常吓人。但是，基辛格“向河内以及它的朋友苏联保证，即使在选举结束之后，总统仍旧会恪守他的诺言，并且会承认巴黎协议的。”

接下来尼克松便开始和勃列日涅夫就越南问题交换意见。勃列日涅夫的态度是：“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了最终解决越南问题的明确迹象。但我们不能忽略礼节和威信正在占据上风，并且在毁坏整个事业。”

这就是基辛格在大选前一个月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著名的，并且可能是愚蠢的讲话——他说：“我们相信和平在望”——时发生的事。很多人认为基辛格编造这番话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尼克松再次当选，很可能真是这么回事。但就在这时候美越之间似乎真的快要达成一次协议了，尽管它再快实际上也只是谈判结尾的一部分。美国人坚持要让它们的西贡盟友来批准和平条款，所以这就意味着签订协议的时间至少要推迟到11月底，因为西贡不希望按照原定进程达成协议，为此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河内则想在总统大选前达成协议，以免一位新总统当选后会出现进一步的麻烦。

262 大选之后，基辛格飞抵巴黎与黎德寿进行新的会谈。当我打电话祝贺尼克松重新当选总统时，他告诉我他认为他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签定一项最终结束越南战争的协议，而且他希望签定协议的时间最迟也不要晚于下个月。他还对苏联领导层在交换情报和实施外交压力方面所起的作用表示感激。但是，和平仍然没有来临。

到了下一个月，谈判出现了困难，华盛顿与河内之间发生了争执，与此同时，尼克松和基辛格不断向苏联发出呼吁，敦促我们对北越施加影响。基辛格甚至把他和黎德寿谈话的速记本拿给我看。美国人提供的情报并不一定总是和越南人提供的情报相吻合，反过来也是如此；双方都不会总是向我们提供重要的细节。但是，美国人向我们提供的情况更为全面，也更为机密一些，这使得

我们可以就具体问题同越南人进行坦率的谈话，劝他们不要过分推迟达成协议的时间。他们不喜欢我们这样做，并且一直敦促我们向美方施加压力。双方对我们的调解都不满意。每一方都想向另一方施加更多的压力，这使得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既不轻松，也不特别有效，因为我们并不想深深地卷入这场争执不休的谈判之中，也不想袒护任何一方。

11月1日上午10点，我接到尼克松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想把他对巴黎谈判的估计告诉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事，这场谈判现在已进入关键阶段。他首先感谢苏联领导层密切关注着这场谈判，感谢他们提供的非正式的帮助。他充满感情地说道，他希望苏联能够帮助他打破同河内谈判时出现的“最后的僵局”。两个星期之后，基辛格告诉我尼克松曾指示他中止同黎德寿的谈判，等到他们能够确定河内是准备同意签署协议，还是仍然要求美国做出新的让步时再说。基辛格交给我一篇反映美国谈判意见的文章和一份题为“巴黎谈判中的重点问题”的文件。他还给了我一份已和黎德寿讨论过的完整的和平协议计划草案以及他同北越谈判代表会谈的一些记录。他要求我不要让越南人知道他给了我这些文件。

三天后，我正要启程回莫斯科参加苏联建国50周年庆祝活动时，基辛格把一封尼克松给勃列日涅夫的私人信函交给了我。信中对两国关系，特别是对勃列日涅夫将在下一年度进行的访美计划做出了乐观的评价，显然，尼克松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鼓动勃列日涅夫向河内施加压力。但是，写信的时机却不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都在莫斯科出席庆祝活动，而且苏联已经说了很多有关“和越南保持兄弟般团结”的话。越南人极为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胡志明知道我们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不仅是苏斯洛夫，其他人也都是如此——因此他们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继续利用这一点。他们对莫斯科的每一位领导人都说，美国人过于斤斤计较了，因此延长了这场战争。他们暗示，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应该迫使华盛顿解决越南问题。就我们自身而

言,我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因为它影响着我们与美国的关系。

当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尼克松下令展开自越南战争开始以来最为猛烈的轰炸行动。我们完全理解这一轰炸行动的政治实质;美国政府已经把全部的地面战斗转交给南越进行,现在需要结束战争并把它的战俘带回家。经过四年执政和两年谈判之后,尼克松政府现在实际上已不再关心究竟由谁来执掌越南政权。基辛格和尼克松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需要找到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以便摆脱越南问题,因为出于国内的原因,他们需要和平。

12月28日,我刚一返回华盛顿便接到基辛格打来的电话——他正和总统在加利福尼亚短期度假。我们谈的完全是越南问题。我对基辛格说,苏联领导层认为在这场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应该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首先要做的是立即停止轰炸北越。这有助于双方放弃拖延战术,从而迅速缔结和平协议。

基辛格非常生气地说道,和固执的越南人打交道太难了,他们在会谈桌前一点儿也不通情达理。“当美方试图在轰炸声的伴随下把它的论点说得更令人信服时,它就是那么通情达理吗?”我反问道。但是,我们在一件事情上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两国之间不要出现毫无必要的紧张关系。

过了几个小时,基辛格又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把莫斯科的态度告诉了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决定同意河内提出的由黎德寿于1月8日在巴黎与基辛格进行会谈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下令从第二天——12月29日起,停止对北纬20度以北地区的轰炸。河内还没有得到通知,所以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告诉它。美国将直接通知他们。基辛格给我念了已经写好了的致河内信件的全文。谈判又重新开始了。

1973年1月27日,美国人、南越人、北越人及越共在巴黎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第二天,停火协议生效。而且就在那一天,我把勃列日涅夫写的一封信转交给了尼克松,信中说:“越南实现和平为加强苏美关系和全面改善国际局势提供了新的可能。”

基辛格异常高兴。他说总统认为现在是确定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日期的时候了。他还说，为了在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同莫斯科的关系，尼克松已私下安排前国务卿迪恩·腊斯克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一职。但是，遗憾的是，腊斯克拒绝重新回到公共生活中来，宁愿留在佐治尼亚州立大学继续教书。

尼克松在回信中表示同意勃列日涅夫关于战争结束将有利于苏美关系的观点，并强调现在应该加快缓和的进程。他请勃列日涅夫告诉他访问美国和举行下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最方便的日期。

不可否认，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信都反映出他们对越南战争结束的满意和如释重负的真实感情，虽然其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两人都认为战争的结束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至于我，由于经历了三位总统艰难的执政时期，感受到长期以来他们因为越南问题对我们两国的影响而产生的烦恼，所以，从我个人的职业角度来讲，我真的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前面还有更富有建设性的工作等待着我们。现在，两国政府已经确定了举行下一次最高级会谈的坚定方针。

第十六章

在美国再次举行最高级会谈

缓和及由此造成的问题

1973年，苏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战后以来从未达到过的和睦阶段。各种情况表明，缓和政策的生存——尽管曾经出现过反复——主要取决于美国一方。的确，在实际贯彻的过程中，缓和这一特殊概念是突然降临到美国人中间的，许多人完全是下意识地接受了这一概念。这种转变还造就出一些新奇的国内联盟，最爱寻衅滋事的右翼分子、自由派反共人士以及犹太人团体一起要求苏联允许自由移民并使人享有另外一些人权。他们的活动迫使国会批准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将对苏联的贸易让步与其放松国内政策联系起来。因此，与在苏联产生的情绪相比较，说美国人的思想倾向已经转变为赞成稳固发展两国的关系尚为时过早。

但是，对美国的发展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水门事件，它造成了美国宪法规定的民主制度的一场危机。起初，1972年6月8日非法闯入设在华盛顿水门公寓内的民主党总部似乎只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尽管这些窃贼后来被发现是按照尼克松政治班子的核心机构的旨意行事的，但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我仍未充分注意对后来把白宫牵扯进来的那些蛛丝马迹所做的初步报道。我认为像尼克松这样一位具有丰富的政治阅历的人根本不会允许他的办公室卷入如此卑劣的冒险活动中。

苏联及其政府很难理解美国舆论何以能够抛弃尼克松总统，尽管他在爬向权力顶峰的过程中曾经不择一切手段，但他肯定是他那个时代中最为能干的领导人之一。以明显多数票当选连任的这位总统因被人们看做是微不足道的一桩小事而面临着被弹劾的危险。苏联公民当时认为，利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他的白宫办公室所享有的相当大的权力对一位国家元首来说是很自然的事。谁会在意这样做是否违反了宪法？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水门事件是他的政敌策划的一场旨在推翻他的阴谋。在莫斯科，他的大多数政敌都被认为是反对改善对苏关系的人。尽管这一切在短时间内不会对缓和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但人们终究会认识到它随时都可能破坏这一进程。它肯定是一颗最终会摧毁这个人的总统宝座的定时炸弹，而我们认为这个人在美国是支持缓和政策的主要力量。

犹太移民和反缓和联盟

第一次最高级会谈之后，一个反苏联盟已在美国政坛的对立面中形成。保守势力越来越积极地反对缓和——这项政策和它们敌视苏联和共产党国家的传统以及延长军备竞赛的决心全然相悖——或许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然而，认为向苏联的移民政策，特别是犹太移民政策发起挑战的时机已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支持持不同政见运动的自由派人士也加入到了保守势力的行列中。

或许我们应该预先对犹太极端主义团体的活动所造成的情绪有所警觉。1970年，犹太极端主义团体几乎天天都要在我们使馆周围设置纠察线。它们在驻华盛顿的苏联办事机构外面搞爆炸活动。纽约城苏联驻联合国使团以及位于郊区的使团住宅的窗户遭到了步枪的袭击，罗杰斯国务卿公开谴责这种枪击行为是“野蛮行径”。在大街上和商店里针对单个苏联公民采取的流氓行动已司空见惯。最为残暴的行动是由拉比·梅厄·卡亨领导的保卫犹太

人同盟实施的。拉比·梅厄·卡亨后来在以色列建立了一个极端主义政党并且成为阿拉伯人在美国进行的一次暗杀行动的牺牲品。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他采取这类行动就是为了“造成苏美关系的危机”。

与这种情况形成讽刺对比的是,我们的使馆以及其他一些苏联驻美机构一般说来都赞成改善两国关系,赞成苏联解除对犹太人移民所做的毫无道理的限制,我们向莫斯科提出的正是这样的建议。但是,上述暴行严重伤害了苏联外交官们的感情,他们再也不愿意继续为说服我国领导层而做出努力。

267 许多犹太领导人和美国政府的官员在私下与我们交谈时都谴责了这种袭击行为。尽管国务院把它自己的特工人员派来保护我们,但它仍正式要求我们提醒居住在华盛顿的所有苏联外交官以及他们的家属小心为上,这使得苏联外交官这一段时期在华盛顿生活得极为不快。当葛罗米柯开完联合国大会准备飞回国内时,他在机场接到一个电话,电话警告说有人打算伤害他。他的座机被移到机场的一个角落里,他本人则呆在机库里,直到警报解除为止。

正当我们为第二次最高级会谈以及勃列日涅夫访问做准备的时候,美国国内出现了要求苏联允许自由移民的运动。这场运动来势凶猛,政治背景极为复杂,它得到了以参议员亨利(斯库普)·杰克逊为首的一批美国国会议员的积极支持。杰克逊是一名来自华盛顿州的保守的民主党人,他有着当总统的强烈野心,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苏联。

这场反苏运动把尼克松1973年春请求国会给予苏联“最惠国”贸易待遇一事牵涉了进来。获得最惠国待遇意味着我们同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基本上享有同样的商业地位。自由派人士想把我们的最惠国待遇同莫斯科解除对移民的限制联系起来。保守派人士则反对给予我们最惠国待遇,其理由仅仅是他们反对缓和。这一切促使双方展开了一场辩论,其结果是损害了此后的美苏关系。

让我解释一下这一声名狼藉的辩论题目——犹太人从苏联移

民——的历史背景。这种事现在已难以让人相信,但在斯大林独裁时期,想移民的人都会被看成是“祖国的叛徒”,他们将被囚禁或流放。斯大林去世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但苏联政府仍然极不愿意让苏联公民离开。移民丝毫不比通过宇航员训练容易。

我从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允许犹太人移民。这样做能对这个国家造成什么损害呢?相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够彻底摆脱造成我们和西方国家,尤其是和美国长期不和的一个根本问题。当人们私下里向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局成员询问他们是如何看待移民问题时,甚至连他们也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明确回答。他们中的某些人仍然受斯大林观点的影响,认为移民者是叛徒。另一些人则声称许多苏联犹太人知道国家机密,因为他们应用科学和技术的军工企业中工作,或从事其他的敏感工作;他们还认为犹太移民会参加到国外喧闹的反苏运动中去。其次还有我们的中东政策的影响:阿拉伯国家一直在抗议犹太人移民,它们认为这将扩大以色列的人口和技术,从而加强以色列的实力。

在莫斯科常常能听到这些理由。但最为重要的一个理由却是不能常常听到的。在苏联这个封闭社会中,克里姆林宫担心出现大规模的移民(不论民族和宗教),生怕在这个社会主义幸福国家出现的一个紧急出口会提供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从而造成国内局势的不稳。因此,苏联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美国想向苏联输出它的自由人道主义和商业价值观,苏联则只想通过贸易获得商业利益,而不想接受它的价值观念。

268

然而,苏联政府不可能完全无视来自国内外的日益增大的压力,因为它试图改善通过莫斯科和华盛顿最高级会谈已经确定下来的苏美关系。因此,犹太移民问题通过基辛格和我之间的秘密渠道得到了认真的讨论。

尼克松政府明白最好不要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它正确地推测出如果没有受到公开挑战,莫斯科很可能会改变它的实际做法。的确,在策划1972年第一次最高级会谈时,基辛格已经向苏联领导层

转达过尼克松的保证,即总统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将不会代表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发出呼吁。莫斯科尽管不情愿,但还是开始悄悄地改变它的移民政策。1968年,苏联犹太人获准移民的人数只有400人,相比之下,1968年获准移民的人数已达到将近3.5万人。

这一进程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72年8月3日颁布的一项法令给破坏了,这项法令规定向移民征收出境税,借口是让他们“归还”因在苏联享受免费教育而欠国家的费用。这项法令让我既感到惊讶又疑惑不解,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项法令几乎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也是因为在苏美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双方都宣称此次会谈取得了重大成就——刚结束不久即发生了这种事。我给外交部发了一封电报,指出这一措施很可能在美国引起负作用,要求他们向我解释做出这一决定的目的何在。我从未收到过这样的解释。

269 后来,当我在莫斯科开会期间,我终于发现了这件希奇古怪的事的原委。原来是我们的教育部提出了要求赔偿的主意。在征收这项税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正在黑海休假。党内第二号人物兼首席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工作。他一直不太愿意采取这一新的、比较开明的移民政策,认为这项新税收是个非常好的主意,于是这项税收就成了法令。葛罗米柯休假回来之后马上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极为荒唐的政治举措。我们逐渐说服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将它废除了。但危害已经造成了,这件事在美国煽动起一场把犹太人移民问题和对苏贸易问题连在一起的辩论。

3月15日,在73名参议员的支持下,参议员杰克逊对尼克松贸易改革法案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即以杰克逊和这一修正案的另一名发起人众议员查尔斯·瓦尼克的名字命名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这项修正案不准苏联获得最惠国待遇和贸易信贷,直到它解除移民限制为止。

这一大规模的运动逐渐引起了苏联统治者的警觉。3月30日,勃列日涅夫指示我按照总统本人的请求,将犹太人移民的秘密资

料交给尼克松。资料表明，1972年，在申请移居以色列的人中有95.5%得到批准。资料还表明，从1971年到1973年，总共有6万名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勃列日涅夫还在同一封信中告诉尼克松，苏联已经废除了移民税。

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都问我他们是否可以在同国会讨论那项贸易法案时利用苏方提供的所有资料。莫斯科的回答表明它在第二次最高级会谈即将举行之际对苏美关系是多么的重视。它同意尼克松将勃列日涅夫的信当做一份苏联的正式声明向国会通报。

4月18日，尼克松将此情况向国会领导人作了简要介绍。多数党领导人马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以及一些重要的共和党参议员——其中包括来自伊利诺斯州的休·斯科特和来自弗蒙特州的乔治·艾肯——得知这一消息后都表示满意。然而，杰克逊参议员却没有被说服。他说，这份报告并没有对今后的情况做出保证。他要求苏联公开承诺让数字固定的一大批人移居国外，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不对希望从苏联移民的人数做出任何限制。他的意见得到了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和其他一些不担心因对苏联移民问题态度软弱而受到指责的参议员的支持。

美国政府及政府内部的苏联反对派仍在试图达成某种妥协。我认为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威胁已经引起苏联政府对犹太移民问题的高度重视，但杰克逊仍在逐步提高他的要求，其目的是为了扩大他在犹太选民中的影响，以实现他爬上总统宝座的愿望。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杰克逊以及他采用的破坏性手段，我们本可以找到一种解决办法。尼克松甚至指示基辛格要求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不要煽动美国犹太人社团反对苏联和美苏移民协议。但这一做法没有收到明显效果。

1973年5月举行的华盛顿最高级会谈没能确定我们两国间

270

列日涅夫做了详细解释，并允诺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但他警告说，最后的决定掌握在国会手里。勃列日涅夫不可能因为杰克逊法案受到了有组织的民众运动的支持就表示对它的承认。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这样做无异于被迫同意美国干涉苏联的内部事务。由于缺乏政治勇气和远见，他们没有能够越过这一障碍。

尽管如此，双方毕竟认识到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痛点。为了解开这个结，双方通过秘密渠道又做出了另外一些尝试。统计资料表明移民人数仍在不断增加，但这一事实反而使得杰克逊参议员进一步利用这一问题来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他和他的支持者们不满意美国政府的温和外交；他们想让莫斯科屈从他们的要求。最典型的事实是在勃列日涅夫来美国参加最高级会谈前一个星期，杰克逊要求取消他的这次访问。这位参议员要的是对抗，而不是达成协议或实现缓和。直到冷战结束之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仍然保留在法令全书中。

尼克松改组政府

新年伊始，基辛格告诉我，为了准备预计于5月或6月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的会谈，尼克松建议2月份通过秘密渠道全面讨论一下所有的问题。他打算着手准备联合文件的文本，这样甚至可以在最高级会谈举行之前就这些文本差不多达成一致意见。国务院在准备工作中再次充当了不太重要的角色。基辛格在新年之前就已经告诉我，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改组政府，特别是国务院。罗杰斯将再呆上大约6个月，驻西德大使、尼克松的朋友和他在大学读书时的法学教授肯尼思·拉什可能取代他。早先曾担任过副国务卿的埃利奥特·理查森将担任国防部长。基辛格解释说：“这样做将使总统和我管起五角大楼来更容易一些，因为理查森相当灵活，而且懂得军事和政治事务。”尼克松还想撤换商业部长彼得·彼得森，基辛格说这个人“在白宫会议上过于健谈了”。（总统喜欢听

简洁的报告和建议。)此外,基辛格说彼得森的妻子“非常饶舌”,她抨击总统的言论已经从华盛顿的沙龙传到了白宫。

就白宫内部而言,这次改组将亚历山大·黑格送回了五角大楼。黑格将从国家安全顾问副手的位置上调到陆军任副参谋长,他原来的位置将被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取代。斯考克罗夫特是一位47岁的空军准将,原来担任总统的高级军事助理。基辛格认为斯考克罗夫特缺乏黑格具有的政治技巧和经验——后来他改变了这一看法——所以他决定让他人分担他的副手承担的职责。斯考克罗夫特将掌管军事事务,外交问题则交给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处理,尽管他并不喜欢索南费尔特的“傲慢无礼”。索南费尔特和基辛格一样也是在德国出生的,在基辛格访问莫斯科时他一直陪伴左右。由于他如影子般到处跟着他的上司,因此人们称他为“基辛格的基辛格”。

271

基辛格还说道,总统对他说,他将被留下来再担任4年总统的外交事务主要助手,也就是说要呆到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结束。基辛格说他很愿意接受这一任命。在那个时候,基辛格的政治声望已经达到了顶峰。在民意测验中,他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人物,其次是比尔·格雷厄姆,已经因水门事件受到怀疑的尼克松排名第三。他的人像已在伦敦蜡像博物馆展出,甚至连参加世界小姐选美庆典的佳丽们也热情地把他选为“最杰出的国际人物”。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不愿意升迁到国务卿这个位置上,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政治选民。他写道,他一直打算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从白宫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因为完全有赖于总统支持的白宫顾问本应该是默默无闻的,而他的名声使他无法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呆下去。他指出总统让他出任国务卿也是不得已的事,因为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尼克松的权力来源于总统享有的权限,现在这种权限已经受到水门事件的削弱,因此尼克松需要他出任公职,以保证他们制定的政策能够沿续下去。

让我再补充一些我个人的看法。基辛格在5月份曾亲口秘密地

对我说，总统曾让他决定由谁来取代罗杰斯担任的国务卿一职：是拉什还是基辛格本人。罗杰斯被解职一事将于7月份他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之后宣布。基辛格显然对总统让他出任这一职务感到荣幸，尽管这将给他带来某种不便，例如他要承受礼节方面的沉重负担以及定期向国会委员会做出解释。

尼克松本打算让罗杰斯出任美国驻任何国家的大使，或者出任政府的其他任何职务，但基辛格认为罗杰斯最好还是重操法律旧业，他早先担任公司法律顾问时收入极为丰厚。然而，到了8月份，水门事件已开始左右总统的决策，基辛格说尼克松想让罗杰斯担任司法部长，为他组织辩护工作。令尼克松感到烦恼的是罗杰斯拒绝出任这一职务，总统最后决定把他摆脱掉。

8月22日，基辛格从圣克利门蒂打电话告诉我，总统最后决定任命他为国务卿。这一任命将在当天晚上宣布。基辛格同时还继续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我们的秘密接触，包括午餐会和晚餐会将继续进行。罗杰斯将于9月3日离职。

旷日持久的猜测就这样结束了，基辛格成了这场幕后斗争的胜利者，对此我没有感到惊讶。这一情况意味着苏美关系的管理运作将得到改善，其原因仅在于它将结束白宫把国务卿乃至他领导的整个部门都蒙在鼓里的那种混乱而又不稳定的状况。通过秘密渠道达成的协议经国务院外交人员之手将变得更容易付诸实施，从而消除了我们早先曾遇到过的许多困难。因此，我欢迎对基辛格的任命，并且真诚地向他表示祝贺。

基辛格向我解释了担任国务卿后他将如何重新安排他的工作日程。由于他的工作必须和总统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获得成功，因此他在每个工作日开始的时候仍将于早晨8点至9点与总统在白宫会晤，讨论重要和急迫的外交政策问题。他还要继续参加白宫工作班子每天上午举行的例会，密切关注它的看法及国内问题。

他打算随后去国务院办公，在那里从上午11点呆到晚上，虽然他仍然会在白宫呆几个晚上。不用说，他还要去白宫参加由总统主

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有会议。作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仍担任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因此他继续主持着有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长参加的联席会议。这些会议将仍在白宫而不是挪到国务院举行，其目的是强调白宫仍掌管着外交政策。基辛格希望任命他担任国务卿会加强白宫对美国庞大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机器的控制，使其工作更有成效，而且更加可靠。这是他要想方设法实现的目标。

勃列日涅夫强迫基辛格“在协议草案上签字”

273

5月初，基辛格访问了莫斯科，我像往常一样陪同他进行访问。

基辛格不仅和葛罗米柯，而且还和勃列日涅夫本人举行了会谈。勃列日涅夫积极参与了此次会谈，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问题的会谈。会谈是在勃列日涅夫非常喜欢的扎维多沃狩猎区举行的。这个地方距离莫斯科大约有80英里远，他们在那里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起草一项防止核战争的协议。勃列日涅夫认为这项协议是特别重要的。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插曲，它完全体现了勃列日涅夫，实际上也是整个苏联领导层对尼克松和美国政府的态度。当协议起草工作完成后，勃列日涅夫建议基辛格草签这项协议。但基辛格拒绝这样做，他说他没有得到授权。与此同时，他表示相信总统会完全同意这项协议的。

勃列日涅夫发起了脾气(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故意的)，他声称如果知道这项工作会以不承担责任的会谈而告结束，他肯定花两天的时间和基辛格进行讨论。结果是勃列日涅夫最终迫使基辛格在一张纸上写下了美国政府愿意签署已经草拟好的这项协议的保证。尽管这一保证没有什么法律效力，然而它还是让勃列日涅夫获得了某种满足感。他似乎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的巨大的外交成就，并且告诉政治局委员们他是如何“拉着基辛格的手，强迫

他在协议草案上签字的”。但是，这一情景和果戈里的喜剧《死魂灵》中奇奇科夫和索巴科维奇这两个互不信任的人物进行讨价还价那一幕是多么的相似。

当我返回华盛顿后与尼克松谈话时，这位总统对苏联领导层不相信通过基辛格转达的他所做的保证感到非常惊讶。他说，即便是基辛格签了字，如果他作为总统最后决定不同意这一协议，那么这种签字仍是无效的。我竭尽全力消除了这件事所产生的影响。坦率地说，我本人不太喜欢勃列日涅夫的这种做法。

勃列日涅夫一遇到基辛格和他的顾问们就喜欢开玩笑。会谈期间，他们在一次短暂的休息时聊起了各自的手表。基辛格的助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自豪地炫耀着他的瑞士手表。勃列日涅夫突然用手把自己的手表蒙起来不让索南费尔特看到，然后建议进行相互交换。索南费尔特有些犹豫，但他接下来又改了主意。他显然认为共产党总书记的表肯定是非常精美而昂贵的。等他接过来一看，才发现勃列日涅夫戴的是一块普通的苏联手表。这是莫斯科手表厂的工人们送给勃列日涅夫的礼物。这块表质量不错，但它是钢质的，而不像索南费尔特期待的那样是一块金表。唯一能够使他感到安慰的是他从这位苏联领导人那里得到了一块纪念表。

会谈结束后，勃列日涅夫邀请基辛格驾车绕着扎维多沃风景如画的乡村驾车兜风。基辛格说他很高兴这样做。他根本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一位鲁莽的驾驶员，他们是在进行一场冒险活动。他们在一条弯弯曲曲的狭窄道路上驾车飞奔了大约半个小时，安全警卫人员驾驶着另一辆车跟在他们后面。交通民警根本不敢阻拦总书记的车。谁敢这样做？这次鲁莽的驾车兜风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此后，他们还曾冲劲十足地驾驶着一艘马力强劲的摩托艇在伏尔加上游水域中来回驰骋。这回可真让基辛格感到惊心动魄，就连他那惯有的幽默感一时间也被吓得不知去向了。

5月初，基辛格还曾秘密地对我谈起过水门事件，这样做显然

是为了表明他没有卷入此事，这件事不会影响他在白宫的地位。相反，他声称，由于总统的两名亲密助手 H.R. 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已被解职，他在白宫的地位反而更巩固了。由于水门事件，基辛格和这两个人的关系一直相处的不好。

基辛格强调说，总统根本不会因水门事件而“考虑辞职”，然而这件事还是让尼克松感到很不愉快。与此同时，尼克松认为他的政治对手还会把这件事张扬上几个月，但它终究会平息下来的。据基辛格说，尼克松对他的同胞无视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而他的对手又无限夸大“按美国标准衡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既生气又心烦意乱。

基辛格顺便说到，总统有很强的记忆力，在剩下的三年半时间的总统任期内，他肯定要对伤害他的人进行报复。他还说，反对派报纸要求推迟与勃列日涅夫的会谈没有对总统产生任何影响。恰恰相反，他越来越相信最高级会谈应该按计划如期举行，并且相信它一定会取得成功。“总统决不会让它流产，”基辛格说。

说来可能令人难以相信，但莫斯科确实没有为了本国的目的而利用尼克松迫切希望最高级会谈获得成功的心情。它也没有对我们在新的最高级会谈举行之前与美国人讨价还价产生影响，莫斯科并没有为了从尼克松那里获得更多的好处而施加更大的压力。首先，莫斯科并不想给一位刚刚开始着手改善苏美关系的总统增加额外的困难。但主要的原因是在 1973 年中期，苏联领导人（我必须承认，包括我国驻华盛顿使馆在内）仍不相信水门事件在很大程度

275

上是一场政治危机。就我所知，直到 1974 年初，政治局才开始认真讨论这一问题。

5 月底，尼克松将一份详细的访美计划送交给勃列日涅夫，以征得他的同意。尼克松已经决定，为了强调这次访问的重要性，这次最高级会谈将打破既定的外交准则，在白宫、戴维营和圣克利门蒂三地举行。尼克松建议在两天之内签署两个重要的协议（防止

核战争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基本原则”),以强调它们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一直拖到6月初才签署。尼克松在最后一刻又在协议文本中加进了两条含义明确的修正案,尽管不太情愿,但勃列日涅夫还是被迫接受了。

这件事令勃列日涅夫非常生气,他拒绝接受尼克松让他去圣克利门蒂他的私人住所做客的邀请。他提出的借口是他的医生建议他不要做长时间的飞行。(这是不顾一切草签协议造成的一个后果,但这件事没有闹大,甚至在最高领导层中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6月11日,基辛格和我对要在最高级会谈期间签署的所有文件都认真检查了一遍,并继续精心推敲着联合公报的文字。会谈结束时,基辛格“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尼克松因勃列日涅夫拒绝访问圣克利门蒂而受到了深深地伤害。我深信圣克利门蒂是一个举行非正式会谈的好地方,因此打电报给莫斯科,建议勃列日涅夫重新考虑。

第二天,勃列日涅夫通知尼克松,他已经决定“不顾医生的劝告”,访问加利福尼亚。午夜时分,尼克松亲自打电话,请我转达他对勃列日涅夫的谢意。他之所以邀请勃列日涅夫住到他家里,原因是他认为勃列日涅夫在他家做客将有助于他们之间建立起比较密切的私人关系;他相信他们两人在一起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这根本不是自我标榜或自以为是,”尼克松接着说道,“这是一个历史的现实。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住宅被称作“卡萨·帕西菲科”,它在西班牙语中是“和平之屋”的意思。这是一个古老而又非常普通的名字,但现在它却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尼克松有时喜欢夸大其辞。

所有的协议草案事先已经准备完毕,就等着勃列日涅夫在访问期间签署了。因此,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即将举行的会谈不会涉及任何谈判问题或拟订协议的问题,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就广泛的问题自由交换意见。

6月18日，在包括葛罗米柯在内的一批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勃列日涅夫乘专机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他们受到国务卿罗杰斯的迎接。我陪同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乘直升飞机飞往戴维营，他们将在那里过夜。勃列日涅夫很喜欢这个带有乡村气息的地方（它使他想起了他的狩猎小屋），他立即通过特意为他安装的无线电话把他的良好印象告诉了政治局其他委员。

第二天，他飞到华盛顿，与尼克松举行会谈。我现在仍然记得6月19日举行的那次欢迎仪式。白宫南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总统站在一张特制的讲台上。对勃列日涅夫而言，这是他最辉煌的时刻。在苏联的核力量、导弹以及核弹头与美国——所有的国家中最为强大的——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还有什么能比和美国总统平等地站在一起更了不起呢？甚至连灿烂的阳光似乎也在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

庄严的仪式，乐队演奏两国国歌，仪仗队，全世界都看到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和美国总统并肩站在一起——对苏联领导层来说，这一切都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最大限度地承认了它的力量 and 影响。我必须承认，对于我们这些陪同勃列日涅夫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自豪的时刻。与这一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尼克松——西方最强大国家的总统——的影响和权力正在下降。电视转播的水门事件听证会正在进行当中，尽管在勃列日涅夫访问期间听证会暂停了一个星期。

这次访问导致了两个重要协议的产生，一个是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另一个则勾划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基本原则”。在其他方面还达成了一些协议，例如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进行科学和技术合作；在农业、运输业、海洋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关税协定，等等。在勃列日涅夫——他想使缓和听上去像是一项不可逆转的政策——

的坚持下,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促进苏美友谊是世界和平的一个永久性因素。联合公报还包括双方就定期举行最高级会谈达成了一致意见;勃列日涅夫邀请尼克松在1974年访问苏联,尼克松接受了这一邀请等内容。

277 这次最高级会谈还有助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解决。在这次最高级会谈结束后的第二个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终于同意10月30日在维也纳就相互削减各自在欧洲的武装力量开始进行谈判。35名外交部长开始为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做准备工作,这次会议于9月18日在日内瓦开幕。这样,由于双方都做出了让步,苏联和它的盟国实现了它们一直在追求的召开一次欧洲会议的目的,而美国和它的盟国也实现了就削减中欧驻军展开谈判的目的。

苏联领导层把著名的防止核战争协议看成是勃列日涅夫访美的主要成就,所以苏联新闻媒介为之大声喝彩。然而,美国对此项协议持批评意见的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把这项协议看成是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本军事战略——以核反击来保卫西欧,使之免遭常规力量的打击——的一种威胁。基辛格写道,他认为是苏联为建立苏美共同管治的格局而进行的一种尝试,其目的是支持苏联可能发动的对中国的进攻。然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即使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种事。

我们的基本政治思想理论决定了我们只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实行和平共处,而不会同它进行共同统治。克里姆林宫公开地愤怒谴责“有关超级大国共同统治的谎言”。对莫斯科而言,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是在缓和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或者正如美国作家雷蒙德·加特霍夫正确指出的那样,是朝着用某种办法控制危机和在危机出现便缓和紧张局势,从而防止危机发生迈进了一步。但它也仅仅是迈进了一步,因为这项协议从未形成制度。就中国问题而言,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天真到要同华盛顿结盟反对北京的地步,因为它知道华盛顿根本不愿意这样做,它的同情心无论如

何也在中国一边。许多年后，基辛格向我承认他曾经错误地把他的认识建立在苏联必定会对中国发动一场进攻的基础之上。

在回忆录中，基辛格自豪地描述了在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他如何想方设法阻止了莫斯科设想的“核共管”策略，最终说服勃列日涅夫同意将他最初定的目标打个折扣后写到防止核战争协议中。但是，基辛格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苏联的原定目标是相互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因此，基辛格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政府以及他这位国务卿反对不使用核武器（说这种话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而是在措词上巧妙地兜了个圈子，说他和尼克松反对与苏联进行“核共管”。说得婉转些，这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只要稍稍回顾一下防止核战争协议的历史过程就可以弄清楚事实真相。

从60年代开始，苏联在不同的场合就不断提出共同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建议。美国和它的盟国渴望保持对常规进攻的核威慑，因此它们一再反对苏联提出的这个建议。勃列日涅夫在和基辛格谈话时以及在同尼克松首次举行最高级会谈时都要求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但尼克松对此问题完全持回避态度，尽管他同意通过基辛格—多勃雷宁渠道对一项不承担任何义务的草案进行讨论。但我们的美国同伴一直在进行拖延，我明显感觉到基辛格就是这样做的。

278

事实证明，在为华盛顿最高级会谈做准备时，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美国人最后决定同意达成一项协议，但他们极力想把重点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转移到不使用武力这样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上去。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我们达成了一项妥协：协议中将不包括有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共同保证——这是莫斯科最初想得到的——但承认我们的军事均势，并且宣布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实现政治目的都是不恰当的。这项协议的真正意义在于它阐述了我们的基本政策，这就是在出现危机或危机已迫在眉睫的时候，通过紧急磋商来缓解政治紧张局势，从而避免出现对抗或冒险战争的风险。总的看来，这项协议是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个进步。

但是,由于双方都不愿承担危机出现时进行磋商的义务,因此这份文件含义不清,而且不具备约束力。

当然,这项协议以及1972年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关于苏美关系基本原则的声明存在的主要缺点是,这两份文件都没有包含能将这些原则付诸实施的有效措施。这一缺陷很快便清楚地显露出来,在此后不到6个月爆发的阿以战争期间,由于缺少相互信任和明确的承诺,共同磋商的主张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然而,人们很容易低估这项协议对国际环境和苏美关系产生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影响。在联合公报中,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宣称这项协议标志着双边关系中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在我国外交部分发给苏联驻外使节的一份秘密总结报告中,勃列日涅夫的访问被描绘成摆脱核战争威胁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有关勃列日涅夫访美组织工作的一些细节是很独特的。勃列日涅夫曾亲自指示苏联特工部门,他的这次访问要按照下达要求进行安排,即他在美国人面前决不能显出低于美国总统的样子。这一指示有时导致了一些奇特现象的出现。首先,为勃列日涅夫提供的电话服务要同尼克松的完全相同。除了当地的专线电话外,他还要通过由苏联接线员操纵的一个苏联专线网络同苏联代表团成员可能出现的华盛顿市的任何一个地方取得联系。此外,279 他还可以同莫斯科进行直接、即时的联系,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美国人察觉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心理,因此他们甚至允许我们将我们的某些内部通话设备安装在白宫,以备勃列日涅夫在访美期间感到需要进行紧急磋商时使用。(可以料到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勃列日涅夫对苏联技术进步的这些成果能在他旅行时陪伴着他感到特别高兴,并开始同在华盛顿的苏联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同在莫斯科的妻子以及同莫斯科领导层中的朋友们的家里进行通话,告诉他们他刚一到达戴维营就对美国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

在华盛顿期间，他住在白宫对面首屈一指的政府宾馆——布莱尔饭店——里，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出于安全考虑，美国首都的主要街道之一，宾夕法尼亚大街靠近白宫一段的交通被切断了，这样勃列日涅夫就可以步行穿越这条大街。在美国首都的历史上，关闭这条中央大街这还是头一次。

在戴维营，尼克松送给勃列日涅夫一辆最新型的林肯牌大陆型小汽车，因为他知道勃列日涅夫热衷于搜集外国小汽车（勃列日涅夫事先已通过秘密渠道明确暗示了这一点）。勃列日涅夫非常喜爱他得到这件新礼物，并且迫不及待地立即试车，想给尼克松展示一下他的驾驶技术（我给他们充当翻译）。总书记是一位驾车高手，但他不熟悉林肯车和它强劲的发动机功率。我提醒他注意这一点，但他早已跃跃欲试了。他一上来即用脚猛踩离合器。汽车猛地窜了出去。公路上出现了一个急转弯，勃列日涅夫不得不急踩刹车，他和尼克松（总统坐在前座上，我坐在后排）差点把头撞在挡风玻璃上。戴维营弯弯曲曲的公路显然不适合赛车，通常只有一些小型电瓶车在这里行驶。尼克松尽管受了惊吓，但他还是尽力敷衍着说：“总书记先生，你开得真不错。”勃列日涅夫竟然把这话当真了。在送给勃列日涅夫的礼品中还有一只用斯托本玻璃^①做的鹰，勃列日涅夫根本不了解美国传统的象征物，也不知道这件玩具的制作人是一位名家，因此他很奇怪为什么尼克松会把这么一样东西送给他。“我不需要这件东西，”他对我说，“你拿走吧。”我说这真是太好了，但告诉他这是件非常昂贵的礼物。它值多少钱？3.5万美元，我说。“真的？”他十分惊讶地说道，“把它还给我。”

在正式的礼节性活动中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紧接着欢迎苏联领导人的官方宴会举行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这次盛大集会安排得非常得体，无懈可击，尤其是考虑到白宫完全是破天荒第一次举办这一性质特殊的活动，而且冷战此时仍未结束。我仍然记得

^① 斯托本是纽约州的一个县，以出产精致的玻璃器皿著称。——译者

仪式主持人大声宣布勃列日涅夫进入会场，请所有的人起立时的庄严情景：“女士们先生们！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到。”在白宫听到这样的宣告在历史上肯定是第一次。勃列日涅夫和他的随从们以及其他在场的人都认识到这是非同寻常的。根本没有人能够想到，20年之后苏联将不再有这样一个政党，在美国人看来，这个党长期以来——即便在那一时刻也是如此——一直是一个邪恶帝国的象征。

勃列日涅夫在使馆为尼克松举行了一个答谢宴会。为了充分显示俄罗斯的烹饪，所有的食品都是用专机从莫斯科运来的。餐桌上摆着伏特加酒和高加索葡萄酒，宴会是在使馆的金色大厅里举行的，气氛轻松而友好。参加宴会的大约有100位来宾，包括总统和他的夫人。此时仍未结婚的基辛格领着一位刚露头角的年轻女演员前来赴宴。他请求不要按照外交礼节让她坐在他的身边，以免使她感到窘迫。他的请求得到了满足。顺便说一下，尼克松非常了解这一习惯，早在1971年，霍尔德曼就交给礼宾官员一份内容诙谐的备忘录，上面写着基辛格“在国宴上不必和那位最美丽的女士坐在一起”。

勃列日涅夫对宴会很满意，他希望“看看大使和大使夫人住的地方”。我们上了三楼来到我们的住室。品尝过美味佳肴后舒舒服服地坐下聊天使勃列日涅夫显得极为风趣幽默，他开始询问起我们在华盛顿的生活情况。生动活泼的谈话被那位特工头头给打断了，他点点头，示意我跟他出去。勃列日涅夫注意到了他的动作，厉声说道：“你不必和他说悄悄话。我们彼此非常熟悉。过来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

这位特工官员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刚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说大使馆被安放了一颗炸弹。他建议勃列日涅夫立即返回布莱尔饭店。我也力劝总书记不要冒险。

“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勃列日涅夫问道。我妻子说这种电话已司空见惯，我们一般是该干什么就还干什么，因为我们也没有

别的地方可去。

勃列日涅夫宣称他“也不想惊慌失措”，尽管大家都努力劝说他离开这里，但他又呆了半个小时，直到午夜时分才走。结果一切都很正常，尽管我因感到责任重大而忐忑不安。

勃列日涅夫访美的另一个不寻常阶段是乘总统专机和尼克松一道去他在加利福尼亚圣克利门蒂的私人寓所做客。到达当地机场后，电话把戏又上演了一次。由于没有安排正式仪式，所以只有很少一些人到机场迎接，其中绝大部分是特工和陪同人员。但是，在附近的桌子上架设着一部我们的保密电话；以备总书记临时需要同莫斯科紧急通话时使用。苏方坚持要求安装这部电话纯粹是为了面子，而不是为了工作。勃列日涅夫没有使用它。

281

在这里我还应该再补充几句。在即将回国之前，勃列日涅夫慷慨地提出让我保留使馆和莫斯科之间通过卫星直拨的电话线路，尽管这样做开支极大。我对他表示感谢，但表示不能接受他的建议，因为保留这条线路以及为管理这条线路而额外增加人员的费用十分庞大。此外，我说，我们和莫斯科之间现在已经有了不间断的电讯联系。其实我拒绝保留这条线路的真正原因非常简单：我已经受够了在勃列日涅夫抵达前一个星期安装的那部电话给我带来的麻烦了。在最高级会谈举行之前的整整一个星期里我简直就没法睡觉。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很愿意试试这条新线路，常常是随便找个什么借口，或者干脆不要什么借口就从莫斯科给我打电话，问些个诸如“华盛顿的天气怎么样呀”之类的问题。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有8个小时的时差，所以电话打到华盛顿时往往是半夜。我逐渐讨厌起这部电话，并且拒绝保留它。至于勃列日涅夫，他以为我是想为国家节省资金，因此对我的想法表示赞赏。

在克利门蒂，勃列日涅夫和总统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们是6月22日晚上到达那里的。由于从华盛顿到这里飞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在6点钟左右和总统简短地寒暄几句后，勃列日涅夫即决定

早早休息了。但过了两个小时之后他仍然无法入睡。于是他走到院子里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我碰巧也在院子里（我方的其他人员都回各自的住所休息了）。勃列日涅夫开始对我讲他是如何喜欢尼克松这幢西班牙风格的房子。正在这时，尼克松突然出现在院子里。他是孤身一人，所以我不得不给他们当翻译。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卡萨·帕西菲科的建筑之后，尼克松邀请勃列日涅夫进了他的房间，并且给他端来了茶、葡萄酒和威士忌。列昂尼德·伊里奇喜欢喝纯威士忌酒——他不愿“兑上水把它糟蹋了”——不一会儿他就醉醺醺的了。谈话的内容也从讨论国际问题变成了感情的宣泄。勃列日涅夫抱怨说当总书记真不容易。他不得不倾听政治局其他成员所说的“各种各样的蠢话”，而且还得重视他们的意见。他的某些同事，他主动说道，正试图削弱他的权力，所以他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他还说出了这些人的名字。

282 尼克松听着勃列日涅夫的表白明显感到不安，尽管他对此显然很感兴趣。这种情景自然令我极为尴尬。事实上，这是我在从事外交工作的全部岁月里所遇到的最不寻常的情况。勃列日涅夫还特别批评了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我极一切努力避免将克里姆林宫幕后关系中最敏感的细节翻译过去，这里面有些事甚至连我都不知道。

我终于想办法把喝醉了的勃列日涅夫扶进了他的房间，幸运的是他的房间就在旁边。尼克松也过来帮了一把。第二天，勃列日涅夫问我：“阿纳托利，昨天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我告诉他是说得太多了，但我注意没有把所有的话都翻译过去。“做得对，”他说，“该死的威士忌，我不习惯喝这种酒。我不知道我喝不了那么多。”

那天夜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凌晨2点左右，勃列日涅夫的警卫站在院子里正对着尼克松卧室的地方监视着勃列日涅夫房间周围的动静。就在这时，他看见总统住处的房门开了，他的夫人帕特穿着一件长睡衣走了出来，她的手直直地向前伸着，眼睛盯着远处，显然是发癔症的样子。她走到我们的警卫身边停了

下来,什么也没说。这名警卫想让尼克松夫人转回去,但她拒不动,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稍稍犹豫了一下之后,那名苏联警卫——克格勃官员——架着尼克松夫人的胳膊把她送回了她刚刚走出来的那个房间,那是她的卧室。他刚把她放倒在床上,特工人员就到了。他们挥挥手,微笑着对我们的人说:“好,好,谢谢。”他们对这一切显然并不感到惊讶。我们的警卫离开了,他很奇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上级告诉他不许将此事张扬出去。

第二天,也就是6月23日,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于中午举行了一次告别会谈。应勃列日涅夫的提议,会谈主要讨论的是中国问题。苏联领导层非常担心美国和中国的合作会发展到出售军事装备这样的程度,因此想阻止这种合作。勃列日涅夫强有力地、固执地并且情绪激动地告诫美国人不要和北京缔结任何军事协定。尼克松向他保证这种复杂的关系决不是针对苏联的。但勃列日涅夫仍抱怨中国“背信弃义地试图挑动苏美之间发生冲突”。他要求得到更为有力的保证。尼克松再次向他做出保证,但言辞极为小心谨慎,这就使莫斯科依然弄不清美国将来究竟会奉行什么样的方针。

下午4时,为了表达对勃列日涅夫的敬意,尼克松在游泳池边举行了一次招待会,邀请好莱坞和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名流——其中包括未来的总统罗纳德·里根——出席。但是喜欢美国西部电影的勃列日涅夫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那些牛仔明星身上,很少注意出席招待会的其他一些演员,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他特别喜欢查克·康纳斯,此人送给他一条牛仔腰带,上面还别着两杆枪。(后来勃列日涅夫常常向他的同事们炫耀这两支手枪。在从美国飞回莫斯科途中,他系着那条武装带,像个牛仔一样熟练地玩弄着手枪,模仿电影上的牛仔逗他的工作人员开心。)

招待会结束后,尼克松设晚宴招待少数几位重要人物,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基辛格、罗杰斯、葛罗米柯和我。葛罗米柯和基辛格白天已经就中东问题单独举行了一次毫无成效的讨论。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要离开圣克利门蒂,所以晚餐之后,勃列日涅夫突然决定

亲自和尼克松讨论这一问题。经过仓促而又令人窘迫的临时布置，会谈于夜里 11 时左右在尼克松的书房里举行，参加会谈的有基辛格、葛罗米柯和我。会谈进行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持续到深夜。勃列日涅夫中午睡了一个小时，因此精神很好。相比之下，按习惯此时已上床就寝的尼克松却显得迟钝而又疲倦，会谈结束前一直把头倚在枕头上。再者说他对这一问题也不感兴趣。显然不可能在这里就中东问题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只有勃列日涅夫例外。他显然认为他是在捍卫一项正义的事业，他的雄辩能够说服尼克松。恰恰相反，他的坚持己见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苏联领导层急于同尼克松就中东问题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这引起了总统的警觉。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在打着解决中东问题的如意算盘：美国和苏联联合采取外交手段，按照阿拉伯国家所提的条件实现和平，其基础是以色列全部撤军，以此换取对它的安全保证——这一点没有公开说出来。尼克松对此是断然不会接受的。

我们大约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分手的，像通常遇到这类情况时一样，临走时提出将这一问题留给部长级会谈做进一步的讨论。

但是，在勃列日涅夫就中东问题提出的建议中，有一个新的重要因素本应该引起尼克松的重视。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显然都对整个谈话感到厌倦，没有认真地加以对待。这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局曾特意指示勃列日涅夫让总统注意爆发新的阿以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苏联发现越来越难以控制它的阿拉伯盟国。在莫斯科看来，这种情况可以使美苏两国进一步密切合作，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防止这场战争的爆发。勃列日涅夫确实不厌其烦地对尼克松讲了这一情况，尽管其方式极为冒失和笨拙，因此很难使尼克松总统相信有必要在这个敏感而又极易爆发危机的地区加强合作。根据其回忆录判断，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勃列日涅夫只是想利用战争的威胁来强迫他们答应苏方在谈判期间提出的策略目标。事实证明他们错了。一场新的阿以战争于 10 月份爆发了。

这场深夜会谈结束后，葛罗米柯和我把勃列日涅夫送回他的房间。当我们进门时，勃列日涅夫猛然想起政治局指示他同尼克松商定一项购买几百吨谷物的协议。由于按计划将不再举行会谈，而且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要离开，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讨论购买粮食的交易，因为尼克松留在了他自己的房间里。

葛罗米柯立刻建议我去找基辛格。基辛格被分配住在一幢单独的别墅里，此刻他已经去那里休息了。葛罗米柯向勃列日涅夫保证，即使是深夜，基辛格也能想办法同尼克松取得联系，并让他同意出售这批粮食。

我向葛罗米柯指出，基辛格可能已经上床就寝，我如果闯进去那可能太尴尬了。但勃列日涅夫欣然支持葛罗米柯的意见。他说我可以说是在转达总书记个人的请求，“亨利肯定能够理解我们并提供帮助”。勃列日涅夫不想在没有贯彻政治局指示的情况下离开这里。他相信我和基辛格能找到共同语言。

说得婉转些，当我走进基辛格的别墅时，他感到非常惊讶。他说在这个时候叫醒总统是绝对不行的。但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他当然不能一下子就回绝勃列日涅夫的请求。对了，他说，他们还有可供出售的粮食，总统极有可能同意把这些粮食卖给苏联。

基辛格建议采取如下的办法：他一大早就将把这件事报告给总统，他希望能够得到总统的批准。但如果总统不同意，基辛格将立即给我打电话，让我向勃列日涅夫做出解释。幸运的是，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不必向勃列日涅夫做任何解释。早晨，基辛格通知我总统已原则上批准了这笔粮食交易，勃列日涅夫为此向尼克松表示感谢。

6月24日一清早，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住宅的草坪上相互道别。接着，他们乘一架直升机飞到离此地不远的一所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两个人的情绪都很不错。勃列日涅夫真诚地感谢尼克松的热情款待，并邀请总统来年访问苏联。

最高级会谈的影响

285

勃列日涅夫访美有助于加快因尼克松首先访问莫斯科而起动的改善苏美关系的进程。我现在仍然认为两位领导人真诚地希望两国关系能获得长期稳定,并能进一步进行合作。他们的私人关系也在加强。他们交换了一系列信件。8月中旬,基辛格告诉我尼克松曾对他说过,在如此信任的基础上交换意见即使与美国的某些盟国也是难以想象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可以说是一种外交成就,但我认为,当水门事件加剧了尼克松的政治和人身孤立的时候,两位领导的个人关系却越来越密切了。几个月之后,我从我本人同尼克松进行的谈话中得到了这一印象。

当然,两国政府都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机会获得战略上的好处。缓和进程不仅改善了苏美关系,而且通过缓和全球外交,对所有大国都产生了影响。

勃列日涅夫的这次访问没过多久就再次引起这个新的三角世界中的另一极的怀疑。此次访问结束后不久,中国大使即紧急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交给呆在圣克利门蒂的尼克松(与总统呆在一起的基辛格于7月6日打电话将信的内容告诉了我)。这封信抱怨说,中国领导层抱怨说,美国签署防止核战争协议是亲苏行为。这封信还抨击这项协议是“两个大国朝世界霸权”迈出的一步,并且告诫美国“苏联的话是不可相信的”。这位大使一边挥舞着大棒,一边又拿起了一根胡萝卜——周恩来邀请基辛格在8月上旬访问北京。

后来,在商量基辛格再次访问北京的有关事宜时,中国人向他暗示,他们准备同美国达成一项类似的协议。总统的脑子里仍然记着与勃列日涅夫就这一问题所进行的热烈讨论,因此对这一暗示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至少基辛格是这样对我说的。这场地缘政治三角关系游戏仍在继续。

两国关系的改善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7月17日,我通知基辛格,莫斯科准备讨论限制分导式多弹头导弹问题。华盛顿自从获悉我们成功地试验了我们自己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之后便开始寻求与我们就限制这种导弹进行讨论。基辛格对此表示满意,但他指出核查可能是主要的难题。这使我不由得注意到了军备控制这个历史的讽刺:随着每一方取得的技术上的进步,我们各自的立场也将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1967年是反弹道导弹系统,现在则是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当双方都拥有这种武器时,它就会打破战略平衡。只是到了这种时候,莫斯科和华盛顿才开始着手寻求妥协。基辛格和我通过秘密渠道积极参与了达成妥协方案的活动。

7月底,基辛格根据尼克松的指示提出了水门事件这一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决不会”(他把这个词重复了两遍)辞职,莫斯科不应相信这类猜测,包括有关弹劾的猜测。他说,总统决心干满他的任期,继续积极从事他的各种工作,特别是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与此同时,他还期望着参加下一年在莫斯科举行的最高级会谈。

286

基辛格最后说,由于同苏联领导层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所以尼克松把勃列日涅夫看成是唯一一位有必要以如此坦率和充满信任的方式向其澄清这一纯属美国内部问题的外国领导人。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极为友善的表示:它非但没有表现尼克松的地位有多么巩固,反而承认他越来越意识到国内压力的沉重,与此同时,他急切地向勃列日涅夫(和他本人)重申,他决心继续坚持他制定的苏美关系方针。苏联政府开始认识到他遇上了严重的麻烦,但仍认为他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巩固两国关系的进程将会继续下去。但是,在美国国会、法庭和新闻媒介中发生的某些事情以及世界某些地区发生的一些争端将表明,我们想使缓和成为不可逆趋势的希望很快就会灰飞烟灭。

第十七章

十月战争

莫斯科，华盛顿和 中东

1973年10月爆发的阿以战争使两个超级大国卷入了一场近乎于对抗的竞争，同时也使它们展开了一场合作，这一合作实际上就是主要通过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秘密渠道进行密切的日常接触。这两个国家发现自己被深深地卷了进去，一方面是寻求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伙伴，一方面又是向各自的传统代理人提供武器援助的对手。与此同时，这场危机表明，可以使紧张局势地方化，也可以防止让紧张局势破坏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这是在缓和条件下出现的第一次严重的国际冲突，它对缓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尽管两个大国为结束这场战争而进行了合作，但它们（尤其是美国人）都试图操纵事件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扩大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双方都不愿意让自己陷入战争的泥潭，同时又要保持两国间的关系。但正如人们后来从基辛格的回忆录中看到的那样，他同时还准备打着缓和的幌子，利用甚至牺牲这种关系来削弱和——如果可能的话——消除苏联在中东的影响。他明确表示，美国不愿为了缓和而牺牲它的地缘政治立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人们常常忘记“缓和不是友谊，而是在对手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的战略。我们的中东政策的首要目标最终是为了削弱苏联的地位和影

响,正像苏联也想削弱我们的一样”。^①

美国在这次战争期间的政策几乎是由基辛格一手制定的,尼克松在此期间完全被水门事件以及由它衍生出的一些问题缠住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战争在美国方面是基辛格的战争。因此,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操纵阿以对立双方,使它们只

听美国的摆布,并将苏联置于在和平进程中无足轻重的境地。这就是美国对中东问题的态度,特别是基辛格对解决中东问题的看法与我们大相径庭之处。尽管勃列日涅夫和整个政治局在促进阿拉伯国家及其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极力协调苏美之间共同做出努力,但华盛顿实际上却在尽力排斥苏联,正如它在战争结束时及刚刚结束之后所做的那样。与此同时,华盛顿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其用意是在对以色列最有利的时候和苏联共同倡议实现停火。

苏联在战争期间的目的十分单纯:重新赢得阿拉伯国家的信任,防止它们在军事上出现溃败,指望同尼克松政府建立的新的合作关系能够使我们共同参与和平进程。

甚至在1973年10月战争爆发之前,苏联政府已数次提醒尼克松和基辛格阿以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已越来越大。莫斯科认为,对苏联和美国来说,消除这场战争的唯一方式是协商制定出和平解决这场中东冲突的基本原则。当基辛格于5月份为准备最高级会谈来莫斯科时,苏联方面即首先向他提出了这一建议。在6月份举行最高级会谈期间,勃列日涅夫在圣克利门蒂同尼克松进行热烈讨论时又亲自发出了同样的警告。9月份,当葛罗米柯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尼克松和基辛格举行例行会谈时再次向他们重复了上述警告。

基辛格后来承认,他们将苏联提出的警告误认为是“心理战,因为我们认为以任何理由做出的战争选择都会损害苏联和阿拉伯

^① 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00 页。

国家的地位”。换句话说，尼克松和基辛格实际上拒绝了和苏联一道承担缓和紧张局势的责任。谁知道？或许两国政府可以联手采用更有力的手段，强迫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寻找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从而制止战争的爆发。

这场战争逼迫华盛顿和莫斯科为解决危机而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但合作过程却很不顺利。从10月6日战争开始直到10月20日停火，两国根据战斗发展的趋势以及各自对战争进程的判断，一会儿敦促迅速停火，一会儿又采取拖延战术推迟停火。双方重新开始向各自的战争代理人提供武器弹药，以此作为当它们认为时机成熟时逼迫交战双方实行停火的杠杆。

289 在这场战争最关键的阶段，即以色列打破停火的时候，华盛顿命令其武装部队处于戒备状态。人们认为这是对苏联威胁要单方面进行干预做出的反应，但促使华盛顿这样做的原因实际上一方面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另一方面是以色列希望凭借着基辛格外交的支持在最后时刻获得额外的领土利益。我们两国最终商定了一项停火协议，并且共同主持了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谈判，尽管华盛顿（特别是基辛格）想方设法要将谈判置于它的单独控制之下。

在战争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所有高层通信往来实际上都是通过基辛格—多勃雷宁秘密渠道进行的。我个人处于一个相当困难的境地，因为出于保守军事秘密或担心美国人破译我们的电报的考虑，莫斯科减少了发给我们驻华盛顿使馆的有关作战以及和这场战争有关的外交活动的情报。缺乏情报使我无法像往常那样对基辛格发表看法。后来，当我从基辛格的回忆录中读到他是如何富有技巧地与我进行谈话时不由得使我忍俊不禁，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但动机却截然不同。他再次证明自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外交家，尤其是当他为自己和以色列拖延时间时就更是如此。尽管如此，我相信我们彼此间还是非常理解的。

叙述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描写阿以战争的全面外交史，而只

是为了回顾一下我亲自参与的苏美交换意见的情况。这中间包含着以前从未披露过的细节，它将充实其本身即极具戏剧性的许多事件的历史记录。

战争开始

对我来说，这场战争是在10月6日一大早开始的，当时我被基辛格于6时40分从纽约打来的一个电话唤醒了。他要我立即向莫斯科转告他即将告诉我的有关以色列面临着战争威胁的消息。他代表总统向苏联领导层保证，美国和苏联一样非常想阻止中东地区爆发又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美国人不是在做戏，他强调说，而是想立即采取有效行动，阻止中东地区发生的情况失去控制。

基辛格的电话令人非常惊讶。自从6月份勃列日涅夫在圣克利门蒂对尼克松谈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正在日益增长以来，我还没收到过莫斯科就此问题发来的电报。我知道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但我不知道战争已经如此临近。我们使馆没有收到有关安瓦尔·萨达特在战争前夕与我国驻开罗大使进行谈话的消息，在这次谈话中这位埃及总统明确暗示了战争将要发生，但没有说出具体的日期。我们也没有收到苏联人的家属已从埃及和叙利亚撤离的消息。 290

几个小时之后，基辛格告诉我埃及和叙利亚已经沿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停火线向以色列发动了全线进攻，这条停火线是沿着以色列在上一次中东战争，即1967年的六日战争期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建立的。基辛格已经到纽约参加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去了，他希望召集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他希望苏联和美国的代表都能得到采取一致立场的指示，而不要袒护各自的传统上的代理人。他说，美国打算提出一项决议案，呼吁双方停火并返回原先的位置，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解决这场冲突。

莫斯科迅速做出了答复：“苏联政府与你同时收到了有关中

东地区爆发冲突的报告。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弄清楚这一地区发生的真实情况，因为我们收到的报告是非常矛盾的……我们像你一样正在考虑采取可行的措施来挽回局势。我们希望迅速与你取得联系以协调我们的行动。”

从10月6日到8日，莫斯科和华盛顿通过秘密渠道一直在紧张地交换着意见。勃列日涅夫极力反对在以色列这个长期以来的侵略者数年来一直霸占着阿拉伯领土的情况下召开安理会会议。他反对让阿拉伯国家从它们刚刚占领的土地上撤走，因为它们实际上只是赢得了本来就属于它们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勃列日涅夫在写给尼克松的信中说道，“在我们看来至关重要的是，如果以色列表示愿意从阿拉伯被占领土上毫无保留地撤出去，那么以色列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将得到保障。以色列为什么不可以接受这一建议呢？”

在这场战争的最初几天，莫斯科受到了开罗和大马士革的强大压力，由于它们在战场取得了优势，因此它们不想让联合国进行干预。勃列日涅夫最初答应了它们的要求，尽管不是十分情愿，因为我们总的说来是反对这场战争的，此外，我们不相信阿拉伯国家最终能够获胜。就在此时，尼克松向勃列日涅夫表示他希望中东战争不要破坏苏美关系的成果。正是在这一关键的时刻，他不敢肯定以色列能够迅速取得最后的胜利，并且希望通过莫斯科保持同阿拉伯国家的联系，如果这些国家认为需要的话。

从10月10日至13日，莫斯科和华盛顿一直在通过秘密渠道频繁地交换着意见，与此同时，它们还通过秘密渠道紧张地讨论着安理会决议。莫斯科试图扩大这项决议的内容，即规定分阶段撤军，要求以色列军队在严格的期限内从它在1967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华盛顿根本不同意提到以色列撤退的事。

10月12日，基辛格让我通知莫斯科，美国不打算向中东派兵，除非苏联这样做。我向他询问有关美国援助以色列的军用物资正在急剧增加的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对此矢口否认。但在

10月13日，基辛格通知我他得到报告说萨达特强烈反对达成一项停火协议。因此，尼克松将不再支持我们在安理会做出共同努力：让一切听其自然——此时以色列已开始重新获得优势。基辛格说总统将被迫修改有关限制给以色列提供补给的承诺，并将美国给以色列的援助调整到和苏联给阿拉伯国家的援助相等的水平上。由于轻易地拒绝尽早实现停火，显然萨达特犯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和战略错误，因为这种做法导致了几天后出现的军事灾难。

10月13日深夜，基辛格用保密电话和我通话。他说白宫仍认为应该实现就地停火（此时以色列人已夺回了某些领土）。我们仍然在强调阿拉伯国家提出的要求，即以色列必须撤到它在1967年战争前占据的边界上，但基辛格说他最多只能同意参照联合国第242号决议。战后通过的这项决议规定了以色列撤出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以换取同它的阿拉伯邻国和平相处的政策。基辛格说美国只能退让这么多，“即使这意味着要同阿拉伯国家和苏联发生一场冲突也罢”。

那天早些时候我参加杰拉尔德·福特的就职宣誓——他接替因财政丑闻而被迫辞职的斯皮罗·阿格纽担任了副总统——仪式时，总统把我拉到一旁。他说他想让我转告勃列日涅夫，为了破坏缓和进程，四面八方都在对两位领导人进行煽动。许多人都想看到缓和失败，尼克松说，“但我们不应当上他们的当，因为两国人民的命运依赖于缓和。告诉总书记，我不会屈服于压力，并将遵守我和苏联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就在总统说他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煽动”的时候，他的国务卿却明显倒向了一边。

10月15日，富布赖特参议员来拜访我。富布赖特赞成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并且支持阿拉伯国家。他说，在白宫向国会领导人提供的一份简报中，五角大楼做出的秘密估计是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获得胜利已达到顶峰，用不了多久得到大量美国军援的以色列就会展开反攻，将阿拉伯人赶回苏伊士运河对岸。富布赖特认为有必要让“目光短浅的”萨达特相信，对他来说，最好的出路是接

292

受安理会的停火决议并开始谈判。这将使美国和苏联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反过来,这样做又会进一步巩固——而不是削弱——缓和政策。亲以色列和反苏的势力已经联合起来竭力破坏缓和政策。

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准确的,所以向莫斯科做了汇报。与此同时,苏联和美国都开始向各自的保护国大幅度补充武器弹药。

10月16日,基辛格通知我们美国正在开辟一条空中补给线向以色列运送物资,随着战争的继续,运送物资的规模还将扩大。停火协议一旦生效,白宫即中止空运行动,苏联也应照此办理。实际上美国的空运是在10月22日开始的,而我们的空运更是在此前两天即开始了。美国向以色列空运了价值22亿美元的军事装备,我相信苏联提供给阿拉伯国家的也不会少于这个数。

基辛格的花招

与此同时,美苏之间仍在就联合国决议草案的措词进行协商。由于谈判和整个局势均已进入关键性阶段,因此基辛格向我暗示他或许有必要飞往莫斯科讨论一下呼吁停火的那项联合声明的文本。第二天,勃列日涅夫做出了答复,向这位国务卿发出了邀请,而尼克松也正式表示基辛格被授予全权。

不仅如此,基辛格抵达莫斯科(他是10月20日到达的,我陪他一同前往)之后又收到尼克松的另一封密电,尼克松让他把电报内容口头转达给勃列日涅夫。这封电报标志着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尼克松说,他同意勃列日涅夫6月份在圣克利门蒂发表的意见,认为代表着两个伟大国家的两位领导人“必须进行干预,为实现公正解决而确定一个恰当的行动方针,然后向各自的盟友施加必要的压力,要求他们接受一项最终能给这一动荡不安的地区带来和平的解决办法”。这项极端重要的建议如果得到贯彻,未来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整个方针都会发生变化。但基辛格根本没把这一信息转告给勃列日涅夫,因为它彻底打乱了他的安排。

在基辛格动身赴莫斯科之前，他显然将就拟订一项联合国决议展开谈判的时间拖延了一两天，目的是为以色列军队向前推进赢得时间。以色列军队已经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并开始对困守在西奈半岛东岸的埃及军队展开翼侧包围。完成这次战场上的翼侧包抄行动将能够增加他在谈判中进行讨价还价的力量。但是，尼克松最近发出的这项要求同莫斯科合作强行解决中东问题的明确指示完全打乱了基辛格的战略部署。“它将彻底破坏我目前掌握的那点讨价还价的力量，”基辛格在电报中对他的副手斯考克罗夫特说。随后他又打电话向黑格发牢骚。黑格此时已从五角大楼调回来接替霍尔德曼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但黑格不愿干预此事，他对基辛格说他自己也遇上了麻烦。刚刚晋升职务的黑格将军正是进行着一场星期六夜晚大屠杀：尼克松解除了司法部长以及司法部其他一些级别较低的官员的职务，因为他们拒不解雇水门事件检查官。

基辛格故意无视总统的指示，尽管他没有直接承认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表示，他遵循了早在他前往莫斯科之前总统即已批准的那项有关联合国决议的计划，但他只字未提有关向勃列日涅夫阐述美国新的立场的事。我不记得他在同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进行的数小时谈话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令基辛格感到惊讶的是，苏联领导人异常迅速地同意拟订一项妥协性停火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呼吁立即实现停火并依从第242号决议（这一决议基本上是美国人起草的）。莫斯科接受了这一决议草案，它认为它将是一个公平的文件，同时它也知道军事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地朝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转变（萨达特这时祈求我们赶紧达成一项停火决议）。这就是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向基辛格建议由我们两国立即共同在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案的原因。

但基辛格显然想拖延一些时间。他说他需要进行磋商。在他从莫斯科回国的途中，他打算在以色列停一下，说服以色列人同意实现停火。勃列日涅夫无奈只好同意延迟。勃列日涅夫不可

能知道的是,当基辛格说服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将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停火刚生效后几小时的混乱,包围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埃及第三军团。实际上这是从一开始即预谋要违反协议。后来,基辛格以赞同的口吻描述了以色列的行动。唯一不清楚的是尼克松是否知道他的国务卿所耍的花招。

294

10月22日深夜,安理会采纳了一项重要的决议,即第338号决议,宣布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不管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有多么严重,但这项决议是它们共同倡议的。

一场新的危机

尽管这场危机表面上得到了和平解决,但它的高潮事实上还没有过去。停火仅几个小时,协议便遭到了破坏。以色列军队违背承诺向苏伊士运河推进,企图包围并粉碎仍然留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具有大约2.5万人的埃及第三军团。

第二天,尼克松接到勃列日涅夫生气地通过热线发来的一封电报:“总统先生,以色列已经全面违反了有关在中东实现停火的安理会决议。刚刚于两天前才达成的协议被以色列领导人的这一行动给蓄意破坏了,我们为此感到震惊。您所处的地位可以使您更清楚地知道以色列为什么会采取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我们看出只有一种办法能够挽救局势和实施这项决议。唯一的办法是强迫以色列立即贯彻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情况万分危急,这不仅是对中东局势,而且也是针对我们两国的关系而言。”

尼克松答复说,美国“将承担全部责任,保证让以色列中止军事行动”。但他在答复中还说,根据他掌握的情报,应该承担破坏停火的责任的是埃及。“您和我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解决办法”,他写道,“我们不应使它遭到破坏。”

在这一天当中,白宫和苏联使馆进行了积极的接触,以协调我们在安理会为讨论停火而召集的另一次会议上的立场。勃列日涅

夫通过热线再次向尼克松表示：“我很高兴地通知您，埃及方面愿意立即停火，如果以色列军队也这样做的话。您可以明确告诉以色列政府。”这封电报强调了苏美在安理会采取一致立场的必要性。

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参加讨论这次危机的政治局会议。我听到安瓦尔·萨达特用特殊电话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这位埃及总统请求“救救我和埃及首都，它已经被以色列坦克包围了”。当勃列日涅夫给我国驻开罗首席军代表打电话问及此事时，这位军代表回答说开罗尚未面临直接的威胁，但他又说，当萨达特获悉几辆以色列坦克越过苏伊士运河，正在向开罗挺进时，“他完全丧失了信心”。事实上这只不过只由三四辆坦克组成的侦察部队，它们不久便撤了回去。

但是，事态发展的真正核心问题是埃及的第三军团，它目前被以色列人包围在苏伊士地区。除非停火立即生效，否则第三军团将被粉碎。由苏联和美国共同倡议的另一项安理会决议，即10月23日的第339号决议，很快就获得通过。它要求双方退回各自的停火位置并派出联合国观察员。

295

第二天早晨，勃列日涅夫气愤地通知尼克松，“当第二个呼吁立即停火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刚刚生效后几个小时”，以色列军队即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和东岸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表示相信总统将能够向以色列施加影响，停止其违反这项新的决议的做法。苏联领导层本身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来影响事态的发展，这使克里姆林宫感到十分恼火。克里姆林宫对以色列和美国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为它坚信以色列至少和白宫达成了默契，否则它不可能采取行动。

苏联政府就“以色列背信弃义地”向埃及军队和人口密集区发动进攻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声明说：“苏联政府提醒以色列政府注意继续向埃及和叙利亚实施侵略行动将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紧接着，莫斯科收到了我国驻埃及首席军事代表发来的另一封急电。电报说以色列人仍在进攻，埃及第三军团已被包围，除非

停火协议立即生效，否则它将被歼灭。我国驻开罗使馆报告说萨达特的统治即将崩溃。

当天晚上，勃列日涅夫召集了一次政治局紧急会议。作为葛罗米柯的助手随同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瓦西里·格鲁比亚科夫后来告诉我，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提出了极为过分的意见。他坚持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地“显示我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他的观点得到了波德哥尔内的支持。柯西金明确表示反对，葛罗米柯对他表示支持。态度谨慎、试图在阿拉伯国家和美国之间玩弄平衡策略的勃列日涅夫也反对让我国军队卷入这场冲突。

于是，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他们最终同意给尼克松发一封电报，电报的措词非常强硬，但不包含任何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威胁。然而，当这封电报发到华盛顿，电文中出现了一段有关我们要卷入这场冲突的较强硬的话。没有人能够猜出这段话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时候被塞进电报中去的，因为这次会议的主要参与者已经不在世了。最后的决定可能受到了萨达特通过电话发出的最后呼吁的影响。

296 结果，这封电报提醒尼克松注意，由于以色列破坏了停火，因此它在“公然向苏联和美国进行挑战，因为安理会决议是根据两国的一致意见达成的”。勃列日涅夫建议派遣苏联和美国部队进驻埃及，他直截了当地警告说，“如果你们认为在这方面与我们合作是不可能的”，他愿意单独采取行动。勃列日涅夫最后说：“让我们在这一特殊的问题上和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共同履行这项协议吧。这将成为我们两国为了和平利益而采取一致行动的典范。”正如最后这段话所显示的那样，苏联领导人此时仍希望与美国政府进行某种合作。

为了进一步施加压力，苏联空军在外高加索地区举行了几次象征性的演习，有一两架苏联运输机飞抵开罗。但正如我后来从莫斯科了解到的那样，华盛顿根本不必真的感到惊恐，因为苏联政治局从未打算干涉中东。这样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

不可行的，因为当时苏联没有对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干涉的力量。即使我们有这个力量，这样做也将把这场阿以间的战争变成苏美间的直接冲突。莫斯科没人想这么做。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声称华盛顿担心苏联进行干预。事实也许如此。但致使美国人产生这种担心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他们不同意苏美联合采取军事行动以监督或观察由联合国主持的停火，这种推测显然更接近于事实。在美国政府看来，那样做等于允许苏联向中东地区进行军事渗透，对此基辛格是不会接受的。

当我于10月24日傍晚通过我们的保密电话线向基辛格宣读勃列日涅夫的来电时，基辛格说话的声音听上去显得很紧张。他把电文又向我复述了一遍，以便弄清楚他的理解是否正确，并答应立即向总统报告此事。

晚上10点15分他回电话说，尼克松已命令总统顾问和白宫助手们召开一次会议。总统希望能够等到会议结束，在此期间苏联不要单独采取行动，以免造成严重局势。

尼克松在答复中表示同意勃列日涅夫的意见，即我们共同采取协调一致的维和行动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他拒绝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联合向埃及派出苏美军事力量的建议，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尼克松说，华盛顿没有得到以色列明显违反停火决议的任何情报。因此，他强调说，苏联发出单方面采取行动的警告造成了极大的忧虑并可能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尼克松表示他愿意增加人力和设备，加强联合国监督停火部队的力量，并宣布他本人同意让某些美国和苏联非战斗人员加入联合国监督停火部队，如果勃列日涅夫所说的向中东地区联合派遣部队就是这种含义的话。

297

超级大国增加赌注：美国发出战斗警报

收到尼克松的电报后不久，我们使馆即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

美国武装力量正在进入战备状态。官方没有对此消息加以证实，最初报道中也未提及苏联。但接下来我们又从广播中听到苏联蓄意威胁要向中东派兵以强制实现停火，即便美国不参加也罢。广播报道说苏联飞机正在靠近这一地区，并强调白宫拒绝屈从苏联的压力。“白宫采取的”坚定立场是——广播中说道——“阻止苏联对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干涉。”

坦率地说，和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相比，我听到这些报道时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惊讶。但我感到极为气愤。我用专用电话给基辛格打电话，并且以在我们的私人关系中极不寻常的声调要求他做出解释——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私下谈话时，基辛格丝毫没有暗示美军进入战备状态的可能性。我强调指出，这种做法显然是和他最近在莫斯科谈判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我看不出美国政府极力制造一场危机即将来临的印象的理由何在。

基辛格为自己辩解说，莫斯科不应将白宫命令进行有限的战斗准备看成是美国政府采取的一个敌视行动，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国内的考虑”。他向我保证第二天即会取消这道命令，与此同时，我可以极其秘密地紧急向勃列日涅夫做出通报。的确，这道命令在 10 月 26 日即被取消了。

基辛格没有特意说明他所谓的国内考虑指的是什么。我这方面则强调美国发出战斗警报是和我们一直在尽力促进的两国关系的总体水平是完全不相容的。那天晚上，当我们两人因在肯尼迪剧院观看一出新歌剧的首场演出（在一场“严重危机”期间！）而不期而遇时，我们又进行了一次类似的紧张谈话。唐纳德·肯德尔碰巧也去看戏，他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对他说：“噢，那只不过是亨利耍的一个花招。”

我当然没有出席 10 月 24 日夜里举行的那次白宫重要会

议——在这次会议上下达了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但两个星期之后，我在副国务卿拉什的住所与他共进午餐时从他那里听到了有关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这次午餐会是在两个星期前即安排好的。（尼克松曾一再暗示他有可能任命拉什担任国务卿，但他最后还是任命了基辛格，而让拉什做了他的副手。这件事显然刺伤了拉什的感情。）尼克松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其原因拉什也不清楚。后来官方解释说总统被水门事件拖住了，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白宫认为苏联真的像基辛格后来所写的那样要对中东进行干涉——那很可能引发一场冲突——的话，那么总统肯定要参加这次会议的。但他为什么没有在那里？难道他还不如他的某些助手那样担心吗？后来他为什么就发给勃列日涅夫的电报表示歉意？

根据拉什所说，参加那次会议的有国防部长詹姆士·施莱辛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摩尔海军上将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柯尔比。他们得到了有关苏联空军行动的情报，并讨论了发生对抗的可能性，但未能就苏联是否真想同美国进行较量达成一致看法。与此同时，他们知道以色列已经违反了安理会星期天的决议，利用停火尽可能多地占据了埃及的领土。

根据拉什所说，基辛格在他主持的这次会议期间一直表现得焦虑不安。他宣称弄清楚俄国人——他们打算向中东派出军队以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的真实意图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基辛格强烈反对向中东派去一支苏美联合部队的原因——俄国人肯定会利用这一机会重新确立他们在埃及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实际地位。他接着建议让美国武装力量立即处于临时战备状态，以此来显示华盛顿坚决反对苏联军队介入中东地区的决心。

并不是所有的与会者都当即同意了这一计划。有人建议必要时可警告莫斯科，如果苏联开始实施单方面向中东地区派兵的计划，美国将命令其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但基辛格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几个小时之后，总统批准了那项决定。拉什认为基辛格在那

次会议上表现出深刻的亲以倾向，即使因此损害苏美关系也在所不惜。但我认为像往常一样是在追求他的主要战略目标，这就是使美国在中东地区具有影响力并占据主要地位。

就在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通过向中东地区派出一支维和部队而结束了这场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决议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军队排除在维和部队之外。第二天，即10月26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都公开表示支持建立一支联合国监督维和部队。战争结束了。

尼克松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声称中东调停是值得称赞的——他的确需要得到一次赞扬来抵消水门丑闻的影响。他把美国政府成功地避免了一场对抗归结于他和勃列日涅夫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并把这一切比做古巴危机。第二天我给基辛格打电话说这两件事几乎无法比较，这样比较根本是不正确的。两小时后他给我回了电话，告诉我总统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样比较是牵强附会的。

对结局感到极为不满的勃列日涅夫第二天，即10月28日，给尼克松发来了一封十分气愤的电报。电报说“正如我和我的同事们所看到的那样，一场信任危机出现了”。他说，美国在一个多星期以来对莫斯科和开罗做出的所有有关实现停火和履行安理会决议的保证仅仅证实了它直接“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而以色列的挑衅性军事行动一直具有明显的，或者可以说是赤裸裸的目的”。他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总统得到的是错误的，甚至是带有欺骗性的情报，某些人捏造这种情报的“目的是鼓励侵略，损害苏美关系以及……削弱我们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勃列日涅夫没有掩饰他本人及他的同事们的怀疑，即基辛格是这场麻烦的始作俑者。勃列日涅夫的电报显然给尼克松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此他请我于10月30日到戴维营和他私下讨论一下这件事。他用一种和解性的，甚至是道歉式的态度和我谈话。

他强调他打算继续奉行改善苏美关系的政策。他说他把上个星期发生的事看作是两国关系中发生的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并请我亲自转告勃列日涅夫，他不会允许以色列人消灭被包围的埃及第三军团。他还表示愿意与我们合作，通过安理会解决这次危机。

“请告诉总书记，”他最后说，“只要我活着并担任总统职务，我就决不允许同苏联进行实际对抗。”他承认在危机期间他可能有点儿不冷静，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于他的政敌和与他有私人恩怨的人对他进行的围攻，这些人想借水门事件削弱他的权力。坦率地说，他说，他现在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尼克松承认因水门事件他在国内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谈话时基辛格不在场，尼克松或许不想把自己和国务卿在危机期间的某些行为联系在一起。对此我不敢加以肯定。

300

基辛格本人及时地发现——出于其自身考虑——有必要为发出战斗警报表示歉意。11月初，他向我承认“白宫下令让它的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是犯了一个错误。总书记事实上比总统还紧张。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我们采取的是一个损害美苏关系的轻率的举动。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对我们大家来说，主要的问题是不要因为进一步相互指责和攻击而加深这种损害，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承认我方可能犯了一个大错误”。

许多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这场中东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一样，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形成了一场致命的危机。尽管这场战争的确是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对我们两国的关系产生了令人相当不快的影响，但它没造成两国间产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威胁。至少莫斯科当初是，现在也是这样估计的。我们没有仅仅因为美国的行动而采取措施，让我们的军队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且我们肯定没有像美国人那样向我们的战略核力量发出战斗警报。人们不禁要想，参与处理这些事件的美国高级官员是不是为了替他们在这次危机期间所扮演的相当不光彩的角色进行辩护才制造出他们使中东地区免遭苏联武装入侵的神话。

然而，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的确是由于莫斯科和华盛顿积极的幕后干预才告结束的。合作与对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次干预的特点。两国共同努力解决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这场危机，并且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达成了停火协定。尽管是处在缓和年代，但这场冲突清楚地表明，两国不一定会会有相同的目标和利益。和古巴危机相比，中东战争从未演变成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其原因就在于苏美关系明显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外，使这场冲突得以结束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和美国 11 月在日内瓦共同主持达成的一项阿以协议。这一切都说明缓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特别是两国政府在这场冲突期间及此后都没有对缓和进程提出疑问或否定它的作用。与此同时，中东战争的发生表明缓和是极为脆弱的，它的不稳定性损害了两国领导层之间的相互信任。

战争结束后，政治局立即讨论了十月危机及美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中东政策真的表明，当事情确实和苏联有关时，他们不打算和它进行合作吗？他们真想和我们发生军事冲突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应如何看待两国间的缓和？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它们使最高级会谈之后在莫斯科盛行的那种对缓和感到兴奋的情绪稍微冷却下来。然而，这次全面而热烈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是再次肯定缓和是一项有益和重要的政策，同时它也承认在某些领域——如中东问题——里要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是非常困难的。对立仍将存在。缓和是有限度的。

第十八章

理查德·尼克松下台

尼克松的最后一位朋友

苏联领导人不可能不注意到，阿以战争是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在国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的背景下进行的。10月末，在水门事件特别检查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被解职后，我从参议员富布赖特那儿听到一个内部消息。他说，尼克松正处于一种经常性的焦虑状态之中。他解释说，这是大众传播媒介对总统品格史无前例的攻击造成的。

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得到关于总统在水门事件中遇到麻烦的消息，其中不少是从尼克松本人那儿得到的。他通过我与他在戴维营的谈话将这些消息传达给勃列日涅夫。但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许多苏联领导人都认为，这一丑闻正被缓和政策的反对者用来反对尼克松。尼克松的谈话和他发出的信息导致他同勃列日涅夫之间的独特的个人交流，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当水门事件不利于总统时，勃列日涅夫表明他本人是尼克松的坚定朋友和支持者，或许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领导人中，他是尼克松的唯一一位朋友了。孤独而又受到围攻的尼克松也相应地做出了回报。

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易于感情用事的人，尼克松通过我传达给他的信息使他受到感动。11月10日，他发来一封私人信件，对尼克松表示同情。信中写道：“我从内心深处希望您能战胜各种困难，其

原因局外人不易明白。但可以理解的是,我们希望您成功主要是为了发展苏美关系,我们继续从根本上改善苏美关系的决心并未因中东事态的发展而降低。”

303 四天后,我应总统的邀请会见了。他的精神状态良好,但看上去相当憔悴,显然是受到了水门丑闻的影响。他说他已认真地阅读了勃列日涅夫的信,并准备做出答复。与此同时他要我转达他对总书记的谢意,因为总书记是他处于困境之中唯一给他以通情达理鼓励唯一的外国领导人,甚至连美国的盟国也没能这样做。他告诉我,这样的友好表示是不会被轻易忘记的,他还请我告诉勃列日涅夫,尽管他们最近出现了意见分歧,他仍决心继续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关系。

在我应邀于12月13日到白宫再次拜会他时,尼克松接着谈论了这些话题。这次私下会谈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不同寻常。在谈话中,他极为坦率地谈论了美国的国内问题。他说,他对“麻烦的中东”和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和会的前景极为重视。他解释说,关于那一地区的问题他考虑了很多,这不仅是因为中东问题具有复杂的国际背景,还因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极有影响。

令人吃惊的是,尼克松接下来对以色列的政策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以色列实际上不想结束它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状态和实际上的冷战。他说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集团渴望阻止苏美关系的任何改善,并想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持久对抗中获取利益。尼克松说,他仅在最近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他一开始甚至没有想到以色列会有这样的长远的目标。其结果是,以色列对中东问题的解决“拒不让步”,这种政策受到在美国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犹太人院外游说集团的鼓励,反过来它又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结果,美国发现自己的外交路线逐渐处于一种与整个世界——阿拉伯国家、苏联、美国几乎所有的西欧盟国及日本——对立的境地。

总统继续说,这是他决定寻求中东问题解决方案的原因之一。

他知道他在面对以色列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时将不可避免地遇到麻烦。但他说他已准备开始行动,因为他已为以色列做了不少事。他认为以色列作为一个被它的敌人包围的小国,仍然需要帮助。他强调说,他在选票方面不欠犹太人的情,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大多数犹太人总是投票反对他,因而,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他能够采取更加不偏不倚的立场。他显然还为大众传播媒介在水门事件上的敌意行动所苦恼。总统说,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基本上受同一个犹太人圈子”的操纵。他带着很强烈的反感说,他们的活动没有节制,他们不知道礼仪,更不用说感激了。事实上,他所用的言词甚至比这更激烈。

随后他对基辛格做了奇妙的评价,对他的才智和工作给予了应有的赞赏,并指出他的犹太人身份使他不那么易于受到美国犹太人集团的攻击,那将是即将到来的中东和谈的一份资产。尼克松认为,基辛格有时会沉溺于以色列的民族主义感情之中,这一点他必须纠正。但从总体上看,总统相信基辛格在沿着正确的路线工作。

304

尼克松相当动感情地告诉我,他打算坦率地向全国发表演说,回击以色列和它的美国游说集团(他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他还抱怨说,以参议员杰克逊为代表的游说集团在国会进行的反苏活动,正在阻碍他的政府为给予苏联平等贸易地位所做出的努力。他最后告诉我,不要相信美国新闻媒介关于他可能辞职,或受到弹劾的大呼小叫。他说他将呆在白宫,直到他的任期结束;他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他将言行一致——别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错误的估计。

我得到的总体印象是,他批评以色列和美国犹太社团是因为他将它们等同于传播媒介,而随着最后结局的临近,传播媒介对水门事件和政策问题的攻击使他感到极为气愤和不满。

12月26日,我带着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再次拜访尼克松总统。当时,我与总统之间的会谈几乎已经变成一项固定的安排。两位领导人通过我进行相当秘密的通信,这种活动此前从未向外界披露。

勃列日涅夫感谢尼克松的“真挚和坦率的精神,这种精神对我们的接触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他强调,总统关于中东问题所说的许多话及他对以色列的政策与苏联领导层的观点是一致的。两国必须联合寻求一种解决方案,以防止对抗的重新发生。关于贸易问题在国会陷入僵局,勃列日涅夫指出:“我们不是乞丐,这是一种相互间的事务。”结尾时,勃列日涅夫提到了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的评论,他说:“感谢您继续留任的坚强决心。”

当我把谈话转向改善苏美关系的想法时,尼克松回答说,他在剩下的三年半任期中将尽其所能“坚持奉行在两次最高级会谈中制定的方针”。他承认他受到了许多美国人的批评:亲以色列组织,大众传播媒介,自由派,国会反对派及其他人,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野心和目的,但却结成同盟联合行动,对他的缓和政策发起攻击。

305 “荒谬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反对冷战,赞成与苏联保持更好的关系。”他说,美国的西欧盟国也做出了同样的急剧转变,它们先前给美国施加压力,要它减小同苏联对抗的风险。现在苏美关系已大为缓和,它们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批评白宫“与俄国人合谋”,猜测它们试图建立“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

就我所知,尼克松从未将我们两人长期谈话的内容告诉过任何人,连他的助手也被蒙在鼓里。他也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它们,但我却将它们报告了莫斯科。它们在苏美关系的整个历史上是相当独特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期间,尼克松在同他的共产主义老对手谈话时就像同他的朋友谈话一样——如果说不是更加的话——坦率和直截了当,甚至有点玩世不恭。我认为,这位因水门事件而日益孤立的冷战斗士最终变得对苏联更为友好了。他与勃列日涅夫个人之间的友好接触和日益加深的关系对此也有帮助。毕竟我们都是人。

白宫内部发生动摇

1月17日,我邀请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到使馆吃饭。他承认尼克松处境艰难,但最终很可能守住他的阵地。曾担任众院共和党领袖的福特告诉我,尼克松要求他用他的关系帮助推行政府的计划,与此同时还应调节国会对水门事件的情绪。这位副总统并未掩饰他的政治抱负。他告诉我有朝一日他会竞选总统,但现在谈论它为时尚早。

然而,他已经在考虑总统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力,并且告诉我如果他“因命运安排而成为总统的话,”基辛格将是他的国务卿。福特对基辛格评价颇高,基辛格非常注意让副总统亲自了解外交政策。副总统说,他完全支持与苏联谈判而不是对抗的政策,他相信相当多的美国人也会这样做。在谈到外交事务时,他总是说“基辛格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尼克松的政策,尽管他讲话时对总统相当尊重。

尼克松工作班子中与他关系最亲密的成员,其中包括基辛格本人,一再重复总统的话,说他不会辞职。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直到1974年7月——尼克松实际辞职前一个月——他还在“试图排除到目前为止仍不可想象的”总统辞职的“想法”。但我第一次听到他谈论这一问题是在六个月之前,即1974年的11月底。他在几次私下谈话中确认,福特已请他继续担任国务卿,如果他继任总统职务的话。基辛格因而预见,在福特任总统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联的政策不会有任何重大变化。

基辛格告诉我,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他已开始考虑总统离职的可能,这是他先前不相信的事情。国务卿对白宫是否有能力保卫总统,使他免遭大量的指责已失去信心。他说,总统的主要不利之处是缺少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为他设计一个战略性的辩护计划,使政府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这一计划,而不要受每天都要发生的新的

事件的干扰。尽管有六七个律师和几位助手定期与总统磋商,并且由尼克松亲自指挥他们的行动,基辛格说,但总统易于情绪冲动,致使他因愤怒而做出轻率的决定。

国会已经意识到白宫士气的瓦解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弱点,因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变得更加强硬,这使得阻碍苏美关系发展的因素大大增加了。这一点特别反映在对我们继续实行歧视性贸易的立法上,政府软弱无力使它难以改变这一政策。在此期间,反苏力量得到了团结,并且加强了他们的活动。

由于尼克松的地位遭到削弱,基辛格本人的地位和影响也下降了。他不遗余力地穿梭于中东地区的各国首都,试图单枪匹马地解决中东问题。这使他远离华盛顿和水门事件。他利用埃及新的亲美倾向和我们在那一地区的僵硬政策,拒绝将苏联带入日内瓦和会的框架之中。

他的这些做法激怒了莫斯科,恶化了苏美关系,尽管莫斯科坚持拒绝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及断然拒绝与以色列方面进行接触而造成的负作用对此也负有责任。如果我们执行一种公平的政策,我们本来能够更为积极和更为成功地发挥作用。苏联领导人在人权、特别是移民问题上坚持顽固、教条、甚至愚蠢的立场,更加无助于关系的改善,它使我们的反对者将美国国会变成了在美国反对我们的主要论坛和情感堡垒。

307 在尼克松政府内部,那些长期以来一直怀疑缓和的人也受到了鼓励,更加大胆地表达他们的立场。1月10日,长期以来对基辛格的思想和方法持批评意见的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提出了一个有限核战争的新理论,即将美国的战略武器从苏联的民用目标重新转向军事目标。苏联军事指挥部门欢迎这一决定,但并非没有顾虑。表面上它是为了避免平民的伤亡,但实际上却意味着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对方的军事潜力合法化。如果一方被剥夺了在敌方导弹和轰炸机发射之前对其进行报复的能力——对敌方空空如也的导弹发射井和机场进行还击当然是无意义的——战略均势将不

复存在,而这种军事均势有助于保持缓和所包含的外交平衡。这种新原则实际上意味着战略核战争的合法化,实际上增加了对苏联的战略核威胁,因为美国拥有更多的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导弹。

施莱辛格坚持说,他让美国的导弹、轰炸机和核潜艇这三种战略武器重新确定目标的计划并非要获得第一次打击的优势。但克里姆林宫正是这样看待这一战略的,而且它与最近达成的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定是相互矛盾的。五角大楼将核战略调整问题的讨论选择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刚刚开始和为6月莫斯科第三次最高级会议做准备之时。我们只能将它视为试图冻结缓和,表明美国政府中有影响的人物对进一步限制核武器和改善苏美关系没有多少兴趣。

一些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之前及进行期间,苏联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由于尼克松的国内麻烦,是否还值得与他进行谈判。这是错误的。当然,莫斯科了解越闹越凶的水门丑闻及对缓和的攻击。但政治局在最后的分析中宁愿与一位碰巧赞成改善苏美关系的总统打交道,而且他仍拥有与外国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权利和意愿。而等待一位对其性格和观点不甚了解的新总统,可能什么也得不到。俄语及英语的一个古老格言说:“趁热打铁。”尽管共产主义学说并不认为政策是建立在个性基础之上,但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之间的奇妙个人感情,直到尼克松政府结束时仍能被感受到。

再次准备最高级会谈

308

1月底,基辛格和我开始讨论尼克松下次访苏的准备工作。他概括了总统关于与勃列日涅夫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态度。尼克松认为,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一份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完满协定,但他仍然想把该协定作为莫斯科最高级会议的主要议题。因此,总统

建议准备一份更为有限的文件,将1972年的临时协定延长几年,限制双方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弹头数量。在此期间,关于广泛地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将继续进行。基辛格还提出了一些数字来解释美国的建议。当然,一些国际和双边问题也将像通常那样被讨论。

我认为尼克松的观点是合理的,因而许诺将它推荐给莫斯科。当我们通过秘密渠道为最高级会谈之前基辛格的预备性访问(当时几乎已成为一项例行公事)做准备时,尼克松于3月份给勃列日涅夫发了一封信。其要点是,总统保证将缓和作为一项不可逆转的政策。他评论了议事日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中东问题及双边合作——并加上了一份手写的附言:昨天,他刚刚在休斯顿会见了苏联的太空问题专家,发现他们“十分出色”。他指出,第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成果之一是联合(尼克松在这个词下划了线)太空飞行计划。他还说:“那也可以是我们其他领域的目标。”勃列日涅夫两天后回信同意这一议事日程,他说最使他高兴的是尼克松对缓和不可逆性的支持,勃列日涅夫正是持这样的论点。在我看来,尼克松或多或少是在利用勃列日涅夫的希望。因为水门事件已经给一切事情投上了阴影。他的亲密战友正在被判刑;约翰·赛里卡宣称,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尼克松的卷入;国会的听证会将在5月6日开始。

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基辛格使用的一个谈判技巧常常使双方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基辛格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葛罗米柯,在同他举行会谈期间都不能对他的任何建议马上作出反应,因为他们必须将建议提交政治局,这当然会使谈判时间拖长,而他在莫斯科的时间却是有限的。基辛格从华盛顿出发之前,通常向我概述美国的一些基本立场,以使莫斯科有时间讨论它们。通过事先私下通知我们,他知道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基础,这种讨论通常在他到达之前在苏联领导层内进行,它能使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不失时机地与他开始谈判,事先准备好他们的反

建议和最终妥协方案。

葛罗米柯运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他是个保密狂，不到谈判开始时从不亮出底牌（甚至对我们自己的代表团成员也是如此）。他总是以一种从容不迫的方式准备详尽的对话，他不喜欢国务卿所运用的广泛而灵活的外交策略。此外，已被授予极大谈判权力的基辛格能够以一种更迅速和更灵活的方式工作，这使他更容易在策略上智胜葛罗米柯。除了他们性格的极大差异外，基辛格的行动只需得到尼克松一个人的同意。而葛罗米柯则必须与整个政治局商量；勃列日涅夫一个人也不会承担起就对美关系做出决定的责任。因而，葛罗米柯同美国官员谈判时是非常谨慎的。

但这一次，由于美国政府的注意力集中于水门事件，基辛格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之前的预备性访问不像以往那样有充分的准备。基辛格还把他的许多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中东的“穿梭外交”中，从而忽视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简要汇报。在美国国内，他面对着反对同苏联达成任何协议的运动，这一运动呼声日高，主要由杰克逊参议员和詹姆斯·施莱辛格领导。

基辛格从3月24日到28日呆在莫斯科，他同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的会谈以相当多的时间讨论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先前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只是一个将于1977年到期的临时条约，基辛格想将它延长几年，我们不反对将它延长到70年代末；新的协定有可能在最高级会议上签署。但勃列日涅夫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中关于限制导弹投掷重量的基础部分。如果接受这一部分的话，苏联将失去最大的导弹 SS-18 的主要优势，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导弹的全面优势。我认为，基辛格很了解这一点。结果双方未能达成妥协，但双方同意，在年底由双方高级官员参加的工作会议上，仍有机会达成协议。

基辛格在莫斯科期间，与他就中东问题解决方案进行的讨论也是困难、甚至是尖锐的，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葛罗米柯在他给政治局的总结中说：“美国百分之百地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

影响和控制十分明显,无所不在。”在其他问题上则进行更富于建设性和讲求实际的对话。

水门事件、白宫和克里姆林宫

在基辛格访问莫斯科之后的4月份,基辛格和我就限制战略问题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细致的交流。然后在4月29日,基辛格和葛罗米柯在日内瓦又进行了会谈。争论主要集中在导弹、包括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导弹的数量水平和类型上。

在此期间,莫斯科密切地关注着尼克松在国内地位的恶化。日渐增加的证据表明,尼克松正在变得无暇顾及外交政策事务,水门事件正在急剧恶化。但克里姆林宫仍然认为,其真正的根源是反苏和亲犹组织阴谋破坏尼克松与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的政策,甚至连葛罗米柯也持这种观点。我们的使馆试图向我们的领导人解释,尼克松被指控违犯了美国的法律和宪法;但莫斯科就是不(或者说不愿)理解美国总统怎么能因在它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受到起诉?苏联统治者的头脑就是不能理解这种情形,因为他们从未想过以这样的事情控告最高当局犯罪的可能性。总之,莫斯科直到最后一刻才相信尼克松可能被迫辞职。我应该承认,使馆在关于尼克松辞职的预测上也是谨慎的,但它认识到了它的一般可能性。

距最高级会谈仅有约一个月的时间,勃列日涅夫决定鼓舞尼克松的士气。5月28日,我到白宫拜访尼克松总统,向他转达勃列日涅夫的信息。我们私下交谈,没用翻译。我向他读了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电报首先礼节性地对最高级会议的结果表示乐观,然后转入正题,即向尼克松“面对面”地转达他以及他的同事的想法。电报承认,克里姆林宫并不真的理解水门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们可以看到,有一股显然是相当强大的力量正在竭力反对您”。电报赞扬尼克松仍然关注外交事务,特别是苏美关系,并断言:

一位政治家坚信他所选择的路线是正确的,并能清楚地看到那些或因狭隘目的,或因目光短浅而站出来反对其政策的人的弱点,那么对他来说,这是唯一的行动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您确实需要毅力和精神力量,在美国及其他地方,确实有人期望理查德·尼克松屈服和崩溃。但是,正像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的那样,您在这方面不会让他们高兴。我们说这番话是基于我们的良好关系以及对即将到来的会见充满成功的信心。现在,我们正期待着您的国务卿5月底的来访,以完成拟于6月份举行的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

一位苏联领导人发给美国总统如此独特的电报在我们两国关系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封电报此前从未公开。在尼克松总统最窘迫之际,这无异是给他以精神支持的一种姿态,而这种姿态来自莫斯科。尼克松显然为这封电报所感动。沉默片刻之后,他要我转达他对勃列日涅夫这些好意言词的感谢。他认为,这些话是完全真诚的。他还要我告诉总书记,他的“身心完全健康”,并准备击退其对手的所有攻击,确信会有有利的结果。尼克松还说,在他看来,历史学家也许已经开始谈论作为苏美关系基础的“勃列日涅夫—尼克松主义”。尽管从未正式确认或宣布,但他说这样一种主义确实存在。它意味着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不是相互对抗,而是尽其全力使两个伟大的民族,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即地球上的和平事业而共同行动。那也是总统希望他在1976年离开白宫时留下的主要遗产。尼克松强调,它将在与苏联领导人以及勃列日涅夫个人的密切合作中产生。在水门事件的阴云中,外交政策、特别是美苏关系中仍有一线光明,总统显然为这一事实所鼓舞。他的情绪振作了起来。

在最高级会谈前大约三周,即6月4日,我与基辛格为准备尼克松对莫斯科的访问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我们期望完成在前两次最高级会议中已经启动的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协定,但水门事

件的阴影仍然给我们的会谈投下了阴影。白宫力图减少右翼在最高级会议方面上对总统的批评。基辛格不愿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过深地公开卷入,以免引火烧身,葬身于水门事件的政治旋涡。

312 水门事件削弱了尼克松的地位,从而增强了反对缓和的力量,这些力量实际上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莫斯科不可能就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认真的谈判。此外,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对苏美核武库进行比较的问题上也存在着激烈争论,因为它们的核武库结构具有很大的不同。五角大楼仍是主要障碍。

6月8日,基辛格告诉我,他已与几位参议员,包括纽约州的杰克逊、雅各布·贾维茨和康涅狄格州的亚伯拉罕·里比科夫进行了私下会谈,讨论了我们的移民政策及其与苏美贸易自由化的联系问题。贾维茨和里比科夫两人都是犹太人,拥有大批的犹太人选民。他给我看了给杰克逊的一封信的草稿,信中解释了美国政府在联系问题上,以及寻求妥协以促成国会给予我们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立场。我首先看到了这样一段话,说尼克松政府“有理由相信每年至少有4.5万人将被允许从苏联移出”。我提出了在一封信里提出具体数字是否适当的疑问。但基辛格说,他最近同葛罗米柯在塞浦路斯会谈时,当他列举这一数字时,葛罗米柯并未对它提出异议。他补充说,他已设法将杰克逊一年10万人的过分要求减到4.5万,但杰克逊仍不满意。很明显,这一问题将长期困扰我们的关系。

最后一次最高级会谈

尼克松总统于6月27日飞往莫斯科,像以往一样,谈判主要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正式文件也在那里签署。此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飞往克里米亚,在雅尔塔附近的奥列安达进行两天的非正式会谈。勃列日涅夫在那儿有座夏季度假别墅。奥列安达会谈的安排与圣克利门特会谈一样。

我到克里米亚的旅行有点冒险的色彩。我们正式离开的时间

定在下午4点,即克里姆林宫会谈预订结束后一小时。我决定利用这一间隙去家里拿几件个人物品。但勃列日涅夫并未遵守时间表,而是在会谈结束后马上到克里姆林宫去接尼克松,他们直接前往伏努克沃机场。在我到达机场时,所有参加谈判的人早已登上我们的飞机飞往克里米亚。我被一个人撇在那里,后来人们告诉我,勃列日涅夫在飞机上也奇怪我为什么不在那里。

幸运的是,尼克松自己的飞机仍在机场等候起飞,准备追随总统及其的随行人员前往克里米亚。美国机组人员认识我,他们同意让我搭乘。因而,我乘坐总统的座机舒服地飞到辛菲罗波尔,整个飞机上只有我一个乘客。由于总统的波音707飞得比勃列日涅夫的图-104快,我们首先到达克里米亚,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十分吃惊地发现我竟然在机场迎接他们。我的解释解除了他们的迷惑。只要外交家们决心抓住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机会,他们的生活便会具有冒险性,便会经常碰到这类事情。

313

由葛罗米柯、基辛格和两国的大使,即美国的沃尔特·斯托塞尔与我参加的雅尔塔会谈集中讨论了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会谈在一个温暖、安静的海岸边进行,那儿建有两座政府别墅。在某种意义上,会谈加强了两位领导人之间在过去的年代里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遗憾的是它未能持续太长。

在严格意义上的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中,大多数问题、特别是正式协定问题由基辛格和葛罗米柯讨论,基辛格是美国代表团的驱动力量。当我们讨论议事日程时,勃列日涅夫大声宣读了几份关于这一问题的纲领性声明。此后,在外交部长和国务卿随后的讨论期间,他会突然插进一些评论。限制战略武器是勃列日涅夫积极参加讨论的惟一问题,因为他对这一问题相当熟悉。但总书记对其他问题的细节不甚了解,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也装着极感兴趣以试图给我们留下印象。柯西金像以往一样熟练地指导我方关于经济问题的谈判。

不可避免的事实是,水门事件的阴影支配着尼克松的行动,这

一丑闻使他在一个多月以后被逐出了他的办公室。他在会谈中常常缄默不语,一次,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期间,当他援引错误的数字时,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加以纠正。尽管在关键时刻尼克松也会简洁地陈述美国的立场,但大部分时间他似乎都忧心忡忡,专心地思考着个人的事情,从而让基辛格成为发言和谈判的主角。

基辛格后来曾写道,苏联领导人利用尼克松的虚弱来“减少他们的损失”。与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及包括基辛格本人在内的官员们的观点相反,我可以证明,无论是水门事件,还是弹劾的前景,对我们的领导人的行为,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都没有任何明显的影响。他们像先前一样对促进和发展缓和与武器控制的进程感兴趣,尽管他们知道总统的权力已受到削弱。他们支持尼克松,因为他依然赞成缓和,虽然他们担忧他在政治上的衰落将造成的后果。尼克松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根据我的判断,水门事件的麻烦和弹劾听证会都未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谈中扮演重要作用。我们事先得到的情报以及我在苏联期间的明确印象是,勃列日涅夫已经决定全力以赴实行缓和,并将他的筹码押在我最终能够幸存以及我有能力实现我的诺言上。”^①

克里姆林宫确实仍然不相信尼克松突然退出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勃列日涅夫甚至私下告诉尼克松,他确信总统将继续这一职务上直到任期结束。他并未排除在同一年与尼克松举行另一次会谈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如此肯定,他很可能是试图给尼克松鼓劲。我个人的观点是,尼克松在几个月内肯定下台,而葛罗米柯认为他大约能坚持一年。无论如何,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都没有试图疏远尼克松。他们试图证明,苏联领导人将始终一贯地致力于缓和,无论美国总统是谁。

这次最高级会谈主要的也是可以预见的缺陷是,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未取得明显进展。水门事件不仅损害了尼克松的总统地

^① 理查德·尼克松:《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英文版第1036页。

位,而且也毁掉了访问期间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取得突破的任何机会。但尽管有水门事件,尼克松仍提出,在同一年的年底在第三国举行一次中期最高级会议,以再次尝试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达成一个协议,勃列日涅夫同意了尼克松的建议(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尼克松辞职前仅一个月完成的)。

在莫斯科签订了几个有益的协定:限制地下核试验的次数,其当量不得超过15万吨;将每一方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数量从两个削减为一个;禁止进行改变气候之类的环境战争;确立了战略武器的替代、拆除或销毁的原则。

从整体来看,这次最高级会谈在继续建设性地发展两国关系方面相当成功。我们讨论了包括欧洲、中东、印度支那和联合国的作用等外交政策问题。达成了诸如能源、建筑、人造心脏及移植、空间合作、运输、环境保护、文化交流和在纽约与基辅开设新领事馆的一系列双边协议。

在尼克松在美国大使馆为勃列日涅夫举行的正式宴会上,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敏感的中国问题。他警告说,中国对和平是一个威胁,敦促苏联和美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防止中国人试图使两个大国卷入冲突的任何企图。勃列日涅夫从1970年起就一再提出这一问题,但尼克松总是回避它。奇怪的是,这一次尼克松当场告诉基辛格,在为拟议中的中期最高级会议做准备时,与多勃雷宁就这一想法进行秘密谈判。但基辛格后来悄悄扼杀了这一想法,我们的外交也没有去贯彻这一想法。

315

7月3日在莫斯科签署的联合公报宣布,双方领导人将“继续积极接触和磋商”。勃列日涅夫接受尼克松的邀请,将于1975年访问美国。联合公报强调,需要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对其数量和质量做出限制。双方还同意签署一个世界性的化学武器公约,尽可能早日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这些文件在随后的杰拉尔德·福特政府期间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帮助该政府确定了其第一年与我们的关系。从整体来看,

第三次最高级会议将缓和进程制度化,维持了它的发展势头,尽管程度有限。尽管尼克松在国内受到猛烈攻击,并将要离职,但苏联领导人在向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通报情况时,对尼克松访问结果的估价仍是一份乐观的秘密概要,听起来好像苏联领导人正期待着长时期的合作。电报说:“通过与美国总统举行的这次最高级会议和谈判,我们看到美国将巩固其和平共处的路线,这就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政治成果。尼克松已确认了美国方面渴望改善美苏关系和维持全球缓和路线的愿望。”

尼克松的最后日子

莫斯科会议之后,我们与华盛顿官方继续维持着正常的交往关系,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几乎是在白宫的最后一天,尼克松仍亲自关注着苏美关系。很难说得清是否因为它是心理上的一扇窗口,是正在迫近他的黑暗中的最后一线光明,还是他仍希望一个有利的结局。

7月9日,斯考科罗夫特要我向勃列日涅夫转达尼克松的谢意,感谢他的殷勤款待以及他们在苏联的坦率会谈。为了贯彻奥列安达谈判的一个问题,他要求得到关于犹太移民的更多资料,供尼克松在同国会领导人讨论苏联贸易问题时使用。我们提供了资料。但当时美国政府已无力与国会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对话了。

7月15日,我与基辛格就像水门事件根本不存在那样讨论了实现最高级会议决定的步骤,并拟定了详细的日程。我们主要讨论了316 将于9月份在日内瓦举行的下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他希望10月份到莫斯科讨论一个一揽子计划。

此后我们讨论了当前形势,我指出,最近一个时期美苏关系因美国政府缺乏有目的性的、思虑周密的计划而受到损害。这显然是水门事件的一个主要后果,水门事件不仅给美国带来了各种灾难,而且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方向而导致公众对苏美关系产生了认识

上的混乱。

基辛格承认,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确实已使政府瘫痪,使它的外交政策根本无法得到贯彻。他评论说,过去的一年里有一些教训可以吸取:理想主义的手段和巨大的公众压力并未改善犹太移民从苏联移出的状况,其数量急剧减少,反而恶化了我们的关系;保守派对核武器谈判的尖锐攻击,不仅未加强美国的安全,反而主要导致了更大的军事开支;对缓和的讨伐将产生严重的国际影响,它造成的国内论争不仅未能澄清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反而在全国引起更大的混乱。事实上,我们同意政策不能仅仅建立在否定的基础上而不去努力争取某种积极的东西;政府权威正在被灾难性地削弱,国家陷于矛盾之中。

我们相当悲观的谈话以这种悲观的意见结束。结果它成为我同尼克松政府高级官员的最后一次会见。白宫将注意力几乎完全转向已迅速发展到顶点的水门危机。

尼克松8月8日在全国电视台上的最后一次露面以及他宣布辞职,在乘直升飞机从白宫草坪起飞之前同白宫工作人员的告别仪式,无疑是战后美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时刻之一。

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尼克松在访问莫斯科之后突然下台仍然是一个不愉快的意外事件。整个事件的进程已清楚地表明了其结局,然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一直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理解这种机制,一个强有力的总统竟然会在公众压力以及以美国宪法为基础的复杂的司法程序下被迫辞职,他们认为水门事件只是微不足道的违法行为。苏联历史上没有类似的事件。

勃列日涅夫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是给即将离任的总统发去一封个人电报:

我谨以个人以及我的同僚的名义,向您表达我们的友好感情,为改善苏美关系和使国际形势正常化,我们共同努力进行了富于成果的合作,达成了相互理解精神。在过去的一年

中，您为苏美关系所做的一切，在我们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及全世界都受到高度评价。这些伟大成就不能不受到所有真正关心和平和人类未来的人的尊重。我还希望您知道，我们已满意地收到福特总统旨在进一步扩大和加深我们的关系的进程的意向性声明，至于苏联，我们决心进一步发展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关系的事业，这一事业是我与您一起开创的。我已向福特总统通报了这一点。

我们向您、您的妻子和全家表示良好的祝愿！

诚挚的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1974年8月10日

尼克松向勃列日涅夫发了一封答复电报：

我已离开总统职位，我以个人名义向您道别。您和我为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做了许多事，因而在世界和平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我是带着这种自豪感离职的。

我知道福特总统同我一样，相信在外交政策上，没有什么比加强日渐增加的美苏友好关系更重要的了。他将在权限范围内尽一切努力来达致这一目标。

我向您个人及苏联伟大人民的未来繁荣表示良好祝愿！

您诚挚的

理查德·尼克松

1974年8月12日

两个不同世界的首脑就这样结束了他们之间的通信。

另一位总统已经离开了白宫,而且是在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条件下离开的。他是一位有着矛盾的观点、信念和行为的人。他对苏联的态度是复杂的,但他与充满精力的助手亨利·基辛格一起,在稳定和发展美苏关系方面扮演了积极作用。但他们在冷战中试图为美国外交政策确定的方向缺乏稳定性,而且易于受到改变和抵制。这种政策的特点与苏联领导人的保守主义和僵硬政策一起导致了反对缓和浪潮的新的高涨。

第十九章

寻找真正的杰拉尔德·福特

与新总统一同起步

尽管水门事件引起了宪法上的动荡,但理查德·尼克松同杰拉尔德·福特的权力交接却是成功的,苏美缓和政策也得以继续。福特担任总统四个月后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了第一次最高级会谈,缓和达到了福特政府时期的最高点。在这个白雪皑皑的地方,他们确定了限制战略武器增长协议的大纲。但高潮也隐藏着低潮,从那以后,缓和就因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以及福特的国内困难等一系列原因而进入无情的衰落阶段。

1974年8月9日,福特宣誓继任总统职位后仅仅几小时,亨利·基辛格就邀请我到白宫,把我直接带进椭圆形办公室。这是新总统与一位外交代表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尽管还有点不习惯新职务,但福特总统看上去喜气洋洋。由于我们以前见过面并相互很熟悉,因此我们的谈话并不那么拘谨。

福特传递给勃列日涅夫的个人信息清楚地表明,他决心继续尼克松的改善对苏关系的政策。尼克松一天前就外交事务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告别谈话,详细地将他在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的会谈及会谈中做出的承诺告诉了即将上任的总统。新总统重申了他对勃列日涅夫翌年访问美国的邀请。如果准备充分的话,总统还准备在那之前在中立地区会见他。莫斯科已经提出了这一想法,基

辛格把它命名为“小型最高级会谈”。福特要求基辛格予以证实，基辛格以微笑予以确认。

总统说他认识基辛格已有很多年了，当年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曾邀请“普通国会议员福特”给他的学生讲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福特继续说，他们相互之间非常了解，他赞赏基辛格关于美苏关系是第一要事的观点。因此，他想让我们知道，像尼克松与基辛格那样，他与基辛格同莫斯科打交道时将成为“高效率的搭档”。基辛格听到这番话显然十分高兴。

320

当我们准备离开他的办公室时，福特沉默片刻后说，在他就任总统的第一天，他还想让莫斯科知道一件事：在担任国会议员时，他曾以发表关于苏联问题的尖锐而不妥协的声明著称。他无法找到“准确而又优雅的词句”表达他想要说的话，但坦率地说，作为总统，他今后在发表公开声明时将极其慎重：他今后将以更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外交事务。

我告诉总统，我国政府无疑将欢迎他继续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总之，我带着对新总统的良好印象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虽然他在外交政策方面是个新手，但我感到他已掌握了这一领域里的一些知识。我向莫斯科报告说，福特似乎准备进行通情达理的对话。

与总统会见之后，基辛格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交给我一封他写给葛罗米柯的私人信件，让葛罗米柯对福特放心。他说，无论葛罗米柯在此后的几周里“可能听到或读到”什么，福特总统都打算遵循和发展尼克松政府时期决定的对苏政策。他将是一位强有力的总统，基辛格写道，并将继续贯彻实施他们此前在莫斯科确定的政策。

我不能不注意到福特本人对基辛格的亲切态度及他对基辛格才智的赞赏，这种感情后来甚至在福特总统的回忆录中仍在继续。无可怀疑，基辛格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导航者，但他的潜力受到了限制。在福特政府中，国内政策和竞选战略——总统在两年内面临着再次大选——压倒外交政策，包括苏美关系。

基辛格还与我谈了相当复杂的白宫过渡时期的情况。福特似乎正准备更换除基辛格之外的几乎所有内阁成员。基辛格一本正经地说,目前他将暂停他的中东穿梭外交,在华盛顿附近地区至少呆上两个月。基辛格说,福特正受到许多国会老朋友和共和党领袖的包围。他们也许都是好人,但他们在国际事务方面毫无经验,他们从对苏关系极不正常的战后时期的词典里借用一些“爱国词汇”,以此来掩饰这一点。福特是个有头脑的人,他非常了解这一点,因而,他正努力避免受他的老朋友的狭隘观点的影响。但他的老朋友们的影响也不能低估。

坦率地说,在福特政府初期,我主要将希望寄托在基辛格以及他的政策观点上。相比之下,对先是一名议员,后来成为众议院共和党议员领袖的福特,我所了解的是他坚定的保守信念,他在越南问题上超级鹰派,通常不愿会见苏联代表,毫不掩饰他对苏联的极度敌视态度,在很少的几次公开讲话中,他关于我们的声明通常是公开敌对的。

总之,福特是冷战时期美国典型的爱国主义议员。他的上台不能不引起我的忧虑。作为尼克松的副总统,他的记录使我希望他能更好地理解尼克松和基辛格设计的缓和政策。当他可能继承尼克松的形势日益明朗时,我同他谈过两次话。他告诉我,他认为国会基本上忽略了苏联问题,很容易成为以杰克逊参议员为首的、组织良好的反苏运动的牺牲品。只有不屈不挠才能打破它。他还说,他完全支持与苏联谈判的政策,他一直把它说成是“基辛格的政策”,而没有将它说成是尼克松的政策。

遗憾的是,副总统的经历本身并非政策继续的保证。在这一点上有一个持久的证据,即哈里·杜鲁门继富兰克林·D.罗斯福担任总统后完全改变了对苏政策。但是,苏联(还有其他国家)的许多人认为,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是国务卿。实际情况并不总是这样。肯尼迪总统让迪安·腊斯克做他的国务卿,但在越南、古巴和军备控制问题上,肯尼迪却更多地听取他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

马拉的意见；约翰逊总统基本上也是这样。尼克松的第一位国务卿是威廉·罗杰斯，但他的作用并不重要，是亨利·基辛格这位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受尼克松委托指导外交政策。正如约翰·杜勒斯一样，终于被任命为国务卿的基辛格在外交事务中也扮演着主角。

我有一种印象，甚至是下意识地确信，新总统准备让基辛格指导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将确保两国关系保持稳定，或者至少使它们比较容易预测。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苏联领导人过高估计了美国以缓和为双边关系准则的愿望。而美国政府，基辛格说，日益不满苏联对缓和的理解，特别是在有关第三世界的问题上，在那儿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竞争正变得公开化。我担心苏联和美国在缓和问题上日渐扩大的矛盾最终将毁掉缓和，但莫斯科对此并不担心，它坚信它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新政府上台后最初一段时间里，两国政府都认为有必要私下向对方重申，它们信守先前在相互关系方面的既定方针。勃列日涅夫对福特发出的第一个信息表示欢迎。仅在两天后，他就要我转告总统，他对福特政府决心遵循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政策并决定在当年举行一次工作会议表示赞赏。基辛格告诉我，福特认为再次举行最高级会议正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福特打算访问日本，并在那儿说明他的政策路线。基辛格说，最好是将总统与勃列日涅夫的首次会见与这次旅行联系起来，这样将使它看上去更自然一些。由于轮流举办的下一次最高级会谈已经定在第二年在美国举行，这样的安排在礼仪上也是重要的。

8月14日，福特再次邀请我到白宫去。在合影时，总统回忆了几个月前我们那次轻松的会见，当时，我的妻子和我请这位副总统和福特夫人到我们的使馆参加非正式宴会。我们放了一些关于苏联的电影，其中包括一个相当有趣的有关西伯利亚乌苏里针叶森林中的老虎生活情况的纪录片。福特后来开玩笑说，这是一次未经事先计划的介绍，它展示了他与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会见将遇

到什么。

摄影师离开之后,福特问我:“你觉得我同勃列日涅夫在那一地区的某个地方,比如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怎么样?”我回答说这一主意值得认真考虑,但我必须将它报告给总书记。福特说,在事情取得进展之前,他无论如何想知道勃列日涅夫的意见。

他想知道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有多远。当我回答说纽约距莫斯科比莫斯科离符拉迪沃斯托克更近时,福特对我国的幅员辽阔感到吃惊,并说没有几个美国人能够领悟这一点。从来不会忘记三角外交的基辛格评论说,苏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会晤将使苏联最近的邻居中国人“高兴”。

323 福特将话转入正题。在他看来,他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第一次会晤应致力于对国际形势及苏美关系的主要问题进行实际、友好的全面回顾,对这些问题没有必要立即做出决定。同时,他还想讨论有关战略武器控制的建议,这些建议将由双方的官员在会晤前详细拟订,使他和勃列日涅夫能够就如何指导他们的代表团进一步谈判取得一致。我回答说,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已经将苏联方面的想法详细地告诉了尼克松,现在该轮到美国了。福特知道这一点,但他仍然想让勃列日涅夫指示他的专家继续寻找妥协方案。

在我们离开时,福特说他与他的妻子将很高兴再次应邀去使馆参加非正式宴会,这样他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苏联纪录片,对那个国家有更深入的认识,尽管这样做有悖于总统的外交礼仪。经过慎重考虑,他指着年初第二次结婚的基辛格说:“也许你能以祝贺新婚夫妻的名义安排一次六个人的宴会。”

我出去时,路过内阁会议室,注意到墙上挂的肖像发生了一些变化,艾森豪威尔仍在那儿,但罗斯福和威尔逊已经被林肯和一位民主党人——哈里·杜鲁门取代。

与纳尔逊·洛克菲勒聚餐：中东问题

8月下旬，福特宣布他决定提名纳尔逊·洛克菲勒为他的副总统。这一职位原由福特担任，现在仍然空缺。基辛格毫不掩饰他对这一选择的满意之情，因为纳尔逊·洛克菲勒长期以来一直是他的庇护人。他开玩笑说，如果他不得不辞去国务卿职务的话，他总能指望得到洛克菲勒的一个秘书职位，无论如何“工资不会比现在少。”

国会关于这一提名的听证会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为许多美国人了解他们极感兴趣的一件事——洛克菲勒到底有多少钱——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据基辛格说，纳尔逊·洛克菲勒自己并不确切知道他的财富有多少。他的财产主要包括大量的股票和证券，在美国和国外的巨大的不动产所有权——它们的价值正在稳步增长；还有大量的艺术收藏品，这是一笔无价之宝。

9月6日，我去参加基辛格安排的让我和洛克菲勒会见的三人宴会。但基辛格在白宫被耽搁了，因而我和洛克菲勒被面对面地留在聚会地。当我被带进去时，洛克菲勒正用电话同他的妻子海珮通话，问她在哪家银行存钱，每个帐户上有多少钱。他对我解释说，他324与她结婚时，他从不费心去了解她有多少钱，但现在他必须向国会提供这一信息。根据国会的命令，大约400名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实际上拜访了他的所有熟人，以此来对他进行审查。因为总统和副总统都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因其前任在丑闻阴云中的离职而被任命的，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洛克菲勒说，整个“透视程序”令人相当不快；但考虑到水门事件后国民对权力和当局的怀疑情绪，这又是不可避免的。他补充说，有时候情况可能会更糟。比如，在1964年他与巴里·戈德华特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这位参议员的一些热心支持者在洛克菲勒的一个鸡尾酒会上往饮料里放了某种东西——当然是在

容。用基辛格的话说,华盛顿行动空间“有限”主要是因为北约盟国对苏美联合行动的“嫉妒与敏感反应”。他说,缓和无疑影响了两大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稳固;华盛顿发现它驾驭自己的盟国比同莫斯科打交道要困难的多。“从这个意义上讲,缓和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损害远比对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集团的损害要大。”国务卿评论说。

我在这里必须承认,苏联本身当时并没有解决中东问题的明确和独立的战略。我们的阿拉伯盟国滥用了我们答应保护其利益的承诺,经常在外交上利用我们来阻止任何调解倡议,无论它是美国提出的,还是其他方面提出的。这一切都使得美苏之间在中东问题上的建设性合作非常困难。我们双方基本上赞成同一个方式:以和平换取被占领土的归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外交有更为现实的一步步和解的计划。我们则追随阿拉伯国家,要求以色列军队立即撤出,而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撤军后是否承认以色列的问题上却含糊其词,因此这一方案是不现实的。

我孙女与福特划分地球

9月7日,福特接见了为完成翌年的太空轨道对接使命而正在接受训练的三名苏联宇航员和三名美国宇航员。两架将要对接的航天器的模型被放进白宫展览,苏联空军上校列昂涅夫以纯正的英语主动向总统解释了对接的过程。

326

双方宇航员的妻子和孩子都出席了接见仪式,他们请求福特与他们合影。我五岁的孙女卡蒂娅与我的妻子和我也站在边上。她极想在照相机镜头前摆个姿势,她的祖母不得不阻止她。福特注意到了这个小姑娘,问她是否想同他一起照像。卡蒂娅勇敢地回答说:“是的,我想。”总统请她在他的办公室里选个地方照像,卡蒂娅走到一个和她一样高、放在地板上的五颜六色的大地球仪前,用她的手臂抱住半个地球仪说:“我们在这儿照吧!”总统笑着抱住另一

半地球仪说，他们已经划分了地球。这张照片仍挂在我书房的墙上，上面有美国总统的签名，照片上他与一位俄国小姑娘隔着海洋和大陆互相努力将手伸向对方。我一直希望这一感人的场面能成为未来苏美合作的象征性前兆，但它在将近20年里并未实现。

照完像后，福特邀请两国宇航员和我与他一起乘总统的直升机飞往亚历山德里亚，它位于离华盛顿不远的波托马可河对岸，福特在搬进白宫前作为国会议员在那儿住过1/4世纪。

市政部门、消防队员和警察在那儿组织了一次蟹野餐，包括啤酒、蟹及当地的美食。当地居民大声欢呼着向总统和他的苏联客人致意。这一切都通过电视向全国作了转播。

在飞回华盛顿时，福特问我对他入主白宫后最初一段时间的印象。我回答说，我所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美国的公众舆论对水门事件显然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专注和激愤。我告诉福特，作为总统，他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我还告诉他，我希望他不久后能在外交政策、包括苏美关系领域起到同样积极的作用。福特说，我的评价同他接过权力时为自己制定的目标不谋而合。他承认，为改善气氛，他担任总统后的第一次行动就是下令清除椭圆办公室内的所有监听装置。

他说，对他来说，现在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外交政策上的时候了，他正期待着与勃列日涅夫举行工作会谈，并将此作为有效合作的出发点。他强调说，他重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条约，它对双边关系和他的总统竞选都是至关重要的。

陪同福特去符拉迪沃斯托克

如同在尼克松任期时一样，亨利·基辛格在最高级会谈之前对莫斯科进行了预备性访问，为最高级会谈做准备。他于10月23日至27日访问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已正式确定于11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在基辛格与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会谈期间，福特给

勃列日涅夫发去一封电报。电报说，他同他的前任尼克松一样，完全信任基辛格，并授予他讨论所有最高级会谈问题的全权。

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是莫斯科与基辛格谈判的中心问题，谈判的基础是尼克松几个月前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期间双方达成的谅解。双方互相通报了各自拥有武器的确切数量，从而为深入讨论一项有效期至1985年的条约提供了条件。

基辛格回国后告诉总统，开始时他担心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强硬立场，关于裁军问题的谈判可能无法取得任何进展。但在最后一天的谈判中，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一些建议。在基辛格看来，这些建议值得仔细研究，因为它们可能为达成协议铺平道路，尽管仍需要进行艰苦的谈判。

从11月13日到16日，基辛格与我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以便为会谈做准备。美国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最新建议趋于强硬；五角大楼已经设法影响了总统，他对过去有关这一问题谈判的复杂历史不太熟悉。基辛格和我还讨论了公报内容以及根据福特的要求各自就限制战略武器发表一个声明的问题。尽管某些条款仍存在问题，我们还是设法为最高级会谈准备好了主要的文件。

福特在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前，将于11月18日到22日访问日本，访问的目的是，在同中国接近后，加强并重建日美关系，以避免基辛格所看到的主要危险：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他说，美国政府的秘密分析表明，日本能够建立一个可转变为军用的民用生产基地，在三到五年内成为领先的军事大国——特别是在与中国结盟的情况下——这种联盟不仅能够被用以反对苏联，而且也能反对美国。莫斯科马上将其视为基辛格在最高级会谈前夕情不自禁地打中国牌的一个迹象，认为基辛格甚至祭起了日本幽灵来增加其效果。但总的来看，基辛格所表达的是他深信不疑的观点，即从长远来看，美国和苏联可以相互合作来对付中日联合的压力。

328

总统的出发仪式在白宫的草坪上进行，福特向前来送行的人

——道别。当他走近我时，我注意到他没有戴帽子。即使在冬天，美国人也很少戴帽子。我告诉他最好戴一顶毛皮帽子去西伯利亚，在那儿，甚至连当地人也总是戴着帽子外出，对那里的天气决不能掉以轻心。福特有点惊慌失措地说，他没有帽子，他一生中还没有戴过毛皮帽子。所以我摘下我用在莫斯科买的海狸皮做的俄罗斯传统式样的帽子，递给他作为我的“西伯利亚礼物”。总统戴上去试试，正好合适。他在苏联外出时，总是戴着那顶帽子，并戴着它照像。

当天我即飞往莫斯科去赶政府的飞机，它将载着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飞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了祖国的辽阔。我们在空中飞行时得知一场暴风雪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肆虐，在那儿无法着陆。我们只得在哈巴罗夫斯克过夜，在此期间，驻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个苏联师被命令紧急清除当地机场厚厚的积雪。我们在第二天安全降落。

为了接待苏联和美国代表团，离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约20公里的乡村地区的一些小别墅被腾出来，那儿是当地党的领导人度假的地方。勃列日涅夫要我先去福特的别墅检查一下，看各项设施是否达到了“适当的标准”。在我到达时，总统的美国工作人员已在那里检查设施，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已经在那儿站岗守卫总统的卧室。我决定亲自试试他卧室里的电话，使用它给远在华盛顿的妻子打了个电话。这确实是一个距离非常长的长途电话——跨越了半个地球，我的妻子极为惊喜。别墅里的一切似乎都很完美。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在勃列日涅夫的率领下乘上一列郊区电气火车去空军一号准备降落的军事基地，这个基地通常是截击机使用的。然后，汽车把我们带到飞机场。在那儿我看到了超现实的景色：没有树木的广阔雪原上零星散布着几幢建筑（所有的军事设施和飞机库都在地下）。一切都被深埋在雪中，仅有一条跑道在夜里被清扫干净。福特走出飞机时显然也被这白色的静寂感动了。它使人想起杰克·伦敦笔下的阿拉斯加。

在互相致意之后(没有举行正式的外交仪式),所有的人都上了汽车,前往一个峡谷乘坐正等待着我们的火车。火车一开动,勃列日涅夫就邀请福特到他的车厢“喝杯茶”,同时喝点儿白兰地。两位领导人谈起了他们过去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成就。谈到天气,福特抱怨说,在华盛顿,甚至一场小雪也会引起大的交通中断。勃列日涅夫微笑着向他许诺,可以派俄罗斯的扫雪机去那儿。然后,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稍事休息。

就在那一刻,勃列日涅夫中了风,叶夫根尼·恰佐夫教授和其他医生设法控制住了病情,但坚持要勃列日涅夫推迟他与福特在第二天开始的谈判,勃列日涅夫断然拒绝,并要求他们对任何人都不要说。结果谁都没有透露这件事。相比之下,一位美国总统即使患一点小病,也会受到严密监控和广泛报道。谈判按计划在第二天进行。我应该补充一点,勃列日涅夫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他飞行了7000多英里,跨过整个俄罗斯来与他第一次见到的这位美国总统谈判。双方事先并未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谈判中必须全力以赴并做出艰难的决定。勃列日涅夫的随行医生已经察觉到了他的大脑动脉粥样硬化的最初迹象,但此事只有他们知道。当勃列日涅夫乘火车经蒙古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时,他再次中风失去知觉,恢复知觉后又继续旅行。此后不久,他对法国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但他的致命疾病的漫长倒计时已经开始。

历史很少有界线明确的转折点,但这次中风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说缓和在某一时刻曾到达过顶峰,而后便开始衰落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的中风可能就是那一时刻,因为从那一刻起,最高级会谈的进程不可避免地慢了下来。

但双方也有其他方面的重要政治原因:犹太移民问题,一位未经选举的美国总统在政治行动上所受的束缚,我们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冲突以及莫斯科和华盛顿对缓和所持的根本不同的观点与期望。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福特极易受到政治攻击。在随后的吉米·卡特政府上台前,缓和政策不断地受到侵蚀。在论及卡特政

府时,我们将再次讨论所有这些因素。但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是缓和的顶点,因此,福特与勃列日涅夫同样应当受到称赞。

330 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会谈于1974年11月23日至24日在当地一个很小的俱乐部里举行。与福特一起参加会谈的有基辛格、美国驻苏联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总统助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和其他一些顾问人员;勃列日涅夫这边有葛罗米柯、外交部美国司司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还有我和勃列日涅夫的几位助手。

两天的会谈紧张而激烈,但十分讲求实际,没有通常的外交礼仪。第一天一整天都在拟订一个长期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谈判进行的十分艰难,这不仅是因为问题极为复杂,还由于美国的立场受到国内因素的极大影响,美国代表团几次离开谈判桌去讨论他们应采取什么立场。基辛格在谈判中发挥了首要作用,因为福特还不了解所有的细节。从另一方面说,总统能更为准确地预料到在国会面前为他达成的条约辩护时可能会涉及哪些问题。总统不愿卷入同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的长时间辩论,而是让基辛格去辩论。福特也不是那种极有幽默感的人,他是个稳健、一本正经的美国人,一旦理解,就意味着交易成功。在其他问题上,他倾听着争论,安静地抽着他的烟斗,依靠他的常识做出决定。

苏联代表团也有它的麻烦,美国的立场在基辛格访问莫斯科之后的那个月因来自五角大楼的压力而变得更加强硬,我们在谈判桌上不得不寻求新的妥协。勃列日涅夫不断向莫斯科打电话,协调他与其他领导人的立场。在一个问题上,他与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格列奇科反对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让步,并坚持任何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都应把英国和法国的核力量计算进去,而勃列日涅夫在谈判中逐渐认识到,福特决不会在这一点上让步。作为一名军方代表,格列奇科还提出了其他过分要求。勃列日涅夫在葛罗米柯的支持下拒绝了这些要求。两人认为,如果迁就军方的过分要求的话,将会毁掉协议和整个最高级会谈。勃列日

涅夫十分愤怒,他声色俱厉地拿出总书记的权威,这样格列奇科才作出让步。

第一天的会谈一直进行到午夜,双方取消了事先安排的宴会而改吃三明治。会议在一天中仅有两次短暂的休息,美国人利用它们来讨论自己内部的事情。尽管天寒地冻,他们因担心被窃听,仍到外面去谈。在一次休息期间,勃列日涅夫递给福特一个木雕肖像,这是一位从未见过福特的地方业余艺术家用质量很差的报纸照片做模特雕刻出来的,肖像一点儿不像福特——有个美国人说它更像弗兰克·西纳特拉^①——但艺术家将他的感情与心灵注入了雕像,总统对它仍然很欣赏。

要了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争论而又不为其技术细节所累就必须了解两国政府在长期谈判中面对的基本任务。两国领导人必须同意限制他们的战略武器,而这些战略武器在结构和部署上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同。从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开始,美国人就以所谓的三位一体的核武器战略——即从陆地、海上和空中发射核武器——为基础来发展他们的战略武器。而作为一个没有海外基地的大陆国家,苏联从一开始就集中力量发展大型的陆基导弹。1974年谈判的焦点是在苏联的投掷重量和数量占优的陆基导弹与美国占优势的多弹头分导式导弹——这种导弹苏联当时非常少——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

基辛格在莫斯科已详细拟订了一个预备性的妥协计划,它允许每方最多拥有2400件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战略轰炸机以及从陆地和海下发射的弹道导弹。双方将被允许各拥有同样数量的多弹头分导式导弹,每方拥有导弹的数量到1988年年底将不超过1300枚。但仍有一些重大分歧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未得到解决,如怎样计算潜艇导弹和飞机发射装置(特别是我们的图-22M新式轰炸机,西方称之为逆火式轰炸机)以及被部署到欧洲前沿阵地从而

^① 美国电影演员。——译者

能将原子武器投掷到苏联领土上的战斗轰炸机。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拟订一个为期10年的“框架协议”的想法，即具体规定任何一国都不能超过的同等上限，但每一方在数量规定范围内确定其陆、海、空战略武器的结构时可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这样的协议不会减少已经存在的武器水平，但至少它将规定一个上限。为了实现这一点，每方可以选择适合自身战略需要的导弹配置。收到这一建议后美国代表团立即要求休会。谈判的深度和广度都增加了。

332 最后，双方就最复杂的条款达成了妥协，同意为1995年以前的战略武器定出一个上限；每方将被允许拥有2400件陆基、海基和空基的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每方最多只能有1320枚导弹使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这消除了我们同尼克松经四年谈判达成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主要缺陷——导弹运载工具总数的不平等。在其他方面也达成了一些妥协，比如战略飞机。这一条款明确承认应逐渐实现数量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这对苏联具有极大的外交和军事重要性。与此同时，正像美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私下警告我们的那样，这一原则为福特政府带来了潜在的国内政治麻烦，美国公众还不习惯在军事战略上与苏联平等的观念。

其他国际问题则在第二天早上10点开始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这一天的会谈没有第一天那么紧张。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问题上，双方进行了有益的交流，美国人显然不愿承担可能使他们与他们的欧洲盟国发生龃龉的明确义务。谈判还包括中东问题，但未产生任何新的结果，美国人重弹他们与以色列的关系以及国内问题的复杂性的老调。

在中东问题上，他们勉强同意将有关恢复日内瓦会谈的一些有益的词句加到公报中。公报再次强调了“苏美最高级会谈的现实意义”。最高级会谈在干杯声中结束，与会者享用了当地产的人参

伏特加和阿穆尔河^①产的鱼籽酱。

会谈结束后，勃列日涅夫驱车送福特和基辛格穿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区去机场，途中为他们指点当地的风光。美国客人对于没有看到屋顶独特的中国式房子感到吃惊，建筑物的内部风格也是欧洲式的。美国人似乎受到了中国人积极的宣传活动的影 响，中国人曾宣称对苏联远东的广大地区拥有主权。美国人原以为在城里能看到中国人过去留下的迹象，看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城市是由俄罗斯人建设的，我们在此已居住了一个多世纪。福特承认，他过去认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更像亚洲城市而不是俄罗斯的城市。基辛格开玩笑说，在他下次见到中国人时，他决不会告诉他们他在这座城市里实际见到的东西，以免惹恼他们。

在机场道别时，福特将他在阿拉斯加途中停留时得到的一件狼皮外套送给了勃列日涅夫。他在登机前把外套从身上脱下来递给勃列日涅夫，令新闻记者感到高兴的是，勃列日涅夫立即将它穿在身上。他们像是老朋友那样分手了。

虽然时间短暂，但双方都对会谈结果表示满意。到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空军基地时，福特将他同勃列日涅夫的会谈描述为“非常、非常好”。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结果超出了他的所有期望。勃列日涅夫在给政治局的报告里也认为这次会见是成功的，特别是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达成了谅解。他说，他认为他同福特总统的个人接触是有益的，他是“一个将来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333

12月10日，按照我国政府的指示，基辛格和我交换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所达成的规定了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细节的秘密备忘录，

^① 即黑龙江。——译者

协议在1977年10月到1985年12月期间有效。^①基辛格同时正式确认总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作出的秘密保证,即美国自1983年以来已不再将西班牙大西洋海岸的罗塔海军基地作为它的一个核潜艇基地,今后仍将如此。这一协议的存在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马德里的怀疑,但它从未被公布过。

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成为后来所有核裁军谈判的出发点。福特和勃列日涅夫成功地就限制进攻性战略导弹的框架达成了协议。考虑到仅在四个月前因尼克松的辞职而造成的混乱,这是一个显著的成就。不管它在技术上的优点或缺陷如何,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会谈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指出了未来的方向。

334 但福特总统不久就受到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强烈批评。缓和的反对者指责他屈从苏联的压力,他们特别抨击在战略武器及其限制方面的对等原则。最起劲地反对最高级会谈结果的人包括以罗纳德·里根为首的共和党右翼和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及其追随者。不幸的是,福特认为在大选之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进程应暂时停止。但我认为,福特支持率的下降并非因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而是因为9月8日他对理查德·尼克松的赦免。人们怀疑他同尼克松做了一笔交易,用赦免的许诺换取总统职位。新闻媒介也停止了与新总统的休战,福特发表的所有效果不好或者是错误的言论

① 关键条款如下:

新条约根据参加方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将特别规定下列限制在协议有效期内生效:

a) 在新协定有效期间,每方将被允许拥有总数不超过2400件的战略武器运载工具,其中包括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ICBM 发射器)、水下发射的弹道导弹发射器(SLBM 发射器)以及装载着炸弹或射程不超过600公里的导弹的重型轰炸机;如果轰炸机所携带的空对地导弹的射程超过600公里,每枚导弹将被作为一件计入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总数(2400件)之内。

b) 在这一限度内,每方可自行决定其总数的构成,但须遵守限制建立新的地下发射井的协议。

c) 每方装备有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水下发射的弹道导弹不得超过1320枚,在这一总数范围内,每方可自行决定它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类型和数量。

都被广泛宣传,摄影师竞相拍下他最尴尬、最不雅观的镜头:被绊了一下或偶然跌倒等,虽然他是一名很好的运动员。一些反对派报纸开始不公正地将他称为意外总统。所有这些都伤害了总统的自尊,减少了他对自己的政策、包括缓和政策的信心。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吵吵嚷嚷的辩论有害无益,因为几十年来美国人一直被告知,他们对我们拥有核优势。因此,总统同意核平等的消息引起了疑问甚至是担忧。大多数人不了解那些用于复杂技术谈判的新的英文缩写词,这就更增加了混乱。来自法语的“缓和”一词引起了更多的争论,它具有两种相当不同的意义:一个是“缓和紧张局势”,另一个是“扣动扳机”。在俄语中,我们从来不用这个优雅但却会引起混乱的外国词。一些美国人甚至把缓和看作是“协商”,这与苏美关系的实质相去甚远。所有这些混乱(真正的或者是人为的)都源于苏联和美国之间在缓和概念上的分歧与矛盾。尼克松年代因缓和思想而产生的欣慰感已经逐渐消失。

犹太人移民问题与缓和

对缓和的气氛破坏最甚者莫过于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问题了。甚至连克里姆林宫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试图——尽管还有反复和犹豫不决——在福特上任后立即开始改变这种局面。8月14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谈时,我提出了防止对苏贸易歧视的立法问题。我秘密地告诉总统,苏联政府向他作出口头保证,每年允许5万名犹太人离开苏联——1973年实际迁出的犹太人达到3.5万人——但莫斯科将不签署任何官方协议,以免杰克逊参议员用它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福特答应要研究这一建议,尽管他不能保证这会被犹太人游说集团所接受。

第二天他就会见了杰克逊、贾维茨和里比科夫,秘密地向他们传达了这一信息。福特宣称谈话是成功的,尽管杰克逊向来坚持顽固立场。他的对话者表示,如果政府给他们写一封澄清情况的

335

信,他们愿意对杰克逊修正案做些修改。杰克逊与他的两位参议员同事的分歧是,他们准备接受口头保证,而杰克逊想要书面保证。

基辛格通知我,他正在起草给参议员的那封信。我告诉他,白宫和国会成员之间的通信当然是他的政府的内部事务。但根据我得到的指示,我必须再次提醒他,这封信不能提及关于移民数字的任何官方保证,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尽管事实上我们将不会反对增长到5万人的水平。并准备将此事通知福特总统。但基辛格仍然我行我素地写了这封信,杰克逊参议员极富煽动性地将它散发给新闻界。他宣称,这封信暗示苏联已保证每年不只是允许5万、而是允许6万人(他自己坚持的数字)移民。克里姆林宫非常愤怒:它克服极大困难所做出的秘密让步竟被广泛宣扬出去了。

第二天,我告诉基辛格,他已经违犯了他自己与葛罗米柯达成的秘密谅解:在官方的信件中不会有任何确切的移民数字被引用。我强调说,杰克逊宣称苏联已同意每年6万人的移民限额,这违反了我们之间的秘密谅解。基辛格显然感到不安,因为这种谅解确实存在。

一天后他通知我,他已同总统谈过,福特对杰克逊的行为感到愤慨,并认为这位参议员的“行为像一头猪”。他要向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说明事件经过。10月18日,福特同杰克逊谈话时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位参议员仅能告诉新闻界国会和白宫之间达成的基本协议,即给予苏联最惠国地位从而取消对它的贸易歧视。参议员可以说,之所以达成这一协议是因为苏联在移民问题上作出了让步,仅此而已。杰克逊并未被允许发表那封信。

但那位参议员刚一离开总统的办公室就在白宫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将信件原文公布给了新闻界。白宫散发了它自己的解释性声明,说苏联从未提到过任何数字,杰克逊的声明仅代表他自己的观点。基辛格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去参加最高级会谈的预备性会议。在那里,葛罗米柯递给他一封正式信件,强调说他为杰克逊的行为作出的解释已被“明确拒绝”。它毁掉了我们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妥

协。但除了亲密助手外，基辛格未将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任何人，他仍希望在最高级会谈中，策略地解决这一事件。

这一切只能使我本人坚信：杰克逊参议员并不打算寻求妥协，而是希望这一问题悬而未决，以便为他的宣传目的和政治前途服务。美国政府尽管寻求妥协，但不得不考虑国会中的亲犹太人反对派，所以它以各种手段从中周旋。我们也或多或少地准备实现可行的妥协方案，却不愿公开承认，担心这样会造成一种我们屈服于杰克逊参议员及其追随者的压力的印象。移民问题继续恶化着我们与美国的关系。

在最高级会谈结束后的12月18日，基辛格和我正在国务院共进早餐，他的一位助手急匆匆走进来，递给他一份刚刚由电台播出的措辞严厉的塔斯社声明的副本。声明公布了葛罗米柯评论“基辛格—杰克逊协议”的信件。声明还提到了将我们的移民政策与在美国享有的贸易权利联系起来的杰克逊—瓦尼克贸易法修正案。声明说：“苏联领导人断然拒绝对纯属苏联内政的事务进行干涉的任何企图，这种企图是不能接受的，不管它来自什么人。”

一开始，基辛格对莫斯科未事先通知他便发表葛罗米柯的信表示愤怒，他告诉我，那只会使贸易法案的通过变得复杂化。我感到我必须打断他。我说，目前提交给国会的贸易法案似乎比1972年两国政府开始推行缓和政策时所实行的法律更歧视苏联，新的法案不仅在贸易上歧视我们，而且在贸易信贷上也歧视我们（参议院于9月19日通过的斯蒂文森修正案要求这样做）。我继续说，总统和国务卿在任何场合都未对这一尼克松曾许诺要加以否决的公开的歧视性立法提出过抗议。

基辛格平静了下来，并打电话给斯考克罗夫特。斯考克罗夫特确认了我刚才说的话，国务卿咒骂他未能得到消息并扔下话筒。随后他又给总统打电话重复了我的话。根据基辛格所说的话，我可以大致判断出，福特承认国会的形势对于苏美贸易关系十分不利，现在是政府介入的时候了。再过两天国会就将休会过圣诞节。福特让

基辛格当天在白宫召开一个会议,讨论一下能做些什么。总统说,不应允许国会在苏美关系领域里继续“给政府使绊”。当新国会在新的一年里召开时,一定要做些事情。

但事情很清楚,政府无法在国会休会的日子里做任何事。国会在12月20日通过了贸易改革法,其中的许多修正案以苏美商务和信贷为条件,向我们的移民政策施加压力。它规定,苏联只有改变其移民政策才能得到最惠国待遇。这一政策将在18个月内(或者说在杰克逊参议员希望竞选总统之时)再提出来审议。美国进出口银行和商业信贷公司对苏联的信贷在四年内被限制为3亿美元。它还拒绝向苏联提供用于矿物开采的贷款——它主要影响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这一法律在很长时期内有效地阻止了我国与美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发展。

国会的投票出乎苏联领导人的意料,他们总是低估美国公共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为他们在国内没有这类压力。他们无法想象美国总统竟然不是真正的最高统治者。震惊之余,他们的反应是迅速和愤怒的。12月25日,勃列日涅夫发给福特一封愤怒的信,声称贸易和信贷法案“根本无法接受”。他补充说:“不用说,这一法案免除了苏联方面因一系列的贸易和信贷协议而承担的义务(包括偿还租借法案债务的协议)。我们的贸易和经济关系遭到重大损害,它肯定也无益于苏美在其他领域的关系。”

1975年1月3日,福特签署了这一法案,他需要法案授予他的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广泛权力,因此他别无选择。莫斯科关于中止偿还租借法案债务的威胁做得恰到好处,这一协议是三年前尼克松和柯西金通过讨价还价友好地达成的。双方都宣称缓和本身将不受影响,试图粉饰这一事件,但缓和确实受到了影响。

当年夏季的一天,杰克逊参议员邀请我到他家共进早餐,为所发生的一切写下了一个注脚。那是7月里炎热的一天。杰克逊住在一幢二层小楼里,房间有意用不那么奢华的中档家具装饰,尽管它

位于富人住宅区。这位参议员自豪地告诉我，他的孩子正在一所纯粹的公立学校上学，而他的邻居的孩子却被送到几乎全是白人学生的昂贵的私立学校就读。他把他的孩子们叫过来向苏联大使问好，然后我们两人便共进早餐。

杰克逊开玩笑说，苏联人在听到他的名字时也许会被吓着，就好像他是个长角的恶魔。我也以同样轻松的态度回答说，我必须告诉他，苏联人不那么容易被吓倒，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非常严厉的生活大学：既不害怕魔鬼，也不害怕女巫，无论他们在哪儿被发现。我们的人民看到了他关于苏美关系的声明，坦率地说，他们对其中的大部分观点不能苟同。

参议员说他赞赏我的坦率，那正是他想与我会谈的原因。然后，他开始热心地阐述他的观点。他讲话的大致意思是，他对苏联的态度与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并非完全不同。两位总统必须玩弄政治手段，他表达观点时则更为坦率，而两届政府基本同意这些观点，尽管它们的观点更多地表现在行动上而不是言词上。

杰克逊声称，他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与苏联达成的战略武器协议，他提出批评主要是因为尼克松政府在1972年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上“对国会不诚实”，他掩盖了同苏联达成的秘密交易。我问他这些秘密交易大概是什么内容，他不愿直接回答。他认为，基辛格起初拒绝披露葛罗米柯10月26日那封扼杀了在移民问题上妥协的信，同样是不诚实。国会领袖，包括他自己，得到了一种虚假的印象，即如果他们保持压力，莫斯科在苏联移民问题上最终会让步。结果，他们很明显是错误的，但那时事态的发展已被情绪所左右，达成妥协为时已晚。最终的僵局对谁都不利。至于基辛格，杰克逊感到，尽管他愿望良好，但却弄巧成拙害了自己。

杰克逊抱怨说，莫斯科用“缓和”一词来描述它对美国的政策，但许多美国人对这个词一无所知，所以对它有极不相同的解释，有时候它甚至被解释成相反的意思。我告诉他，俄语中“razryadka”一词与这个意为“缓和紧张”的法语词汇相对应，但我们从不使用

这个词,它是由美国人提出的。参议员表示,如果它原本就有这么明确的定义,那么美国不会有任何一位政治家敢于反对它。我回答说,现在他已确切地知道了莫斯科所说的意思,他可以毫不畏惧地支持缓和了。他面露微笑,但什么也没说。

在我们分手时,他要我转告勃列日涅夫,他没有、也从未受敌视苏联的思想所驱使。他说他支持美苏关系的缓和,但作为反对派的一员,他有时不得不在策略上而不是战略上批评政府。

尽管我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但杰克逊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已开始认识到,他的外交政策纲领以反苏为基础对竞选总统是不利的。

福特与尼克松之比较

尼克松的被迫离职给共和党造成了严重损害,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私下向我承认,该党发现自己处于困难境地,除非采取措施改善国内状况,特别是经济状况,否则共和党将在下次大选,包括争夺白宫的斗争中遭受严重损失。

作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实际上每天都要与福特见面。斯科特继续说,不幸的是,尽管福特拥有广泛的总统权力,但他在他的党和国家面前并未表现出一位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勇气和其他素质。斯科特说,共和党领导人和福特自己寄希望于副总统洛克菲勒引进“最有希望的华尔街思想”来为政府服务,福特在自己试图争取这些人的努力失败后更是这样。

在某种程度上,福特并未摆脱他的国会议员心理,即他没有理解作为一位总统所拥有的广泛机会和特权,他担心不熟练或不适当地运用权力也许会损害他的政治前途。这一切使福特在作出重要决断时,特别是做出那些难免不受欢迎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决断时过于谨慎。国会老朋友们相互矛盾的观点使福特无所适从,更加缺乏决断。

当年年底,在一次私人宴会上,我们和基辛格对两位总统的表现做了比较分析,他们中的一位在史无前例的情况下将总统的指挥棒交给了另一位。

基辛格说,说起来也许有些奇怪,他发现在过去的几个月期间,与福特一起工作比与尼克松更容易,而他与尼克松曾一起工作了六年。尼克松对外交比较精通,在这一领域他会提出他的想法,而福特却不能。但尼克松的想法不易被改变,即使它看上去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总是为之固执地辩护。有时候,需要二三个星期巧妙地运用策略才能使他放弃某种想法。

与福特不同,尼克松对某一问题不会仅限于考虑一种选择,而是常常要求得到更多的资料。比如,一个决定可能会怎样影响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同苏联、中国、印度的关系等等。换句话说,对一个问题必须从各种可能的角度去处理,因此它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福特不会提出侧面的问题,或者询问复杂的相互联系的问题。他希望问题得到明确的阐述,提交给他时带有如何行动的具体建议。福特是通过国内政策的多棱镜看问题的,即这个问题在国会、党内和国内将被怎样看待,仅在这以后他才会考虑它的国际意义。

基辛格说他正在试图使总统既从国内,也从国际观点看待他的决定;也就是说,基辛格试图避免因国内因素而影响他的各项外交政策行动。但在国内问题上,总统比基辛格老练得多,遇到这类问题时总是由他作出最终的决定,特别是考虑到总统大选即将到来。

在某种意义上,福特所持的信念使他比尼克松更保守。基辛格说,尼克松从本质上讲不是一个死顽固,尽管他在公众中以保守的反共斗士而闻名。他做出此类姿态是为了达到他的目标。当他认为必要时,他会背离自己的传统路线,比如他在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上就是如此。但福特在众议院呆了1/4世纪,而众议院比参议院更保守,也更局限于国内事务。令人遗憾的是,福特的这种倾向得到

了他的国会老朋友们的支持，他们仍定期去拜访他。在这些人中
有梅尔文·莱尔德，他曾出任尼克松的国防部长，并同军方保持着密
切联系。

福特总统并非本来就有反苏的倾向，基辛格说，但他对“苏联
的意图”感到担心。他并非故意要使军备竞赛升级，但他信奉一个
“强大的美国”的爱国思想。他的所有信念都来自于“面向国内事务
而不是国际事务的政治素养”。然而，后来他开始为外交事务所吸引，
对它的细节表现出极大兴趣，尽管他在这方面的综合能力仍远远低
于尼克松。

341 国务卿还注意到两位总统性格的极大差异。尽管享有在危机
中处事极其果断的声誉，但尼克松在本质上是个犹疑不定的人，只
是在痛苦的犹豫和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之后才会打定主意。福特
不是这样，他喜欢简化的“明确组合”，倾向于快速做决定，做出决
定后便难以劝阻。有时候，他甚至比尼克松更任性，尽管他平常与
人打交道时更直率、更富于同情心、更平易近人和随时准备倾听他
的助手的意见。总的来看，私人关系对福特的影响比对尼克松的影
响要大得多。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与苏联领导人
建立的明显的良好关系就变得特别重要。

我认识到，尽管过去的半年对美国来说充满了引人注目的事
件，但苏美关系几乎是奇迹般地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在这个史无
前例的转变时期，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仍设法在一条相对稳定的航
线上航行。但狂暴的天气即将来临。

第二十章

缓和受到侵蚀

右翼的雷声

杰拉尔德·福特就任总统后的第一年是一个动乱不安的年头。这次衰退是战后世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一部分。引起衰退的直接原因是1973年中东战争后石油价格翻了两番。在美国，由于政治机制遭到削弱、水门丑闻以及公众对政府信任程度的下降致使衰退加剧了。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受美军在印度支那最终失败的影响，这对于美国因“从未战败过”而受到的军事崇拜是一次沉重打击，尽管从越南撤退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腾出手在其他地区采取行动。

但是福特未能在国内明显地提高自己政治声望，虽然他设法使他和他的政府摆脱了尼克松的阴影。大选中的政治斗争置他于民主党反对派和他所属的共和党右翼及其主要旗手罗纳德·里根的交叉火力攻击之下。里根公开声称美国在缓和中受到不公平对待，而苏联却捞取了全部好处。

由于在三年的时间里数次举行最高级会谈，苏美关系此时已建立在相互谅解的广泛基础之上。从前的双边条约、协议和换文依然有效并得到顺利执行。国会首次派出正式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根据两国政府协议，由电视直播的苏联《联盟》号和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的对接清楚地表明苏美在科技和其他领域合作的潜力。

我国电视向苏联公众——更不用说向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类似《联盟》号发射实况转播的情况以前还从未有过。7月17日，当转播节目传到国务院会议大厅的大批美国观众面前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处于一种紧张的兴奋状态中。在场的有美国总统、国务卿、内阁其他成员、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员。“如果出差错怎么办？”我想。但一切正常，大厅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福特政府基本上继续执行了其前任的缓和政策，虽然福特又补充了他自己提出的“强大的美国”的理论和基辛格提出的将保持力量平衡、特别是在华盛顿—莫斯科—北京三角关系框架内保持力量平衡作为美国的国际战略基调的理论。但右翼向福特施加的压力、特别是在冷战期间形成的意识形态传统，对于一个本质上十分软弱的政府来说实在是难以抵挡。这个政府不得不尽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性，直到在大选中得到人民的授权为止。然而正是这一选举进程为极力反对缓和的各种力量的联合开辟了道路。他们是犹太选民、工会领袖、形形色色的保守分子以及与这些人有联系的新闻界人士。

白宫很快发现自己在与苏联达成重要新协议方面受到了约束，这可能成为竞选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由于未经选举，总统实际上有自卑感。他不得不认真对付国会，并承受来自五角大楼及中央情报局的压力。它们不赞成与苏联妥协，特别是在战略武器方面。由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日益临近，总统开始向右摆，在政府言论中引进“不接受单方面缓和”的说法，从而采纳了里根路线。4月11日，他在国会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发誓决不允许把缓和变成“一张混水摸鱼的执照……缓和必须是双行道”。

西贡的陷落

福特政府一上台就面临它和它的盟友在东南亚的处境急剧恶化的局面。福特上任不久就给南越独裁者阮文绍发去密电，许诺美

国将给他充分的支持。共和党政府直到最后一刻仍竭力维护西贡和金边的亲美政权,但最后还是以惨败告终。4月17日,美国在柬埔寨的被保护人停止抵抗,4月30日西贡投降。

在西贡即将陷落的危急时刻,美国人乘飞机仓皇出逃。福特不得不向莫斯科求援。4月19日,基辛格请我向勃列日涅夫转交一份“急件”,要求苏联政府帮助实现临时停火,通过“不间断的撤离行动”营救滞留在那里的美国人和忠心耿耿的南越被保护人。他证实美国人终于要全部撤走,并解释说这实际上是请求勃列日涅夫进行斡旋,“最终结束整个越南悲剧”。总统没有向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他任何人求助。

344

4月24日,勃列日涅夫答复说,越南人通知他不会阻碍美国公民从越南撤走,也无意损害美国人的威望。他们将继续执行巴黎协定。福特接到这个答复后感到十分欣慰。

战火停息了两天。4月26日,我又收到一份福特致莫斯科的急件:北越人重新炮轰西贡机场和美国大使馆周围的建筑。基辛格激动地说,与河内的保证相反,河内的行动对美国政府的威望和总统本人都构成了直接的、预先策划好的打击,因为他们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表明美国人是在北越人施加的直接压力下撤离的。我说那也许是事实,同时提请基辛格注意国会和新闻媒介对美国人毫无必要地拖延从西贡撤出的时间所提出的批评,这样的行动本来是可以在两三天内完成的。

不久,华盛顿与河内通过莫斯科最后一次向对方传话。5月28日,我向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转达了河内的口头回答:“越南领导人赞成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河内还说,根据莫斯科的劝告,“越南方面在解放西贡期间表现了克制,为美国人不受阻碍地完成其人员的撤退提供了机会。越南对美国没有敌意,希望美国方面对越南也是如此”。斯考克罗夫特要我转达美国的答复:华盛顿也赞成建立良好的关系,原则上对越南也不持敌意,美国建议以此为基础发展两国之间各个领域的关系。有关这次传话的情况以前从未

公布过,它是这场悲剧的最后一页。

人们只能猜测基辛格当时有多么沮丧。毕竟是他谈成了巴黎协定,人们指望这个协定能使美国在至少不显得是战败的情况下结束在越南的战争。福特刚刚宣布美国已最终从越南撤出后不久,在一次招待会上,我遇到了基辛格。他看上去十分忧郁。他心情十分懊丧地声称:“北越人确实非常走运”,因为国会已正式立法,反对美国在军事上卷入印度支那,此外美国国内现在出现了许多意见分歧,这一切“都使这个国家难以表现出它的意志”。他说,要不是水门事件及福特后来大失人心,北越违背与美国达成的协议的行为是不会轻易得逞的。

显然,基辛格仍然带着怀旧情绪回顾尼克松时代,特别是尼克松执政初期的情况,那时美国外交政策由白宫制定和实施,无需特意考虑国会和舆论的影响。

赫尔辛基会议及其后果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阶段会议于1975年7月30日至8月1日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这是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欧洲各国首脑会议,不过这次美国和加拿大也参加了。35个国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从1973年起开始工作,美国起初认为它无法从中得到好处,因此对这个会议持明显的冷淡态度。但后来签署了一个东西方关于西柏林地位的协定,苏联也表示乐意就相互削减欧洲的军事力量在维也纳举行会谈。随着事态向好的方向转变,于是从1973年开始筹备赫尔辛基会议。

在赫尔辛基签署的基本文件的内容包含与会国在三个关键领域的承诺,这三个领域在赫尔辛基被称为“三个篮子”,即安全、经济合作和人道主义合作。第三个篮子包括人权、迁徙自由和思想交流等重要问题。从谈判一开始,苏联领导人就只对头两个篮子感兴趣,并且主要强调承认将欧洲分为东方和西方的战后欧洲边界。同

时苏联竭力贬低第三个篮子的意义,因为它仍然相信人道主义问题属于内政。与此相反,西方国家公正地认为它们是莫斯科必须为之承担某种责任的重要的国际问题。否则西方国家将拒绝就其他问题达成协议。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会议开幕。

克里姆林宫对第三个篮子的态度受到谈判心理的影响。协议文本是各国代表团经过几个月逐字逐句的热烈讨论才准备就绪的。苏联外交部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向政治局请示。葛罗米柯不时向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谈判的进展,但他们对复杂的措辞很少注意。对他们来说,这一切似乎只是外交上的例行公事。

346

但是当条约准备好、第三个篮子的全貌呈现在政治局委员面前时,他们不禁大吃一惊。由于会议开幕的日期日益临近,政治局对勃列日涅夫将代表苏联政府签署的文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第一个和第二个篮子争议不大,争论主要集中在第三个篮子上。政治局的许多成员(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对于承担可能为外国干涉我们的政治生活开辟道路的国际义务持严重的怀疑态度。许多苏联大使也表示疑虑,因为他们正确地预感到今后将出现棘手的国际纠纷。由于赫尔辛基会议意味着的自由化进程的开始,莫斯科不得不作出将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决定。

葛罗米柯不得不充当外交部拟订的这份协定的主要辩护人,他的妥协观点最终占了上风。他争辩说,多年来苏联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使战后边界和现存的欧洲政治版图得到普遍承认,这将是莫斯科在政治上和宣传上获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此外,他还争辩说,第二个篮子将开辟与西方进行经济合作的前景。至于人道主义方面的承诺,葛罗米柯争辩说,那仍将取决于苏联政府的态度,因为只有它才能决定什么是干涉我国内政,或什么不是干涉我国内政。“我们是自己家里的主人,”葛罗米柯说。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被说服了。这样,从一开始政治局对赫尔辛基会议确定的人道主义原则的承认就含有不照办的因素。

勃列日涅夫在支持葛罗米柯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个人动机主要是想在赫尔辛基会议这样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讲坛上参加签署重要的国际文件。他很容易估计到他在宣传上获得的潜在好处，特别是在他自己的国家，当苏联公众获悉他们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战后边界最终确定下来的时候。至于人道主义问题，在国内只需含糊其辞地提一下，不用大肆宣扬。我告诫他在人权问题上可能会出现麻烦。他对此不屑一顾：“你说人权是什么意思？”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处境当然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他们肯定为这个历史性文件所鼓舞。在真理报上登载这一文件本身就赋予它官方文件的重要性。它逐渐成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宣言，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苏联领导人的想象。

347

福特总统的处境完全不同。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在他以总统身份出国访问的活动中，没有一次像他的赫尔辛基之行那样在美国引起如此广泛的误解。他指望国内支持他签署赫尔辛基文件，主要的理由是苏联政府实际上最后是被迫在人权问题上承担重要义务的。此外，作为对西方国家承认战后边界的报答，苏联承认“通过和平方式”改变欧洲国家边界的合法性，从而保留了德国重新统一的可能性。福特政府从未把这些向美国人民讲清楚，而他的反对者则利用了公众对此问题的模糊认识。

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于1975年8月1日签署，事实证明它在引发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漫长而艰难的自由化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进程最后导致这些国家产生了有助于结束冷战的根本性变化。

在会议期间，勃列日涅夫和福特两度会晤，主要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苏联方面认为在确定最高级会谈和勃列日涅夫访美的日期前就此问题达成协议是至关重要的。当他们就要离开赫尔辛基时，勃列日涅夫一时冲动，把福特拉到一边，表示希望福特竞选总统并能够获胜。这就是为什么9月在加利福尼亚两次发生试

图刺杀总统的行动引起莫斯科关注的原因。不仅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发了一封急电对刺杀未遂表示庆幸,而且苏联领导人的保安措施也加强了。勃列日涅夫的高级轿车加固到不仅能经受炮火,而且能经受反坦克导弹攻击的程度。

通往最高级会谈的艰难道路

基辛格和总统本来已经预见到最后文件将在保守派圈子里遇到麻烦,但权衡利弊之后,他们认为签署文件对国内政策有利,对福特的竞选也有利。所以当得到新闻界支持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攻击赫尔辛基文件和福特本人签署了这个文件时,白宫和基辛格感到措手不及。美国的右翼团体,特别是东欧的政治流亡者组织,无情地批评了福特。罗纳德·里根和参议员杰克逊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国会也表示不满。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推测基辛格插手了赫尔辛基会议,虽然我可以证明他对这次会议根本没有热情。这些批评基本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即通过福特,美国正式同意欧洲的分裂,把东欧让与苏联,简单地说就是对欧洲实行“雅尔塔划分”,这个划分据说是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阶段一致同意的。

348

福特政府被指责为对莫斯科过分宽容,对国际共产主义也是如此。他们指责缓和对苏联而不是对美国有利,因为它将战后欧洲边界固定下来并确认了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保守派也没有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发现任何好处,于是他们指控福特政府在这方面“过分顺从俄国人”。自由派则指责福特政府在捍卫人道主义问题上,特别是在犹太人移居国外问题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困难处境问题上过于软弱。两派人士都强烈抗议福特在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逐出苏联和移居美国后拒绝接见他。甚至向苏联出售谷物也成为反苏活动的对象,其理由是这样做尽管有利于美国农场主,但也会减少国内供应,使美国消费者付出高价。

白宫对这种抗议极为关注，总统为此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基辛格说大多数人都将这种抗议归结于选举政治，但总统仍然相信缓和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为了缓和，在大选中出现必然会发生的斗争也是值得的。我认为基辛格对复杂的国内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但对我们来说，主要的问题是福特政府是否真正能够在竞选更加激烈、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日益增加时抵制住使苏美关系向右转的诱惑。

我向莫斯科报告情况时敦促他们确定新的最高级会谈的日期，我们迟迟没有确定日期已经使白宫和总统感到恼火。而且我们也该考虑在总是很棘手的总统竞选期间怎样处理与华盛顿的关系了。

我的报告在政治局得到了讨论，并促使它对最高级会谈的日期作了更加明确的答复。他们考虑到苏联计划在1976年2月召开新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而对于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本人来说，到那时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是重要的。政治局希望与福特的会晤将会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于是我在8月13日转达了勃列日涅夫建议在11月下旬或12月上半月访问美国的信息。福特马上建议将会谈时间定在11月15日或12月16日。

349 但是通往最高级会谈的道路十分艰难。中东仍然是莫斯科与华盛顿争夺的对象；美国把苏联撇在一边，独自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进行调停，促成了一项以色列从西奈部分撤军的协议，勃列日涅夫与葛罗米柯对此大发雷霆。有关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也在“重型洲际弹道导弹”——例如我们的 SS-18 导弹——的定义上遇到了新的麻烦。

军事技术的发展走在了外交的前面，新的复杂问题在谈判中不断出现。巡航导弹在美国发展得很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导弹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进攻型战略武器。它可以携带核武器从雷达难以测到的低空非常精确地飞向目标。右派人士和军方希望大规模部署巡航导弹将使美国在战略武器方面重新夺得优势。所以苏

联方面开始要求限制这种导弹的生产,并将它们纳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规定的数量之内。

苏联正在制造一种新的轰炸机(北约给它取的绰号叫“逆火式”)。苏联方面声称它是一种中程飞机,因为它不能飞抵美国领土。美国人争辩说,如果在空中加油,它就成为可以打击美国的远程轰炸机,因此应该将它包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规定的限额之内。自然,正如基辛格很久之后承认的那样,美国反对裁军的人对这种远程潜力故意大肆渲染。但实际情况是苏联没有空中加油机,而这些飞机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

既然达成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用意在于使最高级会谈获得成功,因此没有前者也就无所谓后者。尽管福特相信最高级会谈本身就有助于他的竞选活动,但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光进行会谈是不行的。他前两次参加的最高级会谈都富有成果。他需要与美国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献给我们将在第二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显然符合他的这种愿望,但美国人却在设置一个新的障碍。

10月初,基辛格又施加了新的压力,他告诉我福特政府认为,由于某种“未说明的原因”,勃列日涅夫似乎倾向于把他的访美推迟到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或甚至推迟到次年11月美国大选以后。我回答说,我们的立场一贯是清楚的:必须在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签署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个谅解在几乎一年前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晤中就达成了。

10月7日,在白宫为苏美贸易和经济委员会成员举行的招待会上,总统把我拉到一边,又谈起基辛格讲过的话题。他说苏美关系常常出现周期性的起伏,现在正步入大选前的“困难时期”。反苏院外活动集团控制的大众传媒正在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苏联的移民外问题和人权问题。福特说,他本人作为总统有时候得到的宣传报道还不如安德烈·萨哈罗夫以及其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得到的多,持不同政见运动正在被美国那些反对改善两国关系的人所利

350

用。这些人影响很大，他们既有金钱又有机会，因此能最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他从自己作为总统和候选人的经历中认识到不能小瞧这些人，这意味着他不得不采取小心谨慎的策略。

福特说他希望莫斯科理解这一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有许多反对者，其中包括五角大楼。他说那就是为什么苏联一定不能一口回绝美国最近提出的建议的原因。总统说：“让勃列日涅夫给我点什么吧，至少给我点儿具有积极影响的东西，以便使我们能继续用一种建设性的而不是完全悲观的调子进行对话。”

但是莫斯科并不愿意答应这个要求。苏联领导人正受到我国军方的强大压力，他们要求对美国的巡航导弹做出限制。同时苏联领导人低估了国内因素对美国总统的重要性。莫斯科相信来自华盛顿的所有要求只有一个目的——逼迫苏联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苏联领导人也没有注意我们关于政府内部各派存在总统所不能忽视的严重分歧的报告。克里姆林宫深信总统就是老板，他拥有独自作出决定的权力，特别是在他既有愿望又需要达成一项协议的情况下。结果是我们并未试图向总统作善意的表示，而是因袭了固执地拖延争论的旧习惯。我们通常会在最后做出一些让步，但往往错过了时机。我们的让步换来的是因两国领导人不和的加剧而产生的敌意。苏联外交史上留下了很多浪费机会的痕迹。

351 11月初，福特突然宣布对内阁进行重大改组。如同威廉·科尔比被免去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一样，施莱辛格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乔治·布什被从北京调回取代科尔比。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洛克菲勒已被告知，由于右翼的反对，他的名字将从下次大选的党的候选人名单中删掉。他的门徒基辛格失去了他担任的两个职务中的一个，即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一职务由他的副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接任。

从苏美关系、特别是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角度来看，这次内阁改组不是好兆头。基辛格失去了他每天接近总统的机会，又失去了一些有权势的各部门间联合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政策通常是由

这些联合委员会仔细斟酌后制定出来的。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他在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的影响，虽然他仍然是一位主要人物。选举中的政治斗争也影响到了他。右翼人士指责他太迁就莫斯科，自由派则指责他太实用主义，忽视了人权和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因素。在国会，民主党人企图通过为基辛格外交设置障碍来削弱国会所认为的“行政部门对外交政策的垄断”。在内阁内部，福特的亲信圈子中的成员（有些报纸把这个圈子称为“大瀑布的黑手党”）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整他。这不能不对基辛格产生影响。我注意到他变得越来越容易激动，他的行动也比以前更加忙乱和容易引起争议。尽管如此，他仍然是福特政府中主要的缓和鼓吹者。

斯考克罗夫特虽然与基辛格关系密切，但是他在军事问题上的观点更加保守。拉姆斯菲尔德支持五角大楼的政策，强烈反对与苏联达成任何协议，除非美国能够从中获得明显的好处。而且他让福特相信这是他在竞选中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11月中旬，我与斯考克罗夫特再次会谈时首先祝贺他荣任新职。在以前的几次会谈中，他通常态度有点冷淡，但这次我发现他坦诚得多，这也许是他摆脱基辛格长期支配的结果。斯考克罗夫特说他为我们两国政府间接触的减少和两国领导人相互理解的削弱感到忧虑。斯考克罗夫特承认一些情况迫使整个苏美关系集中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一个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因为某些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原因而复杂化。结果我们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令人遗憾地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尽管这一问题非常重要。此外，斯考克罗夫特谨慎地承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在政府内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争执，内阁的改组不但没有使之平息，反而使之愈演愈烈。

我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我已经私下提请葛罗米柯注意把我们将与华盛顿的关系完全集中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的危险。他用惯常的冷冰冰而果断的态度回答说，在下一年2月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缔结一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是我们此时的主要

目标。

于是，外交政策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最高级会谈在我们两国成了国内政治的抵押品，我们两国很快都将为此付出代价。12月9日，我应邀到白宫会晤福特总统。基辛格与斯科克罗夫特也在场。总统交给我一封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要求把基辛格访苏推迟到下一年的1月。只要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疑虑，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的日期就一定会被无限期地推迟。

福特总统试图事先采取行动，以防右翼指责他和基辛格过于匆忙地缔结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他向我解释说，他已经决定等他的新国防部长访问欧洲回国后举行一次正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仔细斟酌美国今后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立场。棘手的问题依然如故，福特的辩解态度并未激起我对在近期达成一项协议的希望。总统继续说，他想让勃列日涅夫知道，尽管存在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和对他在缓和问题上的攻击，他仍然打算继续支持缓和。坦率地说，他的保证听起来并不令人十分信服。

情报战

福特就任总统几个月后，有人从我们大使馆门下偷偷塞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美国的某些权力机构正在采取措施打捞苏联在太平洋沉没的潜水艇。好心人。”我把这件事报告了莫斯科，但是我们的海军不相信能从这样深的海底打捞起潜水艇。于是我于3月29日告诉基辛格，莫斯科对报刊报道在夏威夷附近正在打捞一艘1968年沉没的装备有导弹的苏联潜水艇一事非常关切。这些报道还说有些船员的尸体已经被抛进大海。我说苏联对此不能置之不理；海洋法规定任何国家沉没的战舰仍然是那个国家的财产。我要求对方做出解释，并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打捞活动。

“我的情报对你来说肯定不是新闻，”我对基辛格说，并问他是否能够做出解释。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这个问题已经在

政府内部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他拒绝详细阐述，因为他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几天后，他正式向我保证，打捞苏联潜水艇的工作已经停止，今后也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他说斯考克罗夫特将提供更多的情况。后来斯考克罗夫特给了我一份书面解释：找到6具尸体，其中3具的身份已经辨认出来，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的通常作法是按照军人葬礼的全套礼节将他们安葬。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同时要求进一步提供情况。但美国方面从未对我们做出彻底的解释。

几年后，我们获悉中央情报局订做了一艘特殊船只，表面上是用于海底采矿。这艘船被命名为“挑战者”号，耗资超过3亿美元。它的巨大的水下夹具的真正用途是从1.6万英尺的深海打捞带有导弹和技术文件的苏联潜水艇，并把它放入这艘船里面。苏联海军认为这违反了海洋法：未经战舰所有国政府许可和知晓，不得打捞该战舰。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白宫当然是了解这一切的。福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他就任总统的第二天，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来拜访他，他们要求允许继续打捞潜水艇，尽管有一艘苏联拖网鱼船就在附近。福特命令继续打捞。但在打捞过程中，潜水艇的船体断为两截，只有一截能拉起来。白宫还知道打捞起来的尸体在举行全副军葬仪式后葬入大海，葬礼用摄影机完整地拍摄下来。只是在冷战结束后，这部影片才转交给我国政府。

基辛格在4月份提出了“一个高度机密而又微妙的问题”，即后来被称为散布虚假政治消息的问题。他说，尽管他们不反对我作为大使与华盛顿的政界人物、包括反对派代表会晤，但莫斯科派遣一些身份特殊的非官方秘使在与美国人，特别是反对派人士进行交谈，在交谈中批评美国政府，建议这些人与他们建立密切的联系，并讨论现政府时期苏美关系的状况，这又是另一回事。基辛格说这样做只会对总统的反对者有利，总统希望这件事引起勃列日涅夫

本人的注意。

354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这些事基本上和两类人有关。第一类人是到美国做正常短期旅行的科学家、学者、记者和其他一些人。他们与各种人接触，表达自己对苏美关系的观点，有时他们的观点是批评性的。他们回国以后，将他们的印象和了解的情况向他们的官方资助机构外交部汇报。他们这样做有时是出于自愿，有时是我国外交机构需求的结果。由于缺乏外交经验及对我们谈判的细节不了解，他们往往在与美国人的谈话中即兴发挥，以便给对方留下自己并非等闲之辈的印象。外交关系专业的学者和教授往往如此。结果他们在华盛顿做出的不足以称道的表演往往是弊多利少。

另一类是直接被苏联情报机关利用的人，如记者维克多·路易斯。他是个可疑人物，基辛格曾特别提到过他。路易斯访问华盛顿时，没有与我们的大使馆接触，我也从未在美国和苏联见过他。路易斯及其同伙在西方独自搜集情报时往往表现出一副比苏联外交官更为了解克里姆林宫内幕的样子。

我有一次回莫斯科旅行时曾提请葛罗米柯注意这个问题。他生气地说：“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这种愚蠢的即兴表演的支持者。”我意识到他不愿与情报部门争吵。于是我亲自去找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向他说明这个情况。向美国派遣令人讨厌的人员的做法停止了，苏联公民被告诫避免谈论国内的争执和直率地批评外国政府，尤其是访问美国的时候。

与其他人一样，大使们在国内也有个人的对手、敌人和对他心怀嫉妒的人，我也不例外。对于在我国政府和官僚机构中工作的人们来说，我的职位非常显赫。他们知道我是一个活跃的大使，在美国有许多朋友和熟人。我和我妻子还到处旅行。这一切在苏联大使中是不寻常的。他们大多数宁愿呆在大使馆内，过一种比较宁静的生活。于是，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克格勃和外交部里时不时有些传言，说我太“美国化”。至少可以说在苏联这并不是一个奉承的字眼。这件事提醒我得谨慎点。但在这方面我的主要有利条件是：我

是中央委员，作为驻华盛顿大使，我与国内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党的总书记、总理和许多部长都很熟，其中包括克格勃和国防部的负责人，当然还有外交部长。

接连几任克格勃驻华盛顿官员都知道我认识莫斯科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那些管理克格勃对外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我回莫斯科时，安德罗波夫会邀请我进行持续两三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的无拘无束的交谈。他重视我对美国的看法，愿意倾听非正统的意见。我在任大使期间还与其他克格勃首脑进行过广泛的交谈。他们是：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维克多·切布里科夫、弗拉基米尔·克鲁切柯夫。但维塔利·费多尔丘克除外，他从乌克兰调来接替安德罗波夫的职务。费多尔丘克是勃列日涅夫的门徒，愚蠢而傲慢，后来被切布里科夫取代。

我比克格勃驻美国官员更了解美国，通常我获得的政治情报质量更高，他们也清楚这一点。他们搜集的往往是谣传和道听途说，而他们知道我是通过秘密渠道获得情报的。我或许会告诉克格勃官员他的情报完全是错误的。我没心要透露我的情报来源，说这或那是从总统或国务卿处听来的。他们知道我与谁打交道，因此不愿意在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与我的观点相左。我也会将我发往莫斯科的电报的内容扼要地告诉他们，以便使出自同一大使馆的政治评估的差别不致太大。我们不时在一起讨论与苏美关系有关的外交和内政问题。我也不时建议他们核实他们的情报，或者在我对情报没有把握时要他们附上一句“这份情报有待进一步证实”的话。

355

在许多苏联驻外使馆中，大使与克格勃官员的个人关系都不正常，只有个别使馆例外。克格勃官员不但有自己单独与莫斯科联络的密码通讯网，而且在向莫斯科提供情报方面常常与大使进行激烈的竞争。也有不称职、放肆的吹嘘、试图显示谁实际领导使馆的情况。总的来说，这种行为并不能证明那些卷入这些低级俗气的争吵的人有巨大的才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干

预使馆内部的争吵,甚至召回大使或克格勃官员。我和派驻我们使馆的好几位克格勃官员共过事,在我的大使任内一共有6位,我与他们相处得很正常。我是高级别大使以及莫斯科了解我只是没有发生冲突和摩擦的部分原因。我们的权限划分得很清楚,从来没有出现过重迭。当克格勃官员通过他们在华盛顿的渠道获得重要政治情报时,他们总会告诉我,或常常就情报是否可信向我咨询。而我本人也从不干预他们的情报工作日常事务。他们也不会向我通报他们的具体行动和特工人员的情况,我对此也不感兴趣,因为那是我职责范围之外的事。只有在他们的情报活动暴露,涉及到两国政府时,或可能要发生这样事情时,我才会处理这些事。由于政府或政治局介入,克格勃官员就必须向我提出报告。例如,在最高级互访期间,我通常建议莫斯科命令暂时停止情报活动,以防止发生公共丑闻的可能性。据我所知,他们照办了。

可是我们与我们的情报官员之间确实出现过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极不寻常,以致引起了当时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这样地位的人的注意。他想知道美国人为什么常常能够辨认出大使馆中的哪些官员是克格勃的人。我坦率地告诉他,有几个明白无误的标志暴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

356 “这些标志是什么?”安德罗波夫立刻问道。

第一,克格勃官员在华盛顿寓所的租金比外交部官员的更昂贵。外交部官员不会在家里举行官方招待会,因为完全没有拨出那笔经费。其次,所有的克格勃工作人员,甚至外交级别最低的都配备有由克格勃付费的私人小汽车。外交部官员,甚至最高级别的官员只可以随时使用大使馆的小汽车,因为外交部没有拨出购买个人小汽车的经费。第三,大使馆官员邀请一位外国人在饭馆就餐时,每餐的全部费用限于20至25美元,这是大使馆可以报销的最高数额。帐单的其余部分只能由他们自己掏腰包。因此大使馆官员在选择饭馆和点菜方面通常比较谨慎,克格勃官员则不然,他们的帐单可以全部报销。第四,外交部的职员在工作时间按时上班干本职

工作,而克格勃官员则花大量时间在城里到处逛。第五,美国国务院通过就具体问题进行的日常工作接触已经认识了使馆工作人员,因此知道他们当中每个人的业务专长。但是克格勃特工人员没有在任何问题上显示出专门的知识,而是对一切都感兴趣。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其中一个使我们在外交部门工作的也知道谁是谁。在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克格勃人员多半保持沉默,不参加一般的讨论,这使他们有别于其他外交人员。

安德罗波夫显然对此很感兴趣,并且说他一定会认真加以考虑。我不知道他实际上做了些什么,但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没有人提到他下达了任何命令,但我毫不怀疑他一定这样做了。在私人小汽车、条件更方便的寓所、饭馆帐单报销和类似的业务开支等许多方面,外交官的待遇提高到了克格勃官员的水平。我国的驻外大使们很久之前就向葛罗米柯提出过其中许多问题,但他置之不理,说外交部必须节约硬通货。然而,安德罗波夫显然想办法让政治局相信这样的问题值得认真注意。

相互指责对方搞间谍活动的事被新闻媒介广为宣传,这是引起双方恼怒的一个长期根源。基辛格和我私下讨论过这个敏感问题,他说他已得到授权,建议双方都不要将间谍案公诸于世。他说美国准备私下派代表处理证据确凿的间谍事件以及纯粹的误会,必要时将不动声色地召回涉嫌者。为了避免向新闻界走漏消息,他将亲自与苏联大使讨论这类情况。我表示苏联方面肯定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几天后,基辛格向我通报,总统给联邦调查局局长下达书面指示,规定他的公开讲话中只要涉及到对苏关系都要经总统或国务卿事先批准。基辛格说公务员中纪律日趋松懈,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认为福特是合法总统,因为他不是选举产生的。因此政府不得不加强纪律。莫斯科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保证了双方能够比较严格地长期坚持这种秘密而又严厉的规定。

357

双方情报部门进行的情报战的一个更令人惊恐的方面在11月下旬显露出来了。当时基辛格告诉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夫被怀疑患了白血病,可能是长期遭受莫斯科大使馆内电磁辐射的结果。美国专家推测这种辐射与窃听、破译密电码或干扰大使馆的信息有关。基辛格说如果大使的病被公开,这件事可能成为一大丑闻。因此美国政府要求苏联政府停止辐射。

358 莫斯科指示我否认基辛格所说美国大使馆正在遭受蓄意辐射的指控。我说我们进行了彻底的调查,确定大使馆周围的电磁场没有超过苏联的卫生标准,苏联的标准比美国的低得多。

多年后我才了解到产生辐射的真正原因是克格勃试图干扰美国情报机构的电子谍报活动。美国情报机构以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为基地窃听重要的官方电话和无线电对话,并且把大部分窃听到的信号还原和破译。双方的情报机构都试图抵消对方的努力,因此两国多次以不同借口提出外交抗议和反抗议。事情闹到最高层,福特在美国情报机构的压力下要求苏联方面立即停止电磁辐射,但勃列日涅夫回答说美国大使馆附近的电磁场是由工业引起的,对健康没有危害。苏联建议进行联合调查,但美国人拒绝了。一个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国特别医疗队用两年时间研究从1954年到1976年间曾驻莫斯科的近5000名外交官员及其家属的病历,发现电磁场对他们的健康没有影响。卡特政府时期,国务院私下把这个情况通报给我们。同时双方都不动声色地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

公正地说,我应该补充说明我们在华盛顿的大使馆也面临过同样的情况。但是,当我们的医生告诉我们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时,我们也就不再抱怨了。我本人不断受到喉部和呼吸器官病症的折磨。我们的医生怀疑这是多年在封闭的电子空间工作的结果。我在使馆里的办公室比其他任何办公室的通风条件都差,因为它的四周是夹墙,夹墙之间长期存在磁场。医生们的一再保证听起来当然不错,但谁能够肯定地说两国使馆外交官的健康从长远来说不会

为了冷战而遭到损害呢？

在保护互访的美国或苏联的领导人和官员方面，我们两国的情报机构进行了非常冷静熟练的合作。值得庆幸的是，这种保护从未失手。不仅如此，它们偶尔还就有人可能暗杀正在第三国旅行的高级官员的图谋交换情报。据我所知，我本人就秘密转交了至少两次来自莫斯科的警告。一次是通告有人准备刺杀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另一次是有人在就越南问题举行巴黎和谈期间试图刺杀亨利·基辛格。

但是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相互怀疑和不信任从未完全消除。在美国国务院大楼的第11层楼上，国务卿办公室和一间豪华的接待室通向一个大阳台。国务卿常用这个大阳台来举行夏季鸡尾酒会。从阳台眺望，可以看到波托马克河对岸华盛顿的全景。1986年结束了驻华盛顿大使的工作后，我要求当时的国务卿舒尔茨寄给我一张从那儿拍摄的风景照，作为我多次愉快地在那儿逗留的纪念。这张照片及时寄到了，上面附有亲切而幽默的题词。他后来告诉我这张照片来之不易。美国情报机构反对将它寄给苏联大使，原因据说是它显示了华盛顿中心的战略要点，虽然照片上既没有白宫也没有其他重要的政府建筑物。上面印有更具有战略价值的建筑的明信片在任何一家商店都可以买到。舒尔茨拒绝认真对待这个理由，把照片寄给了我。我把它挂在我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里。

359

第二十一章

姑息右派使福特丢掉了总统宝座

安哥拉

如果说有任何地区冲突的争执使美国人对缓和失望的话，那就是安哥拉。这个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恰好位于非洲凸出部下面，几乎没有几位美国人——俄国人或许更少——听说过这个地方。一向平静无事的安哥拉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拥有祸福相伴的石油。它在1974年4月，里斯本爆发革命，摆脱了萨拉查的独裁统治，安哥拉趁机宣布独立。安哥拉各派此前一直在为推翻殖民统治而战，此时它们反目为仇，开始内战。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诸如意识形态或其他一些根本性分歧留待受过训练的观察家去评判，但有一点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这就是它们名称上的类似：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人运）、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解放全国联盟（安盟）。

人运的领导人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该组织在反对葡萄牙人的斗争期间一直接受我们的援助，但当它转入国内斗争时，援助停止了。然而各派力量很快就开始接受古巴、苏联、南非、美国以及中国的援助。安哥拉成为许多国家实现其国际野心的角斗场，其重要性远远超出其自身所具有的实际价值，对安哥拉不幸的人民来说更是如此。虽然这场冲突远未涉及苏美两国的国家利益，但它还是逐渐演变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最尖锐的地区性冲

突之一。此外,它使苏美关系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急剧恶化,并且提出了缓和在我们的彼此关系之外是否还有普遍的约束力,如果有,那它是什么。

1975年12月9日,福特总统在他的办公室与我举行的一次会晤中谈到了所有这些问题。他说他对美国在安哥拉的战略利益并不真正感到关切,但是那里发生的事正受到美国人越来越多的注意,并被传媒大肆宣扬为对缓和政策的考验;他还被指责为在又一个问题上向俄国人屈服。福特说美国的情报机构报告苏联已经建立了一条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通往安哥拉的空中武器补给线,这条补给线正在被用来运送现在已成为人运的主要攻击力量的古巴部队。他说美国已建立了一条类似的空中补给线,为解阵征募雇佣军也并非难事。但是我们两国真有必要在一个如此遥远、对我们任何一方都无特别价值的地方彼此挑战吗?(我承认这个问题提得好。)

因此,福特建议:一、我们联合向安哥拉各派呼吁停止自相残杀的战争,同意实行和平解决;二、我们要求所有有关国家停止通过向安哥拉运送武器对安哥拉进行干涉。基辛格给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外长们带去了类似的信息,但他的话听起来更加咄咄逼人。他警告说,如果苏联继续在远离苏联领土数千英里、与苏联利益无关的地方参与或支持军事行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就将受到损害。

12月18日,勃列日涅夫对福特的建议做出了答复,在安哥拉发生的事情不是内战,而是外国,特别是南非直接进行的军事干涉。他说调停有赖于联合国制止外国的干涉,苏联无意于通过“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对抗”或“对缓和政策的考验”的三棱镜来看待安哥拉事件。

然而,不仅福特政府,而且美国公众也是这样来看待安哥拉事件的。这些事件对苏美关系产生了影响。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多次就此向莫斯科提出警告。那些自认为在道义上正确的人对我们的报告和论据充耳不闻。

12月23日,基辛格再次对苏联在安哥拉所起的作用提出质询,并将其与缓和联系起来。他提出了一个给我们保全面子的建议,即将此事提交非洲统一组织讨论。该组织已经介入此事的调停活动,但未能获得成功。对基辛格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谁将获胜,而是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不应在某个超级大国的外力帮助下取得胜利。

然而,安哥拉内战这时已经成为受自身利益驱动的超级大国间的问题。我们支持的人运在首都卢安达组成了一个过渡政府。看起来他们可能会获胜。于是,我们感到我们在安哥拉的代理人比美国的更具有合法的地位。莫斯科指示我拒绝接受基辛格对苏联的指责,并指控美国和它的特工机构阻挠安哥拉过渡政府的正常运作。莫斯科和华盛顿就这样越来越深地在安哥拉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一恶性循环将在那儿持续许多年。

对于超级大国形象的考虑只是增加了双方的固执,因为双方都感到不能“失去安哥拉”。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基辛格正确地指出,至关重要的是不能让我们两国被曾经给我们带来过难以测算的灾难的超级大国竞争铁律所支配。我也有同感,特别是在安哥拉问题上,可惜为时已晚。

导致苏联卷入安哥拉冒险的重要机构是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该部多年来受党中央书记鲍里斯·波诺马列夫领导。他是我们的首席理论家苏斯洛夫的门徒。通过葡萄牙共产党,国际部很早以前就与安哥拉解放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而且此后一直支持他们。苏联外交部与我们最初卷入安哥拉无关,并对此抱有怀疑态度。但是党的高层领导作出了决定。

当我与波诺马列夫交谈时,他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由:美国在全球各地卷入许多内战,它正忙于巩固其在埃及和其他地方的阵地,并且推翻了智利合法上台的社会主义政府。那么美国人怎么能把我们支持安哥拉新成立的政府视为破坏缓和呢?难道我们必须屈从于美国人的傲慢和双重标准吗?这种观点最终在政治局占据了支配地位。此外,政治局觉得我们必须在非洲举起反对中国的旗

帜，这样才不会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视为在殖民统治结束后的地区无所作为。

虽然克里姆林宫主要将安哥拉问题视为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但是苏联领导人显然低估了古巴势力在安哥拉的存在对美国舆论和政府的心理影响。在美国，古巴是苏联的代理人的神话对我们特别具有破坏性，1962年古巴危机已经使这个神话在美国扎下根来。然而，是古巴人，而不是我们，最先以派遣他们自己的军队支持人运的方式进行干涉，他们自作主张采取行动，并未与我们磋商。古巴与当地的政治集团有联系，菲德尔·卡斯特罗当然喜欢给美国人制造麻烦。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举1986年我以苏联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对古巴进行的一次访问为例。当时我们正试图约束卡斯特罗，以改善我们与美国人的关系。卡斯特罗使我明白，正在安哥拉发生的事情是古巴一手导演的。他说：“那是我的命令。”他想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演员，而干涉安哥拉事务是他实现这个愿望的一种方式。

363

苏联领导人从未考虑过在任何第三国使用古巴部队，但是古巴人以国际团结为借口迅速设法把我们卷进了安哥拉内战。由于党的领导层具有同样的思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可是，支持在安哥拉的古巴人（他们使用的全是苏制武器）正中我们在美国的反对者的下怀，苏美关于安哥拉的对话成了聋子的对话，根本无助于改善我们的关系。

基辛格在1月赴莫斯科讨论打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僵局时还提到了安哥拉问题，但没取得任何进展。“如果基辛格想谈安哥拉，那他和索南菲尔特谈就行了，”勃列日涅夫厉声对询问他的会谈议程的一位美国记者说。基辛格的助手赫尔穆特·索南菲尔特先前已经转达基辛格“希望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安哥拉将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这些话容易使人们误认为安哥拉的军事行动直接受命于莫斯科。

基辛格回国后开始提出将对苏联实行双重政策，其内容据说

是把坚定与妥协、把强大的国防与军备控制结合起来。他还提出了所谓的历史利益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苏联从未在欧洲和亚洲之外拥有任何利益,所以现在也没有。3月,美国政府取消了三次有关贸易、能源和建筑的苏美政府级会谈。美国政府还决定不要求国会为与苏联的贸易和经济关系正常化立法。合作的精神正在消失,这一点在下一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彻底地暴露出来了。

在莫斯科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基辛格发现突出的问题依然是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勃列日涅夫接受了基辛格的主要条件,将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的最远射程定为2500公里,但拒绝接受为陆地和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限定同样的射程。为了求得平等,他想为它们规定较短的射程。美国的巡航导弹可以从它们的陆地和海上发射场打到苏联领土,而美国领土则在我们的巡航导弹的射程之外。勃列日涅夫作出了更多的让步,保证不将逆火式轰炸机用于洲际飞行,并提交了它的所有性能数据。基辛格似乎感到满意。对巡航导弹的限制也达成了妥协,但基辛格警告说,尽管他的立场与福特一致,但并未得到五角大楼的认可,对他说来,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附带条件。

364 果不其然,当他回到华盛顿时,军方领导人反对他在逆火式轰炸机问题上所做的交易。新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正在带头反对签订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1月21日,在白宫举行了一次怒气冲冲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斯考克罗夫特的副手威廉·海兰私下向我透露,这次争论的结果是一切都被破坏了,美国再次陷入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没有始终如一的立场的境地。总统面临着重新制定政策的任务。鉴于他的主要顾问基辛格和拉姆斯菲尔德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这项任务是很难完成的。自从竞选开始以来,福特越来越倾向于听从拉姆斯菲尔德的意见,此人像总统一样是来自中西部的前共和党众议员,与总统在许多事情上持有相同的保守观点。

因此,福特越来越明显地偏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或至少

在大选结束以前将其搁置在一边。由于共和党右翼不断地攻击基辛格，因此不难理解这位国务卿为何会失去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兴趣。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耗费了他许多精力却收效甚微。基辛格在其他国际问题上也遭受了挫折，他甚至在1月向福特递交了一份辞职声明的草稿，但福特说服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然而他的处境仍然不妙。他至少在与苏联有关的两个主要问题上，那安哥拉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受到来自右翼的公开压力。

莫斯科的立场也强硬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苏美合作的基础业已奠定，但他拒不承认安哥拉事件和目前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的困难之间有任何联系。党代会结束时没有采取措施，消除苏联外交政策业已出现的麻烦。不久，勃列日涅夫被提名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并晋升为苏联元帅，恰好在缓和势头开始减弱时，他达到了国内政治权力的顶峰。但苏联领导层中没有人对缓和势头减弱感到担心，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暂时的现象。

将苏联和美国的态度加以比较是很有趣的。3月1日，当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代表大会进入高潮时，福特屈从于里根及其盟友的压力，公开拒绝使用“缓和”这个词，而代之以“实力基础上的和平”这个短语。事情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但不是朝好的方向。

白宫在缓和问题上陷入混乱

365

苏美关系显然无望在选举年取得进展。除了安哥拉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外，还有其他一些麻烦。苏联的移民问题和不同政见者问题仍然在政治上遭到指责。喧闹和谩骂式的围攻宣传、敌意的游行、对苏联外交官及其家属的电话威胁、在苏联民航总局驻华盛顿办公室外面的一次炸弹爆炸迫使福特总统公开谴责“这些无耻的行动”。这一切只能在两国外交官中引起进一步的紧张和焦虑，无助于我们在任何问题上的谈判，而这也许正中美国国内像拉比·卡海因那样一些煽动者和政治恐怖主义者的下怀。美国新闻媒介

的作用特别具有破坏性，敌视苏联的政治家，其中包括杰克逊、里根和其他一些人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它。对于苏联外交官来说，派驻美国破天荒地不再是一种奖赏。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十分不快甚至充满危险。

我乘坐我国政府的飞机从莫斯科飞返华盛顿，计划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停留。空中交通十分繁忙。飞机不得不在指挥塔台指定的高度排队等候降落。突然我们与美国指挥塔台失去了联系。有一两分钟，我们的飞行员不得不费力地盯着云层降落。由于空中挤满了其他飞机，随时都可能发生灾难。我们后来获悉，负责我们飞机的调度员是一个反苏组织的成员。在一瞬间，他的感情压倒了理智，拒绝为我们的飞机导航。那位工作人员后来被解雇了。我们决定让此事不了了之，尽管一些美国朋友建议我们起诉他。我们持克制态度的原因部分在于该国普遍存在着对苏联不友好的情绪。

勃列日涅夫和福特都不可能没注意到两国关系的恶化。他们交换着信件。4月16日，勃列日涅夫在信中写道，美国领导人的“大量言行只能被视为与建立良好关系背道而驰”，特别是通过军事实力谋求和平的新政策更是如此。他警告说，选举因素“并不能成为使苏美关系中好不容易才获得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成果受到损害的理由”。福特答复说，尽管在竞选中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但他请勃列日涅夫记住，只有总统和国务卿才有权对外交政策发表官方声明，他仍然是改善苏美关系的坚定支持者。但他接着又坦率地表示，他关心两国关系的原因在于安哥拉事件和他对美国安全所负有的责任，正如勃列日涅夫对他本国安全负有责任一样。增加军事拨款是美国安全的需要。这些通信清楚地表明，美国的大选对苏美关系的干扰日益增强。

我们驻华盛顿使馆相信，苏联领导层完全知道在美国广泛出现的反苏运动的情况，但是莫斯科在抵销其影响方面几乎无所作为。莫斯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即这些运动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斗争造成的直接结果。因此他们相信只有做巨大的让步

才能让它平息下来。美国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施加压力使莫斯科特别气愤,苏联领导人一直认为这纯属我们的内政。

在美国地方政治中,国际问题常常被用于获取政治上的好处。众议员查尔斯·瓦尼克访问莫斯科后对这座城市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来拜访我时提到了他的斯拉夫血统,并且说他没有先入为主的反苏偏见。但是他坦率地解释说,他与别人联合提出带有歧视性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主要动机是想在拥有许多东欧选民的克利夫兰地区再度当选。他的选民们正在为反对与苏联的谷物交易而游说,但是这一活动在12个盛产谷物的州里没有取得成效。

卢·哈里斯是一位民意测验者。他告诉我,白宫委托他进行的一次秘密的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缓和主要是出于对核对抗的恐惧。他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反对派进行攻击,但如果美国在1976年能够与苏联达成一项重要协议,比方说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达成一项协议,那将会说服千百万美国人支持缓和。另一方面,如果与苏联的关系恶化,那将意味着福特政府的垮台。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百事可乐的董事长唐纳德·肯德尔是一位著名的共和党人,很早就支持和苏联进行贸易和投资。他说他曾与福特谈过选举战略问题,并且批评了他的反苏言论以及过高估计了里根及其保守派支持者的作用。肯德尔说这些人不过是“党内少数人中的少数”。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告诉我,共和党领导人召开的一次会议也提出一项类似的建议,并吩咐福特不要理睬里根,要继续推进他的纲领中的积极方面:没有战争威胁的和平。他说总统答应考虑这项建议,但又坚持说他不能忽视里根。

福特走政治钢丝的企图也在参议院民主党人中激起了批评性反应,这并不令人吃惊,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对军备竞赛感到忧虑。他记得他的哥哥在1960年与尼克松竞选总统期间利用了与苏联之间存在的令人感到可耻的“导弹差距”,发现了一个政治宣传的新“金矿”。他自己的宣传立刻被军事

367

工业联合集团及其保守的政治盟友利用来扩充军备,这种局面因古巴危机进一步加剧并持续了10年之久。爱德华·肯尼迪认为他的哥哥满脑子都是强大的美国的思想,他因此而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强大的美国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应对苏美关系止步不前负责。他担心不签定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就会重犯同样的悲剧性错误。

基辛格本人向我抱怨说,总统被无足轻重的政客和竞选专家所包围,这些人把防止里根的攻击而不是在战争与和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制定进攻性战略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当基辛格于5月10日将福特建议同时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举行签署和平利用核爆炸条约的仪式转达给我之后,这种内部混乱表面化了。勃列日涅夫同意这个建议。但斯考克罗夫特以福特的名义紧急要求推迟举行仪式的日期。斯考克罗夫特说,总统“没有过多地玩弄外交手腕”就不得不很难堪地承认,举行这一仪式的政治时机不好。里根刚刚在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初选中获胜,如果他再在福特的家乡密歇根州获胜,结果可能会是决定性的。福特的国内政策顾问们请求他推迟签署这项协议,而以基辛格为首的对外政策顾问则相信签署这一协议会增加他的当选机会。斯考克罗夫特说,福特“在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犹豫之后”同意了国内政策顾问们的意见。5月20日,福特又一次为“令人难堪的局面”道歉,再度要求推迟。正如斯考克罗夫特所说:“我们的外交政策以及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在8月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前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条约最终在5月28日才得到签署。

亨利·基辛格的临别之言

6月中旬,基辛格邀请我与他会谈。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讨论,只不过想非正式地谈谈“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那一年中回顾我们的长期关系的几次谈话之一。我已经知道他有点心情

沮丧,部分原因在他被迫无所事事,这不符合他的天性。两周前他向我抱怨说,福特劝阻他不要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抨击里根。在其保守的顾问们的压力下,福特还迫使他的国务卿取消了在加利福尼亚的两次重要演讲。于是基辛格决定从总统选举中脱身。“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他说。

此刻他的脑子里在进行着哲学思考。他说,不管谁在明年上台执政,他的谈判政策仍将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尽管有些问题仍难以解决。卡特执政的第一年也许会显得比福特更艰难,不是因为他的反苏偏见,而是因为卡特缺乏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并倾向于把它们过分简单化。他估计卡特要花4到6个月的时间来把握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关系。

基辛格特别提到卡特具有浸礼会牧师的气质,这意味着他也许会沉迷于在人权问题上进行说教而没有意识到这会被苏联视为干涉。然而基辛格无法预测卡特的政策与福特的政策有什么重大差别,虽然他似乎比福特更有生气,更独立自主。(顺便说一句,甚至在大选以前,卡特就私下向基辛格请教,如果民主党获胜,他建议谁当自己的继任人。基辛格告诉我,他试图做的一件事是劝阻卡特任命其顾问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为国务卿,因为他发现这位波兰出生的教授过于感情用事,不能以长远的观点冷静地思考问题。)

10月29日,即大选前几天,基辛格邀请我去他那里“回顾一下”自1969年他开始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来两国关系总的状况及其哲学基础。他称这段时期为“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但目前由于大选而降至最低点。他说两国关系的倒退始于1974年,当时国会拒绝给予苏联贸易最惠国待遇。从那时起,苏联的犹太人移民问题促使美国犹太人领袖几乎在苏美关系的所有问题上对苏联持强烈反对态度。这些事反过来又影响到两国的新闻媒介和舆论。我同意他的看法,莫斯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不仅不公正,而且非常愚笨。

他还例举了导致两国关系倒退的其他因素。“是苏联,而不是

中国”在准备起草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期间和协定刚刚签署后向北越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使北越人得以在南方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并葬送了他谈成的协定。然后是安哥拉事件,基辛格将其诠释为苏联蓄意想打破与美国的全球力量平衡,苏联的行动使美国舆论很容易就接受了反对缓和的观点。他声称我们制定的政策是为了伤害美国,甚至伤害基辛格本人(这不是真的)。

我回答说,在某些方面他也许是对的,但是将苏美关系几乎机械地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所有失败联系起来是不明智的,有些失败是由基辛格自己的失误引起的。说:“我们不是圣人,但美国人也不是。”

基辛格用一种抚慰的口吻说,他的话应该被理解为“有关历史的简短的离题话”,他只是坦率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为了争论,虽然许多美国人持有与他相同的想法。

我感到这位智力超群的人处于一种迷惘和焦虑状态中:大选的结果及大选后的情况都让人捉摸不透。福特落选后的第二天,我们再次相遇,他似乎第一次对大选持超脱态度,并且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情。他告诉我,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他内心已经明白福特很可能失败,但仍然下意识地排除这种想法并抱着乐观的希望,“正如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时的情况一样”。

基辛格对福特没有利用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就,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提出强烈批评。他对福特因缺乏深谋远虑和犹豫不决而未能签署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大加责备。他说他确信,如果福特在基辛格从莫斯科带回一项妥协方案后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如果他迫使五角大楼尊重他的意见,那么早在3月份就可以签署协议了。基辛格确信,虽然协议肯定会在竞选中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但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来的话,大多数美国人会支持它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确实是决定美国公众对外交政策态度的主要因素。

接着是决定下一步干什么的时候了。到那时为止,他并未认真

考虑离职后干什么,此刻他仍然未考虑好。他有大量的选择机会,但在他长期担任国务卿一职后,这些选择似乎全都显得乏味而肤浅。他说钱不成问题; he 可以用他的名声来挣钱。问题在于找到一个能使他的精神得到满足的工作。

尽管他在处理与我国的关系时造成了一些波折,并玩弄了一些政治花招,但亨利·基辛格在福特和尼克松政府时期对苏美关系的总的改善,对确立缓和政府都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他作为政治家而取得的一项无可争议的成就,他的国际声誉持久不衰。离开政府后,他仍然像以往那样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他从未丧失他的政治家形象,最重要的是,从未丧失他作为首屈一指的国际事件分析家的地位。

370

莫斯科如何看待福特与卡特的竞选

远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很久,莫斯科就不得不确定对福特和卡特的立场,即对他们是支持、反对还是保持中立。8月22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政治局特别会议,讨论堪萨斯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后的苏美关系。这次代表大会仅仅以1187票支持福特和1070票支持里根的微弱差距提名福特为总统候选人。我向政治局报告了美国总统竞选的情况。人们向我提了许多问题,都是有关大选的结果、候选人的立场以及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会议期间,政治局委员们对美国在福特或卡特当政时将执行什么国内政策不感兴趣。没有人问及他们对国内工人和美国共产党员的立场。他们关心的要点是:两位候选人将采取何种对苏政策?谁的政策中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和军事色彩?谁更倾向于竞争甚至公开的对抗而不是合作?谁更支持缓和?

莫斯科对福特已比较了解。他在任三年给人留下了复杂的印象。他看上去像一个正派人,想与苏联保持更稳定的关系。与此同时,他的主要观点是保守的,易于屈从右派的压力,因而他对苏美

关系持何种立场是难以预测的。

卡特在美国享有比福特更倾向于自由派的名声。从不同渠道获得的一些非官方情报表明,他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感兴趣并在这个领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其中包括大幅度削减战略武器。但另一方面,他又以强烈鼓吹人权和其他人道主义问题著称,他随时准备在这些问题上与我们进行争执,而这样做只会带来麻烦。维护道德的斗士往往会成为危险的政治家。

很难确定倾向两位候选人中的哪一位,最好是在竞选中不偏不倚。不管怎样,外国的干预或者表达我们的偏向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这是我向政治局报告的核心。

371 接下来,会议按照这些思路对这两位候选人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讨论没有得出结论,虽然人们因福特是熟人而有点倾向于他。政治局决定保持中立。它的正式指示要求我们“继续与福特政府保持正常的关系”,同时“与卡特的同事保持接触,如果卡特愿意就与他建立直接联系”。苏联报刊受命“以平静的语调和 not 偏不倚的态度”来报道美国大选。使我们担心的是里根成功地使政治辩论向右转,虽然他没有赢得共和党的提名。外交部于10月12日做出的一份分析报告——它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评论说,总统竞选辩论“产生了一些对我们不利的情况……特别是……两位候选人声明的基调都坚持把保持美国的军事实力作为与苏联打交道的基本前提”。这份报告指出,福特和卡特的外交政策声明“显然反映了美国舆论在苏美关系问题上的某些右翼倾向”,它建议我们继续谋求与华盛顿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同时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动作出坚定的反应。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与勃列日涅夫进行了习惯性的单独会谈。他对美国大选兴趣甚浓,但总是把它看得过分简单。他很生福特的气,指责他没有采取和平候选人的立场反对“蒙昧主义者里根”。勃列日涅夫确信那样将会把“所有正直的美国人”争取过来。他还对安哥拉问题正在被用来反对我们感到气愤,因为他确信“我

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再次试图向他解释美国人是怎样看这些问题的,但我的话没有给总书记留下什么印象,他相信“美国的帝国主义者”完全不会认为他在安哥拉没有不良意图。他并没有像美国人正在世界各地所做的那样试图在安哥拉建立苏联军事基地,而只是在“帮助当地的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简言之,他仍然受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我几乎没有能力改变他的看法。

令人吃惊的是,他仍然确信改善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的必要性,部分原因是他确实钦佩甚至嫉妒美国的生活水平及经济、科技成就。尽管他私下和我说过这一类的话,但他仍然相信未来属于社会主义。他确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在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竞赛中占上风。即便如此,他仍然完全排除了与美国打仗的可能性,因为那将意味着“世界的毁灭”。

这就是为什么我能证实美国有人断言苏联领导人也许一直在策划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完全是无稽之谈。克里姆林宫害怕与美国打仗。缓和苏美关系是勃列日涅夫的真实目标,虽然他并不完全理解为此必须做些什么。他的信条建立在传统的对外交政策的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法”之上的。这种方法甚至把和平的关系都硬塞进对抗的模子里,虽然对抗不一定是在战场上。当试图把国际关系看作是不同的利益的富有成效的妥协时,美国的右翼人士和勃列日涅夫一样难于理解其中的道理。这样,对勃列日涅夫来说,美国仍然是主要对手,因为它竭力破坏苏联国内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秩序,因此缓和是有限度的。

372

福特输掉了大选

大选结束了,两位候选人的政治花招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10月30日深夜,我接到斯考克罗夫特的电话。一批犹太领袖人物向福特递交了一份相当于最后通牒的要求,要他公开表示支持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权利。他们说卡特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向莫斯

科的一群犹太人发电报表示同情。斯考克罗夫特带有歉意地打电话告诉我，福特已经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他要求我们“在未来48小时内保持耐心和谅解，直到这场混乱结束”。他许诺说，11月2日大选结束后一切将“恢复正常”。

他的诺言没有兑现。卡特和福特所获选票分别为4080万和3900万，或51%比48%，卡特并没有获得明显的多数，票数的接近足以使福特和他的一些支持者感到心酸。我相信福特安抚右派的策略未能奏效。这种策略只能使他的国内政策不稳定。福特的国内政策与这个国家在越战后要求削减军费和置身于像安哥拉这样遥远地区的争执之外的情绪背道而驰。但他仍然未能取得把一切赌注都押在里根身上的极端保守派集团的支持，而公众则对他的外交政策感到莫名其妙。他不仅没有利用战争与和平问题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反而对缓和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尽管公众支持缓和，政府却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军事预算，同时大幅度削减了用于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开支。

在我看来，签署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是福特在处理苏美关系事务中最辉煌的时刻。此后，他有两种选择：不顾右翼的反对，将其转变为一项正式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或拒绝这样做，从而抛弃他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的最大成就。然而福特犹豫不决。他在竞选期间安抚右派的决定也许使他付出了失去总统职位的代价。

当福特的总统任期接近尾声时，70岁的勃列日涅夫却正处于他政治权力的顶峰。这位苏联领导人是一个年迈的病人，他开始相信（并非没有得到政治局中他的心腹的支持）苏联国内外政策的一贯正确性，因而没有觉察到有必要对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当时现实需求进行本来能够广泛实施缓和的变革。思想的僵化、意识形态的惰性和缺乏灵活性只能导致苏联政策的严重失败和最终陷入僵局。

外交和谈判一直在苏美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们的质量

取决于许多国内和国际因素。外交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在感觉良好的最高级首脑会谈中将分歧淹没在香槟和伏特加酒之中,也不是在联合公报的官样文章中掩饰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找到既保留各自的看法,又不会对重要的战略关系造成严重损害的途径。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失败了,因为他们彼此对缓和的解释模糊不清,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目标。

第二十二章

吉米·卡特面临的种种矛盾

吉米何许人也？

吉米·卡特在步入白宫开始执掌总统之职时，相对说来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政治经历，他政绩平平，几乎没有主持国家工作的经验，也谈不上什么全国性的声望。一些富于政治幽默的人称这位佐治亚州的州长为“吉米何许人也”。大选前几个月，杰拉尔德·福特仍然相信他能轻取卡特。驻华盛顿的各国外交使节像多数美国选民一样，对卡特那种相对逸出常规的风度和独到的见解与判断力疑惑不解。他看起来没有明确的纲领，而普通的美国人总能在他的演说里发现他们渴望听到的东西。他显然不属于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在他自己的党内也未得到可靠的支持。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奇才，在公开场合的行为公然藐视所有的规范标准。他虽是一个虔诚的洗礼派信徒，但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却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有时“心存欲望”。所有这一切得以广泛流传并引起争议。一言以蔽之，他在美国政治地平线上竖起了一个崭新而非凡的形象。

卡特当选以后，我感到很难预测他将来的行动，因为未知的东西太多了。卡特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受训后服役于核潜水艇精锐部队，因此我深切地希望他凭着军事和技术方面的经验，能成为一个比他在白宫的各位前任更可信赖和更为稳定的伙伴，在限制核武器谈判方面尤其如此。生活证明情形要复杂一些，结果卡特和他

的总统任期充满矛盾,甚至比刚开始所显示的迹象还要严重。许多人还认为他很幼稚。这显然是不对的。我本人敬重卡特及其强烈的精神和道德信念。对于真正的裁军、人权、减灾、环境保护以及适当利用和保护这个地球上所有资源的必要性这样一些全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观念,他公开予以强调,在这方面其他总统没有走得像他这样远。

美国历史学家们说他这届总统任期古怪反常,而在我国他当政时期则被认为是苏美关系史上不幸的一页。我倾向于同意这一评价,尽管一开始他抱有良好的打算,想和苏联发展稳定的关系。他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有许多想法,其中一些确实很不错,但却不具备实施这些想法的能力。他缺乏灵活性。在设法达到最佳目标时,他往往低估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有价值的东西。最异乎寻常的例子发生在裁军这个领域。他谋求大量削减核武器,这是他梦中一只美妙的小鸟,但实际上他却放跑了抓在他手里的小鸟,未能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获得批准。

有时卡特的表现似乎是想刻意证明,政治乃是可能性的艺术这句格言是不对的。他偶尔不过是运气不佳,但更多的时候他却未能发现最为重要的目标,并据以制定其政府的各项政策,然后加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他不明轻重缓急和未能抓住重点,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其主要助手们意见严重分歧。既然他只能依赖一个成分复杂并且很不稳定的联盟,他组成的内阁帮他制定的内外政策就难免充满矛盾。他的政府班子中有一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冷战斗士,如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海军上将;此外,一些稍微温和的人士也在政府里构成一个小圈子,他们是国务卿赛勒斯·万斯、首席军备谈判代表保罗·沃恩克、财政部长W.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

这些矛盾使卡特在总统任内深受其累,危机和麻烦不时发生,

在与苏联的关系方面尤其如此。但他的个人性格同样也是充满矛盾的,在国家事务和个人事情上,他那些保守看法和温和观点交织在一起。美国的国际地位由于这个国家在越南的赌博失败而遭到严重削弱,卡特对外政策的核心就是要恢复美国的国际地位。于是美国政府宣称不仅有必要加强北约军事力量,而且应与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个三角中的各盟国建立更为牢固的关系。卡特加强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切合五角大楼的军事和政治信条,他把苏联当成自己的主要对手和敌人。军事力量被认为是影响国际事务的一个关键性的工具。当卡特就对外事务发表讲话时,我们总能听到布热津斯基的反苏维埃主义的回声。

376 卡特在他就职的最初几天内即提出了人权政策,以将西方的外交政策牢固地置于美国的领导之下。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卡特把它看成是他在美国民权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延续,把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正在确立的新道德标准,与他视为不道德的尼克松、基辛格和福特时期形成对照。在调动国内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和帮助弥合由越南战争与水门事件留下的深深裂缝方面,意识形态的斗争起到了辅助作用。但这主要是以损害苏美关系为代价而实行的。

在所有这些发生的同时,苏联领导层的元老们坚持实行其保守的国内政策,使国家逐渐陷入经济和政治上都停滞不前的境地。早在1977年初,苏美两国及其领导人似乎都想改善双边关系和减少核威胁,但到了1980年初,双方关系达到糟糕的地步,缓和已付诸东流,削减核武器条约在美国未获批准,而且罗纳德·里根当选之后重新使用强烈的冷战语言和重开对抗的道路已经铺好。这在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史上,真是颇富戏剧性的一幕。这一时期苏美关系的详细历史及其主要人物,我不打算在此评说。它就像一个错综复杂而花招迭出的棋局,唯一实质性的不同乃在于,结果对局双方事实上都输掉了这盘棋,而缓和政策亦告灰飞烟灭。

第一次友好的试探

早在卡特当选之前,我就开始从他的支持者和知己那里了解到他将如何处理政务。J.保罗·奥斯汀是一名经济赞助人,也是卡特的家乡乔治亚州最有势力的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长。7月底我应他的邀请参加了一个晚宴。他说卡特想任命他很敬重的迪安·腊斯克做国务卿,但腊斯克断然拒绝,他情愿继续留在佐治亚当他的大学教授。他的第二个可能的候选人是布热津斯基。卡特和布热津斯基都是三边委员会(这是一个由社会各界名流组成的集中处理美国、西欧、日本之间关系的机构)的成员,他们在会议期间彼此日益接近。不过,布热津斯基太爱出风头的个性让卡特越来越感到不安。所以奥斯汀说卡特打算把布热津斯基安排在白宫,让他做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这里他的虚荣心将会有所控制。

此后不久,我出席了戴维·洛克菲勒举行的一个晚宴,布热津斯基也是来宾之一。他很可能带着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在苏联人面前炫耀自己。我们已经了解到,他在西方是一位研究共产主义的主要专家,有着古老的波兰贵族血统,二战后他父亲拒绝携家人一起返回波兰;还知道他的儿子娶了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的侄女。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观点,使他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反共分子。不过他近年来已转向了中间立场。当加入卡特的政府班子的可能性变得明朗时,他甚至开始谈论美苏关系在一些领域所取得的进展。

在晚宴的交谈中,布热津斯基显然在极力避免使用过激的言辞,他的态度十分友好。关于外交政策,他的谈话滔滔不绝而且抽象玄奥,我听完之后表示最好能听到一些更实际的东西,如解释一下福特政府与民主党人在外交政策上,特别是关于苏美关系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区别。布热津斯基特别强调说,卡特将会很容易地贯彻他的外交政策,理由是国会将由他自己党内的成员所控制。

但他没有概括出任何本质性的区别，这时洛克菲勒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指着布热津斯基说：“我已经告诉他，我看不出有什么具体的差别。”

我离开的时候感到，洛克菲勒家的人比这位贵宾给我的印象更深，我觉得他们在玩一场实际上没有风险的政治游戏。无论哪一位候选人获胜，他们都能通过自己所资助的人让其了解他们的观点。谁都知道，副总统内尔逊·洛克菲勒是基辛格的后台老板，而这次，他兄弟戴维这位著名的银行家则大力支持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政府里谋得一个显赫职位。

几天以后，我在埃夫里尔·哈里曼家里又参加了另一个晚宴。哈里曼是一个老资格的民主党人，早就成了卡特的顾问之一。哈里曼特别注重的一件事情是，卡特如果当选，将是第一个受过高等技术教育、尤其是了解核技术的美国总统。在哈里曼看来，这说明了卡特何以对“阻止核战争这个现代的核心问题”有着特别的兴趣。他强调说，卡特并不认为美国在任何一种战略武器上谋求优势乃是何等至关重要，相反，他准备与苏联谈判以达成协议，将双方的这类武器限制在“大致相等”的水准。

哈里曼想在9月份访问莫斯科，会见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然后向卡特汇报。我很快安排了这次访问，他于9月16日至22日出访。勃列日涅夫接见了哈里曼，把他看成一位代表着美国友好意愿的国务活动家，他们一致同意有必要进一步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勃列日涅夫表示，他希望最高级会谈继续发挥有益的作用。

378 在政府交接时期，哈里曼成了卡特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他向卡特作了简要的汇报，卡特声称他对这次莫斯科之行感到满意。哈里曼随后向我转达了卡特的反应。卡特最优先考虑的事是就军备控制与苏联谈判，他对此满怀希望，甚至不惜降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确定的关于战略武器的最高限额。苏联提出在中欧裁减军队和武器，对此卡特很感兴趣并表示赞同。但五角大楼的简报给他的印象却是，苏联已经开始在这一地区投入军事力量，这

使他甚为担忧。

与此同时，莫斯科的政治局对卡特竞选胜利作出了迅速的反应。11月4日，也就是大选后两天，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提交一份备忘录，建议授权我与新当选的总统在就职之前就开始直接对话。葛罗米柯认为，我们特别有必要与一个不同党派的新总统取得联系，因为“在卡特精心制定其对苏政策期间，可能受到美国舆论中的普遍右倾趋势的影响，这种右倾趋势最近正在形成，并且已在这次选举活动中十分明确地显现出来”。他还提议，如果卡特“在行使职权以前就表现出与我们开始事务性对话的兴趣”，那么勃列日涅夫就要以个人名义给他写封信。

政治局马上批准了这一计划，同一天我也接到与卡特建立联系的指示。在乔治敦哈里曼的家里，我通过哈里曼开始着手此事。我在接到指示的当天就去拜访了他，这一天正好是他85岁生日。他看上去气色很好，机警灵敏，并乐于做点事情。几天后，他把卡特的反应告诉了我。卡特很重视苏美关系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指示哈里曼转告我，他认为会见勃列日涅夫对于和平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相信首脑定期举行会晤很起作用，也许可以一年举行一次。但在此之前，他对美国的欧洲盟国领导人提出与他会晤的要求要有所表示，这些人对他在竞选声明中提出的进行更密切接触的建议正在作出反应。显然，卡特首先打算的是恢复美国在北约组织中的影响。但莫斯科不想等得太久，决定继续谋求对话，并且从卡特乐于交换看法的姿态中得到鼓舞。

紧接着我从亨利·基辛格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基辛格在去墨西哥短期休假的途中，于11月20日与卡特长谈了6个小时。谈话在佐治亚普莱恩斯卡特的家里进行，大部分内容与苏美关系有关。谈话一开始，卡特就要这位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详细告诉他，1961年

379

辛格感到，这位当选总统对会见他的苏联对手的前景有些担忧，尽管卡特并没有直接这么说。（结果卡特的圈子里有人散布流言，说莫斯科早早地进行试探，有意让新总统栽跟头。风声甚至传到了勃列日涅夫耳里，他在即将离任的财政部长威廉·西蒙12月初访苏期间特意辟谣，称之为“恶毒的捏造”。）

12月1日，哈里曼带给我一封卡特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信中允诺他一上任就马上行动，议定一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虽然他不受以前那些谈判的约束，他仍会对近两年来所做的一切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卡特希望会谈以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方式来圆满完成。

我不免有点警觉起来，便对哈里曼说，我不理解卡特关于他不受以往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约束的说法，这些谈判过去一直是以美国名义而正式进行的。哈里曼回答说，他也就这一点问过卡特。卡特解释道，他只是想保留一点权利，以便提议进行某些有可能的新考虑或做一些纠正，如果这样做能有助于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时，他尤其需要有这种权利。但不管怎么说，莫斯科还是心存戒意。

不久，为庆祝哈里曼85岁的生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我是宴会上唯一的外宾。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以来的美国权势集团成员济济一堂，许多人发表了演说。哈里曼向客人们致谢，还回忆了他一生中一些最重要的时刻。完全出人意料的是，他情绪激动地呼吁与莫斯科发展友好关系。他说：“苏联领导人也想与美国讲和。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会相信苏联人打算首先发起核攻击。他们也有子孙后代，他们跟我们一样爱自己的孩子们。”

苏联领导层对卡特仍吃不准，要求在我们着手行动时不致有任何误会。为了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使缓和恢复元气，勃列日涅夫于1月18日，也就是卡特就职前两天，在图拉发表了一个演说。他不承认苏联在谋求军事优势，还说苏联甚至不赞成把它作为一个有关原则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政策只不过是保持足够强

大的力量来阻止任何侵略者对苏联发动的进攻(这是我们第一次制定军事力量限度的原则)。他还用我们的措辞给缓和下了个定义:“缓和首先是克服冷战,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向正常和平等状态的转变。缓和就是在谈判桌上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分歧和冲突,而不是采用武力、恐吓和张牙舞爪的方式。缓和是某种考虑他人合法利益的信任和能力。”他发表这一演说的目的是从莫斯科向这位新总统发出一个友好的信号。

卡特的新班子

1977年1月4日,基辛格在国务院他的办公室的一间私人房间里安排了一顿早餐,以会见他的继任者赛勒斯·万斯。我对这个房间甚为熟悉。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一个是就要离任的国务卿,一个是即将上任的国务卿,再加上我这个苏联大使,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见,新闻界对此做了报道。

当时的气氛是轻松友好的。基辛格用诙谐的语调说,他要当着苏联大使的面,把他在苏美关系这个领域所担负的任务移交给新任国务卿,并提几点建议作为告别赠言。

基辛格强调,国务卿与苏联大使之间的秘密渠道,对保持两国的直接对话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把我们不留记录的接触、定期的私下会晤、特别直拨电话等一套既定办法都告诉了万斯。万斯对这些细节显然很有兴趣,他马上表示愿意保持这些做法。我不消说也立即表示同意。万斯提议我们相互直呼其名,就像我和基辛格的交往中所习惯做的一样。不过“亨利”就要被“赛”^①所替代。

基辛格强调,最高级会谈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有着特别的作用。万斯说他和卡特都同意这种观点,他还向我透露:他和卡特甚至讨论过举行会谈的可能日期,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项限

^① 赛(cy)为“赛勒斯”(cyrus)的简称。——译者

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新协议,他声称这个协议在卡特的外交政策中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381 然后万斯把话题转向人权,我们都知道这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是一个具有刺激性的问题。他说,出于自己的良知和宗教信仰,他若干年来一直信奉人道主义的人权观。我回答说,万斯毫无疑问完全拥有个人信仰的权利,但是,如果他的这些观点和信仰被用来影响国与国的关系,特别是导致对我国国内事务的直接干预时,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基辛格打断了我们的话,说他不愿意由于这类事情而导致公开对抗,并敦促万斯注意避免做出这样的事。万斯把这个话题放在了一边,不过他肯定还会旧话重提的。

卡特总统于上任两天后,即1月22日,在白宫接见了各国外交使节。但这次盛大的会见安排得有点非同寻常。各国大使及其夫人走进大厅,总统和他的夫人站在那里依次接见他们。白宫的摄影师们为每位大使及夫人与总统夫妇拍摄合影,供日后让总统在上面题词。每位大使都得到了一张照片作为愉快的纪念。然而这一过程几乎占去了接见的全部时间,因为在华盛顿有130位各国大使和代办。

当我们正准备照相时,总统让我转达他个人对勃列日涅夫的谢意,感谢勃列日涅夫通过非正式渠道祝贺他的当选。他说,“我盼望和总书记进行有效的个人合作”;他还补充道,他希望与我进行个别交谈,不过他先已委托万斯两天后向我转告他的一些看法。

我不禁想起了在白宫与卡特之前的四位总统各自的第一次谈话。他们开始谈话时,都无一例外地提到共同保证进行最高级合作的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这些保证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和转化了。这位新总统并非华盛顿权势集团的一员,我十分了解这一点,而我们国内却对此毫无所知。不用说,我很想看到他上任后事态将如何进展。

1月24日,万斯和我在大使馆我的公寓里共进午餐。他提出在3

月份访问莫斯科，向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当面解释新政府的各项政策，以此作为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第一步。中心议题将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其他一些抑制军备竞赛的措施，我欣然同意这个主意，表示将向勃列日涅夫汇报此事，并建议他加以接受。勃列日涅夫果然这样做了，并将访问日期定在3月28日至31日。

万斯强调说，卡特深信限制和大量削减核武器储量实在甚为必要。他说，卡特的确考虑要在这个方面进行认真削减。例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确定的2400个发射装置的数目可以减少一半，甚至更多。我马上意识到，这将表明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一条崭新的途径；不过，这还不是一个具体的方案，虽然当这个方案终于出现时使军备谈判陷入混乱之中。

这是我与万斯长期打交道的开端。他办事十分内行，有条不紊，始终如一，而且勤勉肯干。他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做到胸有成竹。他和基辛格不一样，尽力避免抛头露面，喜欢办事时不事张扬。他对苏联的态度以及与苏联的谈判都不带偏见。你可以信赖他的话，这在那个错综复杂的年代是很重要的。万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步骤都与总统协调一致，力求毫不走样地实现总统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基辛格那么大的回旋余地。

万斯同时又对自己立场的正确性坚信不移，这导致他在1980年主动辞职，因为是年美国为拯救人质对伊朗发动突袭而遭受惨重损失，万斯认为此事与原则有关。这仅仅提高了他的威望和赢得了国内外的尊敬，却使得他在政府里的反对者利用他的正直和良知而捞取好处。他还博得了他的苏联同行们应有的尊敬。在我们见面时，无论是私人交往还是官方会谈，他的行为都无可挑剔，即使美苏两国的立场截然不同，他的一举一动也恰到好处。他从来不使用尖刻的语言以增强修辞效果，在公开场合尤其如此。他是一个乐观、活跃、睿智和平易近人的人，与他的每一次接触，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正式的，都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现在我们仍然不时见面。

1月24日我还见到了布热津斯基,以便更多地了解新政府的骨干成员。卡特政府的道路崎岖不平,但如果认为其原因仅在于万斯与布热津斯基的个性不同,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和反映了某些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占主流地位的情绪和观点。布热津斯基对卡特的政治勇气大加赞许,因为卡特不顾美国军方正在大兴反苏之风,在上任后的第二天就告诉新闻界,他将争取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并采取其他措施抑制核竞赛。布热津斯基当时承认,人们在苏联的军事威胁这个问题上的确过于聒噪不休,这有助于促成公众支持军备竞赛。

与此相关,他不无道理地指出,苏联对其武装力量的实情过分遮掩,因而使总统无法让国会领导人、军方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相信,昂贵的军费实在没有必要,在战略武器方面尤其不必开支过大。但军方却从“最大危险”的论点出发,总是要坚持从最大限度来看待苏联的军事潜力。

布热津斯基打趣地说,当卡特开始查阅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背景材料时,他惊奇地发现,多年来所有的讨论几乎完全基于美国关于双方战略实力的数据,而苏联方面则从未主动提供过任何数字,这是因为克里姆林宫有保密的癖好。他提出,如果我们采纳相互交换军事情报的做法,将会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我与布热津斯基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相互直呼其名,我称他兹比格,他叫我托尔亚)。尽管我们频繁会面,但我跟他的关系不如我与基辛格之间那么有规则。虽然他在观点上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感情丰富而聪明透顶的谈话对象。他喜欢讨论概念性的东西,有时难免不去考虑国际关系中具体的现实问题。他虽然掌握了不少情况,但他不仔细研究苏美谈判的细节,通常也不直接参与谈判。他和基辛格不同,没有去过莫斯科;那是国务卿万斯的事情。我得到的印象是,布热津斯基也断定他自己不是谈判的合适人选,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

批评苏联,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理论家,莫斯科对此十分了解。但不管怎么说,这绝对没有削弱他在苏美关系方面的影响,假使卡特当初不把他作为一个苏联的主要反对者使用,而是赋予他一些职权,在个别问题上与苏联进行具体谈判,就像他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所做的那样,那么他在苏美关系中就能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布热津斯基和我在他的办公室和我国使馆共进早餐时,通常进行非正式的交谈,我们一直沿用这一有效的方式。我和我妻子及我们的孙女一起到他家做过几次客,我们和他的妻子和孩子见过面,他的妻子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雕塑家。我们还下过棋,不过我们对局的战绩却必须当作国家机密对待。

与卡特会谈

在我与万斯和布热津斯基见面后两天,万斯于1月26日交给我一封信。这是美国总统给勃列日涅夫的第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概述了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针。卡特赞同勃列日涅夫在图拉发表的关于裁军的讲话,并申明“我的坚定目标就是彻底销毁核武器”。他列举了可以向这一目标迈进的三个领域。一是迅速达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二是签订及时有效地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三是加倍努力使在中欧均衡裁减常规部队的谈判获得进展。

卡特还谈到了在世界动荡地区共同制止危机的必要性,他特别提到了中东。但他又提醒道,他不会对人类自由和权利漠不关心。他在信的结尾写道,他希望在春天与勃列日涅夫会晤,讨论“我们的分歧和我们的共同利益”。

384

总的说来,卡特的信受到了莫斯科的欢迎,因为它为裁军谈判开辟了良好的前景。同时,他关于人权的声明预示这个问题可能成为经常争论的主题。

2月1日,我应卡特总统的邀请造访白宫。我一个人单独走进了

这间我十分熟悉的椭圆型办公室，卡特看到我没有带任何人记录我们的谈话，感到有点吃惊。但我向他保证，我会准确地将他所有的谈话报告给莫斯科，就像我过去和其他总统谈话时所做的那样。参加我们会谈的有万斯、布热津斯基和国务院官员雷金纳德·巴塞洛缪。

因为苏方只有我一个人，我就轻松地打开了话题，说美方在人数上占明显的优势。我祝贺卡特当选为总统，卡特则很高兴地指出，他来自美国人民中间，只有在这个国家一个普通人才能成为“皇帝”，也就是当上总统。

既然说到了皇帝，我就给他讲了一桩历史轶闻。拿破仑有个元帅叫贝纳多特，被选为瑞典国王。宫廷医生们觉得奇怪的是，当给他检查身体时他从不脱掉衬衫。整个宫廷都对此迷惑不解。直到他死了人们才找到原因，原来在他胸前的皮肤上纹有“杀尽国王”几个字，从注明的日期来看，这是他在法国当革命战士时刺上的。卡特和他的助手们哈哈大笑起来，会谈的气氛于是变得更为轻松了。

卡特开始转入正题，要我转告总书记，他真心诚意地希望改善苏美关系。他说，莫斯科根据以往总统竞选的经验，或许认为他也会忘记自己的很多竞选许诺，但“我想强调的是，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尤其如此。首先他认为，在极大地缓和紧张关系从而得以削减军费开支方面，我们所能做的主要事情是建立相互信任，其办法是双方共同接受一个战略武器的最低水准，刚好保证两国拥有的武器数量足以阻止敌方的进攻，而不是多得让人生畏，担心某一方的军火库只需第一击就能消灭对方。

那么，这些大致的水准会是什么呢？这使我怦然心动，因为新总统的这个声明可能意味着，他的政策与其前任将有很大的不同。后来的结果的确是这样。

卡特回答说，我们双方可以接受“几百个发射装置”这样一个标准，而不是现在的2400个，我们还可以在这个限度内按相应的比例减少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数量。他说他已委托保罗·沃恩克拟

定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的主张。此人曾任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现在是控制军备和裁军署署长。卡特建议我们把逆火式轰炸机和巡航导弹排除在外。但我提醒他注意我们长期以来所表示的反对。

接着，我提出了主要的问题：我们将如何对待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总统会加以拒绝吗？卡特并没有直接回答，只说“新面貌”可能会有好处。这结果证明是一个基本的立场。他主张迅速签订一项不包括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在内的简明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然后他想转向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主要裁减战略军备，把导弹的数量减少到几百枚，特别是削减重型导弹，这种导弹乃是我们军事力量的脊梁。我清楚地告诉总统，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任何背离，都会在将来与苏联的限制军备会谈中引起严重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必须承认，卡特在提出对军备作出如此裁减时固然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但他的这些方案在当时却并不能真正实现。莫斯科觉得卡特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采取了一种浅薄的处理方式，在整个对苏关系方面也是如此。我们赞成逐步地、分阶段地限制核武器，我们还不打算来讨论更大的削减。我们花了12年以上的时间，并且在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后，才接受这一处理办法。

在和我会面前两天，卡特本人就已收到了五角大楼对他的这种处理方式的反对意见。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转交了一份报告，对两国将导弹减至200或250枚作出了分析。这份报告是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同起草的。报告论证说，这样一种低水准将要求对美国的政策作出根本性的改变，还可能给美国的国家安全招致重大风险；在阻挡攻击时，就要求完全依赖对敌国的人口和工业进行报复，而且，在这种总的低水准下，一个或几个小小的“核共同体成员”就可能发挥不适当的国际影响。然而卡特还是决定照自己原来的想法办事。

关于禁止所有的核试验,他也提出了一个同样包罗甚广的建议;即使英国、法国和中国加以反对,苏联和美国也要达成一个两三年内有效的协议,并用以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同意。

386 总统还带头提到了人权问题,要我相信他在竞选中对这个问题是富于诚意的,就像他对待裁军问题一样。因此他希望,如果他改变以往总统的做法,比方说在白宫接见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或者发表声明支持某个苏联人(从他的话中我们知道可能是指安德烈·萨哈罗夫,这位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由于在苏联国内坚持人权立场而获诺贝尔和平奖),我们能够加以理解。他答应不会滥用发表这类声明的权利,因为他意识到这会使我们的关系复杂化,但他出于自己的信仰仍然会不时这么做的。

我便提醒他道,勃列日涅夫曾答应不“为难美国新总统”。末了我说:“总统先生,您已对此甚表赞同,那么就让我们也别为难莫斯科吧。这样肯定会有益于苏美关系的。”

卡特与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说,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强行对抗。这个话题就此搁下不谈了,但它显然还会留在议事日程上,而且确有可能成为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主要痛处——我向莫斯科就是这样汇报的。卡特显然相信,他能将他关于人权的公开言论与美苏关系的所有问题分开,并且不带来任何害处。

在整个会谈中,卡特都很轻松和友好。我第一次见识了他那出了名的微笑,据说这是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所有美国总统中咧嘴露齿最多的笑法。他在所有问题上的专门知识,他那种立即抓住问题要害的本领,他那种想要详细了解最关键问题的明显欲望要胜过福特总统。他还有一个同样明显的欲望,就是提出他自己的独到的新想法,虽然这些想法并非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这就引起了和他谈话的人的警惕,因为在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的谈判中,美国立场的连续性可能受到他这种作风的影响。

我向莫斯科汇报了这次谈话的情况,并建议立即着手与卡特

发展良好的关系；同时我还提醒说，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人权问题上将来会有麻烦。

卡特的改弦更张

在美国，每一届新政府上台，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外交政策的某些变动，卡特政府也不例外。不过，在卡特执政时，高层官员中争议和激烈辩论之多，大概现代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执政时期都难出其右。在他的两个主要助手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之间，这种情形显得尤其突出。这两个人一位是务实稳重的律师，另一位则是精力旺盛和风头甚健的学者；而卡特自己结果又不能下达固定而连贯的指示。这使人联想起俄国诗人伊万·克雷洛夫的一则寓言：一只天鹅、一条狗鱼和一只喇蛄组成了一个不调和的班子。

387

于是，卡特的一些主要顾问们就不断争执，都想总统能听取自己的意见。在这场持续的拔河比赛中，布热津斯基越来越有力地把绳子往自己这头拉过来，驻华盛顿的各国使节对此加以密切注视。也由于这一原因，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摇摆不定，尤以对苏关系为甚。虽然行政部门一致认为，所谓缓和就是“较量加合作”，但实际上，关于在具体某个时候应着重哪个方面却并无一致意见。布热津斯基把全球战略竞争看得至为重要，而万斯却认为，不应因此而掩盖未来可能合作的重要领域。

如果说卡特政府有什么主要障碍的话，那就是他们未能把所有主要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而从中看出其长远意义。卡特和他的顾问们经常凭着一股冲动，抓住一些“热点问题”加以迅速地各个击破，想以此来解决上述主要问题。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或为了安抚有势力的集团，他们有时采取一些但愿能迅速见效的解决办法。毋庸赘言，这种完全缺乏明确的轻重缓急的做法，并不总是能够满足他们自己或国家的长远利益。

莫斯科起初有点迷惑不解，不知卡特在对苏关系上到底作何

打算。从最初阶段他与勃列日涅夫之间活跃的通信联系来看，他的意图似乎是积极而富于建设性的。但是，总不免有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从中插进来，导致种种出人意料的结果，使那些支持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人颇感困惑。卡特政府表示，除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之外，它并不打算将对苏关系作为当务之急，即使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由于卡特背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事情也变得更加困难。

卡特的道德方式极大地损害了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关系，他采取这种方式似乎是有意哗众取宠，旨在获取美国大众的支持，与此同时则毫不在乎它对两国关系所造成的损害。在最初阶段，卡特或许无意使人权问题成为他对莫斯科的政策中一个最富争议的问题。但他的主张是通过大众传媒传播出来的，走的不是传统的外交渠道。我得出的结论是，卡特觉得一场来势汹汹的反苏运动能够在公众关系方面带来很大收获，而又不会从根本上损害与莫斯科的关系，因为我们极为迫切地想要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结果证明这是大谬不然的。

388

然而莫斯科却认为，卡特是在故意干预苏联内政，目的是要瓦解苏联和东欧的现行体制。事实证明卡特是看不到这一层的，他对我们利害所关的问题感觉迟钝，导致了随后的许多齟齬。不论卡特本意如何，他的政策是建立在将缓和与苏联国内情况联系起来的基础上的。这表明他完全背离了以往几届政府所奉行的政策，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他与莫斯科的关系陷于紧张状态。苏联领导层试图通过外交渠道和高层通信与卡特讲明道理，但都白费功夫。苏联方面对卡特的公开批评也于事无补。

美国的一些头面人物开始对美苏关系的恶化表示关注，但卡特出于固执和恼怒，对他们的呼吁置若罔闻。他曾对一位国会议员说，他认为没有必要对勃列日涅夫每次打个喷嚏也表示关注。当然，卡特什么时候愿意，也可以冲着勃列日涅夫打个喷嚏。但他这样又如何能与莫斯科建立长远的关系呢？两个国家正失之交臂。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人权问题

和福特与基辛格时期一样,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仍然是美苏关系中的中心问题,不过,新总统和他的班子决心要弄出一个比其前任更好的条约。基辛格曾于1976年提出建议,美国用削减自己的巡航导弹来换取俄国减少其逆火式轰炸机,卡特不喜欢这个建议,认为这位前国务卿做了一笔很糟糕的买卖,它给巡航导弹施加了太多的限制(不知怎么将空对地巡航导弹算在了战略武器的总数之内),而对逆火式轰炸机的限制则太少。他还认为,这个协议把所有战略武器的最高限度定得太高。于是他觉得,在按照他的大胆方式进行谈判的同时,我们也许同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协定的基础上迅速达成一项协议,以作为一项临时性的措施,不过须将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排除在外。他知道,我们绝对不会同意将美国拥有很大优势的巡航导弹排除在外,然而万斯带到莫斯科的恰恰是这一妥协方案。

布热津斯基觉得苏联外交部是总统新想法的主要反对者,故3月4日卡特通过热线和勃列日涅夫通话表达上述意图时,便绕过了苏联外交部。与此同时,卡特提出了一个新的“全面建议”,对军备进行实质性的削减,还包括全面详细地检查战略轰炸机和多弹头发射器,这事实上改变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框架。苏联的重型导弹数量也将减去一半,大约从300枚降到150枚。卡特的基本方针实际是,美国谋求在苏联**现存的**军备体系中实行实质性的削减,而只对自己**将来的**军备体系做一些无关宏旨的削减,以作为交换。

389

美国行政当局内部有些专家认为,苏联人不会就美方的新建议进行谈判,但白宫对这些反对意见却不屑一顾。和苏联谈不谈得拢,在当时显然不是卡特总统和他主要顾问们(也许万斯除外)感兴趣的衡量尺度。他们期待的是很好的宣传效果,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同苏联进行新的谈判。莫斯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些建议

及其所依据的全部理论。原本就拖延了的谈判又额外延续了两年，到1979年才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的妥协方案。

布热津斯基支持卡特的方式。而保罗·沃恩克这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首席谈判代表在与我私下交谈时则批评卡特，认为总统过于草率，过于心急，想在太短的时间内干成太多的事情，没有考虑到另外一方的利益。万斯和沃恩克都主张逐步进行的办法，可是他们不得不听从卡特的指示。两个主要党派之间和美国政府内部的这种争论，使迅速达成裁军协议化为泡影，也损害了我们与卡特的长期关系。

关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的问题，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是另外两个惹事生非的因素。安德烈·萨哈罗夫写信给卡特，赞扬他的人权政策，卡特随之以私人名义给他回信，并在白宫接见了一些移居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这在克里姆林宫激起了日益强烈的不满。我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卡特真的相信捍卫人权在道义上是正当的（在这方面他的确应当得到这种荣誉），但他把这个问题视为一个便利的宣传武器，在公开场合不断加以使用，其代价是使苏美未能就两国关系中的其他一些主要问题达成协议。他可能是有意这样做，也可能是出于无心。这一政策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双方都是从道义和政治方面出发的。通过最后的分析，我认为，对我们两国的关系，甚至对我们国家的人权事业来说，这种政策是弊大于利的。如果通过秘密渠道施加持久而强大、但基本上是非官方的压力，同时在苏联领导层感兴趣的问题上开展谈判，在这些方面原本可以取得更为成功的进展。

390 2月中旬，我根据政治局拟定的原文发布了一个特别口头照会，愤怒地抗议美国国务院在亚历山大·金兹堡的事情上进行干涉。金兹堡是一个主要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他后来由于经济犯罪而被捕，其罪行是接受国外资助以支持莫斯科一群人根据赫尔辛基协定监视人权问题。我的照会被转到了阿瑟·哈特曼那里，当时

万斯不在华盛顿，他是代理国务卿。哈特曼对我说，他对卡特的正式立场不想作什么补充，但他私下评论道，他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有一种预感，由于卡特政府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实行新的积极支持政策，我们两国的关系会碰到很大的困难。

当时万斯私下里透露，美国政府一心关注持不同政见者的做法，可能影响我们两国的关系，甚至包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他对此感到越来越担忧。在我对万斯重申了我们的立场之后，他甚为不快地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恶性循环。我正式而简洁地回答道：“停止对我国内政的干涉。”我还能说什么呢？这次会谈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两天以后，我与布热津斯基就同一问题进行了会谈。他竭力为卡特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问题的态度进行辩护。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无不自豪地写道，他从一开始即已看出，这一问题是个“绝妙的良机，可使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处于防御地位”。

然而卡特自己却未能意识到，苏联领导人会把他的主张看成对他们国内政治权威的直接挑战，甚至看成是想改变其体制的一种企图。如此一来，一个在苏联领导层看来属于纯粹国内事物的问题，却渗透到了我们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之中。

莫斯科立场坚定

克里姆林宫立即作出的反应是愤慨、恼怒和深为关切。2月底，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这几个政治局最有影响的成员，向其同僚们散发了一份联合备忘录。鉴于万斯预定在3月间访问莫斯科，这份备忘录把卡特近期的信件和公开言论说成是有意“在我们着手谈判之前就试图把他自己对苏美关系基本问题的处理方式强加给我们”。备忘录建议说，克里姆林宫应该向新总统发出信号，让他知道压力是“不能接受的和徒劳的”。这三位部长还对大量削减核导弹充满疑虑，指责

卡特提出这个问题来进行“政治上的蛊惑和宣传”，以强迫苏联作出让步。总之，这份备忘录建议，在美国新政府任期伊始时就对它采取较为强硬的姿态，这在若干年来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中乃是非同寻常的事情。

391

政治局经过仔细讨论之后(出席会议的每一个人都严厉批评卡特关于人权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主张),决定由勃列日涅夫再给卡特发一封私人函件。我于2月27日将这封信交给了万斯。

这封重要的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的发展,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这封信的语气生硬而尖锐。它提醒卡特,“提出一些完全不能接受的建议”而放弃“对待具体的新步骤的协调而现实的办式”,将会阻碍控制军备的进展。信中称卡特的姿态“不具建设性”,并直截了当地问道:“双方大量削减核导弹的主张意义何在?……当万斯国务卿来莫斯科时,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变通的办法。”

这封信对人权问题采取了更为拒斥的态度,指责卡特同时与勃列日涅夫和萨哈罗夫保持通信联系,说这个“变节者(萨哈罗夫)自称是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并反对苏联与美国发展正常而良好的关系。我们并不主张在国际政治的任何一个领域耗竭我们的耐心,包括苏美关系在内。用那样的方式与苏联打交道,乃是此路不通的”。

万斯将信读了两遍。他停了一会儿说,这封信措辞强硬,不过他本人欢迎一位“不搞旁敲侧击”的总书记的直率言词。实际上,万斯承认他不止一次地对总统说过,他处理某些国际问题时过于轻率。他已提醒卡特,不要以为不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他就能达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

“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万斯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事情如此发展,特别是在公众眼里政策的焦点集中在人权问题上,他觉得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希望勃列日涅夫坦率的信函会使总统看事情的态度有所转变。不用说,我并不完全同意这

封信,但我认为总统现在应该收到的恰好是这样的信,这是很有意义的”。

万斯和我达成了相互理解;我们毕竟是行家里手。

布热津斯基的反应则迥然不同。他在回忆录里称这封信“蛮横无理、冷嘲热讽、轻蔑傲慢,甚至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而且据他所说,卡特同意他的看法。在最高领导人的信函往来中,怒气冲冲的辩论在持续进行着。3月4日卡特回复了勃列日涅夫,在交给我的一封信中表明,他的议事日程几乎没有任何变动。把这封信交给我的不是万斯,而是布热津斯基,后者坚决认为此信是积极有益的。

“你现在怎么看?”他问我。

我说,卡特的信对我们解决主要问题没有多大的补益;在我们看来,要解决主要问题,就必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的基础上拟定一个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3月16日,我把勃列日涅夫写给卡特的另一封信交给万斯。信中再次强调了我们在裁军问题上的立场,并对“提出任何超出国家间关系范围的问题的企图”表示拒绝,例如人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快就走进了死胡同。

392

在我回莫斯科为与万斯的会谈做准备之前,我们进行的这些谈话都没有提供和解的实际可能性。布热津斯基转达了总统的意见:他当政的头一年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政治机会以达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对此我当然同意,不过是在什么条件下呢?

同时,万斯以一种极为非官方的方式,向我概略地介绍了有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新设想,他很可能会将这些带到莫斯科。他们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或是签订一个全面的协议,新政府当然倾向于这一方案;或者是达成一项较为有限的协定。这两项建议都意味着严重裁减军备,实质上是以减少苏联导弹为代价的,因为一切大量的削减都在苏方。我提醒万斯,这些建议极有可能遭到拒绝。在万斯将这些建议递交给苏联领导层之前,它们的基本内容就被公布出来,这件事使莫斯科觉得,卡特不过是煞有介事,他只是想取得宣传上的胜利。显而易见,万斯只要坚持这些大量削减的主

张,他去莫斯科的使命在他还没有离开美国之前就注定要失败;而且,我感到他对自己的立场并无多大把握,但他不得不遵照卡特的指示行事。

对一个大使来说,去告诉一位国务卿,他若拒绝一切妥协其莫斯科之行就会失败,这种事是极为少见的;但我在美国已呆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我也知道他在莫斯科将会有什么遭遇。我将我们谈话的情况向莫斯科作了汇报,所以政治局有时间充分地考虑卡特的建议,为我们的答复做准备。

好大喜功的代价

万斯于3月28日至30日访问了莫斯科,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他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问题上遭到了失败。

勃列日涅夫对美国国务卿说:“如果美国打算重提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那么,苏联将再次提出在欧洲的美国前进基地系统和美国向其盟国转让战略武器的问题。美国政府把苏联销毁一半重型陆基导弹作为首要的要求,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393 万斯还有第三种选择,实质上就是原来那两个选择的折中。但当他电告华盛顿建议提出这个方案时,卡特批准了由布热津斯基起草的电文,指示他不要这样做。万斯彻底地泄了气,而卡特也感到受到伤害,内心甚为愤怒,因为他的两种供选择的建议如此之快就遭到了拒绝。双方都不同意发表公开声明和举行记者招待会。万斯之行的失败引起公众极大的关注,并在苏美两方都导致了不信任。对这样一个外交上的灾难又作何解释呢?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此事乃是坐失良机。这也许不错。不过,卡特的那些提议,就其效果而言,意味着与长期形成的谈判进程完全背道而驰,尽管白宫已为此发动了一场宣传运动,但在万斯访苏之前并未通过外交的或秘密的渠道,充分而有耐心地向莫斯科作出解释。苏联领导层已将其威信的赌注下在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

上,把它作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的基础。任何改变这种想法的企图,都会导致苏美关系的破裂;何况当时莫斯科并未准备接受实际削减核武器的主张,只是同意进行某些限制。

我以为,对万斯来说最好的可行方案应该是,把卡特关于同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基础上拟定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意见带给莫斯科,而苏联方面则紧接着发表声明,愿意马上讨论卡特的全面建议。如果按照这一安排,我们或许能早些举行最高级会谈,重新开始最高领导人直接对话,并且消除误会。那样的话,还有可能较早地达成另一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不至于拖到1979年维也纳最高级会谈时方告实现。

然而,糟糕的策略使很好的设想化为了泡影。所有这些切实可行的计划,结果都在卡特当政初期变成了失掉的良机,使苏美关系走上了一条更为困难的道路,两国彼此猜疑,互不信任。更有甚者,新政府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全面性建议,尽管未经深思熟虑,却成为了一种尺度,使批评者们借此来把任何合理和可协商的妥协谴责为对苏联的投降。总统的建议具有明显的诚意,但过于冲动和激进,它给后来的裁军谈判造成了许多额外的麻烦。卡特本人则公开地押上自己的个人威望,这样做实无必要。他的战术是速战速决和好大喜功,这证明是不成功的。

克里姆林宫原本希望,基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各项安排而尽早签定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从而巩固在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时期所取得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保持苏美关系连续性,但卡特的计划打破了这一希望。卡特拒绝接受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各项协议,这使勃列日涅夫在心理上深感震动。其实他早该想到,即便他同意卡特的主张,要重新弄出一套控制军备的方案,在政治上乃是不可能的。不要忘记,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曾在苏联领导层内部引起争论,当时勃列日涅夫如果不是警告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他准备在政治局与他一决高低,他就很难取胜。由于曾发生这种事

情，勃列日涅夫当然不可能为了卡特某些甚至更为激进的建议而再次损害苏联的军事实力。

在万斯离开莫斯科的当天，勃列日涅夫召集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的议程只有一项，那就是如何与卡特政府打交道。苏联领导人对万斯之行的失败并不感到吃惊。我以为，卡特也未觉得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在日记里写道，在万斯离开莫斯科之前他已得知，勃列日涅夫觉得他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最新建议是“有意让人难以接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让万斯把这些建议带到莫斯科去呢？

“破镜重圆”的尝试

苏美双方愤怒的言词满天飞，在这种情势下，勃列日涅夫于万斯离开莫斯科的当天召集了政治局会议。苏联所做的事情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卡特当局有意运用一种激怒疗法。政治局会议只有一个议题：现在我们该如何与卡特政府打交道。在这次教训之后，下一次将会是什么？我们的政策的主要方针，依然是竭尽全力恢复良好关系与缓和气氛——首先是要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但最重要的是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以免华盛顿的敌视情绪变得强硬起来。因此政治局会议决定，勃列日涅夫写信给卡特表示安慰，并在信中发出共同努力以解决我们的复杂问题的呼吁。

4月4日我拜访了万斯，带去了勃列日涅夫给卡特的一封信，信中欢迎卡特提出具体的建议，表示他“坚决相信，即使是在解决我们两国关系中最复杂的问题方面，也决无可能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我在交谈中发现，莫斯科之行的失败仍深深地影响着万斯。由于我有在华盛顿与另外几届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他于是问我个人对苏美关系的现状有何看法。我告诉他，坦率地说，这是近10年来令人最不满意的事情；苏联领导层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努力与新总

统建立良好关系,但不到3个月时间,卡特政府竟弄到这一步田地,伤害了与他们的关系。我问万斯,总统是否真的相信,苏联领导人一定会接受他带去莫斯科的有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建议。

万斯试图证明卡特的方式是正确的,说总统一直渴望对话,或许还希望在两个选择之间有个妥协。但当苏方否定这两个选择时,总统和万斯本人便大吃一惊,他的代表团也“深为震动”。他们原来只预料到,苏方在审查他们的提议时会很挑剔,但完全没有想到,总书记几乎没作任何解释就断然加以拒绝。万斯谈到,卡特深为苏方的拒绝所震动,他失去了冷静,把国会领导人召集拢来,想在万斯离开莫斯科之前就发表一个感情用事的声明。当万斯回到美国时,他已经平静下来。

万斯在我们的谈话结束时重申,他会于5月在日内瓦继续与葛罗米柯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问题(这是他访问莫斯科期间所议定的),并表示他希望还能讨论中东问题。从整体上看,美国政府似乎正在寻找一条路以走出他们自己跑进的死胡同,或者说,至少万斯本人是这么看问题的。

除此之外,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与总统和其他一些官员频繁会面,我发现美国政府在处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正在进行某些改变。我感到美方对回到不公开的外交方式——秘密渠道——的兴趣日益浓厚,这种方式就是进行定期的、非正式的和非公开的接触。似乎人们已经默认,卡特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的公开性方式是走不通的,基辛格的方法反而值得一试。

4月12日,卡特总统邀请我到白宫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他显然想回避万斯访苏一事,只打算讨论如何在数月之内就达成一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他不知我们是否应该在日内瓦重新开始谈判。我回答说,只要最高层在原则上未能相互理解,由裁军专家们组成的代表团不大可能挽回局面。总统接着问,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根本没有讨论美方的建议,为什么就加以拒绝呢?

我答道,苏联领导层深信,美国的建议不可能为我们共同接受的协议提供任何基础,因为在准备这些建议时并未考虑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无疑只会给美国带来好处。卡特要我使勃列日涅夫确信,他决不想搞欺骗以使美国获得利益。他唯一的想法是就广范的问题开始交换意见,首先在核武器的数量上切实进行大量削减,这乃是他的真诚志向。

396

第二天,我在白宫见到了布热津斯基,我们的谈话相当紧张。他看起来似乎是万斯带到莫斯科去的那些建议的主要提出者。他激烈地争辩道,当苏方未作详细解释就断然拒绝美国的建议以后,要进行谈判是有困难的。我们围绕有关这些建议的种种老生常谈的争论点纠缠不清。当时我问他,在他看来,为苏美关系的未来可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厉声说出了他独特的答复:“学会在不断分歧的环境中生活。”

然而,公众对万斯访苏使命失败的反应却不利于卡特政府。卡特本人受到来自美国盟国的压力,它们要求提供更大的帮助。与莫斯科恢复接触的唯一途径,就是卡特与勃列日涅夫尽早举行最高级会谈。卡特在他与勃列日涅夫的私人通信中反复提到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另一条途径应当是重新利用秘密渠道。

在万斯访苏失败之后,我按莫斯科的指示与万斯和沃恩克作了不公开的见面,其原因即在于此。事实上这些会见就是谈判,使我们在4月底制定了一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新方案。这一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揽子方案,经过日内瓦和华盛顿的多次会谈后,最终得到了葛罗米柯和万斯的赞同。卡特本人参加了在华盛顿的会谈。

这些艰苦的谈判得以继续下来,乃是万斯、布热津斯基、沃恩克和我之间通过秘密渠道不断交换意见的结果,虽然这一渠道已经不如从前那样有效了。与谈判相伴随的是美国和大西洋两岸的激烈辩论。在苏美两个核心战略集团间的平衡之外,美国的盟国提出了欧洲核均势的问题。一般说来,欧洲人的举动甚为反复无常。无论何时苏美谈判进展变得缓慢,他们就批评莫斯科和华盛

顿；而一旦出现达成协议的可能前景时，他们又担心被撇在一边。

美国对其盟国的呼吁并未置若罔闻。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制定计划，打算在西欧几个国家部署陆基巡航导弹，其中包括西德。这给苏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造成了新的困难。此后不久，美国很快成功地进行了“潘兴2号”的首次试发，这是一种新的中程导弹。这种导弹如果部署在欧洲，只需8至10分钟即可击中苏联目标，而从美国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要打到苏联则需25到35分钟。

新一轮危险的军备竞赛开始了。

在莫斯科会议之后，我应亨利·基辛格之邀和他见面。我几乎能感觉到，他个人对卡特在裁军方面的失败有些快意。基辛格说，“卡特在裁军问题上虽然颇有诚意”，但他的麻烦在于他想在各个方面都与以往历届政府有所不同。事实上，他过于追求按他自己的方式办事，以致对其前任所曾采取的良好步骤也不屑于重复。

397

基辛格虽然强调他对自己那位学术同行和政府中的继任者毫无妒意，但他还是认为布热津斯基扮演了一个消极的角色。这是因为，布热津斯基只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在国际关系方面并无经验可言；他广泛摘引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的语句，以恣意发动人权攻势和抓住其他想法大作文章，从而使总统及其部下相信他的观点。在基辛格看来，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苏美关系的恶化。

为最高级会谈探路

万斯访问莫斯科失败以后，卡特政府似乎把恢复美苏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级会谈上。

6月3日，万斯就卡特与勃列日涅夫会晤一事大胆向我们进行试探，他和卡特总统都认为这是改善局面的关键。问题是会谈将于何时何地举行。秋季看起来不错，如果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圆满完成，总统将很愉快地在白宫会见勃列日涅夫，双方签订协议，并广

泛地交换意见。如果不是这样,也有可能在美国境外的某地举行最高级会谈。万斯强调说,总统是知道他所透露的这些想法的,但政府里没有一个人知晓我们的这次谈话,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和总统都只向前看,而不是回头向后看,并且希望勃列日涅夫的意见不要公开。

我在原则上对最高级会谈的主张是持欢迎态度的,但我强调有必要在年底前签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因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勃列日涅夫在6月11日的回信中确认了这一点,表示可在秋季或最迟在当年底通过最高级会谈达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

398 但卡特一周后的答复并未包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问题。卡特相信,他与勃列日涅夫越早会面,对苏美关系就越有好处。当时苏美关系正在恶化,要扭转这一局面,促成及早签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唯一的途径乃是在9月或者10月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我个人认为最高级会谈可能有助于挽回这种形势,因此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一建议。

政治局仔细讨论了卡特的要求,紧紧扣住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摆在第一位的原则,但决定采取更为灵活的办法,并静观其变。葛罗米柯是这一方针的主要支持者,他将在9月会谈时试探出万斯的态度,这样做也能确定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立场。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取代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除掉了他的另一个反对缓和的劲敌。

我迄今仍然觉得,推迟最高级会谈并把它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挂起勾来,这是我们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当然,还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因素,正如后来我与葛罗米柯争论时他所解释的那样:勃列日涅夫当时已经健康不佳,他感到如果没有一份拟好待签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做为保证,要他与卡特就诸多广泛的问题进行长时间的复杂讨论是甚为困难的。葛罗米柯也抱同样的想法;事实上也许正是他这样提醒勃列日涅夫本人的。

7月8日,当我陪同苏联科学院的著名人物弗拉基米尔·基里林来到白宫时,卡特个人介入进来。他把我拉到一边,要我告诉勃列日涅夫:“我真的很想和他见面。这很重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能达成一致,我就准备与他会谈。请告诉我,勃列日涅夫觉得什么时候方便,我马上就重新发出正式邀请,请他到美国来。”

9月底,葛罗米柯来华盛顿参加例行会谈,同时到纽约出席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苏美双方都有心很快进行最高级会谈。与此同时,双方还同意就解决中东问题的原则拟定一份联合声明。

10月1日,万斯和葛罗米柯在纽约发表一个声明,号召在日内瓦召开一次由两国联合主持的国际会议。这次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气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亲密。这一突然出台的声明马上引起以色列的敌视,其反对的理由是此事会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牵扯进来。以色列的立场得到了美国势力强大的院外集团的支持。万斯因此受到美国新闻界的攻击,内心甚为不快。后来我从他的助手马歇尔·舒尔曼那里得知,“从白宫打来了一个愤怒的电话”。这个电话很可能是布热津斯基打的。

卡特退却了,并在戴维营着手与萨达特和贝京分别进行谈判。勃列日涅夫写信给卡特总统,抗议将苏联排斥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我以为,这是卡特政府失去的又一次联合行动的机会,是由美国国内的争论和政府本身的不协调所造成的。

399

9月23日和27日,葛罗米柯与卡特在华盛顿白宫举行了重要的会谈。美方出席的有万斯、布热津斯基和其他一些人,苏方只有我和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年科给葛罗米柯助阵。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问题,经过艰难的讨论之后,卡特终于同意不再坚持削减苏联的重型导弹,将其限制在现有的308枚这一水准上,而美国则一枚也没有。苏联则相应地作出一个重要的让步,同意对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计划实行固定的限制。双方同意将空对地巡航导弹的射程限制在2500公里。苏联同意不把逆火式轰炸机开发

成战略轰炸机。美国战略轰炸机上携带的巡航导弹也被施加了限制，将其纳入分导式多弹头运载器的数目内。鉴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条约将于10月到期，卡特和葛罗米柯同意对该条约继续予以尊重，直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生效。卡特的激进计划被平静地搁在了一边，转而寻求更为现实的进展。

卡特预言，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几周”内就能达成协议，但关于具体问题的艰难谈判却摆在前面，一直持续到1979年才告完成。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谈判固然复杂而费时，但这次延滞的主要原因则在于美国的政治势力、甚至政府内部的一些人要求苏方作出更大的让步。这股势力的代言人是杰克逊参议员，此人还使自己成了一个人权斗士。

在9月23日白宫的会谈中，卡特提出讨论苏联的人权问题，结果招致尖锐的反击。葛罗米柯坚决要求美国不要插手苏联的国内事务。卡特谈到保护持不同政见的阿纳托利·夏兰斯基的问题。此人抨击苏联的人权政策，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在莫斯科也颇有名气。

“夏兰斯基是谁？”葛罗米柯冷冷地问道。卡特看上去有点迷惑不解。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夏兰斯基？”他惊奇地问。

“没有。”葛罗米柯还是那么泰然自若地答道。

卡特不知所措，只好放弃了这一话题。

400

我必须承认，当时我觉得葛罗米柯的外交技巧的确过人，他竟用佯装不知打发了如此敏感的问题。

不过，当我们上车回大使馆时，葛罗米柯压低嗓门问我：“夏兰斯基真的是个什么人？给我多谈点他的情况。”

这下轮到我惊奇了。看来他的确不大知道有关夏兰斯基的情况，这是因为他曾指示其莫斯科的下级，不要用他视为“荒唐”的那类事情来烦他。

当葛罗米柯准备离开卡特的办公室时，总统送给他一份出人

意外的纪念品：一套按比例缩小的苏联和美国的导弹木制玩具。葛罗米柯似乎不大喜欢这份礼品，因为它用图形显示，和美国战略导弹的结实的军火库相比，苏联导弹的外形较大，品种更多。后来他把这套东西给了我，说他不喜欢“玩玩具”。卡特的这套纪念品现在仍放在我的公寓里。

在美国参议院最后批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的斗争中，关键人物结果恰好是我们的老对手杰克逊参议员。在苏联贸易部长访美的一次会谈中，卡特总统提醒我，扩大苏联在美国的商业机会的贸易立法要获得通过，其关键也在于杰克逊参议员。我们根据卡特总统的个人提示，作了最后一次把他争取过来的尝试。中国已经邀请杰克逊访华，因此，卡特建议勃列日涅夫同意邀请这位参议员访问苏联。勃列日涅夫表示应允。

我于11月中旬拜访了杰克逊参议员，以若干名最高苏维埃委员的名义邀请他访问苏联。他无疑很高兴，并问他能否受到勃列日涅夫的接见。我回答说，我相信他会有这样的机会。

杰克逊对我转达的邀请表示谢意，说他无论如何将在转年3月访问苏联，那时国会事务不会十分繁忙。他强调说，尽管他并不赞成苏联所有的政策，但他仍在寻求改善与我国的关系。他认为要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开始积极的对话。

但在具体的问题上遇上了麻烦。转年3月，杰克逊参议员邀请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我在那里首先见到的是他的助手理查德·珀尔。此人是顽固反对苏联的死硬分子，曾起草了许多批评我们的声明。在这前一天的外交招待会上，珀尔遇见了我的一个副手，便告诉他说，苏联大使邀请杰克逊访问莫斯科，这一手很漂亮。杰克逊参议员感到很高兴。不过珀尔本人仍强烈认定，可能会发生一点什么事来阻碍这次访苏之行。

珀尔见到我时面带微笑，表示希望参议员和我能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但他说话的口气却有嘲讽的味道。我进入杰克逊的办公室

时,马上觉察到参议员有点儿窘迫。原来,他要求苏联政府允许他在莫斯科与那些出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召开一次会议,同时由西方新闻界加以报道。他承认自己在使情况复杂化,但他认为他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其理由是他乃一个尽人皆知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辩护人,如果他访问莫斯科时不会见他们,就未免有点不合情理。

我问杰克逊参议员,他在莫斯科究竟想见谁,是勃列日涅夫还是持不同政见者。他说他愿意与他们都谈谈。当问及他是否意识到这个新的要求终究会给他的访问带来麻烦时,杰克逊说,他很能理解“勃列日涅夫的困难”,但这些仍旧是他访苏的条件。

不久,我把莫斯科的答复转交给他:“我们邀请参议员访问苏联是从积极发展两国关系的需要出发的。参议员却把我们同意他会见一群与我国制度公然对抗的人作为他此次访问的前提,即使从变通的角度考虑,似乎也能看出这两者是毫不相干的。”

杰克逊的访苏终未成行。

第二十三章

卡特一塌糊涂的外交重点

高挂在非洲之角上

卡特总统对人权问题抱道德化的看法，布热津斯基则一有机会就坚持反对共产主义，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我们与卡特政府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关联性在1978年再度强烈地自我展示出来了。它表明美国在极力加大对苏联的限制，从而降低缓和的程度。苏联在国内外的举措于是就完全取决于莫斯科对最高级会谈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谈判的总体进度所抱的希望。这两者向来是我们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它们在1978年上半年下降到了低点，此后开始上升，不过与尼克松和基辛格时期的缓和程度相比差得还很远。但有节制和有选择的缓和这一原则，确实仍然是防止核战争威胁的主导力量。双方都在地区性冲突中上下其手，这样做危险系数固然甚低，但却引起了外交和政治上的严重不和。

至1978年初，地处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冲突成了美苏角逐的核心。索马里约有200万游牧民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省，故长期以来索马里要求将该省划入自己的版图。1974年，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在亚的斯亚贝巴被一个军事集团所推翻。在数年的内乱和争夺之后，陆军上校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于1977年2月成为领导人，他还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得到苏联军备援助的索马里趁埃塞俄比亚国内动荡不

安之机,占领了欧加登省。

莫斯科起初与索马里保持友好关系,于1974年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而他们则允许苏联船只使用亚丁湾的伯贝拉港和红海南端的入口。美国在埃塞俄比亚的皇帝被推翻之前,一直是其传统的盟国。

403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曾访问这一地区,并试图组织一个进步阵线,亦即将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南部也门组成一个联盟。南部也门地处亚丁湾的另一边,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隔海相望。由于索马里坚持不肯归还所占领的欧加登省,使这一尝试未能成功。门格斯图上校在埃塞俄比亚的统治得到了苏联和古巴的支持,从而阻止了索马里军队向埃塞俄比亚境内的进一步推进。所有这些导致超级大国的位置发生荒唐的颠倒;事实上它们不过是相互交换了各自的附庸。

由于苏联转而支持埃塞俄比亚,美国便相应地抓紧停止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援助,同时指责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新政府侵犯人权。(真正的原因当然是皇帝倒台了,而取代者显然是左翼分子。)此时华盛顿把注意力转向索马里,而且由于索马里在1977年底因莫斯科拒绝提供更多武器而取消了与苏联的条约,美国便更加关注索马里。苏联随之与埃塞俄比亚签订了一个同样的条约。1977年底,大约2000名古巴军队和1000名苏联军事顾问被派往亚的斯亚贝巴。索马里被迫在欧加登省退却,但仍控制着该省的很大一部分。

从地缘政治学的长远观点来看,非洲这一地区事态的发展对当地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莫斯科的政治领导层就持这种看法。然而,苏联和古巴进驻安哥拉刚刚两年,紧接着又干预非洲另一国家,由古巴部署特遣部队,苏联予以运输和其他后勤援助,于是引起西方尤其是美国一片哗然。人们怀疑苏联已采取一种新的战略,在第三世界对西方实行挑战和迂回包抄。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

里,此事很快成了卡特政府与莫斯科关系中的一个首要问题,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并在卡特政府内部引起严重不和。布热津斯基在表达上述疑意时态度最为咄咄逼人,而他的主要反对者是万斯。万斯在回忆录中解释说,他并不认为苏联在非洲的活动与什么重大的计划有关,它不过是企图利用地方冲突占点便宜,但国内反对苏联和古巴进行干预的政治压力很大,使政府未能把它们当作地方冲突对待。

然而,我们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所存在的关联性却要求延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其他一些裁军谈判,并在贸易和高层访问方面施加一些限制。万斯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这样会阻碍产生成果,但关联性的作用在不断增强。

我身为大使,对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关注非洲这个地区事态的心情是相当熟悉的。我能很有把握地说,克里姆林宫在这个地区没有什么长远的全球计划,万斯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由于对安哥拉的干预并未使其受到重大的国际复杂局势的牵累,莫斯科便毫无顾忌地在其他国家大打出手,开始是在埃塞俄比亚,接下来是在也门以及若干非洲和中东国家,最后登峰造极的是在阿富汗。

404

上述每一种局面的出现当然都有当地的具体情况,但它们所依据的却是国际大团结这样一种简单而原始的观念,这种观念意味着我们在反帝斗争中尽自己的责任。这些情形通常与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任何关系,而不过是在一些各派争夺权力的国家基于意识形态来干涉其内部事务,但这都无关宏旨。克里姆林宫有些人对我国卷入那些遥远地区的冲突深感荣耀,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使苏联成了一个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然而这却是一种轻率浮躁的想法。

了解外交事务的决策机制在克里姆林宫的运作情形,对于理解我们在第三世界那些有时异乎寻常的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按常规,对当前问题的处理都是先由外交部提出建议。实际上主要是葛罗米柯本人一手操持,而且他的所有建议照例都被悉数

采纳。他是公认的权威,尤其是具体跟西方和美国打交道的权威,而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也坚持捍卫自己在这—领域的权威地位。总的来说,他是一个谨慎的人,只要不涉及苏联的核心利益,他就反对与美国进行严重对抗。

不过,第三世界并非他最拿手的领域。他认为在那里发生的事件终归不能对苏联和美国的基本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而结果证明他无疑低估了这一点。此外,在传统上,苏联外交部并未真正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领袖们打得火热,与这批人打交道的是党的国际部,其负责人是中央书记鲍里斯·波诺马廖夫。他看不起葛罗米柯,葛罗米柯也不把他放在眼里。

在第三世界的所有这些工作,特别是涉及解放运动的工作,是由政治局很有影响的二号人物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来统筹的,他多年来一直负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国际活动。在他看来,第三世界的所有斗争都有其意识形态基础,即帝国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团结一致的口号下,他和他在党内的积极追随者设法使政治局介入了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冒险之中。在这方面克格勃给予他支持,因为党在这个领域的联系都是通过克格勃成员来办理的。军方打算送去武器和顾问,但不打算派出苏联军队。

405 苏联许多职业外交家都反对我们深深地卷入这些遥远地区的事务,但当这都是以党的名义来进行的时候,还有谁会公开唱对台戏呢?有些外交家,包括我本人在内,曾自行设法在西方通过非正式的谈话来减轻其不利影响。我们对我们的西方同事解释说,所有这些行动都只不过是一时冲动,并不一定是什—苏联刻意瓦解西方世界地位的庞大计划的组成部分。但在他们对我们那些遥远地区的冒险性插手行为深为反感的情形下,这是很难说服人的,而且还在美国引起了甚为消极的反应。

我曾尝试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波诺马廖夫及其他人解释,我们在第三世界的冒险破坏了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他们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成不变的:美国人自己在全—球如此活

跃,为什么要对我们喷有烦言?

我正巧曾参加多次讨论安哥拉、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问题的政治局会议,因此我可以这样说,苏联甚至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美国的不满。政治局认为这些不满与美国合法的切身利益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不把它们看成是和华盛顿的关系中的主要因素。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战略价值也未在政治局进行过积极的讨论,它们和苏联隔得实在过于遥远。但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为首的我国一些高级将领却玩弄这种想法:我们的旗帜在那些遥远的地区飘扬,便意味着对美国的蔑视,这使他们感到兴高采烈。有一种理论认为,所有这些多少证明苏联已是一个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世界强国,勃列日涅夫对这一说法引以为荣,我怀疑那些高级将领私下里利用他的这种虚荣心玩什么花样。这有助于解释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偶尔支持我们的某些冒险行动,而苏斯洛夫则为这些行动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提供证明。不过,只有当确切无疑地知道这些冒险不会导致和美国的直接对抗时,勃列日涅夫才会表示支持。

万斯在1月14日和我的一次私人谈话中提出了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冲突问题。我告诉他,莫斯科不接受美国关于苏联卷入的说法,也不同意美国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索马里军队必须撤出埃塞俄比亚。与此同时,美国的反苏集团和新闻界则日益急切地把我们在非洲之角的活动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及其他问题联系起来。在3月2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到这种联系时,卡特总统加以否定,但他又说是苏联的行为使之与其他政策产生了联系。3月17日,卡特在韦克福里斯特大学发表讲话谈到,由于苏联有着一种插手地区冲突的“卑鄙嗜好”,美国有必要对自己的军事战略作“一次重要的重新估价”。

我们使馆曾提醒莫斯科,华盛顿乃是从全球观点来看待这类事情的,即便并无确切理由这样做,故非洲之角的局势看起来开始

有点像1975年安哥拉的事件，“为各式各样的反对我们两国良好关系的人提供了弹药，使这种关系处于炮火攻击之下”。我们的报告还指出，古巴在这个地区的投入对美国人来说仍然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使馆向莫斯科建议说，可试着从对苏美关系的潜在损害这面棱镜来看非洲。但莫斯科仍旧认为美国的反应不过是在我们之间持续的意识形态斗争框架内的又一系列宣传攻势而已，因而加以贬斥。

在1月31日我与万斯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谈中，这一不同的方式变得格外突出。他有点紧张不安地说，一些苏联战舰和登陆艇在红海集结，这就动摇了他自己关于和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的主张。他补充道：“我要直率地告诉你，总统身边有些人对他说，苏联最近的行动乃是对总统个人的直接挑战，是在试探他是否坚定有力，他应当向俄国人表明，他不可以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我知道，万斯对美国舆论的警觉完全是有根有据的。但我唯一能真心诚意做的事情就是对他解释说，莫斯科并非一心要试探总统的意志。我试着用一种极为私人的方式告诉他事情的意识形态的一面，但这当然无济于事。显而易见，我们两国在这一地区卷入了一场真正的冲突，或许我们的卷入可用以促成问题的解决。可是我们应当如何下手呢？

曾有过一次尝试。1978年1月，葛罗米柯正式倡议由美苏对非洲之角的局势进行联合调停，但卡特政府对这一提议嗤之以鼻，因为这会使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出现合法化，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就作过这样的解释。他在这里听起来有点像亨利·基辛格，后者曾用同样的说法来反对苏联参与一次解决中东问题的行动。苏联还曾提议重开中断了的关于在印度洋地区限制军备的谈判，但也为卡特政府所拒绝。还有更多失去的机会将会凑在一起。

在与万斯会谈1个月之后，我又跟布热津斯基讨论了非洲的种种问题。他的千言万语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那就是卡特感到越来越不安。他反复强调，苏联和古巴军队在埃塞俄比亚的出现对西方

利益构成威胁,危及中东与美国、西欧之间的各条石油运输通道的安全。他说它们有可能被“切断”。

我问他何以认为苏联真能切断石油运输线。它会攻击和打沉美国的运油船吗?那将构成一种直接的战争行为。白宫果真抱有这种荒谬的想法吗?布热津斯基承认,虽然白宫并未给这种说法提供多少凭证,但这一过于简单化的观念却在国会和美国媒体中广泛流传。我们没有再作争论,但他仍然清楚地表明,我国在这个地区的出现是不受欢迎的。

在卡特政府内部忧虑不安的情绪变得日益强烈。3月24日,万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苏美关系已“进入一个不稳定的阶段”。卡特决定要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秘密接触。可口可乐公司的保罗·奥斯汀曾悄悄告诉我,他曾飞往古巴为卡特执行秘密使命,见到了古巴领导人,并以总统的名义告诉他,古巴在国外的行动使美国难以继续华盛顿和哈瓦那之间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卡特一直坚持以此为他的一个目标。卡特捎去的信息说,妨碍正常化的主要绊脚石乃是古巴在非洲特别是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行动。卡斯特罗要他告诉卡特总统,决不会有一个古巴士兵越过索马里边界。我后来从万斯那里获知,菲德尔当时断然拒绝就非洲问题对美国人作出任何承诺,宣称他将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莫斯科和华盛顿在所谓非洲事务上几乎完全徒劳地花费了如此巨大的精力,我现在回想起来不禁十分吃惊。20年后没有人(除了历史学家)还会记得这些事情。甚至当1992年乔治·布什派美国海军陆战队赴索马里参加联合国部队救援那里的饥民时,只有新闻界少数几个人评论说,索马里当时盛行的无政府状态的种子极有可能是15年前超级大国插手时种下的,而美国政府中则没有一个人提及此事。若干国家的内部纷争都粘在了冷战这张网上,索马里只是其中之一,其他国家还有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等,所以这些国家由于和两个超级大国牵扯在一起,结果都变得每况愈下。

我们卷入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冲突，涉足安哥拉的战争，这都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们向这些地区提供军事装备，古巴部队在那里进行活动，特别是我们通过我们的空运把他们送到那里，这些就使美国人确信，莫斯科已发动一场反对他们的斗争，以便在非洲实行控制。我当然知道，某些空运是通过国防部而由我们的使馆武官当场安排的，外交部很少知情。美国就此事发表了许多正式声明，在批评我们的人中，有不少本来是对我们怀有良好愿望的。

缓和变得一团糟

克里姆林宫虽然对威胁缓和的因素感到担忧，但还是低估了这些因素。政治局在5月初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美国日益强烈的攻击问题。我参加了讨论，想要描绘一幅苏美关系的客观图景，特别是介绍美国人是如何看待苏联的行动的。要说服政治局是殊为不易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偏见依然十分强烈。

政治局的成员坚定不移地相信，旧的殖民帝国正在崩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普遍衰弱，这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进程。苏斯洛夫在勃列日涅夫的支持下宣称，这些都不是我们促成的，因为它们乃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无论何时只要可能就应当支持这一进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想刻意瓦解甚或伤害美国的利益，这丝毫不涉及两国政府和两个国家的关系。这就是苏联最高领导层进行官方推理的咒文。当然，那些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人，诸如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和柯西金等人，知道局面并非如此简单，但当触及到我党意识形态的核心时，他们通常宁可不发表强烈的反对意见。

话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有意思地注意到，那次会议的最后决定并不是调整或纠正我们在第三世界或人权领域的行动，而是“改进”对我们的观点与行动的“解释”，“更为积极地捍卫我们的立

场”。那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并没有什么错，错的仅只是我们的宣传。

勃列日涅夫企图使苏联在缓和问题上的立场免受西方日益强烈的批评，公开否认关于苏联在第三世界进行干涉的指责，并争辩说，在缓和与苏联和“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自由的各国”的关系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之处。他同时还为缓和辩护，认为它是苏美关系的基础。勃列日涅夫在说出他的看法时信心十足，这固然是没有疑问的，但我们和美国的争执，的确是源于苏美两国对缓和的看法上存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导致对苏联在一些地区冲突中的活动的解释发生更大歧义。对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来说，缓和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现在尤其如此，因为莫斯科已被公认为平等的核超级大国，并在全球发挥作用。但在美国公众看来，苏联对第三世界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完全是毫无道理和侵略性的。这是一种怒气冲冲的看法，克里姆林宫仍然十分明显地低估了这种看法的力量。

卡特政府对缓和同样有自己的看法，只不过更为暧昧不清而已。卡特政府的观点有点过于简单化，认为缓和是基于由合作与较量所构成的这一公式的；万斯倾向于寻求新的合作领域，而布热津斯基则更注意较量的一面。国务卿认为，对于华盛顿和莫斯科有关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冲突的分歧，不可作出过高的估计，以免掩盖苏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尤其是限制战略武器的问题。与此相对照，在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看来，几乎苏联的所有政治行动都是反对美国利益的阴谋诡计，因而更倾向于主张斗争，而不是合作。

在我的外交同伴中间，上述意见分歧乃是公开的秘密。许多消息是从白宫本身泄露出来的，大部分是通过布热津斯基的支持者的渠道。外国的大使们于是不禁感到十分好奇，这几个人品质和观点如此不同，卡特总统如何可能使用他们，并听取他们的建议。这是否可以解释卡特的外交政策何以摇摆不定和缺乏固定的重心

呢?但是,到底什么是他自己的立场呢?

由于卡特又恢复了同中国的关系,他打这张牌,希望能对苏联施加压力,因而问题并未变得更为明了。布热津斯基积极促成这一局面,他被派遣到北京执行外交使命,希望这能引起莫斯科的注意,并使其怀疑变得牢固。而这恰恰是万斯所不想做的。

在5月21日至23日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时,苏中关系正处于重要的关头。当时北京刚刚拒绝苏联关于开始两国边界纠纷谈判的动议。在苏中边界发生了多次冲突。勃列日涅夫和乌斯季诺夫曾到过苏联的远东地区边境,视察并加强那里的防卫力量。布热津斯基在北京进行的谈判涉及美国的战略计划和技术援助,涉及在非洲和其他地区开展合作以对抗苏联政策的种种计划,对此他显然表现得兴致勃勃。他走得很远,甚至公开抨击“北极熊”。

410 莫斯科对此不可能视而不见,勃列日涅夫公开抨击打中国这张牌来对付我们的“可笑”做法,说这是“一种短视而危险的政策”。尽管如此,莫斯科还是决定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5月27日,葛罗米柯在华盛顿会见了卡特,提出了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的若干重大让步,同意冻结苏联重型导弹所携带的弹头数量(每枚SS-18导弹所携带的弹头不超过10个,而不是它实际所能携带的20至30个)。他们审议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草案。他们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仍未能完成这一草案。

不幸的是,卡特提出讨论苏联的人权和古巴插手非洲的问题,这很尖锐而又毫无成果。葛罗米柯一向以克制谨慎而闻名,但在回到使馆后,他简洁而强烈地指责卡特顽固纠缠于那些我们认为属于苏联内部事务的问题。

5月27日,葛罗米柯还与万斯进行了长时间的单独会谈。双方不用宣传腔调,而是坦率和会意地一致认为,苏美关系走进了一条危险的死胡同。我后来得知,万斯两天后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敦促卡特反思苏美关系,因为他的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实际持两种不同的看法。他提醒说,总统从某些资深官员(他指的是布

热津斯基)那里得到的建议,如果做得过头,就会引起苏联强硬的逆反行动。例如,人权攻势可能促使苏联更为严厉地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到那时行政当局又将做什么呢?他批评用中国牌来对付我们,但他认为美国在第三世界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牌”,因而行政当局应当更具自信。不过他反对把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为和“我们自己的根本利益”相关的问题联系起来,譬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我看来,这份备忘录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预防美国外交政策的消极转向,因为万斯预见到,如果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占上风,就会发生那样的事情。然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却利用每天向卡特作简要汇报的机会,继续促成一种更强硬的政策,借助我们的双边关系来增加对苏联的压力。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14名成员给卡特写信,要求他结束因政府内部意见分歧而引起的混乱状况。卡特于是决定发表一项关于苏美关系的政策声明。他私下里请布热津斯基和万斯分别起草他的演说稿,最后的定稿由卡特本人准备。6月7日他在自己的母校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发表了这次演说。这个演说把缓和与对抗、常识与好斗言辞、万斯的意见和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奇异地揉合在一起。

411

卡特在开头说,我们两国之间的缓和乃是和平的基本要素,应当对它作出清楚的界定,使之真正对双方都有利。卡特颂扬美国的民主理想和原则,同时攻击苏联的整个制度,尖锐批评苏联的人权政策。他说:“我们要扩大和苏联的协作,但同样也要和新兴国家协作,和东欧国家协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协作。在世界上那些尚未实行真正的自决和多数人统治原则的地区,我们尤为致力于达到这两项目标。”他在结束演说时托出了主题:“苏联既可以选择对抗,也可以选择合作。美国已做好面对任何一种选择的充分准备。”

总统内心的确切想法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并不十分明确。美国新闻界把这次演说描绘成对苏联领导人的一次挑战。苏联和美国许多人得到的印象则是,卡特所倒向的政策并非缓和,而是对抗。

苏联的《真理报》发表一篇经政治局同意的文章，说总统的演说显示了布热津斯基那咄咄逼人的一手，带有重开冷战的危险。

就在演说后的第二天，万斯吞吞吐吐地告诉我，总统希望莫斯科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待他的演说。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依我之见，这个演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平心静气。万斯在接下来的坦率交谈中说，在最近几周的整个辩论和总统对苏联的公开态度中，有一个心理上的背景，那就是卡特十分担心，不仅仅在莫斯科，而且在他自己的国家，人们不把他看成一个坚定果断的总统。他的这种担忧的部分根据在于，他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下降得很厉害，而且公众对他作为总统的表现普遍反应消极。万斯说，这种优柔寡断、犹疑不定的政客形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他未能说服国会通过他的若干重要法案，由于他同意对战略武器最高限额作很少一点的削减，由于他在是否部署中子弹——一种只致人死命而不毁坏财物的新发明——的问题上说了不少蠢话。这与他在总统任期开始时所唱的高调形成鲜明对照。他在国内事务方面的声誉也受到严重损害，因为他在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的斗争中损失了大量个人政治资本。而且万斯还说，卡特认为，他这种软弱和倒霉的总统形象，乃是导致“莫斯科的强硬挑战”的原因。于是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怀疑，莫斯科在盘算趁机从中渔利。

大致与此同时，政治局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听取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警告说，国际局势严重恶化，他认为责任在于卡特政府的“日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包括总统本人和他的亲密同事，特别是布热津斯基的尖锐的反苏言论。他说，各种反苏派和军事工业联合体通常合而为一，卡特似乎正受到这一联合体的影响，但他同时也想打出恢复冷战的旗帜，以争取再度当选总统。勃列日涅夫声称，这一方针还影响了美国对北约、非洲和中国的政策，他建议按这种思路写一篇严肃的长文，在苏联的所有报纸上刊出，同时为华约各国政府起草一项声明，指责北约理事会最近的一次会议加剧军备竞赛。政治局表示同意。

在此同时,从国会传来了新的警告信号。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是个很有势力的人物,后来做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告诉我,“在最近两三个月里,行政当局试图挫败国会对各种政治问题的反对时,实际上无一不是打出了反苏这张王牌”。丘奇说,行政当局的所有立论都建立在苏联实行扩张主义这种陈腐说法上,他指出,白宫而不是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原始的反共主义,这还是第一次。

“我告诉你这些的原因是,”丘奇说,“白宫在国会制造的气氛致使参议员中间对苏联的怀疑和沙文主义情绪日益强烈。在参议院,围绕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阴云正在集聚。行政当局如果不采取紧急步骤,参议院可能不会批准这个协议。”他说,最好是把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表决推迟到1978年国会选举以后,以便让苏美关系稳定下来。果不其然,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在7月间公开要求中止和苏联的所有谈判。他说,从战略上看,苏联在非洲的干涉比限制战略核武器更为重要。

陷入僵局

在这一年余下的日子里,我们两国的关系每况愈下。实际上,不论是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是中东问题,不论是对古巴的惊恐还是利用中国对付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日益纠结在误解和怀疑这张网里,同时卡特政府内部的纷争又使事情变得更糟,我们是无法摆脱这种纷争的池鱼之殃的。

413

苏联对人权的践踏使我们的讨论变得更加迷雾重重。有两个联合国的苏联雇员在5月份被捕,其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6个月后被判处50年监禁。卡特政府想以此交换被监禁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为此我和万斯、布热津斯基进行了好几次不愉快的会谈。这些讨论花费了许多时间,弄僵了使馆和国务院之间的工作关系,更糟的是恶化了我们两国政府的关系。万斯作出了一个友好的姿态,提

议用两个联合国雇员交换被控从事间谍活动的夏兰斯基。这样他们都会免于受审。我个人支持这个主意,并向莫斯科提出了建议。万斯的苏联事务顾问马歇尔·舒尔曼告诉我,这次交换是卡特总统出的点子。但莫斯科马上表示拒绝。这一毫不让步的决定使我感到困惑,因为对双方来说,这个交易都是走出僵局的合理途径。唯一可能的解释乃是苏联领导层对卡特个人怀有强烈的不满。

随着夏兰斯基和金兹堡的审判日益临近,万斯于6月7日再次找到我,对这两个审判在我们双边关系中意味着什么表示深切关注。他还表示,他将于7月12日至13日在日内瓦会见葛罗米柯,莫斯科计划就在这个时候进行审判,他个人对此感到遗憾。如果审判不推迟一两个星期,他在国内将被置于十分微妙的地位,卡特可能不会同意他在这种情势下会见葛罗米柯。他在第二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审判“只会影响我们两国关系的气氛”。

两天后舒尔曼告诉我,卡特是同意这次会面的,但他计划就审判发表一个更为强烈的声明。同时还要宣布,他的科学问题助手弗兰克·普雷斯将取消一次已计划好的对苏联的访问。普雷斯此前已提醒我,“高层决定”已经作出,如果夏兰斯基受审,他就拒绝我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访问邀请。舒尔曼说,图恩大使已从莫斯科发回电报,主张取消万斯和葛罗米柯的会谈。这封电报在总统的办公室里就引发了一场争论。在场的多数人打算支持图恩。万斯死活不同意取消会谈,而布热津斯基则建议推迟。卡特本人在两可之间。万斯宣称,如果总统取消这次会谈,那么卡特和勃列日涅夫的最高级会谈就会无限延期,至此事情才决定下来。

414 然而,一系列不够重大的和科技的访问与接触被取消了。7月底,卡特总统的母亲访问了梵蒂冈,向教皇保罗六世转交了她儿子的一封个人信件,信中呼吁罗马天主教会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斗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总之,在卡特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之间日益强烈的敌视中,我们两国的关系陷入了更深的僵局,且不说卡特自己的下属意见不一和彼此争权夺力也对此产生

了影响。

当葛罗米柯和万斯于12月21日至23日在日内瓦会晤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延迟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完成。万斯带着卡特的指示,要在监控导弹试验的遥测信息以有助于证实是否遵守协议的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万斯在和葛罗米柯讨论这个问题后,试图根据葛罗米柯提出的妥协调整美国的立场。他随即向华盛顿发了电报。第二天,万斯正和葛罗米柯在我国代表团驻地会谈时接到了布热津斯基打来的电话。由于使用的是普通的公开电话线路,我们无意中得知了他们通话的全部细节。布热津斯基告诉万斯,卡特决意坚持他的决定,并将在最高级会谈时向勃列日涅夫重申。他补充说,他得到了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的支持。万斯两度试图为他的妥协方案辩解,但纯属徒劳。当时的整个场面使我们甚感尴尬,因为布热津斯基好像在给国务卿下达严厉的指示。

第二十四章

与卡特举行最高级会谈

恢复军备竞赛

在卡特总统任内后期，困难重重的国内经济，美国国际威望的跌落，再加上面对二者似乎日益无计可施的总统，都促使美国内部出现了一种茫然失措的思想意识。为了让美国逃避面临的种种问题，国家主义者、极端保守主义者以及过激分子主要靠着加快政策的军事化和军备竞争步伐使各自提出的观点、思想以及济世良方得到广为宣传。沙文主义由此出现，给对外政策增加了反苏的压力。整个这一年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无不被利用于达到这些目的：伊朗革命和美国人质被扣、巴拿马运河条约、越南在柬埔寨的驻军、尼加拉瓜革命、石油问题和美元疲软、中东的局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古巴的一支苏联旅、欧洲的核导弹以及最终的阿富汗动荡。无论如何，美国外交政策遇到的许多困难和挫折都归咎于苏联，已经过时的红色恐怖这时换上了新面孔。

美国在军事上落伍于苏联的说法也随之问世，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从政府方面讲，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地缘政治计划，或者是布热津斯基就美国利益所谓的“生死攸关范围”受到苏联威胁而提出的“地缘战略”概念和理论，如从兴都库什山脉延伸经过伊朗、中东、土耳其和波斯普鲁斯海峡终端这一地区，布热津斯基将之夸大描述为一个“危机的弧形带”，它把从巴基斯坦到埃塞俄比亚的长宽地带拦腰切断，对中东石油国家形成包围之势。这种理论有利于

进行成功的宣传,无非使众多的时事评论员词汇增加和《时代》杂志的封面赫然醒目而已。

美国政治形势的独特性表现为,极右势力比其他政治力量更为巧妙地和有力地投大众情绪所好,缓和进程由此受到破坏。卡特政府的反应是继续扩充武装部队,由于承诺在和平时期以空前速度提高未来年月的军费,这就使拨款比例出现新的变化,就是在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这种速度也是有增无减。

416

苏联领导层日益把卡特视为敌对总统,不惜一切恢复军备竞赛。苏联军工联合企业不无庆幸地加快制定军火生产计划。苏联军队介入非洲和其他局部冲突更是显而易见,最终发展成对阿富汗的直接军事干涉。对苏联境内不同政见者的审判也促使美国国内的反苏情绪日盛。

在苏美关系中,除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外,整个政治气候的不稳定性对裁军谈判产生了消极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经济、文化和其他联系蒙受其害,而这些联系在双方多年的巨大努力之后,已成为我们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1980年1月4日,卡特宣布对苏联实行广泛制裁,这是美国对几天前苏军作战部队进入阿富汗支持该国政权而做出的反应,此时,苏美关系的紧张程度已达到顶峰。制裁包括中止参议院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辩论,减少或取消在我们双边关系的许多领域达成的若干协议。卡特政府宣布,美苏关系进入长期对抗时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到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为止。

1979年初,万斯邀请我概括地谈谈我在外交方面的看法。1月5日我们进行了会谈,一开始就谈到总统对我们近期就美国主要官员所发议论抱怨的答复,这些官员有意把苏联描述为敌国或潜在的敌国。万斯说,总统已经非常认真地捎来口信,承认他本人不是没有错误。

我说,莫斯科当然要注意卡特,但我还是提请万斯注意布热津

斯基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一种新的评论方式,他们认为,未来对美苏关系挑战的一个主要焦点将集中于第三世界原料上的对抗,据称苏联尽管拥有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正试图从美国手中抢夺原料。万斯表示同意,谈到近期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理论没有经过认真分析,分析就被公诸于众。

万斯告诉我,他和总统已经详细考察了政府在卡特任内余下两年内的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他们一致认为以下三个领域应予优先考虑:

417

——东西方关系,尤以苏美关系为关键,以及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结束和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开始。

——美元的巩固(它已经落到空前的低点,必须得到德国与日本庞大的信贷限额的支持)以及主要工业国家之间严重经济分歧的解决。

——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万斯谈到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以及东南亚和南非是相对不太紧要的地区,然而这些地区能够影响到国际关系的总环境和本政府的优先考虑之事,当然其中之一是与勃列日涅夫的会晤。我们一致认为,尽可能早地结束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比其他事情更为重要。事实上,正是这些想象中较为次要的地区把它们自己推到了世界事务的前列,使卡特任内后半期美国与苏联的雄伟大志化为乌有。给美国造成麻烦的无非是伊朗,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是阿富汗。

卡特竭力争取举行最高级会谈

2月27日,卡特总统邀请我在他的官邸进行了一次讨论,以消

除我们对他维持良好关系之兴趣的疑虑(这是他颇为忧虑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在下一年将面临着重选)。苏美关系的不稳定状况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拖延已开始使卡特颇感不安,所以他决定亲自干预事情的进展。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也在场,因此我能看得出谈话气氛非常严肃。一个话题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与之相连的维也纳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另一个话题是中国。不过从卡特语气上看,二者是同等重要的。

卡特在日记中回忆说,他打算向我强调与苏联关系的重要性、他对近期苏美关系恶化的忧虑以及我们共同使之改善的需要。实际上,他所谈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

总统一开始就告诉我,他想要勃列日涅夫知道,他觉得作为总统的最大责任是保持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美好关系,在他执政前两年期间,两国关系未能取得进展,对此他深表遗憾。他真诚地希望尽早举行最高级会谈;他说,重要之事是会晤和交换看法,他理解勃列日涅夫的观点,即纵然谈判已经使最高级会谈延误了两年多之久,但它应该以签署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为标志。不过在卡特看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已接近尾声,所以最高级会谈似乎近在咫尺,他正企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418

总统希望最高级会谈在美国举行,如果医生建议勃列日涅夫不宜长距离飞行,会谈也可安排在一个中立国。“我愿意向苏联主席保证,”卡特在结束这一话题时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一经签定,我打算使用我权限范围内的一切手段,其中包括向人民直接呼吁,说服参议院批准这一重要协议,尽管就今天我们参议员的情绪而言,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恰恰在一年之后,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本人请求参议院推迟批准这一协议,这真是历史的莫大嘲讽。)

总统接着就把话题转到了与中国的关系。2月17日中国入侵越南之后,勃列日涅夫与卡特在热线上交换了彼此看法,勃列日涅夫一口咬定中国是侵略者,而卡特则吁请不要扩大事态,他将之看作

是中国对越南侵略柬埔寨的反应。双方均怀疑另一方对中国的战略。卡特首先要我向勃列日涅夫保证，第一，美国与中国之间没有签署任何秘密协定；第二，美国政府事先并未得知中国在邓小平访美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打算进攻越南。总统谈到他本人曾强烈告诫这位中国领导人不要在越南采取行动，而且在进攻发生之后他要求中国部队尽快撤出——这恰恰也是苏联的愿望。

我告诉总统，他的保证将汇报给莫斯科。“我们认为这些保证是积极的，”我说，“但是我们的谨慎小心应该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事实是中国在邓小平访美之后紧接着就入侵越南。强调这一点的不是苏联公众，而恰恰是在美国。”我提醒卡特注意勃列日涅夫在新近热线通话时对这次侵略的质疑：“它仅仅是巧合吗？”

卡特回答说，他非常理解勃列日涅夫的疑虑，这正是他邀请我来谈的一个主要原因。

卡特正在表明对我们之间关系转变的真正兴趣，我带着这种印象离开了白宫。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第一次卡特没有涉及到他一向重视的人权问题。此外，在下个月期间，卡特与勃列日涅夫之间交换个人口信最终解决了双方在战略导弹试验的遥测信息上的争执，这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余存的问题之一。3月5日，万斯私下告诉我，中国大使已正式通知美国，中国正从越南撤出全部军队，同时他也向我提到卡特理解苏联领导人的忧虑——这恰恰不是卡特政府在这场危机达到高峰时所说之言。莫斯科与华盛顿设法渡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两国关系未受到严重伤害，国务卿说，其意义非同小可。

走向维也纳

卡特的情绪发生变化之后，3月29日，万斯邀请我进行非正式会谈。会谈在靠近国务卿办公室的一间小巧舒适的房子里举行，我们之间的这种私人会谈通常都安排在这里。万斯一开始就谈到，

本届政府,尤其是他本人强烈感到莫斯科认为我们两国关系比其他总统执政时更为明显恶化。我们感到美方主要是在推卸责任。

“这点对吗?”万斯问我。我回答道,我的确不怀疑他的评价,因为我拥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他说,卡特对我们之间根深蒂固的缺乏信任和理解忧虑不安,希望在与勃列日涅夫“尚存最后可能性”的最高级会谈上消除疑虑,以便把我们的关系建立在更具建设性的基础上。这实际上是那天上午与总统在他的寓所里进行私人会谈时的话题。

万斯还说卡特告诉他,他常常在深夜还在考虑苏美关系问题,确信勃列日涅夫也同样如此。双方都明显认为对方在欧洲、中国和中东地区的举措主要受到敌对目的的促动。但是双方都不应该把一方的行动视为针对另一方而来,那不过是华盛顿与莫斯科往往对之做出解释的方式而已。简言之,对抗的概念在我们的关系中染上了各种色彩。卡特认为,我们在许多地区能够具有并行不悖的利益,这些利益对一方来说是重要的,对另一方来说则处于次要的考虑,而不是基于一种无处不敌对的标准之上。

我告诉万斯,总统所说之言中的许多观点我都深表赞成,但在政治中,评判政治家的标准是他们的行动,而不是莫斯科知之甚微的他们的私下观点。

万斯谈到,卡特不知怎么总是确信在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会晤期间,他们能够改善这种局面。卡特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屡屡试图陈述自己的观点,但收效甚微。他相信面对面的会谈。万斯本人明显希望勃列日涅夫能够从个人角度对卡特产生影响,消除他的上司对苏联以及苏联对外政策所持有的某些会令人误解的思想。

我理解万斯改善我们关系的真诚愿望以及要勃列日涅夫在最高级会谈上影响卡特的希望。但是我知道,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十分不佳,很难使上述希望变为现实,因此主要的重点应放在对会议文件的准备上。有时我们对领导人之间个人接触所

抱的希望过多,其实他们也不能形成不受约束的一套想法,当场做出大胆而独创的决定。

在1979年上半年期间,我们就这样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着一种深入细致的外交对话。卡特和勃列日涅夫之间,万斯、布热津斯基与我之间多次交换了意见。讨论集中在有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尚未解决的问题上。为了找到解决诸如导弹遥测和如何计算新式导弹等方法,我与万斯进行了20余次私下会晤。但是两国军方毫无让步之意。他们自恃争执问题的技术性高度复杂来获得让步,否则就对整个协议设置障碍。万斯的处境甚至更难,他不仅必须要说服五角大楼,还必须要说服他在白宫内的反对者,后者正试图利用我们就非洲、越南、古巴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分歧的谈判来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不过万斯和我都清楚,这次双方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愿都倾向于我们;他们想要签署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和举行最高级会谈。

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正如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那样,5月7日下午3点15分,万斯向卡特汇报了他与我的会谈:“总统先生,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而言,基本谈判已告完成。”我必须坦言,这是我感到十分宽慰和满意的时刻。实现这次最高级会议花费了数年时间,我参与了通向这一目标的十分艰巨的准备工作。1979年5月9日,关于一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协定被宣布。这一协定基本上重申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规定的限额,而没有按照卡特最初请求的那样进行较大修改。

下一个问题是选择最高级会谈的地点。卡特提议这次该轮上华盛顿了,因为上次与福特的最高级会谈在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勃列日涅夫根据医生的建议提议将会谈地点定在莫斯科。卡特答复说他不能赴莫斯科,因为国会内的一些人也许指责他对俄国人又做了妥协,这会影响到条约的批准。布热津斯基两个地点都不赞成。最后我们同意选在维也纳。

5月20日,我会晤了与卡特关系最为密切的汉密尔顿·乔丹,此人作为卡特国内的主要政治战略家可能最清楚总统的动机。会谈在我们的使馆举行,这是乔丹首次访问这里。他的话题集中在维也纳会谈诸方面所牵涉到的国内事情,他一开始就坦言相告,总统完全清楚这次会谈的世界影响,决心保证这次会谈的成功,但他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当选总统。这也意味着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获得参议院的批准。

乔丹说,卡特焦急地想与勃列日涅夫建立一种有条不紊的良好关系,但是他也竭力避免看起来像一位轻率地投入到俄国人怀抱的领导人。他说,这样做只是重复理查德·尼克松的错误,造成一种出乎常情地突然转向缓和的错觉印象。况且1979年那年的政治现实是在处理与苏联关系上众说纷纭,这种形势大大不同于尼克松当政时的大部分年月。

对于我们目前两国关系的不佳状态,卡特总统将不责怪任何人。他承认,在他出任总统的头几年期间也许存在着一些错误,不过苏方也可能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维也纳会谈,”乔丹说。看来卡特已经忘掉——或正试图忘掉——其政府与莫斯科之间3年来关系动荡的历史。

3天以后,布热津斯基和我就维也纳会谈的议事日程达成了一致,仅有为数很少的分歧。在人权问题上,我们拟定了一个允许存在分歧的原则,这样双方都能在商定好的日程之外提出任何问题,只是另一方有权避免讨论它认为关系不大的问题。两位领导人将于6月15日抵达,接着举行两小时左右的会谈。会议安排比较轻松,以使勃列日涅夫有更多的时间休息。晚餐在下午7点或7点半开始。6月18日上午举行3小时的会谈以及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签字仪式,随后这次最高级会谈便宣告结束。其他协议将在工作会议上签署,这就免去了有记者参加的特别仪式的紧张。

6月11日,当我与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共同完成了供维也纳会谈

颁布的公告草案后，我把我方参加维也纳会谈的代表组成告诉了
他们。除了总书记之外，苏方代表还包括另外3位政治局成员，他们
分别是葛罗米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以及康斯坦丁·契尔年科。
契尔年科新当选为政治局成员，是勃列日涅夫的心腹之人，以后成
了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使代表团具有如此高的规格，显然是出于万
无一失的考虑。苏方代表组成给这两位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卡特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包括万斯、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
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将军。

万斯和布热津斯基提出的策略大相径庭。万斯赞成寻找积极
的共同点，不要过分强调难以解决的争执问题；布热津斯基则认为，
对勃列日涅夫直言相告有关不适宜白宫的苏联政策各个方面
是可行的，“以免未来产生误解”。

当乔丹小心谨慎地试探我对这种策略分歧的意见时，我提醒
他不要忘记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首次会晤时产生的积极结果，在
那次会议上，讨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乔丹答应向卡特建议采取相
同的方法。卡特在他的日记中谈到哈里曼简要告诉他如何与勃列
日涅夫谈判。哈里曼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将竭尽全力避免限制战略
武器会谈的失败。他的最崇高义务就是使他的人民避免战争，切记
不要使他感到惊讶或尴尬，因为勃列日涅夫年事已高，他既通情达
理而又容易冲动。哈里曼的建议的确有益。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

从6月15日到18日举行的最高级会谈最终成为卡特总统任内
两国领导人的唯一一次会晤。正如精心计划的那样，这次会议的主
要具体成果是6月18日签署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他
们举行会晤这一事实具有巨大的政治和心理意义。但是十分遗憾，
会晤来得太晚了，时间是卡特任内第三年年中，到了此时，昔日的
消极势力已十分强大。这次会谈产生的最大效果是暂时抑制了对

缓和的侵蚀。卡特必须消除人们因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以及对他与勃列日涅夫会谈不满而造成的对立情绪。参议员杰克逊把卡特赴维也纳之行比作张伯伦参加绥靖希特勒的慕尼黑会议。乔丹以后告诉我,这种比喻使卡特深感痛心,致使他到达维也纳时拒绝用伞遮雨,以免让人回想起张伯伦的形象。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及其附带议定书是此次会谈的主要成就,也是会谈多年来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对苏美关系极其重要。它大大阻止了军备竞赛,即使从未被批准,但奠定了随后十几年中达成大幅度削减核武器的重要协定的基础。

无论详情细节是多么复杂,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实质再明显不过了。双方第一次同意在具体数量水平上削减武器及其替代物和改进物,哪怕只有少量的削减。他们也同意遵守规定详尽的核实安排;这是对苏联传统思维方式的重大突破,因为苏联在过去根本不对任何核实措施加以考虑。在战略武器谈判的长期过程中,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第一次确定了各类核武器总和的最高限额,双方数额相等,其中包括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这一数目并没有超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规定的2400枚的限额。到了1981年1月1日,双方将把数额削减到2240枚,该条约的有效期将保持到1985年。他们还同意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和潜艇发射导弹最多不得超过1200枚。苏联可以保持其现代化重型导弹,美国则没有。两国领导人也在诸如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每年生产限制在30架)等有争议的问题上互相让步,并同意导弹试验发射不得加密,以便一方能够对另一方进行监测。

423

该条约是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明显改进。但双方是在1977年到1979年旷日持久的谈判期间极其艰难地达成这些改进的,因而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宝贵的时间付诸东流。在此期间,美国政界和公众对条约的支持大大下降,结果条约从未被美国国会批准。

条约仅仅控制而没有禁止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组装,这是它

的缺陷之一。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过程也排除了部署在欧洲的中程核导弹,从而导致我国与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何谓欧洲导弹这一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

即使这样,只要条约被尽快批准,双方进入维也纳会谈上同意的下一个阶段谈判(该阶段将举行双边谈判以实现大幅度削减核武器和最后签署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上述消极因素也能克服。毋庸置疑,走向下个阶段的潜力的确存在,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上发生的一件奇怪插曲就表明了这一点。

6月17日是会议的第二天,卡特就裁军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实际上是有关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建议,但以一种十分异常的方式传递给勃列日涅夫。在美国使馆的电梯上,卡特把它交给了这位苏联领导人。他给了勃列日涅夫一张黄色带格的纸,上面草草记着这些想法。卡特也许与其代表团成员讨论后就随身携带了这张纸,但显然他在最后时刻决定试探勃列日涅夫的最初反应。他如果在正式会议上出其不意地拿出这些想法,将冒立即被勃列日涅夫拒绝接受的风险,万斯1977年3月在莫斯科的遭遇正是如此。

卡特的建议即使包含着许多严重的分歧,但为进一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例如,建议没有提到对战略三元系统的飞机部件进行任何限制,而美方传统上在这方面占具优势。不过总的看来,建议在一些方面十分接近80年代后期苏联自己提出的分阶段裁军的重要倡议。

可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在1979年并不准备接受这样一种宽泛的看法,将战略力量均势固定下来的愿望压倒了对真正利益均衡的寻求。五角大楼和国会是否同意卡特的新观点,当时也不十分明显。

不管怎么说,勃列日涅夫那天晚上召集苏联代表团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卡特的纸条”。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拼命反对这些意义深远的建议。契尔年科与他遥相呼应。谨小慎微的葛罗米柯说,诸

多问题不应该一下子就拍板定案,还有时间同政治局其他同志协商,况且我们毫无必要立即向卡特表态。至于勃列日涅夫,他并不想在最高级会谈期间以一种开创性的方法处理新出现的棘手问题。他离开莫斯科只准备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而不对付新出现的棘手问题。因此,他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卡特提出的半官方的建议由此被束之高阁,这样双方就失去了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取得进一步重大进展的另一个机会。

卡特的国内批评者以及苏联领导人把他在裁军领域提出的激进建议说成是典型的理想主义,或者是对一个严肃问题的轻率处理。但是当我回顾1979年的情况时,在我看来,他的行动受到对下述两方面的焦急心理与日益担忧的左右,一是核武库正变得越来越危险,二是迅速的技术进步已经使协议和条约变得陈旧无用。达成条约的过程太缓慢了。进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花费了三届政府6年的时间;与此同时,武器实验室把新一代的导弹、轰炸机和中子弹带给了世界。对于两国首脑来说,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他们自己发挥一种主动而不间断的直接作用,使武器谈判更有效率。我承认,在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之前和期间,我本人就产生过其中的一些想法。

425

由于推迟举行最高级会谈,卡特抱有的与勃列日涅夫进行个人外交的希望也逐渐破灭。在这两三年期间,勃列日涅夫更加老弱多病,精神不振——他在维也纳歌剧院观看节目演出时就昏昏欲睡。与此同时,由于苏美关系动荡不宁,苏联领导人开始把卡特视为眼中钉,他们把造成不稳定归咎于卡特。此外,在翌年的总统选举中,卡特的政治命运究竟如何丝毫不为人所知。总之,两个领导人进行个人外交的会晤来得太晚了。

在会议期间,卡特和勃列日涅夫都简单阐述了各自在诸如欧洲、中东、古巴与苏联在非洲扮演的角色、中美关系、人权、贸易等许多问题上的立场。他们在多数问题上意见相左,但回顾本身有助于理解两位领导人的思想。地区冲突和人权还是争执最为激烈的

问题。意识形态在双方显然都居支配地位。这次最高级会谈没有导致双方对苏美分歧的进一步理解,更不用说找到解决这些分歧的方式了。

在这次会谈期间,我对主要角色进行了密切的观察,我发现卡特显得十分轻松,在讨论不同问题时,不需要顾问的帮助。他有点像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谈期间的肯尼迪。勃列日涅夫知道我们在重大争执上的主要立场,但没有准备进行复杂的讨论。在多数情况下,他只是照本宣读其助手在具体问题上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并不逐一说明。他的译员持有发言稿的全部复制件,即使勃列日涅夫念错时,翻译还是准确无误。如果卡特要求对其陈述进行详细说明,苏联代表团将予以准备,以供勃列日涅夫在下次会议上发言。如果这还不够,葛罗米柯将介入并阐述我们的立场。

426 尽管勃列日涅夫掌握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最低限度的材料,但他在生命的晚年离不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的确令人捧腹。在一篇稿子上,我们代表团在最后时刻删去了其中一段,当勃列日涅夫念到这里时,他转向译员,大声问道是否应该读这段话。译员做了否定的回答后——我们总是保证使总书记完全明白他所宣读的所有内容——勃列日涅夫才继续往下念。译员本身就是来自外交部的外交家,经验丰富,他们在为勃列日涅夫与卡特一个接着一个的会晤充当翻译时,事先为勃列日涅夫的可能回答准备了几种译文,以便在需要时刻帮助他选择正确的。这种安排属于国家重要机密,不过我猜测美国代表团完全明白其中的奥妙。

中国问题是在两个领导人最后会谈时讨论的。在这个问题上,勃列日涅夫情绪十分冲动,不用讲稿就谈了起来。他试图说服卡特,相信中国领导人的保证和利用中国人反对苏联都是危险的。卡特由此侥幸知道勃列日涅夫对这一问题忧心虑虑。勃列日涅夫未能掩盖他那冲动的情绪仅仅增加了美国领导人利用这张王牌对抗苏联的诱惑力。

然而，两位领导人在维也纳会谈期间却建立了友好的个人关系。尤其是他们在告别仪式上拥抱吻面，的确令在场的所有人感到十分惊讶，卡特回国后也为此陷入政治窘境。在两国领导人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后将要起立时，我听见站在他们身后的葛罗米柯低声对乌斯季诺夫说：

“你觉得他们将相互吻面吗？”

“我想不会，”乌斯季诺夫回答说，“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呢？”

“嗯，我不敢肯定，”葛罗米柯说。

葛罗米柯比他的同事更了解勃列日涅夫。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对他的下属说，卡特“终究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朋友。”

在苏联代表团中，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契尔年科只是重复他们的话或勃列日涅夫的话，要么就默不作声。至于乌斯季诺夫，卡特在开幕式期间建议，两国国防部长应该在另一次会议上单独会谈，使他们能够建立个人关系，探讨诸如削减中欧部队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那天下午，在我们代表团秘密开会时，勃列日涅夫敦促“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的教名）与他的对等官员哈德罗·布朗举行会谈，但乌斯季诺夫显然不愿意与美国人谈判，他认为那是“葛罗米柯的事情”，为此还引起了争论。

葛罗米柯说，在进行中欧裁军谈判时，苏联代表团有一张未用的应急牌：我们准备把我们在这一地区的驻军再削减一万人，并做出其他一些让步。葛罗米柯建议，乌斯季诺夫在与布朗会谈时应该打出这张王牌，苏联国防部长为表诚意愿以一个折衷建议来对待会谈。他认为，这会帮助布朗作出对应让步。

屈于勃列日涅夫的压力，乌斯季诺夫勉强同意了。会谈在第二天举行。没有任何外交代表参加，以免这些内行在场会使两位国防部长感到不自在。乌斯季诺夫两小时后怒气冲冲地返回使馆。他始终不愿意在高层次上与美国人会谈；他回避美国人，并设法说服勃

427

列日涅夫,这种会谈将是徒劳无益的。这次经历只是更坚定了他的看法而已。

他以厌恶的口气告诉勃列日涅夫:“我无法想象葛罗米柯或多勃雷宁如何能耐着性子与美国人进行谈判。我努力从各个方面接近布朗,向他谈到未来远景,说了我们的让步,但是布朗反应冷淡,并不承诺回报任何东西。唉,他只是吞食了我们的让步,老是重复众所周知的美国立场。那一套我已经忍受够了。”

葛罗米柯没有再劝说乌斯季诺夫改变他的方式,因为他把与美国人的谈判看作本职工作。所以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在与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的合作中,在形成国家的对外政策上,尤其在与美国关系方面,差不多成为一个享有无限权力的人物。

从最高级会谈跌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泥潭

布热津斯基从维也纳一回国就交给我卡特送来的一件礼物,即一支纪念签署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特制钢笔。布热津斯基把卡特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心情描述为“外表反常但实质上可以理解”,因为总统感到心理上的紧张状态已经松弛下来,这就使他相信与苏联进行理智对话以及达成进一步协议的可能性。然而,条约本身的命运出现了不祥之兆。对于反对派掀起的抵制批准条约的大规模运动,白宫显然忧虑万分。万斯说,这场运动“仅仅是因为与苏联签署了这一条约而受到传播媒介的支持”。戴维·洛克菲勒告诉我,尽管工商界对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感到满意,但他作为外交机构的一位领导请求我们在强调对条约的立场时宽容“参议院的吹毛求疵者”。洛克菲勒谈到,造成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卡特的国内政治处境不利,特迪·肯尼迪正在利用这一点,试图在一场可能的交锋中争取民主党人支持他,以使总统失去支持的席位(肯尼迪并不反对条约)。洛克菲勒说,这位参议员尚未真正形成自

已明确的政治方针,只是试图利用公众,得到他们的同情。

与此同时,总统让一个退役的将军乔治·塞格尼厄斯出任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想让他在批准条约过程期间,以一个军人出面来平息反对情绪。塞格尼厄斯在与我谈话中承认,他所面临的任务决非轻松。公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国家的能源危机和伊朗革命造成的汽油短缺上面,他们会反问那些试图支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政府官员,为什么他们必须在加油站排着长队等待呢?

在莫斯科,政治局、政府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6月22日发布了一个联合决议,称赞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是“朝苏美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形势正常化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几天以后,葛罗米柯就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举行了大型记者招待会,他的评价有条不紊,无可挑剔。他肯定知道,这次最高级会谈在美国遇到了麻烦。因此他警告说,莫斯科将拒绝考虑进一步的修正案或重新谈判条约。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测。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提出几十处修正,在经过长时间和争执不休的听证会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9票对6票使条约获得通过,但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把条约送给参议院全体会议,这实际上是置条约于死地的阴险一招,结果10票反对批准,7票弃权,无一票赞成。

古巴小危机

在古巴问题上爆发的一场新的苏美危机使局势更为恶化,只是这一次危机不是两国政府中的任何一个直接挑起的。一支2000人到2600人的苏军分遣队——或如美国所称的“旅”——事实上自1962年以来就驻扎在古巴,训练古巴人掌握苏联的军事装备,肯尼迪总统就知道它的存在,其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可是它在1979年为公众所知时,就掀起一场不利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批准的政治轩然大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参议员正为他的重选闹别扭,所以下令停止批准限

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听证会。

4:9 此时我正在莫斯科，我的双亲都已经病危。万斯不得不请求葛罗米柯派我返回华盛顿，帮助他弄清问题。安葬了我的父亲后，我为了那说好听点是一种愚蠢的争斗，说坏点是一种基于虚假或扭曲情报之上的政治阴谋，离开了奄奄一息的母亲，未能参加她的葬礼。我抵美后向万斯说明了美国人称之为驻古巴苏联旅的情况。我说：“它还是老样子。我刚刚从莫斯科来。我反复核实过，它1962年起毫无变化。”我感到既生气，又悲哀。外交部门、国会成员、白宫官员和我频频会谈，用了数周时间才算解决了这场古巴小危机。万斯后来不无讥讽地把这场轩然大波说成是美国的“记忆失灵”。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历史首先是作为悲剧然后作为闹剧在重演。

在批准问题上另一些真正的和虚构的困难被政府官员、国会成员和新闻媒介用来对苏联施加压力，这要么是试图进行政治讹诈，要么至少被莫斯科看作是这样。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8月6日送交给政治局一份备忘录，力促政府持强硬态度，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备忘录列举了美国从批准个人移民申请到莫斯科与第三国关系等诸多要求，谴责华盛顿企图借机利用苏联批准条约和商业关系平等的愿望，达到要挟我们在其他无关之点上做出让步的目的。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随后警告说：“我方的任何让步将导致厚颜无耻的新要求。由此可见，我们对任何此类新要求所做出的反应应该是坚定我们的立场，要么干脆就置之不理。”

政治局认可了他们的建议，这当然使他们在抵制这些棘手问题时态度更为强硬，卡特原本还希望能在维也纳他感觉到的好转气氛中使之解决。结果，过分的要求由于卡特政府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未能让步而被不屑一顾，造成了与卡特的愿望背道而驰的结果。

作为冲突场所的欧洲

卡特政府在欧洲的政策旨在大力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其取得对华沙条约国的优势,这是1978年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理事会会议正式通过的政策。一项所谓北约核力量现代化的计划是中心所在,其实质就是在欧洲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对苏联领土的欧洲部分构成打击能力。1979年12月,北约理事会接受了一项美国计划,部署能够在不到10分钟内从欧洲打击莫斯科的108枚潘兴-Ⅱ导弹,以及464枚战斧陆基巡航导弹,后者命中率更高,射程远达1500英里。上述部署是对苏联在其西部领土紧急部署我们新建造的SS-20导弹的反应。SS-20导弹灵敏度高,相当准确。

430

在军方的压力下,苏联领导人做出了部署SS-20导弹的愚蠢决定,军方被这种导弹的高性能冲昏了头脑。当我们单方面地秘密部署SS-20导弹时,苏联最高领导人对苏联核潜力在欧洲竞争地区的加强而感到得意。但是当美方宣布了类似的计划时,莫斯科着实大吃一惊。刺激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使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北约的部署也属于美国军事、政治战略新方案的组成部分。这一方案暗示,苏美两国在“中心战略系统”上的对等状态出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这进而意味着美国应该在地区系统同洲际核运载系统一样达到与苏联的同等。但在实际上,这种安排将改变总的核导弹均势,对美国有利。关键是我们的中程导弹不能发射到美国领土,而基地设在欧洲的美国导弹则能打击苏联欧洲部分几乎每个地方的目标,从而相当于战略导弹。

事实证明,我们部署SS-20导弹的决定是一场灾难,它不仅使我们花费了巨额的钱财,而且引起了西方采取军事报复手段,其表现是1983年西欧部署了自己的中程导弹。结果军事紧张状态在欧洲加剧,总的战略核均势转向有利于美国。以后,双方为缓和紧

张状态不得不做出巨大努力,相互放弃这类导弹,进而予以销毁。这是对最早部署 SS-20 导弹是一个严重失算这一事实的迟到的和勉强的承认。

431 在美国,许多人认为,苏联可能进攻西欧,并确信美国在一场洲际导弹决斗中不会仅仅为了保护欧洲人而以自己的城市为赌注。哈里曼1978年就认识到这种日益加剧的危险,通过我劝告勃列日涅夫发布苏联已经停止在欧洲军事集结的重要公开声明,以便使他能够发动一场有力而成功的宣传攻势——正如苏联发动的这场运动已经破坏了美国在欧洲部署一种新型核武器即中子弹的计划。中子弹通过辐射致人于死地,但却不毁坏财产,因而被看作是发动战争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武器,而不被视为是对进攻的防御。

然而在那个时期,我国的欧洲政策摇摆于矛盾的要求之间。在缓和紧张状态和通过承认以“东方政策”而著称的德国和解政策而发展与西欧国家全面关系上,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我们也狂热地在欧洲集结我们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一行动是秘密进行的,避开了公众的眼睛和维也纳多边会谈,结果只是使西方疑虑重重,引起它首先加强其常规的北约部队,继而加强其在欧洲的导弹。

1979年9月下旬,万斯和我讨论了美国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的计划。根据我的记忆,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详细谈到这一问题。万斯显然着急要我们作好准备。他并不掩饰这一事实,即卡特政府期望在12月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得到北约盟国的必要支持。万斯直截了当地说,北约的决定是美国政府促成的,以回答我们部署 SS-20 导弹,对此万斯表示深感遗憾。

莫斯科发起了一场反对部署潘兴-II 导弹的大规模公开运动。10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东柏林讲话时尖锐地批评了打破欧洲力量均势的部署计划。只是到了此时他才提出削减苏联的导弹力量,条件是北约不部署新型导弹。他还建议翌年从德国撤出2万人的部队和1000辆装甲车,但为时已经过晚。我们应该早在哈里曼以

及参议员曼斯菲尔得、富布赖特和肯尼迪提出这样的建议时采取行动。

10月9日，卡特拒绝了勃列日涅夫的提议，以坚定的语气赞成加强北约力量的计划。他同时拒绝了勃列日涅夫紧接着提出的建议，即在安排12月召开北约会议之前开始就欧洲部署导弹进行谈判。卡特首先决心保证支持其盟国，然后，仅仅是然后，才全力对付我们。

11月19日，我与布热津斯基进行了会谈。他转达了总统关于美国在欧洲将不谋求军事优势的保证——但对苏联的优势也不能保持沉默，所以美国不会坐视不理，袖手旁观我们在欧洲集结核导弹潜力。布热津斯基坦率地承认，美国的固执态度是基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考虑，前者甚至比后者更为重要。他说，构成卡特政府政策的基础是美国希望在北约内保持强有力的影响。布热津斯基还谈到，欧洲人清楚，苏联威力强大的中程武器是针对着他们的，莫斯科由此能够对西欧国家给予毁灭性的打击。美国人是否冒险以其洲际导弹力量给予反击，他们对此表示怀疑。

432

“我们能够想象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即苏联利用其在这一地区的优势，或许能对西欧施加强大压力使之面临着两难处境，要么一败涂地，要么接受如芬兰的地位，断绝与美国的盟国关系。”布热津斯基说。美国人担心，西欧将很快选择当时被称为“芬兰化”的中立道路，这有悖于美国的利益。

纯粹从逻辑方面讲，布热津斯基的话不无道理。当然这种说明并未反映出苏联政府的任何真正计划或目的。莫斯科将不会冒险使用其 SS-20 导弹的新力量，但西方人如何确切地知道这一点呢？

在那段时期，我常常为磋商某事来往于莫斯科，我从未听到过政治局任何成员或我们的高级将领讨论甚或提到诸种政治考虑。我也没看到过政治局或外交部的任何文件谈到部署我们的 SS-20 导弹产生可能的政治机会或后果。军事上的正当理由是早

就提出的唯一理由。在我们与美国和北约欧洲成员国在潘兴导弹问题上面临着外交对抗之前，外交部只是参与制定了国防部的这一计划。

433 这些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政治局还是在精神上从事军备竞赛，满意地接受了我们军方领导人的这种评价，即我们的新式武器系统能够带给我们在欧洲的核均势，以中程运载系统对付西欧的美国前沿配置系统。这是决定性因素，此外政治局还认为它也会使我们在战略均势上与美国人处于相等水平：在莫斯科眼中，北约在欧洲的核武器被视为是对苏联的战略威胁，应该被苏联核武器相抵消。不过，克里姆林宫并不期望北约的欧洲国家——在美国的急切援助下——为对付我们的 SS-20 导弹很快同意在它们的领土上部署美国的导弹，以抵制来自莫斯科的任何政治讹诈。这恰恰是布热津斯基的论题，美国和欧洲的亲美宣传机构非常成功地利用了它，布热津斯基和他的同事则靠着纯粹的惯性继续低估了西方舆论的作用。

1979年12月12日，北约批准在西欧部署108枚潘兴-Ⅱ弹道导弹和464枚巡航导弹。北约的这一决定属于所谓“双轨”方法的组成部分，即在部署导弹的同时寻求谈判，谈判如果成功，将放慢或取消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部署。这一举措加剧了莫斯科对卡特及其政府的敌对，因为苏联领导人首先把之视为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中规定的战略限制的故意违背。美国在欧洲部署能够打击苏联领土目标的中程导弹毕竟是对美国战略核潜力的重要补充。针对北约提出的谈判建议，莫斯科声明，北约试图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这一事实已经破坏了谈判的基础。只是北约的决定被取消或其执行公开中止，莫斯科才会来到谈判桌前。

僵持状态在延续，双方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的决定进一步恶化了它们的政治关系，丝毫没有减少对各自国家安全的威胁。

第二十五章

阿富汗

1980年前夕，我在莫斯科一家医院接受年度体检。12月28日早晨，我被无线电中传出的高声通告所惊醒。苏联部队“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进入该国。对我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打电话给外交部的朋友。他们证实了这一消息，但很少有人能告诉我详情细节或者说明整个行动由政治局策划，高度保密。阿富汗长期血流成河的悲剧从此开始，数年后当我就此事撰写文章时，世界尤其是我国感到了它带来的令人悲哀的结果。

干涉的背景

许多年来，阿富汗远远置于全球活动的主流之外。它与美国和苏联保持着同样的友好关系，满足于它的中立地位，对孤立于现代世界颇感自得。阿富汗国王不时访问苏联，甚至在那里度假。他也去会晤西方领导人。1973年，国王正访问罗马时，被他的堂兄弟穆罕默德·达乌德所推翻，之后阿富汗继续保持中立。这个国家没有卷入任何严重的国际争执，因奉行不结盟政策而受到许多国家的尊重，即使阿富汗与苏联有长达几乎1000英里的国境线，但不结盟政策使之免于卷入大国的冲突。大国在该国达成了一种妥协；首都喀布尔南部的所有援助计划由联合国或西方援助专家所经办，北部的所有援助计划由苏联援助专家所控制。在莫斯科，外交部的阿富汗处是苏联外交部门最平静的机构之一。

阿富汗共产党势力不大,按照意识形态和部落分裂成著名的“人民派”和“旗帜派”,前者比较激进,后者更亲近莫斯科,在地方政治统治集团中影响很大。70年代期间,伊朗国王同意为阿富汗第一条与伊朗接轨的铁路提供资金,达乌德在一定程度上受伊朗国王的影响,表现出有点脱离苏联的倾向,因此他开始解除旗帜派人的官职,即使这样,还有些旗帜派人士在政府内供职。

1978年4月,阿富汗发生了一场政变,历史学家对政变的原因至今仍然争执不休。共产党派别之间的长期不和,其中包括一位著名的旗帜派人被谋杀,可能起了作用。4月27日,阿富汗装甲部队和空军进攻达乌德的宫殿,杀死了他以及大多数部长和宗室人员。据我所知,苏联使馆的外交官员起初不知所措。克格勃的卷入即使有的话,也不明显。

一个迅速升级的动荡时期从此开始。这场政变成立了由人民派和旗帜派组成的政府,但是旗帜派人士在两个月就被驱逐出,通过新总统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及其冷酷无情的同事哈菲祖拉·阿明,权力落到人民派的手中。旗帜派领袖巴布拉克·卡尔迈勒被贬谪到布拉格任阿富汗大使。我们主要通过克格勃的特工逐渐卷进了国内各派的斗争。阿富汗新政府试图把在土地占有、教育以及甚至在农村地区起着重要作用的嫁妆等方面的激进改革强加给实质上还是中世纪的农民。改革在没有对农村适当认识的情况下进行,激怒了地方毛拉。到了初秋,该国东部地区爆发了武装起义,进入寒冬就蔓延到大多数省份。莫斯科焦急不安,但断然拒绝了塔拉基提出的直接提供军事支持以对付赫拉特省城战斗的请求。

1979年2月,喀布尔发生了导致美国大使阿道夫·达布斯遭害的悲剧事件,达布斯是我非常熟悉的职业外交家,曾在莫斯科任使馆代办,在华盛顿任负责苏联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当他驱车回使馆时,喀布尔的一伙恐怖主义分子把他作为人质从车上推下来带到了主要的旅馆闹市区。这伙人困守在一家旅馆的房间,试图

与阿富汗政府讨价还价。大约两小时后，阿富汗保安部队猛攻这间房子，达布斯在混战中饮弹身亡。

莫斯科对这一惨案深表遗憾。与此同时，它拒绝对阿富汗当局未能救出这位大使承担任何责任，阿富汗当局声称已安排了从恐怖主义分子手中解救这位大使的行动。不过我们继续进行秘密调查，证实阿富汗保安部队的苏联顾问在试图尽速解救达布斯时未能完全控制该部队。对阿富汗政权来说，这是一个声望问题，组织欠周密的行动导致了悲剧。

在1979年剩下的日子里，类似的事件尽管不太引人注目，但加剧了阿富汗的紧张局面，使莫斯科对我们南部边境的动荡不宁忧心忡忡。苏联提供了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以稳定阿富汗政权。在此期间，阿富汗领导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血腥的竞争。首相哈菲祖拉·阿明10月8日在废黜他的阴谋被粉碎后，命令将总统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处死。克格勃越卷越深。我们的情报部门不信任阿明，认为他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也许会转向美国人求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这是克格勃向政治局报告的主要内容。

1979年12月27日，在一场受苏联情报部门支持和参与的政变中，阿明被推翻和处死，情报部门大大加深了莫斯科的卷入，在苏军出兵这一重大决定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克格勃受到我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坚决支持。苏联驻喀布尔使馆小心翼翼地反对阿富汗内战，更不用说最终发生的这场大规模入侵了。

1980年1月初返回华盛顿使馆后，我起初并没有把遥远的阿富汗发生的事件看作是我们与美国已经恶化的关系的关键所在，尽管由于该地区日益动荡和苏联卷入这些事件，美国已越来越关注那里的局势。华盛顿不时把它的担忧传递给莫斯科。可是苏联领导人并不想主动进行对话，因为他们认为阿富汗属于自己的利益范围。他们不希望美国在该地区的任何利益合法化，就像美国人极不想使苏联在非洲或中东的任何存在合法化一样。

这里有必要谈谈伊朗的局势。伊朗位于阿富汗的西南边境。1978年,美国为支持伊朗国王增加了对伊朗的武器援助,派遣了大批顾问,这一举动只能使莫斯科深感不安。11月17日,勃列日涅夫致电卡特,强调苏联对美国图谋影响伊朗发展的忧虑,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伊朗是我们与之保持正常关系的邻邦国家。他请求两国政府公开声明不干涉伊朗的内政。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苏联也有这种图谋,还说美国坚决支持伊朗国王恢复伊朗安定的努力,将在外交政策、经济和安全方面与伊朗保持关系。可是随后形势急剧发生变化——伊朗国王出逃和反美情绪爆发。1979年11月4日,美国驻德黑兰使馆被一群狂热的暴徒所占领,使馆全体人员被扣作人质,持续了许多月之久。这一事件是对卡特政府声望的沉重一击。

在美国,要求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愤怒之声日渐上升,莫斯科再次感到不安。11月7日,我拜访了布热津斯基,受莫斯科指示私下告诉他,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干涉我们这个南部邻国,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他向我保证美国决无此类计划。同一天稍晚的时候,万斯告诉我,军事行动已被取消,原因是它将危及人质的性命。在联合国,苏联在要求人质获释这一点上支持美国,莫斯科在给阿亚图拉·霍梅尼新政府的一份秘密外交电文中也请求释放人质。布热津斯基12月5日向我表示了卡特的感谢。

木已成舟

从1979年12月初开始,由葛罗米柯、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以及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组成的小圈子在克里姆林宫详细讨论了阿富汗局势。阿明被怀疑倾向美国。随后他们面见勃列日涅夫,坚决要求为了“不失去阿富汗”,苏联应该采取果敢措施。他们说服了勃列日涅夫。到12月中旬,勃列日涅夫决定把这一问题提交给政治

局全体成员讨论。另外3名参加内部讨论者受命准备一份特别报告,对苏联军事干涉阿富汗进行分析和提出建议。

1979年12月12日深夜,一个秘密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做出这一蓄谋已久的重大决定者不是整个政治局,而只是政治局内一伙最有影响的成员。除了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之外,出席会议的还有头号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莫斯科市委书记维克托·格里申、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基里连科以及党的国际部长波诺马廖夫。勃列日涅夫主持了会议。

438

会议讨论了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的建议。这份报告的主题简洁明确:阿富汗形势严重威胁了苏联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这种局面能够被美国、中国或伊朗通过建立和扶植一个不友好的阿富汗政权用来对付我们,因此立即派兵进入阿富汗以阻止这种危险的发展十分必要。乌斯季诺夫满有把握地认为,整个军事行动可以相当迅速地完成。安德罗波夫谈到他在喀布尔的部下与该政权关键成员交往甚密。葛罗米柯讲了讲国际上批评入侵的可能性,但同意安全原因与之相比更为重要,苏军1968年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时局面与此相同。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支持与第三世界人民加强“国际团结”的政策。勃列日涅夫不屑深入进行冗长的解释或讨论,他简略地建议批准派遣苏军到阿富汗的计划。上述占据最高地位的三驾马车受命为部队部署做出安排,监督进而采取的措施,其实,部署工作已在进行之中了。

这样,最后决定毫无异议地被通过——一项对往后多年国际关系产生灾难性影响的决定。美国通过卫星很快发现情况有点异常,于是向我们提出询问。舒尔曼12月15日拜访了苏联代办弗拉季连·瓦肖夫,谈到美国不无忧虑地注意到“苏军大部队继续部署在苏联国土之外”,也就是在阿富汗。在这一问题上,华盛顿要求根据1972年缓和最高潮时苏美之间签订的协定予以解释,该协定规定“对也许威胁和平与我们相互关系的国家冲突进行协商和互通情报”。莫斯科对美国的要求基本上未予理睬。

因为勃列日涅夫优柔寡断,身体欠佳,医生要他避免过分焦虑和激动,这就为政治局最活跃的成员提供了方便。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在这一有关阿富汗的不幸决定上起了作用,因为他们各自的特别部门已经积极地卷入了阿富汗事件。弗拉基米尔·克留契科夫是克格勃高级官员,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升为克格勃的首脑,他亲自指挥了那次行动。他们使勃列日涅夫确信,胜利将是轻而易举。

439 葛罗米柯在外交上小心谨慎,经验丰富,但在军事上却非如此,他显然决定依赖政治局那些在秘密行动计划上态度坚定的同僚以及政治局内的一般情绪。令人奇怪的是,他丝毫没有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做出强烈反应的可能性提出任何异议或警告。

葛罗米柯低估了这种反应的力量。他肯定认为,莫斯科与卡特政府之间已经敌对的关系几乎不可能因为苏联打算在阿富汗采取行动而有所恶化。我们驻华盛顿使馆人员无人被问过有关可能的反响,当时即使我在莫斯科,葛罗米柯也不会找我商量,他认为,美国无论会做出什么反应,都不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主要因素。

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取代葛罗米柯成为苏联外交部长后曾告诉我他在葛罗米柯的个人保险箱内发现一封信,内装支持苏联这次入侵的宣传材料,关于阿富汗的任何文件均未发现。即使葛罗米柯最初犹豫不决,但后来他是热情支持这一行动的。

另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当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其他毫无作战经历的高级军官赞成使用部队时,我军总参谋部和直接了解阿富汗的军官反对这一计划。尼古拉·奥加耶夫、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和瓦连京·瓦连尼科夫等将军负责准备入侵计划,他们呈递给乌斯季诺夫一份报告,警告把苏联正规部队介入一场持久内战的种种危险;在好战部落居住的险峻多山地带,这种行动将是徒劳无益的。他们立即被召到国防部长面前,笔直挺立,被痛斥了一顿。“我们的军队什么时候决定过外交政策?”乌斯季诺夫问道。他命令他们“停止讨论”,赶快准备军事行动计划。

12月6日，由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契尔年科参加的另一个会议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举行。三驾马车汇报了12月12日会议上所做决定的执行情况。勃列日涅夫批准了准备工作，其中显然包括克格勃推翻阿明的计划，尽管此事未留下任何书面记载。

第二天，全体政治局成员讨论了我们在阿富汗的下一步行动，决定开始派遣我们的主力部队。政治局批准了发给苏联驻各国大使“澄清”这一决定并为之在国外辩护的指示，同时致电国外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解释我们对阿富汗所发生之事的看法。

440

政治局也批准了官方塔斯社的解释。塔斯社将宣称，苏联军队被派往阿富汗“执行阿富汗领导人恳求的任务，其目的只是为了击退外部的侵略”。这种解释难以自圆其说，所以另外一项秘密决定当场被通过，题目为“关于对我们在阿富汗行动的宣传支持”。以苏联共产党名义撰写的通告被批准在全国发表，对阿富汗事件做出我们的解释。附加通知随后秘密下发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委员会。政治局试图为明显属于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辩护。12月28日，大规模的入侵开始。从名义上讲，苏军进入阿富汗是应以我们的被保护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为首的“新政府的请求”，其实政府本身刚刚组成，卡尔迈勒还在国外。在1980年1月2日的会议上，政治局把苏军入侵阿富汗的兵力定为5万人。

1月初，在我返美之前，我向勃列日涅夫表示了对我们与美国之关系的忧虑，他满有把握地告诉我：“此事将在3到4周内结束。”的确，卡尔迈勒似乎迅速在苏军与阿富汗军队驻扎的喀布尔和阿富汗各主要城市确立了统治。1980年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因此提出苏军部分撤出这一问题。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三驾马车在波诺马廖夫的支持下认为，卡尔迈勒政权尚不够强大，没有我们部队的支持将会被推翻。这将向苏联在世界各地的盟国发出了我们不可依赖的不祥之兆。

勃列日涅夫没有提出异议，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深知一

项向国外派兵的重大决定不可能单单由他或政治局做出。他提议政治局应该请求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政治局实际上只是这个更大机构中享有权力的指导委员会。约200名成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随后不久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大家一致支持政治局，无人表示异议。

441 从此以后，阿富汗事务就委托给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三驾马车，他们通常通过由其代理人组成的一个工作小组发挥作用，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代表克格勃，阿赫罗梅耶夫代表国防部，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代表外交部。尽管后两人反对由他们指挥的军事干涉，但却按照各自上司的命令行事；他们以后在撤兵问题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三驾马车不时向勃列日涅夫汇报，提出他和政治局通常采纳的建议。随着他们上司的改变，在三驾马车上供职的人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包括以后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长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克格勃的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勃列日涅夫偏爱三驾马车发挥作用的方式，以致他为波兰、古巴、裁军和其他重要问题设了许多新的三驾马车。勃列日涅夫随着日益衰老，逐渐不再用此方式进行控制，他愿意信赖政治局指挥三驾马车工作的亲信成员。

是什么原因促使克里姆林宫决定入侵阿富汗？迄今我们尚未发现任何书面证据来肯定地说明最初的动机，但是间接证据以及那些与事件密切相关者的证言清楚地表明，莫斯科并未制定任何宏大的战略计划，以建立通向中东石油富国的新的立足点和由此获得对美国的全球优势，这与美国最顽固的反苏分子的主张，其中包括白宫内卡特那些人的主张形成对比。如果苏联领导人拥有这样一种计划，他们将会更加注意华盛顿可能做出的反应，将会采取先发制人的外交措施。但在苏联档案馆，无任何确凿证据证实这种征服战略理论。

苏联对当地局势做出的反应是，我们的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

由于阿富汗内部日益动荡和阿明政权的显然无能而受到威胁。几个月后在一次私人谈话中，万斯对我说，他与我一样认为阿明的确是个恶棍，但我能理解他的话意，无非说阿明不是美国的代理人。总而言之，乌斯季诺夫认为，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措施，阿富汗在未来就会成为美国反对苏联的另一个前哨基地，其地理位置正好攻击我们中亚共和国的“柔软的下腹部”。意识形态的原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即维护这个亲苏政权的目的旨在对付我国穆斯林人口居住的边境地区附近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断上升的挑战。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有力地强调这一点，两人分别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想抓住这个机会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围。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明确宣称，苏军在阿富汗的出现不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在扩张主义与缓和之间做出自觉选择的结果。就我所知，在讨论中，克里姆林宫甚至没有考虑过这类选择，我所看到的记录尚未证明他们甚至在这些术语上有所考虑。

442

然而它是一个严重的估计失误。一场在毗邻小国进行的战争因为出现游击队抵制将持续10年之久，无论莫斯科如何竭力靠着不断干预它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喀布尔政府来解决阿富汗内政，但苏联人民不得不为他们的冒险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些大概是任何苏联领导人所始料未及的。

我在莫斯科短暂停留期间，于1985年10月17日偶尔参加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在确定我们撤兵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会议严肃认真，气氛压抑。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提出了“解决阿富汗的方案”——结束我们的卷入和撤出的时间已到。他首先描述了阿富汗的形势以及政治、经济和我们对外交政策的有关问题。接着他说：“我们把我们的军人派到那里，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并不十分明确。离开的时间已经来临。”他没有敢把最初政治局入侵阿富汗的决定说成是一个严重失策，因为他实际上正向5年前投票派兵的同一天政治局发表讲话。但他的概括十分明确：“不管是支持

卡尔迈勒,还是抛弃卡尔迈勒,我们都应该坚决采取一种尽早使我们从阿富汗撤兵的方针。”无人对此提出异议,也无人表示坚决的赞成,只是默默地勉强同意。这次会议在决定我们从阿富汗撤兵上至关重要,戈尔巴乔夫过了好长时间才将会议内容透露出来。

过去我们把阿富汗视为美国与苏联之间争夺第三世界的战场,这一遗产的影响经久不衰。此外,由于阿富汗问题悬而未决,我们日益陷于窘境,最终成为我们自己的“越南综合症”——担忧在整个世界的眼中蒙辱离开战场,由此损害大国的形象。

1986年5月——当戈尔巴乔夫逐渐成功地换掉了政治局全体成员后——他决定除去卡尔迈勒。卡尔迈勒已被苏军占领当局安排就职,但事实证明他根本不称职。戈尔巴乔夫想以我们安全部门推荐的纳吉布拉这个“铁腕人物”取而代之。卡尔迈勒被召到中央委员会大楼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我当时是负责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有幸成为他们会晤的唯一目睹者。戈尔巴乔夫直截了当地告诉卡尔迈勒,他应该把职位让与纳吉布拉,定居在莫斯科。其家属已经居住在这里。

卡尔迈勒顿时茫然失措,他低三下四地乞求戈尔巴乔夫改变主意,允诺以一种更端正的积极方式履行职责。但戈尔巴乔夫不为所动,他不再相信卡尔迈勒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摆脱事实上由苏联自己所造成的僵局。整个场面留下令人悲痛的印象。

阿富汗问题在政治局内部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政治局最终决定撤兵。戈尔巴乔夫对我说,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在两年内撤出,1987年期间分阶段撤出我们的一半部队,另一半在1988年期间撤出。他希望阿富汗最终将保持中立,美国将不会在该国取我们而代之。事实证明,这种政策完全失败了。

撤兵到1989年2月15日才告结束。同年12月,苏联议会在回顾历史时谴责了这次侵略,宣布侵略决定是由前领导层内一个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组成的小圈子所做出。随着对外和对内政策出现了一种新方法,苏联新领导人正式

通过了这一颇受欢迎的悔过决议。然而这出长达10年的悲剧在我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它在耻辱的失败中结束，并且动摇了整个苏联政权。

阿富汗与苏美关系

历史毫无保留地谴责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这一定论完全被俄罗斯联邦所接受。但是回首往事，理解卡特政府反应强烈的动机是很重要的。卡特反应强烈，屡屡夸大其词地宣称苏联领导人不可信任，这次侵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和平的最大威胁”。这种有点不可理喻的夸张言语准确地刻画出总统焦虑不安的心情。

正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这是一位受到轻蔑的懦弱领导人仅仅在其权限范围内做出更坚决反应时感情的迸发吗？抑或它是总统最大限度地为了国家利益的一个强硬的蓄意决定吗？卡特那几乎把苏美关系推回到冷战水平的义愤填膺和过分渲染的反应（一些历史学家就这样认为）的正当理由是什么？甚至奉行主动对抗的里根政府都未重复卡特的极端要求，即苏军撤出是在军备控制和范围广泛的其他争执上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一个极不现实的条件。美国对苏军侵入遥远的阿富汗所做出的深受欢迎的反应与它对1968年苏军在欧洲入侵与美国利益更为相关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捷克斯洛伐克所做出的反应相比，强弱程度如此悬殊，其原因何在？

444

我提出这些问题决非为苏联所犯的严重错误开脱，我找不出对之作出的任何便当解释，但是从双方所犯的错误以及失去的机会中汲取教训却是十分重要。苏联的干涉与美国的强烈反应证明是苏美关系决定性的转折点。正是这个转折点才把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时的缓和10年转到里根执政时的对抗年月。莫斯科试图使缓和政策的其余部分存在下来，深信把地区冲突和它与美国的主要争执区别开是必要的。但是卡特在白宫的幕僚得到了一个罕见的

机会使总统信服他们的命题,即苏联对美国构成了全球威胁。双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互不妥协拉开了一场新的冷战。

苏联这一十分错误的行动为美国右翼再次展开军备竞赛提供了一个有据可依的政治借口,恢复了对缓和的攻击,当然也帮助发动这些攻击的领导人罗纳德·里根使卡特的重选成为烟云。就卡特本人来说,他有意识地把包括核争执的美苏关系的整个范围缩小到阿富汗问题,从而使苏美关系在世界其他地区难以取得进展。卡特的这套报复举措对苏美在政治、贸易、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错综复杂的全面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是卡特决定无限期地推迟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批准,哪怕条约几乎同等地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这些行动加在一起构成了卡特政府对苏联政策的全部内容,因此缓和政策实际上已注定取决于苏军能否从阿富汗撤出。

克里姆林宫面对新的形势开始重新考虑苏联的对外政策,其主要任务是掩饰和最终抵消它入侵阿富汗所造成的影响。这种认识促使我们的政策发生了显著转变,重点从华盛顿转向与西欧进行富有生气的接触。在那年年中,卡特警告他的欧洲盟国,只要苏军仍在阿富汗,就不要对缓和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卡特这番话不是偶然的。苏联领导人也准备对美国采取一种强硬路线。

445 最后,苏军撤出和冷战结束后,莫斯科和华盛顿对阿富汗都失去了兴趣,阿富汗不再是祸根,这一点既引人注目又令人悲哀。阿富汗逐渐被遗忘,尽管使用大国军用品遗留下的武器进行凶杀斗殴仍在发生,但其内战已告结束。如果苏美在阿富汗的长期对峙被苏美积极合作建立和平与稳定而取代,那么这个饱经战乱国家的状况也许会迥然不同。

让我主要从个人经历上回顾一下阿富汗危机期间实际发生在苏美关系上的事情。最初的舌战几乎立即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最高层展开。1979年12月28日,卡特致电勃列日涅夫要求入侵部队应该

撤出，在同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称苏联的干涉是“对和平的严重威胁”，是“对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的公然违犯”。那天下午稍晚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和卡特在热线上通了话。

勃列日涅夫在复电中声称苏联的行动是暂时的，但同时告诉卡特，苏军有限的部队将留在阿富汗，直到他们的任务完成为止。卡特在12月31日收到这份电报几小时后接受了电视采访，他指责勃列日涅夫声称苏联的行动是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是歪曲事实，他说这次侵略“使我个人对苏联最终目的的看法造成了更富戏剧性的改变，而先前我在任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未使我这样做。”这番话令人难以忘怀。他的国内政敌抓住这番话不放，将之攻击为一个软弱领导人做出天真而动情的反应。

1月4日，新年伊始总统便发表了戏剧性的电视讲话。他请求参议院推迟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批准的辩论。他也延迟了美国和苏联领事馆的设立，取消了全部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范围从小麦出口到纽约大都市博物馆修道院的珍藏品画展。卡特还宣布，美国及其盟国将向阿富汗邻国巴基斯坦提供军火、食物及其他支持，准备给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类似援助。

1月20日，我从莫斯科返回。苏联领导人沉浸于对卡特及其报复计划怨气冲天之中。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之后感到卡特十分友好，现在也因为卡特的敌对打心眼儿里诅咒他。只有葛罗米柯（以他那特有的谨慎和简洁的方式）向我建议，我在华盛顿应该尽力了解是否能够做些什么来防止我们与美国关系的彻底崩溃。他补充说，卡特的行为就像一头走进一家瓷器店的大象——这是对众所周知的英语短语的俄文翻译。

446

我经历了许多次美国的反苏运动，但这次运动的强烈和规模程度我以前从未遇到。卡特总统个人着迷于阿富汗尤其引起我的关注。他屡屡把苏联的干涉描绘成对美国安全的直接威胁。那些赞成与苏联改善关系的人纷纷销声匿迹。流行于美国政界的一种说法是，入侵阿富汗标志着针对美国的某种宏大战略计划的开始，该

计划远远超出了阿富汗本身，我对此也深感惊异。各类政策专家提出了相当多的推测。主要由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地缘战略思想在华盛顿明显压过了其他的政治和外交考虑。

在我返美几天后，万斯邀请我到国务院与他进行一次坦率的会谈。他特别激动，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内只有寥寥可数的人试图使我们的关系免遭“华盛顿的各类极端主义”的攻击，他总是这些少数人中的一员。他接着说，因为今年是选举年，阿富汗所发生之年的时间选择可能是更为糟糕。它们给了苏美关系以及在美国一贯维护这种关系之人沉重的一击。万斯还谈到，尤其是在竞选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防止关系完全破裂十分重要，在局势稳定之前我们必须保持一个联系桥梁。只有恢复军备控制谈判才能实现这一目的。然而只要事件的地点在阿富汗，关于长期讨论的印度洋非军事化问题的谈判将不得不从现在的议事日程上取消。他还补充说，他已就这些与总统进行了讨论，卡特准备继续谈判，但只能是私下，而不便于公开进行。

我同意我们的关系确实处于低点，应该共同寻求一种解决的方法。不过我说，苏联不可能忽视美国的反苏歇斯底里，尤其是这种歇斯底里是由政府，直言说是由卡特总统本人煽动而起。卡特完全失去了理智，其行为不像是有一个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倒像一个完全受感情左右的人。我指出，在总统多次关于禁止农产品出口的讲话中，他一直希望这种制裁将造成苏联的食品、肉类和面包的短缺，苏联人民将会感到这一点。说得婉转些，这不会有助于增加苏联人民对卡特政府的同情以及友谊。那么，国务卿阁下谈的是哪一种桥？

我谈这些话时语气十分激烈，有时也置外交礼节于不顾。我确实为我们关系的瓦解而忧心如焚，这些关系的建立花费了許多人多年的不懈努力，当然我完全认识到，我们入侵阿富汗起了灾难性的作用。

万斯提出了一个看起来特别有趣的问题。他在犹豫片刻后问

道,美国是否能设想苏联不打算从阿富汗进攻伊朗或巴基斯坦。他把之比作如果铁托逝世后对南斯拉夫的一种假设的进攻,这将把我们的关系置于大灾难的边缘。他向我保证,美国决无此类意图,相信苏联也不会有——但是苏军侵入并不是华沙成员国的阿富汗,动摇了本政府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谨慎意图的信任。

我在这里能够感到布热津斯基的“危机弧形带”理论的影响。我告诉万斯,我能当场正式向他保证,苏联决无向巴基斯坦、伊朗或该地区任何其他国家扩张的计划。

“对南斯拉夫来说它也是真的吗?”万斯问道。

我语气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决没有隐瞒某项计划,此外,我刚刚从莫斯科回来,可以负责任地讲这番话。

万斯如释重负,认为我们两国需要相互理解。可是这次会谈向我表明,我们有机会讨论局势是国务卿而不是总统的提议。只有万斯才会在白宫的一片喧嚣气氛中试图防止我们关系完全崩溃。显而易见,万斯劝告总统与我进行这样的会谈并非易事。另一方面,卡特无疑也想试探我们对巴基斯坦、伊朗和南斯拉夫的意图,这表明他终究还是怀疑在我们政策的背后隐藏着某种“宏大的苏联计划”。

1月23日,卡特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占了上风。总统在讲话中将以后称之为卡特主义的政策公诸于众。他宣称任何外部势力控制波斯湾的任何意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侵犯,这种侵犯将遭到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这番话听起来像1947年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政策的杜鲁门主义。卡特决心奉行一种积极的外交,“使任何侵略者为其侵略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

448

这标志着卡特转而把军事力量视为对付苏联的主要方法。卡特政府对阿富汗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完全出乎莫斯科的意料之外。苏联领导人在阿富汗采取行动时认为这一行动不会触及美国利益,而且不会威胁我们所知的美国在波斯湾的根本利益。然而,

卡特政府的反应竟然如此强烈,就好像阿富汗确实被华盛顿看得极其重要似的。这似乎在强词夺理,因为他们发现很难为美国政府宣布卡特主义和对苏制裁提供更有力的理由。

在卡特讲话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苏联领导人得出结论,仍被克里姆林宫看作地方冲突的阿富汗事件恰恰成为卡特政府大规模恢复军备竞赛、加强美国在波斯湾军事地位以及发动一场全面反苏攻势的借口。所有这一切预示着缓和进程面临着无可挽回的危险。

可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继续干涉阿富汗事务。一系列重大事件照样发生,双方完全失去了相互信任。勃列日涅夫及其政治局同事们认为,卡特在合作与对立之间有意识地选择了后者。与此同时,卡特确信,莫斯科故意选择侵略阿富汗是对其意志的检验。双方处于冲突进程中。

外交与总统的情感

在那年的冬末和第二年的春天,万斯和我努力缓和在阿富汗问题上造成的紧张状态,尽管在一个充满激情的大选年这也许是奢望。美国的反苏情绪如火如荼,很少政治家能够抵制这种情绪的发展,卡特当然也不例外。

449 2月2日,万斯和我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会谈期间,我们讨论了两国外长会晤以帮助消除误会的可能性。我俩一致认为,如果万斯能与葛罗米柯会谈,他们会努力从相互谴责转到逐渐地平息政治气氛和解决一些问题上来。万斯要我试探一下莫斯科,我表示同意。但是我离开1小时之后,他又打电话给我,撤回了他的要求。他刚刚与在戴维营的总统通了电话,总统不让他自惹麻烦。不过万斯仍然坚持不懈,2月8日他告诉我总统原则上赞成这一建议。他交给我一封致葛罗米柯的私人信件,表示希望于3月举行会晤,他认为这是眼下的唯一机会。

我们还讨论了卡特政府向中国人提供诸如卡车、美国卫星终端站等“非杀伤性”军事设备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国防部长布朗访问中国时透露出来的。莫斯科认为，这是对美国拒绝给中国和苏联提供军需品之政策的背离。万斯承认我们的话极有道理：在苏联干涉之前本政府无人倡导向中国提供军需品，这个决定很大程度上是总统本人因为阿富汗问题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做出的。

2月16日，葛罗米柯复信回答了万斯的会晤建议，严厉批评了美国现行的对苏政策。“选择权在美国手里”，这是葛罗米柯复信中的最后一句话，它模仿了1978年卡特本人在安纳波利斯发表的好战声明。

万斯对这种回答感到十分沮丧。“好吧，我们只好看看结果如何，”他盯着信说。

布热津斯基随后对前来参加白宫秘密会议的美国大公司首脑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谴责苏联领导人所犯之罪难以饶恕。美苏贸易和经济理事会联合主席阿科姆公司的C.威廉·维里蒂将他的讲话透露给我。布热津斯基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将至少持续恶化到大选结束，或许延续到1981年。他谈到，卡特决心对苏联在阿富汗的活动“给予惩罚”，与苏联的军事对抗不可避免。他讲话的实质是警告苏联可能用部分撤兵来发动一场广泛的和平攻势，重要的是不要落入苏联的圈套，不要返回到美国舆论对苏美关系缺乏警惕性的状况。

两周之后，万斯告诉我，在他与卡特最近的一次讨论中，他告诫说，如果局势照现在的样子继续发展，我们的关系将受到破坏，这样即使卡特重新当选，卡特的第二任政府也不会有足够长的时间恢复关系，连任期将是一个对抗期。他告诉总统，唯一的出路是不要感情用事并开始理智的对话。可是卡特极其愤怒——他周围的人极度渴望他在此情况下不能自持。

卡特经过一些天的思考后，得出一个十分新颖的结论：他请求勃列日涅夫接待作为他个人特使的持有机密信件的马歇尔·舒

尔曼。在我第二天与布热津斯基谈话时，他透露说，他是这次行程的潜在候选人之一，但是——他坦率地加了一句——他因主张强硬路线而被排除在外。当问道舒尔曼是否有新东西告诉莫斯科时，布热津斯基回答说，不会有令人过分意外的建议，仅是寻找未来的共同点罢了。他进而说，舒尔曼——曾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事——因为不“与总统十分靠近”，成功与否他无十分把握。布热津斯基显然不赞成这次旅行。

我对舒尔曼此行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当僵局已经存在于地位显赫者的层次上时，舒尔曼能够达成什么协议？无论如何，整个计划考虑欠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也未将之组织的有条不紊。舒尔曼本人并未表现出必要的不屈不挠精神，他要求把信直接交给勃列日涅夫，没等答复就返回了华盛顿。这一切对我们的关系等于雪上加霜。

3月18日，布热津斯基邀请我在他的乡间住宅共进晚餐，他说卡特知道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他首先向我保证，总统不打算将竞选活动建立在反苏的基础之上，这和他的一些共和党竞争对手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总统想要我们的关系正常化，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正常化，将意味着双方耗费巨额经费的十年又丧失了。由于两个超级大国几乎都不愿意在一场直接军事冲突中一决雌雄，所以两国关系迟早都必须恢复正常。

我们花了两个小时讨论阿富汗问题，试图找到一种相互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布热津斯基之言明显反映出卡特的某些思想，因此比较重要。与此同时，他也许只是试探我对他个人的想法有何见解，但我从未从万斯那里听到此类事情。布热津斯基提出，阿富汗应该奉行严格的中立以消除苏联对其南部边境地区的忧虑。如果莫斯科企图把阿富汗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国家，把不享有民众支持的卡尔迈勒扶持为国家首脑，美国将继续予以反对。

布热津斯基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这种立场。美国赞成中立的阿富汗像芬兰一样对苏联友好，而不像蒙古一样成为一个仆从国。美

国也打算按照苏联的提议保证不干涉阿富汗事务，它只是希望知道苏军欲逗留多久，仅仅是一两个月，还是数年？用莫斯科的穆斯林朋友如阿尔及利亚或叙利亚取代苏联部队如何？如果来自阿富汗领土的威胁又起，作为最后一招，苏联是否保留重新派兵的权利。如果苏联领导人不过分固执地支持卡尔迈勒政权，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可能为谈判提供了一个基础。到戈尔巴乔夫终于抛弃卡尔迈勒时，谈判已经为时过晚。

布热津斯基还就他那众所周知的“危机弧形带”理论和中国等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我喜欢布热津斯基的直言不讳，尽管这种方式有时使会谈气氛紧张。他说，如果伊朗和巴基斯坦准备宣布中立，美国将根据一项美苏秘密协定予以尊重，但不给予正式保证，以免造成苏联势力范围扩大到波斯湾得到了美国同意的印象。

关于中国，布热津斯基说，出于一种基本而明确的原因，不偏不倚的政策已被放弃，以利于友好关系的建立：美国政府屡次提请莫斯科注意苏联在世界各地利用古巴部队对抗美国利益，但是莫斯科充耳不闻，现在美国也要如法炮制，利用中国人。

我得到的印象是，布热津斯基把这次会谈视为一项方案的组成部分，该方案第一次在阿富汗问题上强调了具体的打算。白宫似乎也意识到，卡特执行反苏政策走得太远了，因此与莫斯科保持联系的愿望变得可行；万斯和布热津斯基轮番利用这种联系决不是偶然的，所以当他们运用时，情况就会忽冷忽热，反复无常。卡特政府模棱两可的方法留下的总印象令人费解。当卡特的人私下与我接触，欲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莫斯科时，他们好像确实担心我们关系的恶化，但该政府的所有公开行动无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3月13日，卡特公开号召联合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许多致力于资助运动员的美国公司私下告诉我们，它们不能抵制这一呼吁，此时卡特政府言行不一还不是十分明显。一周之后，一向非常悲观的万斯告诉我，卡特似乎着迷于“因阿富汗惩罚苏联”的报复思想。那次谈话表明，卡特—布热津斯基那伙人

已使万斯无计可施。苏联对此同样负有责任,因为它拒绝了万斯提出的举行也许有助于疏通我们关系的部长级会谈的建议。

452

4月初,我被政治局召回莫斯科,就苏美关系急剧恶化问题进行商讨。苏联领导人不承认阿富汗对美国利益这么重要,因此很难理解卡特对苏军进驻阿富汗做出的极端反应。他们有两种不同解释。一些人认为,美国的反应过度首先是出自卡特本人的情绪不稳定;由于维护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他毕竟对双方关系恶化有所准备。另一些人认为,布热津斯基的强硬反苏方针在政府内占据上风,引导总统以此行事。阿富汗只是借口而已。

我告诉政治局成员,问题的症结既不是卡特本人,也不是他的智囊布热津斯基。他们目前行动完全一致。重要之处在于他们成功地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我们在阿富汗是侵略者,正图谋在整个中东扩张,因此与侵略者毫无缓和可言。反苏运动把我们以及那些如参议员富布赖特、肯尼迪、哈里曼、唐纳德·肯德尔等支持友好苏美关系的人置于困境,尤其当无人能看出缓和如何在我们关系中得以恢复时更是如此。

我建议,我们的外交政策不应该集中在阿富汗,而应该寻找一些能够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地区。我同时感到,与卡特的政治和解是力所难及的。

政治局成员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分歧。他们实际上毫无异议地决定继续在可能的地区,尤其在欧洲推进缓和工作,同时努力揭露美国政府暗中破坏缓和的动机。他们也感到期望美国在进一步解决阿富汗问题中起建设性作用是不现实的。布热津斯基的中立化主意根本不可考虑,原因在于一是他们不信任他与卡特,二是把赌注押在卡尔迈勒身上。我一回到莫斯科,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就相继告诉我大致的情况。总的来讲,我感到克里姆林宫决心继续其在阿富汗的方针,并确信最后定能成功。

我丝毫不是为苏联领导人在阿富汗的干涉主义政策辩护,但

必须强调,由于卡特政府把两国关系出现的所有问题与阿富汗联系在一起,所以实际上它把对苏政策仅仅归结到这一问题。一旦我们公开宣布对我们南部边界的一个动荡国家承担义务,那么期望苏联部队立即撤出几乎是不现实的。卡特本人相信我们的政策会发生这样一种突然转向的可能性吗?我当然认为他不相信,他公开采取强硬的反共产主义态度显然出于选举考虑,我认为这种态度对他是有利的。

返美不久,万斯就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进行非正式的闲谈。他说他将去佛罗里达短期休假,但是在此之前,他想听听我的莫斯科之行。我告诉他苏联不存在着任何反美情绪,不过坦率讲,对卡特的抱怨与日俱增。人们的心情是不信任和嘲弄感交织在一起,他们对我讲,卡特正把官方的全部力量投入对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联合抵制上。(日本大使告诉我,卡特急欲对莫斯科采取“惩罚行动”,其强度在他的外交生涯中空前未有,他对这次奥林匹克运动会采取的行动像是一个着魔之人。)万斯说,卡特的焦急不安泛泛而言可以归因于竞选运动,具体来说可归因于外交政策的两大难题,即阿富汗和伊朗的美国人质。

万斯没有进一步详细阐述,略微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对华盛顿在政治上如何变得腐败提出令人吃惊的见解:不再有任何人际关系可言,每个人在争夺权力——或看起来是权力的东西——的斗争中都渴望拆他人的台。万斯怨气十足,溢于言表。稍后他又说,他期望5月在维也纳庆祝奥地利国家条约25周年时与葛罗米柯会晤。他的声音沉闷单调,他表示对这次会晤不抱任何希望。当我们在4月20日再次会面时,他告诉我,卡特过分忙于追求重新当选,致使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未获批准。其实,当他出于选举目的继续攻击苏联时,如果他能设法使之得到批准那才是个奇迹。万斯仿佛沉浸于痛苦的思考之中,他不无遗憾地承认,他个人为与莫斯科建立良好关系的斗争产生不出任何积极结果。他第一次坦率承认其他的

力量占据上风。他表现出少见的悲哀情绪,仿佛沉浸于痛苦的思考之中。我们的谈话决不是官方的和例行公事的。

我当时不知道万斯将提交辞呈,其直接原因是他反对营救伊朗美国人质的突击作战行动。他担心就是大功告成,也会造成人质伤亡,使美国外交愈益恶化。他的辞职在4月25日营救行动失败之前一直秘而不宣,但的确反映出他对卡特政府政策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此外,他不太适合华盛顿特有的激烈政治斗争和玩弄手腕。

4月29日,万斯在宣布辞职后的翌日邀请我进行告别谈话。他看上去十分忧郁悲哀,这种情绪丝毫不是矫揉造作。他告诫我预计未来数周内政府将公布对伊朗使用武力的好战声明和威胁。最后,万斯有点惊慌不安地谈到选举后的形势。他已经认识到,卡特正放弃与苏联的对话政策,开始执行一项长期对立的政策。该政策甚至持续到卡特重新当选之后,至少与苏军留驻阿富汗同样之久。万斯说,这是总统对其僚属说明他对苏联立场的明确方式。

一考虑到万斯的公正和沉着的个人品质,我就想起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裁托马斯·沃森短暂的外交生涯。沃森以宽宏大量而著称,对苏联抱有好感,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为一个飞行员把美国飞机运送到苏联。维也纳最高级会谈时他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接替好斗的职业外交家马尔科姆·图恩。沃森因为阿富汗和伊朗问题在莫斯科并非轻松安逸。万斯辞职后,沃森电告万斯,他打算回华盛顿一趟,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形势十分紧张,万斯告诉我,他希望沃森将不随他之后提出辞职,因为在竞选运动期间这会不利于总统,此外,“在莫斯科有一个渴望改善关系的友好之人”尤为重要。

万斯说,沃森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商人,他“对所发生的一切十分耿耿于怀。他不是一个容易调整生活的人。当他处于世界上最大公司之一的首脑地位时,他不知道僵局是什么。他总是能够找到一种妥协。现在我们的关系处于僵持状态。职业外交家能认识

到这一点，然后等待时机。但沃森不会等待时机，他紧张不安，不知所措”。

6月8日，万斯邀请我及我的妻子到他家里与他的妻子共进告别晚餐。参加这次晚餐会的只有我们4人。我们进行了私人交谈，相互表达了个人友谊，在这些紧张年月期间这种友谊本身就是一种非凡的经历。一个才华出众之人在这个动荡年代不得不离职，我对此深感惋惜。

第二十六章

卡特的失败：一份缓和的墓志铭

选举前的僵局

现在业已清楚，莫斯科判断一位美国总统——无论其是在职的或还仅仅是一位候选人——的主要标准是只要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觉得他会推进和加深苏美关系，从而阻止两国重新陷入另一轮的冷战就行。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之所以被看作是比巴里·戈德华特更好的候选人，无疑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读者也许还记得，莫斯科出于对以反共作为其政治生涯进身之本的理查德·尼克松深深的忧虑，曾错误地为休伯特·汉弗莱的竞选提供帮助。1972年，当尼克松出人意料地继续执政时，不为别的，单单为了继续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莫斯科也更喜爱尼克松和他的外交明星亨利·基辛格，而不是自由派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对杰拉尔德·福特来说，其情形也一样。

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对莫斯科也是一个意外，并且是一个不太愉快的意外。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看错了他，美国的选民也是如此。在他竞选连任的时候，莫斯科非常不信任卡特，没有支持他同罗纳德·里根竞选。

不过，那样做也是由于我们同样也看错了里根。克里姆林宫觉得简直不能相信美国人竟然会反对缓和，回到冷战时代那种充满猜疑、好战、耗费巨额军费开支的状态中去。但是，由于卡特揪住阿

富汗问题不放,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

随着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埃德蒙德·马斯基被任命为新的国务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测定卡特会不会设法使阿富汗问题冷却下来,并使政府面向更广泛的问题。马斯基在1972年选举中曾设法赢得总统提名,在他的党内得到广泛尊敬。我知道他是一个很踏实的人,但对苏美关系知之不多。在马斯基的任命宣布后的那一天,沃森大使打电话给我,并与我讨论了马斯基其人。他说马斯基持自由主义观点,他当然想成为一名好国务卿,但他对到底该怎么做并没有明确的想法。

在奥地利国家条约签署25周年纪念会上,马斯基与葛罗米柯在维也纳第一次相见。他们讨论了主要的国际问题。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敌意相当明显,尤其是在讨论阿富汗问题时更是如此。马斯基本人还算冷静和克制,他的判断相对于其他大多数政府官员而言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他的均衡观点被华盛顿总的消极对苏政策所淹没。葛罗米柯在讲话时赞成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但在我们对阿富汗采取行动的情况下,他的话很难令人信服。在向政治局提交的报告中,葛罗米柯说此次会面进一步证明卡特政府正在使其政策朝着使苏美关系恶化的方向发展。

6月16日,我应邀在国务院会见了马斯基。他说他在对其在维也纳与葛罗米柯的会见进行思考后曾通过沃森给葛罗米柯捎去一封信,希望重新改善我们的关系。但他发现葛罗米柯半心半意,其答复令他十分失望。我问他的信件是否意味着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他想了想后回答说,这封信可以说是对美国立场的总结。毫不奇怪,我们的谈话在阿富汗问题和其他问题上自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一切都是老调重弹。显然,要想使如此专注于阿富汗问题的卡特政府同我们的关系朝好的方向转变根本没有希望。虽然马斯基在观点和感情上都更接近万斯,而不是布热津斯基,他也没带来什么变化。

卡特政府同时还在采取“遏制敌人”——苏联——的进一步措

施。8月份,白宫透露说,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在对苏联的军事目标发动先发制人的持久核战争的同时,也要能对敌人的城市予以大规模的核摧毁,卡特政府已采取了“新的核战略”。由卡特签署的其他指令还为在核战争爆发后确保军事和政府领导人能从加固的地堡中用保密通讯设施指挥战争,并动员经济度过核战争等做了准备。新闻界对这些指令的报道从来没得到过官方的证实,它们把这些举动描绘成核威慑的一部分,意在向苏联显示:美国有能力经受一场持久的核冲突。在模拟的战争条件下还举行了有卡特参加的特别指挥演习。美国政府正陷入军事歇斯底里中。

这样,卡特政府最后一刻的主要思想是想增强对苏联的核威胁意识,而不是寻求一致。卡特所说的在合作或冲突之间的选择已演变成核威慑和对抗,并且由于军事预算的快速增长而加深。这就是卡特作为一个总统的变形,你也可称之为演化。换句话说,民主党的卡特留给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一份有关核计划的完整的遗产,为里根的核战略打下了基础。莫斯科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我们的军事开支也达到创记录水平。结果,在这种权力游戏中,真正的安全和常识成了失败者。

选举中向莫斯科求爱

7月中旬,哈里曼来看我,他似乎很悲观。他第一次谈到他的高龄和他的死(他当时快89岁了),但他渴望最后尽一份力使苏美关系回到更有建设性的轨道上去。他直率地建议苏联在阿富汗问题上做出一个激动人心的姿态,比如宣布开始裁军的声明。哈里曼比当时许多苏联领导人更清楚地认识到,阿富汗战争是没有希望的,只会极大地损害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感到自己在改变形势方面孤立无援,他谴责布热津斯基和卡特,后者似乎“被他那过于健谈的助手弄得昏昏欲睡了”。

哈里曼说:“当我听说万斯辞职时脑子里涌出的第一个念头便

是乘最早的航班飞抵斐济或是其他远离华盛顿的地方,只要能避免在11月份的选举中,在要么选举卡特和布热津斯基,要么选举里根之间作令人心痛的抉择就行。”他说,只是在他得知接替万斯的人是马斯基时,他才决定他可能会投卡特的票。但是,他终究还是拒绝了由白宫提出的支持卡特竞选连任的要求。

其他方面也有人来访问我。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刚被纳入里根外交顾问的名单,他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做过基辛格的代表,后来又做过福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7月2日,他和我一起共进晚餐时对我说,如果莫斯科给卡特一个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机会,卡特很可能获得连任。但是,如果苏联采取中立的立场,静待选举的结果,不给卡特送上一张王牌,那么里根就有相当大的获胜机会。他这是在试探我对发生的一切有何感想。我向斯考克罗夫特指出,由于这两个人都曾发表过敌视苏联的讲话,所以苏联会觉得很难表示更喜欢哪一个。

458

“你是怎么想的呢?”我反问他。

斯考克罗夫特说他非常了解卡特:总统有强烈的使命感,往往在对自己的行动方向缺乏正确把握的时候就靠夸张和夸大来行事。起先他赞成裁军,但紧接着他又转向狂热的军备竞赛。他曾认为同苏联达成一项协议是可能的,但随后却迷恋于在各个方面向苏联全面出击的想法。此外,他喜欢从不同的顾问那里寻求“不同的选择”,结果不仅导致国内和外交政策出现波折,而且也在各位顾问之间造成对立。

斯考克罗夫特还说,与此相反,里根和艾森豪威尔一样,喜欢从他的主要顾问那里得到大家都同意的、经过协调的建议,免得自己被一些相互冲突的方案弄得手足无措。如果他不喜欢他得到的建议,他会让他们回去再想一想。因此,里根要求挑选专家担当重要职务,并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力。斯考克罗夫特把里根描绘成一个很实际的人,而不像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时给人留下的印象那样,是

一个死不悔改的反苏分子。

我向斯考克罗夫特指出,美国选民似乎不太关心哪一位候选人当选,哪一位落选。他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说:“那就让我们等一等,看美国人民更不喜欢哪一位。”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并不是里根的特使第一次向我做出亲近的表示。早些时候,也就是在1979年3月3日,理查德·艾伦还作为里根的私人代表拜访过我。从艾伦在尼克松的白宫办公室任职起我就认识他。艾伦来看我时里根还没正式宣布他将做总统候选人,但很快他就这样宣布了。艾伦转达了里根的一个私人要求,那就是想到莫斯科会见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如果不成,见见其他苏联领导人也行。我告诉艾伦,我们都很清楚里根是一个极端的右翼政治人物,他想得到什么呢?这仅仅是他的一种选举伎俩吗?难道他想通过这次访问使他获得对苏联事务比较了解的名声,回去后对苏联更加倍努力地进行攻击吗?

459 艾伦对此予以否认。他把里根与尼克松两人作了比较,并提醒我注意后者在当选前后对苏联态度的变化。他说,里根已经到过欧洲许多国家,会见过那里的许多领导人,他最近还得到中国的邀请,但里根更重视苏联,因为苏美关系比中美关系更重要。艾伦说,里根需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以便获得更广泛的选民基础,他正在朝国内和外交政策的中心靠拢。

我向莫斯科建议在4月份邀请里根访苏,这也是他提出的日期。在经过一阵犹豫后,莫斯科同意了。但此次旅行被推迟了,后来也未能成行,因为里根在那之前已下决心将反苏作为他参加选举的旗帜。

下一个来拜访我的是布热津斯基。7月12日,我们一起在我的寓所吃午饭。我们讨论了阿富汗问题、中国问题、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以及中东问题,但都没取得多大进展。从一开始他就声明,他和卡特都认识到,如果我们的关系继续恶化下去,我们就会冒在

20世纪80年代回到1947年至1955年那种冷战状态的风险，但这一次会更加危险，因为两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增强了。他说，问题在于两国政府是否能鼓起勇气，尽力消除它们之间的分歧。我回答说提出了一个极好的问题，但我更愿意让他先向美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

尽管说得不明白，但他显然在暗示他是以卡特的名义向莫斯科讲话。他终于谈到了正题。他说如果卡特继续留任总统，而不是把这一职位让给里根，苏美关系会更好一些。我要求他举例证明这一点。于是布热津斯基表示卡特准备继续进行军备控制谈判。他还提到里根提出军事拨款的“不合理的要求”以及里根反对苏联的长期历史。与此同时布热津斯基也指出，阿富汗问题仍是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他还对他以前所提出的建议进行了总结，并重复了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和中国问题上的官方立场。这一切很难说服莫斯科支持卡特去反对里根。

8月中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就此进行表决。由于政治局既厌倦卡特，又担心里根，所以它决定采取骑墙态度，这实际上也是我们驻华盛顿使馆提出的建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听取外交部的通报，这个通报是由我亲自参与拟就的。就在这次会议后，政治局认为，在一场势均力敌的竞赛中，对双方都敞开跑道是明智的。政治局在给我们的指示中要求我们“不得中断由我方倡导的对话，尽量阻止苏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在不损害我们利益或地位的前提下，保留一些有益的资本以便将来使用。如果里根或他手下的人有意与我们联系，我们不应当回避。”苏联新闻界被告知，应该对两位候选人进行同样的报道，不要有偏向任何一方的表示。

勃列日涅夫评论说：“即使是魔鬼自己也分辨不出哪一个更好一些，是卡特还是里根？”

460

10月初，工业家阿曼德·哈默也来拜访了我。他告诉我，他刚在卡特的办公室与总统和一群商人吃过早饭，他们多数是犹太人。

卡特的竞选总管罗伯特·施特劳斯也在座,他也是犹太人,是当时华盛顿最有权势的捐客之一。

哈默说,卡特显然对横在竞选道路上的许多障碍感到担心。里根已赢了好几分。由白宫发起的对里根的人身攻击非但未能奏效,反而使自身大受其害,它从根本上损害了卡特作为一个正派人的名声。卡特承认自己的竞选活动正陷于停滞状态,他号召商人们作出贡献,买下广播时间。他特别强调犹太人社区的重要性。由于他们的组织性,犹太人可以在关键的州内,比如在纽约、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还有其他一些州使选举结果朝有利于卡特的方向倾斜。卡特抱怨犹太人社区没有充分感谢他为以色列做的贡献,是他促成了戴维营协议并给予以色列人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总之,卡特要求工商界人,尤其是哈默应当带头对犹太人社区施加影响,让它们支持卡特。

哈默为此来问我,苏联领导人是否能增加犹太人移民人数。犹太移民数量主要是由于卡特攻击苏联国内的人权状况,在近几个月内大大减少了。

哈默说:“卡特如果重新当选,他一定不会忘记这一帮助。”他暗示将保证让卡特知道这一点。

不能说莫斯科对他的要求没有做出反应。我认为卡特在选举中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自己的党内未能得到可靠的支持。他是作为一个局外人而不是作为他所在的党的领袖来竞选总统的。在他任总统的最后一段时期,对在华盛顿的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领袖来说,他都是一个局外人,尤其是对国会的本党人士来说更是如此。

这里我还要谈谈已故的阿曼德·哈默。我与他保持着定期联系,就像和美国商界其他许多头面人物一样,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因为他与苏联的联系(他生在俄罗斯,年轻时来到美国,他是第一批同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做生意的美国人中的一个)

他一直未能摆脱关于他是苏联间谍的谣言。但他不是。^① 他同克格勃没有联系，他们也许曾试图与他接触，但他不是间谍。如果他是间谍，那他一定不是个好间谍。

比如，你要是和他讨论政治和其他问题，他总是把所有的问题混在一起，然后就如何改善苏美关系提出初步看法。这是他最喜欢的话题，我想这也是他最感虔诚的主题。很多美国总统竞选时都得到过他的慷慨捐助，他把他与总统们的谈话告诉我们，试图想主动充当一个秘密的中间人撮合高级别的对话。但是，据我所知，美国政府从未让他做它的代表，我们也一样。葛罗米柯尤其不喜欢这种业余外交家；作为外交部长，他有时也在哈默访问莫斯科后不知不觉地在包括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内的听众面前解释哈默的思想。但我们从来没有让哈默代表我们给美国政府带去什么信息。

苏联人对哈默的尊敬完全是出于另外的原因，这就是他与列宁相识的传奇故事。在莫斯科，人们在介绍他时，总是说他认识列宁，这就为他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我们的一些领导人来说，与他谈话是很有趣的。勃列日涅夫就喜欢与他谈论美国的生活、华盛顿的政治传闻以及他与美国总统及其他著名美国人的谈话。他常常夸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奉承他的苏联听众。

我们也很尊敬作为商人的哈默。柯西金总理很喜欢他的处事方式。我亲眼目睹过哈默和柯西金为一个价值70亿美元的化学工程举行的一次两小时的谈判。哈默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精确地说明他打算投资的钱数，双方又能各赚多少。经过一番讨论后，哈默拿出一张纸，草拟了一份“谅解框架”，上面只有四五个数字，柯西

^① 哈默亲口告诉我，他与罗纳德·里根的妻子南希关系不错，她曾给他看过一些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那里得来的私人备忘录。备忘录告诫里根不要与哈默保持密切联系。艾伦确信哈默是克格勃间谍，尽管他并没有证据来证明。据南希·里根说，她的丈夫对艾伦的怀疑一笑置之。而且，他还任命哈默为从事癌症研究的医疗机构的白宫协调员，这是一个荣誉极高的慈善职位，算是对哈默为他的竞选所作贡献的一种回报。

462 金改了一两个,哈默表示同意,交易就算做成了。所有的细节问题留待助手们去处理,他们的工作以哈默手写的框架为准。哈默对商业非常精通,我想他在与我们做生意时一定赚了很多钱,也捞取了不小的名望。

选举前两个星期,布热津斯基来我们大使馆拜访我。他谈到如果卡特仍留在台上,他就会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这让我很吃惊。很难说这是不是想在选举前从莫斯科那里获得一些积极的表示,或者是不是布热津斯基已意识到对抗已走进了死胡同?不管怎样,任何人听到他要给予的东西都会感到出乎意料的。

布热津斯基向我保证,卡特的第二届政府将会在他们所认为的三个重要方面做出努力,为两国关系“逐步正常化”开个好头。第一,将恢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并通过削减军费开支放慢军备竞赛速度;第二,布热津斯基说伊朗和伊拉克的战争有变成一场消耗战的危险,他建议如果这两国有一方崩溃,莫斯科或华盛顿都要抵制住诱惑,不要去填补空白;第三个重要变化将发生在阿富汗:美国政府将不再把苏联撤军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联系起来,卡特也将不再要求撤换巴布拉·卡尔迈勒,尽管把他调换到更受尊敬的其他职位,由一个新总理来取代他也许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布热津斯基还说了一件让人想不到的事。他说卡特政府已改变了美国把苏联当作许多与美国敌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幕后支持者的外交理论。他列举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为例。我欢迎这种改变,并且说美国迟早会承认这一点,现在虽然迟了点,但总比不承认强。他说,在选举后,只要美国人的情绪一平静下来,政府就计划扩大与安哥拉、越南和古巴的联系,甚至会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他最后说,尽管华盛顿仍打算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双边互惠关系,但它决不会卖军事装备给北京,中美结成军事联盟是“绝对不可能的”。

布热津斯基没有把里根与卡特作直接的对比,但他的谈话强

烈暗示：如果重新当选，卡特就能使苏美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当然这一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他的意思很明显：莫斯科在竞选活动中不应当做减少卡特重新当选机会的事，如有可能甚至可以帮助他一把。

那次会面的时间是10月16日。10月31日，也就是在11月4日选举前几天，布热津斯基再次打电话给我。他承认卡特正在失势，竞选就要结束，一切只好等到选举那一天见分晓了。我真没想到，布热津斯基竟开始谈论起苏联对他个人的态度。他说很多著名的美国政治人物从苏联官员那里带回了许多对他的批评性评价。那些苏联官员在私人谈话中把他对苏联敌视的原因解释为他是一个波兰人。他还补充说，甚至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也有过类似的反波观点！

布热津斯基由此把话题说开。他说历史的确使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关系复杂化了，过去的悲剧仍未结束。他承认有些潜意识的偏见在作怪，但是他认为他主观上不是这样想的。他对这样一个事实很清楚，即波兰的命运同苏联及俄罗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在反对德国统一的大背景下，波兰只能同莫斯科结盟，没有其他的选择。否则，德国就会摧毁波兰，“作为前波兰人”，他认为波兰别无选择。

“当然，”他说，“我的确一点也谈不上喜欢苏联及它的政策。但我并不像莫斯科想象的那样反对苏联。在这件事上我与基辛格没什么两样，但基辛格比我幸运。从一开始，尼克松就派他去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及其他苏联领导人会谈。尽管他们对他们的人格和观点并不存在什么幻想，但基辛格还是设法与他们建立了某种个人联系。而我是由形势所迫，背着百分之百的反苏名声被推到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的。苏联领导人甚至都不愿和我谈话。”

我向他指出，是美国政府而不是我们在挑选谈判代表。我们愿接受卡特作出的任何选择。从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如果卡特重新当选，布热津斯基一定会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同苏联高层官员建

立更多的直接联系。我相信这比让可厌的总统助手在幕后继续操纵更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关系。但这却成了我与他在其任职期间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

464 最后,基辛格本人也来看我了。在叙述这次谈话的情况之前,我必须先提一下我们上一次的会面。那是在1979年11月,离此刻差不多有一年了。我在那次谈话时批评了他抛弃自己在任职期间所奉行的政策,在公开讲话中反对苏联,从而向右翼靠拢的机会主义行为。我问他想从中得到什么。基辛格辩解说他对苏美关系的基本观点并没有什么改变,但他不得不考虑公众的情绪,尤其是在选举临近的时候。他正忙着为共和党工作,似乎想在共和党获胜后重新回到政府任国务卿,那样他就可以回到他注重苏美关系的政策上去。因此,他很希望与每一个潜在的共和党候选人保持良好关系,而不是与他们对抗。虽然他不会站出来反对里根,但他确信里根是唯一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他吸收进政府的人。

将近一年过去之后,基辛格在10月22日再次来找我谈话。他说他正在进行的访问是得到里根本人的完全同意的,前一天他还与里根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人谈话,这让我很吃惊。基辛格说,里根阵营对胜利相当有把握(当然不排除卡特阵营最后一刻会出人意料地获胜),前景看好。基辛格向里根提出了一些与苏联发展关系的建议,里根便授权他就此与莫斯科进行秘密联系。

基辛格还告诉我,如果里根当选,他最好不要沿续他在好斗的竞选演说中阐述的方针,因为这不仅会导致与莫斯科关系的持续紧张,也将使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关系不和。基辛格解释说,他知道苏联领导层是不会在他们认为极端重要的事情上被欺侮的,苏联人也清楚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尽管他们不愿当众承认。因此,让新总统认识到他的短处,让莫斯科了解哪些是美国的真正利益是很重要的。

基辛格继续谈到,如果里根赢得选举,他就会有机会把这一切

向克里姆林宫阐明。在就职前他就会派一个私人特使去莫斯科在两国有可能马上求得一致的领域,包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提出大致的规划,并在里根和勃列日涅夫之间建立起一种长期的私人联系渠道。基辛格说他自己不会成为担负这一使命的合适人选,不过他若无其事地提到,如果里根打算挑选他,他很可能会同意的。他告诉我可以把这一切连同里根直率的承诺都告诉莫斯科。但他让我注意,不要把它理解为可以立即开始同里根对话,那要等到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基辛格满有把握地认为到那时里根会同意的。他答应在选举后继续和我联系。

465

这次不同寻常的谈话给我留下了奇怪的印象。很难相信里根突然准备在选举后转变立场。难道他想利用基辛格使莫斯科相信,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疯狂反苏的右翼分子?还是希望预防莫斯科在最后一刻采取什么措施帮助卡特,从而破坏他的选举?这实在令人生疑。我相信基辛格为了回到政治高位,完全可能在与里根谈话中就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方案或建议,就像他在尼克松手下所做过的那样。里根在选举前的紧要关头,显然不会介意基辛格跟我们谈谈他的个人看法,借此也许还可以试探一下苏联对与可能当选的新总统最初的接触有何反应。不过,这毕竟只是基辛格的主意,而不是里根本人的。总之,基辛格是过于精明了,他相信里根会倾向于他和他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他还建议我们等待选举结果并看一看里根会做些什么的原因。我给莫斯科的建议是暂时不要以任何方式对此作出反应,耐心等待选举的结果。基辛格从未成为里根的顾问。

卡特的失败

里根以压倒多数战胜了卡特,并且彻底打败了包括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在内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我们不久就得到了如何与新总统打交道的明智建议。提出这个建议的不是别人,而是前总

统尼克松。这位前总统出人意料从纽约赶到我们驻美使馆,出席在11月6日选举后两天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他说他的来访具有特殊的目的,他准备与我谈谈里根,并请我把他的观点提请勃列日涅夫注意。

尼克松说长期以来他对里根有很深的了解(他们都是加利福尼亚州人)。一方面,他的观点的确很保守,他也是个反共分子;另一方面,他希望美国强大,最重要的是,他相当有头脑,是一个注重实际的政治人物。尼克松相信,从长远来说,苏联领导人将会与里根建立起像当年与他之间具有的那种友好关系,但是这需要时间,也许需要很长时间。苏联领导人千万要记住不要过早地让他接触古巴或其他敏感问题,那样做只会使里根变得更加固执。

466

尼克松继续说道,他同里根保持着私人联系,里根经常就不同的问题与他商量。他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联系,他也愿意利用自己长期的经验,帮助里根更好地理解苏联及其政策。尼克松说他还愿意在里根挑选内阁成员后再与我会面,并提出一些与里根政府打交道的实质性建议。

这位前总统看起来气色不错,他显然受到新总统上台的鼓舞。虽然里根也曾公开证实他在某些问题上与尼克松商量,但仍不清楚尼克松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不过我得承认尼克松对里根在长时间内将会如何行动的预言相当准确。

在莫斯科,我们对里根应首先采取何种政策成为苏联领导人之间激烈争论的话题。我们仍不能确定里根未来的对苏立场,里根要在下一年的1月20日才就职。11月17日,苏联领导层指示驻华盛顿使馆同里根的下属接触,“好好观察一下这些官员,了解他们的看法”,尤其是他们对外交政策,当然也包括对苏美关系的看法。苏联领导层还指示“此事要悄悄进行,应当谨慎小心,不要急躁,更不能唐突,要考虑到他们有进行接触的愿望”。但是里根的助手此时正忙于就职大典,尽享他们的胜利,没有显示出这样的愿望。

在华盛顿,我惊讶地发现,美国大多数新闻媒介对总统的态度

变得可真够快的。自从杰克·肯尼迪死后，新闻界中许多本已变得玩世不恭、十分轻浮的人士都把里根当成英雄来看待。他们曾把约翰逊看成是一个残忍的家伙，尼克松是一个骗子，福特是个糟老头，卡特无能。但他们一定是支持新总统的。

剥下缓和的外衣

467

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宣誓就任总统。他继承的是一份苏美关系遭到破坏的缓和遗产及冷战的一个新时期。我是这些变化的目击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过去20年来美国外交政策所经历的值得注意的演变的目击者。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充满巨大活力、富有戏剧性甚至是危险的时期到约翰逊时代——那时他专注于越南，我们则被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搞得焦头烂额，再到尼克松和福特时的缓和与最高级会谈时期。后来美国外交政策的钟摆就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与苏美关系正常化的时代急剧摆向极右的方向。

但我把缓和也看成是一个失去机会的时代，对此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在尼克松和卡特之后仍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即苏美关系的历史本质是什么？是缓和还是对抗？制约我们关系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虽然缓和是短命的，但不应低估建立伙伴关系的这次失败经历的重要性。首先，它向世界表明，两种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的持续对抗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核冲突的危险可以大大降低。尽管受到犹犹豫豫、议而不决的阻碍，两国还是就军事问题达成了认真的协议，军备控制逐渐提到两国关系的主要议事日程上。只要这种政策继续下去，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苏联的外交来讲，它都是一项成功的政策。但它却不幸被证明是短命的，不完善的，未能坚持下去。

谁应当对缓和的失败负责，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历史学家把它归咎于苏联实行扩张主义外交政策和保守的国内政策。共产主

义时代的苏联史学家则几乎一致把责任推到美国奉行的侵略政策上。俄罗斯联邦新一代历史研究者则走向另一极端，他们极力颂扬对前苏联的一切进行根本性的修正，把一切罪过都加在前苏联政权头上。他们中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例如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在其最新著作中试图为两国关系的历史描绘出一幅更完整的画面。

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冷战结束时，我们那一时代的人没有谁利用自己对那些事件的亲身感受和直接认识来回答这些问题。我将从我个人的角度对这些事件进行总结并予以评价。

缓和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和美国对缓和有着相互矛盾的概念且难以调和，而双方精英人物没有能够调和这些矛盾最终毁灭了这项政策。苏联精英人物与尼克松、福特及卡特政府一样，从来没有对双方在缓和政策上所持的哲学、政治设想进行真正的审查和透彻的分析。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只满足于把缓和当作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他们把它当作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当作一场与资本主义世界不可避免的战争。因此，他们在寻求缓和的同时，又卷入第三世界的军事和外交活动，以帮助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而自豪，并试图引导他们沿着熟悉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用不着诉诸毁灭性的核战争就可以最终取得对资本主义的胜利。

美国政府对缓和主要成就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缓和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对付苏联影响的工具。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希望实现缓和，但美国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阶级斗争观点去影响他国，通过对共产主义的遏制寻求同苏联的全球对抗，并继续对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指望借助缓和最终搞垮东欧。

严重影响缓和及作为其镜子的军备控制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两国在对待可能发生的核战争问题上存在着军事错觉。他们都把军事计划定在最坏的基础上，想在第一轮核打击中就对敌人造

成毁灭性破坏。但是,由于不了解对方的目的和打算,于是就在彼此互不信任、相互怀疑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局面。这就延缓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步伐,甚至当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由于武器制造技术上的进步,已使得协议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的核战略也笼罩在模棱两可之中。多年后,也就是1994年5月,在佐治亚州的圣西蒙岛由布朗大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起的一次会议上,真相才大白。我与其他一些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士参加了会议,在美国一方,万斯·布热津斯基和哈罗德·布朗向出席会议的俄罗斯人证实,卡特政府并没有以第一次核打击理论为基础来对付苏联(尽管卡特像他的前任一样也考虑了当苏联在欧洲发动大规模常规力量的进攻时对苏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冷战时参与了核战争计划制定的两位俄罗斯高级将领尼古拉·德特洛夫和维克托·斯特拉诺杜波夫也证实,苏联政府和总参谋部从来没有执行过第一次核打击的理论,因为他们相信核战争将给两国带来难以承受的破坏。这与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公开声明正好相反,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就是:“生者将会嫉忌死者。”

469

然而,就在双方都花费成百上千亿美元去消除对另一方发动一场突然核打击的忧虑的同时,任何一方对这种战略连想都没有想过,因为他们都知道这对双方都意味着巨大的灾难。当然这一切我们也是到现在才知道。缓和正好可以缓解此种担心,但是,对缓和所持的矛盾的态度不可能使之成为两个超级大国都接受的思想。每一方实际上都在遵循自己的缓和观,每一方都在实行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双重标准,并以此评判另一方的行为。同时双方领导人也未能向公众解释清楚缓和的希望和局限。

在美国方面,随着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上台,缓和即已开始。那时的的问题是这位老政治家是否像他在竞选中说的那样变成了“新”的尼克松。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尽管他仍然是一个保守派,但他毫无疑问也在用新的眼光看待与苏联的现存关系。然而,尽管尼克

松和基辛格对缓和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贡献，但我通过自己与他们多次密切接触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上台后根本没有全面考虑他们的缓和思想，更不用说想出一种方法以结束冷战。我相信他们那时也没有把缓和作为最终目标，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得那么远。

470 在他们刚上台一年左右，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苏美关系根本就没有明显的积极性，他们面临的最迫切的外交问题是尽快结束越南战争。这——不是抽象的缓和外交思想——才是他们希望同苏联改善关系的主要动机。简言之，缓和的思想是与一个更紧迫的短期任务，即结束越战紧紧相连的。

但把每件事都与越南战争联系起来则未免太简单化了，也是不能接受的。当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考虑美苏战略平衡时，他们一定考虑了长期的影响，这当然是美国安全的基本问题。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谈判达到战略和常规武器之间最有利的平衡。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想通过加强与苏联的联系来控制其西欧盟国的行动，因为它们正试图独立地与苏联发展关系。前面我已谈过选举上的考虑对苏美关系的影响，但那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而不是战略上的影响。

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尤其是卡特没有执行一贯的缓和政策。他们的缓和思想是前后矛盾、模棱两可的。这只要回忆一下白宫在1973年秋阿以战争达到高潮时让它自己的军队作好对付苏联的准备就行了。这件事直接而有力地说明，不管我们在签署的协议中如何常常使用“伙伴”一词，美国领导人根本不准备在诸如中东之类的地区把苏联当作一个平等的伙伴。

同样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内，尽管在商界、宗教组织及许多公共政策和外交关系协会中有着强烈的支持缓和的情绪，但支持缓和的运动从来没有作为一支统一的力量而发挥作用。两国都未能将缓和的深厚政治基础建立在国会与公众的广泛联系上。商业、文化和科学交往不足阻碍了巩固的物质和社会政治联系的形成，这

又进而妨碍我们在高度情绪化的人权领域找到解决办法,从而阻碍了淡化冷战色彩的进程。

与此同时,反对缓和的人却相当有组织,活动也频繁。一些就苏美关系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有影响的集团组成了现实危险委员会,该委员会起了相当大的消极作用。犹太人集团、新保守主义集团及其支持者也是如此。最后到里根时期,美国政治中最保守、最沙文主义、最好战的代表也走到了前台,鼓吹要在越南战争失败后重新树立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

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也门和阿富汗等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事对缓和也造成了相当的损害。当基辛格和尼克松及其继任者发现,缓和根本没有能保证维持世界社会和政治现状时,由基辛格和尼克松发展起来的缓和思想就极大地动摇了。莫斯科也从错误的假设出发参与对它的破坏,它认为苏美关系可以脱离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务而独立发展。

471

美国对此采取的对策是,通过在它认为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地区施加压力来协调它与苏联的各种关系。比如,它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做的。连锁原则是由基辛格提出的,虽然这与他寻求同苏联达成苏美之间限制核武器协议的目标相矛盾。由于基辛格的自相矛盾就导致在1976年选举之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被冻结了。结果,福特决定用以实力促和平的口号取代缓和的这个词。“苏联扩张主义”成为一个新的警语。到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时期,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成为连锁原则的长期抵押品。

水门事件极大地削弱了尼克松和福特执行一项连贯的苏美关系方针的能力,但在卡特时期,苏联严格的犹太移民政策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对这一方针造成的破坏更大。把缓和与苏联国内情况联系起来标志着同尼克松和福特时代完全决裂。苏联领导层把它看成是即使不是想改变,至少也是想削弱自己的政治基础的一种尝试。苏美关系越来越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并因此依赖于过于狭窄的基础,即限制战略武器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情

况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截至1972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几乎完全集中在核武器问题上,它们通过订立条约来禁止核试验、限制核扩散和限制反导弹防御体系。

但是,在1972年至1974年间,两国政府有意将它们的联系扩大到另外三个领域,但没有一个取得了特殊的成就。首先,两国政府进行了其他形式的军备控制谈判,特别是在维也纳就削减欧洲常规军事力量问题进行了商谈,但没取得多大进展;其次,我们又试图在1975年1月扩大两国的经济关系,但美国国会对此给予了沉重打击,后来我们又努力达成妥协来消除对苏联的贸易歧视,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再次,我们努力为我们两国在危机时刻的行为和关系制定规则,但是从1972年到1974年,两个超级大国在各种情况下所进行的活动都是我行我素,好像它们从来没有签署一份名为“苏美关系的基本准则”的文件似的。这份文件是在1972年莫斯科美苏最高级会谈时签署的。莫斯科对自己在非洲无视这些原则负有责任,而华盛顿在中东的行为也应受到谴责。

莫斯科也有它自己的连锁观。1972年,苏联的战略是把最高级会谈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成功连在一起。事实证明,这种战略是错误的。在最高级别的会议上全面及早讨论苏美关系也许有助于为签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并取得更多的谅解铺平道路。由于维持双边关系的主要渠道——限制核武器谈判——因政治形势的恶化已被封死,缓和也就走进了死胡同。此外,造成缓和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国内对缓和缺乏政治上的一致支持。因此,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没有政治上的缓和,军事上的缓和是不可能的。

在苏联,勃列日涅夫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其中一些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已形成,其中包括对西方的缓和;保卫东欧现状;对中国的遏制;卷入第三世界事务等。在卡特当政时期,苏联领导人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回到缓和的主要轨道上去,这一政策在1972年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谈

取得最初的巨大成功后，由于各种困难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败了。

尽管存在国内政治、意识形态或军事方面的阻碍，我们在外交上仍一直致力于缓解国际紧张局势，限制和削减武器储备。我们的外交政策过分受意识形态的左右，为了“履行对其他民族的国际义务”，我们卷入了地区冲突，从而造成了长期的对抗。莫斯科相信它这样做是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情况由于苏联领导层的大国抱负以及与美国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尽管是不必要的——冲突而复杂化了。在古巴首开危险的先例，然后又蔓延到了非洲，这就破坏了我们极力建筑的缓和基础。

当苏联领导人试图把缓和与他们所说的在世界范围进行的阶级斗争相调和的时候，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华盛顿的反应，认为这样的地区冲突只是些次要问题，莫斯科以某种方式可以把它们同诸如军备控制等基本问题分隔开来。公正地讲，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华盛顿，适用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在中东所奉行的政策。在中东，美国外交一直把这一地区划为禁区，极力消除我们的影响，把苏联排除在外。在卡特离任前，美国还在三大洲的阿富汗、索马里和安哥拉以及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地利用代理人进行战争。

473

至于苏联境内侵犯人权，这完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犹太移民问题、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粗暴对待、苏联对以色列和中东的政策、最后还有与此毫不相干的美苏贸易关系等，这一切全都缠绕在一起。

我仍然认为，如果我们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考虑问题，解决与美国犹太人社区的争端也许会极大地促进缓和的进程。我不止一次向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提出过这个问题，但他们的态度总是毫无理性；他们的答复也是含含糊糊，不得要领。他们甚至说：“不能屈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压力，让他们来干涉我们的国内事务。”很难向他们解释清楚我们的人权政策受到了美国公众的普遍憎恨，我们的使馆人员也越来越憎恨极端主义组织的恐怖行径。

苏联领导层还低估了美国国会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作用。这首先是由于他们自己对我们的国会——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缺乏尊重，苏维埃对党的领导人所作的所有决定也是顺从地一味予以批准。莫斯科据此认为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是首要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对美国国会的情绪就不去考虑了。结果，国会总是有惊人之举，往往给苏美关系以重大打击。

474 勃列日涅夫那一代人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束缚由于苏联与世界的隔离而增加了。这也许是斯大林留下的最大遗产，从我们对美国政策缺乏经验和无知中可以反映出这一点。苏联领导和人民不懂得美国及其政治权力的源泉，错误地把尼克松也当成苏联那样的美国总书记。直到1973年我们的人民才开始认识到美国国会至少也和美国总统一样有权。克里姆林宫也明显低估了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这种隔绝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它最终滋生出一种对这个模糊的世界，首先是对美国的怀疑和敬畏之情。美国因此仅仅被看成是罪恶和具有扩张野心的国家。当然，美国反过来也是如此，它对我们国家同样知之甚少。

苏联领导人常常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讲话，甚至他们之间的交谈也是如此。这种语言也成了官方报纸《真理报》和《消息报》的语言。他们表达思想的方式和格式无疑也影响到其内容，他们用的都是些政治、哲学方面的专门术语，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这是掩盖其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的最简便的方法。

苏联军工企业联合体的影响日益增长也是逐渐破坏缓和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它同美国一样对尖端技术有着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安全机关的所有活动都是高度保密的，其程度西方人连想都没法想，因此，苏联议会和公众舆论对国家的军事政策和国防计划实际上无力控制。甚至连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完全知道，因为国防部长和国防工业部长只对总书记负责，党的总书记同时也是三军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勃列日涅夫同他曾经领导过的军工企业联合体有着长期的密切联

系,他也比较偏爱军事。由于他参加过伟大的爱国战争(虽然并不怎么出名),他总自以为自己是军事方面的最高权威。

总之,军人及军事工业的领导作为勃列日涅夫在党和政府内的可靠支持者,自然可以使自己的计划在他那里畅行无阻,但这些人对外交政策是一点也不懂,也很少承担责任。这些军事计划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也不受总书记办公室外的公民控制,甚至不受最高苏维埃、政府乃至政治局的审查。政治局这个所谓的国家最高决策机构有时只是简单地收到通知,而不是向它征求意见。

这一切造成了不受控制的军备竞赛,而这种竞赛与特定的外交政策目标或缓和的一般思想并无关联。两国在尼克松任职期间采纳的军事平衡原则被苏联最高军事领导人解释为授权给他们去发展他们的美国对手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而且质量上还要更好一些。赫鲁晓夫向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提出的陈旧口号“赶上美国并把它甩在后面”也被军队理解为允许其进行扩张。这种平衡思想实际上剥夺了我们确定自己的军事政策的可能性,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必须遵循美国为实现它自己的目标而确定的路线,而不是走我们自己的路。结果,尽管我们在装甲部队、火炮、自行发射装置的数量上已远远超过美国,仅在一些战略武器上落后于美国的时候,苏联又开始了新一轮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军备竞赛。

475

保密方式也引起国外的疑虑。除了葛罗米柯本人之外,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对苏联的军事扩张计划都是一无所知,却还与各自的外国对手按照一些过时的数字讨论这些事情。有时,我们也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装作不知道而不说实话,如在用作太空目标跟踪的克拉斯洛亚斯克监测雷达事件上就是如此。我们只是重复了官方的立场,坚持这项计划是在与美国签署的导弹防御协议的范围内,但实际上我们已违反了 this 协议,负责雷达系统建设的陆军参谋部在一封给勃列日涅夫的备忘录中承认了这一点。我要指出的是——不是为苏联领导人辩护,而是澄清事实——他们自己也并不总是相信美国会在遵守军备控制协议方面做得那

么光明磊落。

这一切使西方公众对苏联的意图持消极态度。这样做的结果也使得我们不知不觉地帮助了美国某些热衷于捏造一个“邪恶帝国”敌人的假象的人，他们鼓吹要想和这个敌人作战必须全国团结一致，做好战斗准备，花销多大也在所不惜。

但是，军费开支的增加大量消耗了苏联的资源。停滞的迹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已初现端倪，并逐渐损害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反过来这又刺激美国领导人尽可能施加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压力来迟滞苏联的全面发展，削弱我们的国际地位。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克里姆林宫任凭苏联外交政策遵循一种过度扩张的帝国模式，而这种模式在十几年前便让美国吃尽了苦头。

476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本人。在1970年至1974年间，西方政治家把勃列日涅夫描绘成比较值得赞扬的名人，说他能处理国际事务和谈判，渴望和平与秩序。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但是70年代后期见过勃列日涅夫的西方领导人则把他看成是另外一个人，我们这些苏联外交官回莫斯科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对世界的发展越来越不关心，渐渐地，他只是间接参与制定我们在重要谈判中所采取的对策，包括在限制战略武器中的立场。虽然他也主持会议，对我们的政策予以最后的批准，不过却是以一种非常敷衍塞责的态度。勃列日涅夫个人不再给缓和以任何推动，这也对它的失败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要忘记，由苏联总书记和他的美国对手的个人抱负和魄力促成的缓和决不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是最高级个人会谈显得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还是拥有对最重要的事务作出最后决定权的大人物。不幸的是，自尼克松以后，两国领导人都低估了这些会谈的必要性。这些会谈可以公开交换意见和相互评估对方的观点，并在制定政策中吸收这些意见。

让人感到可悲的是，虽然勃列日涅夫和卡特两人原则上都赞

成缓和和放慢军备竞赛速度,但是事情却朝着另外的方向发展,克里姆林宫没能从潜在的对手卡特身上看出他赞成那个目标。相反,苏联领导人把卡特政府相互矛盾的外交政策看成是反对苏联利益的阴谋,而卡特本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感情用事和朝三暮四则更是于事无补。

过分拖延批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美国方面从未批准);军备竞赛;在非洲、中东和古巴的争夺;在人权问题上的公开对抗以及中美在反苏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这一切降低了苏美关系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地位,与此同时,卡特政府还宣布增加对苏联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压力,以此促使其外交尤其是国内政策的变化。毫不奇怪,卡特的行动自然会引起莫斯科的特别不满,双方也就不再试图去理解和调整它们在许多对立问题上的态度。

所有这些因素和1977年至1979年在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发生的动乱加在一起,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变得更加激烈。最后,苏联干涉阿富汗使缓和政策的外衣被彻底剥掉,两国又重新回到了冷战状态。

第二十七章

自相矛盾的罗纳德·里根

恢复冷战

罗纳德·里根在总统任内先是恢复了冷战以来最黑暗的日子，然后又给苏美关系带来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程度的改善。这种矛盾现象使许多人着迷，其中既有学者，也有普通人。但现在依然很难肯定它究竟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产物，还是产生于自觉的行动，抑或只是两国领导人时时摇摆的计划。不过罗纳德·里根本人在这种历史转变中决不是一个傀儡。我认为里根也许不了解细节问题，但他对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非常关心外交事务。他是结束冷战的一个主要领导人。

在这位引人注目的新领袖赢得选举的最后胜利并领导美国之后，三位有病的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士坦丁·契尔年科在里根总统第一届任期内出现了飞快的更替，他们的政策保持了连续性。他们都认识到，核战争无论如何应予避免，哪怕是最小的合作都符合苏美的利益。尽管他们言词上都很革命，但他们憎恨变革，然而，他们对军备限制谈判都表示出兴趣，换句话说，他们想建立一种军事缓和的机制。但政治缓和的恢复暂时似乎毫无希望。

从1981年到1983年，苏联政府不仅在公开讲话中，而且通过我直接参与的私下外交接触表示赞成继续与美国政府对话，但是在

里根任职的最初几年我们与之接触的主要结果是，他拒绝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而是寻求军事上的优势，并向苏联发动一场不妥协的新的意识形态上的进攻。伴随着这场运动的是里根宣布对我们这个“邪恶帝国”发动凶猛的讨伐，并运用高技术狂热建造新武器，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如果起用，将会打破两个超级大国核武器平衡。里根任职的头五年，五角大楼的预算翻了一番，国家债务也翻了一番。付出这些代价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全球和地区对抗中击败共产主义这一大战略。

我们苏联人认为，里根正走上一条打破两国军事和战略平衡的道路。苏联领导人多年来花了这么多的金钱和精力就是为了维持平衡，他们对里根的行为所做出的特别反应自然是既愤怒又怀疑。他们把他的政策当作是对他们与美国政府费力达成的协议的背叛。莫斯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取得全球平衡。尽管苏联领导人更赞赏用双边协议的形式解决争端，但他们仍决心对里根的政策进行反击。他们把他的行为看成是冒险主义。

前景暗淡，毫无希望。国际关系的紧张仍在加剧，外交变成了公共关系的演习，美苏对话也不过是宣传而已。在里根任职的头五年我是苏联驻美大使，后来我回国担任负责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在里根任职初期呆在华盛顿的几年是我长期担任大使期间所经历的最困难、最不愉快的时期，我们实际上没有真正开展建设性外交工作的余地。我与白宫长久以来建立的有效的直接联系都中断了。

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缓和冲突，防止因冷战复活而造成的紧张演变成一场热战上面。但我必须说明的是，尽管双方都在进行恶毒的攻击，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感到恐惧。我们两国的关系由于1983年9月1日苏联战斗机击落一架南朝鲜客机而降到了最低点。这次事件造成269位平民丧生，里根竭尽全力利用了这次悲剧事件，使外交活动几乎完全陷于瘫痪状态。

那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甚至一度考虑到甩手不干，回莫斯科去。但与此同时，里根却与勃列日涅夫交换着私人信件，试

图以某种不完全的方式在私人水平上保持联系。里根就是这样自相矛盾。

479 变化出现在里根第一届任职中期,它是由里根的一个独特的个人姿态造成的。1982年11月,总统来到我们使馆,对勃列日涅夫的逝世表示悼念。紧接着,里根又不顾激烈而广泛的抗议,宣布在欧洲部署导弹,此举旨在加强华盛顿和欧洲对付莫斯科的自信心。前面的道路真是艰难而又崎岖,这里既有总统个人的行为因素——他总是左右摇摆,时不时还公开反苏,同时也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经常更迭造成的不稳定局势有关。

由于契尔年科有病,戈尔巴乔夫经常代为主持会议,结果,从1984年夏天开始,政治局逐渐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所控制。在没有广泛征求意见的情况下,政治局就采取了两个重要行动。第一是重新与美国开始裁军谈判,第二是建议与里根举行最高级会谈。我们并不想与华盛顿立即展开真正的对话。莫斯科仍然怀有强烈的猜疑,认为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的压力,里根政府也不会那样做。美国政府的确也没有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周密计划,沉默寡言的国务卿乔治·舒尔兹与精力充沛地领导着五角大楼的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由于美国已完成了大规模的重新武装,总统不顾前后矛盾,表示要与苏联签署一项协议,以减少核威胁。

里根也渐渐从反对与苏联接触转变为利用这种接触为国内政治目的和特定的外交政策目标服务。他逐渐对树立一个坚强总统与和平调解人的良好政治形象表现出兴趣。不仅如此,他还有意无意地开始考虑与莫斯科实现某种和解的可能性。

在1984年里根连任、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升任总书记后,举行6年来的第一次美苏最高级会谈的设想很快便出现了。戈尔巴乔夫把最高级会谈当作加强他个人的政治威信和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工具。同时举行这样的会谈也可以使他腾出手来更好地准备苏联的下一个五年计划,该计划打算只把少量的资源投入军事

而着重发展国民经济。不作这样的调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会越来越困难。

第一次里根—戈尔巴乔夫最高级会谈于1985年11月19日至25日在日内瓦举行。使双方都感到满意的是,它证明两人——不是作为不可调和的对手,而是作为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领导人——是可以对话的。这次会议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最终导致两国关系发生了剧变。我长期以来一直希望通过缓和恢复并推动合作,如今这一切似乎都已成为现实。我亲身经历了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下面我来讲一讲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480

同过去决裂

就任总统后,罗纳德·里根审慎而坚定地开始同过去决裂。总统与他的持激进观点的保守派随从不失时机地履行他们在竞选中所发的誓言,或者说是威胁。他们废弃了缓和,利用一切可能与苏联直接对抗,注重加强军事力量,这就意味着不惜牺牲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计划而增加军事预算。

军事力量的急剧膨胀破坏了就控制军备竞赛而举行事务性会谈的前景。美国的新领导层把过去苏美在军备控制方面取得的成就当作对美不利的东西一笔勾销,整个推翻了军备控制思想,把它转变成美国扩大自身实力并打破战略平衡的附属品。同苏联进行的任何谈判都要从实力出发,以制约莫斯科在国际上的活动。这至少是苏联领导人通过高级别接触和我作为大使与新任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进行寻求对话的无数次失败尝试后,得出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黑格从观念到行为都是一个标准的军人,除他之外,负责美国裁军政策的最高层人士多是些根本反对他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人。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尤金·罗斯托跟他兄弟沃尔特一样固执己见;军备限制谈判大使爱德华·罗尼将军反对限制战略武器

会谈第二阶段协议,以前他还做过日内瓦裁军谈判五角大楼的代表;负责国际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理查德·珀尔代表五角大楼协调裁军和其他小组的关系,他曾是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的主要外交政策助手,在阻碍与苏联达成协议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481 美国政府的军备控制建议似乎是专为破坏而不是推进这一进程而提出的。中程导弹“零点方案”规定以我们撤除所有的 SS-20 导弹来换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不部署它们的导弹,它根本无视苏联是在以实实在在的东西换取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里根在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中提出的大幅度削减陆基弹道导弹的政策——以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取代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强调从限制改为削减,这是一个新变化——对苏联也是不适当的,因为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有7/10是陆基的,而美国只有2/10。莫斯科与西方许多国家都认为这些建议只是想在公众面前标榜自己,而不是真诚地寻求减少核武器。

美国继续执行促使东欧与苏联分离的政策,并且以一种更直接、更明显的方式追求其目标的实现,就像其在波兰做的那样。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包含有军事合作的因素。美国在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把地区地缘政治与在一条广泛的战线抵制苏联影响联系起来,从卡特的灵活反应政策向积极主动政策转变。美国对政治解决把苏联带进长期消耗战之中的阿富汗危机毫无兴趣。为了抑制古巴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行动,美国对哈瓦那加强了政治和心理压力。当里根和黑格威胁要打击中美洲“不稳定的根源”时,他们指的就是古巴。美国为此在其武装部队内成立了单独的加勒比海指挥部,还进行常规军事调动,古巴反革命组织也加强了活动。

美国同莫斯科的关系在急剧恶化。苏联领导层原指望里根上台后会放弃他在竞选中的反苏态度,采取更明智的立场,但事实证明这些希望都毫无根据。白宫利用一切机会破坏苏联,它执着地把所有的国际事件都看成是同苏联的对抗,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局限于全面的、甚至是纯粹的反苏基础之上。这就是莫斯科得出的总的

印象。

当然,美国政府不可能完全忽视战略核武器平衡的规定,也不可能忽视其盟国和本国人民的某种担心,即这种新政策有可能导致与苏联爆发直接对抗的危险。正是这些因素才促使里根和勃列日涅夫通过私人通信进行半心半意的、大都没有结果的对话。里根偶尔写些这样的信表示他的友好感情,他认为这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他好斗的公开立场的影响。这些都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进行的。与其前任不同,里根政府拒绝使用任何私人渠道。

莫斯科对罗纳德·里根根本就不抱什么幻想。但在其领导集体的思想深处却仍然保留着一种下意识的、微弱的希望,即这个言词强硬的政治家最终会成为一个他们可以和他建立联系的现实主义者。当他们认识到他们在同一个危险的、喜欢对抗且不愿和苏联达成任何协议的人物打交道时,他们的失望变成了真正的担心。至少在里根总统任期的前五年,莫斯科的看法就是这样。

482

里根的说三道四的做法对克里姆林宫有关国内问题的争论及其领导人的变更所产生的影响,与华盛顿所预期的效果恰恰相反。它加强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安全机关那些一直迫切要求找出里根政策的对应物的人的力量。罗纳德·里根想方设法要在我们领导人之间设立一道相互敌视的坚固防线。没有人信任他,他的任何建议几乎都很自然地受到怀疑。我们两国关系中这种独特形势,有可能导致种种危险的后果。

当亚历山大·黑格在尼克松时期的白宫工作时我就认识他了。我并不认为他是国务卿的最好人选。他是一个典型的恶霸;他说话的态度富有对抗性;他不愿达成双边协定是人所共知。他把任何事都看成只有黑白两色,不承认还有其他色彩。他的这种判断的绝对化似乎反映了他的军人背景。他更熟悉对抗的环境,而不是不确定的环境,他认为紧张局势的缓和和长期谈判的模糊前景与这种不确定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他把自己当成美国外交政策“代言人”的一人负责制企图导致了他同总统的亲密助手以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的数不清的小冲突。他们当中无人承认新国务卿有权垄断外交政策，渐渐地连总统也反对他了。他不久就被政府内外当成一个爱挑起争论的人物，虽然他的观点与总统本人的观点并没有多大区别。

我不久就发现，新政府的问题在于还有另外一个人在负责苏联事务，他就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他执意不与我们大使馆联系，他不想因此挑起与黑格的公开冲突，因为黑格认为和苏联使馆接触是他的特权。这使得政策上毫无区别可言，因为艾伦对苏联无论如何也是不友好的。

483 黑格第一批任命的官员中有两个是在东欧呆过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我对他们都很了解。第一个是沃尔特·斯托塞尔，他曾担任过驻西德·波兰和苏联大使，黑格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服役时与他关系不错。他成了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在国务院排第三位。第二个是劳伦斯·伊格尔伯格，他当时是驻南斯拉夫大使，从前做过亨利·基辛格的助手，他就要被任命为负责欧洲事务的副国务卿。黑格决定不设苏联事务特别顾问一职。

我同黑格的第一次谈话是在参议院批准对他的任命之前，为庆祝新总统就职而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进行的。我们一同回顾了他在尼克松手下任职时我们之间的大量私人交往。我指出我们两国的关系曾经是很友好的，莫斯科准备再度进行合作。但黑格却指出，我们的关系不幸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必须努力工作，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消除对彼此在世界各地意图的强烈的怀疑。在他看来这是造成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原因。他说，在他的任命被参议院批准后，这将成为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题目。

在招待会上，我还和温伯格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我与他也是从尼克松时代起就相当熟悉了，他那时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我们的公共教育部长彼得罗夫斯基早先也曾会见过温伯格并很为他着迷。在了解到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彼得罗夫斯基向莫斯科

的每一个人都重复说在里根政府内有“他的一个朋友”。我根据温伯格从前的经历,认为他会起些均衡作用,但不久我们的幻想就完全破灭了。

我首先对温伯格的任命表示祝贺,并开玩笑说由于他在公众面前采取了我称之为“相当灵活的立场”,从而证明他已经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官了。他表示反对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甚至连反弹道导弹协议也反对。他停了一下又说 he 至少要花6个月时间与专家商谈,才能找到与苏联进行军事谈判的正确方法。我们双方的立场不可能一致,因为我们决定私下再讨论这个问题。我说我准备概述苏联的立场,并解释其背后的动机。

温伯格承认,他对这类事没有经验,也相当无知,所以在目前即便与我进行一次预备性会谈也没多大意义,以后则另当别论。至于他的公开声明,他坦率地承认他不过是重复了里根的观点而已。在政府内毫无保留地支持里根在外交政策上的所有声明将成为温伯格的行为特色,只不过他通常使这些声明听上去显得更强硬。

484

黑格和葛罗米柯第一次正式交换意见时也持同样的调子。1月24日,黑格写信——通过美国驻莫斯科使馆——警告苏联在波兰和非洲的行动,批评我们在阿富汗的政策。但对裁军的问题,他在信里却只字未提。7天后我转交了葛罗米柯冷冰冰的回信。信中说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注意,但他感到“遗憾的是,根据你的信件,这些问题都没得到新政府的注意”。黑格看过信说,经过考虑他认为我们的第一次交往可以“暂停”。

随后,黑格问我个人对美国新政府有何看法。我们见面那天正好赶上里根第一次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那里刚刚发表了一番臭名昭著的讲话,说苏联领导人为了推动世界革命而“保留犯罪、撒谎、欺骗的权力”。我告诉黑格,坦率地讲,我看不出它与持傲慢的说教态度的卡特政府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尽管它的继任者高唱着“新开端”的调子,但他们仍然踏着卡特的脚印前进,其结局恐怕也

会一样的。

“你不能把我们与卡特政府相比，”黑格怒气冲冲地打断我。

“不幸的是，这样的比较符合事实，”我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政府真正关心改善两国间的关系，而不是为公开对抗寻找借口，那样的比较自然不太恰当。但针对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和里根对苏联充满敌意的讲话而言，这个比较是恰当的。我们把他的讲话看作是他的政策宣言，我对此只能感到遗憾和震惊。他会怎样和我们打交道呢？里根发表这种前所未有的胡乱讲话无疑将会给苏联领导人留下一种最不友好的印象，我相信会引起他们强烈的愤怒。他那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在一开始就给新政府定下这样的调子呢？”

我承认我对新总统这样猛烈地攻击苏联实在感到迷惑不解。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想不到可能会有比卡特时代更糟糕的。但不久我就看出来，在意识形态和宣传方面，里根时代更糟糕，而且更加危险。

485 黑格说里根曾给他打电话说起过新闻发布会的事，并特别强调有关苏联的讲话不是要冒犯莫斯科的任何人，只是表达他自己的深刻信念而已。

我告诉黑格，这种澄清只会使事情更糟。

我就这样结束了与新国务卿的第一次正式会见。与其前任不同——他们都喜欢与我单独交谈——黑格把会谈安排在有两位副国务卿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虽然黑格建议我们于2月5日在参议员珀西家的聚餐会上再见面，那时我们可以比较随便地交谈，但有一点很明显，这就是从前开辟的秘密渠道已经不复存在。相反，我们的第一次正式谈话同他与葛罗米柯首次交换意见时一样，主要集中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如伊朗问题、阿富汗问题、波兰问题等，忽视了诸如裁军之类有可能实现妥协的领域。这就是新政府所采取的路线。第一次正式会谈就使我确信我们面临着艰难岁月。

另外，由于意见交换公开化，报刊上的宣传得到了肯定。这显

然是根据黑格的指示,也许还是根据总统的命令进行的。虽然按照外交惯例,外交部长之间的信件往来都是保密的,但白宫还是首先泄露了黑格给葛罗米柯的信件的基本内容。葛罗米柯愤怒地做出报复,他把自己的回信内容也泄露了出去。这样,从一开始,美国新政府的外交就以两国政府的公开指责为特色。

在我第一次拜访黑格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后来弄得人所共知,成为新政府对苏联不妥协的象征。在基辛格和万斯任国务卿期间的大约12年里,我们的秘密通道一直在全速运转。我到国务院拜访他们有时是官方性质的,有时却是私人性质的。当我像其他大使一样公开地通过正门进去,就是官方性质的,而当我乘车通过国务院地下停车场进去时,就是私人性质的。每一次都由国务卿决定我该走哪一条路线。一切都取决于他是否想让新闻界知道我们的会见,或者不让他们知道,但通常都是后者。在每次拜访前,我的助手都会给国务卿的私人助手打电话,从那里得知我是从大门进去,还是经过停车场进去。

我的助手像往常一样打电话问我第一次拜访黑格应走哪一条路线。国务卿的助手回答,“跟往常一样”。我最近几次去国务院都是走停车场,所以我的助手和司机决定照此办理,没有想到问我这“往常”指的是哪一条路线。当我们到达停车场时,我们却被引到了正门。坦率地讲,我对这种变化并没有太在意,因为过去也出现过这种变化。我没有向黑格问及此事,他也没有提。但第二天,这一“事件”就被故意透露给了新闻界,并演变成巧妙表达美国对苏态度变化的一个有意的姿态。当我再次见到黑格时就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对这种所谓的“误会”表示歉意,说他的助手应当事先告诉我们新的路线。我那时才明白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而已。它并没有增加我对新国务卿的信任。

政治局于2月11日在愤怒而激动的气氛中开会,讨论了整个形势。里根总统由于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那篇被美国新闻媒介做了详细报道的讲话而受到彻底的一致谴责。在我长期的大

使生涯中,苏联领导层的愤怒从来没有这样突然而深入地发泄到一位美国总统身上。这是最高层领导个人关系的一场灾难,虽然里根本人也许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根据双方的约定,我于2月5日与黑格在参议员珀西家举行的晚餐会上见了面。那天晚上天很冷,还刮着风,天气似乎也在和当时的政治气候遥相呼应。我们的谈话持续到深夜。黑格对自己的原则深信不疑,但他表现得像一个老朋友。尽管他比为尼克松服务时更有发言权,也更自信,但他讲起话来仍然含含糊糊。他显然是想表明自己是政府中主要的外交决策人。

黑格在谈话中清楚地表明,里根保证要无条件地急剧增加军费以“赶上苏联”。我指出,卡特政府在最后一次向国会作证时表示,美国和苏联在战略武器方面已经大体平衡。黑格很不情愿地承认均势的确存在。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按照美国军事专家的意见,如果苏联军备竞赛以这样的规模和势头发展下去的话,假如不采取紧急对应措施,到里根任职末期,苏联就有可能在军事潜力上超过美国。

那么为什么不进行军备谈判以减轻这些忧虑呢?黑格明确表示,它还没有列入新政府议事日程。新政府优先考虑的是执行一个内容广泛的重整军备计划——“然后我们再看看”。

487 黑格还坦率地表示,尽管“我个人希望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用词应更恰当些,但他不是故意那样做的。不管怎样,他感觉到的和他所要说的都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政府不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同苏联打交道”。公开发表敌对讲话是政府新的苏美关系立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解释说,这意味着里根不能忍受苏联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利用像古巴这样的代理人。里根对古巴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挑起内战感到特别愤怒。

黑格还把莫斯科关心波兰发生的事与美国关心中美洲的事情相提并论。如果莫斯科甘愿冒因镇压波兰团结运动而引发世界危

机的风险，“我也想告诉你，如果有必要，美国也准备在我们这一地区采取坚决的行动，古巴和所有其他国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他的话是否意味着里根政府对与我们进行任何建设性对话都不感兴趣，它会放弃任何外交手段而把希望完全倾注在军备竞赛上吗？他们真的相信这种好战的方式行得通吗？黑格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对话，但要花时间准备，同时他把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与“苏联总的行为”联系起来，美国政府将对苏联的行为做出评价。我拒绝接受这种看法，并解释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史表明，这种做法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只能导致永久对抗。

黑格的谈话明显是有意向我们施压，根本就不打算寻求达成一致。美国政府仍然认为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尤其是在裁军问题上出现积极的变化不符合它的利益。正如黑格所说，当美国人民被要求为军事开支的急剧增长做出相当大的牺牲的时候，美国政府当然不愿把“错误的信号”传递给他们。

我邀请斯托塞尔来我家吃饭，决定与他就形势作进一步探讨。我们从1952年起就保持着友好关系，那时我还只是驻华盛顿使馆的一位参赞，他是美国国务院苏联处处长。现在他是副国务卿。多年来在作为朋友和专家而进行的交往、谈话和讨论中，我们之间已建立起相互信任，即使在两国处于对立状态时也是如此，因此我们谈得相当坦率。

他的一些陈述非常值得注意。根据斯托塞尔所说，里根对苏联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看法，他真诚地相信他的政治权力来自美国人民对他的反苏立场以及大力呼吁重整军备的支持，他认为重整军备据称可以赢得世界对美国的尊敬。这一切使得像他本人那样的专家都很难主动提出专家建议，他们只能听从来自上面的指示。国务院没人确切地知道能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做些什么：是拟订一份全新的协议？是改变字句？还是进行修正呢？苏美关系中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是如此，他们只是在应付了事。

他感到在里根把他的军事计划递交国会之际，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至少要停顿6到8个月。他说，我们这些专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一点一滴地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开展两国政府间的对话，并为将来的部长会谈作准备。我同意他的建议。但目前里根仍像他在竞选中那样发表反苏言论。只不过他现在所谈的题目是古巴、左派对萨尔瓦多的威胁以及为“自由波兰”而进行的斗争。

勃列日涅夫的突破尝试及其失败

2月中旬，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26次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前，政治局就外交政策，尤其是我国与华盛顿新政府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我汇报了我第一次与其高级代表进行的接触的情况，葛罗米柯做了极富批评性的报告。政治局对新总统及其政策表示忧虑，甚至惊恐。我们该怎么办呢？

政治局最后决定仍然遵循缓和的路线，希望里根能逐渐变得“更有理智”。在党代会期间，苏联领导层又提出了新的外交政策倡议，希望能改善局面，扭转紧张局势上升的势头。党代会后，由于没有秘密渠道可以用来探讨这些思想，政治局决定通过勃列日涅夫给里根的私人通信来进行。

3月6日，勃列日涅夫发出第一封非正式信件，这实际上是一封邀请信。它邀请里根就一系列具体建议开展对话，这些建议包括欧洲安全与合作的赫尔辛基会议所设想的建立信任机制以防止突然袭击等问题。勃列日涅夫建议把提前通知举行演习和类似活动扩大到苏联领土和西欧，甚至扩大到远东。他还建议重新开始削减核武器谈判，讨论解决中东问题和两伊战争的办法，举行联合国安理会最高级会议。这封信的基调可以从信的开头提出的设想和结论中体现出来。它设想“军事战略平衡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结论建议美国新政府考虑苏联的设想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对话”加以探讨。虽然有些要求也许提得太过分了，同时美国政府也不可能

接受其中的每一项建议,但是信件本身包含有大量的积极因素,如果华盛顿愿意,足可以供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进一步对话使用。

由于这项计划的梗概在我们的党代会公开提了出来,所以西方对此作了广泛宣传。美国国内的反应明显不一致。理查德·尼克松在纽约邀我进餐时对此予以好评,说勃列日涅夫不与里根进行公开辩论是对的。里根正受好斗情绪的支配,他已经为来自莫斯科的批评做好准备,所以他准备反击。最高级会谈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尼克松认为,从长远来说,这项建议会起积极作用,但他劝我们不要操之过急:“我斗胆向你们提出一些个人忠告,我劝你们在下次对话中,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不要固执地逼迫里根举行最高级会谈。不要把事情做过头了。”

里根在勃列日涅夫讲话后不久就与尼克松进行了电话交谈。使尼克松大为吃惊的是,里根的一个助手向他暗示,苏联的和解建议是总统本人强硬立场的结果。里根本人怀疑勃列日涅夫建议举行最高级会谈是因为他比较有经验,因此能够击败总统,尤其是里根现在对许多问题的细节并不了解。但尼克松试图以他自己与勃列日涅夫的多次最高级会谈来说服里根。然而里根似乎已被自己的部下说服,认为自己的政策是正确的。尼克松建议我们“再教育一下”里根,但让我们不要着急,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

几天后,我在企业家肯德尔为庆祝自己的60岁生日而举办的晚餐会上见到了温伯格。我问国防部长本人对勃列日涅夫的建议有何想法,他回答说,国务院对此正在研究。“但是,”他又补充道,“坦率而大胆地讲,我预料在里根政府时期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会有很大的改善。”

当被问及是什么原因使他做出这样的回答时,温伯格踌躇了一会儿,然后脱口而出:“莫斯科认为它可以以对待卡特的方式对待里根。但里根要证明这样做的效果会适得其反。”

我要他更具体地谈一谈那些向里根提出这种奇怪思想的人以及背后的原因。温伯格敷衍了事地做了解释。他再次谈到苏联试图

用对付卡特的方式来考验里根的陈旧说法。然而,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只是说苏联领导人在最高级会谈中巧妙地赢了卡特,让他同意了有利于苏联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温伯格的进一步论证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如果里根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那他想要得到保证,即会谈后苏联军队将不入侵波兰,这样的事在卡特与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会面后几个月便在阿富汗发生了。里根不允许自己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人们曾这样嘲笑过他前任的天真。

我告诉温伯格,他的推理完全站不住脚。“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来说,哪一方也没有使对方上当。请你准确地告诉我究竟是哪些地方出了毛病?”

温伯格说他还没有仔细研究这一问题,但政府正在进行审查。我指出,在审查条约之前就说它不恰当或对它不满意,或者一心只想证明它是不可接受的,这样做至少也可以说是不正常的。我还指出,我可以保证没人有入侵波兰的打算。

与温伯格谈话给我的印象总的说来是悲哀的,他对我们的简单态度和他的无能成为里根政府当时的一种特色。总统形象的塑造者很喜欢他在诸如波兰之类的问题上针对苏联发表的富有挑战性的公开声明。唐纳德·肯德尔告诉我黑格对此也没多加考虑,虽然国务卿仍旧认为警告可以在国内产生有用的印象,即政府能够阻止苏联做这些事(尤其是在苏联根本不打算这样做的时候)。但温伯格却在跟着白宫讲这些意在塑造一个强硬总统形象的话。另外,温伯格自己也很喜欢抛头露面,他对记者发布的大量反苏演说有助于实现他的这一目的。这些讲话连黑格都很烦,他讨厌温伯格干涉他认为完全属于国务院职责范围的事。

我与里根的下一次会见是在华盛顿一年一度举行的著名的烧烤晚会上。我是被邀请的不多几位大使之一。这样的晚会通常都有来自政府、国会、国务院、五角大楼、商界及新闻界的大约500名头

面人物参加。在这些晚会上,包括总统在内的著名政治人物通常都是人们的笑柄。那就是说,他们要被放在烤架上“烧烤”。总统与反对派领导人和其他一些人相互说些笑话,第一夫人南希·里根在一群化装记者对她昂贵的服装挑毛病时露出吃惊状。即使对一个美国观众来说,这也是不寻常的。此外还有许多拙劣的滑稽表演和其他娱乐节目。这是某种外国人不熟悉的奇怪而典型的美国政治表演。

我与总统只是在中间休息时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我们互致问候,他表示希望能与我进行详细交谈,并说尼克松曾向他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我回答说愿意在他方便时与他会面。他向我保证说无论如何他都要那样做,只是得稍晚一些,以便在考察与苏联关系后能使会谈真正取得成果。他还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他很难在同样的基础上与大使竞争,因为大使已经历了好几位美国总统,对所有的问题都熟透了。

里根从医院给勃列日涅夫写信

我请沃尔特·安嫩伯格和他的妻子勒诺吃饭。他们是里根夫妇在加利福尼亚最亲密的朋友。沃尔特·安嫩伯格是美国前驻英大使;他妻子则是首席礼宾官。她是一位迷人的妇女,曾因在机场向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行屈膝礼而受到新闻界的攻击。她被指责向王权低头,虽然美国新闻界和读者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多少外国君王来访的消息,更不用说从大不列颠来的了。

安嫩伯格说他相信里根最终甚至会在他的助手之前认识到他将不得不调整他的对苏政策。他断定“在这一点上,里根并非不可救药”。但他补充说这需要时间,尤其是总统从3月底的一次暗杀企图中死里逃生后已形成了一股慰问浪潮,里根正把它变成一种政治资本,使他能在华盛顿和全国更孚众望(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向他发了慰问电,黑格后来为此向我道谢)。安嫩伯格以他特有的

正式语气说,此次受伤很可能会拖延总统对外部世界进行“深思的过程”。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与参议员保罗·拉克索尔特的私人会谈。他是总统的密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志同道合者。里根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他在毗邻的内华达州任州长。拉克索尔特提醒说,我们也许忘了要改变里根这样一个年届70、对苏联又持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的老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又说总统的观点在慢慢发生着变化,他已逐渐认识到同莫斯科展开对话将是必不可少的,他甚至已经开始给勃列日涅夫写私人信件了,这与他的个性是完全不相符的。这件事本身并不太重要,也不可能给莫斯科带来多大影响,但拉克索尔特说这是里根理解现实世界的真正的心理上的进步。应当记住,他写信的时候一只胳膊还被吊着,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他的助手还劝他不要写这封信。“但我支持里根,”他说。拉克索尔特还补充说,如果苏联领导人最终发现里根是一个愿意达成协议的小伙伴,那他们不应感到惊奇。

在伤病恢复期,里根果然拿起了笔。4月25日,黑格带给我的不是一封,而是两封里根写的信。第一封是对3月6日勃列日涅夫信件的正式答复,黑格告诉我,这是由国务院起草的,另一封则是里根亲手写的,没有用打字机打。美国总统在信里说,他“与苏联领导人有一些相同看法”。黑格是在接到正式答复的同时又从里根本人那里拿到这封信的。他相信里根是想避开他从前任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些具体问题,从更广阔、更富理性的意义上考察苏美关系。

这封信被政府当作最高机密,因为总统的密友认为这封信写得太幼稚了。但是这封信很值得注意,因为它是里根在其总统任内的前期,在没有助手帮助或国务院正式建议文件的情况下,由他自己亲手起草的为数不多的几份外交政策文献之一。在此后几年中他将把这封信当成他一贯倡导对苏友好关系的证据,并以此来回答那些指责他改变了对苏态度的人。

这封信回忆了勃列日涅夫在圣克门蒂拜访尼克松时他们之间

第一次会面时的情景,并且说“人类的和平与善意似乎就在唾手可得之间”,当时勃列日涅夫拉着里根的手向他保证要致力于和平事业。在唤起普通人对自己的人身自由和安全的希望的同时,里根有些怀疑两国政府会不会“让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哲学、政府政策阻止我们去考虑人民真正关心的日常生活问题”。

我在读总统的信时发现,它受到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具有的善意的传统思想的激励。他乞灵于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一段历史。那个时候苏联还没有原子弹,并且受到战争的彻底破坏,但美国当时并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虽然没人能阻止它这样做。但是,总统指出,苏联后来的政策似乎变了。如果我们能改变那一切,两国是能够合作的。

493

勃列日涅夫的回答一个月后才送达。他也回顾了他们在尼克松的卡萨·帕西费科别墅的会见,也回顾了缓和以及军备控制政策。“现在,为什么这一进程运转不灵了呢?为什么停止甚至逆转呢?”勃列日涅夫写道。他不同意里根的看法,他说当美国实现了“美国领导人所说的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苏联一直在恪守其战时的承诺,但近年来两国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糟。“但我要传递给你的主要信息是,我们不是在寻求任何平衡,对贵国的合法利益苏联不存在任何企图,”勃列日涅夫写道,“我们在寻求另外的东西,这就是和平与合作,寻求在苏美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信任与友好的感情。”

这是他们在最初交往中发出的最重要的信息。黑格仔细地读了信,但委婉地拒绝在总统看到它之前发表评论。

里根试图与勃列日涅夫展开私人对话。如果他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他失败了。苏联领导层也许低估了里根做出这一举动的心理因素:在疗养伤口的时候,里根平生第一次给苏联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写了一封亲笔信。勃列日涅夫的回信(里根在回忆录中称之为“冷冰冰的答复”)以标准的论战形式强调了他们的分歧,而没有强调发展他们的个人关系的必要性。这种调子不可能在他们个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里根的信实际上也没有起到多大的帮助作用,虽

然他显然是在坦率表达他个人的信念。我认为,两个人之所以未能调整好进行对话的波段,其主要原因是时机尚不成熟,里根本人写那封信也是出于一时冲动,没有真正考虑在对苏政策上作些具体的改变。尽管此后他们各自的外交部在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又为他们起草了许多信件,但他们的私人通信实际上停止了。最高层之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宫还把里根的信件中带有偏见的内容泄露给了新闻界,这就使他们之间的联系毫无保密性可言。

494 在这个困难时期还曾出现过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变化,这就是我接替吉列尔莫·塞维利亚-萨卡萨成为驻华盛顿外交使团的团长。塞维利亚-萨卡萨从1943年以来一直是尼加拉瓜驻美大使,而1943年我们驻华盛顿的大使是葛罗米柯。塞维利亚-萨卡萨是一个性情快乐的人,他对每个人都很友好。他既从不为日常公务所累,也不担心升迁问题,因为他是尼加拉瓜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的儿子,美国与索摩查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他本人实际上是美国的政治工具。塞维利亚-萨卡萨乐于出席华盛顿各使馆出于礼仪请他参加的各种活动,直到尼加拉瓜发生革命剥夺了他的大使职务为止。这场革命也使我成了外交使团团长,因为我在华盛顿服务的期限仅次于塞维利亚-萨卡萨。里根政府自然是谴责尼加拉瓜革命的。

我马上就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我根本没有时间出席华盛顿各使馆举行的招待会,那时大约有150家使馆,每一家至少每年得举行一次国庆招待会,还有其他一些场合也要求外交使团团长参加,如每当国家元首到达华盛顿时在白宫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等。这又导致了第二个问题。有一些国家同苏联关系不友好,或者根本没有外交关系,这虽然不影响我的外交使团团长的地位,但我在仪式上有时总感到不相宜。更糟的是,里根总统在欢迎讲话中几乎总免不了要批评苏联,批评它的政策及意识形态,这已成为他的仪式

中的一部分。但是绝对没有必要让苏联大使听了一遍又一遍。

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完全知道这种情况的敏感性,所以每当华盛顿有对苏不友好的国家元首来访或国务院知道里根会在欢迎讲话中谴责苏联时,我们就安排在资历上仅次于我的瑞典大使威廉·瓦克梅斯特代我去参加。我们合作得很好。我还目睹了许多有趣的事,其中有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华盛顿的一次不能说不重要的访问。教皇使节为外交官举行了一次招待会,然后聚集在一个大厅里的大使们应邀一个一个地走进一个较小的接待厅,我们在那里受到教皇的接见。

作为团长我是第一个进去的。我知道这位波兰出身的教皇精通俄语,我就用英语问他愿用哪一种语言交谈。教皇提议他自己说波兰话,我说俄语。过了一会儿,他出乎意料地问我是否介意他把我当作一个伟大国家的大使来祝福,这样他就可以祈盼我寻求世界和平的努力获得成功(他知道所有的苏联大使一定是共产党员,因此从形式上说也都是无神论者)。我回答说我很乐意接受他的祝福,尤其是在从事他所提到的伟大事业的时候。因此,我相信是我们外交历史上接受教皇祝福的唯一一位苏联大使。

495

莫斯科日益增加的烦恼

了解那个时候苏联领导人的心理状态是很重要的。缓和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已成为苏联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打上了勃列日涅夫本人的烙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是在缓和时代上升到权力的高位的。在苏联,对缓和——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的价值都没有什么争论。对莫斯科而言,它不仅仅意味着降低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而且使苏联领导人感到他们取得了同美国平等的而且受到国际承认的永久超级大国地位。他们希望这一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然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突然面对着一位新总统——罗纳

德·里根，他想把这一切都扫除干净。最令他们沮丧的是里根对苏政策的两个特征：一个是他重获军事优势的明确决心；另一个是他决心发动一场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战争，在苏联国内及其盟国之间制造混乱。美国舆论总体上认为里根是清白的，甚至对他表示支持。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发觉他们正面临着全新的形势和一个令人烦恼的人物，他顽强地推行着一条使他们极不舒服、让他们感到震惊的路线。当它们不情愿地得出只要里根掌权，缓和即不可能再恢复的结论，克里姆林宫内部就会倾向于对他进行反击，而不是拉拢他。

当葛罗米柯和黑格9月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面时，双方重申了他们在前两次会面中的立场，虽然他们也同意就欧洲导弹问题进行谈判，并同意于次年1月再次举行会谈。葛罗米柯因为没有收到去白宫的邀请，尤其是他还带着政治局的特别指示，要亲自向新总统阐明我们的外交观点，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而非常愤怒。

496 与此相反，里根最近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在发送的当天就被公诸于众。这封信是9月22日发送的，信中重申了白宫对苏美关系的立场。白宫和美国驻苏使馆试图断章取义地表示华盛顿正努力发展与莫斯科的良好关系，而不是相反。出于愤怒，政治局也把勃列日涅夫的信件公之于众，但它更愤怒的是里根政府把高层领导人的通信用于宣传目的。

然而，政治局决定勃列日涅夫还是应该回复里根的信，就当没有发生过泄露事件似的。我在10月16日把勃列日涅夫的回信交给了黑格。这封信欢迎里根明确表示要与苏联保持稳定牢固的关系，但它断然拒绝总统指责苏联在古巴、安哥拉、柬埔寨等地或在其他地方搞的活动是两国间良好关系的障碍。勃列日涅夫在信中说，把那些活动同两国关系的改善连在一起只会导致“蓄意的僵持”。此外他也不同意里根有关苏联新闻界的反美运动是恶化两国关系的

主要因素之一的说法。

“如果谁有权抱怨猖獗的敌对活动的话,那就是苏联。这只要看一看针对所谓的苏联威胁而不停进行的宣传就行了。是什么原因使您,美国总统先生,在前一天的公开声明中说苏联把它的政策建立在它会赢得一场核战争的信念之上的呢?除非有人故意蒙蔽您,否则您一定知道我的声明:核战争对整个人类将是一场灾难。”

勃列日涅夫在信中试图通过同意黑格和葛罗米柯就限制欧洲核武器问题举行谈判来挽救局势。黑格没做任何评论,但答应把信转给里根。里根在10月2日已经宣布了一项长期的军备扩张计划,准备最大程度地增加强大的战略武器生产,其幅度要比历届总统计划的都要大,提供的资金也更多。它包括生产100架B-1战略轰炸机,发展“隐形”轰炸机和威力更大的三叉戟核潜艇,生产100枚MX级洲际弹道导弹,改进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这些项目有些已在卡特时期讨论过,但真正命令将其投入生产并大肆张扬的是里根。里根当着新闻界的面签署的这项军备扩张计划是美国军事和政治原则向包括可能发生有限核战争的假设转变的一个重要部分。

苏联领导层感到它日益受到里根政府发动的运动的攻击,这场运动试图使其错误地指责苏联认为自己能够打一切核战争并取得胜利合法化。10月20日,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对富有挑战性的不停指责应作何反应。出于愤怒,克里姆林宫决定把它的立场通过答《真理报》记者问的形式公诸于众。政治局批准的答记者问文本如下:

497

问:里根总统最近说,根据对苏联领导人的私下谈话所做的判断,苏联认为它可以打赢一场核战争。他以此证明他的加速发展核军备的方针是合理的。您对美国总统的这段话有何评论?

答:里根先生说他知道苏联领导人私下说了些什么,那就

让他凭良心作答吧……谈到正题,我只能说……如果有人想发动一场有望取胜的核战争,那他一定是自取灭亡的疯子。不管其军事力量多么强大,也不管他想选择何种方式发动核战争,他都不会达到目的。惩罚将不可避免地随后而至。这就是我们的原则立场。如果美国总统也作出一个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声明,把核攻击的思想当作犯罪而抛弃,那将是件好事。

里根总统自然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他的好战立场引起许多国家的日益忧虑,美国的邻国更是如此。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愿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之间进行调停,但里根拒绝了他。经过几次努力后,墨西哥人于11月23日在墨西哥城安排黑格与卡斯特罗的长期同事、副总理卡罗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会面。双方对会谈都保守秘密,对我们或墨西哥人都没有说什么。我是从墨西哥驻华盛顿大使乌戈·马加因那里得知这件事的。

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也不断损害着我们的关系。11月中旬黑格告诉我,里根本人对夏兰斯基和萨哈罗夫很感兴趣。他说,他们的案子如果得到积极的处理的话,可以对我们两国的关系产生建设性的影响。虽然他们时不时为了宣传目的打这张牌,但里根和黑格都没有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利发表意见(相比之下,卡特就这样做了)。我们大使馆曾接到卡特、万斯和其他政治人物打来的电话,询问有关萨哈罗夫和其妻子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的报道。我们报告了莫斯科并得到答复:“据我们所知,他们的病并不严重。”这就是全部的答复。

498 我们仍然定期提醒莫斯科注意审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对美国公众舆论及苏美关系的严重的负面影响,但莫斯科根本不予理睬。勃列日涅夫政权仍然相信西方围绕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是一场意在搞垮苏联的意识形态战争。对里根个人的愤怒也是他们固执己见的另一个原因。

12月13日,我请比利·格雷厄姆到使馆进餐。这位著名的传教士曾试图搞到一张出席下一年春天在莫斯科就和平与裁军问题而召开的宗教会议的邀请信,我帮他弄到了他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格雷厄姆告诉我,他刚应总统之邀在白宫度过了一个晚上,并与总统和他的妻子做了一次长谈。他认识里根的妻子已有15年了。在谈话中,他提请总统注意,尼克松由于在与苏联和中国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的进展而被载入史册,他认为里根也可以作为一个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苏美关系朝正常化方向转变的伟大总统而名垂青史。格雷厄姆尤其赞成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他指出,日益增长的核威胁在美国激起了宗教感情的波涛。

我问他里根的反应。他想了想之后回答说:“我相信总统正沿着正确的轨道行进。”很显然里根对格雷厄姆的建议不太热心,但也没有直接拒绝。我问他,根据他的看法,谁对总统最有影响。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里根的妻子南希。他把她描绘成一个相当有智慧但又相当保守的妇女,她似乎希望她丈夫在美国历史上,包括在苏美关系中留下一个杰出的记录。

我也喜欢那样,但里根在他任职的头一年肯定不是这样一个人。

第二十八章

里根的讨伐运动

不受外交影响

不管莫斯科审议或实际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方针，事实证明里根政府是不受其影响的。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与在其任期中期就已从竞选时的高谈阔论转向采取较为温和、务实立场的大多数美国总统相反，里根显示出对国内外传统势力的有效免疫力，这些势力通常能作出完美的政策调整。执政两年后，里根丝毫未改变在其进入政界前很久就具有的好斗意识形态立场，这曾主导其1980年的总统竞选。苏联依然是他的头号敌人。

1982年1月26日，黑格和葛罗米柯在日内瓦第一次重要的外交邂逅中见面了。他们讨论了核武器限制、中东、南非、安哥拉和其他地区的冲突，但是每个人都坚持各自的观点，而不愿作任何妥协。对波兰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每一方都要求另一方停止干涉。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这似乎不是美国人的目的。会议结束时，黑格宣布：“我认为这次会谈的目的不是改善苏美关系或整个东西方关系，相反，我方借这次会谈阐述了我们对一些紧迫问题的看法，首先是表达对波兰局势的关切。我认为，我们的会谈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有用的。”

这次会谈所完成的是使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更加疏远，而且当问题转到武器控制时更加严重。在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

上,黑格用波兰事件来说明他未能恢复裁军谈判是如何正确的。这又是一次僵局。

在波兰,知识分子和工会举行的要求民主改革的示威游行震撼了波兰政府的控制,直到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于12月13日颁布了军管法令时为止,而且我们支持他的行动。在辞职许多年以后,雅鲁泽尔斯基承认他采取行动是抢在苏联军队进行干涉前的先发制人,而事实上苏联领导人不愿派军队进行干涉,以免重蹈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招人辱骂的覆辙。这一策略的考虑要点是,多年来,苏联根据《华沙条约》在波兰的一些军事基地驻扎军队,但是苏联军队从不干涉波兰国内动乱,而且莫斯科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进行干预。

里根政府发起了一场针对苏联的疯狂秘密战,并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来报复。与此同时,我接到一份情报说,1982年1月里根同他最亲密的顾问们讨论是否向团结工会提供秘密资金,以确保该工会能在波兰军法统治的寒冬中生存下去。一场冒险的秘密战的幽灵浮现在与会者的眼前,使每个人都感到震惊、语塞。黑格打破了沉静,称这一想法是“发疯”。副总统布什同意并争论说,如果秘密行动被发现的话,这只能激怒莫斯科。然而,温伯格、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威廉·克拉克、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问题专家理查德·派普斯则热情支持这一秘密行动。里根总统立即命令比尔·凯西草拟一项计划。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凯西安排中央情报局提供先进的通讯设备和物质援助,大约每年达800万美元。苏联秘密警察通过其在波兰政府的眼线了解到美国的这一秘密战计划,但未将这一秘密得来的情报公诸于世。

当时我们所不知道的是,里根政府鉴于波兰事件正在重新制定美在东欧的目标。1982年春天发布的美国总统第32号指令是偏激的:美国政策的目标是“制止苏联维护其对东欧控制的努力”。指令授权为此进行各种公开和秘密的行动。

在欧洲导弹日内瓦会谈上,美国代表团授命寻求所谓零点

选择方案,该方案要求苏联全部撤出 SS-20 导弹,作为交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停止部署潘兴和巡航导弹。里根这些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拥有核优势的提议,甚至在美国政府内部也引起了激烈的辩论。那些真正希望达成协议的人们认为,这些提议很明显是一边倒,苏联肯定不会完全接受(事实上我们没有接受)。其他人,显然包括里根自己,认为从后面两个方面来说单是提出零点方案就是胜利——不管是被接受(这看来不可能)还是被拒绝(这将使华盛顿从中得到宣传上的好处,并且可以在欧洲部署新的导弹)。

501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也停止了。美国政府表示正在研究新的立场,但是这一进程因内部激烈的争吵和上层官员明显缺乏兴趣而拖延了。这使担心武器竞赛不断升级的美国人感到忧心忡忡。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和马里兰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马赛厄斯在各自的党内都是知名的自由分子,他们来见我并表示,普通美国人被核武器问题所迷惑,而总统和国务卿有意将欧洲中程武器均势同战略力量均势混为一谈更使他们感到不知所措。两人要勃列日涅夫发表一项立场明确的声明,阐明我们两国的所有战略力量已基本达成均势,并用具体数字加以说明。他们敦促苏联宣布准备冻结战略武器以及部署在欧洲的导弹。否则,里根政府会以此作为武器竞赛的借口。

我对两位参议员的这项好建议表示支持。不幸的是,莫斯科并未给予太多的重视。因为严守秘密的习性主导着我们对核武器问题的一切考虑,克里姆林宫拒绝公布数字。莫斯科深信,里根政府非常了解核武器的大致均势,但是——令苏联政府感到愤慨的是——美国还在继续加强防卫,并以舆论认为美国落后为借口寻求军备控制政策。里根在1982年3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已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我不知道美国总统及其助手们是真的相信他们所讲的这些话,还是主要说给大众舆论听的。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坚定地认为,美国领导权已落入这样的人手中,他们从不喜欢缓和,不接受

均势,并企图重新取得优势,梦想实现由美国人统治的世界和平。苏联领导人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实:美国国防预算开支在里根执政的头几年里每年增长25%。一旦里根政府确实发动军备竞赛,克里姆林宫就有理由认为,在美国核力量已拥有空中和海上优势时,苏联不应该因发展 SS-18洲际和 SS-20中远程导弹以取得对美陆基导弹的一些优势而受到某种惩罚。

经过一段长时期的拖延,1982年5月白宫完成了削减战略武器的建议。里根总统在其毕业的伊利诺斯州尤里卡学院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公布了这一建议。黑格召见了我就作了吹风。他表示,总统要我将建议的要点直接转达给勃列日涅夫。他强调说,这一建议很重要,是里根政府内“最高纲领派”和“现实主义派”两大阵营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而产生的。黑格属于后者,而且很高兴里根批准了国务院的意见作为这一建议的基础并拒绝了其他部门提出的“不太现实的想法”。他无疑为他领导的国务院感到骄傲。总统的意思是建议夏天在日内瓦开始谈判,目标是大规模削减战略武器到均等的水平。然而,黑格并未向我说明细节。

502

里根5月9日在尤里卡学院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美苏关系的,并以相当温和的语调讲的。显然,这是对反对核武器的群众运动作出的一个让步。但实际上美国的立场没有任何重大改变。里根有关战略武器建议的主旨是,通过按同一比例减少两个超级大国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实现不相称地大幅度削减苏联核力量的意图。我们此前已经研究过了里根的建议: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导弹是陆地发射的,而美国则拥有陆、海、空发射的三种类型导弹,所以里根的建议被莫斯科看成是美国扩大(或建立)核优势的拙劣企图。如果仔细计算一下,建议最终导致美国战略力量将为苏联战略核武器的一倍半,并在弹头数量上取得三倍的优势。美国核力量重新装备的长远计划也不会受到影响。

然而,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根据卢·卡农在其《里根总统》一书中所说——里根不懂得苏联的回绝是有事实基础的,也不

懂得回绝并不表明莫斯科不愿意谈判。约一年以后，斯考克罗夫特惊悉，里根简直不知道苏联战略力量主要是陆基导弹！这令人难以相信，但也许是事实。无论如何，无知是有其影响的。由于里根缺乏对武器控制实质问题的了解，反对改善美苏关系和削减核武器的幕僚们得到了许多机会。这使他们作出了不可能实现、但看上去很有感召力的建议。这一建议使里根总统看似一位随时准备谈判的热爱和平的伟人。

当然，里根的讲话立即引起了苏联领导层的注意，并导致了极其相反的反应。5月12日，仅在里根讲话三天后，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向政治局递交了一份联名备忘录，清晰地描述了克里姆林宫领导核心对里根的建议和其决策层的真实情感。备忘录愤怒地谴责里根“为掩盖美国的军国主义侵略政策而制造的一场宣传运动”，并企图违反能带来缓和的核均势协定。他们说，整篇讲话“充斥着对苏联粗鲁的和彻头彻尾的敌视”，旨在分裂社会主义国家并消灭我们的制度。

这个独一无二的备忘录坦率地表明了苏联领导人对里根的情感。他的名字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里一切罪恶的代名词。政治局讨论了备忘录，并作出了特殊决定：确认备忘录为苏联对里根讲话的正式立场。但是，当要通过外交途径转达时，政治局决定抑制其愤慨，并于5月25日冷静地作出答复说，苏联同意有关举行事先彻底准备妥当的细致而全面的最高级会谈的建议。同时，莫斯科强调，苏联不能将里根总统关于武器控制的建议作为真正而务实的谈判基础来接受。

在白宫

2月13日，里根总统为外交使团举行晚宴时，我发现由于我外交阅历深的原因而被安排在里根夫人南希的邻座。我妻子也同样坐在总统的旁边。就像肯尼迪夫妇一样，里根夫妇知道怎样在白宫

举行这种正式的大型活动,并从中得到享受。这是一次多姿多彩的社交晚会。大多数外交官很少有机会见到总统。

席间,里根夫人向我抱怨说,由于一年前发生了暗杀里根的事件,秘密警察几乎限制了她和里根的一切活动。

“我们在白宫成了普通的监狱犯人,”她说,“特别是我丈夫发生那件事以后。安全警卫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甚至不能外出参观我最喜欢的博物馆和商店。我们唯一安全的去处是加利福尼亚州山区牧场,你在那里可自由地散步而不会撞见我们的保镖。但从另一方面讲,你不得不适应这一切。这个国家总是有一些疯子随时准备再次谋杀里根。已经有许多吓了。”

南希·里根抱怨她从来没有机会访问莫斯科或列宁格勒,而且考虑到苏美关系现状,在她丈夫总统届满之前是不会有这种机会了。但她非常愿意去看看我们的国家。她承认,她和她的丈夫对苏联知之甚少(这一点从我们的谈话中看得很清楚)。

我表示,重要的是不偏不倚地看待并理解其他国家,因担心在错误基础上制定错误的立场而用旧框框看人是危险的。她不断重复其看法,认为人们应该到其他国家访问并亲眼看一看。显然,她渴望获得第一手资料。

564

她批评美国新闻界对她丈夫的声明吹毛求疵,并对华盛顿社交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总的来看,她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知道自身价值的女人。

晚宴后,我同里根总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谈话,他知道我刚从莫斯科回来,并想了解莫斯科是怎样估价美苏关系的。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们的关系目前正处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我又说,如果他愿意听的话,我可以向他提供一份更加详细的报告。里根迟疑了一下,然后指着周围的大使们说,我们可以在晚些时候讨论莫斯科对我们之间关系的估价。我表示将随时恭候,但很显然,里根自己并不这样想。

关于这天的事,里根总统在他的日记里作了稀奇古怪的记载,

后来在他的自传出版时发表了。里根谈到我妻子和我来白宫参加晚宴时是这样写的：“我们听到的每件事都是真实的：他们是最为可爱的一对。实际上，他们可爱极了，以致于你都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坚持苏维埃制度的。事实是，他和他的夫人最可爱，并且在经过40年婚姻后依然是那样相亲相爱。”^①

我并不是仅仅因为高兴（尽管我承认是这样的）才引了这段话。引起我重视的是，令里根着实感到惊讶，他所发现的两个可爱的人竟能在苏维埃制度下生活——也就是生活在“邪恶帝国”里，并且活生生地在外国代表这一制度。对我来讲，里根写这段话时的直率和漫不经心再一次并永远地证实了我的观点：个人的信念，而不是某种政治面貌，决定了里根对苏联人和同我们有关的一切事物的看法。

2月21日，我到白宫拜会了新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威廉·克拉克，同他进行了谈话并相互结识。他接替了因收受日本人礼物的丑闻而不得不辞职的理查德·艾伦。作为里根加州助手之一的克拉克惊奇地表示，除了极少次部长级会议外，在过去的一年里从未举行专门会议详细讨论我们两国之间重大的国际问题。我回答说，里根政府回避讨论，但我们已做好准备，而且现在依然是这样。然而，我想就某些国际问题同克拉克举行至少是一般性会谈的努力未能成功，因为他不太熟悉这些问题。然而，他却完全持有同他老板一样的意识形态方式。我个人认为，克拉克几乎不可能成为秘密渠道的最好合作伙伴，如果里根决定恢复这一渠道的话。但是无论如何，克拉克更愿意维护白宫的安全，而不想同我们直接保持接触。他无疑既不是基辛格，也不是布热津斯基。

505

4月初，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里根以他那特有的轻率语言表

^① 罗纳德·里根：《一个美国人的生活》，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90年版，第822页。

示,如果他出席6月联合国大会裁军会议,他准备会见勃列日涅夫。“我们可以谈谈,”里根说,同时摆出姿势让白宫记者们照像。

这番话在美国引起了一场混乱。但我不得不向莫斯科报告,里根政府并未同我们进行过接触,除了这个讲话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大使馆奉命认真跟踪事态的发展,但我们也被告知不要采取任何主动行动。苏联领导人不愿显示出对同里根会晤有特别的兴趣,除非美国决定通过官方途径讨论最高级会谈一事。然而,从黑格到低级美国官员都未提到此事。之后,莫斯科认为,我方完全保持沉默可能会被误解。两个星期后,即4月18日,《真理报》发表了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是回答预先布置好的记者提问),称里根总统关于最高级会谈的讲话“给人留下了相当模糊的印象”,但勃列日涅夫愿意在不同的级别上,特别是最高级会谈上同美国进行积极的对话。他表示,最高级会谈应安排周到,或许秋天在第三国举行。

当天,白宫发表一项声明说,里根政府仔细研究了勃列日涅夫的建议,但美方未做进一步说明。5月,黑格向我再次提及此事,并表示里根需要时间作准备。当我立即建议于10月举行时,黑格回避了。然而,这个问题至少已通过正式渠道提了出来。

我注意到,里根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进行的讨伐是有其限度的,这是受其支持者直接财政利益所决定的。里根政府不会对他们的抱怨视而不见。美国中西部的农场主们就属于这一利益集团,他们在波兰宣布军管后很好地执行了里根政府对苏联实施的粮食禁运法令。3月19日,两位来自产粮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堪萨斯州的鲍勃·多尔和俄亥俄州的罗杰·杰普森——来见我,并提醒我美国现有巨大的粮食储备(8200万吨)。他们表示,低粮价、苏联购买力不足及苏联可能完全撤出美国粮食市场等原因,将会引起美国中西部商人和农场主严重的担忧。两位参议员希望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

我不得不告诉他们,美国不是一位可靠的贸易伙伴,这一点可 506

以从里根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武断的决定中看得很清楚，他们应该去向白宫陈述意见。两位参议员表示，他们知道这一点，并准备向总统提出此事。产粮州的议员们后来确实会见了里根。事后，里根承认，禁运几乎未能影响苏联。他说，“禁令表明我们自己受到了损害，而所要制裁的那些国家却未受到任何破坏”，并许诺美国政府将不再利用农产品出口作为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

黑格被斯芬克斯取代

6月25日，星期五，我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向美方递交勃列日涅夫关于要求美国限制以色列的信件。以色列军队刚好入侵了黎巴嫩，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包围了贝鲁特。我同黑格联系，并在当天晚些时候安排了会见。这次会见比较特殊，因为它是在里根宣布接受黑格辞呈3小时之后、黑格告诉记者他已辞职1小时之后进行的。然而，黑格并没有取消我们的这次会见。

当我到达时，我发现黑格焦虑不安。我们很快了结了手上的事情，黑格显然不愿再谈公务，我当然也不再坚持。相反，我们就他决定辞职的原因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很想知道辞职的原因——到这时，会见变成了私人之间的谈话，他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首先，黑格在许多外交政策问题上同里根在白宫的加利福尼亚州幕僚之间存在的分歧日益显现，分歧点包括东西方关系、南北关系、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中东政策的某些方面。他说，即将举行的战略武器谈判迫使他不得不同支持采取不可能实现的立场的“笨蛋和怠工者”进行一场长期的战斗。由于黑格的努力，美国采取了现实的立场，或者至少比里根总统的许多助手和顾问们所鼓吹的立场更现实。（我极力猜想，如果连黑格都不能接受，那么他们提出的是什么样的立场啊！）

其次，黑格对无休止的诡计和里根总统最亲密的助手们不断向新闻界透露对他的恶语中伤感到厌烦。他把这些人看作是“善长

在幕后搞阴谋的政治侏儒”而嗤之以鼻。此外，他们还编造故事，说黑格企图把自己当作美国外交政策的唯一真正的领导人，以削弱里根总统制定政策的作用。他们经常向总统打小报告，说黑格想利用其国务卿的地位同里根角逐1984年的总统职位。

黑格对我说，他没有这种想法，但是里根似乎认可了这一诽谤。简言之，同里根总统保持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已经很难了，而这一关系对一个有信心指导外交政策的国务卿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黑格表示，是他主动采取辞职决定的，并且经过了长期的深思熟虑。他在辞职当天才向里根总统提出，总统接受了他的辞呈——看来这是黑格始料未及的。

黑格表示，总统的助手们建议卡斯帕·温伯格，或者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甚至还有裁军署长尤金·罗斯托作为国务卿候选人。黑格激动地喊道：“建议他们作为国务卿候选人肯定是疯了！”然而，里根最终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让乔治·舒尔茨担任了这一职务。黑格把舒尔茨描绘成一个具有处理国际事务经验的老朋友。（两人都曾在尼克松政府中供过职，黑格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舒尔茨任劳工、财政部长和预算署长。）黑格说，舒尔茨“不善长作精彩的即席讲话”，“有点像”一个行动迟缓的教练，但这也无妨”。

在回国休假前，我同斯托塞尔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谨慎但又清晰地使我了解了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重大好转。他表示，里根政府对达成协议，甚至连达成改善气氛的协议都不感兴趣。虽然莫斯科坚持原则和采取不妥协立场，但从理论上讲，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因为里根总统幕僚中有些人持不同看法，他们争论说，苏联会因其经济困难和技术落后而被迫作出让步。

斯托塞尔表示，里根不准备受外交经验的影响并认为美国应不惜任何代价取得优势，不必作出任何妥协来回报其对手。比如，总统认为，为使两国核武器处于同等水平，苏联必须在削减其占优势的核武器方面作出重大牺牲。他还深信苏联会对这样的协议感

兴趣。这种被称之为无视外国利益的“美国方式”的偏见，成为始终贯穿于里根政府的一个特点。

508 斯托塞尔向我谈了其对新国务卿相当积极的评价，称他是一位保守派，无过多的好战意识，为人谨慎，沉默寡言。既然他不会利用反苏辞藻，这些特点也许不碍大事。他谈到同苏联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但警告我说舒尔茨不会仓促试图改善苏美关系，多半会等待时机直到里根自己考虑成熟为止。舒尔茨要成为对美国外交政策有影响的人物的主要问题是，他是否能成为封闭的里根幕僚圈内的一名成员，这个圈子抵制外来户和不熟悉的观点。

直到9月23日，我才会见了新任国务卿舒尔茨。此前，他的职务得到了美国国会的批准，而我也刚返任。他以讨论即将在联合国大会同葛罗米柯的会晤开始了我们的谈话。他认为举行会谈的最佳方法是避免涉及广泛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带有宣传性问题的争吵，应该尽量使用一种确保产生有益效果的方法。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舒尔茨尚不知道，但是只要苏联对手不反对的话，他会考虑的。我告诉他我将把他的意见向葛罗米柯报告（葛罗米柯定于第二天抵达纽约），但我可以保证葛罗米柯同舒尔茨一样将会避免进行宣传说教。

舒尔茨回忆起他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对莫斯科的访问和由我安排的同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外贸部长的会见。他开玩笑地给我讲述了在黑海边索契市附近钓鱼的情景。他们未钓到一条鱼，但却在海边用了一顿美味的野餐，有甘美的葡萄酒和许多格鲁吉亚吐司。

总的来看，舒尔茨轻松愉快，未使用黑格所特有的激烈表达语言。他以富有条理的方式来主导谈话，尽管他避免谈论要害问题，实际上避开紧迫问题。他喜欢侃侃而谈，但不谈具体问题。9月28日和10月4日两天，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同葛罗米柯初次会晤时，采用了这种与众不同的谈话方式。他们首先讨论了地区问题，如中东、阿富汗、加勒比盆地和南非问题，然后谈了较为广泛的问题，包括遵守赫尔辛基协定、核不扩散、限制军备竞赛和人权问题。双方

未取得明显的进展,但会谈平静地进行着,而且双方同意定期交换意见。然而,坚冰远未打破。葛罗米柯又一次未能得到邀请去白宫会见里根总统。

在葛、舒第一次会晤期间,我惊奇地看到这两个人在某些方面很相似。两人均为人谨慎,而且是天生的公务员。他们是苏美高层官僚机构的出色代表——审慎、守口如瓶、忠诚、专家治国论者。10月底,也就是26日,我们发出了一个虽然微弱但友好的信号,并得到了友善的回报。我被授权通知美国政府,苏联已发射了名为RS-22新型轻量级洲际弹道导弹。我去美国国务院将这一信息通

509

告了伊格尔伯格,并强调,我们是作为一种友好的姿态提供这一信息的。伊格尔伯格对我表示感谢,称苏联没有义务通知美国有关这次发射的情况,并对此表示赞赏。

一天后,当我参加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一次小型招待会时,舒尔茨把我拽到一边,表示要我向莫斯科转达他个人对我们友好姿态的高度赞赏。仿佛作为一种回报,他表示他已批准重开同苏联进行的领事谈判,确定了核不扩散磋商的日期和进一步就南非问题交换意见的日期。这些都是同葛罗米柯已经讨论过的问题,而现在他们在执行已达成的协议,以期恢复正式会谈。

舒尔茨说,他已向里根总统汇报了同葛罗米柯会谈的情况,并称会谈是详尽而严肃的。“我想应该用严肃这个词,对不对?”舒尔茨问。我表示赞同。

舒尔茨是多纳尔·肯德尔的朋友。肯德尔向我讲述了新任国务卿同里根的反苏理论家之间的麻烦事。“你几乎不能想象里根政府内发生的事情,”舒尔茨告诉肯德尔说。他说,温伯格极力干预外交政策,建议动用军事力量,而不是采取外交活动来简单地处理每场国际危机。此事已闹到总统那儿去,并引发了黑格与温伯格的不和,最终导致了黑格的辞职。

“我不会重复黑格的错误,”舒尔茨告诉肯德尔说,“相反,我会耐心地与总统相处。”舒尔茨认为里根“不是没有希望的”,特别是

他已执政两年，并且开始认识到庞大的军事计划不能代替真正的外交政策。但是，里根固执，并从思想意识上不准备同俄国人达成协议。“我们必须等待时机，”舒尔茨说，这句话已成了他的座右铭。

我向莫斯科报告了的这次谈话证实了我对舒尔茨的印象：他极其谨慎地而不是仓促地行事。坦率地说，我最初对他在处理苏美关系时表现的过于审慎的做法是不太愉快的，这种做法在裁军谈判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起初，他对问题的实质不太了解，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显然并未得到探讨达成协议的权力。他似乎在拖延时间。他极不愿意参与秘密渠道的态度引起我的特殊警觉，尽管他曾多次表示愿同我会谈。

510 然而，他简短、冠冕堂皇的讲话方式却令人难以琢磨里根政府的意图，这根本不是华盛顿与莫斯科通话的最好方式，特别是在我们之间关系一触即发的严重时刻更是如此。记者们已同样发现这位温和而迟缓的人很难套出话来，并给他起了个“斯芬克斯”的绰号。要套出他不想透露的情况，就像从石头中挤出水一样枉费心机。他对用武力支持外交政策毫不陌生，并会直率地宣称，武力与外交并不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里根政府真正的代表。

然而，我对舒尔茨的看法逐渐好转。作为一位事务型聪明人，他花了许多时间与企图控制美国外交政策的人们和来自国务院外的外交进行了斗争，并因被迫防守他的地盘而得罪了温伯格和连续四任的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罗伯特·麦克法兰、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和弗兰克·卡卢奇。甚至连里根有时也会屈于这些顾问的压力而绕过国务卿，以致舒尔茨只是在最后时刻才得悉诸如战略防御计划等一些重要问题。在舒尔茨任职的头几年里，总统幕僚内部的诡计和权力斗争使他毫无选择，只有缓慢而平稳地行事。我认为，他本人对里根逐渐转变看法做出了虽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实质性的贡献。

在美苏外交问题上，乔治·舒尔茨成为里根政府务实集团里的当然领袖。这个集团包括麦克法兰、总统形象首席塑造家迈克

尔·迪弗、总统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副总统布什和我行我素的南希·里根。他们的对手是保守集团，包括温伯格、克拉克、法律顾问埃德温·米斯、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这两个集团在美国国会、新闻界和政府机构中都有盟友。国务院是务实派的基地，但是受直率的保守分子肯尼思·阿德尔曼署长领导的国务院重要部门——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却站在另一边。知名的保守集团利用美国的政治气候更是为所欲为。白宫写作班子是忠实的保守分子的飞地。但是，美国政府的主要声音当然是里根总统自己。

11月4日凌晨，大使馆机要组长叫醒了我，他郑重地向我递交了勃列日涅夫本人的一份电报。电报说，我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镰刀斧头金质奖章，苏联领导层向我表示祝贺，因为这是

511

对苏联文官最高的奖励。在整个苏联外交史上，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被授予这种荣誉的大使。不用说，我是非常高兴的，可我也感到非常惊讶。这么高的政府奖励通常是在国庆节、重要国际协议的签署、某个官方活动或诞辰纪念日或是受奖人的生日等重要场合上才颁发的。然而，那天并不是上述重要场合的日子，至少不是我所知道的那些重要日子。我纳闷是什么促成在这一天向我颁发奖励的。

连续几天，我收到了许多政府官员、知名人士、外交同行、朋友和亲戚的电报。我们同大使馆工作人员举行了友好的晚宴。这些活动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当我稍后晚些时候向葛罗米柯询问时，他只说了苏联政府决定表彰我多年来在美苏关系困难的情况下作为大使做了许多工作。然而，后来我在克里姆林宫受勋时才得知了另一件事，这既令人奇怪，又感悲痛。向我颁发最高奖励的政令竟然成为勃列日涅夫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签发的最后一份官方文件。他于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1月10日不幸去世。

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

当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消息公布后，里根政府立即庄重地作出反应。11月11日，我接到威廉·克拉克的一个电话，他转达了美方和他本人的哀悼。他说，里根总统正考虑派遣由布什副总统率领、包括舒尔茨在内的美国高级代表团参加葬礼，总统本人也将于第二天上午到苏联驻美大使馆签署吊唁簿。舒尔茨向里根建议，他应参加葬礼并会见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尤里·安德罗波夫。但是，总统不准备举行任何形式的最高级会谈，也不愿参加葬礼。

第二天上午10时——这是个星期六，里根总统在克拉克和迪弗的陪同下来到了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他写下了下面这段话：“我向勃列日涅夫主席的家属和苏联人民表示我的哀悼。祝愿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和平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罗纳德·里根。”

第一次到苏联大使馆的里根总统很显然因其对“邪恶帝国”前哨的造访激动不已，甚至下意识地重复悼词中的个别单词。我带他观看了尼克松总统同勃列日涅夫谈判和进餐的房间和大厅。里根观看了这些房间并以极大兴趣审视了图片。虽然进入苏联大使馆时里根怀着警惕和防备之心——他看来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是在来访结束时他感到很舒适，并以较为自由自在的、确实友好的态度进行交谈，尽管我们不得不经常重复所讲过的话，因为他的听力有些障碍。他表示希望再来拜访我们，但是在喜庆的场合进行。

有些人说，美苏关系历史性的转折始于里根的这次来访，而其他人认为，这一转折直到一年多以后里根发表的另一篇讲话时才到来，他在讲话中作了个比喻说，伊凡四世和詹姆士一世比较了他们的人生后祈盼和平。当我们在大使馆收听了里根1984年1月16日的讲话时，我们不能断定这是一次坦诚的讲话还仅仅是一次竞选演说。但是无论如何，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事情开始有了起色，这

先始于莫斯科,然后才是华盛顿。

11月12日,尤里·安德罗波夫由政治局推选并获共产党中央全会批准,接替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声明在语调上多少带有寻衅性的,这表明了他当时的情绪并完全反映出苏联领导层的情感。“我们非常了解,”他说,“和平不能靠乞求帝国主义得来,只有依赖于苏联武装部队不可战胜的力量才能得以维护。”

当安德罗波夫还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这使他还负责国外情报工作)时,我就经常同他打交道。他对外交政策问题的了解同葛罗米柯同样多,并比葛罗米柯更了解苏联国内政策,如持不同政见者和苏联移民问题。他还通过克格勃国外情报网了解了外国对这些敏感问题的反应。葛罗米柯实际上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

安德罗波夫的感觉和观点是混杂的。他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在他的工人同伴和朋友中有许多带有犹太血统的人。我从来没有听他讲过有关犹太人的笑话和轶事,这与其他一些领导人相反。他会在私人谈话中发表一些自由主义观点,但他又不是自由主义者。他坚决反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认为这不仅在国内,而且对我们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

在所有人当中,正是安德罗波夫提议把萨哈罗夫流放到高尔基市。在政治局讨论萨哈罗夫案子时,我碰巧出席了这次会议(我是被召来汇报其他问题的)。安德罗波夫提出的主要理由是,萨哈罗夫和他的夫人已成为国外反苏运动的经常性焦点问题,因此,只有把他们流放到对外国记者关闭的地方,才能切断他们同外国人接触的各种渠道。可当一些政治局成员——契尔年科、格里辛、索洛门切夫——提出西伯利亚的几个边远城市时,安德罗波夫提到了苏联第三大城市高尔基市。他指出,那儿的气候条件同莫斯科基本相同,这是萨哈罗夫的医生提出的一个强烈要求。因为一般说来

513

无人反对流放萨哈罗夫，也就无人同安德罗波夫争辩。萨哈罗夫被苏联政权看成是讨厌的人，如果不是一个直接的敌人的话。

安德罗波夫对外交政策的观点接近于葛罗米柯，而且他们经常成功地向政治局联名递交备忘录。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还经常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三个人一起构成了政治局决定外交政策的核心。安德罗波夫具有一定的优势，他既熟悉外交政策，又从克格勃提供的众多情报中了解军事问题，因此，他为他的观点进行辩护是很胜任的。葛罗米柯与乌斯季诺夫在各自所辖领域内都是权威，但双方又不向对方提出特殊要求，这使安德罗波夫感到轻松自如。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委员会有长期工作的经历，并得到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支持。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他对苏联国内局势了如指掌，使他从其他苏联领导人中脱颖而出，尽管他因其特点和无可争辩的才华力求同其他领导人保持平等地位，并不试图使他们相形见绌。这一切决定了他当选为总书记。

安德罗波夫总是对我们同美国关系的状况感兴趣。不管我什么时候在莫斯科，他总是邀请我进行私人长谈。他的兴趣广泛：政治、经济、文化、社交活动，特别是美国精英和华盛顿官方机构建制。同葛罗米柯一样，但与富有情感的乌斯季诺夫相反，安德罗波夫不喜欢同美国对抗，但认为里根是一个危险分子，他的行为可能会引发美苏之间的军事冲突。因此，安德罗波夫产生了对里根谨慎的态度和维护苏联防卫能力的决心。

我依然认为，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安德罗波夫准备认真地同华盛顿达成协议，特别是限制核武器问题。在这方面，他有些像戈尔巴乔夫，而戈尔巴乔夫是他的门徒。这两个人是苏联党内最高领导集体中的知识分子，各有千秋。独特的是，安德罗波夫执政初期曾指示我们参加裁军谈判的代表团停止会谈，并暗示可能退出——这是葛罗米柯有时使用的吓唬人的手法——但仍坚持谈

判。然而，命运注定了安德罗波夫将永远不会真正地完成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使命，因为他那不能治愈、最后发展成致命的肾病只允许他执政了15个月。

11月14日，由副总统布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时，安德罗波夫会见了他们，并进行了单独谈话。这是他同美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见。他讲话的要点是，苏联准备改善美苏两国的关系，但他未具体说明。由于无足够的时间，他未准备好就具体问题进行了会谈。

舒尔茨从莫斯科一回来就要我转达代表团对安德罗波夫的谢意，感谢他在国葬和政权过渡期极需他时还能抽出时间会见代表团并进行会谈。“当然，你不可能通过一次短暂的会见解决任何严肃的问题，”舒尔茨说，“但我们认为同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建立个人关系是重要的，我们对此表示赞赏。”然后，舒尔茨建议我们以后举行私人会见，非正式地审议我们之间的关系。对此我表示接受。

11月23日，我应邀同舒尔茨共进晚餐。他是我会见的第七任国务卿，并在同一间办公室用餐。真是光阴似箭。谈话是私人性质的，而且相当坦率。我提醒舒尔茨注意安德罗波夫赞成对话，并询问里根如何对此做出响应。舒尔茨表示，总统授权他作出答复，里根也真诚地赞成建立一种较为建设性的关系。虽然里根未掩饰他仍然致力于使美国成为军事强国的事实——舒尔茨引用里根总统的话说：“我理解安德罗波夫先生也同样具有致力于苏联强大的思想。”——但是里根指示舒尔茨告诉我，他准备探讨可能导致建立较为建设性关系的问题。

我问他们认为应如何举行一次实际的对话，并提醒他，因为直到现在，美国政府提出了不能接受的要求，即我们做出单方面让步来回报关系正常化。舒尔茨回避讨论任何具体问题，如核武器谈判。他说，双方经常在什么是优先解决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举例来说，”他说，“人权问题。我们赞同苏方关于干涉你们内政是不可接

受的观点。美国政府相信人权问题就其本身而言不是特别重要的，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引起了美国国内广泛的反应，白宫不能置之不理。”他告诉我，尼克松曾建议里根政府私下就这一问题同我们打交道，里根对此表示同意。他继续说：“我们要求苏联领导层做的唯一的事情——而且我们不愿公开我们的要求——是审议遗留的移民申请。这些申请虽然不多，但是在美国却无人不晓，至少有些申请应该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来解决。”里根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较之卡特较为温和与灵活。

与舒尔茨会谈后，我向莫斯科建议应该让舒尔茨参加更为积极的对话。安德罗波夫表示同意。12月6日，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我又同舒尔茨会见了，并告诉他，经过对其建议的考虑，我想谈谈我的看法，希望他能参加具体的、积极的讨论。听我说出这些话后，他以极为谨慎的方式表示，尽管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相信交换意见是相当有益的，并答应向里根总统汇报。

同舒尔茨的谈话给我留下这一印象，即他正在伸出他个人的触角来试探将来是否有可能举行一次有意义的对话。他可以说是在执行他个人的试探性使命，尽管白宫暂时尚未决定是否举行具体的会谈。每当我们谈到诸如削减武器或最高级会谈等具体问题，国务卿总是保持沉默，或作一般性地说明而回避问题的实质，或者许诺以后再谈，这些都绝非偶然。

后来，事情变得很清楚，在安德罗波夫担任领导职务的头几个星期，舒尔茨请求里根授权他去审慎地探讨改善我们之间全面关系的可能性。然后，舒尔茨毫不迟疑地同我开始制定他所谓的“工作计划”，以便系统地审议我们之间的分歧。

然而，这需要时间。到年底，两国关系依然停滞不前。12月30日，美国记者金斯伯里·史密斯收到了我们对他所提问题的书面答复，答复除回答具体的问题外还概述了我们关于核裁军的立场。总的来看，他提议将战略武器冻结在现有水平，然后削减1/4的武器，达到一个均衡的水平。这一点还应适用于欧洲。里根政府对这

些意见毫无兴趣，而且还宣布了美国没有举行美苏最高级会谈的计划。

这是否等于完全陷入僵局？不完全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告诉我，在他同里根最后一次会见时，总统表示他有一种直觉，感到他对苏联的政策有些不对头，但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总之，不仅里根自己的反共陈词滥调，而且还有他亲密的顾问（他们是最后一批建议改善关系的人们）的狭隘性，阻碍了他找出其错误所在。他不得不从其他方面去看问题，结果他变成了一个自信和决心从一开始就指导其政治生涯的人——这就是他自己。

516

第二十九章

“多做少说”

终于同里根举行了会谈

1983年2月5日下午5时，我来到国务院参加我以为是同舒尔茨举行的例行会谈。他通知我，里根总统要即刻在白宫亲自同我会谈。我感到很突然，但还是立即接受了邀请。

这是一个寒冷、多雾的夜晚，上周末下了一场大雪后，华盛顿的天气尚未恢复正常。我的拜访是在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我们从地下车库乘舒尔茨的座车驶向白宫，并从东门进入白宫，那里很少被用来接待官方来客。有人领着我们从东门来到了白宫二层楼总统私人住宅，而不是右侧厅的总统办公室。总统私人住宅布置得相当漂亮和舒适，里根喜欢在这里举行非正式谈话。只有我们三人在这儿，而且舒尔茨仅限于偶尔插几句话。

我们相互表达了问候，咖啡送了上来。总统全面听取了舒尔茨与我会谈的情况介绍，还专门了解了安德罗波夫对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的美国代表团所讲的话，他希望继续按此方式同我保持接触。他表示，首先，为坦率交换意见，越过“官僚机构”的各部门领导人直接同总书记建立个人和秘密的通话渠道是有益的。如同在过去几届美国总统任内时期建立的通话渠道一样，这一渠道可以通过舒尔茨和苏联大使的接触来运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里根懂得这是值得做的。

总统继续说,虽然安德罗波夫曾告诉布什和舒尔茨,他主张同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您,大使先生,也曾代表苏联领导层向舒尔茨做过同样的表示,但是请告诉安德罗波夫,我也主张同苏联建立良好的关系。不用说,我们完全认识到我们的一生不足以解决多年来积累起来的所有问题。然而,有些问题能够并且现在就应该处理。或许苏联人把我看成是疯狂的战争贩子,但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发生战争,因为我知道战争会带来无穷的灾难。我们应该开创一个清新的开端。”

“我注意到,”总统继续说,“安德罗波夫显然信奉这一格言:‘多做少说’。对一个新人来说,迈出即便是象征性的第一步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不承担过去的重负。”

里根提出了一个以不寻常的象征性姿态来表示我们之间关系转变的小建议。他要求苏联批准向自1978年以来一直生活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地下室的7名圣灵降临会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发放出境签证,他们当时强行通过警卫进入大使馆并寻求庇护。里根总统说,如果允许这些人移民,美国公众会以比达成任何双边协议更大的热情来对苏联表示欢迎。“这听起来有些荒谬,但这是美国。”(在美国舆论焦点集中在私人新闻上的这种特殊情况下,里根总统从他自己方面来讲是正确的。)里根还表示,将犹太移民同贸易挂钩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是错误的,但这个修正案已获国会批准,他不能取缔。如果国会取缔了,他不会从中作梗。

里根停顿了一下,好像在等待我发表看法。我说,既然总统和美国政府准备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有赖于我们作出对等的反应。但是,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准确地了解美方怎样去做。

总统提出有关安全和美国仁慈的基本观点作为回答,这曾在其致勃列日涅夫的第一封亲笔信中提及。他问我,苏联是否的确相信美国对苏联构成威胁——美国是否会进攻苏联,并发动一场核战争?他继续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那时美国垄断了核武器,它的军事工业在备战,一切都为美国统治世界准备就绪。那时,

除了美国谁能制止苏联?但是,美国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519 勃列日涅夫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提醒里根说,苏联军队在二战刚结束美国人回国之后就曾统治了整个欧洲大陆,但苏联履行了其对战时盟友所承担的义务,未考虑向西欧扩张。我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我要求里根从我们的角度看一看:苏联周围有无数的美军基地,它们有新型核导弹,而且美国政府正在寻求进行军备竞赛。“至于我们是否认为美国对苏联构成军事威胁的问题,”我说,“请允许我坦率地讲,我们认为美国在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政治紧张局势时正在推行重新武装的庞大计划才是对我们国家安全构成的真正的威胁。美国人民需要战争吗?回答对我们来说是很清楚的:他们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不需要战争。至于我们,苏联每一个家庭都知道战争是什么,会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我们相信美国总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里根说,他当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坦率地说,美国人民把苏联的主要政治主张看成是对美国的主要威胁,这种主张是以马列主义关于世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学说为基础的。因此,苏联为鼓励和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进行辩护,特别是触犯美国利益时更是这样。简言之,苏联认为未来只能属于它,而美国穷途末路,即使美国的社会制度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并且美国的生活水平是世界最高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未来,并将为之而奋斗,”总统说。

我对里根说,他的话听起来是真诚的,但不现实。我们不会用武力把我们的观点和信仰强加给别人。让历史成为我们在和平共处条件下竞争的最高仲裁者。“我们不会宣布发动一场全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的讨伐运动,”我说,“我们准备接受历史的判决,而不会发动战争或者采取可能导致一场特别是在美苏之间进行的灾难性战争的鲁莽行径。避免战争是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工作,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里根表示,这个问题需要经过多次讨论,并开玩笑地说,他在

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报纸上看到了所谓列宁征服世界的十戒学说，并在讲话时加以引用，他因此遭到了批评。这种学说实际上并不存在，同列宁毫无关系，而是里根惯于借用可疑的引语来支持他的政治评估，蛊惑公众、新闻界和他的白宫官员，更别说克里姆林宫了。

我告诉总统，我要抓住这一突如其来的同他会谈的机会，来谈谈对未来的一种可同国务卿继续会谈的实际解决办法。里根表示愿意倾听，我便详细地谈了核裁军问题，包括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欧洲核武器争端。里根重申了美国在欧洲导弹问题上的立场，很清楚，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520

“让代表团继续工作吧，”他简洁地说，“最后，我愿再说一次，同安德罗波夫一样，我赞成我们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我愿清除两国关系中的战争威胁。我希望出现一个积极的转折。请将这些话转达给总书记和苏联全体领导人。”

会见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对里根来说是相当长的。众所周知，他的注意力是短暂的，但这一次并非这样。舒尔茨和我返回国务院，继续详细地审议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次会见不但是我同里根的第一次私人会见，而且也是他作为总统第一次同苏联高级代表进行有实质内容的会谈，并且——就我所知——也是他反共和反苏长期生涯中的第一次。举行这次会见的决定是英明的，尽管这是里根在其总统任期的第三年才做出了这个决定。这表明他终于想要亲自密切审查苏美关系事务的愿望。

舒尔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除了里根夫人南希、迪弗和舒尔茨本人，总统的全体幕僚都反对这次会见，但是里根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进行。对他来说，同“邪恶帝国”的代表进行面对面外交的第一次尝试，显然具有重要意义。里根第一次试图做一个同苏联谈判的人。会见这一事被白宫列为绝对保密。舒尔茨告诉我，这次会见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总统自己开始同苏联大使对话，国务

卿就能有足够的信心处理苏美事务,可以不用顾忌来自白宫内部和其他方面的反对意见。因此,这次会见成为舒尔茨一直在寻求的重要突破口。

我向莫斯科发回了这次会见的报告,建议我们继续耐心地工作,来约束里根极端主义的观点。我指出,渐进地迈出同里根建立私人关系的小步子,在最初阶段较之任何重大计划更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因为我认为里根尚未对重大计划作好心理准备。我建议,作为第一步,我们应该了结圣灵降临会人员问题,不管怎样,这是早应该解决的问题。

521 一个月之后,舒尔茨告诉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报告说,苏联政府朝着允许圣灵降临会人员移民的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尽管他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这件事。然而,更重要的是,当舒尔茨转达这一消息时,里根表示很满意。这件事虽小,但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是令人感兴趣的。对里根总统来说,他的请求是他本人对苏联政府是否有诚意的试探:莫斯科的共产党人会对他的请求(哪怕是小问题)作出反应吗?对苏联领导层来说,里根的请求看起来显得很奇怪,甚至可疑。执政近三年之后第一次会见苏联大使时,里根总统实际上只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圣灵降临会人员,似乎这是我们之间最重要的问题。这一请求令他们相当失望,并未得到莫斯科的热情欢迎。但是,这是个态度和心理的问题。

以后的几个月里,包括布什和舒尔茨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多次提到,这个案子是对总统认为不可能同俄国人打交道信念的第一次象征性的突破。

在华盛顿长期居住期间,我越来越把心理因素看成是两国领导人关系中最重要方面。不幸的是,领导人自己并不像对地缘和意识形态冲突那样对心理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经常是极其武断的。

从舒尔茨在白宫会谈及以后长期接触中的表现来看,里根很明显是真正的老板,国务卿则执行他的指示。舒尔茨几乎没有干预

我们的谈话，而且很显然完全赞同里根所讲的话。我甚至得出一个也许是错误的印象：国务卿有些怕总统。从舒尔茨的回忆录来看，很清楚，他在任职初期不能经常私下会见总统，而只能通过里根的助手同他保持接触。在白宫会见时，我仔细观察了里根和舒尔茨，感到与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的关系相比，他们之间并无密切的私人关系。

关于秘密渠道，我认为当时里根并无怎样使用它或甚至怎样让它发挥作用的想法。他从尼克松那儿得悉，这个渠道在确保两国领导之间进行私人对话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在白宫会谈时，舒尔茨随声附和了里根总统的话，但是他对秘密渠道也表现出无多大兴趣，并未做什么事以让它启动。看来，这有好几个原因。舒尔茨也许怕这一渠道可能受总统助手的操纵。然而，他也不愿意单独掌管这个渠道，因为只有在一方利用渠道进行私人对话来揣摸对方在具体问题上是否有达成妥协办法的意图时，这个渠道才能真正发生效用，而且舒尔茨尚未准备做这种探讨。不同于基辛格，舒尔茨是受到一定的约束的，在刚上任时尤其如此，他几乎每次同我会谈前都要事先请示总统。此外，舒尔茨尚未掌握裁军会谈的具体内容，这是在过去使秘密渠道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主要问题之一。

522

不管舒尔茨何时想同我讨论武器谈判的进展情况，他总是带着一些熟悉情况的官员和专家参加，甚至在他已经掌握了问题的实质时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任何秘密对话都是不可能的。我同他的私人会谈远比同万斯、基辛格、或者腊斯克少得多，尽管我敢说同舒尔茨个人关系是相当友好的。总的来讲，舒尔茨是里根政府的真正代表，他不断地、固执地为美国立场进行辩护。

回首往事，并参阅舒尔茨的回忆录，我认为舒尔茨很清楚有比较大的持久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耐心地推动里根及其幕僚接受他有关达成妥协的思想。他谨慎地寻求制定一项对苏联的长期政策。在里根固有的相互矛盾心理及其对苏联漂乎不定的情绪和里根政府内在对苏政策上无休止争吵的情况下，这是一件不容易做

的工作。他们很难制定出一个完整的政策。里根总统时不时地批准一些局部行动的做法却很盛行。只是在两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掌握了莫斯科大权,而且里根在舒尔茨的支持下准备向苏美关系注入新的活力的时候,这项政策才具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苏联担心美国发动核进攻吗?

里根讲话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他因有人提出美国是否对苏联构成军事威胁的问题而感到其清白受到了沾污。难道每个人都认为美国会对苏联发动一场核进攻吗?他在白宫会见我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因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

我可以作证,与美国进行核战争的可能性确实曾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最后一个守旧派领导人)认真考虑过。这些领导人和他们的同事们都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的确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军事威胁。因此,我们的军事计划是以一种压倒一切的防御战略为基准而制定的,这种战略是建立在遭到严重破坏而进行反击的可能性之上的。然而,或许除了安德罗波夫,他们认为可以预料这场进攻会随时发生,就像希特勒进攻苏联,或者日本人1941年进攻珍珠港一样。这种恐惧在我们这边不大,因为我们了解美国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防止对我们实施无缘无故的第一次打击的最佳保证。我们清楚,两个超级大国没有导致军事冲突的对抗历史,可能除了1962年古巴危机以外。这场危机本身帮助确定了实际防止公开战争的界限。总之,我个人从不认为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会制定对苏联发动核进攻的计划。这一信念随着我多年来在华盛顿的居住而植入我心中。

莫斯科对军事对抗恐惧心理的增加,不是因为害怕已占据美国历史意识的偷袭,而是因为古巴所发生的事情——紧张的政治冲突,这在未来不可预见的某个时候可能发展并不可预测地升

级。考虑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无休止的政治、军事争夺和紧张局势,还有像里根这样的冒险总统,莫斯科不得不对美国的好战和简单的人为失误造成的致命结果表示担忧。安德罗波夫有一次在私下谈话时对我说:“里根是不可预测的。你应预见到他所能作的一切事。”大体上讲,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是认真对待里根的——或许远比他对其古怪行为更认真,因此,他们越来越警惕地注视着里根的言行。我们的情报部门也比在其他美国总统任内更加警惕地去捕捉美国发动军事行动的预兆。

当安德罗波夫还是克格勃主席时,他确实认为里根政府正积极备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持同他一样的看法。他们说服政治局批准在苏联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军事谍报战计划,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赖恩作战计划”,它取自俄语“核导弹进攻”词组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缩写。1983年,所有克格勃驻外人员都接到了紧急和详尽的指示去收集美国进行第一次打击计划的证据。仅在第二年,当里根的政策开始转变时,莫斯科才对邪恶帝国、星球大战等做出不带偏见的解释说明。外交部完全被排斥于这个作战计划之外,我还是从一位克格勃驻华盛顿人员那里得悉这一计划的。我们两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仍然提供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因为莫斯科的疑心可能是基于我们所不知晓的一些重要情报。

苏联政治领导人和最高军事司令部感到他们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认真对付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因为他们肯定,如果苏美之间发生一场严重军事冲突的话,那么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使用核武器。尽管作了许多爱国主义宣传,但是他们相信一场核战争是不能够真正取得胜利的,他们深切地希望华盛顿最高军事领导人持有同他们一样的看法。然而,他们毫不认为他们潜在的对手真是这样看问题的,相反,使他们感到恐慌的是美国连续不断地谋求战略优势。因此,我们决心不改变我们已取得的核均势。

美国公众对核威胁的反应要比苏联人民强烈。美国人经常被沉迷于核战争恐怖的传播媒介和好莱坞所提醒,因而记住了这种

威胁的存在。然而，苏联人民却经历过更深痛和长期的危险感，在二战中亲身遭受了悲惨的损失。如果在当时能对苏联人民进行民意测验，问他们谁最有可能第一个按动核电钮——是勃列日涅夫，还是里根，那么回答很可能是一致的——是里根。如果问美国人同样的问题，大部分人会说是勃列日涅夫——但是相当一部分人会对他们自己的总统感到担忧。这就是我的印象，虽然我从未搞过任何民意测验，但是我同许多美国人谈过这个问题。

关于这种担忧，苏联军队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80年代期间曾讲过一个具有实际战略意义的重要事例。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和博学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他后来访问美国时给五角大楼的对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回莫斯科时，他建议我们一起审议同美国的关系。我对这个主意表示欢迎，因为我对军队总是有一种好奇心。谈话是在他那挂满地图、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办公室里进行的。

我请元帅简要概括了我们针对美国的军事部署。他手执教鞭，沿着地图上的苏联边境画了一个圈，特别是在西方接近苏联的北约国家。他边指边说，在这一段，我们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但是在另一段，我们需要三四个师作为增援部队，还要建立一些要塞。在一些地点，我们的部队必须要坦克、飞机、机械化步兵等部队来增援。“你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做到这一切，”他说，“我们缺乏资金。我们将不得不再次要求政治局增加资金。总参谋部认为我们应全线做好准备。”

我直率地问他：“您确实相信美国和北约组织会在某一天向我们发动进攻吗？”

525 “相信还是不相信，不是我的使命，”他强调说，“我不能依靠你们外交官和你们的一切会谈，或者是您愿称谓的任何东西。今天，您似乎在某点上同意华盛顿的看法，但是明天世界上或苏美关系中爆发新的敌对将使时钟拨回冷战时代，或者甚至造成一场军事冲突。只要记住1973年的阿以冲突就足够了，当时美国针对我们使

其武装部队处于最高战备状态。顺便说一句，在尼克松政府时的缓和时期也发生过这种敌对行动。现在，难道里根总统就能使我们产生更大的信心吗？这就是我作为总参谋长的名言为什么是‘全方位的国家军事安全’的原因。我们从不得不同美国、它的西欧盟友或许还有日本打仗的、可以想象到的最坏情景来考虑问题。我们必须准备好打使用各种武器的各种战争。苏联军事思想可以归纳如下：1941年发生的事情将永远不会重演。”

在维也纳裁减常规武器谈判上长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我们为什么要在中欧大量集结苏联机械化部队，听阿赫罗梅耶夫回答我提出的这一问题也是令人感兴趣的。他简要讲述了历史背景。在杜鲁门总统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不久，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就开始紧张起来。莫斯科接到的情报说，杜鲁门考虑一旦同苏联发生严重冲突，就使用核武器，当时美国显然拥有核优势。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制定了反击计划，并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在欧洲中部（我们的军队仍然驻扎在那里），我们组建了一支有许多装甲师组成的强大部队，这支部队能够以闪电战的打击摧毁美国的欧洲盟友，并一路占领它们的领土直至英吉利海峡和西欧大西洋沿岸。斯大林相信装甲威胁能与美国的核威胁相抗衡，这就是装甲部队在那里所做的一切——尽管西方认为这是随时准备用来征服西欧的潜在侵略先锋。苏联甚至在已达到了同美国均等的核力量之后依然继续以这种方式进行军队部署，部分是因为纯粹的惯性，但也是为了维护东欧的稳定，因为那里的民主运动开始发展。

阿赫罗梅耶夫极其秘密地表示，他相信裁减我们驻中欧军队和武器是可行的。一年之后，他向戈尔巴乔夫递交了他的建议，强调我们应坚持美国方面做出相应的让步来作为交换。当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积极寻求同西方修复关系时，阿赫罗梅耶夫经常参加部际辩论，他反对在裁军谈判上向美国做出过于性急的让步。他强调在这方面应有步骤地进行，这使他处于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境地。他支持1991年的政变，并在政变失败

时自杀了。他的惨死是他忠实地坚持这一信念的结果,即他认为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所推行的政策使我们的军队力量耗尽,威严扫地。

我毫不怀疑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五角大楼的美国对手们也考虑到“可以想象的最坏情景”。几乎不能想象,如果这一情景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将给人类带来什么,尽管曾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托马斯·沃森向我吐露,他曾调查过美国军人的思想,发现他们也同样地悲观。

当沃森领导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时,卡特总统曾邀请他参加研究美国准备进行核战争的美国工业家委员会。他们研究了美国海、陆、空核导弹的各个方面和五角大楼的指挥机构。在同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沃森请将军们告诉他的委员会,美国如何发动一场反对苏联的核战争。面对着四周墙壁上挂着的巨大地图和带指示灯的图表,将军们向他显示了在战争发生的头几个小时里所要摧毁苏联国土上的一千多个目标。苏联的伤亡达一亿多人。

“那么我们的伤亡有多少?”沃森问。

他们回答说,美国伤亡大约8000万人,而且同苏联一样有许多重要工业将被摧毁。

“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被毁灭后,你们将怎么办?”沃森继续问到。

他告诉我,将军们相互看了看,几乎无言可答。

几天后,沃森向卡特总统递交了他的报告,主要结论是,核战争问题不应交给将军们去处理。他解释说,他们可以发动这场战争,但他们认为有关人类(或者幸免于核战争的东西)在战后的情形如何不是该他们关心的事。

邪恶帝国和星球大战、选举和最高级会谈

对我们来说,似乎最难以琢磨的是,里根在公开激烈地谴责苏联的同时,又秘密地发出——口头的或通过他的私信——完全不同的信号,以寻求关系正常化。我们在白宫首次会谈时,里根似乎在努力建立同苏联领导层的工作关系,可会谈后不到一个月,也就是3月8日,他公开把苏联描绘成“邪恶帝国”,这是个既令人难忘又臭名昭著的词组。这个词组直接引自电影制作大师乔治·卢卡斯制作的好莱坞系列影片《星球大战》,卢卡斯的电影片名很快进入国际政治,但是带有讽刺意味。里根使用这个词组的场合是其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全国福音派基督教协会上发表的讲话,这个协会包括了许多支持保守派的死硬分子。讲话的初衷并不是将这次讲话当做外交政策上划时代的事件。据舒尔茨讲,白宫以外无人,包括他自己,有机会事先审议这篇讲话稿,但这个词组很快传遍了整个世界。

527

整个事情表明里根无疑是一个前后矛盾的人,他的言行不一极大地激怒了莫斯科,而且因里根自己好像从来看不到这一点而更加如此。在他的头脑里,这种不一致可以完全和谐地共存,但是莫斯科当时认为,这种行为是蓄意欺骗和敌视的表现。苏联领导层有时脸皮极薄,忘记了他们也是这样时不时地进行反美宣传的。里根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接下来再谈谈星球大战本身,里根总统提出时它被正式称之为“战略防御计划”。该计划出台时正巧是我3月23日拜会舒尔茨的时候,我向他递交了安德罗波夫关于敦促里根加快中欧裁减常规武器日内瓦谈判的信件。当会见快结束时,舒尔茨出乎意料地给我了一份里根即将在电视上发表的讲话文本。他说他要赶紧去见总统时,我还在阅读讲话文本。里根在讲话中表示以发展一项长期的研究计划给予世界以“反对核武器威胁的希望”,这个计划最终能

研制出激光制导和其他尖端的防御性武器,在高空之外摧毁导弹而使之不能发挥效用。

我立即问舒尔茨,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政府准备中止美苏两国已达成的限制反弹道导弹设施的协议。他再次“正式”地向我保证,美国政府将履行该协议规定的义务,美国这项研究发展计划将在反弹道导弹协议框架下进行。我回答说,虽然我还有待于读完讲话文本,但依我看,美国在一个新的领域内,即外层空间又发动了一轮武器竞赛。里根在全国电视上以他那特有的激烈言辞讲话宣布了这项研究计划。

528 星球大战计划——批评家们起了这个名字,认为这全是科幻小说——被著名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领导的美国军事科学家和逐渐兜售里根这一思想的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们勾划出其轮廓。独特的是,仅几天前,国务院和舒尔茨才被通知有关这篇讲话及其主题的情况。事先无人同他们磋商,他们只是争取到将有关反弹道导弹协议的词句加进了准备好的讲话文本中,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撰稿人干脆就忘记了他们的存在。

一些美国历史学家写到,这一新的计划是里根幻想的产物,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简直不能够接受这一个事实,即美国——动用了购置所有军事装备所花的一切资金——竟然没有防御苏联导弹的系统。他很容易地相信美国的独创性能克服巨大的技术障碍。因此,里根错误地认为,美国能保护自己免受核攻击。导弹防御系统成为里根在白宫时期困扰他的几个新问题之一。

里根的讲话引发了美国和全世界的争论。大多数美国人表示欢迎,但科学家和一些国会议员持怀疑态度。欧洲人担心,如果美国最终藏匿在“战略防御计划”的盾牌之后,美国会牺牲欧洲的利益来保护自己——确切地说是担心使美国新式潘兴导弹免遭打击的“核爆炸余波”。从军事竞赛和稳定方面来讲,自约30年前开始的军备控制谈判以来,战略防御计划形成了对军备控制正统观念的最为激烈的挑战。该计划成为美苏争论的主要原因,我们之间的关

系因此而深受影响。

莫斯科把里根的决定看成主要是一项旨在破坏战略形势稳定并在美国本土建立一个大型的反导弹防御系统的行动,以不给苏联一旦爆发核战争而进行反击的机会。安德罗波夫立即宣称,这一新概念将使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并警告美国正踏上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当然,莫斯科不可能立即估价“战略防御计划”可能产生的一切军事和政治影响,但是担心美国已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无庸多言,我们自己的军事设计师们随即要求迎头赶上,并得到了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大力支持。由我国科学院院士耶夫吉尼·弗利赫夫领导的物理学家同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他们的观点在那个易动感情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我们的领导人深信,美国的巨大技术潜力再次占了上风,并把里根的讲话看成是一个真正的威胁。

3月26日,里根总统的密友迈克尔·迪弗在一次外交晚宴上找 529
我交谈时,我开始看到美国政界对里根这一新计划的一些看法。我知道他是在同苏联关系上采取务实立场的里根总统密友之一。迪弗一开始就向我这个苏联大使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根据我长期生活在美国的经验,我是怎样评估里根明年再次当选总统的可能性的呢?

我回答说,我认为这有赖于三个因素:第一,美国经济形势;第二,民主党被提名人;第三,苏美关系状况。我又说,里根总统推行的对抗路线几乎无助于他。而且新的“战略防御计划”又是如何造成新的争论的。

迪弗表示在一般的招待会上讨论所有这些细节是困难的,但是对他显然是在我同里根会见之后采取这种方式谈话,我感到很奇怪。我对迪弗关于“战略防御计划”的观点很感兴趣。他把这个计划看成是一场竞选运动,因为它给予美国投票者以核威胁会被制止的希望,并挫败民主党关于里根是战争贩子的攻击。

几天之后,我同副总统布什进行了一次更为生动的、有关选举

的谈话。他向我吐露，里根决定竞选连任总统，估计他可能于6月或7月宣布这个决定。他带着一丝痛苦的声音承认说，他将不得不调整他本人的计划，但是如果里根因任何原因而改变他的决定的话，他将最有可能成为共和党被提名人。麻烦的是，布什遭到了右翼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他太自由主义，但是他依然认为，如果里根决定不再参选，他作为副总统将处于赢得提名的最佳地位。

我说，里根那时可能会支持他。布什回答说，不一定。“我不期待里根给予我有力的支持。我所期待的最佳情况是他那仁慈的中立立场。他可能对其保守派朋友说我一些好话，但仅此而已。这也不碍大事，一切有赖于在选举当天美国国内总的气氛。”

布什继续说，虽然里根总统完全了解经济对他再次当选的重要性，但是很显然他并未看到同苏联改善关系的重大意义，因为美国投票人被里根总统讲话吓住了，并且他继续追求重新武装美国的主要目标。尽管里根看来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他在好几个场合中告诉布什，他愿意同安德罗波夫达成妥协，并至少缔结一项正在日内瓦谈判的核武器协定，这可能就是最高级会谈的主要内容。

530

但是，布什说，里根却有另一个固执的想法，即苏联领导人不会向他作出任何让步，哪怕是非常微不足道的让步。“对苏联政府来说，这可能有些希奇古怪，但是里根非常重视圣灵降临会的案子。这个案子虽已取得一些进展，但尚未完全解决。对里根来说，此案已成为一种测试苏联领导层对他个人的要求持何种态度的试金石。我建议，你应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案子虽并不那么重要，可它或许有助于改变里根对苏联的固执看法。”

副总统感到，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让里根改变他的看法和他带到白宫来的几乎无法想象的观点和偏见。当布什在里根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同里根更加接近时，他惊奇地看到里根在很大程度上受好莱坞的陈词滥调和他那些富有而保守的、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加州朋友们的思想所支配。不幸的是，许多根深蒂固的旧框框依然扎根于总统的头脑里，并因受其白宫幕僚中保守分子的影响而强化。

“噢，他很顽固，确实非常顽固，”布什重复地说里根，“但我认为，如果苏美关系成为总统竞选的焦点，他不会一点儿也不改变。”

4月，英迪拉·甘地公开建议各国政府首脑在联合国会晤，来讨论军备竞赛问题。安德罗波夫在写给她的一封信中表示拒绝，因为他虽主张苏美最高级会谈，但里根政府显然尚未就真正的会谈做好准备，况且，他担心里根可能把最高级会谈变成谋取他个人政治目的的“小会谈”，这只能使苏联受到民主党关于苏联支持里根总统的批评。甘地总理接到这封信后表示谅解。

然而，里根在未征询我们意见的情况下公开表示准备会见安德罗波夫，企图以此诱使他出席联合国大会。莫斯科对此保持沉默。经过一段长期沉默后，里根出乎意料地决定给安德罗波夫发一封信。我发现很难说这一姿态是受选举考虑的驱使，还是真心愿改善关系，但是他亲笔写了这封信，放入密封的信封里，于7月21日作为绝密件通过美国驻苏联大使发出。

里根的信力求使安德罗波夫确信美国就许多问题提出的各种建议是有道理的。这封信典型地反映了里根的作风，它表面上看很友善，且无他通常公开使用的谴责言词，但是除了一般性地表示准备经常地秘密交换意见外，这次还是没有什么新建议或者可能做出的让步。

我后来得悉，里根信件的原稿曾提议举行导致全面销毁核武器的会谈，这个提议被他的那些可憎的顾问们给删掉了。信里表现出里根自相矛盾的特点：在考虑大幅度削减核武器的同时，又开始从事一项庞大的新军事计划。里根信件定稿的最后文本以下面的结论结尾：

我们双方对维护世界的稳定共同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我相信我们能完成这一使命，但是为了完成使命，就需要我们进行比以前更为积极的交往。关于东欧和南亚局势，特别是本半球以

及诸如军备控制、我们两国间贸易和扩大东西方接触的其他方面的问题，都有许多值得商谈之处。从历史上看，当我们的前任私下并友好地相互通话时，事情就取得进展。如果您希望进行这种通话，您会发现我将随时恭候。我期待着您的答复。

这封信在莫斯科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对写信的动机争论不休，但是安德罗波夫决定以同样的语气做出答复。他的复信装在密封的信封里，于8月1日发出并交给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克拉克。该信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限制欧洲核武器从而避免地区性核武器竞赛的具体建议。该信结束时说：

我力求不在此信里提出许多问题，但是只选择了我认为我们可以讨论的焦点问题。我对在这些和其他问题上同您进行具体而坦率的交换意见表示欢迎。如果我们的交往需要的话，我同意秘密地进行。我谨提议，通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和您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任何人之间进行这种接触。

接下来是手写的词句：“总统先生，我真诚地希望您能极为严肃认真地对待我的意见，并以建设性的精神做出反应。”

安德罗波夫想恢复秘密渠道的意图是产生于我定期回国度暑假时我们在莫斯科进行的谈话。他问我对重开秘密接触渠道有什么想法，我回答说，里根政府似乎不在意，因为他无意同我们达成任何协议。总之，美国方面究竟有谁能承担起秘密渠道的工作呢？几乎所有白宫助手们对我们可能取得的事情知之甚少，克拉克也提不出什么建议。虽然我说舒尔茨“不是没有希望的”，但他“不能坚持他的观点”，尽管他不反对建立良好的关系。我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可同舒尔茨密切合作，尽管他完全不同于他的前任——基辛格和万斯。

安德罗波夫发现里根是个谜。“他是在玩弄阴谋，当个伪君子，

还是真正认识到,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分歧,但在核时代不可能实现对抗?”由于里根总统自相矛盾的行为,我不敢冒险作明确的答复。然而,安德罗波夫总结这次谈话说:“我们应继续保持同里根的合作。我们应保持警惕,因为他是不可预测的。同时,我们必须重视他准备改善我们之间关系的任何迹象。我们应该使秘密渠道畅通,但我们不应该做得太过分。”

矛盾的外交手法

对我来说,探测里根政府的真正石蕊试纸,将在欧洲导弹和军备控制的争议中找到。这些问题涉及了熟悉而有效的领域,甚至2月里根在其白宫二楼起居室里私下做了一切友好表示之后,依然可以透过这个领域探测里根的真正意图。

欧洲导弹的争议不仅起源于华盛顿或莫斯科,而且还起源于欧洲。美国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不仅作为主要的军事武器,而且还作为政治武器,先是被卡特,后是被里根供应给美国的盟友,作为美国愿保卫他们的真诚表示。在里根政府推行对抗政策时期,欧洲在其本土上是否愿意接受这些导弹,成为其是否像里根领导下的美国一样有骨气坚定地与苏联对抗的政治试金石。然而,里根自己的行为引发了横跨欧洲的广泛和平浪潮,这使他赢得人民支持的工作更加难做,相应地我们反对他的努力更容易一些。

里根政府关于零点选择方案的谈判立场是很吸引人,但在遭到我们拒绝后,里根于1983年3月底在洛杉矶的讲话中提出了被称之为中间选择方案的东西。为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来驳斥对他的批评,里根提出一项新计划,规定苏美双方在欧洲的中程导弹装有相同数量的核弹头,但未提具体数字。在向欧洲北约国家驻华盛顿的大使们解释时,里根表示,莫斯科不可能在北约国家于12月份部署导弹的这个最后期限之前同意任何事,这样北约国家或许可以先走一步,直到1984年固执而现实的俄国人为了阻止部署美国所

533 有导弹而接受里根的中间方案——而这有可能导致最高级会谈。(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然而,对我们来说,里根的中间方案归结起来只能是同一件事:我们将拆除我们的一些导弹,而美国却有权部署自己的导弹——美国空军基地和英法核武器都不计算在内。我告诉舒尔茨,这其实意味着要美国扩军,而要苏联裁军。

这件事说明了在那段时期苏美双方提出的裁减核武器建议的特点。这些建议以大张旗鼓的宣传、自吹自擂并由领导人亲自向盟友、新闻界进行解释等方式公布于众,而不是通过秘密渠道进行讨论,或者两国代表团在工作会议期间周到细致地予以审查。苏美军备控制的争议变成了两位最高领导人个人之间的一场公开的战斗——这与举行最高级会谈的主要思想即要求相互而秘密地探讨只有达成一致意见之后才能公布的协议的思想恰恰相反。

我必须承认,克里姆林宫发现它正在处理非常令人烦恼的新事物,这就是里根总统直接提出的、明显一边倒的一整套目标:军备控制必须导致对苏联核武器库自上而下地全面检查,以改变美国通过其防御计划不能实现的核均势。苏联认为,军备控制是限制军备竞赛并达成均势的一种手段,这是把连续性同秘密外交相结合的过程。因此,我们相信里根对军备控制的态度不严肃,在西方,甚至在美国有许多人持有相同的看法。当然,里根政府渴望消除这种看法,而且舒尔茨在同我们接触时变得特别积极。

4月17日,我去国务院参加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除了舒尔茨自己以外,他所有的高级助手们都出席了,他们是劳伦斯·伊格尔伯格、肯尼思·丹姆、理查德·伯特和——真令人感到惊讶——温伯格,他刚从五角大楼过来。陪同我的是苏联使馆参赞奥莱格·索科洛夫。显然,我们的人没有他们多。

温伯格第一个发言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和实际的建议:使热线现代化,把两国国防部连接起来,这样可以跟踪对方的军事演习和导弹发射情况;交换恐怖分子活动的情报,特别是抢夺核材料的情

报；在美苏驻对方首都的大使馆之间建立更加有效的通话渠道。温伯格谈话简洁明了，但是在提出建议后，他实际上未参加我们的谈话，好像他对谈话不是非常感兴趣。

然后，舒尔茨提议，日内瓦军备谈判人员现在华盛顿休会，我应同他们见面。由于葛罗米柯已经拒绝了美国最新建议，我立即问：“他们到底要同我讨论什么问题？是讨论原来的建议，还是准备讨论新的想法？”舒尔茨未作具体回答，只是提出完善1976年和1979年协议条款的可能性——这两个协议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签署。他建议就南非、阿富汗和中东问题进行磋商，但未作具体说明。

然后，他转向里根喜欢谈的话题——圣灵降临会人员。莫斯科已经批准一人离境前往美国。舒尔茨暗示，随着更多的人获准得到出境签证，美国政府将会把1976年渔业协定延长一年，并缔结一项长期粮食协定（因此而取消了1981年波兰实施军管后里根自己宣布的禁运）。

在莫斯科，对这次不寻常的会议有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他们对有两位高级部长参加的这次会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另一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注意到讨论本身集中在一些小问题上，并谨慎地避开有关军备限制的一些重要问题的实质内容。政治局决定按程序办事，希望出现转机。政治局还同意开始就温伯格提出的两个建议进行磋商，即使热线设备升级和交换反恐怖分子的情报。其他两项建议受到我们秘密警察保守主义的阻挠，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美国设备具有更高的质量。

但是，当舒尔茨4月14日邀请我参加一个有关裁减战略武器的长会时，事情未取得任何进展，因为舒尔茨未表示出做任何让步的迹象。继尔又召开了同样毫无成果的欧洲导弹会议，同时美国公共关系机器——美国政府用一个虚拟的矛盾修饰词“公开外交”来称谓它——开始运作。有关国务卿和苏联大使私下会晤的报道被披露给华盛顿新闻界和外交使团，给人们留下了双方都真心愿意解决僵局的印象。然而，秘密渠道实际上被阻塞了，而且我也是直

率地向沮丧的舒尔茨的副手肯尼思·丹姆这样讲的。我解释说,他的老板把这个渠道当作一个必要的途径,通过这个途径提出与日内瓦谈判多次讨论相同的问题,而不是如同我们在过去几届美国政府做的那样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

535 舒尔茨肯定在形式上得到了这一信息(如果不是在内容上的话),因为两个星期后他邀请我同他私下会见。事情发生在5月19日,这是我们第一次无旁人参加的会见。他表示需要私下谈谈,以使苏联方面确信里根已充分认识到苏美关系的巨大意义,但他想知道莫斯科是否真的这样认为。我说,美国、苏联和全世界人民都深信,20年来里根是最反苏的美国总统,而且他的观点近似疯狂。舒尔茨争辩说,苏美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危险。我以嘲讽的语调表示了肯定,并说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坏,也更危险,但是我想知道他能否例举出在里根政府的头两年发生了哪些有利关系好转的变化。经过慎重考虑后,他只讲了两件事:我们对圣灵降临会人员所做的决定和达成了恢复向苏联出口粮食谈判的协议。其他事情他就记不得了。这几乎不是震撼世界的事件。虽然他做了最大努力,但是显然并无实质性变化。

6月18日,我们又参加了一次礼仪性的会议。经里根总统批准,会议被设计成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舒尔茨和我就欧洲导弹问题举行私下会谈;接着,舒尔茨的主要助手丹姆、伊格尔伯格、伯特和我的两个参赞维克多·伊萨科夫与索科洛夫参加我们就人权、武器控制和双边协定举行的会谈;最后,回到就中东和中美洲问题举行面对面的谈判,而他的三个助手向我的两个参赞进一步提供有关我们双边关系的情况。日内瓦军备谈判两个主要人员也参加第二阶段会谈,这样,参加会谈的人相当多。

很明显,这种流行的外交方式意在展示更加灵活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对直到那时还要进行对抗的政府来说是一种发明。然而,最近的这次会议却像一场三幕外交戏,使我茫然不知所措。国务卿没有提出基本战略,或选择任何基本方向。他只是提出了(却

未进行深入讨论)一系列建议和具有不同重要意义的问题以及达成一致意见的各种可能性。但是,我却深受这一切行动的鼓舞,或许这就是这些行动的目的之一。不幸的是,美苏关系很快进入了新的低潮,但同这次精心策划的外交小舞步毫不相干。

KAL007航班事件:痛苦的回忆

大约在8月31日午夜,苏联驻美使馆临时代办奥莱格·索科洛夫接到助理国务卿理查德·伯特打来的紧急电话。伯特通告说,韩国航空公司007号航班在自纽约飞往汉城的航线上在萨哈林岛^①地区某地失踪,机上载有包括一位美国众议员在内的269名旅客。他说,飞机可能偶然侵入了苏联领空,并做紧急着陆。当时美国监侦部队未能得到进一步消息。

536

这一事件如同电影一样迅速展开。这件事发生时,舒尔茨刚好是当时在华盛顿的唯一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而里根及其助手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场里休假。9月1日早晨6时30分,舒尔茨从家里被叫醒并告知韩国民航班机失踪,或许被苏联人打下来。舒尔茨立即忙起来。他同美国情报部门和日本官员通话。(日本北部有一个拦截苏联无线电信号的秘密设施,并由美日联合管理。)

上午10时45分,舒尔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激动地宣称对苏联攻击的反应是一种厌恶的感觉。他说,人员伤亡惨重,无人能为这种恐怖的屠杀行为进行辩护。舒尔茨尚不知苏联官方反应,也没有任何带定论的证据。虽然他通常较谨慎且迟钝,但这次他却很急切。他那大动肝火的记者招待会为美国官方的反应和新闻媒介的愤怒定了调。

9月2日,索科洛夫会见伊格尔伯格,递交了一份苏联政府照会,谴责韩国飞机“严重侵犯了苏联的国界”,并抗议有美国官员参

^① 即库页岛。——译者

加的、“在美国发动的诋毁苏联的运动”。我认为，苏联政府这种倒打一耙的行为铸成了严重的大错。它无足够的勇气公开而迅速地承认，即使飞机侵犯了我们的领空，但飞机毕竟在苏联领土上被击落，并对此深表遗憾。莫斯科试图给人以这种印象，即苏联不知道失踪的飞机——这完全不是事实。苏联政府一直等到10月6日才最后由塔斯社发表了一项声明，承认韩国民航班机被一架苏联战斗机错误地击落。但是，到那时，苏联长远利益已经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在西方始终存在的反苏运动的种子随即生根发芽并迅速生长。

537 里根总统很快加入进来。他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时宣称，苏联飞行员知道这是一架民航班机，但还是把它击落。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们的飞行员真的认为这是一架美国侦察机。苏联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说：“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虚假的声明……。”先是里根，后是安德罗波夫发现他们自己没有必要亲自卷入这场相互公开谴责的激烈斗争中。

简言之，这一事件发展成美苏关系中的一场重大危机。乍看起来，这种说法有些失之偏颇，因为飞机不是美国的，而且它无可争辩地飞入苏联领空，偏离了航线。但事实证明此事是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华盛顿同莫斯科之间关系中内在的愤怒趋势的催化剂。它还说明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困难和苏联文职领导人与我们的军事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将军们较之政治家们甚至更加孤陋寡闻。

我正在克里米亚休假，安德罗波夫紧急召我回莫斯科。当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他看上去有些憔悴和忧虑。他说我必须提前结束休假，并命令我：“立即返回华盛顿，并尽最大努力一点一点地淡化这一不必要的冲突。我们的军队因击落韩国民航班机而铸成大错，这或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使我们摆脱这一困境。”他当着我的面给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打电话，并命令他做出向我介绍情况的安排。

在同我谈话时，安德罗波夫咒骂“那些一点儿也不关心政治大问题的傻瓜将军们”使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想想我们为改善这一关系所做的一切努力，他们把整个事情都搞

糟了，”安德罗波夫说。在这点上，他真诚地相信，这一事件始于美国秘密警察企图探测我们在这一地区的雷达设施，并且他对里根的公开辩护感到气愤，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挑衅。但是，他说，即便是这样，对我们的空军指挥部来说也不是击落飞机的借口，相反应该把班机迫降在我们的机场上。安德罗波夫实际上准备公开承认错误，但是我的同事，葛罗米柯的副手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后来告诉我，乌斯季诺夫说服了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犹豫不决很可能至少是部分因为他身体有恙，但是当时苏联政府能承认错误也是罕见的事。这意味着承认政府和最高军事司令部是不负责任的。

当我来到国防部乌斯季诺夫的办公室时，我发现他正在严厉地斥骂从远东召来的高级将领们。除了别的事外，引起他生气的是我们的雷达防御系统中出现的疏漏。在鄂霍次克海以西的堪察加半岛和萨哈林岛正在建造追踪外国飞机的雷达综合系统。虽然乌斯季诺夫下令要紧急完成，但是工期还是被推迟了。这时，刚好韩国民航班机悄悄地飞越了尚未安装好的雷达，并在雷达的盲区飞行了近一个小时。因此，当飞机越过堪察加半岛飞向萨哈林岛附近的中立水域时，远东空军司令部紧张不安，命令拦截飞机，因为飞机已飞越了特别禁区。我们的战斗机飞行员在他的报告中称，那天夜里能见度很差，他错把民航班机当作美国侦察机，因为它们的侧影很相像。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五角大楼的这次造访未能使我对我们的最高司令部产生好感。乌斯季诺夫显得很慌乱并非常气愤。

538

第二天，我返回了华盛顿。我认为双方处理这一事件及讲话的方式近似于有些疯狂。舒尔茨在情感上已滑到危险的境地；他甚至在尚未搞清美国情报部门是否卷入（很有可能卷入）的情况下提出指控。我简直永远弄不明白他极为愤慨的原因。

9月8日，伊格尔伯格正式通知我，作为对击落韩国民航班机的惩罚，美国采取了制裁措施：根据美国政府指示，将关闭苏联航空公司驻华盛顿和纽约的办事处。在随后进行的非正式谈话中，伊格尔伯格表示想知道到底是谁发出击落飞机的命令的，当时是否向

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作过汇报。我答复说,根据苏联军队的有关规定,地方军区空军司令部可以在事先不向莫斯科请示,特别是在时间来不及的情况下,作出阻止外敌入侵苏联边境的决定。所以这次入侵事件事先未向克里姆林宫报告。

伊格尔伯格表示很奇怪,并“严格地以个人名义”问道——我们已相识多年并在两国关系好的时候进行过坦率的谈话——有关莫斯科苏联领导层总的情绪和对我们同里根政府关系前景的看法。我坦率地告诉他,莫斯科越来越相信俄罗斯的一句俗语,“同人熬粥都熬不到一块儿”。他表示,因为发生了韩国 KAL007 航班事件,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将会是这样的,但是他依然期待着未来会出现好转。

539 我作为这一事件的见证人可以作证,苏联领导层深信韩国民航班机侵入苏联领空是美国策划的一次侦察行动。后来,韩国飞机上的黑匣子被苏联潜水员从海里打捞起来,但此事作为绝密未向外公布。直到1993年,俄罗斯政府把飞行记录器交给了国际民航组织,以供由俄罗斯、美国、日本和韩国政府发起的专家调查之用。在这场悲剧发生10年后,国际民航组织公布了其调查结果,但未得出结论:为什么具有现代导航设备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的韩国民航班机竟神秘地偏离了从安克雷奇到汉城的航线,并溜进苏联领空达数小时之久。没有证据表明,当苏联战斗机飞行员那天夜里在苏联领空上向 KAL007 号航班开火时,他是否真的知道他在攻击一架民航班机。

可是,正是认为苏联有预谋地攻击了一架民航班机的想法成为里根总统和国务卿进行公开谴责的根据。他们是根据什么原因急切地作出这一危险的谴责的呢?至于莫斯科,我们当时并且现在仍然相信华盛顿对这一事件的了解远比他们承认的要多。

这一悲惨事件在我们同美国和里根总统个人的关系上留下了永久而痛苦的记忆。我们的领导人深信,里根蓄意、无条理地利用这一事件来反对他们,而且美国特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卷了进去。

安德罗波夫认为，里根的反应是“歇斯底里的”。9月，葛罗米柯和舒尔茨在马德里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开至最后阶段时举行了首次会晤。气氛是爆炸性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舒尔茨提出了敌视苏联的指控。葛罗米柯对他的指控进行了驳斥。两人讲话后，马德里会议的紧张气氛达到了顶峰。

第二天，舒尔茨与葛罗米柯举行了在 KAL007 航班事件发生前就已安排妥的会谈。会谈开始时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舒尔茨一开始就先谈了苏联的人权问题。葛罗米柯拒绝讨论，并像以往一样坚持说这是苏联内政。然而，舒尔茨再一次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他刚才说的话。为了使他的话更加可信，他又说是总统授权他在会议开始时发表上述这番讲话的。葛罗米柯再次拒绝讨论。这样，他们不得不到另一间房子，当着两国代表团的面又继续会谈。

舒尔茨在桌边一落座就开始大声谈论起韩国班机事件，他知道有许多人在听。他不理睬葛罗米柯要求按程序进行会谈的建议，而是大谈这一事件，再次提到里根总统的授权。双方相互进行严厉的谴责。有时，葛罗米柯甚至失去了他特有的冷静，把眼镜甩在桌子上，几乎摔碎。双方既无时间，也无心思讨论其他问题。

葛罗米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这次相互谴责是他在其外交生涯中同14位国务卿进行的最激烈的一次。会后，葛罗米柯对我们这些最亲密的助手们说，他认为舒尔茨也许企图向他挑衅，以求得里根的欢心。我不能证实上述猜测，但是我可以作证，国务卿在外长级会议上感情用事已超出了正常的界限，也远远超出了他一向对自己要求的自控能力，尽管他可能确实是非常气愤。

这种情况仍在持续。9月18日，莫斯科宣称，当葛罗米柯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美国有关当局未向他提供安全保证。纽约和新泽西两州州长以葛罗米柯应该乘坐普通民航班机为借口，拒绝准许他的专机降落在两个州的机场上。政治局取消了葛罗米柯的访问。虽然葛罗米柯看上去有些生气，但我认为他从内心深处欢迎这一决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访问美国不是好兆头。

安德罗波夫：幻想破灭了

9月29日,《真理报》发表了安德罗波夫的一项声明,他强烈批评里根关于欧洲核武器的政策并谴责美国政府在击落韩国民航班机后掀起反苏浪潮。声明的关键之处是,“如果有人对美国现政府的政策有可能向好的方面发展抱有任何幻想的话,那么现在这些幻想完全破灭了。”“完全”这个词还专门做了强调。苏联领导层达成一致结论,即同里根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安德罗波夫代表政治局发表了这一看法,也许是因为他自己的幻想破灭了。但是对整个政治局来讲,这项声明形成了一种态度,其势头持续了一段时间。

当然,安德罗波夫的声明引起了里根政府和其他人的注意。10月1日,基辛格告诉我,他应邀去白宫参加了磋商。他们对安德罗波夫关于幻想破灭的讲话给予特别的注重,显然他们已懂得了安德罗波夫的意思。基辛格向里根建议,除非他希望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否则他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忍耐,并将他谴责苏联的讲话降温。他在白宫时把苏联比作“一个沉重的飞轮,很难启动;然而它一旦启动就难以制止”。

541 伊格尔伯格后来私下告诉我,白宫和总统本人得出了一个结论,即苏联领导层由于某种原因,不愿意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核武器问题上达成协议方面同里根打交道。因此,两国关系的前景是暗淡的。我回答说,这看来是受嫁祸于我们的观念所驱使;安德罗波夫的声明讲得很清楚,我们需要缓和紧张局势并限制军备竞赛——“但是里根总统却又是怎样做的呢?”伊格尔伯格说,前些时候,基辛格告诉里根,他深信秘密外交和秘密渠道在同苏联领导层打交道时非常有用,里根看来愿意尝试一下。但是这一想法在里根分别同舒尔茨和克拉克讨论时不知丢失在何地了。

里根对世界的独特看法继续影响着其政策。沙特大使班达尔·宾·苏丹王子代表沙特国王会见了里根,当时沙特国王在黎

巴嫩各武装派别之间进行斡旋以实现停火。这位大使惊奇地发现，里根仅凭苏美争夺这个三棱镜来看待那个地区发生的一切事情。里根相信，叙利亚总统哈菲斯·阿萨德在黎巴嫩做的每件事都受莫斯科驱使，或者甚至是授意的——“几乎都是安德罗波夫自己做的，”班达尔王子说。甚至阿拉伯兄弟之间的争吵都被里根看成是莫斯科搞的阴谋，或者是苏联以牺牲美国的利益而获取好处的机会。其他大使对白宫的政策也持相同的看法。

10月28日，我应邀同舒尔茨共进午餐。他表示，单独同一个小外国大使共进午餐还是头一回。（如果我说20年来我同他的前任像这样共进午餐已有数十次的话，那将是不策略的，而且是一种失态。）他想“从哲学的角度”来谈谈两国之间的关系。他说，双方正在从事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并将继续这样做，但是总统仍然认为我们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求大同。

我请国务卿坦率地告诉我，是谁公开地并在官方场合中竭力恶化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一事实甚至在美国都无人否认。我例举了里根总统刚刚在几天前的全国电视中发表的讲话，这篇讲话谴责苏联在黎巴嫩和格林纳达制造麻烦。是什么使他企图愚弄美国人民，使他们相信苏联在这两个国家发挥邪恶作用的神话？那里甚至没有苏联人存在。

最后，他对秘密渠道及其重要意义发表了一通哲学说教，但是怎样利用秘密渠道他未作具体说明。他询问我的看法。我回答说，我们之间的问题依然很简单：一切有赖于这一渠道的内容——即通过它来传送什么话，双方是否真正使用它来达成妥协。舒尔茨说，他将在11月9日至15日随同总统访问远东时同里根谈谈秘密渠道的事。

542

我纳闷他为什么要推迟至访问远东时，而不是立即就同里根总统讲清楚这个问题。国务卿出乎意料地说，他通常在陪同总统到国外访问时才更容易有机会同里根讨论政策问题，因为在国外访问时他们不受国内紧迫问题和白宫工作人员的干扰。我相当惊讶

地听到舒尔茨坦白承认，他在华盛顿时同总统讨论重要政治问题的机会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他必须等待最适宜的时间，以得到总统对他建议的首肯，特别是关于苏美关系这种重要问题。

我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写到，舒尔茨虽担任国务卿已一年多，但他依然未做好充分准备使自己成为讨论重要问题的权威人士。与其说他对问题细节的无知，不如说是里根总统显然尚未决定进行具体谈判。我又说，美国选举年日益临近，虽然尚未感到有对竞选的考虑，但无疑在一定的時候会有这种考虑，我们应观察美国政府的行为以寻找机会。或许美国政府会开始玩一场更加灵活的游戏。

在欧洲部署美国核导弹和谈判出现的僵局使莫斯科进退两难。如果我们继续就限制欧洲军备进行会谈，就会使世人抱有达成协议幻想。然而，如果我们退出谈判，那就无法阻止华盛顿部署全部导弹。很清楚，苏联利用谈判和公众压力来阻止美国部署导弹的战略未能成功。不用说，克里姆林宫对里根的忿恨已达到极点。总之，苏联领导层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根本无法同里根达成协议。

543 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政治局决定退出欧洲导弹谈判，同时发动一场巨大的宣传运动来说服欧洲人，部署新的美国导弹只能使核威胁升级。在第一枚美国导弹于11月23日运抵欧洲后的第一天，苏联新闻媒介发表了安德罗波夫的声明，谴责华盛顿发动了一场反对社会主义的讨伐运动。他说，为保持军事均势，苏联中程导弹将部署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部署中程战术导弹。他又说，如果北约组织撤走导弹，苏联亦将如此。莫斯科无人相信北约组织会改变主意，这只不过是说给大众听听而已。

我深信，我们犯的最严重错误是未能在北约组织决定部署美国导弹之前抓住机会相互达成妥协。在北约组织采取决定前的两

年中，机会之窗是存在的。早在1979年夏天，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专程在莫斯科机场逗留并会见了柯西金，以表示作出妥协的可能性：苏联应向西方保证，新式 SS-20 导弹携带的核弹头数量不会超过苏联即将退役的老式 SS-4 和 SS-5 导弹携带弹头数量。

柯西金向政治局报告说，施密特的建议值得考虑，但是乌斯季诺夫极力反对。国防部长不想向西方暴露他计划部署的 SS-20 导弹数量，更别说削减弹头数量的可能性了。勃列日涅夫通常是反对柯西金提出的建议的，但这次他拿不定主意。他看着葛罗米柯。但是，外长保持沉默，他不想同乌斯季诺夫争吵，并且不敢肯定施密特的让步是否能起作用。我们错过了那次机会。在苏联未能对施密特建议作出回答后，北约组织于1979年12月作出了决定。

1983年12月8日，苏联方面在日内瓦又宣布了一项决定。苏联拒绝为下一轮军备谈判确定日期，莫斯科仍旧谨慎地不说军备谈判实际上被中止的话。苏联代表称，美国的建议旨在使美国战略核武器（把潜艇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计算在内）数量上的优势翻番，并以削减苏联重型导弹的数量来摧毁苏联战略部队的中坚力量，而根据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的协议，苏联重型导弹数量是被冻结的。这种形势鼓励重新武装，而不是裁军，这正中里根的下怀，因为美国国会正就里根提出的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进行投票表决。

如果稍有区别的话，那么苏联政府第一次决定中止限制核武器会谈是我们同里根政府之间关系的最低点。总的来说，1983年——安德罗波夫之年——成为苏联外交政策困难的一年，对他本人亦是如此。

第三十章

解冻

里根好战性逆转的原委

美国的强硬路线对苏联政治局内部争论及对其领导者态度的影响几乎总是与华盛顿的初衷背道而驰。在里根好战言论带来的可怕扩军的形势下，苏联领导人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开始汲取了里根的独特观点，认为苏美关系会长期恶化是审慎的政策的选择。后来双方都逐步认识到除非另辟它径，否则他们正在走向毁灭。然而从对抗和竞相升级转折到这一步耗费了相当长的时光和努力，假如这一趋势没有占先形成的话，也许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现在看来，这一转折始于1984年总统选举期间。但竞选与转折有多大关系，谁也说不清楚。白宫意识到公众对罗纳德·里根政策中有关战争威胁的说法愈来愈担忧，一种热爱和平的呼声占了上风，好战的观点被压了下去。即使如此，里根仍不时失言，这突出反映了他的本来面目：重整军备的计划仍在进行；继续在欧洲部署美国导弹；总统丝毫无意放弃他的最新得意之作——战略防御计划。因此莫斯科认为它不得不对着干。舒尔茨和葛罗米柯那时正准备于1月1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下一轮会晤。政治局为外长拟定了详细而基本不让步的指令。这一指令清楚地显示了政治局的深刻忧虑，里根持续的竞选活动给苏联领导层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与舒尔茨的谈判中，葛罗米柯受命将里根的

政策描述为“充满了军国主义和侵略色彩”，进而向舒尔茨表明莫斯科不会容许超级大国之间军事平衡的改变，同时清楚地表示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和巡航导弹迫使日内瓦谈判必须讨论这一问题，并将使战略武器会谈更为艰难。

前往斯德哥尔摩之前，舒尔茨和我碰头，讨论恢复秘密渠道的条件。莫斯科虽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愿意一试。两国外长计划在斯德哥尔摩讨论众多其他问题的同时，就此问题的细节进行谈判。我心里当时在想他们的谈判会很艰难，天晓得会谈会不会像在马德里那样变为愤怒的争吵。舒尔茨愁眉苦脸地开玩笑说，两国关系是如此之坏，以致稍加努力就可改善关系的机会比比皆是。

舒尔茨给我看了一篇里根在1月16日关于苏美关系讲话的初稿。舒尔茨建议里根在讲话中强调，即使苏撤出欧洲导弹谈判，政府也决心保持与苏联对话。里根的信息显现了新变化和新调子，即现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已经振兴，它与欧洲的联盟得到了巩固，他的政府准备开始着手解决与苏联的分歧，宣告1984年是和平进程的机遇年。总统宣称，现实主义、力量和对话是他的指导原则，力量与对话并存。他赞同首脑定期会晤，并总结说，如果苏联政府真正希望和平的话，就会有和平。对于里根来说，这是一次赢得好感的特殊电视演讲。

在其他任何时候，一位美国总统这样的讲话均会被看作是向改善与苏关系迈出实质性的一步。然而，尽管有其他许多消极因素，但总统大选的临近使人们难以相信里根的诚意。他的讲话在美国并未赢得公众的好评，他讲话腔调的惊人改变被认为无非是为竞选服务。回想起来，他的讲话显然反映了他在对苏关系的看法上出现某些演变的端倪。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声明或许会通过秘密渠道给予补充说明。然而当时里根本人也许尚未准备将他的新思想变成具体的建议。

舒尔茨与葛罗米柯在斯德哥尔摩的会晤进行得并不是太糟糕，但是当葛罗米柯遵命严厉指责华盛顿时还是出现了一些紧张

546 气氛。舒尔茨后来告诉我,他感觉尽管葛罗米柯持强硬路线,但就他们的私人会晤来说,要比马德里那次令人气愤的会晤好多了。他把此次会晤比喻为“破冰”,尽管双方在表明所熟悉的立场时都所答非所问。舒尔茨说:“葛罗米柯结束会晤时说,我们的谈话是非常有必要的,对此我完全同意。”

我感觉旁观两位外长的舌战很有趣。两人均个性极强,智商很高,阅历丰富。两人都对各自的政治体制坚信不移,拒绝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而放弃政治原则。双方均不相信我们的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从根本上得以改善,尽管双方正在试图从已意识到的危险处境中寻找出路。但双方都对此小心谨慎。即使如此,这也为一片险恶的形势注入了某种乐观因素。

这使我想起了当时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些聚会。一次是纪念迪安·腊斯克75岁生日的大型宴会。所有腊斯克的继任者都出席了,另外还有大约200多名高级官员和美国大使,只有我一个人作为一位外国大使出席了宴会。我非常高兴地再次见到这位曾与之愉快合作过的人,尽管在困难时期我们存有分歧。还有一次是在坎南学院举行的纪念苏美关系50周年的宴会上。在这些活动中,对苏联政策的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我对此洗耳恭听。我走上讲台后所说的开场白是:“我到此来不是要说我们是完全正确的,而你们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说绝非戏言。我在美多年,公正地说,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国家及其社会制度的利弊。我曾试图向我的政府解释我所看到的美国各届政府不同的对内、对外政策,而且尽量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诚然,我的一些分析是错误的,或太感情化了。总而言之,我受我国哲学及我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太深了。我要尽自己所能对外阐明这一点。然而我总是尽量做到客观,我的愿望是改善两个大国间的关系。

里根是乞求和平者吗？

在前半年里，对整个华盛顿，特别是对我们使馆来说，最令人感兴趣的挑战就是判断总统对苏联接触的严肃程度如何，如果他的所作所为是与事实相符的话，那么又能持续多久。11月大选后还会坚持下去吗？对此现象的观察、解释和建议颇多，且五花八门。这样做的人一般并没有因感兴趣而加以渲染。

547

事实上解冻的迹象并没有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们误解。这些大使每月在我们使馆聚会一次。“朋友们”定期会面，我从来不以小组头头的身份自居或出面协调政策，那是莫斯科的事，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地交换外交情报和华盛顿的小道消息。我们1月13日会面时，除了古巴大使外，所有大使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随着美国开始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美国对他们国家采取了抚慰态度。他们感觉到，自大选以来，里根讲话时敌意小了。

吉米·卡特1月30日意外地来拜会我，他表达了对于里根扩军程度的关注。他形容里根的和平言词纯粹是竞选花招。前总统完全相信，只要里根在台上，就不会就军备控制、特别是核武器达成任何协议（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糟糕的预言家）。

我与伊格尔伯格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谈话，他的思想与卡特几乎如出一辙。当被问及我们是否可期待里根政府在改善与我们关系的问题上具有积极性时，伊格尔伯格直率地表达了他的顾虑。他说，里根自信他的和解腔调足以安慰选民。伊里诺斯州的自由派共和党人查尔斯·珀西告诉我，1月6日里根和他的助手碰头讨论竞选中的“苏联策略”，他们断定选民已完全知道里根反苏立场的实质，所以他不能再做什么，以免使选民认为他是个战争贩子，但也不必增加他们对与苏签署重大协议的希望。

甚至梵蒂冈也对此感兴趣。在梵蒂冈默许下，费利克斯·莫利姆教父与我一直保持着个人联系。他向我透露，梵蒂冈国务卿

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已会晤过里根,他得出的印象是,里根要在其竞选期间克制反苏情绪,这样做会使美国基督教神父们满意,因为他们报告说,全体教徒们在里根执政的三年中一直因战争的威胁而胆战心惊。然而卡萨罗利还发现里根牢牢地抓住其强硬路线,部分原因是他相信美国在欧洲部署核导弹会促使苏联的态度更为灵活。

548 乔治·凯南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外交家,他曾制定了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现在他同样相信里根已开始为竞选而鸣锣开道,因为他必须得顾及全国上下对核战争的恐惧。他指出安德罗波夫提出的里根政策危险的警告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迎合了宣传核战争恐怖电影的浪潮。尤其是大约有1800万人观看了“末日”这部片子,再加上美国政界和宗教界名人们出版书籍、发表文章、评论,所有这些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效果,使恐惧撞击着美国人民的心。在里根试图以和平候选人的面目出现在选民面前时,凯南建议我们抓住总统的话,使他采取守势,同时公开表明“即使在里根领导下”,我们也为达成一个对双方有利的协议做好了准备。既然他在考验苏领导人,我们同样也得选几个可能会取得迅速进展,并能付诸实施行动的问题来试试他。

基辛格当然有其独到之见。他说,里根及其随从在竞选期间不想夸大苏美关系。他报告说,白宫和国务院正在讨论各种行动,以向苏联发出信号。然而整个议程杂乱无章,原因是没有一个人来很好地组织。他强调里根政府没有一个紧凑的计划来对待苏联问题,因为里根从未严肃地思考过这一问题,而且国务院特别缺乏主动性,并且缺乏提出新思维的勇气。

在一次官方晚宴上,我碰见了议长托马斯·蒂普·奥尼尔和一位老朋友。像往常一样,他谴责里根,但又问我他们从白宫处所闻是否可使他认为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正在得到改善。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并说苏美关系仍同以前一样糟糕。奥尼尔说,尽管政府官员在国会里试图依靠与苏联人私下的关系来使人们得出相反的

印象，他还是这样认为的。奥尼尔说应不遗余力地阻止里根这个危险人物再次当选。“如果此事发生”，他显出一副焦虑的样子继续说，“里根自己本性的发泄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很可能使我们处于重大武装冲突的边缘。他是一个危险的人。”

此后在5月，我从伊格尔伯格处找到了我以为是对我长久以来对白宫战略的真正本质的疑虑的首次明确答案。伊格尔伯格刚刚离开国务院，就职于基辛格的咨询公司。这里的薪水远比他原在政府中所领取的一年6.5万美金的工资丰厚得多了，原来的那些钱不够他支付孩子们的大学费用。

按规定他在位时所得到的消息是不得泄露的。他说，白宫已经决定里根在竞选期间应该充分利用苏联拒绝继续日内瓦核谈判一事大做文章。他们的理由是，面对民主党说他不如他的共和党的前辈们，攻击他没能与苏联达成任何重大军备控制协议，他可以以此为自己辩护，所有这些都归罪于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和军事威胁。使馆从各种渠道得到了几乎同样的情报。我们均报告了莫斯科，而莫斯科未能拿出有效的宣传对策。

549

伊格尔伯格还向我透露了他对里根作为普通人和行政官员的看法。总统仍受其引以为自豪的“天生本性”所主导，可是他天生的本性并没有产生出丰富的思想。他少得可怜的主意还带着意识形态陈词滥调和平庸宣传的强烈色彩。在他执政的三年时间里，他所控制的外交政策仍无所作为，特别是在复杂的核政策问题上，他根本不求甚解。他的助手为他省去了审阅冗长报告的麻烦，那些东西他是不会读的。里根坚持只有那些已得到他的顾问同意的建议，他才会考虑批准。他讨厌对那些意味着在政府里的两个对立阵营中作选择的问题作出决定。

这种做法加强了五角大楼和温伯格制定外交政策的作用，在处理与苏联和中国关系的问题上更是如此。温伯格利用里根对军事的青睐，实际上可以否决国务院的任何一项建议，或者至少是抓住极好的机会促成通过他的计划。在里根面前，他积极地为国务

院的观点辩护。但国务院需经“总统批准”的跨部门问题，如军事利用空间、化学战争或裁军等，都非常重视军方的意见。

550 国务院的外交受到白宫所制定的对付苏联的程序的严重制约。明文规定严格限制外交官谈判的口径，即使在传统的与苏官方代表非正式交换意见时也不例外。由于这些指示是非经常性地下达的，所以美国代表没有替代的立场以适对方同等数量的问题，继续非正式对话。他们没有灵活性，只能传递给苏联代表一个经批准的信息和时间。解释舒尔茨不明确、谨慎的言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实际上没有机会经营一条交换意见的秘密渠道的原因所在。而过去，这条渠道曾帮助外交官们在双方首都为打破僵局找到办法。伊格尔伯格说里根及其随从甚至听不进关于利用其他政客对付苏联的经验的意见。因此，一旦总统感觉到他与莫斯科的对抗走的太远时，他便采纳他小圈子里亲密助手们东拼西凑的意见，这些人在电视上塑造形象是行家里手，但却对克里姆林宫的运作方式和如何与其进行对话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珀西议员告诉我，白宫加紧散布总统已尽其所能与莫斯科改善关系，然而克里姆林宫却暂停核武器会谈的消息。我列举了一系列我们裁军建议的例子，这些对珀西来说是个新发现。他问我这些建议为何不发表。我回答说，高级记者应该保密，珀西摇摇头说：“你是在里根的手心里玩游戏。”

如同生活中常有的事一样，里根在偶发事件中表现出即使不是最不合乎理性的，但也可能是最具决定性的本性。8月11日，里根总统在每周例行向全国发表的电台演讲试音时开玩笑地说：“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今天高兴地告诉你们，我已经签署了一项立法，宣告苏联在法律上永远失效。五分钟后，我们开始轰炸。”但他不知道，当时麦克风是开着的。

苏联政府没被这个玩笑逗笑，而是通过塔斯社发表了一份措词强硬的声明。声明的内容在美国的影响也一样不怎么好。国务院急忙竭尽全力进行反击，谴责苏联利用偶然事件言过其实地大肆

宣传。或许是这样吧。我所说的这些是根据我当时作的笔记回忆起来的，那时作笔记是为了判断总统的真正情感和动机。毫无疑问每个人，包括我在内都对此事记忆犹新。

过渡：安德罗波夫逝世，葛罗米柯继任

我最后一次见到安德罗波夫是1983年我回莫斯科休假期间，在中央委员会他的办公室里。他看上去气色不太好，但在讨论与美国的国家事务时仍精力充沛。他批评里根的政策，特别是批评美国公开攻击苏联，他认识到这使得他不可能与华盛顿达成最低限度的和解。“我赶上对付这位美国总统真算我倒霉”，他对我说话时语气虽很轻，但言谈中带有苦涩。 551

那年冬天，舒尔茨得体地询问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他说：“对安德罗波夫病情的各种猜测传到了白宫。”我回答说，据我所知，总书记虽需注意保重身体，但他在继续主持国事。他住院次数日渐频繁，虽然对此时有谣言，但任何有关消息都对外保密。第一个令人警觉的迹象是他没有出席12月的党中央全会，这时总书记的传统报告是要本人宣读的。当时苏联大使们，包括我在内一点也不不知道他的病情有多么严重。

安德罗波夫于2月9日逝世。我曾寄希望他来逐渐改善苏美关系。他的才识当然胜过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一筹。在适当的情况下，他是可以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重要调整的，而且他肯定是想这样做的。他最初的某些观点被他的门徒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借用，并又依自己的方式发展了，可安德罗波夫本人却从来没有机会、也没有精力去改变苏联的外交政策。此外，国际形势也不容许他这样作。强大的惰性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克服的。2月12日里根来到使馆，并在吊唁簿上签名。

1984年2月13日，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确认契尔年科为总书记的接班人。第二天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乔治·布什。当时

他是率团来参加安德罗波夫的葬礼的。两人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契尔年科对布什说双方“不是天生的敌人”。布什答道，里根准备进行真正的对话。

72岁的契尔年科的当选并未给苏联对外政策带来任何重大改变，他那时患肺气肿，身体很虚弱。然而，葛罗米柯又重新获得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控制地位，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他丧失了有关权利。但事实上，他们之间没有很大的分歧，他们开始承认有必要与华盛顿共同寻找一条走出死胡同的办法，特别是在限制核武器会谈问题上。契尔年科感到非常缺乏主动性，但是他又不敢作出果断的改变。作为由政治局委员们选拔出来的谨慎的过渡性人物，他通常是听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并被他们的情绪所左右。他是过去20年里一位最软弱无力、最令人难以理解的苏联领导人。

552 契尔年科和里根之间开始的一系列交往不由使我想起一种精心设计的礼仪舞，在这场舞蹈中，双方互相通信，向和平与裁军这一需求行屈膝礼，但却无任何行动推动它取得进展。里根春天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苏联，这显然是想指望中国作为抗衡力量。他声言绝不会与苏联签署任何在欧洲削减或清除核武器的协议，除非苏联可以保证这些武器不会被转移到亚洲去。这次访问总的来说使苏联领导人怀疑里根政府实行全面敌对的情绪进一步加深。

苏联存在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一老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的纠纷，对此我国政府继续采取坚定而漫不经心的报复政策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开始时，我们放任事态的发展到了在国外变成丑闻，危及两国关系的地步，然后我们又让步。克里姆林宫的确认为，纯粹的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得到了西方情报机构的鼓动和帮助而发展起来的。

就拿安德烈·萨哈罗夫及其妻子伊琳娜·邦纳的事件来说吧。里根和舒尔茨告诉我，除非容许她出国治疗，否则萨哈罗夫就准备举行绝食斗争。他们希望我们在这一事件成为另一起反苏运动之前，能考虑她的要求。5月19日是星期六，早上我在家接到总统

亲自从戴维营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想向契尔年科发出私人秘密请求,请其容许邦纳离开苏联进行治疗。有报道说她的身体极坏,上帝不容许她现在死去。里根认为,如果此事发生,愤怒的美国公众舆论会把已经很糟糕的两国推到可想而知的最低谷。里根说,他不怀疑苏联医学科学的高水平,但是“如果她死在莫斯科会是什么情景呢?那将会有没完没了的麻烦。如果她要死,就让她死在这里,起码没人来指责我”。 553

里根又以调解的语调补充说,当然他不能判断邦纳的身体状况目前到了什么程度,他是根据他所得到的非官方消息这样做的。我答应迅速将他的请求转达给莫斯科。我把里根的干预看作是他出于某种良好愿望所做的姿态。

没过一周,我用电话向里根转告了来自莫斯科由葛罗米柯签署的答复。电报说,“那个女人及其同谋”正在试图蓄意使人们对目前的形势引起注意,以损害苏联的名誉,她的身体的真实状况是“她会比她的许多同龄人活得更长”。他坚持说这是“由高级医学专家作出的具有权威性的结论”。

总统冷静地认识到,他无意仅仅为了帮助邦纳而恶化两国的关系,可他又不能制止有人为其健康状况而大声疾呼。他说他害怕此事又会引起美国国内支持她的犹太教各组织协助而闹出乱子。

直到第二年戈尔巴乔夫当政时,邦纳才获准前往美国访问。1985年8月29日,政治局讨论了她的请求。克格勃主席维科托·切布尔科夫的发言有利于批准她的请求,但是他明确地反对容许萨哈罗夫陪同她前往,因为他知道苏联核武器发展的详尽情况。切布尔科夫说,如果萨哈罗夫在国外有了实验室,他就可以继续他的军事研究。然后他又说:“萨哈罗夫的言行举止受其妻子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愤怒地大声说:“犹太复国主义就是这样。”邦纳实际上只是半个犹太人,与苏联的犹太抵抗力量没有特别关系。萨哈罗夫不是犹太人,然而由于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是犹太人,同时许多外国犹太组织通过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及其它人权小组从事共同的事

业。戈尔巴乔夫和许多政治局委员认为邦纳事件是犹太复活主义的影响的扩大。邦纳被获准离境了,可是他的医生却被留了下来。此后,她几次到国外去旅行。

两国关系继续走下坡路。5月,莫斯科拒绝出席在洛杉矶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们在寻求表达不喜欢里根的方式的同时,仍然没有忘记卡特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件事。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们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反对复杂的军备控制谈判,呼吁尽早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这是连一般焦虑不安的选民都能理解的事。

6月20日,舒尔茨再次请我去会谈。这次谈了三个多小时,助理国务卿理查德·伯特和我们使馆的参赞维克多·萨科夫参加了会谈。舒尔茨说,总统十分清楚双方的失望和难处,他想要改善两国关系,但如何改善呢?与契尔年科举行最高级会谈是有益的,他没有拒绝考虑此事,同时他建议把我们的问题开列出一份清单。

为此舒尔茨和我一道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单子:核武器控制,禁止外空武器,反弹道导弹系统,公开放弃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提案,限制海军武器,禁止化学武器战争,改善热线等。554 我们简要地涉及了地区性问题,如南非、中东和两伊战争、人权问题和特殊的双边问题。我们清理出所有有争议尚未解决的问题,然而没有试图得出答案,甚至连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也未涉及。毫无疑问,讨论有助于将我们的事物井然有序的摆出来。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令人吃惊的是,白宫邀请葛罗米柯重新恢复了他每年秋季对白宫的访问,并与总统进行会晤。国务院苏联处处长詹姆斯·西蒙8月下旬发出了邀请,但其前提是要“理解会晤应是严肃的,而不是用于宣传目的”。他极秘密地向我们的临时代办解释说,这个奇怪而不同寻常的信息显然反应出里根的随从对“当前情况的妄想”,尽管白宫肯定出于自身利益希望会晤,但又极端害怕莫斯科在会

晤时投下影响大选的宣传手段的定时炸弹。他补充说,政府已下令为苏联外长来访采取必要的保安措施,包括一部防弹车(他们知道葛罗米柯对其自身安全是十分注意的)。

与此同时,里根在竞选中开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他的政策已见成效,他现在可以更加亲切地对待苏联。相反,苏联领导人却继续公开攻击美国政府,声言战争的危险在增长。苏联领导人愿意对民主党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给予口头上的援助,这不是因为他们了解他,而是他们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比里根好。然而蒙代尔没能利用对他有利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我认为那是因为蒙代尔不能确定到大选之日,苏联因素会是有利于他还是有利于里根。由于爱国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在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美国人民希望他们的总统在同苏联进行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竞争中挺起腰杆吗?或者他们希望他与俄国人举行最高级会谈并为了改善关系而作出某些调整和让步吗?蒙代尔从未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政治局内部,围绕着在竞选的最后阶段我们的最佳表现方式问题引发了一场论战。莫斯科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把对反击任何攻击,不停顿地批评里根作为重要原则,但在行动上不要过火。我们的批评要有限度,并需慎重,因为美国历史清楚地表明,外国对大选的干预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恶果。我们应该预计里根可能获胜,对待一位我们或许将要与之打交道的人太蛮横了不是上策。政治局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政治局认为葛罗米柯与里根的会晤太重要了,因此为他拟定了特别指示。他们强调莫斯科对华盛顿的希望是首先讨论彼此的安全问题,表明冻结或削减核武器储备的意愿,放弃生产或部署不稳定的新式武器,同意外层空间非军事化。

苏联自此改变了态度,对里根从对抗到开始尝试与其达成协议。他们打算趁机抓住里根竞选期间的温和调门,寄希望于以后加以利用。现在回想起来,做出如此过速的反应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不能确定这扇选举机会之窗能敞开多久。舒尔茨在他的回忆录中

写道,直到1984年底,就总统关于苏美关系的问题的辩论仍很激烈。当里根决定接待葛罗米柯时,他告诉舒尔茨说,此事事先不要向任何人透露风声,不然他周围的人又要吵闹不休,执意让他改变主意了。

葛罗米柯又来到了白宫

9月26日,总统在白宫接待了葛罗米柯。用礼宾规格来衡量,里根是按政府首脑而不是按外长的规格来接待他的。总统在椭圆形的办公室摆好姿势与其合影。新闻记者来的太多了,不得不把他们分成三拨儿,所有的人都用最大的声音提问题。

南希·里根出现在午餐前的鸡尾酒会上。葛罗米柯在被引见后向她敬酒。他喝酸梅汁,她要了一杯苏打水。“我们俩都喜欢饮料”,他用干巴巴的幽默文字说道。

葛罗米柯与总统夫人聊了一会儿,“您的丈夫赞成和平还是战争?”他问道。她回答说总统当然完全赞成和平。葛罗米柯惊奇地问:“你敢肯定吗?”她百分之百地肯定。葛罗米柯还坚持问:“那他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的建议呢?”她问道:“什么建议?”有人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但就在午餐开始前,葛罗米柯又提醒里根夫人,“每天晚上别忘了在总统耳边说‘和平’两字”。她说:“当然,我会的,我也得在你耳边说。”我必须说,葛罗米柯从交谈中得到了乐趣,他非常兴奋地向政治局作了报告。

556 里根和葛罗米柯的谈判在椭圆形办公室内举行。他们谈了两个小时,午饭后继续谈。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高级官员有布什、舒尔茨、温伯格、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里根助手贝克、米斯、迪弗和新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伦。葛罗米柯由副外长科尔尼柯和我陪同。

会见一开始里根就发表了冗长的讲话,主要是关于美国希望和平,并进而解释为什么美国人民把苏联看作是对和平的威胁。里

根解释说,他看到马列主义政治哲学激励苏联的世界革命政策,而且这场革命将导致资本主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灭亡。他推理说,美国必须武装自己,否则就将被迫在投降和灭亡之间作出选择。葛罗米柯竭力去纠正他。他说,的确,历史进程的目标就意味着一种社会形式不可避免地要被另一种形式所代替,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但这绝不是军备竞赛的理由。苏联领导人绝不相信政治和军事威胁,任何人也不可能指责我们企图用武力改变美国的社会结构,他说:“我们没有这个计划,我们永远不会有这个计划。”

里根建议午饭前与葛罗米柯举行私人会谈。葛罗米柯后来向我们通报这次简短会谈时评论说他十分不理解对所有这一切有什么好兴奋的。总统好像要告诉他什么重要机密一样,他强调说他的个人梦想就是“无核世界”。葛罗米柯回答说,核裁军是首要问题。双方都同意最终目标是彻底消灭核武器。这就是私人会晤的全部内容。我不排除里根本人渴望让苏联外长相信,无核世界是他的真正梦想。里根确实不止一次地公开提到这一点,但他认识到即使他的随从也不相信这一点。

总统的几个助手向我们证实,里根事先告诉他们他想在休息时与葛罗米柯单独会晤,但他没有告诉他们谈什么,显然事后也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里根和葛罗米柯进房间后,门留了一条小缝,以防总统万一有事呼唤值班员时可以听到。里根与苏联外长就无核世界问题简短交换意见后便起身去私人盥洗室,出来后,他问葛罗米柯是否也要去方便一下。葛罗米柯便去了。那位值班官员没有听见他们谈什么,所以总统的随从人员不能肯定总统是否忘记了 557
他要与葛罗米柯私下会晤的意图,还是改变了主意,或是一开始就打算只是聊几句而已。

总而言之,两人都有理由认为交谈进行的很好,而且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并未发生其他官员在场及在午饭时出现的不必要的发火的情况,然而双方都固执己见。

在后来的广播讲话里，总统描述他与葛罗米柯的会晤是有益的，首先从为争取再次当选的竞选角度来看是这样的。葛罗米柯对新闻媒介说，他与里根的讨论“不能使我们得出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出现了实际而积极变化的结论，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这一声明向人们证实苏联政府对美国的评价没有改变。然而葛罗米柯对接待本身很满意。在乘飞机离开华盛顿时，他告诉我，他发现里根是人类最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葛罗米柯是这样说的，全人类也都是这么说的——大选后里根可能会对签定协议实行更严格的控制，或许秋季与葛罗米柯举行下轮会晤时会更甚。葛罗米柯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白宫，苏联政治局中迄今最无名气的委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成为总书记，把葛罗米柯赶上了实为虚设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位，他被一位更年轻、更灵活的政治家所取代。

葛罗米柯的美国之行使苏联领导人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如何进一步与里根发展关系。我们曾希望反对美国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的群众运动会迫使美国和北大西洋组织放弃它们的计划。可是所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我们错了，核导弹被毫不犹豫地部署在欧洲。通过恢复谈判来寻求和解是有必要的，这也有益于商讨外层空间核武器问题。否则我们会错过这个机会。莫斯科开始痛苦地重新评价直至11月中旬还在执行的政策。随后我们即向里根建议美国大选后重开新一轮谈判。

对于里根来说，他感觉会见可怕的葛罗米柯是克服了一个障碍。职业外交官、美国驻苏联大使阿瑟·哈特曼告诉我，里根会见葛罗米柯后，立即与他的同僚们会谈，哈特曼也参加了。里根看上去格外轻松：与葛罗米柯的会晤结束了。总统开玩笑地说，与美国的顽敌、令人信服的苏联卫士葛罗米柯的辩论要比与蒙代尔辩论难多了。哈特曼的印象是里根为通过了“葛罗米柯的考试”而感到满意。这次考试增强了他的自信心。

里根进行了全面总结,他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相信苏美关系会回到弗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是天真的幻想。两国对相互的社会制度的看法不可调和,这是两国将继续对抗下去的部分原因。但是里根所得到的印象是,苏联的确渴望达成协议,以缓和军备竞赛,并认为11月后这种机会将会出现。

哈特曼说,看来一旦里根当选,里根会对裁军问题投入更大精力。而他迄今一直是坚持通过增加新的军事计划来维护美国安全这一模式的。但是现在他愈来愈认为美国安全利益最好是通过执行新的军事计划与同苏达成的军控协议相结合来予以实现。而迄今为止里根忽视了这一政策的后半部分,因为他深深地陷在执行前半部分之中。当然,他现在还有机会向后半部分努力,尽管存有任何幻想都是错误的。

就在大选前,副总统布什在家中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晚宴,从那里我得到了更多的有关消息。他对获胜充满信心,他漠视华盛顿最新的传说,即里根在大选获胜几年后可能会为布什而自愿隐退。布什对此开心地大笑说,我应该期待里根自愿隐退前华盛顿发生一场地震,里根太热衷于当总统和他所拥有的权利了。里根在竞选演说中表明赞成与苏联发展较好的关系,并提及签署军控协议的可能性,我想了解他演说背后的意图。布什回答说,里根的确诚心诚意地信奉他所说的话,但要被问及他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以及如何付诸实施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白宫尚未酝酿任何实际的步骤。

外层(内层)空间的新气氛

里根最钟爱的计划——战略防御计划——使对里根政府的真正意图的试验失败了。战略防御计划是里根政府最后着手谈判的目标,而且只有在大选后并在证明条件接近的前提下才这样做。大选开始前的夏天,莫斯科和华盛顿已就宇宙空间军事化问题进行

559 了长时间的讨论。里根和葛罗米柯已就战略防御计划交换了10封私人信件,他们商谈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事实的确如此。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问题专家、后来成为美驻苏大使的杰克·马特洛克对我说,里根对与苏联谈判瞻前顾后。主要的障碍是,如果在核查问题上失败了的话,他不愿意成为替罪羊。

在一定的時候,星球大战会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华盛顿也不可能抗拒。外交斗争围绕着会谈的确切名称展开,我们建议叫做“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的谈判”,华盛顿则不接受“防止”一词。这已远远超过了外交上的吹毛求疵或语义上的辩论,因为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是指谈判要达到禁止战略计划的结果。莫斯科不同意收回其用词,因为最后的可能是通过控制的过程而实现空间军备竞赛合法化。

9月初,美国方面宣布对将在日内瓦举行的“外层空间军备控制谈判”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美国建议讨论削减核武器及核查的可能性问题。美方的第一个建议仍指的是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的可能性,因为这样一来实质上把问题降低到了控制手段的问题。第二个建议的目的是要在欧洲部署潘兴导弹后征服苏联对战略武器谈判的拒绝。里根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上详细地阐明了这一观点,这样做实际上是公开表明他愿意重开苏联突然中止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回顾往事,美国在外交上坚持尽可能减少战略武器的数量这一点是值得信任的。1993年这一目标终于得以实现,但在1984年白宫则需要那个建议来表示其裁军政策和它准备重开会谈的姿态,同时把球坚决地踢给了苏联一方。莫斯科决定等到总统大选之后再說。11月中旬政治局同意就“核与空间武器”问题重开新的谈判,这是苏联喜欢的名词。但这一决定并未因里根以压倒优势再次当选而加速进程。里根的再次当选归功于其内外政策。政治局指示葛罗米柯尽力从舒尔茨处得到较好的筹码。

美国政府内部就战略防御计划展开了一场公开辩论。主要的

批评是，在战略防御计划发展成为向外空发射导弹前，苏美两国关系和战略平衡可能已被破坏了。无论如何，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可行性表示怀疑。内部辩论是在舒尔茨和温伯格之间引人注目而激烈地进行的。在政府和商界中以前的一些亲近的同事们在许多事情上均持不同意见。就在里根再次当选后，事情竟然发展到舒尔茨私下要求总统在他与温伯格之间进行选择的地步。

然而，里根拿不定主意，说他们两个他都需要。就思想意识和个人关系而言，他与温伯格更为亲近，并常常采纳他的意见。但大选后，他想加速与莫斯科的接触和谈判，特别是在核武器控制问题上，这样对他来说，舒尔茨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新上任的、更加固执己见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伦接替了善于思索的威廉·克拉克。麦克法伦私下告诉我，大选后舒尔茨开始彻底地研究裁军问题；此前，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肤浅。因此舒尔茨井井有条地开始为同葛罗米柯的谈判作准备工作。

11月23日，苏联和美国宣布，葛罗米柯和舒尔茨拟于1985年1月7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新一轮军备控制谈判，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欧洲中程导弹和外层空间武器问题，他们将为未来的会谈制定具体的日程。

当我与舒尔茨再次见面时，他看上去对会谈的可能性相当乐观。好事多磨。他将要去戴维营，里根要在那儿会见撒切尔夫人。他们盼望倾听她关于最近在伦敦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情况通报。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的台阶上赞扬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新的政治人物，称他是位可以“打交道”的人。她公开称赞一位苏联官员是前所未有的事。那些顽固的美国反共分子的好奇心油然而生。舒尔茨面带微笑，惊讶地大声说道：“他究竟凭什么迷住了这位铁娘子？”

或许我应该告诉他其中的原因。我第一次见到戈尔巴乔夫是去年夏天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在政治局汇报，实际上没有任何人问我超出平常的事，提问都不外乎：事情进展如何？但

戈尔巴乔夫却缠着我问问题。大约二三十个问题吧。他阅读了所能找到的一切有关美国的书。他想了解的东西太多了。

561 当我从舒尔茨的办公室走出来时，我碰见了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西蒙斯。他告诉我美国为日内瓦会晤作准备的态度达不到苏方所期望的程度。美国方面的态度在于强调战略防御武器，而把外层空间问题放在次要的位置。此外，国务院对于五角大楼的外层空间计划了解得太少。舒尔茨按其有条不紊的方式，曾要求五角大楼就战略防御武器作简要介绍，但未能如愿。西蒙斯告诉我，莱斯利·亚伯拉罕森中将就该计划作了简介，他是星球大战计划的主任。通过听取简况介绍，舒尔茨认识到中将只是概括地讲的，如果有新闻记者采访的话，他也可以用这些材料对付他们。

舒尔茨说：“我想了解详细情况。”他向中将询问了几个特殊问题。对舒尔茨的到来，亚伯拉罕森丝毫没有感到窘迫，他问他的助手，国务卿想了解绝密材料，他是否经过安全检查了。舒尔茨很生气。由此可见，美国军方能提供给他们的高级外交官的秘密也不比我们的将军向我们的高级外交官所提供的秘密多。

在莫斯科，政治局召开了特别会议，为赴日内瓦的葛罗米柯制定指导细则。他得到了明确的指示，要求他尽可能在禁止外层空间武器方面争取明确的承诺，并要将此问题和核武器谈判联系起来。所有这些的目的是使美国没有可能回避讨论空间武器问题，因为美国显然只想讨论削减战略核武器问题。戈尔巴乔夫主持了政治局会议。由于契尔年科的身体越来越坏，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的次数日益增多。里根顽固地坚持战略防御计划，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他苏联领导人深知要不惜代价挫败里根的企图。这种两个敌对的、但又互不相让的国家间的冲突一直主导着以后几年的安全谈判，两位领导人感情用事又使问题扩大了。

舒尔茨带着不同且不明确的指示前往日内瓦。他是在与温伯格发生纠纷后从里根处得到这些指示的，温伯格坚决反对与葛罗

米柯就空间武器举行任何会晤。(当时战略武器计划是五角大楼发展最快的计划)。舒尔茨的理由是不举行星球大战会谈,整个日内瓦会谈就毫无意义,因此他将此事报告了总统。里根就像所罗门一样解决争端。他说,开始与苏联讨论这个问题没错,但是舒尔茨应该“什么都不屈服”地进行。

在日内瓦会谈时,舒尔茨不同意将会谈局限于空间武器和里根战略防御计划的方案,他反对将空间武器与核武器会谈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使他与葛罗米柯的讨论进行得非常困难,特别是最后的公报措辞更是如此。我目睹了此事的全过程。我可以说,葛罗米柯在执行政治局的指示时表现出令人敬慕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他们达成了妥协。联合公报说,谈判人员分为三组来讨论复杂的空间武器与核武器诸多问题,即战略与中程导弹问题,以便于在“相互关系”中解决这些问题……,制定出有效的协议的目的在于防止空间军备竞赛、中止陆地军备竞赛,在于限制、削减核武器,在于加强战略稳定”。

562

尽管这一声明都是些费解的赘语,但还是宣布了苏美之间新一轮谈判的开始,三个关键性小组开始讨论欧洲核武器及空间武器——战略武器、中导和星球大战武器问题。诚然,美国方面后来的确试图为自身利益要修改措辞。但是,谈判的确展开了。

大选后,两国关系的公开气氛开始明朗。12月初,我宴请了埃德加·布朗福曼,他是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并且是一位著名的商人。他指出,犹太人和黑人是仅有的两个投里根反对票的少数民族派别。他说,他代表美国犹太人中的温和派,他试图采取现实态度对待苏美关系,不希望犹太人成为新的冷战的人质。他说,大多数美国犹太人认为,在核时代,他们的生存意味着首先阻止苏美之间的核战争,这一点使他们有兴趣支持缓和。世界犹太人大会领导人准备反对军备竞赛,支持缓和,与苏联改善关系,并密切与犹太社团的关系。布朗福曼还表示打算以食品、化学品和采油工业商人的

身份访问苏联。我们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我帮助他安排了他的苏联之行。

经济关系也开始恢复。苏美贸易和经济委员会美方主席德怀恩·安德烈亚斯在此后的一周访问了我。他对我讲了他的莫斯科之行及会见葛罗米柯的情况。他确信苏联准备发展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并准备提请政府对此加以重视。我愿公正地对安德烈亚斯做出评价，他是一位坚定的改善两国关系的维护者，他博得了政治与经济领导人的尊敬。他以坚定的信心和高效率，在私下作了大量工作。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我们两家人现在仍保持联系。

563 几天后，阿曼德·哈默来拜访我。他满怀热情地告诉我，在克里姆林宫他受到了盛情款待，并同契尔年科进行了长谈。里根政府对他的苏联之行很感兴趣，总统把他请去并让他谈谈会见的情况。哈默请我告诉契尔年科，他正在试图获得美国政府出口海上石油钻井设备的许可证，因为这种设备可在北极地区运行，但是禁止向苏联出口。他曾成功地得到了出口煤炭输送设备的特别豁免许可，然而要得到石油钻井出口的许可就困难得多了。但是显然他得到了去见里根的邀请，同以往一样他将从最高层开始突破。

这一新的、减轻对抗的气氛说明了什么呢？就在圣诞前夕，我与麦克法伦一起吃饭，讨论对新的一年的展望。尽管我欢迎这种变化，但莫斯科仍不能肯定这种气氛是不是仅仅为选举而营造的。

麦克法伦的估计是：里根相信他已经完成了他作为总统的基本工作，即重新挖掘美国军事力量的潜力。他将继续支持军方，但现在他相信此时正是逐步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以达成削减核武器协议的大好时机。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没有改变，他坚信自由企业是发展国家潜力的最好途径，但他不再对此公开辩论。麦克法伦说，他的首要任务是减少核战争的威胁，因此1985年他首先寻求与苏联达成核协议的可能性。

我面露疑色，但是麦克法伦评论说，总统对苏联的观点上正在经历着演变，尽管这一进程对那些与他无日常工作关系的人来说是不明显的。

第三十一章

冷战结束的开端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意味着什么

1985年11月的日内瓦最高级会谈是近六年来苏联和美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可能会被作为结束冷战的开端而载入史册。虽然美国政府并未就放弃它的基本原则作出暗示，然而里根对苏联的看法已经出现了变化。他开始放弃无条件对抗，并表示了走向谈判的现实主义的意向。这一变化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

华盛顿首先强烈地以为日内瓦会晤是扩军的成果，因而亦是对其强硬外交的认同。然而里根赤裸裸的扩军和外交对峙政策并未带来所期望的结果。它的基本作用在于在美国国内和总统本人的思想上重建自信力。打算用新武器来迫使苏联放弃其国家利益或将其用来毁灭苏联从来都是不现实的，那只是总统自圆其说，有时有人认为有道理而已。实际上是国内外双重压力打破了里根的战略。在国外，美国受到来自盟国的压力，要求它恢复与苏联的对话。在国内，美国人民对苏美关系的危险状态的关注变得日益不容忽视，这一点在民意测验中显而易见。此外，不论美国政府的军事计划效果如何，其影响已达到了最高点，因为它进展比较顺利，或者说已接近成功地完成。假如要达到另一个更具威胁的高峰的话，那需要五角大楼的军备规划者们再次付出巨大的努力。

战略防御计划受到军火工业集团的欢迎，同时作为改变战略

平衡使之变为有利于美国的工具,并迫使苏联无限支出直至破产的战术,也赢得了美国右翼的支持。总之,这一技术幻想的任何最终军事效果都似乎可取。起初,戈尔巴乔夫差点儿上了圈套,他把战略防御计划当做首要外交和公开攻击的目标,并搞出了一个花费小的苏联方面的对应计划,但他的主要目标都始终如一,那就是通过外交谈判扼杀或瓦解星球大战。

苏联的变化过程也并非易事。康斯坦丁·契尔年科逝世于1985年3月10日,在此之前,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们一直奉行老一套的外交政策。虽然戈尔巴乔夫已开始谨慎地思考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应变对抗为公务式关系的必要性,但他起初被迫步步谨慎小心,同时在政治局和支持继续对抗的最高层,他尚需时间以巩固他的权力地位。而且他根本不知道里根下一步又会耍什么新花样,直到11月最高级会谈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总统的这种无法预知性都在政治局思想上占统治地位,这使戈尔巴乔夫的处境更为复杂化。

戈尔巴乔夫控制苏联外交以后,它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具活力,而且为日内瓦最高级会谈发生的转变铺平了道路。戈尔巴乔夫晓得如何利用里根提供的开端进行宣传,而紧随其后制定新的重大计划来阻止军备竞赛。当然,在所有层次上与该政府进行频繁接触亦同样重要。这包括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的私人信件往来、戈尔巴乔夫新的、自负的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与国务卿和总统的会见与通信联系等,这些积极的工作联系均是通过曾几乎被彻底掐断的外交途径进行的。

华盛顿决定同戈尔巴乔夫打交道

自从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层的一颗上升的明星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时,美国政府就表示出了对他的不断增长的兴趣。1985年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恢复裁军会谈的会晤中,舒尔茨(经里

根批准)私下告诉葛罗米柯,即使戈尔巴乔夫尚未担任总书记,如果他希望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他将受到里根和舒尔茨的接待。葛罗米柯很嫉妒,但也未费心再去掩饰他对美国动议的不快。这个政治局的老卫士对戈尔巴乔夫产生了疑心。舒尔茨到此为止未再谈下去。在外交政策的执行上,葛罗米柯得到了契尔年科的全面授权,他对此毫无兴趣。1985年初,契尔年科将从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葛罗米柯将作为国家主席填补主要是礼宾职能的这一位置,同时继续担任外交部长。这意味着他又加强了权威。契尔年科将继续保留在党内的最高领导位子上。然而他的逝世改变了所有的计划。

3月11日,契尔年科逝世次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共产党总书记。这位老卫士对于任命了一位年仅54岁这样年轻而精力充沛的人,而他本人却未能成为候选人一事很不高兴。葛罗米柯在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突然提名戈尔巴乔夫,用赌赢马的方式来极大地削弱反对派,这是他毕生的一贯做法。然而,短短的六个月时间,戈尔巴乔夫就因葛罗米柯思想僵化而炒了他这个外交部长的鱿鱼,把他踢上了一个台阶。他终于得到了元首的职位,但不再负责外交部。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虽然对缺乏动力和广阔的战略回旋余地不满意,但他也没有明确的外交政策。里根在公众场合表现出的不妥协的反共立场使戈尔巴乔夫难于迅速制定新的对外政策。

就在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当天,我们收到了他可能期望里根政府发出的第一个暗示。舒尔茨3月11日到使馆悼念契尔年科,他在里根总统与我私下会谈前20分钟到达。舒尔茨告诉我,他在这之前在白宫见了总统,当时麦克法伦和新任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甘也在场。总统总结时说,苏美关系出现了新形势和新机遇,尽管结果不得而知,但如果不加以利用将是不可原谅的。当总统刚刚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时,一位新的苏联领导人开始掌权,他的所有表现证明他将来有能力主宰外交与内政。因此与莫斯科的

关系在总统的议事日程上列在优先考虑的重要位置。里根又补充说,已开始的日内瓦军备控制会谈的结果将是关键。

567 因此里根从一开始就打算开展最高级别的对话,基于这一目标,总统决定给戈尔巴乔夫写信。信将由即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契尔年科葬礼的布什副总统转交。信中的内容包括邀请新任总书记访问美国。不用说,戈尔巴乔夫将作为最高级的客人受到美国政府和总统本人的接待,而且白宫将就其所便,按他选择的日程安排他访问美国。舒尔茨还说,是“轮”到苏联领导人访问美国了,不过,如果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原因感到一时不能离开苏联,希望邀请美国总统先访苏的话,里根将会理解。

总统到了以后,并没有与我提到上述问题,但是我注意到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他这是第三次来使馆出席吊唁活动。“可是”,他说道,“我希望下次为愉快的事来使馆。”他并要我代他转达他本人对戈尔巴乔夫的问候。

从舒尔茨那里得到的消息当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戈尔巴乔夫也一样。里根担任总统以来,这还是首次选择通过他那位颇具个性的国务卿公开表达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愿望。戈尔巴乔夫立即注意到华盛顿的信号不同寻常,更令他感到特别的是,这正中他的下怀。

次日,麦克法伦来使馆吊唁时又重复了舒尔茨转达的信息。他强调,总统希望戈尔巴乔夫别推迟会面,以便能在首次最高级会谈时“相互认识”。最高级会谈的前景以及它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程度,可以从麦克法伦不同寻常的表白中看出,如果会谈能在那时举行,国会很可能不会批准 MX 导弹几十亿的经费,这是因为会谈将是两国关系得以改善的转折。他还表示,由于总统本人将更多地直接参与美苏往来,因此重新开通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渠道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这真是新闻。

3月13日早10时,戈尔巴乔夫在庄严的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布

什,葛罗米柯和舒尔茨参加了会见。他们的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戈尔巴乔夫郑重确认如果华盛顿持同样的态度,苏联已准备促成与华盛顿的良好关系。布什转达了里根对戈尔巴乔夫访美的邀请,戈尔巴乔夫对此表示感谢,但并未给予十分肯定的答复,这是因为这种事须经政治局讨论决定,而他却把注意力集中在核武器和空间武器会谈的议题上,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这一会谈刚刚在日内瓦展开,而且尚未看到什么希望。

“美国是否真的希望会谈取得成果呢?还是要利用它来完成再次扩军计划呢?”戈尔巴乔夫直率地问道。他强调说,苏联从来没有与美国开战的计划,现在也没有这种企图。“苏联领导层中从没有这样的疯子,”他说。他宣称,苏联人民不接受任何人指教他们应如何生活,他们也不会对任何人这样做。“让历史去验证这一判断吧”,他说。

568

双方都对这次坦率而有生气的会谈很满意,并坚信这样的对话有必要继续进行,虽然会谈并没有提出什么新思路,而且不时还会提出一些相对立的想法。“戈尔巴乔夫与我所见过的任何苏联领导人都有根本上的不同。”舒尔茨过后这样告知新闻界。

3月15日清晨,舒尔茨给我打了电话。他几小时以前刚从莫斯科返回,现在正在去向总统汇报的途中。他证实戈尔巴乔夫的坦率、专长和改善苏美关系的明确态度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将向总统汇报所有这一切。第二天在国务院为外交使团举行的年度招待会上,舒尔茨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里根让他根据会谈的情况描述一下戈尔巴乔夫是怎样的一个人,并同其他世界名人作个比较。舒尔茨告诉我,他给戈尔巴乔夫打了高分,认为他是位胜任且能干的领导人,毫无疑问,他的外交政策目标很明确,并决心不遗余力地付诸实施。

总统请舒尔茨列出几个实质性问题,以便向美国和苏联舆论交代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的必要性(舒尔茨说:“总统不甘心错过这个机会”)。舒尔茨建议恢复俄航的飞行,在纽约和基辅互设领事

馆，签订文化交流、交通、能源和环境协议。里根说考虑到过去四年来的紧张状态，这些已为首次会晤提供了足够的基础。我问舒尔茨，为什么控制陆地和外空军备竞赛等重要问题未列入议程，他回答说，这些当然可以讨论，但在首次最高级会谈中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很渺茫。这一切听上去好像是认真的许诺。

接着，我又听到了副总统布什的赞扬之词。那是3月19日在白宫草坪上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当时我是作为外交使团团长出席那次活动的。布什说，里根期待戈尔巴乔夫对邀请他举行最高级会谈做出答复，然而就在前一天访问加拿大时，里根抑制不住的反苏情绪再次在他的讲话中出现。我直率地告诉布什，听到总统的正式讲话，似乎远不能使人相信总统渴望举行最高级会谈，看来他是口头上而不是从心底里赞同会谈。

布什耸耸肩，表示反对夸大总统的言词，认为那是他不经意讲的。布什说：“里根还是里根。”这一点不假，仪式开始后，总统在他的欢迎辞中再次攻击“马列主义者”和他们在中美洲的阴谋、尼加拉瓜桑迪密斯塔政府以及苏联和古巴对他们的支持。

然而，尽管冷战还在兜圈子——温伯格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苏联警卫在东德枪杀一个美国联络官的悲剧，这一事件激怒了美国公众舆论——政府似乎朝着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方向行事。4月31日，我与鲍勃·多尔参议员谈了一次话。多尔是一位有影响的共和党领袖，他的印象是白宫越来越相信迟早会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多尔认为那将是大大地得分，因为这意味着里根周围的极端右翼分子鼓吹的政策破产。在最高级会谈时，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将表明里根承认他在首届任期内奉行的对抗政策不可行，必须进行调整。因此多尔认为，最高级会谈对下一届总统竞选有十分重要的潜在意义，因为他将削弱国内好战的极端保守主义浪潮。这一番表白出自这样一位机智而又观念相当保守者之口，令我尤为欣赏。

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最高级会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戈尔巴

乔夫不同意前苏联领导人这样的观点，即会谈必须达成协议才算成功。

“如果你们定这条规矩，”戈尔巴乔夫告诉他的政治局同事们，最高级会谈就不可能在两三年内举行，也许根本就不可能举行，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需要举行最高级会谈来了解里根以及他的计划，最重要的是与美国总统进行私人对话。”

葛罗米柯对他的观点并不感兴趣，但是外交部长向新任而又能干的总书记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太合适。戈尔巴乔夫建立了与里根的通信往来，在信中赞同举行最高级会谈，而没有提什么不同的观点。戈尔巴乔夫敦促认真行事，并说，最高级会谈不必非得达成什么重要文件；重要的是在平等和相互权益的基础上达成相互谅解。这标志着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脱离了克里姆林宫过去的立场。这正是里根和舒尔茨所希望的。4月18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公开宣布支持举行最高级会谈。这得到了苏联人民的赞许。

570

在我回莫斯科出席中央全会之前，舒尔茨邀我一起讨论他正在为里根起草的复信。他保证这将与戈尔巴乔夫的信一样具有建设性意义。里根没有坚持签什么协议，但建议在日内瓦会谈、斯德哥尔摩会议、防止核武器扩散、维也纳中欧裁军会谈和控制化学武器等问题上以认真态度对待我们之间的分歧、地区问题的合作及其他机遇。这封信写的很高明，它认真而又富有批评性地分析了我们的立场，同时施加了压力。戈尔巴乔夫虽然正在寻求新的途径，但他还未就基本行动作出准备，这是因为在制定他自己的外交路线并得到政治局批准之前，他得被迫继续执行经葛罗米柯反复推敲的外交路线。

戈尔巴乔夫论苏联的外交政策

4月23日，戈尔巴乔夫照常攻击里根加剧世界紧张局势的外交政策，同时表示希望里根作出转变，以便为他与总统的会见铺平道

路。他在邀请我私下谈话时反映出他本人既持有传统观念，同时又对我们的教条主义方法极不信任以及采取灵活性的潜力。这是我第一次与作为总书记的他进行私下的、非正式的谈话。他的举止朴实而自然，他自然而然地谈出了他对苏美关系的看法，并问了许多问题。他对有关美国的每一细节都感兴趣。

戈尔巴乔夫的两个思想比较突出，而且对于一位苏联领导人来说，这些思想也并不那么新鲜。首先他坚信我们不能靠武器的威力来取得战胜“帝国主义”的胜利，同时不结束军备竞赛也无法解决我们的国内问题，再者我们必须想办法最大限度地把美国军队从西欧撵出去，而达此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减轻世界紧张局势，并一步一步地从欧洲撤出苏美军队。对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越洋返回家园，而对我们而言，撤退仅仅是回到几百公里外我们的边界内，这样欧洲国家依然明显地感到这些军队的存在。这是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方面最初的一些想法。

571 关于美国，他告诉我说，我们应尽力解除两国关系中的敌对性，避免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吵，集中精力使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正常化并加以发展。作为大使，我必须遵循这种方针，首要任务就是安排与里根的最高级会谈。他强调这是他个人的指示，对于我来说，这犹如数年大雾中的一缕清新的空气。

戈尔巴乔夫非常渴望了解里根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并不怀疑里根的反苏倾向，但总统是愿意听人劝，还是毫无希望的人呢？他是一个反共狂还是实用主义者呢？是可以与其达成某些协议，还是不值得一试呢？

我告诉他，我们所看到的里根，在其第一个任期中是敌对的，这次发出的实用主义信息是在过去一年第一次出现，尽管表现出与苏联建立最高级联系是含糊、兴趣不稳定的姿态。这是否仅仅是以他独特的方式，像尼克松一样，在对苏关系上经历着同样的演变呢？我本人的经验表明，与里根有可能理智地谈谈。“但是”，我提醒戈尔巴乔夫，“里根从未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任何一次会晤，只是

与葛罗米柯会见过，而葛罗米柯本身又是一个特别的人。人们不得不设法与里根打交道。”

我强烈建议戈尔巴乔夫与里根见面。“不用说您不能保证好的结果，”我补充说，“但是就我们的双边关系而言，我认为我们赢得的将比我们失去的多得多”。

戈尔巴乔夫表示赞同。谈话中他并未掩饰他对葛罗米柯在苏联外交政策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特别是与美国有关的问题上的保守和教条策略的不快。他显然已决定撤换他，而且没有忘记葛罗米柯对他英国之行的批评。那时戈尔巴乔夫尚未当选总书记，在英国他是战后第一位引起真诚的友好反应的苏联领导人。葛罗米柯异常漫不经心地对一些老政治局同事们说，戈尔巴乔夫出尽了风头。同时，葛罗米柯斥责几个驻西方国家的苏联大使，其中包括我，不满意我们向莫斯科报回的那些西方对戈尔巴乔夫访问的积极反应。戈尔巴乔夫很快识破了这些伎俩，而且深深地印刻在脑海中。

应该提到的是，政治局委员们对外国有关他们的报道非常感兴趣。使馆报回西方新闻界有关他们出访和外国政要访问莫斯科的报道和评论，我们的塔斯社亦不例外地加以报道。这些报道经编辑后，必要时经删改后转发。然而要向政治局呈送全文，他们以阅读这些报道来衡量委员们出访或接待的成败。

572

担任总书记不久，戈尔巴乔夫从形式上改变了他的前任的习惯，开始将外交政策问题不只交由葛罗米柯处理，也交给中央委员会主管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鲍里斯·波诺马列夫处理。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欣赏波诺马列夫的工作，而是要葛罗米柯明白党的系统有自己的外交政策部门可以给总书记提供不同的观点并且被采纳。这种有意的怠慢表明葛罗米柯对外交政策的统治已接近尾声。

5月14日，正值奥地利庆祝战后独立25周年的节日期间，舒尔茨和葛罗米柯在维也纳举行了会晤，他们不但讨论了范围广泛的各种问题，而且重点讨论了关于核武器与空间武器的日内瓦会谈

问题。会谈长达六小时，内容很具体，但毫无成果。直到会谈末尾，大家心照不宣的最高级会谈议题才被提出讨论。谁都不愿首先提这个问题，以免显示他缺乏外交风度的热情。因此，两位外长玩了一场不必要的游戏。舒尔茨比葛罗米柯更沉得住气。

葛罗米柯从戈尔巴乔夫处得到讨论这一事宜的明确指示，他最后被迫提出会谈的地点和时间问题。戈尔巴乔夫建议11月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舒尔茨说，这次轮到苏联领导人到华盛顿来了。葛罗米柯不同意，建议在欧洲举行，因为戈尔巴乔夫上任才几个月，不愿去华盛顿，以免造成向里根献殷勤之嫌。

舒尔茨将此情况报告给里根，这引起了政府内部的争论。11月中举行会晤可以接受，但里根敦促戈尔巴乔夫在两首都之一举行会晤。他并承诺不再进行口头攻击并亲自参与协议的准备工作。

573 最高级会谈的安排逐渐有了眉目，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温伯格和政府、国会里的保守派人士攻击苏联没有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他们本身反对批准这一协议）。他们在支持美国扩充军备的同时，要求里根蔑视这一协议并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里根发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声明，表示只要苏联遵守协议条款，他不会放弃协议，但是为他自己保持了部署新型核潜艇的选择，而这种潜艇的导弹超出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范围。塔斯社随之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里根取消这一条约，那将造成严重后果，而且，事态会再次倒退成为一场严重的外交战。

6月17日，我与舒尔茨举行了会谈，终于使最高级会谈的安排逐步进入到最后阶段。会谈时麦克法伦和保罗·尼采也在场。舒尔茨说，总统不太情愿地接受了戈尔巴乔夫的在第三国举行会晤的动议，并建议选在日内瓦。然后，他宣读了一份文件。文件概述了美方的想法，表示美国准备放慢星球大战计划，交换条件是苏联同意大规模削减战略导弹的数量，这一想法的理由是只有苏联减少进攻型导弹力量，美国才可能有理由放慢战略防御计划，美国认为那是一个防御项目。这与其说是与我们的妥协，还不如说是美国政府

内部舒尔茨和温伯格之间达成的某种妥协，因为温伯格开始时拒绝接受对战略防御计划的任何限制。我们当然一直认为导弹力量的规模应摆到谈判桌上来。

然而，还有另一个建议对我们有吸引力。舒尔茨说，总统授权他与我秘密进行“广泛而富于哲理性的磋商”，讨论已在日内瓦谈判的关键的军备限制问题。两国外长7月下旬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下一轮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时，他和葛罗米柯还可以继续交换看法。

我向莫斯科建议接受这个磋商框架，因为这意味着这届政府对里根当选后开始对话是认真的，当然这在当时还有待证实。两个星期后，莫斯科接受了11月19日和20日在日内瓦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但拒绝了秘密磋商，赞成通过日内瓦军备谈判者们继续举行例行会谈。

舒尔茨说，我们的答复令人失望，但他并不知道这是葛罗米柯起草的。葛罗米柯拒绝支持恢复任何由基辛格和我发展的那种秘密个人谈判。他本人不喜欢这种形式，因为这将降低他本人的作用。他使戈尔巴乔夫相信这种富有哲理性的磋商的结果是把我们引入旷日持久的谈判——使我们同意就里根的得意计划进行谈判，最终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引向星球大战。

转折的开始

574

在两国首都于7月上旬宣布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消息时，莫斯科又发表了一条引起全世界每个角落关注的新闻：葛罗米柯被解除了外交部的工作。但由于他协助了戈尔巴乔夫当选，他才没有被迫退休——三年后他才退休——而被推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从形式上讲，这是国家的最高职位，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大政治影响力，基本是礼仪性职务。戈尔巴乔夫在与美国举行首次认真对话的前夕，摆脱了一个令他头痛而不喜欢的部长，因为他的存在和他的权力阻碍了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外交政策方面注入新思维。

葛罗米柯在位近30年以后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我个人的长期经验而言,我能证明在他那严厉而冷峻的外表背后藏着一颗善良的心。他待人诚恳、工作勤奋,表现出了高超的专业能力。尽管他有各种缺点,但还是赢得了他的同事和外国对手们的尊敬。就他个人而言,葛罗米柯证明了他所处时代的政策的正确性,并在执行中表现了少有的坚韧、天才和技巧。他最优先的目标就是捍卫他认为是国家利益的东西,而首当其冲的是捍卫我们在那场打败纳粹德国的残酷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作为斯大林的门徒,虽然他是一个诚实而正派的人,但他不太重视外交政策中如人权这样的伦理问题。他不相信这样的抽象命题在政策上或在影响早日与西方达成基本协议的可能性上会成为重要因素。

他在谈判中不屈不挠而又呆板的作风具有传奇性。即使手中有经政治局批准的让步方案,他也得等到他的对手要中止谈判离席而去时才妥协。有时他的这一做法实在过分,以至于太缺乏灵活性,使其在最后的分析中来不及表示他的决心而造成谈判失败。他在与基辛格和万斯谈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时平空失去了几次达成协议的机会。尽管如此,在政治局中,葛罗米柯不管是在常规武器或是核军备方面都是裁军谈判的主要发起者。

575 葛罗米柯并未支持过不必要的和危险的对抗,特别是与美国的对抗,他与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威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出色的苏联冷战斗士,特别是在他认为我们的利益遭受到威胁时。他是党的负责的党员,忠实捍卫共产主义思想,并相信其最终会取得胜利。所有这些都深深地扎根在他的思想里和行动的准则中。然而,当世界的新发展和迅速变革要求新的认识时,他逐渐变成了他多年负责的苏联外交的障碍。他后来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在内心深处十分痛苦,但他知道他已无法改变自己了。

因思维陈旧而下台的当然不只是葛罗米柯一个人。鲍里斯·波诺马列夫是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传统上由他起草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局报告中外交政策部分的内容。1986年初起

草提交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时,修改委员会批评外交政策部分未能反应新精神,又陷入了过去的陈旧的思想。波诺马列夫气愤地回答说:“什么是新思维?我们的思想是正确的,让美国人去改变他们的思想吧。戈尔巴乔夫在国外的言论完全替他们、替西方说话!”

在选择葛罗米柯的接班人时,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苏联和许多西方国家的旧传统,没有选择外交官,而是选择了一位政治家。政治局委员们告诉我戈尔巴乔夫曾提出我和葛罗米柯的副手科尔尼延科是不错的选择。但后来他告诉政治局,外交政策应该由党来直接控制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由党的领导层的一员来担任这一工作的原因。

但他称之为党的领导人的并不意味着来自克里姆林宫,恰恰相反,使人们大吃一惊的是,他提名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担任这一职务。并令政治局委员惊讶地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谢瓦尔德纳泽从未在莫斯科任过什么职,他一直在格鲁吉亚供职。另外他没有任何外交经验。戈尔巴乔夫并不看重这些东西,他说:“他将边干边学。”他认为重要的是要一位站在他一边的精明的人,而且要求他不受旧政策陈规旧套的困扰,准备将戈氏的计划付诸实践。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里也需要一位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当时他的外交政策新思维在政治局里并不是得到一致赞同的。

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依靠谢瓦尔德纳泽。他们是老相识。早在25年前他们即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事,后来在苏联南部的比邻大区任党的书记时成了朋友。当时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谢瓦尔德纳泽在格鲁吉亚。谢瓦尔德纳泽在克里姆林宫领导层中没有什么他自己的关系,这正中戈尔巴乔夫下怀,因为由一个外来人担任新的外交部长的职位有助于保证他对总书记的忠贞不二。

576

他们在工作中密切配合。不久,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两驾马车就彻底掌握了国家外交政策的决定权,逐渐地把其他政治局委员们推向了幕后,而且集体的意见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在

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的最后阶段尤为显而易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谢瓦尔德纳泽辞职。然而这两驾活跃的马车的行动并不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些行动明显缺乏长远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谢瓦尔德纳泽急于紧跟戈尔巴乔夫的仓促举措,不经外交部外交专家的出谋划策便仓促达成协议。

在撤销葛罗米柯——他担任政治局委员直到1988年退休——外交部长职务的中央全会上又选举了两位新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第一书记鲍里斯·叶利钦负责建设事务,列夫·沙可夫主管国防工业。沙可夫后来成了负责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谈判的政治局三驾马车的头儿。另外两位委员是谢瓦尔德纳泽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他们代表两个部在军备政策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竞争(正像华盛顿一样)。沙可夫和他的接班人迪米特里亚佐夫受戈尔巴乔夫指示协调两个部门的立场,促使他们达成妥协。

我第一次见到谢瓦尔德纳泽是在莫斯科休暑假时,那时他已经是部长了。他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详细地询问了美国的情况,并对两国关系兴趣颇浓。我注意到他对问题本身并不那么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通过妥协找到解决它们的办法,我似乎发现与葛罗米柯相比,同他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而葛罗米柯长期形成的观点是难于改变的。我也喜欢谢瓦尔德纳泽毫不掩饰他缺乏外交经验的作风,他毫不顾及他部长的身份,随意地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谢瓦尔德纳泽建议我陪他去出席7月末举行的外长会晤,以便协助他完成在国际上的外交亮相。这次会晤正值赫尔辛基最后协议达成10周年。我当然同意。他对舒尔茨在那里发表的关于苏联人权的谈话的调门很惊讶,他认为这已超出了一般的敌意。谢瓦尔德纳泽更富于调和精神,当他在赫尔辛基见到舒尔茨后,他问他的美国对手,“你是不是非得发表那样一个讲话呢”。

577 舒尔茨看起来自鸣得意,对他的讲话在美国受到舆论的广泛

报道感到相当满意。但是谢瓦尔德纳泽明确意识到，国务卿这样的公开讲话使得他和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里对里根政府采取更灵活的新举措变得更困难了。舒尔茨似乎对如何评判戈尔巴乔夫关于莫斯科宣布的自8月6日起停止苏联所有的核试验的决定感兴趣。国务卿公开反驳说，除非核武器试验受到控制，否则无法知道苏联是否遵守诺言。莫斯科生气地反击道，停止核试验比对核试验进行监测要强得多。

这次私下会晤主要是为戈尔巴乔夫—里根最高级会谈做准备，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没能在造成两国分歧的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但会谈气氛显然比类似与葛罗米柯的会晤要友好得多。谢瓦尔德纳泽欣赏舒尔茨的专业水平和与他的个人关系。会晤结束时，谢瓦尔德纳泽对我表示感谢，并说外交部的许多高级外交官对他很冷淡，不像我那样帮助他。

通向最高级会谈的坎坷之路

我一回到华盛顿便于9月10日拜会了舒尔茨，讨论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基本问题是美国政府，特别是里根在总体上对最高级会谈没有一个明确的设想，如会谈日程、可能取得的结果事先都没考虑。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各持己见，如果说前者希望达成某些协议、或起码取得一个积极的结果的话，那么后者对此则毫无兴趣。温伯格的追随者拼命阻止总统在他们认为他一直极力坚持的原则问题上，首先是在战略防御计划上做出让步。

很显然，里根和里根夫人关心的首先是最高级会谈的气氛，而不是会谈的基本问题，这使得我们的准备工作一直忙到抵达日内瓦的最后一刻。舒尔茨告诉我，总统不愿在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团“消过毒”的地方举行宴会，而是喜欢在阿加·卡恩的别墅进行轻松的谈话。在华盛顿，舒尔茨给我一封南希·里根写给赖沙·戈尔巴乔娃的信，信中表示了她愿尽早会面的希望和“我们这些夫人”

渴望尽最大努力改善苏美人民间的关系的信心。

578 然而,在实质性问题我却未得到答复。舒尔茨说,政府甚至没有准备去讨论发表核不扩散联合声明问题,可这个建议是他们美国人自己提出来的。很显然,国务院仍在等待来自白宫的对最高级会谈的指示。罗伯特·伯德参议员向我通报了在战略防御武器计划的主要问题让步,以换取大幅度削减战略导弹问题上的内部斗争情况。持强硬路线的人反对签订任何协议,从而把会谈降低成了一场宣传战,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已得分较多,而里根现在要尽其最大努力赶上去。

9月16日,我和舒尔茨又举行了一次会晤,他坚持认为总统争取使最高级会谈获得成功的态度是认真的。但他也承认,美国领导人对会谈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没有把握。坦率地说,他本人的迟钝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外长们应该在最高级会谈准备工作中起主导作用,起码以前总是如此,但我完全没有认识到他的双手被总统周围的斗争所束缚着。

哈特曼大使从莫斯科赶回来进行磋商,他告诉我里根愿意对裁军问题予以一定的关注,同时也想强调在一方有利益的地区需要相互克制,这是理查德·尼克松一贯倡导的战略。但哈特曼还告诉我一些里根的准备情况,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距举行最高级会谈只剩两个月尚无丝毫进展的原因。为了与时代并进,里根在研究历史,以更好地理解“俄国人的思想”和对苏联及其政策背后的动机有较完整的认识。他几乎每天翻阅关于苏联的有插图的小册子——他对大厚本的书不屑一顾。他阅读为他准备的官方摘要,但他更喜欢曾在苏联生活过的人的口头讲述的传说、故事,特别是那些见过苏联领导的人所撰写的传记式的故事。哈特曼顺便说,里根对选来给他讲故事的人或许是半信半疑的,但那是总统的事;在这些人当中有定居在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舒尔茨犹豫不决时,温伯格却不失时机地开始兜售星球大战计划。他说服里根采取了另一个步骤。9月23日,白宫宣布组建美

国武装部队的联合空间指挥部。所有这些引起了莫斯科的恼怒。谢瓦尔德纳泽在联合国宣称,国际关系中出现危机的一切责任均归于美方。

但戈尔巴乔夫无意致力于与里根进行毫无结果的争论,他更乐于坚持外交上的主动。9月27日,他请谢瓦尔德纳泽向白宫递交了苏联对最高级会谈以及对正在日内瓦进行的核武器与空间武器谈判的新建议。首先,他正式建议削减一半射程达对方领土的远程核导弹,以此作为彻底禁止外空武器的交换;这将意味着削减6000个核弹头。然而他又建议分别就在欧洲的、准确地说是在英国和法国的中程核导弹问题进行谈判。与此同时,苏联限定了在欧洲用于战斗警戒的SS-20导弹的最高数额,及挖出并消除已废弃的SS-4和SS-5导弹。戈尔巴乔夫说,欧洲有权等待美国做出友善的反应。

苏联的建议旨在达成妥协,它们使美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境地。10月4日,一位白宫发言人气愤地说,美国不会公开作出反应。第二天,温伯格再次固执地证实,美国政府不会与苏联谈判战略防御计划。舒尔茨对此不予公开评论。

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使美国政府重新产生分歧。舒尔茨看出舆论有利于苏联,因此建议美国作出反应,因为苏联战略力量的大幅度削减会遏制美国今后部署导弹。温伯格和五角大楼坚持战略防御计划的应急方案。里根拿不定主意了。美国政府内激烈的辩论集中在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协议上,十多年来,这一协议被历届美国政府狭义地解释为使星球大战的合法化。五角大楼的律师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提出了更广义的解释。政府和国会内部及新闻媒介都在争论。

10月,舒尔茨和麦克法伦拟订了一个明智的解决办法并得到了里根的批准。它认为从法律角度看,广义的解释是合理的,但是,战略防御计划应在传统的狭义解释的基础上发展。斗争仍在继续,欧盟对反弹道导弹协议的前景感到惊恐。毋庸置疑,苏联坚决支持

狭义的解释,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巩固了我们的宣传立场。

580

麦克法伦9月末向我承认,总统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发动一场宣传战,希望能迫使他在核武器这一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总统不得不给予戈尔巴乔夫应得的评价:苏联的新领导人不像他的前任们,他非常熟练地运用公众舆论来反对他的外国对手,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然而麦克法伦警告我们不要过高地估计公众舆论对总统的影响。里根是一个固执己见的、在公众舆论压力下也不会轻易作出让步的人。在我看来,显然知道如何很好地运用宣传武器的白宫第一次体会到被真正的宣传武器所鞭答的滋味。

这也许对促使里根更加认真地考虑谈判问题起了作用。在9月份的最后一次会晤中,里根和谢瓦尔德纳泽又提起了建立秘密渠道以准备最高级会谈之事,然而后来里根没能任命他所希望的人代表美国一方。总统授权麦克法伦和我联系。他捎带着说,舒尔茨因其他事务非常繁忙,因此没有很好地使用这一渠道。麦克法伦打算充分使用这一渠道。

我知道麦克法伦在白宫中是缓冲温伯格和舒尔茨对立观点的人物,尽管他倾向于国务卿的观点。总统再次当选后,麦克法伦开始说服总统,认为他与戈尔巴乔夫的最高级会谈有益于美国。在我与他会晤时,他的这种情绪很明显。总统夫人也非常渴望最高级会谈成功,这样可以保证她丈夫在历史上的地位。如果没有他们对里根的压力,光靠舒尔茨自己很难使总统出席最高级会谈。

乔治·布什在促成最高级会谈中发挥了作用,因为他把会谈看作是在1988年的下届总统选举中接替里根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10月9日,我们坦率地进行了会谈,十分明显他在寻求苏联的帮助,以创造较好的气氛。布什说,他愿意与戈尔巴乔夫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并以轻松而又不被人误解的语调补充道,应该让总书记了解他将要与之打四年、也可能八年交道的总统是哪种类型的人。布什提出在1986年作为副总统访问苏联并会见戈尔巴乔夫,这样就可以增大他获得提名和当选的机会,与此同时也会促成来年苏

美之间就核裁军达成重要协议。他坦率地说道，他在日内瓦会议上，没有看到丝毫达成协议的机会，因为里根不打算签署一项可能限制他所心爱的创举——战略防御计划的重要协议。

布什说，重要的是要在容许做的事和不容许做的事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我立即回答说，反弹道导弹协议使划这样一条线成为可能。

“可能如此吧，”布什说，“但是，里根相信，或者某些人使他相信，这条线应该从部署武器系统，而不是从发展和试验武器系统划起”。

布什犹豫片刻后，又提到里根的另一天生的特性：总统认为在表达观点的同时考虑问题是非常困难的，这意味着在里根热烈地鼓吹一种思想时，——不论它是对是错——他很难抓住他的对手在说什么。他需要时间来消化来自另一方的思想和争论。出于这个原因，布什认为第一次最高级会谈的首要问题是给里根灌输来自他对立面的一些不同的思想。简言之，除非世界上出现了突发事件，否则，需要另一次最高级会谈来达成有实质性的协议。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到了点子上。

布什也讨论了他面临的政治问题。他知道作为里根的副总统使他在公众眼里的地位大大削弱，因而也损害了中间、甚至中间偏左人士对他的认可。他说他的意思是，杰克·肯普、鲍勃·多尔和霍华德·贝克缺乏国际经验和资金支持，与他们相比，他和地方一级的共和党有着更好、更深的联系，他要借助于这些优势在一两年内拓宽政治基础，重新获得自己的知名度。布什请我向戈尔巴乔夫通报我们的谈话，并希望拜会他并进行详谈。我相信布什很可能当选总统，所以我向戈尔巴乔夫作了通报。

一个理由是他是一位可以随风飘的政客。几个月后，即1986年2月，在一次招待会上我们又聊起了政治。我开玩笑地说，对他突然转向极端保守主义是应该祝贺呢还是应表示同情。他赢得了那些从来不是他的政治盟友的赞扬。布什说我对美国的政治信念太清楚了，因而也了解他的所作所为。“我不隐瞒事实”，他继续说，“我想当总统。然而，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美国已经强烈地转向保

守主义。现在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人没有机会当总统,连共和党提名都是不可能获得的。我别无选择,只有认真对待。”

布什告诉我他没有改变要与苏联改善关系的观点,尽管出于明显的原因他没有公开表明。“我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你们的新总书记的活动”,他说,“他有政治想象力和气魄。在我看来,有朝一日我们会走到一起的”。虽然不得不等待了几年,但布什的预言后来真的变成了事实。

582 随着最高级会谈的临近,尽管里根承受着国内的压力,但华盛顿方面丝毫没有表现出平等交换意见的迹象。10月10日,在我短暂地回莫斯科为最高级会谈作准备之前,我见到了舒尔茨,他表示为讨论最高级会谈有关事宜,由他对莫斯科进行一次访问可能是有益的。他向我通报了诸如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哪次会见交换礼物以及美国代表团的组成等有关安排的细节。三天后,里根在电台上讨论了军备限制问题。他老生常谈地说什么美国在战略性核军备竞赛方面远远落后于苏联,因此首先应恢复战略平衡。

我从莫斯科回来后告诉舒尔茨,他所盼望的访问已经得到考虑,事情看上去是积极的。舒尔茨对我说:“白宫那些家伙”对建设性的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缺乏兴趣,他们已为里根草拟了将在第五十届联大上发表的带有“反苏炮弹”内容的讲话稿。但令舒尔茨满意的是,里根拒绝了这份讲稿,因为这很可能搞糟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挑起公开的舌战,从而使最高级会谈变得一团糟。

尽管美方仍未就外空和裁军问题明确表态,但舒尔茨却饶有兴趣地说出了总统的意愿:他希望在最高级会谈后继续与戈尔巴乔夫对话,并渴望在他总统任期届满前携其夫人南希·里根访问莫斯科。舒尔茨提出了一个私人要求:如果他访苏之行得以批准的话,他想买两件雕像。历史价值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们看上去必须美观。一个他自己要,另一个是南希·里根要的,她早就想得到一件著名的俄国宗教人物雕像。我告诉他此事可以安排。

10月22日,麦克法伦在一次宴会上告诉我,里根终于开始认真准备最高级会谈的事了。他已经研读了11份有关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政治观点的参考资料,并就他们的谈判进行了几次排练。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数次会议全力为最高级会谈作准备。里根还向他的加利福尼亚老顾问理查德·尼克松进行了咨询。

戈尔巴乔夫于是决定亲自负责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并邀请舒尔茨访问莫斯科。舒尔茨由麦克法伦陪同于11月4日抵达莫斯科。戈尔巴乔夫邀请我参加了第二天的会见。会见是在中央委员会相当朴素的办公室而不是在宏伟的克里姆林宫进行的,以此来强调这次会谈的性质是事务性的。

戈尔巴乔夫多少有点儿焦虑不安。在会见前一小时,他把谢瓦尔德纳泽和我叫了去。距他与里根的会晤只剩下两周时间了,可除了会见舒尔茨和里根本人的准备工作外,会议的日程和会晤可能产生的结果都还没有头绪。他对此显然不高兴。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从美方得到的除了一般原则外,没有其他任何消息,”他强调仅仅与总统进行礼节性会见以满足礼宾需要是不合适的。他希望取得更加具有实质性的、更加有内容的成果来使政治局中持怀疑的人相信会晤是值得的。与此同时,里根不时公开发表的声明听上去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583

戈尔巴乔夫对秘密渠道为何没有运作而感到奇怪,我解释说,里根政府基本上不搞秘密外交,尽管看上去将来会有变化。“我们将看到”我说,“里根通过秘密渠道所转达的消息与最后分析会相符的”。我力劝戈尔巴乔夫对舒尔茨施加压力,从而了解总统的真正想法。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并说:“好吧,让我们看看舒尔茨国务卿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讨论。戈尔巴乔夫和舒尔茨花费了不少时间进行了几乎是哲学性的讨论,焦点是对两国政府彼此的弱点所怀有的错觉,双方都企图利用对方的弱点为己服务。戈尔巴乔夫对这一策略特别提出批评。他讲话中特别强调赞同两国改善

关系,并着重指出需要达成核武器和空间武器协议。他特意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战略防御计划上,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认为有些过火了,因为那样做起码会使里根更加确信战略防御计划的重要。

然而,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尝试都无助于和舒尔茨达成在最高级会谈上可能签署协议的共识。舒尔茨以其特有的原则性言辞加以搪塞,他仅仅不承担义务地宣称最高级会谈本身的重要性。此外他没有忘记提出人权问题,对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再次避而不谈。这当然使戈尔巴乔夫对会晤的期待更加现实一些。后来戈尔巴乔夫告诉我,他喜欢舒尔茨关于经济问题的总体思想,他们会谈中涉及了这个问题,并且他对此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浓。他愿意今后与舒尔茨再谈这个问题。

而舒尔茨对于戈尔巴乔夫的精力印象很深。我们使馆得知,在莫斯科会晤后,舒尔茨很着急,他担心在最高级会谈时戈尔巴乔夫会在裁军问题上施加新的、更加强大的压力。那样会使里根处于困境,并会使宣传对戈尔巴乔夫有利。戈尔巴乔夫一听说此事便对我说,他不想让里根把最高级会谈看作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相反,他认为最高级会谈应该是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的会议,这样才能了解里根的意图并避免对抗,虽然戈尔巴乔夫肯定要清楚地表明他的观点。总之,在发展与里根的新的关系方面,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的意义远远不只是一块跳板。戈尔巴乔夫强调说:“你不能把期望值定的太高。”

584 当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报告他与舒尔茨会晤的情况时,感到失望的戈尔巴乔夫承认他没能使国务卿在关键问题上全力参与实质性的会谈,看来舒尔茨对最高级会谈没做严肃的准备。这些印象使得他减少了政治局中不正当的过高的期望,政治局给了他自主处理他与总统举行不太正式的会谈的权力。

我11月7日回到华盛顿向舒尔茨简述戈尔巴乔夫对最高级会谈的态度时,他很满意,甚至感到宽慰。我对舒尔茨说,总统应期待

实实在在的会晤，而不是一方企图把另一方挤到死角或者为了争论而争论，尽管理所当然地应坦率、严肃地讨论实质性问题。

他告诉我他已经向总统汇报了他在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情况，里根询问了很多问题。他对实质性的讨论和戈尔巴乔夫的风度、对反对意见的忍耐、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幽默感和在各种问题上的专业知识表示好奇。里根告诉舒尔茨安排戈尔巴乔夫第二年七月访问华盛顿是可行的，并可以总统接着回访莫斯科作为条件。我将这些报告了莫斯科，并建议公开宣布同意定期举行最高级会谈本身就是最高级会谈取得的有价值的结果。

舒尔茨和我就有关日程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可能达成的协议和联合公报上。基本的文件是由美国国务院官员和我国使馆起草的联合公报。这一工作完成了。

但11月13日舒尔茨告诉我出现了一个新的、出乎意料的障碍。政府内部反对最高级会谈的人提出了异议，尽管为起草联合公报已作了大量工作，但他们反对总统事先这样做。他们的论点是在会谈前就草拟联合公报的文本是错误的，因为这意味着外交官们会将两国领导人自己尚未讨论的事情强加给他们，总统赞成这种论点。舒尔茨很为难，他说，总统认为在会谈之前这项工作应停下来。那么就要决定下一步干什么。当我问及舒尔茨为何不能在领导人了解此事的前提下作必要的准备工作时，他只是推托说这是总统的指示。

不用说，莫斯科对此感到非常吃惊和不快。以前与其他美国总统会谈时都是由双方事先做好联合公报的初步准备工作的。遵照指示，我第二天紧急约见舒尔茨。我对他说，在莫斯科看来，美国方面好像在最后一刻开始变卦了，它对我们曾共同提出的许多最重要的想法极其冷淡。这使我无所适从，美国政府再次将具有实际意义

585

了,他曾“厌恶”地目睹了戈尔巴乔夫和密特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情景。里根显然是害怕在电视镜头前输掉这场宣传战。

我知道理查德·尼克松与里根就最高级会谈问题交换过看法。就在我们前往日内瓦前,唐纳德·肯德尔向我扼要地介绍了前总统的反应。(麦克法伦曾宣称肯德尔可能会成为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但在里根手下这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他会以工作繁忙为借口推掉这项工作。)尼克松对里根准备最高级会谈的方式提出了批评:里根不太了解问题的细节,特别是裁军问题的细节,他非得依靠他的助手和专家不可。麦克法伦和里甘极力建议总统进行一般性的哲学对话,认为那是安全的话题,总统可以借此不和戈尔巴乔夫讨论具体问题。尼克松说,许多总统助手倾向将最高级会谈只不过看作是当代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的亮相会议。他们试图劝说总统这样看待会谈。

尼克松把舒尔茨说成是十分积极、严肃而知识渊博的人,但指责他没有能对总统施加足够的压力。尽管舒尔茨是参与为总统出席最高级会谈作准备工作的重要人物之一,但他过于小心翼翼。尼克松通过做工作消除了里根与温伯格的分歧,使两个人协同工作,因为作为国防部长温伯格即使在美国也是和苏联极端敌对的象征。

最后,尼克松以怀旧的心情说,他希望他处在里根的位置,因为里根获得了与新的总书记一起来完成苏美关系转变的历史性的机遇,但他担心里根不能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

苏联领导层和戈尔巴乔夫本人实际上是以极度忧虑、不知会产生什么结果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对待最高级会谈的,因为这是五年来首次与这位以恶毒反苏为特征的总统会晤。舒尔茨对莫斯科的访问并未能消除这些担心。外交部、国防部和克格勃像往常一样准备了联合备忘录,它构成了经政治局讨论并批准的给予戈尔巴

乔夫关于举行最高级会谈指示的基础。1985年11月11日的这份备忘录代表了苏联领导人对我们与美国及里根关系的全面评价,反映了戈尔巴乔夫自执政以来所发展的主要思想与思维。与以前同类的文件相反,这份备忘录反映了他对最高级会谈持谨慎、妥协的基调,在语言上也比较接近普通的讲话。

备忘录声明称最高级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努力——不论机会多么小——寻求与准备在平等基础上与苏联建立关系的美国总统找到共同语言,而不是要改变对方或在两国关系中引入对方的思想意识分歧”。它一开始就承认不能期望以达成协议来解决苏美之间的主要分歧,“我们最大的期望是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将从核战争不能被接受、不能打赢的基点进行工作”。事实上,这是戈尔巴乔夫希望带回的结果之一。他得到的指示是强调安全、核武器、空间武器是两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备忘录还告诫说“在地区冲突上,里根会重弹反对我们的老调”,所以两国间的磋商起码能确认苏联在这些地区的作用。即使达不成实质性的协议,“最高级会谈的结果也应有一个继续保持对话的相互换文……能够有一个联合文件总结最高级会谈的结果当然绝非坏事,但达成这个文件不应有偏见。没有一个最后的声明也无所谓”。

戈尔巴乔夫得到了的指导方针很明确,莫斯科并未对最高级会谈寄予很大希望。政治局批准的最低方案授权戈尔巴乔夫在情况需要时可根据具体形势斟酌行事。正如我们这些陪同戈尔巴乔夫前往日内瓦的人所了解的那样,雄心勃勃的他还有额外的目标:试图说服里根禁止空间武器,同时消减一半战略核武器。

11月17日,即最高级会谈的前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温伯格致里根总统的秘密备忘录。国防部长强烈建议总统拒绝裁军的任何步骤,诸如承诺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或在星球大战上让步。温伯格试图在最高级会谈举行前的最后一刻破坏会谈。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

587 11月18日上午11时45分,戈尔巴乔夫的飞机抵达日内瓦,他与里根的会谈于次日开始。这一会谈是自1943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德黑兰会晤后第十四次最高级会谈。54岁的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刚刚开始他生气勃勃的生涯;74岁的里根是反共老手,正处在总统显赫职位的巅峰。两人都认识到苏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又同样殷切希望给予两国关系一个崭新的开始。他们都对自己的地位充满信心,都相信自己的信念,并且相信说服对方的个人能力。

然而他们既自信,同时又对参加最高级会谈所担负的责任感到紧张不安和敏感,而且每个人都有理由不惜一切代价争取会晤的成功,或者至少看上去取得了成功。里根需要证明他毕生经营的实力换和平的政策,戈尔巴乔夫需要争得他刚刚开始改革的国际形象。

所有这些都体现在他们的表现上。他们把希望集中寄托在他们的四次私人会谈上,这包括一次在日内瓦湖边避暑别墅举行的会谈。他们在炉边轻松而非正式的气氛中谈话。他们也参加两国代表团的会谈,但是一半的时间里只有两位领导人及其他他们的翻译在一起渡过。这使庞大的新闻记者队伍的日子非常难过,直到会谈结束才解除对他们的新闻封锁。

从一开始,里根就通过礼宾上的表现手法证实了他独特的宣传技巧。首次会谈于11月19日星期二举行,地点在里根的下榻处水之花宾馆,这是一座位于湖边的19世纪的大别墅。总统是会晤第一天的正式东道主。那是一个寒冷的11月的早晨,湖边刮着刺骨的寒风。戈尔巴乔夫穿着大衣,戴着冬天的帽子。他到达时,里根没穿大衣,不戴帽子,身着西服迎出门外,并和戈尔巴乔夫合影。新闻界发表了许多照片,里根显得非常年轻,生气勃勃,身体健壮,而戈尔

巴乔夫却裹得严严实实以御严寒。他们看上去像同龄人。后来我们从里根的助手那里了解到,总统在大厅里等待戈尔巴乔夫到来时是穿着大衣的。但当他从窗户望见戈尔巴乔夫来了时,立即脱掉大衣,走出去迎接苏联领导人。里根的直觉起了作用,而戈尔巴乔夫脑子里深深地记下了这一细节。当轮到我们做东,里根来到我们的下榻处时,戈尔巴乔夫也是不穿大衣出外迎接。

最高级会谈在早上10时开始。每方都有六位顾问(包括外交部长)在另一个会议室恭候。里根把戈尔巴乔夫和他们的两个翻译带到了一个灰兰格调的客厅内举行了私下会谈。因为我曾和里根会晤过几次了,因此戈尔巴乔夫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如何才能掌握好首次重要会面。我告诉他对里根来说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而且对今后的谈判也很关键。尽管意见非常分歧,但重要的是要让里根首先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我建议他利用他的幽默感,在开始时不要太严肃地谈具体问题的细节,以免使里根为难。戈尔巴乔夫本人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他对这些心领神会。

结果首次私下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而不是事先计划的15分钟。他们无拘无束地回顾了他们的分歧,并在坦率而友好的气氛中“无拘无束”地交谈。总的看来,他们的首次会晤应该说是成功地建立彼此间的良好关系。

然后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同他们的外交部长和其他专家一起在别墅的华丽客厅里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两位领导人基于各自国家在政治与社会制度存在的长期矛盾观点,雄辩阐述了各自对冷战的基本思想认识。他们的谈话在许多方面都是重复里根在其五年执政期中和苏联领导人私下通讯的内容。当然两国领导人都没有说服对方,但对互相已熟悉的观点的讨论是在事务性的、互不伤害的气氛中进行的。相互听取对方的陈述是有益的。

与各自的工作班子分别共进午餐后,两位领导人商量了星期二下午的会谈中将要讨论的军备控制问题。有关战略防御计划和削减核军备的讨论无疑是复杂而艰巨的。气氛变得紧张而激动。里

根建议停下来吸点儿新鲜空气,戈尔巴乔夫马上同意了,他们为防寒又穿戴整齐,一同朝湖边有着大壁炉的避暑别墅走去。因此日内瓦会议又被称为“炉边最高级会谈”。

在别墅里里根把他的一份建议交给戈尔巴乔夫,这个文件的形式是“指导原则”或共同目标,将发给出席日内瓦军备谈判的谈判者。首先是削减战略力量50%,这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赞同。其次是达成一个过渡协议,削减欧洲的中程核导弹,并最终完全撤走所有这些导弹。戈尔巴乔夫反问关于英国、法国的机载核武器的问题怎么办,里根随即在建议中删掉了这些问题。

589 但是,最有争议的是第三条“更加依靠防御体系”的建议,用里根的话说它是指战略防御计划,而且此建议回避了是否应将其列入限制反弹道导弹的长期协议中的问题。更糟糕的是,这一声明似乎意指苏联已经原则同意战略防御计划,甚至我们可能在“这一防御计划”上合作。戈尔巴乔夫立刻提醒里根,1月份在舒尔茨与葛罗米柯的会晤中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削减进攻性武器与停止搞空间武器必须是相互联系的,而里根的建议在何处反映了这一点呢?总统说他并不认为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

在壁炉旁进行的这一激烈争论持续了一个小时。两人在意识到进入僵局时,决定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他们回到住处。在回去的路上,里根问是否可以在美国再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戈尔巴乔夫马上表示同意,并进一步建议他在苏联作东道主举行第三次最高级会谈。里根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建议。戈尔巴乔夫及其代表团一行离开后,总统兴奋地通知美国代表团,双方已就下一次最高级会谈问题达成了协议。描述这次会晤的历史学家们所不知道的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事先都已经通过秘密渠道为这次交易作了准备。在这届政府执政期间,事情安排的如此顺利是少有的。在日内瓦会谈前,里根就通过我告知戈尔巴乔夫要在将举行的会谈中就此后的最高级会谈安排提出他的上述建议。

而大多数出席谈判的人并不知道这次秘密交易,因此令他们

非常吃惊同时又感到宽慰,不论此次会谈结果如何,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将在两国首都再安排两次会谈。这一重要协议的达成表明了两国领导人继续并扩大相互对话和寻求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0日星期三上午11时30分,在苏联代表团驻地,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继续就太空武器问题展开争论,当时他们的助手们也在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锋富有戏剧性。里根极力为战略防御计划辩护:“这不是什么进攻性系统,我谈的是盾,而不是矛。”戈尔巴乔夫反驳道:“事实是战略防御计划又挑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

戈尔巴乔夫进一步逼迫里根:“当我说到苏联永远不会主动进攻时,您为什么不相信呢?……你们甚至不能与你们的盟友分享你们的先进技术,为什么我要接受您提出的让我们共同进行战略防御计划研究的建议呢?让我们大家更实际一点。我们准备妥协。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同意就中程导弹搞个单独的协议。我们将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范围内讨论大幅度削减战略武器数量的问题。但是必须停止实施战略防御计划。”

590

这时出现了长时间的、令人窘迫的冷场。我们这些与会者感到两位领导人都很气愤。戈尔巴乔夫首先意识到需要冷静下来。

“总统先生,”他平静地说,“我和您的意见不一致,但我能看得出您确实坚信这个计划。也许我们争论得过于激烈了。我只是想向您表达我们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关注程度。”

这次会谈过后,戈尔巴乔夫告诉他的助手们,当他意识到在这次最高级会谈中不可能迫使里根放弃星球大战的研究计划时,他决定中止讨论。他准备在未来的最高级会谈中完成这项任务,以免使本次会谈遭受失败。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地区冲突和人权这样的有争议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及另外一些问题在这次会谈中都不太重要,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涉及所有问题——然而在讨论的问题中也有些细微的变化。里根照常强烈谴责阿富汗战争,但

是美方的职业外交人员对戈尔巴乔夫淡淡地为苏联对阿富汗的政策辩护而表示惊讶,戈尔巴乔夫似乎在说他本人对此没有责任。苏联方面注意到里根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远比美国官方代表通常的态度要强硬。

双方在准备最后声明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科尔尼延科在葛罗米柯去任后仍任谢瓦尔德纳泽的第一副部长,舒尔茨和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谢瓦尔德纳泽本人在日内瓦会谈中不太活跃)。为了达成必要的妥协,高级外交官的辅助性会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直到两国领导人最后一次会谈前几个小时才达成妥协,这多亏了戈尔巴乔夫的介入。里根没有参加在含义上引起真正分歧的措辞上的争辩。

最重要的分歧集中在美方不希望将核武器和太空武器联系在一起,而苏方坚持要联系,否则拒绝发表联合声明。在声明中是否提到战略防御计划和反弹道导弹条约也存在分歧,最后两者都删去了。

在早上10点举行的闭幕式开始前几个小时,即凌晨4时30分才就联合声明达成最后妥协。关于军备问题,美国代表团同意葛罗米柯和舒尔茨1月8日达成的协议文本,而美国人最初甚至不同意再次提出这一协议。关于这些问题的最后声明是:

591

总统和总书记讨论了核武器和太空武器谈判事宜。他们同意在上述谈判中加紧工作,以便完成1985年1月8日美苏联合协议规定的任务,即防止太空军备竞赛,停止陆上军备竞赛,限制并减少核武器,促进战略稳定。

外交文书的起草者们拟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文件,这也是里根入主白宫后华盛顿和莫斯科达成的第一个这一类的文件。联合声明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件,它宣称永远不应该发动核战争,核战争没有胜方。双方强调防止在两国间发生任何核或常规战争的重

要性,并宣布它们将不寻求军事优势。在我们看来,政治局给戈尔巴乔夫的备忘录中规定的最低要求已经实现。另外,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还签订了科学、教育、文化交流协议,这是过去15个月来经过65次会议200小时的事先谈判才取得的成果。

戈尔巴乔夫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同意在最后声明中加入“以合作精神解决人道主义案例”的承诺。这样在联合声明中我们首次在双方争论不休的人权问题上发出了变化的信号。

由于我们在战略防御计划上存在着深刻分歧,因此最后声明中基本上回避了该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里根对于这一计划的狂热和偏好阻碍了削减战略武器的进展。舒尔茨在那次有关战略防御计划的激烈争论结束后说,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最终已承认对这方面的研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根本未同意这一点,并且认为日内瓦会谈最好的结果就是都承认存在分歧。这次最高级会谈并未在戈尔巴乔夫所期待的停止星球大战这一主要目标上取得进展,它对削减核武器的承诺也是含糊不清的。戈尔巴乔夫希望他能够克服或在某种程度上削弱里根的顽固立场。他及时地耍了小手腕,把下次最高级会谈安排在华盛顿举行,但他也不想空手而归,因此他安排第二年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临时会晤,其结果仅仅再次证实动摇里根实现其星球大战的梦想绝非易事。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给我留下的是不舒服的印象,双方仍存在着某些分歧。戈尔巴乔夫毫无道理的把自己捆在美国空间武器的军事研究上,而且视此为最高级会谈成功的先决条件。这样里根就把我们逼进了死胡同,后来我们不得不自寻出路。

回顾我参加过的许多次最高级会谈的情景,我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首次会晤非同寻常。事先没有准备联合文件,他们在军备控制这一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不可能为依次讨论这一复杂问题而事先商定会谈方案。结果,他们最后无可选择,只得认可这次会谈只是相互结识的会晤。这成为他们走向合作迈出的第一步,而且对他们是崭新的第一步。里根和戈尔

532

巴乔夫实际上拒绝遵守他们的助手为他们准备的议程，他们的做法或许是对的，这使他们避免了在一些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上陷入僵局，从而避免个人之间的对抗，这对首次见面是特别重要的。

商定再次举行会谈和就核战争发表的最后声明表明这次最高级会谈取得了不小的进展。里根在任总统五年的时间里首次与苏联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有助于克服他的某些心理障碍，首先是里根本人认识到至少有可能直接与苏联领导层和这个邪恶帝国打交道了。虽然两国关系本身仍很复杂，但这为进一步取得进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因此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首次会晤可以说是成功的。这并不是战略突破，然而毫无疑问取得了某些道义和政治上的收益，并为以后的最高级会谈铺平了道路。根据我对两位领导人的观察，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之间找到了相互交流的途径。

在回国的飞机上，戈尔巴乔夫说里根给他的印象是复杂而矛盾的一个人物，有时他直言不讳，如为战略防御计划进行辩解时就是如此，有时又唠唠叨叨地宣传他信仰的那些教条。他固执而又保守，然而戈尔巴乔夫发现可以与他建立联系，而且他并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意味着他已经准备同他打交道了。

里根的随行人员毫不怀疑里根离开时对戈尔巴乔夫持有积极的印象，认为他作为一位领导人不同于他的所有的前任。在日内瓦第二次共进晚餐时，里根甚至开始免去姓氏直呼其名了，这在美国人来说是典型的友好表示（小心谨慎的助手们告诉他还是等一等再这样做为妥）。白宫得意洋洋地通过新闻媒介向公众介绍了这次“炉边最高级会谈”，里根向国会作了富有戏剧性的、赞许的报告。民意测验对总统的支持率上升到84%，这一分数对于白宫的政治理论家也一样不无裨益。

在莫斯科，政治局为讨论会谈的结果专门举行了会议。戈尔巴乔夫喜形于色地报告了会谈情况和他会谈的生动印象。总之这是我国领导人首次与美国这位臭名昭著的反苏总统会面。

葛罗米柯首先向戈尔巴乔夫祝贺,祝他在日内瓦履行困难的使命时所取得的出色的成就。政治局其他成员效仿葛罗米柯,按照惯例而不是出自真心地赞扬了总书记,国防部长和克格勃的主席除赞扬外还补充说里根仍旧是里根,我们在和他打交道时应保持警惕。戈尔巴乔夫完全同意,并表示他在日内瓦的会谈尚未取得突破,而是有希望与里根开始改善关系,我们应探索和发展这一趋势。他促使冷战逐步结束的主要希望是与美国达成削减并最终结束军备竞赛的协议。经过热烈的讨论,政治局正式肯定了这次会谈的积极意义,同时批准了努力与里根政府发展关系的政策。戈尔巴乔夫特别提到了举行新的最高级会谈的价值。11月27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报告时,戈尔巴乔夫公开称日内瓦会谈是“必要和有益的”。

在这次最高级会谈过程中,虽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系统的政治计划,还未形成对美关系的安全思想体系,但他成功地形成并展示了他进行外交谈判的个人风格。最重要的是他确定了与里根合作的行动方向,而且得到了他的政治同僚们的认可。这导致了后来苏美关系的根本改变。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和里根达成了心照不宣的谅解,即绝不能让日内瓦精神付之东流。

第三十二章

告别华盛顿

友好与外交

我在华盛顿的外交生涯里总共和六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其中没有哪一位表现得像罗纳德·里根那样更具有自相矛盾性。在我们看来，他重新挑起冷战、保持冷战、又反对冷战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当他和他的对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又以他们各自的方式秘密策划结束这场冷战的时候就更加令人不可思议。他的头脑里从不考虑具体的问题，而且似乎从未认识到只友好是不够的，是不足以解决争端的。他凭直觉办事但又不通过简单的途径，美国人常常认识不到他的性格的这一复杂性。他顽固地相信他想要相信的东西，对他本人是这样，对其他人以至对这个世界上大量的现实也是这样。当通过某些神秘的过程使得他确信这个世界或者他周围的人已经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发生了某些变化的时候，他将按照他的新的信念行事，这使他最终能够放弃他对冷战和主宰其后半生的同共产主义的斗争所承担的义务。

我认为总统和我本人之间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是他奇特的人际关系的最佳例证。当舒尔茨1986年3月告诉他我被提升为共产党中央书记并将回莫斯科领导中央委员会国际事务部时，里根吃惊地问：“他是共产党员？”尽管我们已经逐渐建立了私人友好关系，但总统显然不知道或许是不想知道所有的苏联外交官毫无例

外地都是共产党员，他提的这个问题肯定带有某种使人称道的感情色彩，但这个问题的本身也暴露出我们不是在同一个人一般的政治家打交道。

当我从日内瓦返回华盛顿时，我们从他11月28日给戈尔巴乔夫的私信中看到了他更多的这类举止，信是手写的，以此来强调它的机密和的确出自他个人的手笔。信中包含有一个请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下半年访美的正式邀请。这封信的内容十分广泛，在此我仅引其中数节。它们是从我们所存的俄文档案记录里译回英文的。

595

既然我们在国内都面临着使我们两国建立起一个更具建设性的关系的任务，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想把我就我们的会晤的一些想法告诉您……有些事情我想私下亲自转达：第一，我想让您知道我发现我们的会晤很有价值，我们已一致认为要讲实话而且我们已经这样做了，结果是我离开会议时对您的态度有了更清楚的了解……显然我们还有许多事情未达成一致……是些非常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如果我没有误解您的话，您也在决心采取行动把我们的国家关系引向和平，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一致——而这毕竟是所有问题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

像在继续日内瓦的谈判一样，里根再次为其战略防御计划辩护，并把它同削减防御性核武器挂起钩来。他还把地区冲突说成是另一个关键问题。他说：

美国不相信苏联是世界上所有罪恶的根源，但是我们相信您的国家利用和恶化了地区紧张局势，并通过向这些地区提供武器使紧张局势和冲突更加升级……我们双方都毫无疑问地要继续支持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不使用武力的方法来进行……

我们两人都有许多顾问和助手,但是您知道,保持和平与加强合作的责任归根结底仍是我们两人的。人民期盼着我们的领导,我们不做,没有人能够做到。

12月5日,我同舒尔茨讨论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的结果。这位国务卿一反常态,毫无拘谨而又不无幽默地说,里根受了一场教育。舒尔茨说,在里根当政的最初几年里,他认为苏联所有的声明都只不过是为了误导西方所搞的一种宣传,但里根在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私人会谈之后改变了看法,他承认苏联领导人有很强的信念。对里根来说,这种承认意味着有了一个重大进步。特别有益的是,总统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时间里不得不倾听肯定掌握着最可靠消息的人为苏联的目的和意图做辩解,而这种辩解又是很有说服力的。596 尽管他们在许多事情上达不成一致意见,但里根已经开始承认其他观点存在的权利,而不能像他过去所经常做的那样将它们弃之一边。舒尔茨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做了一件好事。像是在总结里根对戈尔巴乔夫的印象,国务卿引用了总统在日内瓦会谈刚刚结束后对他最亲近的助手们所说的话:“这个人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但可以和他共事。”

戈尔巴乔夫对里根来信的回答表达了他对第二次最高级会谈的期盼。他在信中主要探讨了核武器和太空武器的解决办法,但在信的结尾处他明确表示希望总统把他的回信看成另一次炉边谈话。他说:“我们都想保持日内瓦会谈的气氛实实在在地发展我们之间的对话,我认为在准备新的会谈时,互通信件将是最为重要的联系方式。”

圣诞节后第一天,我接到总统从加利福尼亚州打来的电话。他还没有接到戈尔巴乔夫的复信,却收到了我本人的一封信,我在信中表达了建立更好的关系的希望。一阵寒暄过后,里根称我可以在准备新一轮最高级会谈的工作中得到他的支持,他还请我转达

他和他的夫人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戈尔巴乔娃的良好祝愿，并向他们保证他们会在美国受到热烈欢迎。当我告诉他戈尔巴乔夫给他的复信正在途中时，他打趣地问是不是个好消息，我用同样的语调回答道：“是一封圣诞贺卡。”

善意的问候一直持续到新年。元月一日，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分别向美国和苏联人民互致电视祝辞。这是里根的主意，但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以此作为其新思维正在形成的象征性姿态：头号帝国主义分子被允许向邪恶帝国的人民们直接发表讲话。

当总统面对一系列的裁军建议时，他发现自己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些建议仅仅用微笑和坐在火炉旁友好地聊聊天是不能作出回答的，需要对国家利益作出仔细评估并通过某种慎重的外交方式才能答复。

在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之前的一段时间，第一副外长格奥尔吉·科尔年科和苏军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未请示上级就根据他们自己的设想着手进行关于核裁军的最大可行性方案研究。无论是葛罗米柯和他的继任者谢瓦尔德纳泽还是几任国防部长，甚至戈尔巴乔夫本人直到同里根会谈之后都还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这次会谈之后，他们的计划才通过两个部的渠道转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当时他正离开莫斯科做短暂的休假。谢瓦尔德纳泽对它很感兴趣，但在听到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之前因怕被牵扯进去而一直犹豫不决。

597

这一设想的实质是，美苏双方拥有比现存核武器少得多的核武器才会有相对的安全，而且越少越安全，即便核武器已被削减到很少数量后也足以给敌方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竟被视为是超凡的，其原因仅在于它像许多的简单想法一样从来没有被尝试过。戈尔巴乔夫热情地接受了这个想法，尽管还需要他使用高明的说服技巧才能使政治局批准它。他得到了谢瓦尔德纳泽和科尔年科领导下的外交部的全力支持。虽然国

防部不太支持这一想法,但他得到了阿赫罗梅耶夫的支持,元帅的计划有助于缓和保守的军方的压力。不管怎样,这项计划在戈尔巴乔夫的催促下进展神速,不出一个月它就可以展示在美国人和全世界的面前。

1月15日,我会见了舒尔茨,交给他一封戈尔巴乔夫致里根的急电,电报的内容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裁军计划。我意识到同早些时候就此问题转达的信件相比,这封电报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此我尽力把这一点向对方讲清楚。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个导致在下一世纪初最终实现全面彻底地核裁军的分阶段裁军的计划”,或者说2000年计划。这个计划很快传遍了全球。

这一计划为削减核武器——包括核弹头以及运载系统——直至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制定出一个三阶段方案。它详细规定了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的削减计划,禁止发展太空进攻武器,即“太空打击武器”。该计划还建议逐步削减常规武器。这个计划是苏联提出的第一个恰当而又实际的裁军计划。它将多种武器包括在内,还制定了适用于双方均衡裁军的具体时间表。它考虑到了美国的最新建议,为双方达成妥协提供了一个明显而又现实的基础,尽管肯定需要进行谈判。

舒尔茨得到的印象是准确无误的,他提了一些问题,但对实质性问题未做评论。他显然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规划拿给专家看,并向里根报告他们的意见。

598 几个小时以后,戈尔巴乔夫公开透露了这个计划,强调在今后15年里要在这个星球上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这是一个能引发公众的想象力的简单论点。无可否认,戈尔巴乔夫的声明带有宣传的成分,但现实是美国政府不能对它不屑一顾。苏联第一次准备同意大规模地削减战略核武器,这不仅是里根长期所坚持的,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领导人不得不认可的。里根在第二天回答关于戈尔巴乔夫计划的问题时,对苏联第一次提出彻底削减核武器表示满意。

几天后,唐纳德·肯德尔对我讲了关于他同白宫办公厅主任

唐纳德·里甘的一次谈话的情况。里甘向他承认戈尔巴乔夫的计划震惊了整个白宫。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曾向总统保证，戈尔巴乔夫正忙于准备党代会的内部事务。现在当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具体的，并且其中多处同总统本人公开提出的一些想法显然很相似的建议时，白宫绞尽脑汁也得给他一个答复。里根政府意外地发现它所面临的苏联外交在最为重要的核裁军问题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生机和随机应变，因而不能够将这些建议看成仅仅是宣传而搁置一边。

里根总统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做出反应。他只是说美国及其盟国将“仔细审查”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他认为建议中有些部分在他看来是富有建设性的。他试图把注意的焦点转移到欧洲中程核武器谈判上。这一谈判是在日内瓦进行的，但它已发展为一轮典型的相互谩骂。同时温伯格也以他一贯的极为消极的方式，公开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暂停核试验的建议。

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在美国政界也引起了一次小小的地震。当我把戈尔巴乔夫的声明副本交给国会山的领导人后，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竟出人预料地对我说：我们两国能够而且应该在和平与裁军问题上取得一致，“到了我们做点正经事的时候了。”此人像大多数南部保守议员一样以其对苏联一贯的敌视而臭名昭著，然而这次他竟然邀请本州记者采访报道他同苏联大使的第一次会见，随后他又从南卡罗来纳州报纸上剪下一些友善的文章与照片送给我，这的确是那些天里发生的一件罕见的事。

民主党也开始担心被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联合和平攻势所孤立，这一攻势是从他们两人的最高级会谈开始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想查明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想法，因此决定访问莫斯科。行前他于1月23日拜访了我，并就我们对里根的政策提出了一些温和的批评。他说我们的做法使里根在美国名声大震，缓解了美国人民对核冲突威胁的忧虑，削弱了蓬勃发展的反战运动，抵消了里根在国

会乃至全国受到的反对。肯尼迪指出，里根连一项军备计划也没有被迫放弃过，相反他还继续促进那些计划的发展，以此作为谈判中同苏联讨价还价的筹码。他甚至不同意暂停核爆炸，在最低程度上表示他的善意。

随后，舒尔茨于2月11日要求和我谈话，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几次私人谈话之一。他说他“要在总统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秘密渠道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一些想法。总统想让戈尔巴乔夫知道对他的裁军建议还未做出反应并不意味着总统忽视这些建议，但他想在能够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做出答复。舒尔茨略为详细地说明了这个答复的内容，它强调了中程导弹问题。

舒尔茨所描述的上述想法在政府里引发了一场尖锐的辩论，辩论结果是：政府不要直接拒绝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可以从中选择那些看上去有吸引力的部分展开谈判，在谈判中不要将建议中有吸引力的部分同不太有吸引力的部分联系在一起。当里根正式答复于2月22日送交莫斯科，它遵循了一种选择战略。总统欢迎分阶段核裁军方案，但又按照美国立场提出反建议，从而否定了这一方案。比如，他称赞戈尔巴乔夫销毁欧洲中程核导弹的建议，但又坚持在亚洲也销毁中程核导弹；战略核武器的削减必取决于苏联接受星球大战计划和单方面地削减常规武器；只要核武器是威慑武器库中的一部分，核试验就将是必要的。

在同苏联打交道时，美国政府显然没有严格的纪律和明确的指导方针，政府成员好像乐于表演一些小冲突去激怒莫斯科。在双方都宣布了间谍案件后，美国政府于3月7日责令在纽约的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量削减人员；3月13日，美国军舰在克里米亚半岛沿岸举行了一次显示其海军力量的军事演习；从政府高级官员口中不时地有反苏言论传出；5月27日，里根宣称他将不再遵守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条约所规定的战略武器限度。

不仅苏联而且美国国会以及欧洲联盟都尖锐地批评里根上述决定，舒尔茨私下也反对这一行动，但这个守纪律和唯命是从的

模范在里根发表声明之后又转而支持里根的决定。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好像又滑到了不断冲突的道路上。

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3月初,我离开华盛顿参加苏联共产党第27次代表大会,这次党代会彻底地改变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它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间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思想转变成东西方在较低和较少危险的军备状况下共享安全的观念。它坚定地支持1月15日公诸于众的裁军计划。我对我国外交政策上的这些新思想感到非常满意。事先我得到一份戈尔巴乔夫报告的征求意见稿,我欢迎我们政策上的重大改变,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而且其中有一些是我早就悄悄地提倡的。

这次大会除了给我们的政策带来了根本的改变,也对我的生活带来了根本的改变。

我不止一次地当过党代会的代表。像往常一样,我每天参加二至三次会议,会议期间我拜访了外交部和其他各部,试图解决在我们驻华盛顿大使馆堆积的大量的官僚主义问题和政策分歧。我同我的朋友以及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们进行了不少私下会晤,他们都想听到来自美国的最新消息。在我当苏联驻美大使的这些年里,我通过这种方式也扩大了我的朋友圈子。同样这些会晤对我也非常有用,因为我可以借此了解国内形势以及苏联领导层今后的打算,这对远在华盛顿当大使的我是至关重要的。

有这些事做,两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我也开始准备返回华盛顿。在党代会的最后一天,闭会前有较长一段休息时间,因为在这次会议上要选举政治局成员和中央书记。我绕着克里姆林宫和红场散步以度过这段时间。在会议开始前10分钟我返了回来,然而,我刚一走进会议大厅,戈尔巴乔夫的一名警卫就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他告诉我他们已找了我半个小时,总书记要紧急约见我。

我跟着他走到主会场后边的戈尔巴乔夫私人办公室,他正在那里为最后一次会议做准备。离开会还有五分钟时间,敦促代表们回到会议厅的第一次铃声已经响过。

我们握了握手,戈尔巴乔夫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有一种意见”,即我将被提名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主管国际事务,因而需要我返回莫斯科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国际部——正是这种来历不明但又不能改变的党的意见在40年前宣告了我的外交生涯的开始。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坦率地讲,这种使人感到荣幸的任命对我一点也没有吸引力,我宁愿继续呆在国外,因为我非常喜欢大使的工作。我过去喜欢美国,现在也还喜欢。我喜欢我的工作相对具有的独立与自主,也喜欢同莫斯科的官僚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享有很少见的机会,可以直接向总书记(接连共五位)和政治局表达我的意见和看法,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从苏联最重要的外交岗位上对苏美关系中的一些大事和决定产生影响。最为糟糕的是,我所了解的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实际上与外交政策和外交无关,它主要是忙于促进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左翼组织的合作与联系。我对此既无经验也无兴趣,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没有考虑我的争辩,他说挑选一位有经验的大使来领导党中央的国际部是为了提高这一部门的威信。眼下这个部在外交政策上实际没做什么,尽管那本是它应该做的。说到同外国共产党打交道的事,戈尔巴乔夫说:“你将有几位有经验的助手,他们做这些事情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因此还是让他们继续做下去。你的主要责任就是外交政策。”

第二遍铃声响过,戈尔巴乔夫对我的新任命表示祝贺,然后就向主席台走去。

接下来的一切都像是在梦中度过的。当戈尔巴乔夫宣布中央委员会最高机构的人员组成时,我坐在那儿极力使我的思路保持清醒,我的名字上了候选人名单,我被选到新的岗位上,那就是我

驻美大使工作的终结。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试图把我召回到莫斯科工作是在一年以前。早在日内瓦最高级会谈期间的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问我对谢瓦尔德纳泽要我做他的副手有何意见。我同谢瓦尔德纳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在他同美国官员的首次会晤中我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帮助他。我回答说那是我的荣幸,我也非常感谢这一委任,但我还是愿意呆在我目前大使的职位上,因为同外交部官员共事的前景的确不吸引我。戈尔巴乔夫大笑,接着说他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但再也没有下文了。

就这样我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告诉戈尔巴乔夫我必须回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其他官员告别,他同意了。4月初我飞往华盛顿时第一次意识到我的新职务的重要。按当时的规定,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有乘专机去国外访问的待遇,我同我的夫人就成了偌大一架飞机上仅有的两位乘客,我承认我感到很不安。

一连串的告别

为了在华盛顿举行最后一轮会晤,我带去了戈尔巴乔夫给里根的信,信中对最高级会谈五个月以来两国关系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进展表示忧虑。4月7日,就在我对里根总统做辞行拜会的头一天晚上,舒尔茨请我和新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共进晚餐。

他们要我坦率地谈谈苏联党代会以后莫斯科对苏美关系的态度。我告诉他们苏联领导层不能不对两国之间关于裁军和其他问题的谈判再次中断表示关切,对我们来说,这是令人遗憾的,它表明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比它宣称的要为下次最高级会谈所做的准备工作相差太远。

这是我在离开华盛顿之前同舒尔茨举行的最后一次私人会

晤,他对里根政府再次不顾在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中做出的安排,没有积极地利用他和我这一秘密渠道表示了他个人的遗憾。“现在我看清了,”舒尔茨说,“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才没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秘密渠道,上届政府的经验,特别是在安排最高级会谈时使用这一渠道的情况就是一个明证。”事实表明,他们继续采取的是与此恰恰相反的程序,总统自己提出了议程,最终也没有利用更加秘密和灵活的渠道做任何工作。

603 第二天我到白宫向里根辞行。天气非常好,阳光普照、暖意融融,全然不像1983年我拜访里根时那个阴冷的夜晚。这是一个穿礼服的正式场合,出席的人员有舒尔茨、波因德克斯特、唐纳德·里甘、总统负责苏联事务的助手杰克·马特洛克以及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珊·里奇韦,我国大使馆参赞别斯梅尔特内赫和索科洛夫会见时也在座。在没有译员的情况下,我们同总统谈了一个半小时。

像在以往的重要会谈时一样,里根总统习惯地手持内容广泛的笔记说他想提一些建议。结果是他比他的助手们提出了更为具体和详细的建议,这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国务卿在我见总统之前的头天晚上没有谈具体意见,显然他们已决定,所有要我转达给戈尔巴乔夫的美方立场的解释都由总统本人来做。里根称他决心改善两国关系,这一关系自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以来已通过增加接触和交往得到了改善。但同我们一样,总的说来他还不满意。他特别关注地区冲突,尤其关心以利比亚为根据地的恐怖主义和在阿富汗发生的战争。

里根进一步说,各方都应为军备控制提出最实际可行的建议并共同寻求达成协议。他同意禁止核试验是最为重要的,但没有采纳戈尔巴乔夫关于就此召开一次特别首脑会议的建议。他提议先由专家就如何更有效地改进对核爆炸的检测进行讨论,并以此作为下次最高级会谈达成一致的基础。

里根接着提出了许多他认为是“理想的然而也是现实的目

标”，他建议就以下问题达成协议：削减战略武器的50%，进而消除中程核武器和首先发动核打击的威胁以及研制在太空中有大规模杀伤力的进攻性武器的威胁；禁止化学战；寻求达成和平解决地区冲突的程序以及改善政治气氛以利于扩大经济和贸易合作。

里根为我们提出的时间表是在本年度就主要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这样才能使按计划在1987年召开的下一次最高级会谈上谈判正式的协议成为可能，美方也能在1988年总统改选之前有充分的时间批准这些协议，过了这个时间里根就得下台。此外，这些协议也将是对戈尔巴乔夫1986年1月15日建议的第一阶段方案的实施。他还说他准备以建设性态度和更加有效和可信的方法来削减中欧的武装力量。

里根平静而祥和地谈了这番话，如果有人对他执政期间同苏联打交道时所采取的强烈的反共态度和方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仍持怀疑态度的话，这种怀疑将被这次谈话记录所消除。他结束谈话时请我告诉戈尔巴乔夫，他期待着戈尔巴乔夫在年内的第一次访美，并希望他至少要访问一个星期，他允诺：“在他访问我国期间我将亲自陪同他。”

604

但是，不管里根安排的议程多么广泛和他的态度多么合情合理，他所提出的最高级会谈议程并未说明怎样去解决他所说的那些重要问题，而且也忽视了他所谓的太空防卫武器、战略防御计划和反弹道导弹问题，而这些又恰恰是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谈讨论的焦点问题。他的建议并不是一个全面计划，而只是一个漏掉某些重要的问题的几个互不相干的方案而已。我所能对里根讲的就是向他保证他所说的一切都将向戈尔巴乔夫本人报告，并将向他做出答复。我向他重申戈尔巴乔夫建议的实质是要求停止尖锐的反苏言论，并敦促为最高级会谈做认真准备，不要把它搞成一个最高级别的“临时凑合会议”。

然而，里根总统表示，他意识到最高级会谈应有一个广泛的议程，他将亲自参与审定这些议程，这也许是谈话中他第一次做这样

的表示。这是一个好兆头。但与此同时，他的思想根本没集中到哪怕是最小的一个具体议程上，也分不出轻重缓急，最高级会谈的所有准备工作再次被留到最后一刻去临时安排。戈尔巴乔夫对这次最高级会谈抱很大的期望，因而越来越感到不安。当他们抵达雷克雅未克时发现只有一个议题，即核武器与太空武器问题，然而就这一个议题也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双方心中都不打算妥协，一切事情都留待两位领导人自己去讨论和解决。他们失败了。

正式会见结束后，里根总统请我留下来和他私下谈话。他说看起来双方领导人都必须再推动一下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一种方法是加强不同谈判场合的谈判，特别是更多地启用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的谈判，另一种方法是最终启用一条严格保密的渠道，这在准备日内瓦会谈中证明是有用的。但是里根对如何使新的渠道运作起来没谈任何意见。我即将返回莫斯科，他答应考虑如何恢复秘密渠道，但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后就再也没听到下文，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大使轮换的太勤——在此后里根剩下的执政期里和他的继任布什总统的执政时期，总共五年的时间里我们换了四任大使。

605 总统把我送到我的车旁。他显然想通过这一最高的礼仪规格表示对我的极大关心。我们在前六年中发展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再次请我问候戈尔巴乔夫，希望年底之前在美国见到他，“我们有事情要谈，”总统说，并再次祝我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我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张里根总统当时在白宫送我时的情景的照片，里根总统和我沿着一条从他的椭圆形的办公室穿过白宫花园的路走下来，我们愉快地交谈着，在我们的身后是同我关系最亲密的两位外交官——亚历山大·波因德克斯特和奥列格·索科洛夫。

戈尔巴乔夫在给里根的私信中对“A.F.多勃雷宁多年在华盛顿担任苏联驻美大使时所从事的活动以及他为建立我们两国人民之间良好的相互关系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了赞赏；里根给了我一帧有他本人签名的我们同我们的夫人一起在白宫的合影照；理查

德·尼克松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在我们认识的所有的大使中没有一位像您这样忠实地为他的国家献身服务40年……没有您的活动我们两国间不可能发展成现在的这种新的相互关系,这一关系在1972年的最高级会谈中发展到了顶点”;吉米·卡特送给我一本他新出的书,上面题有“赠与我的朋友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德为我举行了一次极其丰盛的午餐会,出席午餐会的有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的重要参议员:萨姆·纳恩、克莱本·佩尔、爱德华·肯尼迪、斯特罗姆·瑟蒙德、约翰·华纳、约瑟夫·拜登和其他许多要员,随后他寄给我一封友好的私信。

还有许多其他的辞行拜会、会谈、午餐和招待会,我们大使馆也举行了一场告别招待会,出席这场招待会的有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外交使团官员、政界和公共知名人士、商人、报纸专栏作家和记者,我在许多年中结交的朋友、熟人和在公务活动中所认识的人物都到场了。舒尔茨发表了一个热情的祝辞,我也做了告别演说。

不得不向每一位道别留给我的是一些许的伤感,向我的大使馆说再见,结束我在华盛顿这么多年中忙忙碌碌、四处奔波的经历和难以忘怀的印象使我感到难过,同所有这一切分开是件艰难的事。我在大使馆的最后一个晚上几乎没有合眼。在这个难以对付而又奇妙的国家毕竟当了24年的大使,现在说再见不是那么容易的。

罗纳德·里根和苏美关系

在本世纪的后2/3的时间里,美国政府的对苏态度可用一条不
规则 and 波浪形的曲线来代表: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二次大战中
巩固了苏美联盟;杜鲁门是冷战开始的象征,并在他任总统期间使
冷战逐步升级;艾森豪威尔在他的任期将结束时寻求冲突的缓和;
肯尼迪被迫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并开始谋求缓和;尼克松时期缓
和得到了发展并达到顶点;福特在任期内表现得摇摆不定;到了卡

606

特时期又采取了维持现状的做法,本来缓和的基础就摇摆不定,到了这个时期彻底垮下来;里根从1981年至1984年的第一任期是同缓和政策的严重危机连在一起的过渡时期。简言之,美国在70年代后对缓和的不满意逐渐地导致了80年代初的冲突,但在此之后,我们两国关系中又出现了可能摆脱危机的迹象。里根在同苏联共事中所取得的成就就足以同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相比,或许还胜过他们。

罗纳德·里根天生自相矛盾的性格和他奉行的前后不一的政策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话题,他是战后我们两国关系中最不寻常的一位美国总统,我的同胞都把他看成是一位奇特而又带神经质的政治领导人。普通的苏联公民很难了解这个战争贩子和敌人是怎么转变成为一个同共产党的总书记在红场手拉手散步,并同苏联就限制战争武器签订了一系列重要协议的友人,西方也很少有人能明白这一点。

罗纳德·里根的这种自相矛盾很值得探讨,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即里根对核武器充满了梦幻,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又根深蒂固地暗藏着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要最终消灭核武器。他的这种梦幻和深藏不露的信念又是如何被最终证明比他发自内心地反对共产主义更加强有力的呢?

里根刚上台时,不管他的经历如何,莫斯科在选择缓和还是对抗的政策上是毫无疑问的。苏联领导层显然更喜欢70年代的缓和政策,这在苏联公众舆论上也不存在任何争议。在80年代的前半期,苏共中央政治局所面临的不是要选择缓和或者对抗,而是里根政府将采取什么政策,我们将如何面对这种政策的挑战。尽管在里根的第一任期里苏联领导人接连更换,莫斯科仍继续为推动缓和进程和削减军备而努力,并始终批评美国拒绝接受缓和、军备控制和谈判的做法。里根政府公开而又急切地选择对抗不要缓和,谋求军事领先不要军备限制,苏联那个时期所采取的行动是对里根的好战姿态作出反应的需要,这些行动远远地超出了西方所能接受

的限度。

我必须承认,从一开始我就对里根总统的总的心理和他对苏联,特别是对苏联领导人的态度产生了兴趣。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由于他在我们内心的形象毫无疑问是反苏的,因而更增强了我的这一兴趣。引起我的注意和让我感到不解的是,他对苏联宣称的敌对政策同他与苏联领导人和我在私下接触中所做的或所讲的明显地不协调,而这些事完全不为美国大众甚至政权机构所了解。

比如:里根在公开场合显不出一一点自相矛盾,我也真诚地希望如此。他攻击苏联是邪恶帝国,用相当贬低的言辞描述苏联领导人,然而不一会儿又私下秘密地给苏联总书记写亲笔信,表示他的愿望是建立一个无核的世界和更好的苏美关系以及和世界上共产主义和无神论者的首领举行最高级会谈。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这些愿望是真诚的,但与此同时我又不敢相信他自己充分地意识到或注意到他的那些肆意的反苏言行,这种言行常常是毫无道理的甚至是恶意的,无疑会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这一切似乎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又能够很协调地装在他的脑子里,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他对那些矛盾没有过多地想过,也不太关心苏联领导层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

在里根当总统的最初阶段中,莫斯科把他的行为视为一种顽固的敌对行为,没有认真地对待他想要改善两国关系的信息和保证,相反却把这些信息与保证当成是一种欺骗和宣传手段。甚至里根在第一任期快结束时私下试探苏联领导层对可能进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的看法时也遭到克里姆林宫的怀疑,认为他是在为竞选连任而采取行动,因而否定了里根的想法。

从1984到1986年,里根政府从它开始的那种对苏毫不妥协的公开敌对态度一点一点地逐步改变到小心地试着开始进行外交对话。里根在1984年重新竞选总统的几次演讲中都强调要同苏联既对抗又对话。他私下讨论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他开始懂得把

外交政策只建立在意识形态上是危险的。他对苏联采取了军事力量加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对策,因而他将主要外交政策改变成为实力加谈判。1984年9月,里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美国恢复了它的力量……我们准备同苏联进行建设性的会谈。”在里根重新当选和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关于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对话增加了。排除了当时的一切干扰后,他们于1985年在日内瓦进行的面对面的会谈非常成功地推动了新一轮缓和进程,先前的缓和进程已被卡特,后来又被里根毁坏了。

里根总统这种独一无二的个性对他的对手和专家来说都是一个谜,其谜底就是他们明显地低估了他。事实证明,里根总统比最初表现出来的更加深沉。不可否认,里根对我们两国的关系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也不愿意仔细地考察两国间的那些错综复杂的事情,特别是有关武器谈判的事。或许他思想上的偏见有时妨碍他做出合乎实际的估计并使他前后说法不一,但他还是比其他任何一位总统都幸运地办成了事。他率直的个性也帮他躲过了许多麻烦,他可以当之无愧得到美国人所赞美他的绰号——“特氟隆总统”。

里根被认为是有天赋、有鉴别力和乐观的人。他的想象力促成了像战略防御计划那样的重大设想。他巧妙地展示他自己的形象,并使亿万人为之倾倒。在很大程度上他是靠自己的信心和有潜质的天赋办事的,而这并不一定是出自智慧和知识,而往往出于他的自信与性格。他把复杂的问题用极其简单的口号去强调说明,并避过专家直接和亿万人民群众进行心灵上的交流。他熟练地使用这种方法操纵公众舆论来为他善意的或邪恶的目的服务。他常常因尝试使用一种最简单原始的方法而受到指责,这种方法可以省却他对问题做恰当地、洞察其中奥秘地分析研究。这些指责多半都有道理。

但是他驾驭事物的力量的确来自于他的能力,我始终搞不清楚他的这种能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还是出自他的天性,然而这种

能力却把他外在的方法简单同内心坚信他的观点正确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尽管有时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或者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知道这些观点依然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并通过他自己顽固地坚持和坚强的决心能够使他的意见得以实现。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他成功地维护了欧洲中程导弹的零点选择方案,当他第一次提出要在欧洲把中程导弹统统都清除掉这个建议时,没有人相信这个想法立得住,连美国人也不相信,它看起来过于偏袒美国的利益以至于不能被任何人所接受。但是里根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顶住了苏联通过外交谈判、向西欧公众施以宣传压力和长期激烈的公开争论等阻挠美国部署导弹的企图。事实又一次表明,在美国部署导弹的压力下,莫斯科逐渐地修正了它关于总的战略均势的观点,也修正了它关于限制核导弹谈判的态度。总之,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接受零点方案也适用于它自己的SS-20s 导弹,承认这一方案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最合适的方案,尽管这意味着数亿卢布被浪费掉了,因为一开始是我们自己做出了发展导弹的草率决定。

这个例子也不能被说成是军备控制的大失败和里根重新武装政策的大胜利,事实上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卡特和里根没有再增加武器,因而也没有促使苏联力争保持核均势,果真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会使我们两国都付出无数的军备开支并将严重地妨碍我们对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正常化的寻求,同时使军备控制发生逆转。但当里根1983年宣布他的战略防御计划时,苏联的战略家抓住时机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我们意识到在战略均衡方面我们已经走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也许我们过分估计了星球大战的军事意义,一旦除去这层面纱让我们再一次对形势做出思考会使我们更加接近军备控制。

里根坚持要求在核武器削减过程中进行核查也对联合控制体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要信任也要检查,俄语中用“Doveryai no proveryai”这一成语来表达与此相同的意思,但里根此后再未用

俄语重复使用过这一成语。联合控制体系对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的莫斯科领导人来说始终都是一块大绊脚石。

让我们再来看看销毁战略导弹的问题。里根有时和公众一起分享他的没有战略导弹的世界的美梦,但是没有一个人,甚至他的随从当中最亲密的人认真地对待过他的意见。他的呼吁被当成是豪言壮语而不屑一顾,然而除去宣传的内容这确实就是豪言壮语。正如以后大家都知道的:里根真的说到做到。当里根在雷克雅未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在某种条件下他赞成两国都清除他们所有的远程核导弹时,这一说法让全世界有机会认识到里根其人,也大大地出乎他的欧洲盟国的预料并令它们不快。里根盲目地确信战略防御计划不是一件讨价还价的小事情,戈尔巴乔夫又毫不让步,这两者使610 他们不能就主要核导弹的削减问题达成协议。当时的戈尔巴乔夫被里根对战略防御计划的顽固坚持弄得忧虑不安,这种忧虑远远超过了因里根意外地同意大规模削减核武器而带来的鼓舞。然而到了雷克雅未克,戈尔巴乔夫不再去顾及这些情感,认为他能够并将同里根一起共事。他认为里根是一位能够做出重大决定的人。当我们回到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告诉了我这一点。

认真地研究一下里根的政治生涯就能看出他基本上是注重实效的,而且比他讲的那些要人们相信的话更具灵活性,这对解释他改变他的对苏政策有帮助,不管是他最喜欢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大多数的反对派都认为他的这种政策的改变是不可思议的。

我认为他在总的思想观念上没有重大的改变,有些改变是逐步地接受包括苏联和美国在内的这个现实世界上已经发生了的重要的变化,单方面的对抗有违时代精神这些事实而渐渐地形成的。再有,他意识到了他坚定的反对态度将有损他自己的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说到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使美国在它的历史上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不管最终付出多大代价,他的重新武装计划使他在谈判桌上能自信地面对苏联人。

一些美国人,特别是认为里根大规模的扩充军备和推行强硬

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那些人仍坚持认为里根的上述做法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里根的第二个任期正巧是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位,没有戈尔巴乔夫冷战不可能结束。然而,假如里根能够看得更远一些并能推测出苏联的真正动机和同意那些已经摆上谈判桌的裁军条约,那么无需把沉重的军事开支包袱加在美国人身上就能结束冷战。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四次最高级会谈成了双方领导人和他们的国家逐渐改变方向的重要里程碑,双方在这一改变中都发挥了作用。里根,接着是乔治·布什在改善我们两国关系中更为有力。就是在那个时期冷战结束了,我们两国间的关系这时比缓和的最初几年还要好。多疑的苏联领导人开始相信,通往国际安全的路是由与美国签定大量的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协议来铺成的,国际合作的机会之窗已经大开。随后苏联在1991年的不多几天里就分裂了,这是外国干涉或影响的结果吗?真的像里根政府的支持者依然相信的那样,邪恶帝国是被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最终搞垮的吗?

611

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中,也就是在冷战还在继续,军备竞赛直到里根总统任期结束仍在持续的情况下,回答仍然是否定的!假如军备竞赛的压力仍然在继续,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政治局或者鼓吹强硬军事政策的其他人都会得到来自军工联合体和全国的更为有力的支持;如果苏联领导人把美国的军事集结描绘成对苏联民族生存构成威胁时,苏联人民会做出反应,我对此毫不怀疑,用我爱国主义的理解来说,因为所有的俄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称之为伟大的卫国战争——之恐怖记忆犹新;苏联是个集权主义国家,政治反对派的出现是不实际的,更不要说能够获胜。就军事开支对民用开支相关的是非曲直展开一场辩论,尤其对被认为是危及祖国的事辩论是不切实际的,苏联人民会勒紧裤带并把这视为民族生存战争的一部分。

令里根那些执着的追随者伤心的是:里根奉行的对外政策所

导致的苏联国防开支的增长并不是击垮这个邪恶帝国的“稻草人”。我们并没有如这个世界上像卡斯珀·温伯格一类人所相信的那样使自己在军备竞赛中破产，苏联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反应仅仅是在防御费用中有了一点相应的增加而已。纵观里根担任总统时期，苏联防御费用的增加也对我们的经济衰退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没有超出前些年国防开支的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我们经济上的麻烦是由于我们内部政策的矛盾、低投资以及缺乏创新造成的，这也正是西方在世界银行或是其他部门的经济专家现在所相信的。

这听起来有点儿像是个历史的笑话，特别是对于里根的崇拜者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如果不是里根总统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放弃了他对苏联的敌对立场转而采取一种更富建设性的姿态的话，戈尔巴乔夫可能不会发动他的改革和推行他的“新思维”，相反，戈尔巴乔夫将会被迫继续采取他的前任延续下来的保守的对内对外政策，而这种政策就是为了保卫苏联反对美国。那样的话，谁又能知道世界将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612 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冷战和里根总统对苏联和它的经济和内部问题没有产生影响，事实上确有影响。但把在苏联而后是在俄罗斯发生的巨大变化看成是为符合美国利益而上演的一出戏也是没有意义的。把苏联一个国家的改变归咎于美国的一任总统所推行的政策是一个极大的夸张和实在的历史错误，更不要说这种改变是有决定意义的。苏联的命运是由我们国家内部来决定的，这其中我国第一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任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个人起了不小的作用。

从古罗马到大英帝国，所有强权的瓦解都是由于内部矛盾而不是由于外部压力造成的。没有人赢得了这场冷战，双方都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这场冷战的结局是我们双方取得了共同的胜利。

第三部

离开华盛顿之后

77

1

1

1

戈尔巴乔夫：苏联第一任 也是最后一任总统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继承下来的苏联是地球上的一个大国，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大国形象已失去其光辉，但它仍然强大和统一，而且是这个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然而，在从1989至1991仅三年的时间里，欧洲大陆的政治前线已从欧洲的中心有效地东移到1653年时的俄罗斯边界，也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联盟之前的边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苏联的消亡，其根源应主要从国内来找，在于我们的政治斗争，在于我们的不称职但又野心勃勃的领导人，还在于国内急剧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一连串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的人民中的大多数没有参加而且至今也没能真正弄明白。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发生的这些充满了戏剧性和灾难的日子有待于全面和彻底的研究，但我只讲我所经历的那部分故事。

中央书记的生活

1986年3月，我从美国回到莫斯科就任分管国际部的中央书记。我感到像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世界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局的一位代表拜访了我，他们向政治局和党的书记处成员不仅提供保安措施还提供一切服务。作为党中央的一位书记，我得知为我配

备了四名私人保镖，一辆内装无线电话的吉尔牌高级轿车，并且在索斯诺夫卡配给我一个国家所有的乡村庄园，叫它“松园”比较合适。这个庄园有它自己的职员：三个厨师，四个女招待，两个园艺师和一名警卫。

616 当我得知这个特别的庄园曾经属于闻名遐迩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时不禁大吃一惊。这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授给他的。在赫鲁晓夫罢免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以后，朱可夫元帅就住在这里，直到他去世。这是一栋宽敞的两层楼房，有大餐厅、客厅、图书馆和好几间卧室，甚至还有一间电影放映室。庄园里还有一个网球场，一间桑拿浴室，一个花房和一个果园。所有这一切比莫斯科水平的豪华还有过之。

政治局和党的书记处大约25位成员都能免费使用一个特别的飞行中队以供他们在国内和国外的旅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两条国内和一条国际“热线”电话，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与任何一位苏联官员取得联系，不论他是在什么地方。在我们之间还装备有一套专门的保护得很好的电话联系网。

政治局的每周例会通常在星期四召开，有时戈尔巴乔夫也召开紧急会议，所有的中央书记都出席这些会议，很少有例外。他们有权参加讨论，但无权投票表决。政治局并不经常采取表决手段，当总书记意识到即将发生不一致的时候，他就会建议将有争议的问题拿到下次会议上再做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向持不同意见的成员施压，使其接受他的立场。

戈尔巴乔夫陶醉于言谈辞令，而且几乎就每一个问题高谈阔论，其结果是上午11点召开的会议要到晚上6点甚至到8点才能结束，每位想要发表意见的人都让发言。戈尔巴乔夫是位强有力的人物，通常控制着政治局的会议，长期下来便造成了没有人真正想同总书记发生对立的一种局面。当他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正如他主持过的所有的政治局会议那样，他的观点以及他的逻辑都是激动人心的，而且像往常一样最终能成功地使政治局接受他的决定，尽管

他不是一个人独裁主义的统治者，而且还必须顾及到大众的情绪。他在政治局里没有遇到过直接的或者有组织的反对，然而有一个人，即鲍里斯·叶利钦，当时莫斯科党委会的书记，却能顽强地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虽然他通常喜欢保持沉默，特别是当讨论的问题与他的权限毫不相干的时候。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是对叶利钦持有某种赏识，因为正是总书记先前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

在规定的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休会期间，所有与会人员都一起聚到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大餐厅的大长桌上用餐，每个人只能从仅有的两种简单的食谱中选菜，自然食谱里不会有精心制作的佳肴，也没有烈性酒，只有菜加咖啡。人们的谈话将集中在新闻和当日的会议题目上。

政治局的会议不保留正式记录，当然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要秘密地做一些笔记。政治局的决定将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发出并在一个严加控制的官员名单中传阅以便落实和监督，这些文件都被保存在总书记的直辖部门里，锁在一个“特别的文件柜”中。

617

会议的议题总是出自于总书记自己的决定，政治局的要员们有权建议增加或改变议题，但很少有人这么做。要讨论的文件在会议前的一至两天里由中央委员会的总务部下发，这个部是在总书记直接管辖下的一个主要行政机构。

总务部在中央委员会机构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它是由总书记最亲近的人领导的，那就是阿·卢基扬诺夫和以后的瓦·博尔金。卢基扬诺夫是位有才智和友善的人，但博尔金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倨傲不逊、心胸狭窄的官僚，令很多人吃惊的是像他这样一个人居然能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博尔金显露出他的真正面目是他不仅参与了1991年8月的政变，还在戈尔巴乔夫撤退到弗洛斯特被幽禁起来的时候变成一位向他从前的恩人发布最后通牒的代表团的头子。博尔金先前每天都有机会接近戈尔巴乔夫，评论他的来信并向他提供有关的最新消息以及外界关于诺曼克拉托拉——是我们用来说真正治理这个国家的官僚领导阶层的字眼——的谣

言。正是他提出政治局的会议议程建议而后经戈尔巴乔夫审议和批准的。

从表面形式上看,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没有副手,但实际上他的副手是叶·利加乔夫,这个人一直呆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直到在他统治的最后一刻弃他而去。利加乔夫掌握着党的日常事务并由此获取了在全国实在的影响,正是他主持所有的书记处会议。

利加乔夫还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党的另一位书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做他的副手。利加乔夫是个正统派,对他坚信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原则从不动摇。当我刚开始在书记处的工作时,戈尔巴乔夫就坦诚地告诉我,他尊重利加乔夫作为一个党的组织者的才干,这减少了他日常例行公务的负担,但就思想和文化发展而言,戈尔巴乔夫说利加乔夫根本不是一个“革新派”,因为他学到的全部理论差得远啦,然而他有足够的的能力维护党的思想纯洁。

利加乔夫的这些不足后来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利用,雅科夫列夫赢得了戈尔巴乔夫的信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把和总书记的私人谈话确立在一个高知识层面上,这使得雅科夫列夫成为戈尔巴乔夫信得过的谈话伙伴并将他的思想渗透给戈尔巴乔夫。

618 这种行动的结果使雅科夫列夫得以控制了思想领域,并在他成为羽翼丰满的政治局成员和戈的最亲密的助手之后戈尔巴乔夫最终将这一思想领域放心地交给了他。雅科夫列夫因此成了戈尔巴乔夫的邪恶智囊人物,诱使戈尔巴乔夫摧毁了他得以维系其权力的党组织。

戈尔巴乔夫从不同他的任何一位助手保持太近或者太远的关系,他可以轻易地抛弃一位原来的同事而置他于痛苦和失望的境地,当他下台之后没有一个政治局成员出来为这位前总书记和总统辩护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维埃领导人之间不存在私人友谊,他们的家庭也不保持密切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成经常被克格勃跟踪和监视而造

成的心理障碍所致。我们只能在为全国的节日举行的正式集会上，或者在为高级外国嘉宾举行的晚宴上，或者戈尔巴乔夫夫妇在他们距雅尔塔很近的克里米亚的夏宫里举行的年度晚餐上得以见面。碰巧在疗养所休假的政治局成员和党的书记都能够接到邀请出席。

举行此类晚宴的地方是在查尔·亚历山大三世的夏日行宫上为斯大林盖起的一所小房子里。宴会上的气氛是温和的，只有一件事情多多少少地搅乱了这种气氛，那就是大家轮流向总书记和他的夫人敬酒的传统，戈尔巴乔夫看来很喜欢这样，我们当中最年长的葛罗米柯总是第一个开始这一礼节。

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主要在于他可以提名政府、党和军队的高级官员，这种提名相当于最终的任命，因为没有人想要反对他，他尽其所能到处安插他的人。

政治局除了通过提名还讨论对内对外政策、工业发展以及党务等各种类型的问题，只有军事问题不做详细的讨论，因为有另一个特别的机构——最高军事委员会去做，这个委员会又是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正因为如此，不是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了解在军事方面发生的事，这一点对于军事工业联合体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它可以在暗地里向总书记极力施加影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戈尔巴乔夫得以把高级将领们逐渐控制在手，他的这种做法是勃列日涅夫极少采用的。

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谈

619

当我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的国际部负责人时，我对这个职位的职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个部有大约200个职员，实际上负责全球的事务。我曾认为这个部在苏维埃外交政策上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很快发现它主要是同西方以及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和其他左翼组织以及激进的国际组织和群众运动打交

道,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联系则由书记处的另外一个部办理。我惊奇地发现国际部确实同第三世界以外的苏维埃外交不相干,而仅仅是偶尔在诸如安哥拉、索马里、埃塞俄比亚、阿富汗等一类国家中显现出其重要。这个部对我们同美国和西欧的关系与谈判毫不关注,也根本得不到有关这些的一点儿消息,它还被挤身在军备控制方面以外。我查了多年以前通过的这个部的章程,发现它只同其他国家的类似的政党打交道,与苏联外交政策没有一点儿关系。

造成这种情况有历史的原因,苏维埃政府的初期,列宁就宣布过将奉行两种政策,那就是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在这两者不发生冲突的时候,将以同样的热诚去执行,但如果相互冲突,共产国际得服从苏维埃国家的外交政策。一大批把世界革命放在首位的人转而信奉苏维埃的外交政策,然而这两种政策又总是同时存在和经常地混为一起,回忆以下越战时期我们同河内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某些政策是思想意识的结果,对它们的宣传不能为苏联的意图制造一种最好的形象,外国人很容易把一些全球阴谋或邪恶的扩张阴谋归咎于莫斯科的主人。

国际部按惯例地延续执行着共产国际的路线而外交部则处理国家的外交政策。

620 我与戈尔巴乔夫讲了这件事的荒诞无稽,而后他请我起草一个新的章程来反映他的新政策。我于1986年5月交给他一份附有章程草案的详细备忘录,他很快就批准了。章程中除了与外国的左派政党保持传统的关系之外,我还作了另外一些改变,即在“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上和所有国际关系中带根本性的问题上”要维护和执行党的路线,也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路线。为了强化本部的新机构,我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准许将外交部几位外交上的重量级人物和专家调过来,包括格·科尔尼延科,他曾是葛罗米柯的副手并继续做到葛的接班人谢瓦尔德纳泽外交部长的第一副手,格·科尔尼延科成了我的第一副手。我还把丘尔金调到我身边,他是一个很

有能力的外交官,以后也当了副外长。另外我还调来了一些军备控制谈判方面的专家。

1986年,戈尔巴乔夫强调坚持“日内瓦精神”的重要性并宣布了“到2000年建立无核世界”的裁军计划,他想同里根进行第二次会晤并对此显得有些焦虑不安和缺乏耐心,过去的一年里他们之间有不下25封信件来往,这对他们的私人关系给予了积极地推动。戈尔巴乔夫对前一次最高级会谈为他做的大肆宣传颇感欣慰,但这一次他想得到的是一次有重要成果的会议。他在1986年上半年几次在政治局提到这一点,但并没有详细说明会议日程是哪一些,尽管星球大战还经常作为通向胜利的潜在阻力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1986年2月底,他向他的一些助手透露:“也许是到了不必再害怕战略防御计划的时候了。美国正在指望我们也准备建立一种像战略防御计划一样耗费巨大的防卫系统,同时希望他们在技术上的领先而赢得这场军备竞赛。但我们的科学家告诉我说,假如我们想破坏或是抵消掉美国的战略防御系统,我们只需花费美国计划所花费的十分之一。”

这事实上是戈尔巴乔夫同一大批知名的科学家经过深思熟虑地考证和磋商而得出的结论。但在我们的军工联合体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逐渐地开始改变他与科学家磋商后得出的看法,直到最后坚持要里根从战略防御计划撤退作为关于裁军的新的一轮最高级会谈召开的先决条件。戈尔巴乔夫告诉政治局我们自己的战略防御计划系统的花费将超过5000亿卢布,他问他的同事们:“我们从哪儿弄这么多钱?”但军方极力地劝他相信我们的战略防御计划系统在未来的核冲突中将会对美国拥有第一次核打击的优势,这种观点却促使他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对派。

621

直到戈尔巴乔夫去克里米亚度假时,政治局还没有做出关于最高级会谈的最后决定。我也正在那儿休假,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已决定向里根建议在这个秋季举行一次会晤,会晤地点是在莫斯科

和华盛顿之间的某地，可能在伦敦或是雷克雅未克，主要的议题是核裁军。谢瓦尔德纳泽已经同意了他的这个想法，在提交到政治局讨论之前戈尔巴乔夫征求我的意见。

我支持了这个意见，但询问戈尔巴乔夫究竟他想和里根讨论的核裁军具体的是什么内容，他回答说如果里根总统放弃战略防御计划的话，他将提出大规模削减战略武器的建议。我告诉他我不大相信里根会放弃他最中意的战略防御计划项目，但是戈尔巴乔夫说他要坚持这一点。谁知道呢？他有点犹豫不决，也许里根最终会放弃战略防御计划，作为交换他将会得到想要的大规模削减核武器。如不能实现这一切的话，戈尔巴乔夫仍然指望他关于核裁军方面的激进主张能够让他赢得全世界的注意。

1986年10月11日至12日，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会见了里根，之后各自都极度失望地离开了。

这次会晤是相当引人注意的，因为在我们两国的关系史上这还是第一次，确有就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达成协议的可能。里根出人预料地接受了这个大规模地削减核武器的想法，甚至同意在10年之后完全销毁核武器。但是他拒绝对反弹道导弹条约承担义务，这个条约有可能妨碍他推行星球大战计划。戈尔巴乔夫极力想说服里根缓解一下他的立场，但未成功。

有一段插曲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戈尔巴乔夫和里根深夜结束了他们冗长而又激烈的会谈，在他们离开会议大楼时因未达成协议而默默无语地走着。走到总统的轿车前时，他们停下来相互告别，我碰巧就在旁边因而做了临时翻译，在那个寒冷的冰岛之夜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话。

戈尔巴乔夫用一种他无法隐藏的抱怨语调说：“总统先生，你错过了这个唯一能载入史册的机会，这位被载入史册的伟大总统为核裁军铺平了道路。”

里根阴沉地回答：“那对我们两个人都适用。”

在驱车去机场的路上，里根长时间保持沉默，他的办公厅主任

唐纳德·里甘和他坐在同一辆车上。里甘后来告诉我，总统最后打破了沉默说：“唐，我们差一点就和戈尔巴乔夫达成协议了，真是太遗憾了！”随后他伸出他的大拇指和食指相距半英寸，说：“我们就差这么一点儿。”总统有些心灰意冷。

在这同时，我和戈尔巴乔夫坐一辆车去会见等候在另一栋楼里的记者。他对里根顽固地坚持战略防御计划非常气愤，他认为里根对战略防御计划的顽固坚持是他们这次会谈失败的主要原因。戈尔巴乔夫急于要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谴责里根，和他在一起的我们几个人尽力使他平静下来。在车里呆了足有10到15分钟后，他恢复了自控能力。他告诉我们将对里根提出强烈地批评，但不准备关上将来继续会谈的大门，免得让新闻界把这次会谈描绘成一次彻底的失败，而应把这次会谈视为朝着达成协议所迈出的第一步。

作为雷克雅未克会谈的见证人，我觉得这次会谈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所负的责任并不比里根少，因为他也为这次会晤设置了障碍。他原本手头有一副好牌，这就是他自己提出的裁军建议，如果他不像里根顽固地坚持战略防御计划那样顽固地反对战略防御计划的话，他的这副牌可能玩得会更好。如果他们能在大规模削减核武器方面达成协议，那么可以把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推到以后。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在以后的谈判中使用了这一讨价还价的战略，直到里根政府的结束。

在政治局对雷克雅未克会晤的回顾总结会上，戈尔巴乔夫仍然对里根气愤不已，但他说同里根会见毕竟是值得的：首先，这次会晤向全世界表明苏联领导人确实准备认真地对待裁军问题；其次，里根出人预料地表示他愿意就削减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再次，美国在欧洲的北约组织伙伴将会对里根不惜一切代价的继续坚持战略防御计划提出批评。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已在盼望他与里根的下次会议。政治局的元老和军工联合体已悄悄地反对他的“新思维”以及他和美国的和解计划，但他已通过宣布坚定不移地实行新外交政策的意图战胜

了他们,他充分地意识到他能够依靠党、依靠他那时所得到的公众对他的支持战胜他们。

匆忙之中的戈尔巴乔夫

623 戈尔巴乔夫处理政治局事务工作的态度逐渐地改变了,他的作风变得更加独裁与专横,该由政治局讨论的外交政策问题已转到由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过问。最初,戈尔巴乔夫和外国领导人特别是美国领导人安排的一切会谈都是通过政治局详细讨论决定的,不管会谈地点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国外。通常葛罗米柯先呈上外交部的讨论稿、需要签署的文件草案以及其他国际会议和会谈所必需的东西,但是到了谢瓦尔德纳泽当外交部长时,几乎没有什么上呈的文件和讨论的事情。显然,戈尔巴乔夫是在力求避开政治局的路线、方针和指令,自由地同外国的国家元首交往,在谢瓦尔德纳泽的帮助下,戈尔巴乔夫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事实上而不是在形式上,戈尔巴乔夫在单枪匹马地设计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又同样是单枪匹马地执行这一政策。

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他与美国总统里根和接下来的布什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中,戈尔巴乔夫越来越热衷于那种事前毫无准备的临时做决定,他不和我们的专家磋商就突然做了妥协,而这一妥协是我们的军方长期以来都认为的对美国人的单方面让步。

关于戈尔巴乔夫作风的一个事例将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那是在1987年的4月,国务卿舒尔茨到莫斯科和戈尔巴乔夫进行欧洲导弹问题的谈判,苏领导人准备放弃使用苏联的 SS-20 导弹和其他武器,以换取美国放弃自1983年以来部署在欧洲的与这种导弹类似的美制导弹,讨论中的欧洲导弹射程是在500到1500公里。在这一谈判交易中,双方将销毁所有的这些中程导弹,但军方坚持要保留我们的射程仅400公里的100多枚 SS-23 最新型导弹。舒尔茨

到达前,戈尔巴乔夫要求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和我准备一份会谈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应总结出苏美双方的立场。阿赫罗梅耶夫提出具体地建议:如果舒尔茨试图将 SS-23 导弹也包括进去的话,戈尔巴乔夫应予以拒绝,因为这种导弹的射程低于条约草案中所做的限定。

在先前的谈判中美方试图将 SS-23 导弹也包括进去,但没有坚持必须得这样做。当舒尔茨来到时,他执意坚持要拆除这批新导弹。戈尔巴乔夫开始并没有理会这一点,但临近会谈结束时舒尔茨再次提出了 SS-23 导弹的问题。他强调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同意包括这些导弹在内的话,他就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将非常接近一项条约,这项条约将由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华盛顿举行最高级会谈时签署。

使阿赫罗梅耶夫和我大为震惊的是,戈尔巴乔夫犹豫了一下之后就对舒尔茨说:“就这么定了。”接着和舒尔茨握手,其他官员也相继告辞了。

阿赫罗梅耶夫惊呆了,随后问我是否知道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在最后一刻改变立场,我像他一样感到茫然。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转身跑向总书记的办公室,半小时后他回来了,告诉我一个离奇的故事:当他问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这么突然地就全部放弃了这一批先进的导弹,而什么也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时,戈尔巴乔夫答复说他可能犯了个错,因为他“忘了”我们在备忘录里对他的提醒。阿赫罗梅耶夫接着建议赶紧派人到舒尔茨那儿去纠正我们的立场,趁舒尔茨还没有离开莫斯科。戈尔巴乔夫非常生气地对他大叫:“你是在建议让我们告诉舒尔茨国务卿,作为总书记的我不了解军事方面的问题,在我的将军们给我做了纠正之后,我现在来改变我的立场,让我食言吗?”

故事结束了。戈尔巴乔夫在一般情况下有极好的记忆,像这样的事他没有理由会忘记。阿赫罗梅耶夫非常怀疑戈尔巴乔夫早就筹划出这一切,因为戈尔巴乔夫知道参谋部不想要他放弃 SS-

23导弹,而政治局也会支持军方。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后来向领导做了妥协从而排除了签订条约的最后障碍。

从12月8日至10日,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中程导弹的条约,他再一次在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讨价还价和磋商的情况下做出了重大让步。戈尔巴乔夫不仅同意销毁我们部署在欧洲的全部 SS-20导弹,还同意销毁苏联在亚洲部署的这种导弹。在亚洲的 SS-20导弹是我们用来对付中国和美国在日本及印度洋的基地所做的战略防卫的一部分,因此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退让。条约从政治上向世界传送了一重要的信号,两个超级大国终于认识到军备竞赛不能加强他们的国家安全,而控制军备却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的军事指挥官以及一些政治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为了和华盛顿达成协议所做出的重大让步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他们也看到戈尔巴乔夫受了一直同国防部闹冲突的谢瓦尔德纳泽的极大鼓励。

这场斗争由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和国防部长谢·索科洛夫牵头闹到了政治局。这两个部关于苏美裁军谈判的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也走进死胡同:两部代表都遵照他们各自的部长的指令行事,这些指令又是无法协调的。谢瓦尔德纳泽经常向戈尔巴乔夫抱怨军方,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一再地调解双方。

625 随后,戈尔巴乔夫委派列维·扎伊科夫领导联合部长委员会,为裁军谈判准备我们的立场。扎伊科夫是政治局成员,他同军事工业长期打交道并与军方有着良好的关系,但作为一个老党员,他还是忠于总书记的。尽管这样,戈尔巴乔夫还是私下找他谈话做工作,终于把他给争取过来。扎伊科夫在谢瓦尔德纳泽和索科洛夫之间保持着一个适当的平衡,他的使命开始向前推进,但没有像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所期望的那样快。

虽然戈尔巴乔夫有些急躁,但最初还比较谨慎,想避免同军方的直接冲突,突然发生的一个对他特别有利的事件给他提供了良

机。1987年5月29日，一架单引擎的西德制造的小飞机侵犯了苏联的领空，它在未被苏联的防空系统监测到的情况下一直飞到莫斯科，造成了轰动一时的外国飞机降落在红场的奇闻。这架飞机是由一名叫马赛厄斯·拉斯特的年轻的业余飞行员驾驶的，这件事震惊了苏联领导人，他们一直确信飞到苏联的领空而不被抓到是不可能的，这件事也使国防部陷入一片混乱。

戈尔巴乔夫充分地利用了军方的混乱状态及其威信的重大受损。就在拉斯特降落红场的第二天——那是个星期天——戈尔巴乔夫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就强烈地谴责“国防部的彻底无能，国防部必须把这一特别事件向党和人民做出解释。”他要求国防部的官员立即解释。

国防部副部长伊万·卢舍夫向政治局报告并承认这件事确实从未听说过，他试图为空防系统的失灵辩解，称现有的空防系统仅仅是为截击现代化的军事飞机而设计的，并不能监测到时速为150至170公里飞行高度不超过300至400米的小飞机。这一点听起来并不能令人信服，卢舍夫不得不承认事故发生的唯一责任者是国防部。索科洛夫部长承认国防部并未开发能拦截低空飞行的单一目标的空防措施，他还承认国防部的有关空防部门之间没有密切地配合。

一阵激烈的争论过后，戈尔巴乔夫发言，他讲到军队里形势之严重，军中高层领导人“惧怕党朝着改革的方向转变，也害怕新思维思想”，敦促他们不得延误马上纠正这种形势，他紧急要求国防部有一个更加强有力的领导来“增强军队机构的政治责任感”。然后他转向国防部长说：“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我对你的人格的完美没有怀疑，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若我是你，我将立即辞职。”

索科洛夫大为震惊，起立并当场请求辞职，戈尔巴乔夫“代表政治局”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辞职，并补充说，为缓解此事给他带来的刺激将宣布他退休。

休息15分钟后，戈尔巴乔夫提议任命索科洛夫的副手德米特 626

里·亚佐夫为国防部长,他先前已被戈尔巴乔夫安排召见。当时亚佐夫任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干部部长,因此他与党的中央委员会有密切的联系。亚佐夫对戈尔巴乔夫比索科洛夫更加唯命是从,因而戈尔巴乔夫完成了一次悄悄的军事政变。新任国防部长不了解关于裁军谈判的事,而且同它们根本就不发生什么关系。由亚佐夫当国防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裁军谈判中感到很省心,来自军方的反对意见变得温和了。索科洛夫和大约100名将军、上校以及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和不赞成对美国人退让的军界保守的领导人都一起退下来。但就总体来说,军方仍对戈尔巴乔夫不满,这一点将在以后一再地表现出来。

得以控制了军方后,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裁军问题时变得更为积极和有信心,他想尽快地达成目标,他被这项任务的巨大挑战性所吸引,并被国际上对他的喝彩声弄得神魂颠倒,所以他未经认真地考虑后果就擅自行动了,这正是他的毛病所在。他要么不能,要么太急促地设想事件朝美好的方面转化,他经常是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去实施他宏大的规划,只有一个令人陶醉的蓝图。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当有人对他急剧的改革表示谨慎地关注时,戈尔巴乔夫总是打断对方,认为这同“新思维和改革精神相抵触”。

在1988年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前戈尔巴乔夫紧急促请政治局通过了一个鲁莽的单方面削减50万武装力量的决定,部队裁员对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影响是好的,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因此得到了大力赞许,但是苏联政府没有把如此庞大的裁减人员队伍重新融入平民经济的计划。之后于1990年戈尔巴乔夫又签署一项北约同华沙条约集团国之间在欧洲削减常规武器的条约,这一条约要求进一步削减我们的武装力量。这一项政策原则上说是好的,但却造成了严重的国内危机,因为从德国和东欧撤回了大批的苏联武装人员,国家面临着如何安置这些退伍军人的棘手问题,这一灾难性的任务以后又传给了俄罗斯联邦。他们住在哪儿?他们干什么?没有越冬的房子给他们,没有地方安置他们的家属而只能安排他们

在最简陋的居住条件下过冬。戈尔巴乔夫证明了他是一个最差劲的组织者；削减军队的规模并把裁减下来的士兵送回家这原本是恰当而又确实必要的主张，但由于拙劣的安排却成了国家严重和长期的负担。

面对东欧的剧变，苏联人民得不到政府对这些变化做出清楚地解释，最初感到迷惑不解，后来就变得愤怒起来。部队的士气削弱了，军队和老百姓都弄不明白苏联的军队到底是怎么啦，不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的胜利者吗？怎么就像被抛弃掉一样一下子被遣返回家了呢？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时代不光彩的一幕。

戈尔巴乔夫、布什和德国

戈尔巴乔夫的声望从1990年起就在党内、军队里和百姓中迅速地下降了，国内的经济问题更加速了他威信的下落，然而在国外他的威望却暴涨。他能否在苏联外交政策朝着新思维的转变中起领导作用呢？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在同美国的迅速和解以及令人难以忘却的谈判中都是有功的，正是这种和解与谈判导致从根本上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

但是回头看看，现在很清楚，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的外交常常不能从美国及其盟国那里赢得一个稍好一些的协议。在签定限制欧洲导弹的条约时，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接受在另一条约中写进削减苏联武装力量的一个沉重包袱，这个包袱就是1991年6月14日在维也纳签署的关于欧洲常规部队的一项条约，削减这些常规部队的代价是沿俄罗斯南部边界和高加索地区出现的大动乱，俄罗斯的军队人数在那些地区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莫斯科想对这个条约的有关条款重新谈判的一切努力都等于白费。

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1991年7月31日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时签署的，如果不是华盛顿在这个条约中再次占有军事上的优势的话，这也能算是一个好的条约，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一方对

削减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监督执行承担义务。起初戈尔巴乔夫想单方面地宣布如果反弹道导弹条约遇到违约的情况，莫斯科将自动撤消对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但是后来他决定不把这次签定条约的仪式复杂化，因此，甚至在罗纳德·里根离任之后，仍可听到美国重提里根所热衷的战略防御计划。

628 戈尔巴乔夫和他忠实的副手谢瓦尔德纳泽向西方做出了慷慨的让步，本来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得到使苏联在欧洲安全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以及苏联在欧洲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能够做到但由于缺乏经验和对达成协议缺少耐心，加上过分的自信和被西方舆论的大加吹捧，使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常常被他们的西方谈判伙伴智取和击败。有时他们做出的让步远远超出了必需，像在签署关于军备控制、东欧、德国统一、海湾危机等协议中就是如此，即使在苏联分裂之后他们还继续这样做。戈尔巴乔夫使苏联的外交变了形，他通过某种个人支持的渠道与美国的高级官员搞外交以避免他在政治局的同事和我们职业外交团的外交官们的批评，所有的一切都在愈来愈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先前通过我所进行的秘密渠道和我代表莫斯科同华盛顿达成的一切协议都必须通过政治局批准。）自1989年起，苏联的外交变得愈加乏力，原因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国内政治的迫切压力和他极力支撑他越来越低的威信造成的。结果是我们适应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的能力明显地下降了，这在不少程度上是由戈尔巴乔夫本人造成的。

党的国际合作部在1986年发挥了短暂的作用之后已起不到什么作用了，逐渐地它又恢复到它原来的职能上。1988年戈尔巴乔夫命令国际部向别国的共产党以及其他的外国组织和运动解释他的改革的意义，“因为他们对这些不理解和有迷惑”，但是就连我们自己也迷惑不解。

国防部的作用下降，谢瓦尔德纳泽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他想垄断外交政策和避免来自国际部的竞争，因此我所领导的国际部

就不再每天积极地参与外交政策了,戈尔巴乔夫时不时地使用我是把我当作他的苏美关系的私人顾问,特别是在他接下来与里根和后来的乔治·布什的会晤中均如此。他有时派我做他的私人代表同美国的高级官员直至总统秘密地讨论一些事情,但是我不再系统地涉及苏美事务,这些事务连同其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只由两个人来处理,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

戈尔巴乔夫开始走向实质上的帝制统治,在谢瓦尔德纳泽的热烈支持下,他绕过传统的政策制定机构,越来越多地由他自己做出重大决定并把整个国家的方向导向国外。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布什和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也把美国的外交政策集于一手,而且赶非正式外交的时髦,借同外国领导人面对面地自由交谈或打热线电话相互起作用。美国总统和苏联总书记好像都没有感到有同他们的政府磋商的必要,也不觉得有必要向他们的人民解释国家前进的大方向和他们奉行的政策的含义,然而就是这一切形成了冷战以后的世界格局。

629

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的核心代表着所有国家共同的价值利益,即:防止核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结束冷战。这并不否认在我们的外交上有国家利益的存在,和在沿着这些路线前进的全面重新设计中有必要的灵活性与想象力以克服老的教条,苏联外交团中的大多数人都对此持热情的欢迎态度。

但是很快地他们变得困惑和沮丧了,戈尔巴乔夫一再地耗费掉苏联的谈判潜力,他公开地标榜“全人类的利益”并把这实际解释成他不断地做出决定,同西方轻率地达成一些协议从而忽视了苏联的重大利益。在乔治·布什就任总统之后不久,美全国安全委员会于1989年3月13日通过了一个秘密文件,文件称美对苏政策不应以“支持”戈尔巴乔夫为目的,而应以同整个苏联打交道为目标,以便“推动苏联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布什政府相当成功地作了这种推动,军备控制随着1989年底柏林墙被推倒而垮台,华盛顿同波恩联合在极其重要的领域从戈

尔巴乔夫那里得到了最重大的让步,这就是德国的统一和欧洲的安全,两大军事集团把欧洲分割开来达40年之久,同时也奠定了苏联的安全基础。

630 就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的较早时候,苏联外交部就开始积极地探讨新的思想,为了同西方讨论全球和地区的安全体系问题。我们设想这种新的思想在全球范围里应该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在欧洲应该是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框架下的地区安全体系。这是苏联政策的一个总目标,尤其在欧洲是这样,戈尔巴乔夫全力支持这个总目标。他热心地把他对欧洲地区安全思想的想象发展成一个“共同的欧洲之家”,在这个家园里,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和平地住在一个公寓楼的各公寓里,对美国和加拿大来说,如果不是住在同一栋楼里也是住在同一条街上。华盛顿对他的热心没有做出反应,但也没有公开地拒绝,美国正在悄悄地同它的盟国探讨德国统一的可能性。

当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12月2日和3日在马耳他会见布什总统时,德国的统一问题并未列入议事日程,但这一想法却在他们每个人的心里,因为就在不到一个月之前柏林墙倒了,东西德在半个世纪里第一次自由地混合为一体。布什在非正式的谈话中小心地试探戈尔巴乔夫的口气。(这是布什开始一项谈判所乐于采取的方法,他会轻轻地试探着把一个想法毫无压力地传给对方,有时还会再重复试一次,然后等待看对方是不是上钩。)

戈尔巴乔夫回答得很抽象:我们的政策是在坚持一个全部欧洲进程和逐渐建设一个“共同的欧洲之家”基础上制定的,在这个共同的欧洲之家中一切国家的安全利益都应受到尊重。但他没有具体说明能够或者应该怎么做,尽管手中已有一份外交部写的秘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提出了一项具体的政策,即德国的统一应该是欧洲大气候逐渐转变的最终产物,在这个大气候中北约和华沙条约集团应该将他们的大方向从军事转向政治并通过相互协议最终解散这两个组织。在马耳他未能就德国的统一问题进行更多的

讨论,但对布什和西方总的来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拒绝将统一问题作为讨论题目,华盛顿和波恩害怕我们可能会做的就是拒绝讨论。

马耳他会见之后不到一周,布什就写给戈尔巴乔夫一封私信,再次提起德国统一问题。总统写道:统一应该在自决的程序下进行而不应过早地预言两个德国将如何决定和成为欧洲共同体一体化的一部分,这种统一应该是“和平的、渐进的和在一个演变过程中进行的”。

因此双方实际上同意德国统一是一个总进程的一部分,这个总进程将把欧洲安全与稳定引向一个新的体制,过去40年的安全与稳定是靠相互对立的两大坚强军事集团组织的力量均势来保障的。这种赞成逐渐演变到一个新的全欧洲体制的立场得到了政治局和我们的欧洲及德国问题专家的支持,但是后来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在国内的动乱事件中,他实际开始自己处理关于德国的一切谈判或者与谢瓦尔德纳泽乘双驾马车,把我们的职业外交官们甩在一边,而且几乎不通知政治局,尽管他们仍然赞成逐渐演变进程。在西方通过秘密渠道传来的压力下,他开始把德国统一问题与总的欧洲安全问题分开来。

的确,当他于1990年6月2日在华盛顿同布什进行最高级会谈时,他即席谈了统一后的德国中立化的想法,也谈到北约和华沙条约集团两组织在逐渐合并其机构的同时给予统一后的德国以成员国地位的设想。但他的犹豫不决很快就结束了,当西方国家为德国统一不断施加压力和他国内改革停滞不前时,戈尔巴乔夫开始放弃他原来的立场,以此希望西方能够继续同他合作。

631

出乎西方的预料,1990年7月,在一个不为公众注意的边远的高加索休假地戈尔巴乔夫同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举行了一次闪电式的会晤,他不顾政治局仍然存在的相当强烈的反对意见,撤消了所有的条件同意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成为北约的成员。后来布什总统的一个助手告诉我:科尔自己承认对戈尔巴乔夫的

突然接受感到大吃一惊。德国总理像所有西方国家一样已准备同戈尔巴乔夫进行长期而又艰难的谈判,并且为达成任何一项协议准备在有争议的部分做出几套退却的方案,科尔和他的随从人员在回国的飞机上庆祝这一历史事件的到来,他们完全没有料到这件事在讨价还价之中来得如此之快。华盛顿也没有隐瞒它的高兴,德国统一问题对美国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也等待着同莫斯科做艰巨的讨价还价,后来布什、贝克、基辛格和其他一些有名望的美国人告诉了我这一切。

这样预料中的一个长期的、逐渐的演变过程被戈尔巴乔夫仅用半年就结束了,他为什么这样匆忙?他当然清楚地知道德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一进程必须以确保苏联和整个欧洲的安全与稳定的方式来完成,毕竟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压力之下,他主要的意愿是同西方共建一个新的欧洲,结果是苏联的选择明显地缩小,莫斯科在新情况下自我调整的能力大大地削弱。

一开始戈尔巴乔夫还有主见,这就是德国的统一应该与新的欧洲安全机构的形成同步进行,但他没有为这一宏大设想而奋斗,特别是当东欧的政权开始垮台和这个地区越来越不稳定的时候,他实际上并没有试图把这一重大战略变为具体的行动,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他确实在华沙条约集团国遭到这种巨大变化的冲击时甚至没有提到政治局去讨论,他完全被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挫败了。他那些缺乏战略而又处于思想混乱中的同事们,有的是气愤,有的只是消极被动,眼睁睁地看着东欧这些国家一个接一个地从华沙条约这个政治与军事联盟铁幕中挣脱出去,这一铁幕虽然不受欢迎,但它还是控制了它的成员国并制止其内部发生自我毁灭的冲突达两代人之久。政治局的会议上对每个国家的形势进行了逐一地讨论,但是这种讨论是混乱不堪的而且被戈尔巴乔夫空洞的言辞所主宰,他指责东欧共产党的领导人没能进行改革和不采纳“新思维”,有时他一时兴起就匆忙去访问那些领导人并教训

他们,但是这只能促使当地政权的瓦解,尤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这样。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垮台

我相信戈尔巴乔夫从来就没料到整个东欧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脱离了苏联的轨道,也没有料到华沙条约集团瓦解得如此之快,他成为他自己政策的恶果的见证人。忧虑重重的顾问们对东欧的瓦解向政治局和戈尔巴乔夫敲过警钟并询问如何对待这一安全问题,克里姆林宫整个处于混乱状态中,对这种瓦解拿不出应急方案来。军事干预被排除了,戈尔巴乔夫绝望地重复着他的主要理论:与西方共同探讨在“新的欧洲”建立一个新的安全体系,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匆忙地接受了德国统一后丢掉了他最好的一张牌。

到了1989年谢瓦尔德纳泽在私下持有比戈尔巴乔夫更加悲观的观点,正值外长在格鲁吉亚的黑海度假时,他的私人助手谢·塔尔阿森科向他报告来自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一封紧急电报,齐奥塞斯库要求华沙条约集团国对波兰进行一次军事干预,因为波兰的反共产党的团结工会赢得了全国大选。莫斯科迅速地拒绝了,正在海滨度假的谢瓦尔德纳泽心情忧郁地对他吃惊的助手说,莫斯科最终会失去它对华沙条约集团的控制,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事态的必然发展将迫使苏联走上分裂,特别是波罗的海几个共和国的退出。来自格鲁吉亚的他的几个合作者之一后来说他从未喜欢过苏联,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想着他的家乡格鲁吉亚能够独立,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华盛顿,不论是里根政府还是布什政府都没有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成功持特别乐观的态度,1987年春,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访问莫斯科时非正式地对戈尔巴乔夫谈到她最近在华盛顿访问了一些高级官员,他们认为苏联的改革失策了,这一失策将会搞垮这

样一个中央大国的整个经济结构，特别是当戈尔巴乔夫推进这项改革太快的時候。她告誡戈尔巴乔夫要谨慎，尽管她自己也在将英国的国家工业转为私有化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但她还是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成功。戈尔巴乔夫在向政治局报告时取笑那些未指名的极端保守的美国人，他补充说也许他们有道理，他认为无论如何需要15到20年的时间才能重新调整好苏联的经济，但这只是事后的想法，因为他没有照此去做。

在1989年初，作为准备马耳他首次最高级会谈的一部分，戈尔巴乔夫派我带着他的指示和他给布什的一封私信到华盛顿同新总统讨论最高级会谈的议题。我同布什相识已经20年了。（戈尔巴乔夫认识布什是在1988年12月里根安排的一次午餐上，里根即将结束他的两任总统任期，戈尔巴乔夫希望与当选总统布什谈谈，但由于里根抢了镜头，他们只作了一次短暂的私下会晤，我做翻译。他们同意开始进行积极的私人联系。）布什向我承认苏联最近发生的动乱事件促使他重温了苏联的历史，为更好地了解共产党在这个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作用。总统向我提了一个“不是很外交，但是很直接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能够渡过这段混乱时期吧？他想要戈尔巴乔夫做他的谈判对手，但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前景不能确定。布什询问了能确保戈尔巴乔夫继续他的领导的有关法律与司法程序，政治规则与传统，这种继续领导的确保应“不考虑某种党的突然的决定”，就像免除赫鲁晓夫的职务那样的突然决定。他对提出这种冒犯人的问题表示歉意并向我保证不向任何人泄露这次谈话的内容。

我告诉布什他对形势的复杂性的看法是对的，改革带来了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性又使人很难看得更远。我说戈尔巴乔夫刚刚被选为总统，即便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现在也不能解除他的职务和剥夺他的权力。但是形势又很独特，许多事情都不明朗，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党始终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现在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看起来戈尔巴乔夫起码在不久的将来还能够作为布什

在外交政策上的对手,而且像所期望的那样同美国签署一些意义深远的协定,特别是在裁军方面。

我说:“你可以指望得到这个。”

两天之后布什给了我一封致戈尔巴乔夫的亲笔信,信里强调他们之间进行私人接触的重要性和“改革不仅对苏联人民而且对他的子孙后代都具有的重大意义”,布什显然决定指望戈尔巴乔夫。

但是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控制事件的能力已接进尾声,在头四年的执政时间里,他是这个国家毫无争议的领导人,到1989年底,在某种程度上他还能控制局势并使之运转,但是到1990年苏联的形势进一步地恶化,戈尔巴乔夫开始感到他大势已去。他拼命地想加强他的地位,虽然不为大家所知,但他确实不遗余力地想从美国 and 布什新总统那儿得到财政和道义的支持以继续他的改革,并以此来支撑他的政权和他在国内的声望。

634

到1989年12月马耳他会议的前夕,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还不能肯定布什是否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种疑问反映在谢瓦尔德纳泽于1989年11月8日给戈尔巴乔夫的一封信封绝密的私人备忘录里,备忘录称:“布什看来是一个优柔寡断的领导人”,由于受到各种不同力量的牵制,布什还没有就对苏联领导人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苏联的改革问题决定采取什么态度。谢瓦尔德纳泽说布什显然不会介意利用莫斯科改革中遇到的困难为他自己谋利益,因此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在马耳他最为重要的是得到布什对他的改革计划的公开承认,这是符合两国利益的。政治局认为这是最高级会谈的一项重要任务。

戈尔巴乔夫怀着这样的印象离开了马耳他,他已得到布什对他的改革的支持,并把这看作是他们的会晤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1990年1月21日他向政治局报告说他对布什“准备在经济领域中给我们一些实际的援助表示欢迎”,并称这绝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同时也是对苏美合作之必要的相互理解,这种理解在世界局势

发展到现阶段的关键时刻是一个稳定的因素。

1990年5月中旬,就在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前夕,贝克国务卿访问了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同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私人会晤谈我们的国内问题,贝克极表同情。当贝克告诉他布什政府赞成改革因为改革“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和“华盛顿已将苏美关系从对抗转变为对话与合作”时,戈尔巴乔夫轻易地就被这几句重新保证的话冲昏了头脑。

但事实上就在这之前不几天,美国驻苏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向来访的美国马里兰州州长威廉·谢费吹风时还说:苏联正经受着经济衰退、民族矛盾加剧、犯罪率上升甚至有军事政变的威胁。尽管有逐渐民主化的希望,但他认为仍需要50年到3/4世纪的时间才能够在这个国家牢固地建立起民主。马特洛克坦率地说,当美国支持戈尔巴乔夫时还应利用戈对华盛顿的访问来加强美国的利益,将已削弱了的苏联朝着能接受政治和经济的让步推动,包括接受德国的统一。

从华盛顿访问回来,戈尔巴乔夫再次满意地对他的同事们说,布什对“我们国内的困难”表示理解并再次提到“美国决不会对苏联造成任何威胁”的私下保证,戈尔巴乔夫强调他“没有感到来自华盛顿方面的更多的威胁”,并宣布他成功地利用了布什实质是美国对改革的支持,也使华盛顿相信苏联的改变将对美国有利。关于德国问题他含糊不清地说,尽管对统一后的德国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双方都寻求一项符合全欧洲进程的一部分的解决办法。可是他隐瞒了他想同西方尽快达成协议的愿望以帮助他摆脱在国内的困境,这种愿望也使他做好了一切准备接受西方的要求。他在此之后的第二个月同科尔会见时就接受了这些要求。

布什同戈尔巴乔夫保持的密切接触和不时地对戈尔巴乔夫的公开赞许对他起到了特别的安慰和消除他的疑虑的作用。在1990年7月,当德国的统一问题处于成败未卜的关键日子里,布什先打

电话后写信给戈尔巴乔夫,信中提到在伦敦召开的西方七大工业国集团首脑会议,他写道:所有七国领导人都同意欧洲“积极和迅速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您精明的外交政策”带来的,还说,他知道戈尔巴乔夫想听到的是“北约准备同您合作建立一个新的欧洲”。布什说作为一个总统他也在考虑“北约自身的逐步转变”。所有这一切都令戈尔巴乔夫倍受鼓舞。

1990年8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给布什的一封冗长的复信中表示“对同布什总统密切地合作解决这些历史问题充满信心”。一个月后,在1990年9月赫尔辛基会晤期间,布什再次称赞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这种称赞令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无比高兴。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布什和贝克“确定无疑地对处在困难之中的苏联努力进行社会的根本改革给予坚决地支持”。

但是所有那些乐观的期望从未变成现实,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失败,国内危机四起,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混乱,这一切削弱了苏联的潜力。在冷战进入最后的紧要关头,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缺乏连贯的、平稳和坚定的外交政策来结束这场冷战,这种结束应该是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恰当而又体面的方式来进行的。随着冷战的结束,平等将会是真实的,这种真实的平等将能创造出一种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国际关系将被改变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并将进入一个没有冲突的时代。在令人费解的仓促行动中,他们放弃了重要的地域政治和军事立场,而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机会而且是严重地错过了这个机会,指挥棒失灵了,他梦想之中包括所有国家也包括俄罗斯的具有一个新的安全体系的新欧洲并没有成为现实,欧洲的安全问题在冷战结束很久之后仍然是让人猜不透的一个谜,欧洲、俄罗斯和美国的联合努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戈尔巴乔夫在推进我们的国家自由和民主的进程中还起了突出的作用,在把我们的经济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进

程中同样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的“新思维”,特别是国内的经济政策远不如他在国际竞技场上来得成功,“新思维”在不少方面都是灾难。他的思想前后矛盾,直到他当政的最后几天,仍然重复着他的“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的座右铭。他坚信社会主义并拒绝对我们的经济结构进行急剧的变更,当他已经意识到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需要引进一些市场体制的成分时仍然如此。

637 他的政策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种聚合。但在公众场合,最引人注目的是1987年在华盛顿他与一批美国学者会晤时断然拒绝了这种说法,他在描述他的经济计划时从来不用“资本主义”这个字眼,而且他的俄罗斯联邦的接班人也继续回避这个字眼。戈尔巴乔夫最根本的失败在于他没有真正地懂得经济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政策,他始终在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特别是向外国人和科学院的院士们求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从事实上大规模的经济管理。从1986年到1989年我在政治局的工作和参与对重大问题的审议时从未听到戈尔巴乔夫为经济改革提出任何总的和详细的计划,不论是一年的或五年的或其他种经过仔细考虑的计划。他总是心血来潮地临时凑合一些计划,这些计划有时是在他从国外回来有时是他同有名的经济学家和西方杰出的工业家谈话之后凑成的。中国总理李鹏向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奥·亚·特罗扬诺夫斯基表示,戈尔巴乔夫改变观点如此迅速以致于中国人不能够恰当地研究它们。

在1986年改革刚开始时,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这样解释他的经济信条:苏联经济必须改革,尽管我们尚不能确切地知道如何实现这种改革,但我们必须开始。他告诉政治局他们都必须遵照列宁的教导去做:“在一切努力之中最重要的是投身到战斗中去,这样才能学会下一步该做什么。”好,我们已经投身到战斗中了,但是几年下来甚至俄罗斯的新领导也不确切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作为一个国内改革者,特别是作为一个国家和它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在实际问题面前越来越表现得毫无办法,常

采用冲动的、狂热和鲁莽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不仅使我想起温斯顿·丘吉尔对尼基塔·赫鲁晓夫讲的一段话,那是在1956年赫鲁晓夫访问英国时两位领导人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说的,这位英国政治家说:“赫鲁晓夫先生,您在您的国家正发起一场改革,那确实很好,但我想劝您不要太草率了,想用两大步就跨过一个大峡谷是做不到的,您会摔落下去。”

给戈尔巴乔夫政权以致命打击的是共产党在苏联的瓦解以及他在创建一个新的替代权力和权威机构上的失败。共产党连同她在全国各地方的支部,是从在莫斯科的最高领导到工厂和农村的管理骨干,作为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是这个国家毫无争议的统治者,因此他直到1989年还继续强调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在他自己的改革中的领导作用。

但在此后不久他开始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因为他一旦打开了民主与公开性的潘多拉盒子,来自党内的批评意见就增加了,他的政治局也不是完全一致地支持他的改革,戈尔巴乔夫不会忘记赫鲁晓夫在党内的一次政变中被即刻解除职务。由于惧怕失去在党内的控制地位和由此失去在全国的最高权力,1988年底他转而把议会的作用也控制在总统手里,这样他的职务就不能够由共产党罢免。但是这一切都是密室中的政治交易,只能削弱戈尔巴乔夫在全国的地位。1991年8月当议会禁止共产党的存在并支持叶利钦时,戈尔巴乔夫身边没有一个人追随。^①

638

到最后戈尔巴乔夫没了主见,对国内和国际需要优先处理的

^① 1991年8月19日,我独自一人呆在我外交部的办公室里工作,对发生在几个街区之外的政变感到忧虑。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了一个熟悉但又和当时的气氛极不协调的声音,声音带着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语调。“阿纳托利,你好吗?我是鲍勃·斯特劳斯,我作为美国大使刚刚来到莫斯科,我找不到任何一位苏联官员。我试着与别斯梅尔特内赫外长通话,但他不在,我应该怎么办?”我告诉他耐心等几天,我许诺在这几天里安排他与外长会见。事实上我在第二天就安排了这场会见,但却是在劝我的老同事别斯梅尔特内赫摆脱了他的犹豫不决之后进行的,斯特劳斯因此便能很快地开始履行他的新职责了。

问题拿不出具体的办法。我猜想他对这样的意见不会感到太舒服，这种意见认为他努力倡导的新思维所解放出来的力量是他控制不住的。戈尔巴乔夫自己对如何推行必要的改革这项艰巨的任务思想混乱，这造成了政治和经济的混乱，再加上1991年下半年的大动乱导致了他个人政治上的垮台和苏联的瓦解。

假如改革能够得到巧妙和恰当地指引的话，一切积极的成果得到合理的保留，先前主要的缺点与错误能够在周密的计划和逐渐演变的方式中得以纠正，经过了更新、改革并且朝着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前进的苏联不仅能够战胜对它的挑战，而且我相信也能够跻身于世界民主国家的前列。我深信在将来会实现这一点，不管在新的道路上会出现多少艰苦的磨难。

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伟大的前景也丢掉了幻想，俄罗斯开始将自己调整到同外边的世界打交道中应处的恰当位置上，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形成俄罗斯的新形象以及它的对内对外政策，这一过程将在不少的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是否和如何承认一个新的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应发挥的恰当的作用。在西方仍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将是无法预测的和危险的对手，但把未来押在将俄罗斯压下去的赌注上才是不切实际和真正危险的。俄罗斯有着相当丰富的人力和智力资源，自然资源也丰富，它横跨于两大洲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作为一个民族的永久的决心都将使俄罗斯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存在下去，如果相信过渡时期的巨大困难剥夺了我们矗立于世的能力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于美国和全世界来讲拥有一个强大和自信的朋友和盟友远比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器而又不友好的国家要强得多。

我们可以互相学习，正像美国人经常不断地在改革资本主义一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在苏联仍然受到尊敬，是他相信市场体制也需要国家不时地予以纠正。我们俄罗斯人，由于我们急进的民主分子过于急切地朝着资本主义过渡，无意地破坏了我们的

社会安全网。俄罗斯赞成民主,但是就像对市场的理解一样,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有许多不同的理解。甚至在美国也总有这种情况发生,正如亚伯拉罕·林肯于1864年在巴尔的摩所说的:“我们都讲赞成民主,但是当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所指的不总是是一样的内容。”

现在俄罗斯准备成为美国的一个有建设性的盟友,这种盟友关系绝不反对任何第三国,我们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都为和平而努力。但是俄罗斯人民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也要捍卫他们的民族利益,不是靠牺牲别国利益地动用武力,而是通过传统的政治与外交方式合理地汇集起这种利益。这条道路将永远不会平坦,美国不也是经常遇到困难和竞争吗?有的甚至是来自于它的盟国,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来自法国和曾经是它的保护国的德国与日本的困难和竞争。

但是即便我们两国的利益在历史上有过冲突的话,这种冲突也很少。冷战只是一时的反常现象,它是建立在思想分歧上的,而不是在民族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我们现在必须从冷战的心理状态中摆脱出来。现在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的美国遇到民主的俄国,两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当我们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和不轻易地丧失信心,我们的利益也许会时不时地出现抵触,但是我们总是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这种不一致,而这种方法应不伤害到极其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这就是我在美国长期生活所学到的十分重要的一课,是我从与美国的密切协作以及我的外交生涯中得出的,也是我在本书的章节中试图表达的。

附 录

安德烈·葛罗米柯1967年1月13日提交的外交政策备忘录(经政治局批准)节选

近些年的经验表明,与美国实现和平共处是极为复杂的工作。总的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不符合苏联及其盟国的国家利益。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保持和平。在缓和的条件下更易于巩固和提高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

肯尼迪和约翰逊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是维持世界现状。美国关于美国和苏联的“至关重要的利益范围”以及“第三范围”的思想大体上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承认各种力量目前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然而,美国政府企图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进一步传播,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及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必须以某种方法考虑事物的真实状况。这和他们如何看待欧洲安全、西柏林等问题有特殊的关系。

美国的左派力量仍然比较薄弱。这就是为什么采取和平共处政策必须更多地着眼于美国统治阶级中的温和派和自由派人士以及政府中那些基本上赞成维持现状的成员的原因。当然,这些人急于维持现状的愿望有时可能会导致尖锐的分歧,而且甚至会在个别地区引起危机,因为世界上出现更为重大的进步性变革是历史的必然。此外,正是美国拥护维持现状的势力却把它们的政策同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及准备进行地区性军事冲突结合了起来。

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强调,1964年10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结束了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唯意志论和说教具有极为重

要的意义。

如果我们从更加广泛的前景上,而不是从目前由于美国侵略越南引起的两国关系的不利状况考虑苏美关系的话,可以说在目前这个转折时期出现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在世界和平的条件下或在世界大战的间歇期间,国家和民族将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然而,全球性的核战争是否会爆发,其答案无疑只能取决于苏美关系的发展状况。

这反过来也证明了苏联共产党党纲中做出的在目前的历史阶段世界大战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坚定地继续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抵制中国领导人的冒险性计划,他们寄希望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美国之间在8至10年内必定爆发一场武装冲突。认为美国一心想要进行战争,因此同美国发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准确地反应了中国人的立场。我们把主要力量集中于国内工作上完全符合列宁关于创造新的、更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将保证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论断。

641

我们在原则上不排除为维护和平、确保某些重大国际问题得以解决而采取苏美合作行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当然必须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我们特别重视两个大国的关系,而忽视其他国家的利益。

在一定的条件下,1963年中止的苏美对话甚至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上重新开始。对这种可能性及其适当的安排必须进行系统、深入的考虑,就像从1942年开始,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战后世界组织所做的考虑一样。

我们在与各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交往的过程中,不应该因为对帝国主义持片面的看法而主动拒绝采取外交策略的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将共产国际的活动和外交部的活动明确区分开——列宁曾经强调过它们的区别。为了使我们的对美政策更加灵活,更富有成效,正式的对外政治声明和苏联政府采取的行动必须绝对地、更明确地以对外关系的利益为基础。两种制度

间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以及从意识形态的观点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所做的批评,绝对应该通过党、公众组织及新闻界来进行,因为它与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无关。

至于美国入侵越南及其对双边关系产生的影响,我们应该继续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全面的援助,但却不要直接卷入战争。我们必须使美国人认识到,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采取进一步升级的军事行动将迫使苏联向这个国家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摆脱目前这种状况的唯一出路是在尊重越南人民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政治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结束越南冲突无疑会对苏美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会为解决某些国际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我们不应该回避就我们的利益问题与美国达成协议,如果这样的协议同我们关于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并不矛盾的话。不用说,我们应该避免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局面,即一方面反对中国,另一方面反对美国。将苏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将是有利于我们取得这一目标的因素之一。

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而斗争是抗击美国分裂社会主义社会行为的主要手段。

为了实现削弱美国在西欧地位的目的,我们应该不断地坚持欧洲问题只能“由欧洲人来解决”的原则。我们必须坚持倡导欧洲能够而且必定会保证其自身的安全并加强东西欧之间相互信任关系的思想。

642

古巴问题:我们主要的和长期的任务仍然是对古巴提供经济和政治援助,并且还要加强它的防御能力。我们应该避免采取行动或发表声明对美国领导人做出的他们将不进攻古巴的保证表示怀疑。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全面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路线在各个方面都符合我们外交政策的利益。考虑到我们缺乏储备,所以我们应该着重发展同埃及、叙利亚、马里、几内亚、缅甸、刚果、坦桑尼亚这样一些已经走上非

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最进步的国家以及对我们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阿富汗、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的经济合作。我们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在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国家进行活动,这样才能根据互利互惠的原则不断地同它们建立起经济及贸易合作。

考虑到越南和中东的局势,我们应该及时采取措施以缓解三块大陆中心的紧张状况,那里的尖锐冲突有可能连为一体,从而形成“严重的形势”。就此问题,我们应该一方面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政策的斗争,另一方面灵活地控制某些阿拉伯国家——如叙利亚——的极端主义政策倾向,使之确立加强国内力量的政策方向。

裁军问题:我们应该坚持积极的裁军立场。我们在为实现广泛、全面的裁军——预计这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而斗争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某些有限的措施,首先,要达成一项核不扩散协议。为了防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他非核国家走上发展核武器的道路,有必要实现与美国的对话并寻求达成这样一项协议。

与此同时,有必要继续向美国施加压力,支持采取美国政府曾经宣布不能接受的、但却能得到世界公众舆论的理解并且有助于揭露美帝国主义路线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取消在国外设立的军事基地,把军队从外国领土上撤回来以及削减军费开支。

关于影响美国政治力量联盟的可能性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切办法分化美国政界的温和派和强硬派,为了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今后发动世界核战争,要孤立“主战派”。在这一点上,共和党(通过选举)取代约翰逊总统不大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众所周知,共和党的候选人比约翰逊表现得还要右倾。因此,在实施涉及美国的外交行动时,我们应该避免让这些行动在这个时候加强过激派中约翰逊对手的地位。与此同时,同约翰逊“忠实的反对派”(富布赖特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迪克·克拉克等人)保持联系是有用处的。通过我们的公众组织扩大我们与自由派和民主力量的联系,以及进行文化交流和艺术、教育方面的交流也是有益的。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1968年9月16日做出的对外交政策方针及苏美关系状况的评价(经政治局批准)节选

A. 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共同体并发展苏联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多种形式的、更加深入的合作。当前的形势要求我们像西方国家通过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联系的或与之有关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议会等)多边组织网络建立的一体化一样,实现广泛且稳固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我们应该分阶段地、通过各种途径建立起事实上的联盟。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应该坚定追求的目标。我们不应期望美国在此方面采取任何行动,这样做将会使世界紧张局势严重地恶化。

B. 我们应该坚持努力为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这种努力尤其应该包括控制军备竞赛等措施。

C. 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能力对民族解放运动提供相应的援助。我们要反对新殖民主义。至于我们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它应该以有益于苏联的方式而建立。建立这样的双边关系需要严格遵循上述原则,这是因为苏联首先应保持其国内的稳定才可能在世界舞台上保持强大的力量,就像美国的强大是由于它国内稳定并在此基础上奉行其全球战略一样。

D. 我们和美国的关系。由于越南战争,军事力量和反动势力明显地增强了;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欧洲局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其中包括美国可能会奉行更具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的危险。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当今国际交往的发展对美国潜在的力量形成了某种限制,特别是在那些苏联和美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广泛利益冲突的领域中。

因此,发展我们与美国的关系要求我们在执行政策中把必要的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并要求我们积极地运用外交策略。尽管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核战争并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美国统治集团把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当作他们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苏联进行颠覆活动的充分依据，其目的是破坏我国的国际声誉及外交政策，并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地位。另一方面，苏联就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采取行动的决心使美国领导人对他们在该地区的潜力量有了更为清醒的估计，并再次看到我国领导层保卫苏联重大利益的决心。

……然而，1961年至1963年期间的苏美对话并不是偶然的；展开这场对话的理由今天仍然有效。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就更广泛的问题重新开始对话的原因。甚至现在就应该为这种对话进行系统的、有目的的准备。

索引

(本索引的页码系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 Abrahamson, Leslie, 莱斯利·亚伯拉罕森 561
- Adenauer, Konrad, 康拉德·阿登纳 76
- Adzhubei, Alexei, 阿列克谢·阿朱别伊 54, 60
- Afghanistan, 阿富汗 473, 508, 534
- coups in, 阿富汗政变 435—36
- neutrality of, 阿富汗中立 434, 443, 450, 452
- Soviet invasion of, 苏联入侵阿富汗 5, 184, 415—18, 434—59, 462, 476, 481, 484—85, 490, 500, 590, 603
- Soviet withdrawal from, 苏联撤出阿富汗 442—45, 451
- US-Soviet relations and, 美苏关系和阿富汗 443—48
- Agnew, Spiro, 施皮罗·阿格纽 291
- Akhromeyev, Sergei,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
- conventional Weapons and, 常规武器与阿赫罗梅耶夫 525
- Euromissiles and, 欧洲导弹与阿赫罗梅耶夫 623—24
- and fears of nuclear attack, 阿赫罗梅耶夫与对核攻击的恐惧 524—26
- and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阿赫罗梅耶夫与入侵阿富汗 439—41
- nuclear disarmament program of, 阿赫罗梅耶夫的核裁军计划 596—98
- Aleksandr III, Czar of Russia,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Alexeyev, Aleksandr,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夫 71—73

Allen, Richard, 理查德·艾伦
458—59, 461, 482, 504

Alphand, Hervé, 埃尔韦·阿尔方 137 38

Ambrose, Stephen E., 斯蒂芬·E. 安布罗斯 41

Amin, Hafizullah, 哈菲兹拉·阿明 435—37, 439, 441

Andreas, Dwyane, 德怀纳·安德烈亚斯 562

Andropov, Yuri, 尤里·安德罗波夫 209—10, 218, 427, 477, 479, 511—15, 517—18, 520

in ascending to power, 上台 512—13, 515

Brezhnev's death and, 勃列日涅夫去世与安德罗波夫 511, 514, 517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安德罗波夫 517

and confusion about détente, 安德罗波夫与缓和问题上的混乱 408

conventional arms reduction talks and, 削减常规武器会谈与安德罗波夫 527

death of, 安德罗波夫去世 551

dissidents and, 持不同政见者与安德罗波夫 512—13

and Dobrynin's first private meeting with Reagan, 安德罗波夫与多勃雷宁同里根的第一次私人会谈 517—18, 520

Euromissiles and, 欧洲导弹与安德罗波夫 542

Gandhi's proposed arms race discussion and, 甘地建议举行军备竞赛讨论与安德罗波夫 530

Gromyko's relationship with, 葛罗米柯与安德罗波夫的关系 210

Helsinki Conference and, 赫尔辛基会议与安德罗波夫 346

illness of, 安德罗波夫生病 514, 537, 550—51

and impossibility of agreement with Reagan, 安德罗波夫与不可能同里根达成协议 540—41

and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安德罗波夫与入侵阿富汗 437—41, 443, 452

KAL007 incident and, KAL007 航班事件与安德罗波夫 537—40

and KGB residents of embassies, 安德罗波夫与克格勃驻使馆人员 355—56

Lebanese civil war and, 黎巴嫩内战与安德罗波夫 541

political disinformation and, 政治假情报与安德罗波夫 354

Reagan's anti-Sovietism and, 里根的反苏思想与安德罗波夫 550—51

Reagan's contradictory behavior and, 里根自相矛盾的行为与安德罗波夫 532

and Reagan's peacemongering, 安德罗波夫与里根乞求和平 547—48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安德罗波夫 390, 429, 502—3

SDI and, 战略防御计划与安德罗波夫 528

and Soviet fears of nuclear attack, 安德罗波夫与苏联对核攻击的畏惧 522—24

on tactical delays in foreign policy, 安德罗波夫论外交政策上的策略性拖延 209

Third World policy and, 第三世界政策与安德罗波夫 405

Angola, 安哥拉 360—66, 368—69, 371—72, 403—7, 409—10, 462, 473, 496, 499

antibalistic missile (ABM) systems, 反弹道导弹系统 141, 148—53, 162, 164—67, 189, 220, 285, 471, 483, 572—73, 627

cost of, 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费用 149

Glassboro summit and,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与反弹道导弹系统 162, 164—67

Moscow summits and,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与反弹道导弹系统 213, 217, 242, 248, 252, 314

Reykjavik summit and, 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谈与反弹道导弹系统 604, 621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反弹道导弹系统 211—13, 215

- SDI and, 战略防御计划与
反弹道导弹系统 214,
527—28, 579—80, 589—
90, 621
- Soviet development of, 苏
联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进
展 148—49, 152, 166
- zero option for, 反弹道导
弹系统的零点选择方案
213
- Arbatov, Georgi, 格奥尔吉·阿
尔巴托夫 468
- Austin, J. Paul 保罗·J. 奥斯汀
376, 407
- Austrian State Treaty, 奥地利
国家条约 37, 139, 453, 456
- Bahr, Egon, 埃贡·巴尔 221,
229
- Baker, Howard, 霍华德·贝克
412, 581
- Baker, James, 詹姆斯·贝克
510, 556, 628, 631, 634—35
- Ball, George, 乔治·鲍尔 137
- Bandar bin Sultan, prince, 班达
尔·宾·苏丹王子 541
- Bartholomew, Reginald, 雷金纳
德·巴塞洛缪 384
- Bartlett, Charles, 查尔斯·巴特
利特 94
- Beam, Jacob, 雅各布·比姆
231—32
- Begin, Menachem, 梅纳赫姆·
贝京 398—99
- Benes, Edvard, 爱德华·贝内斯
377
- Berlin, 柏林 58—59, 140,
183, 189, 195, 201, 220—
24, 229—30, 345, 640
-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古巴导弹危机与柏林问题
80
- diplomatic stalemate over,
在柏林问题上出现的外
交僵局 63—68, 71, 73,
75, 77—78, 98—99, 105—
6, 111—13, 120—21, 233
- and Dobrynin's appoint-
ment as U. S. ambassa-
dor, 柏林问题与多勃雷宁
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51—
52
- Moscow summit and, 莫斯
科最高级会谈与柏林问
题 210—11, 217—18,
220—24, 230, 239, 242
- quadripartite agreement
on, 就柏林问题达成的
四方协议 233
- and Soviet military aid to
Cuba, 柏林问题与苏联
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
70, 73, 75, 77
- U. S. missile program and,

- 美国导弹计划与柏林问题 152
- Vienna summit and,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与柏林问题 43—46
- Berlin Agreements, 柏林协议 193
- Berlin Wall, 柏林墙
erection of, 柏林墙的建立 46, 65, 93, 105
fall of, 柏林墙的倒塌 46, 113, 629—30
- Bernadotte, King of Sweden, 瑞典国王贝纳代特 384
- Bessmertnykh, Aleksandr, 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 5, 60, 439, 603, 605, 638 注
- Biryuzov, Sergei, 谢尔盖·比留佐夫 73
- Bohlen, Charles(Chip), 查尔斯(奇普)·波伦 169
- Boldin, Valery, 瓦列里·博尔金 617
- Bolshakov, Georgi, 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 59 注, 69, 85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博利沙科夫 52—54, 61—62, 94
and stalemate over Germany and Berlin, 博科沙科夫与德国和柏林问题的僵局 64—65
- Bonner, Yelena, 叶连娜·邦纳 552—53
- Brandt, Willy, 维利·勃兰特 206, 221—23
- Brezhnev, Leonid,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4, 15, 128—33, 145, 174—75, 191—94, 216—20, 250, 346—48, 371—72, 377—81, 383—84, 386—88, 463—65, 477—78, 488—91, 508, 517—18, 551
ABMs and, 反弹道导弹系统与勃列日涅夫 150, 242
accountability of, 勃列日涅夫所负的责任 219
and adjusting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勃列日涅夫与调整外交政策的方式 193
and agreement on preventing nuclear war, 勃列日涅夫与防止核战争协议 273, 276—77, 285
Angola and, 安哥拉与勃列日涅夫 361, 363—64, 371
and attempts on Reagan's life, 勃列日涅夫与企图杀害里根 491
Berlin issue and, 柏林问题和勃列日涅夫 242
Carter's election and, 卡特

当选与勃列日涅夫
378—81

Carter's human rights
policy and, 卡特的人权
政策与勃列日涅夫
386, 388, 391

and Chinese invasion of
Vietnam, 勃列日涅夫与
中国入侵越南 418

death of, 勃列日涅夫去世
478, 511—12, 514, 517

detente and, 缓和与勃列日
涅夫 191, 251, 276,
408—09, 412, 472—76

and discussions on summit
with Reagan, 勃列日涅
夫与讨论同里根举行最
高级会谈 490, 505

and Dobrynin's awards
and honors, 勃列日涅夫
与多勃雷宁获得的奖赏
和荣誉 511

Dobrynin's finances and,
多勃雷宁的工资与勃列
日涅夫 57

drunken revelation of, 勃
列日涅夫喝醉了的表现
281—82

espionage and, 间谍活动与
勃列日涅夫 356

Euromissiles and, 欧洲导
弹与勃列日涅夫 496,

501, 543

in exchanging gifts with
Ford, 勃列日涅夫与福特
交换礼品 330—32

in exchanging gifts with
Nixon, 勃列日涅夫与尼
克松交换礼品 255—
56, 279

and first use of nuclear
weapons, 勃列日涅夫与
首先使用核武器 278

Ford's presidential cam-
paign and, 福特的总统
竞选与勃列日涅夫
365—66, 371

and Ford's relationship
with Kissinger, 勃列
日涅夫与福特同基辛格
的关系 319—20

foreign policy skills
lacked by, 勃列日涅夫
缺乏外交政策技巧
130—31, 135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
瓦最高级会谈与勃列日涅
夫 488—90

Glassboro summit and,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与
勃列日涅夫 162, 167

Gromyko's relationship
with, 葛罗米柯与勃列日
涅夫的关系 131, 521

- Hammer and, 哈默与勃列日涅夫 461
- Harriman as channel for, 哈里曼为勃列日涅夫充当联系渠道 378—79
- Helsinki Conference and, 赫尔辛基会议与勃列日涅夫 346—47
- Humphrey's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汉弗莱的总统竞选与勃列日涅夫 174
- illness of, 勃列日涅夫生病 275, 319, 328, 373, 398, 420, 425, 438, 441, 476—77
- India-Pakistan War and, 印巴战争与勃列日涅夫 236
- and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勃列日涅夫与入侵阿富汗 437—41, 443, 445, 448, 450
- and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勃列日涅夫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79, 183
- and Israeli invasion of Lebanon, 勃列日涅夫与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506
- Israeli relations and, 以色列关系与勃列日涅夫 162
- Jackson's Soviet visit and, 杰克逊访苏与勃列日涅夫 400—01
- Jewish emigration and, 犹太人移民与勃列日涅夫 267—70, 335
- and Johnson's campaign for additional summit, 勃列日涅夫与约翰逊为额外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展开活动 177
- Khrushchev's dismissal and, 赫鲁晓夫被解职与勃列日涅夫 128
- and Kissinger's secret Moscow mission, 勃列日涅夫与基辛格赴莫斯科执行秘密使命 244—45
- Kosygin's rivalry with, 柯西金与勃列日涅夫对立 134—35, 207, 282
- in meetings in San Clemente, 在圣克利门蒂会谈 257—58, 275, 280—84, 288—90, 292, 492—93
- Middle East peace negotiations and, 中东和平谈判与勃列日涅夫 222, 242, 283, 304, 349, 399

- Moscow summits and,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与勃列日涅夫 203, 220, 225, 232—33, 239—42, 244—48, 251, 254—57, 307—15, 323, 472
- and NATO's attempts to achieve military superiority over Warsaw Pact, 勃列日涅夫与北约试图获得对华约的军事优势 431
- Nixon's direct dialogues with, 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直接对话 228—33
- Nixon's resignation and, 尼克松辞职与勃列日涅夫 316—18
- and Nixon's Visit to Poland, 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访问波兰 243
- October War and, 十月战争与勃列日涅夫 288—300, 302
- Oreanda meetings of, 勃列日涅夫参加奥列安达会谈 312—13, 315
- political disinformation and, 政治假情报与勃列日涅夫 353
- in presiding over Politburo meetings, 主持政治局会议 219—20
- and purposes of U. S. - Soviet summits, 勃列日涅夫与美苏最高级会谈建议 36
- Reagan as annoyance to, 里根使勃列日涅夫感到烦恼 495—98
- and Reagan's concern for dissidents, 勃列日涅夫与里根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关心 498
- Reagan's letters from hospital to, 里根从医院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 492—93
- Reagan's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里根的总统竞选与勃列日涅夫 458
- Reagan's unproductive dialogues with, 里根同勃列日涅夫的无效对话 478, 481
- reducing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削减军费开支与勃列日涅夫 133
- and reform movement in Poland, 勃列日涅夫与波兰的改革运动 500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勃列日涅夫

- 216, 242, 254, 275, 285,
309, 313—15, 319, 323,
329—31, 333, 347, 349—
52, 363, 379—81, 388,
391—92, 394—95, 397—
98, 418—20, 422—26,
464, 476
- sense of humor of, 勃列日
涅夫的幽默感 273—
74
- Soviet - China border
disputes and, 苏中边境
争端与勃列日涅夫 409
- and Soviet fears of nuclear
attack, 勃列日涅夫与苏
联对核攻击的恐惧
522, 524
- and Soviet naval presence
around Cuba, 勃列日涅
夫与苏联海军出现在古
巴周围 234
- Third World policy and,
第三世界政策与勃列日
涅夫 405, 408
- and troop reductions in
Europe, 勃列日涅夫与削
减驻欧军队 426—27
- Tula speech of, 勃列日涅
夫的图拉讲话 379—
80, 383
- U. S. - China relations
and, 美中关系与勃列日
涅夫 282, 409—10,
426
- and U. S. military aid to
Iran, 勃列日涅夫与美国
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
436—37
- U. S. - Soviet trade and,
美苏贸易与勃列日涅夫
284, 337
- Vienna summit and, 维也
纳最高级会谈与勃列日涅
夫 397—98, 413—14,
417—27, 435 注, 445, 490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
争与勃列日涅夫 136,
139—40, 144, 155, 233,
239, 242, 244—47, 251,
257, 260—64, 343—44
- Vladivostok summit and,
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
会谈与勃列日涅夫
319, 322, 326—33, 394
- Washington summit and,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与勃列
日涅夫 258, 264, 270,
274—86
- Watergate and, 水门事件与
勃列日涅夫 274, 286,
302—5, 310, 314
- Bronfman, Edgar, 埃德加·布
朗夫曼 562
- Brown, Harold, 哈罗德·布朗

- first - strike doctrine and, 先发制人理论与布朗 469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布朗 385, 414
- on Third World confrontation, 布朗论第三世界对抗 416
- and troop reduction in Europe, 布朗与削减驻欧军队 426—27
- and U. S. military aid to China, 布朗与美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 449
- Vienna summit and,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与布朗 422
- Brzezinski, Zbigniew,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5, 368, 375—77, 382—84, 386—93, 402—3
- anti - communism of, 布热津斯基反共 397, 402
- anti - Sovietism of, 布热津斯基反苏 375, 412, 452, 463
- Carter's Naval Academy speech and, 卡特的海军学院讲话与布热津斯基 411
- Carter's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卡特的总统竞选与布热津斯基 449—50, 457, 459—60, 462—63
- China visited by, 布热津斯基访华 409
- comparisons between Kissinger and, 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比较 383, 463
- comparisons between Vance and, 万斯和布热津斯基比较 382, 386—87
- and confusion about detente, 布热津斯基与缓和问题上的混乱 409—12
- expertise of, 布热津斯基的专业知识 377, 383, 397
- first - strike doctrine and, 先发制人理论与布热津斯基 469
- human rights and, 人权与布热津斯基 386, 390, 397, 413
- Iranian crisis and, 伊朗危机与布热津斯基 437
- Middle East peace negotiations and, 中东和平谈判与布热津斯基 398
- and NATO's attempts to achieve military super -

- iority over Warsaw Pact, 布热津斯基与北约试图获得对华约的优势 431—33
- and revival of arms race, 布热津斯基与军备竞赛的恢复 415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布热津斯基 382—83, 388—89, 392—93, 396, 399, 413—14, 417, 420, 427, 459, 462, 471
- and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布热津斯基与苏联入侵阿富汗 446—47, 449—52, 456—57, 459, 462
- on Third World confrontations, 布热津斯基论第三世界对抗 416
- U. S. - China relations and, 美中关系与布热津斯基 409
- Vance's criticisms of, 万斯对布热津斯基的批评 410
- Vienna summit and,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与布热津斯基 414, 417, 420—22, 427
- and war between Ethiopia and Somalia, 布热津斯基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战争 403, 406—7
- Bugayev, Boris, 鲍里斯·布加耶夫 145
- Bulganin, Nikolai, 尼古拉·布尔加宁 32, 37
- Bundy, McGeorge, 麦乔治·邦迪 59, 84, 119, 122, 142, 163, 428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争与邦迪 117, 137, 174
- Bundy, William, 威廉·邦迪 137
- Burt, Richard, 理查德·伯特 533, 535—36, 553
- Bush, George, 乔治·布什 3—4, 350, 510—11, 517, 521, 556, 604
- Andropov's death and, 安德罗波夫去世与布什 551
- Brezhnev's death and, 勃列日涅夫去世与布什 511, 514
- Chernenko's death and, 契尔年科去世与布什 566
- conservative conversion of, 布什的稳健变革 581
- and end of Cold War, 布什

- 与冷战结束 610
- and fall of Soviet Union, 布什与苏联的崩溃
- and famine in Somalia, 布什与索马里饥荒 407
- foreign policy style of, 布什的外交政策风格 628—29
-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与布什 580—81
- German reunification and, 德国重新统一与布什, 629—31, 635
- Gorbachev's fall and, 戈尔巴乔夫下台与布什 633
- Gorbachev's reforms and,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布什 632—35
- Malta summit and, 马耳他最高级会谈与布什 630, 633—34
- Pentecostal case and, 圣灵降临节案与布什 530
- presidential campaigns of, 布什的总统选举 529, 580—81
- Reagan's presidential campaigns and, 里根的总统选举与布什 529—30, 558
- and Reagan's push for summit, 布什与里根极力争取举行最高级会谈 568—69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布什 623
- space weapons and, 太空武器与布什 567—68, 580
- Byrd, Robert, 罗伯特·伯德 578, 605
- Cambodia, 柬埔寨 121, 170, 343
- U. S. invasion of, 美国入侵柬埔寨 206, 208
- Vietnam invasion of, 越南入侵柬埔寨 415, 418
- Camp David, Middle East peace negotiations at, 戴维营中东和谈 398—99, 460
- Cannon, Lou, 卢·埃农 502
- Carlucci, Frank, 弗兰克·卡卢奇 510
- Carter, Jimmy, 吉米·卡特 5, 202, 329, 374—476, 481, 486, 606, 608
- anti-Sovietism of, 卡特的反苏思想 412, 451, 458
- and ban on nuclear tests, 卡特与禁止核试验 383, 385

- cabinet of, 卡特内阁
375—77, 387
- and Chinese invasion of
Vietnam, 卡特与中国入
侵越南 418—19
- comparisons between
Reagan and, 里根和卡特
比较 484, 489—90
- and confusion about deten-
te, 卡特与缓和问题上的
混乱 409—12
- diplomatic corps received
by, 卡特接见外交使团
381
- dismantling detente and,
废止缓和与卡特 467—
68, 470—73, 476
- domestic agenda of, 卡特
的国内日程安排 411
- espionage and, 间谍活动与
卡特 358
- Euromissiles and, 欧洲导
弹与卡特 532
- farewell to Dobrynin
from, 卡特与多勃雷宁
道别 605
- first soundings of, 卡特的
首次试探 376—80
- first - striking doctrine
and, 先发制人理论与卡
特 469
- foreign experience lacked
by, 卡特缺乏外交经验
368
- human rights policy of, 卡
特的人权政策 375—
76, 384—91, 397, 399—
400, 402, 410—11, 413—
14, 418, 452, 460, 497, 515
- Iranian crisis and, 伊朗危
机与卡特 175, 417,
437, 453
- and Jewish emigration
from Soviet Union, 卡特
与犹太人从苏联移民
372
- main handicap of, 卡特的
主要障碍 387
- Middle East peace nego-
tiations and, 卡特与中东
和谈 383, 398—99,
460
- military buildup under, 卡
特时期的军备建设
457—59, 462, 496, 609
- and NATO's attempts to
achieve military super-
iority over Warsaw
Pact, 卡特与北约试图获
得对华约的军事优势
431—33
- Naval Academy speech of,
卡特在海军学院的讲话
411, 449

- nuclear war preparedness
strategy of, 卡特的准备
核战争战略 456—57
- Olympics boycott and, 抵
制奥运会与卡特 451,
453, 553
- popularity of, 卡特的声望
411
- presidential campaigns of,
卡特的总统竞选 368,
370—72, 374, 377—81,
384—86, 417, 421, 425,
427, 444, 446, 448—50,
452—54, 455, 457—60,
462—65
- Reagan's peacemongering
and, 里根乞求和平与卡
特 547
- and reduction of troop in
Europe, 卡特与削减驻欧
军队 378, 383
- and revival of arms race,
卡特与军备竞赛的恢复
415—16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
会谈与卡特 370, 375,
377—85, 387, 400, 405,
410—11, 413—14, 417—
24, 426—29, 444, 453,
462, 471, 490
- Shcharansky's release
and, 夏兰斯基获释与卡
特 413
- and Soviet fears of nuclear
attack, 卡特与苏联对核
攻击的恐惧 526
- and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卡特与苏
联入侵阿富汗 416,
418, 439, 441, 443—58,
462
- U. S. - China relations
and, 美中关系与卡特
409—11, 426, 449, 463
- and U. S. military aid to
Iran, 卡特与美国向伊
朗提供军事援助 436—
37
- U. S. - Soviet trade and,
美苏贸易与卡特 446—
47
- as unknown quantity, 难以
预测的卡特 374
- Vienna summit and, 维
也纳最高级会谈与卡特
379, 393, 397—98, 413—
14, 417—26, 429, 435 注,
445, 490
- and war between Ethiopia
and Somalia, 卡特与埃塞
俄比亚和索马里战争
403, 405—7, 409
- Casaroli, Cardinal, 卡萨罗里·
卡迪纳尔 547

Castro, Fidel, 菲德尔·卡斯特罗 67, 136, 497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古巴导弹危机与卡斯特罗 85, 91—92

foreign adventures of, 卡斯特罗的对外冒险 96, 362—63, 402—3, 407

Moscow summit and,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与卡斯特罗 254

and Soviet military aid to Cuban, 卡斯特罗与苏联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 71—73, 79—80

U. S. attempts at overthrow of, 美国企图推翻卡斯特罗 71

Ceausescu, Nicolae,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183, 632

Chazov, Evgeny, 叶夫根尼·恰佐夫 329

Chebrikov, Konstantin,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 477, 513, 551—53, 561—63, 565—66, 609

death of, 契尔年科去世 566—67

dissidents and, 持不同政见者与契尔年科 552

illness of, 契尔年科生病 479, 561, 566

and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契尔年科与入侵阿富汗 439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契尔年科 424

SDI and, 战略防御计划与契尔年科 559

and Soviet fears of nuclear attack, 契尔年科与苏联对核攻击的恐惧 522

Vienna summit and,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与契尔年科 421, 424, 426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 197, 233, 340, 343, 383, 400, 459, 624

and ABMs, 中国与反弹道导弹系统 166

and Angola, 中国与安哥拉 360, 362

and ban on nuclear tests 中国与禁止核试验 385

Cultural Revolution in, 中国的文化革命 142

and Glassboro summit, 中国与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 162

and Gromyko's assessments of foreign policy, 中国与葛罗米柯

- 对外交政策的评价
157—58, 641
- and India - Pakistan War, 中国与印巴战争 235—37
- and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中国与入侵阿富汗 438
- Kissinger's visits to, 基辛格访华 224, 226, 234, 241, 243, 257, 285
- and Moscow summits, 中国与莫斯科最高级会谈 226—27, 254, 314—15
- Nixon's visits to, 尼克松访华 217, 221—22, 225—28, 230, 232—33, 236, 240—41
- nuclear weapons of, 中国的核武器 129
- and PNW, 中国与纯现值 277, 285
- and Reagan's presidential campaigns, 中国与里根的总统竞选 458
- Reagan's visit to, 里根访华 552
- and reducing U. S. military presence in Europe, 中国与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 169
- and ruble - yuan exchange rate, 中国与卢布 - 元兑换率 21—22
- Soviet relations with, 苏中关系 68—74, 78—81, 138, 192—93, 196, 217, 236, 241, 362, 409, 472
- U. S. relations with, 美中关系 202, 206—7, 221, 224—25, 241, 277, 282, 327—28, 409—13, 417, 425—26, 449, 451, 463, 476, 481.
- Vietnam invaded by, 中国入侵越南 418—19
- and Vietnam War, 中国与越南战争 115—16, 129, 135—39, 142—43, 224, 241, 246, 257, 344
- and Vladivostok summit, 中国与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会谈 322, 328, 332
- and Washington summit, 中国与华盛顿最高级会谈 282
- and Weinberger's foreign policy role, 中国与温伯格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所起的作用 549
- Church, Frank, 弗兰克·丘奇 412, 428, 465

-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23, 37, 103, 348, 587, 637
- Churkin, Vitaly, 维塔利·丘尔金 5, 620
- Clark, Dick, 迪克·克拉克 146, 642
- Clark, William, 威廉·克拉克 504—5, 510—11, 560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克拉克 531, 541
- Clifford, Clark, 克拉克·克利福德 173—74
- Colby, William, 威廉·科尔比 298, 350, 353
-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217, 277, 308, 315, 332, 345—48, 488, 539—40, 544—46, 573, 629—30
- Connors, Chuck, 查克·康纳斯 282
- Cordier, Andrew, 安德鲁·科尔迪耶 90—91
- Cox, Archibald, 阿奇博尔德·考克斯 293, 302
- Crimean Peninsula, U. S. warships off coast of, 美国军舰在克里米亚半岛沿岸航行 599
- Cuba, 58, 96, 106, 118, 120, 140, 201, 321, 413, 451, 462, 465, 481, 487, 496, 547, 569
African adventurism of, 古巴的非洲冒险 360—63, 403, 406—7, 410, 425
and assassination of Kennedy, 古巴与肯尼迪遇刺 109
Bay of Pigs invasion of, 入侵古巴猪湾 40—47, 71, 76
dismantling detente and, 废止缓和与古巴 472, 476
Dobrynin's visit to, 多勃雷宁访问古巴 362—63
and Gromyko's assessments of foreign policy, 古巴与葛罗米柯对外交政策的估计 641—42
Moscow summit and,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与古巴 254
offers to mediate U. S. disputes with, 提出调停美国与古巴的争端 497
removal of Soviet missiles from, 从古巴移走苏联导弹 86, 89, 91, 93
Salvadoran civil war and,

- 萨尔瓦多内战与古巴
487—88
- Soviet military aid to, 苏联
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
68—82
- Soviet military brigade in,
苏联陆军旅在古巴 415,
428—29
- Soviet naval presence
around, 苏联海军在古巴
周围的存在 208,
217, 234—35
- and stalemate over Ger -
many and Berlin, 古巴与
德国和柏林问题上的
僵局 66—67
- U. S. provocative actions
against, 美国对古巴的挑
衅行为 136
- U. S. quarantine on, 美国
对古巴的隔离 81—87
- U. S. reconnaissance plane
shot down over, 美国侦
察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
87
- Cuban missile crisis, 古巴导弹
危机 5, 43, 52, 68—101,
107, 111, 113—14, 116,
189, 193, 362, 367, 606
- aftermath of, 古巴导弹危
机的后果 91—98
- comparison between Octo-
ber War and, 十月战争
与古巴导弹危机的比较
297, 299—300
-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古巴导
弹危机 54, 93—94
- eruption of, 古巴导弹
危机的爆发 78—86
- nuclear test ban and, 禁止
核试验与古巴导弹危机
100—101
- settlement of, 古巴导弹危
机的解决 79, 84, 88—
91, 93—95, 109, 111
- and Soviet fears of nuclear
attack, 古巴导弹危机与
苏联对核攻击的恐惧
523
- U. S. - Soviet seminars
on, 美苏关于古巴导弹危
机的研讨会 74, 95
- vast significance of, 古巴
导弹危机的广泛影响
-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20, 377, 542
- Soviet invasion of, 苏联入
侵捷克斯洛伐克 58,
143, 148, 178—84, 186,
189, 200, 438, 444, 467,
500, 643
- Dam, Kenneth, 肯尼思·达姆

533—35

Daoud, Mohammed, 穆罕默德·达乌德 434—35

Deaver, Michael, 迈克尔·迪弗 510—11, 520, 529, 556

de Gaulle, Charles, 夏尔·戴高乐 40—41, 76, 105—6, 120, 137

Deng Xiaoping 邓小平 418

Detinov, Nikolai, 尼古拉·德蒂诺夫 469

Dobrynin, Anatoly,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

alleged Americanization of, 多勃雷宁被说成是美国化了 354

awards and honors of, 多勃雷宁获得的奖励和荣誉 510—11

changes in life of, 多勃雷宁的生活发生变化 600—602

as dean of Washington diplomatic corps, 多勃雷宁担任驻华盛顿外交使团团长 493—95

diaries of, 多勃雷宁日记 3—4

diplomatic style of, 多勃雷宁的外交风格 6—9

education of, 多勃雷宁所受的教育 3, 13—19, 24

finances of, 多勃雷宁的工资 34, 56—57

foreign policy expertise of, 多勃雷宁的外交政策专业知识 27—28

grand purpose of, 多勃雷宁的宏伟目标 4—5

heritage of, 多勃雷宁继承的遗产 14, 16

interpreting skills of, 多勃雷宁的翻译技能 29

as party secretary, 多勃雷宁担任党中央书记 615—22

Dobrynin, Irina, 伊琳娜·多勃雷宁 14, 35, 47—48, 56, 82, 103—4, 125, 243, 250, 257—60, 280, 326, 328, 354, 383, 454, 503—04, 602

Dole, Bob, 鲍勃·多尔 505, 569, 581

Dubček, Alexander,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179

Dubs, Adolph, murder of, 阿道夫·达布斯 谋杀 435—36

Dulles, Allen, 艾伦·杜勒斯 55

Dulles, John Foster,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26, 29, 37—38, 40, 65, 109, 131, 321

Eagleburger, Lawrence, 劳伦

- 斯·伊格尔伯格 483,
509, 533, 535—36, 538,
540—41, 547—49
- Egypt, 埃及 208, 362
- Middle East peace nego-
tiations and, 中东和平
谈判与埃及 204—5,
306, 349
- October War and, 十月战
争与埃及 290, 293—96,
298—99
- Six-Day War and, 六日战
争与埃及 160—61
- Soviet Treaty of Friend-
ship with, 苏埃友好条约
222
- Eisenhower, Dwight D., 德怀
特·D. 艾森豪威尔 4,
25—26, 109, 116, 131, 168,
323, 606
- comparisons between
Reagan and, 里根与艾森
豪威尔相比较 458
-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arsenal under, 艾森豪威
尔任内战略武器库的发
展 331
-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
瓦最高级会谈与艾森豪
威尔 37—38
- Paris summit and, 巴黎最
高级会谈与艾森豪威尔
40—42, 251
- Ellsworth, Robert, 罗伯特·埃
尔斯沃思 186—87
- El Salvador, 圣萨尔瓦多 462,
473, 487—88
- Erlichman, John, 约翰·埃利
希曼 274
- Ethiopia, war between Somalia
and, 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
的战争 402—7, 409
- Eureka College, Reagan's
speech at, 尤里卡学院, 里
根在尤里卡学院的演讲
501—3
- Euromissiles, 欧洲导弹 396,
495—96, 520, 532—35,
542—45, 552, 559—60,
598—99, 603, 623—24, 627
- Geneva meetings on, 关于
欧洲导弹问题的日内瓦
会谈 500—501, 598
-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
瓦最高级会谈与欧洲导
弹问题 588, 590
- and NATO's attempts
to achieve military supe-
riority over Warsaw
Pact, 欧洲导弹与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试图获得对华
沙条约组织的军事优势
430—33
- public opinion on, 有关欧

洲导弹问题的舆论 577
and Reagan's peacemongering, 欧洲导弹问题与里根乞求和平 547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欧洲导弹 423
space weapons talk and, 空间武器会谈与欧洲导弹 562, 579
zero option for, 关于欧洲导弹问题的零点选择方案 480, 500, 608—9
Falin, Valentin, 瓦连京·法林 229
Fawzi, Mahmoud, 马哈茂德·法奇 161
Fomin, Alexander, 亚历山大·福明 94—95
Ford, Gerald, 杰拉尔德·福特 5, 194, 202, 291, 315, 319—74, 376—77, 386, 429, 444, 457, 466—68, 606
Angola and, 安哥拉与福特 360—61, 366, 372
anti-Communism of, 福特的反共思想 320—21
anti-Soviet demonstrations and, 反苏示威与福特 365
attempts on life of, 谋杀福特的企图 347
cabinet reorganized by, 福

特改组内阁 350—51
comparisons between Nixon and, 尼克松与福特相比较 339—41
dismantling detente and, 废止缓和与福特 468, 470—73
Dobrynin's first meeting with, 多勃雷宁第一次会见福特 320
domestic agenda and, 国内议事日程与福特 339—40
espionage and, 间谍活动与福特 357—58
in exchanging gifts with Brezhnev, 与勃列日涅夫交换礼物 330—32
Helsinki Conference and, 赫尔辛基会议与福特 347—48
and Jewish emigration from Soviet Union, 福特与苏联犹太人移民 334—35, 372
Kissinger's criticisms of, 基辛格对福特的批评 369
Kissinger's relationship with, 基辛格与福特的关系 319—21, 327
Nixon's resignation and,

- 尼克松辞职与福特
305—6, 317
- presidential campaign of,
福特的总统竞选活动
320, 324—25, 334, 340,
343, 347—51, 364—74,
377, 455
- pressure from right on, 右
翼向福特施加压力
342—43, 348, 351, 364—
66, 371—73
- raising sunken Soviet sub
and, 打捞沉没的苏联潜
水艇与福特 352—53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
会谈与福特 319, 323,
330, 332—34, 347—52,
363—64, 369, 372—73,
384, 388, 393—94
- Soviet cosmonauts and
U. S. astronauts
received by, 福特接见苏
联和美国的宇航员
325—26
- Soyuz - Apollo docking
and, 联盟 - 阿波罗宇宙
飞船对接与福特 342
- U. S. - Soviet trade and,
美苏贸易与福特 336—
37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
争与福特 168—69,
343—45
- Vladivostok summit and,
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会
谈与福特 319, 322—
23, 327—33, 341, 364,
372, 420
- Watergate and, 水门事件
与福特 305—6, 326, 471
- Ford, Henry, II, 亨利·福特二
世 208, 210
- Fortas, Abe, 阿贝·福塔斯 118
- Foster, William, 威廉·福斯特
149—51
- Fulbright, J. William, J. 威廉·
富布赖特 431, 452, 642
- October War and, 十月战
争与富布赖特 291—92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
争与富布赖特 116,
135—37, 141, 169
- Watergate and, 水门事件
与富布赖特 302
- Gandhi, Indira, 英迪拉·甘地
236—37, 530
- Garthoff, Raymond L., 雷蒙
德·L. 加特霍夫 81 注,
203, 277
- Geneva, 日内瓦
agreements on Laos in,
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
协议 121—22, 137

-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in, 日内瓦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277
- Euromissile talks in, 日内瓦欧洲导弹会谈 500—501, 598
- Haig - Gromyko meeting in, 黑格 - 葛罗米柯日内瓦会谈 499
- hot line agreement signed in, 日内瓦热线协议 97
- Middle East peace talks in, 日内瓦中东和平谈判 300—301, 303—4, 306, 332, 398
- nuclear weapons talks in, 日内瓦核武器会谈 529, 534—35, 543, 545, 549
- SALT talks in, 日内瓦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310, 316, 395—96, 413—14, 480
- space weapons talks in, 日内瓦太空武器会谈 559—62, 565—66, 572, 578—79
- Vietnam War talks in, 日内瓦越南战争会谈 170—71
-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 3, 36—39
- Geneva summit(1985), 1985年日内瓦最高级会谈 479—81, 571—74, 577—96, 598—99, 601—4, 608, 620
- and Brezhnev's attempts at breakthrough with Reagan,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与勃列日涅夫试图在与里根的关系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488—90
-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日内瓦最高级会谈 573, 580, 589, 602, 604
- drafting communiqué for, 起草日内瓦会谈公报 584, 586, 590—91
- meaning of,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的意义 564—65
- preparations for, 为日内瓦最高级会谈做准备 577—86, 592
- setting time and place of, 确定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的时间和地点 572—73
- Germany, 德国 51—52, 59, 146—47, 169, 194, 206, 396, 417, 431, 483, 574,
- Geneva summit(1955), 1955年

- 626, 642
- Berlin issue and, 柏林问题
与德国问题 见柏林
- diplomatic stalemate over,
在德国问题上陷入外交僵
局 63—68, 77, 98—99,
105—06, 112—13,
120—21, 233
- Euromissiles and, 欧洲导
弹与德国问题 542—
43
-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
瓦最高级会谈与德国问
题 37
- Moscow summit and, 莫斯
科最高级会谈与德国问
题 248
- NATO membership of, 德
国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成员 631
- reunification of, 德国重新
统一 46, 113, 121,
347, 463, 629—32, 635
- Soviet treaty with, 苏德条
约 121
- Vienna summit and, 维也
纳最高级会谈与德国问
题 43—46
- Ginzburg, Aleksandr, 亚历山
大·金茨堡 389—90,
413
- Glassboro summit, 葛拉斯堡罗
最高级会谈 151, 153—
54, 162—67, 180—81
- Goldberg, Arthur, 阿瑟·戈尔
德贝格 161
- Goldwater, Barry, 巴里·戈德
华特 102, 105, 119, 122,
188—89, 324, 455
- Gorbachev, Mikhail, 米哈伊
尔·戈尔巴乔夫 3—4,
33, 438, 441—43, 522,
606—12, 615—38
- ABMs and, 反弹道导弹系
统与戈尔巴乔夫 627
- Afghanistan and, 阿富汗问
题与戈尔巴乔夫 442—
43, 451, 590
- Andropov's relationship
with, 安德罗波夫与戈尔
巴乔夫的关系 551
- in ascending to power, 戈
尔巴乔夫上台 557,
565—66
- back channel policy
making of, 戈尔巴乔夫
私下制定外交政策
628—29
- and changes in Dobrynin's
life, 戈尔巴乔夫与多勃
雷宁生活的改变 601—2
- comparisons between
Andropov and, 安德罗波
夫与戈尔巴乔夫相比较

- 513
-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戈尔巴乔夫 573, 582, 589
- conventional weapons and, 常规武器与戈尔巴乔夫 525
- coup against, 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 526, 617, 638 注
- disarmament plan of, 裁军计划与戈尔巴乔夫 577, 596—600, 603, 620—22
- and disintegration of Soviet Communist Party,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共产党的解散 637
- dissidents and, 持不同政见者与戈尔巴乔夫 553
- and Dobrynin's farewell meeting with Reagan, 戈尔巴乔夫与多勃雷宁同里根的告别谈话 603—5
- domestic agenda of, 戈尔巴乔夫的国内议事日程 628, 636—38
- and end of Cold War, 戈尔巴乔夫与冷战结束 610, 636
- Euromissiles and, 欧洲导弹与戈尔巴乔夫 623—24, 627
-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与戈尔巴乔夫 479, 571—74, 577—93, 595—96, 598, 601—2, 608, 620
- German reunification and, 德国重新统一与戈尔巴乔夫 629—32, 635
- goodwill exchanges between Reagan and,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互致良好的祝愿 596
- hastiness of, 戈尔巴乔夫的草率 626—27, 629, 631—32 .
- Malta summit and, 马耳他最高级会谈与戈尔巴乔夫 630, 633—34
- Moscow summit and,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与戈尔巴乔夫 627—28
- new thinking foreign policy of, 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新思想 620, 622, 627, 632, 638
- official dinners given by, 戈尔巴乔夫举行的正式宴会 618
- outmaneuvering of, 戈尔巴乔夫的制胜谋略 628

- Politburo meetings headed by, 戈尔巴乔夫主持的政治局会议 616—18, 622—23
- political bankruptcy of, 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破产 632—38
- popularity of, 戈尔巴乔夫的声望 627, 634
- Reagan's contradictory nature and, 里根自相矛盾的本性与戈尔巴乔夫 607
- Reagan's invitation to U. S. to, 里根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 565—67, 584, 594—96, 604—5
- and Reagan's push for summit,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急于举行最高级会谈 568—70
- reforms of,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587, 611, 626, 628, 630—38
- and rewriting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s charter, 戈尔巴乔夫与修改国际部的权限 619—20
- Reykjavik summit and, 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谈与 戈尔巴乔夫 604, 609—10, 620—22
- Rust landing and, 鲁斯特降落与戈尔巴乔夫 625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戈尔巴乔夫 621, 623
- Shevardnadze selected as foreign minister by, 戈尔巴乔夫任命谢瓦尔德纳泽担任外交部长 575—76
- Shultz's Helsinki speech and, 舒尔茨的赫尔辛基演说与戈尔巴乔夫 577
- Soviet foreign policy addresses of, 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外交政策讲话 570—73
- space weapons and, 太空武器与戈尔巴乔夫 561, 565, 567—68, 573, 578—79, 582, 589—92, 596, 620—22
- Thatcher's meeting with, 撒切尔夫人与戈尔巴乔夫会谈 560, 632—33
- troop cutbacks and, 裁减军队与戈尔巴乔夫 570, 626—27
- U. S. - Soviet economic relations and, 美苏经济

关系与戈尔巴乔夫
562
Washington summits and,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与戈
尔巴乔夫 630—31,
634—35
Graham, Billy, 比利·格雷厄
姆 271, 498
Grechko, Andrei, 安德烈·格列
奇科 175, 194, 248, 259,
295, 330, 394, 405
Gribkov, Anatoly, 阿纳托利·
格里布科夫 73
Gridiron Dinner, Dobrynin's
meeting with Reagan at, 多
勃雷宁与里根在格拉迪诺·
迪那会谈 490—91
Grishin, Victor, 维克托·格里
申 437—38, 513
Gromyko, Andrei, 安德烈·葛
罗米柯 5—6, 16, 58, 117,
134—35, 201—3, 209—10,
218—21, 233—34, 377—
78, 381, 453, 463, 494—95,
537, 544—46, 551, 560,
620, 623
ABM systems and, 反弹道
导弹系统与葛罗米柯
150
and agreement on preven-
ting nuclear war, 葛罗
米柯与防止核战争协议

273
Andropov's relationship
with, 安德罗波夫与葛
罗米柯的关系 210
and Andropov's views on
foreign policy, 葛罗米
柯与安德罗波夫对外交
政策的看法 512—14
annual White House visit
of, 葛罗米柯一年一度对
白宫的访问 554—58
and assassination of
Kennedy, 葛罗米柯与肯
尼迪遇刺 112
Berlin issue and, 柏林
问题与葛罗米柯 63,
66, 77, 105, 233
and Brezhnev's attempts
at breakthrough with
Reagan, 葛罗米柯与勃列
日涅夫试图在与里根的
关系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488
and Brezhnev's power
struggle with Kosykin, 葛
罗米柯与勃列日涅夫同
柯西金的权力之争 134
Brezhnev's relationship
with, 勃列日涅夫与葛
罗米柯的关系 131, 521
Carter's election and, 卡
特当选与葛罗米柯 378

- Carter's human rights policy and, 卡特的人权政策与葛罗米柯 399—400, 410
- competence of, 葛罗米柯的能力 32—33
-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葛罗米柯 53—54
- and confusion about detente, 葛罗米柯与在缓和问题上出现的混乱 408
- Cuban mini-crisis and, 小规模古巴危机与葛罗米柯 428—29
-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古巴导弹危机与葛罗米柯 74, 76—79, 82, 89
- diplomatic style of, 葛罗米柯的外交风格 9, 29
- dismantling detente and, 废止缓和与葛罗米柯 473, 475
- dissidents and, 持不同持见者与葛罗米柯 552—53
- and Dobrynin's appointment as U.S. ambassador, 葛罗米柯与多勃雷宁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48, 51
- and Dobrynin's awards and honors, 葛罗米柯与多勃雷宁获得奖励和荣誉 511
- Dobrynin's foreign policy innovations and, 多勃雷宁的外交政策创新与葛罗米柯 231
- Dobrynin's relationship with, 多勃雷宁与葛罗米柯的关系 33, 35, 48, 51
- Euromissiles and, 欧洲导弹与葛罗米柯 495—96, 543—45
- and Ford's relationship with Kissinger, 葛罗米柯与福特同基辛格的关系 320
- foreign policy assessments of, 葛罗米柯对外交政策的评价 156—58, 183—84, 207, 640—43
-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与葛罗米柯 572—73, 577, 589—90, 594, 598
- Glassboro summit and,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与葛罗米柯 163
- and Gorbachev's ascending to power, 葛罗米柯与戈尔巴乔夫上台 565—66

- Gorbachev's disarmament plan and, 戈尔巴乔夫的裁军计划与葛罗米柯 596
- Gorbachev's dissatisfaction with, 戈尔巴乔夫对葛罗米柯的不满 571—72, 574—76
- Gorbachev's official dinners and, 戈尔巴乔夫举行的正式宴会与葛罗米柯 618
- Haig's first official exchange with, 黑格首次与葛罗米柯正式交换意见 484—85
- Hammer and, 哈默与葛罗米柯 461
- Helsinki Conference and, 赫尔辛基会议与葛罗米柯 345—46
- Humphrey's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汉弗莱的总统选举与葛罗米柯 176
- and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葛罗米柯与入侵阿富汗 437—41, 443, 445—46, 448—49, 452, 456
- Israeli relations and, 以色列关系与葛罗米柯 162
- Jewish emigration and, 犹太人移民与葛罗米柯 267—69, 312, 335—36, 338
- KAL007 incident and, KAL007 航班事件与葛罗米柯 539—40
- and KGB residents of embassies, 葛罗米柯与克格勃驻使馆人员 356
- Kissinger's secret Moscow mission and, 基辛格赴莫斯科执行秘密使命与葛罗米柯 244—45
- Middle East peace negotiations and, 中东和平谈判与葛罗米柯 205—6, 235, 283, 309, 349, 398
- Moscow summits and,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与葛罗米柯 218, 248—49, 254, 256, 308—9, 313
- and Nixon's direct dialogue with Brezhnev, 葛罗米柯与尼克松同勃列日涅夫的直接会谈 228—32
- nuclear test ban and, 禁止核试验与葛罗米柯 102—3
- October War and, 十月战争与葛罗米柯 288,

- 293, 295
- Paris summit and, 巴黎最高级会谈与葛罗米柯 40—41
- political disinformation and, 政治假情报与葛罗米柯 354
- and purposes of U.S. - Soviet summits, 葛罗米柯与美苏举行最高级会谈的目的 36
- Reagan as annoyance to, 里根使葛罗米柯感到烦恼 495
- Reagan's anti-Sovietism and, 里根的反苏思想与葛罗米柯 544—45
- and Reagan's push for summit, 葛罗米柯与里根急于举行最高级会谈 569—70
- and reform movement in Poland, 葛罗米柯与波兰的改革运动 499
- ruble - yuan exchange rate and, 卢布 - 元兑换率与葛罗米柯 21—22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葛罗米柯 203, 215, 254, 309—10, 313 330, 351—52, 390, 395—96, 398—400, 410, 413—14, 424, 426, 428—29, 502—3, 534, 574
- Shultz's talks at UN with, 舒尔茨在联合国与葛罗米柯会谈 508—9
- and Soviet military aid to Cuba, 葛罗米柯与苏联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 72, 74, 76—78, 81
- and Soviet naval presence around Cuba, 葛罗米柯与苏联海军在古巴周围的存在 235
- space weapons talks and, 太空武器谈判与葛罗米柯 559—61, 565, 572
- and stalemate over Germany, 葛罗米柯与在德国问题上的僵局 63, 66, 77, 105
- Stalin's relationship with, 斯大林与葛罗米柯的关系 21—23
- on tactical delays in foreign policy, 葛罗米柯论外交政策上的策略性拖延 209
- Third World policy and, 第三世界政策与葛罗米柯 464
- and troop reductions in Europe, 葛罗米柯与裁减

- 驻欧军队 426—27
- U. S. - Soviet trade relations and, 美苏贸易关系与葛罗米柯 284
- Vienna summits and,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与葛罗米柯 44, 398, 421, 424—28
- Vladivostok summit and, 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会谈与葛罗米柯 327—28, 330, 335—36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争与葛罗米柯 136, 139—40, 144—45, 244—45
- and War between Ethiopia and Somalia, 葛罗米柯与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之间的战争 406
- Washington summit and,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与葛罗米柯 276, 281, 283—84
- Watergate and, 水门事件与葛罗米柯 310
- Grubjakov, Vasily, 瓦西里·格鲁比亚科夫 295
- Haig, Alexander, 亚历山大·黑格 5, 225, 270—71, 480, 482—87, 490—93, 501—2, 505—9
-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黑格 485—86
- Euromissiles dispute and, 有关欧洲导弹的争论与黑格 495—96
- October War and, 十月战争与黑格 293
- Reagan's anti-Sovietism and, 里根的反苏思想与黑格 484—87
- and Reagan's letter to Brezhnev from hospital, 黑格与里根从医院给勃列日涅夫写信 492—93
- and reform movement in Poland, 黑格与波兰的改革运动 499
- resignation of, 黑格辞职 506—7, 509
- Soviet dissidents and,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与黑格 497
- and Soviet's annoyance with Reagan, 黑格与苏联对里根感到恼火 495—96
- Haile Selassie, Emperor of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 402—3
- Hailsham, Lord, 黑尔什姆勋爵

- 103—4
- Haldeman, H. R., H. R. 霍尔德曼 214, 274, 280, 293
- Hammarskjold, Dag, 达格·哈马舍尔德 33—35
- Hammer, Armand, 阿曼德·哈默 132, 460—62, 562
- Harriman, W. Averell, W. 埃夫里尔·哈里曼 377—79, 431, 452, 457
- and Johnson's decision against running for reelection, 哈里曼与约翰逊决定不再参加竞选 173—74
- nuclear test ban and, 禁止核试验与哈里曼 101—4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哈里曼 379
- Vienna summit and,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与哈里曼 422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争与哈里曼 141—42, 165, 169, 171, 173—74
- Hartman, Arthur, 阿瑟·哈特曼 390, 557—58, 578
- Helsinki: 赫尔辛基
- Bush - Gorbachev meeting in, 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在赫尔辛基会谈 635
-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in, 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345—48, 488, 573
- human rights accords of, 赫尔辛基人权记录 390, 508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赫尔辛基 202—3, 211, 213
- Shultz's speech in, 舒尔茨在赫尔辛基的讲话 576—77
- Helsinki Final Act, 赫尔辛基最后行动 347, 576
- Helsinki Watch Committees, 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 553
- Herter, Christian, 克里斯琴·赫脱 40
- Hitchcock, Alfred, 艾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259—60
-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15, 158—59, 422, 522
- Ho Chi Minh, 胡志明 115, 117, 155, 171, 263
- Hollywood, Calif., Dobrynin's visit to, 多勃雷宁访问加州好莱坞 259—60
- Hughes, Richard, 理查德·休斯 163
- Humphrey, Hubert, 休伯特·汉

- 弗莱 173
- presidential campaign of,
汉弗莱参加总统竞选
168, 173—76, 185—86,
455
- Vietnam War and, 越南
战争与汉弗莱 138,
173—76, 185—86
- Hurok, Sol, 索尔·赫鲁克 125
- Hyland, William, 威廉·海兰
364
- Ilyitch, Leonid, 列昂尼德·伊里
奇 281
- India, 印度 234—38
- Indian Ocean, demilitarization
of, 印度洋非军事化
406, 446
- Iran, 伊朗 417, 485
- Afghanistan and, 阿富汗
与伊朗 435—38, 441,
447, 451
- fundamentalist revolution
in, 伊朗原教旨主义革命
415, 428
- Iraqi war with, 两伊战争
462, 488
- Nixon's visit to, 尼克松访
问伊朗 243, 256
- U. S. hostages seized in, 伊
朗拘押美国人质 175,
· 382, 415, 417, 437, 453—
- 54
- U. S. military aid to, 美国
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
436—37
- Iraqi:
- Irani war with, 两伊战争
462, 488
- Isakov, Victor, 维克托·伊萨科
夫 5, 535, 553
- Israel, 以色列 266, 642
- Carter's presidential cam-
paigns and, 卡特的总
统竞选与以色列 460
- dismantling detente and,
废止缓和与以色列
470, 473
- and Jewish emigration
from Soviet Union, 以
色列与犹太人从苏联移
民 158—59, 267, 269
- Lebanon invaded by, 以
色列入侵黎巴嫩 506
- Middle East peace nego-
tiations and, 中东和平
谈判与以色列 204—5,
283, 303—4, 306, 309,
325, 332, 349, 398, 460
- October War and, 十月战争
与以色列 278,
287—302, 470
- Six Day War and, 六日战
争与以色列 159—

- 62, 164, 167
- Soviet relations with,
苏联与以色列的关系
158—62
- U. S. relations with, 美国
与以色列的关系
159—60
- Vladivostok summit and,
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
会谈与以色列 332
- Jackson, Henry “scoop”, 亨利
“斯科普”·杰克逊
159, 267, 269—70, 304,
312, 321, 333—38, 365—
66, 480
- Dobrynin’s breakfast
with, 多勃雷宁与杰克逊
共进早餐
337—39
- Helsinki Conference and,
赫尔辛基会议与杰克逊
347
- planned Soviet visit of, 杰
克逊计划访苏 400—
401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
会谈与杰克逊 399—
400
- Vienna summit and, 维也
纳最高级会谈与杰克逊
422
- Jackson - Vanik amendment, 杰
克逊 - 瓦民克修正案
265, 269—70, 336,
366, 518
- Japan, 227, 375—76, 525, 624
Ford’s visit to, 福特访问日
本 327—28
KAL007 incident and,
KAL007 航班事件与日
本 536, 539
Pearl Harbor attacked
by, 日本进攻珍珠港
37, 522
Russian War and, 俄日战
争 19
and Weakening of dollar,
日本与美元地位下降
417
- Jarring, Gunnar, 贡纳尔·雅
林 204
- Jaruzelski, Wojciech, 沃伊切
赫·雅鲁泽尔斯基 500
- Javits, Jacob, 雅各布·贾维茨
312, 334
- Jepsen, Roger, 罗杰·杰普森
505
- Jha, L. K., L. K. 杰哈 236
- John Paul II, Pope, 教皇约翰·
保罗二世 494—95
- Johnson, Lyndon, 林登·约翰
逊 6, 57, 115—90, 193,
198, 321, 429, 466—67, 606

ABMs and, 反弹道导弹系统与约翰逊 141, 148—49, 151, 153, 165—67

additional summit sought by, 约翰逊试图额外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 177—78, 180—81, 184—87

anti - communism of, 约翰逊的反共思想 188—89

and assassination of Kennedy, 约翰逊与肯尼迪总统遇刺 107—8, 110, 115

and Brezhnev's power struggle with Kosygin, 约翰逊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权力之争 134

comparisons between Brezhnev and, 勃列日涅夫与约翰逊相比较 131—32

in deciding against running for reelection, 约翰逊决定不再竞选总统 172—74, 177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of, 约翰逊难于做出决定 118

and diplomatic stalemate over Germany, 约翰逊与在德国问题上陷入外交困境 121

and Dobrynin's amusing run - in with Rostow, 约翰逊与多勃雷宁同罗斯托进行的令人可笑的争吵 142—43

Dobrynin's first private meeting with, 多勃雷宁第一次与约翰逊私下会谈 119—20

domestic agenda of, 约翰逊的国内议事日程 115, 118, 120, 132, 156, 187

foreign policy of, 约翰逊的对外政策 115—19

Glassboro summit and,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与约翰逊 151, 153, 162—67, 180—81

and Gromyko's assessments of foreign policy, 约翰逊与葛罗米柯对外交政策的估计 158, 640, 642

Humphrey's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汉弗莱的总统竞选活动与约翰逊 175

- and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约翰逊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79—82, 184
- Khrushchev's dismissal and, 赫鲁晓夫被解职与约翰逊 128—29, 134
- Laotian crisis and, 老挝危机与约翰逊 121—22
- and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约翰逊与不扩散核武器 148
- personality of, 约翰逊的个性 117—20
- presidential campaigns of, 约翰逊的总统选举 133, 455
- reducing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削减军费开支与约翰逊 133—34
- and reducing U. S. military presence in Europe, 约翰逊与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 146
- and relocation of Soviet embassy, 约翰逊与苏联使馆重选馆址 124
- Six-Day War and, 六日战争与约翰逊 160, 162, 164
- and threatened invasion of Romania, 约翰逊与威胁入侵罗马尼亚 181—83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争与约翰逊 115—18, 121, 129, 132, 135—38, 141—45, 155—56, 162, 164—65, 168—75, 180, 184—89, 244, 467
- Jones, David, 戴维·琼斯 422
- Jordan, Hamilton, 汉密尔顿·乔丹 421—22
- Kahane, Meir, 迈尔·卡亨 56, 266, 365
- Karmar, Babrak, 巴布拉克·卡尔马尔 435, 440, 442—43, 450—52, 463
- Kendall, Donald, 唐纳德·肯德尔 297, 366, 452, 489—90, 509, 585, 598
- Kennan, George, 乔治·凯南 547—48
- Kennedy, Edward, 爱德华·肯尼迪 146, 367, 427, 452, 598—99, 605
- Kennedy, Jacqueline, 杰奎琳·肯尼迪 109—10
- Kennedy, John F., 约翰·F. 肯尼迪 4, 6, 42—46, 51—

117, 119, 129, 132—33,
159, 169, 188—89, 321,
428—29, 431, 466—67,
503, 640
assassination of, 肯尼迪遇
刺 107—12, 115, 123
and attempts to overthrow
Castro, 肯尼迪与试图
推翻卡斯特罗 71
Bay of Pigs invasion and,
猪湾入侵与肯尼迪 43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肯尼迪
52—54, 60—61, 93—95,
100, 110—11
Cuban missiles crisis and,
古巴导弹危机与肯尼迪
54, 75—81, 83—93, 95,
111, 116, 606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arsenal under, 肯尼迪执
政时期战略武器库的发
展 331
and Dobrynin's appoint-
ment as U. S. ambassa-
dor, 肯尼迪与多勃雷宁
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57—62
Dobrynin's last meeting
with, 多勃雷宁与肯尼迪
的最后一次会谈 105—
7

foreign policy skills of, 肯
尼迪的外交政策技巧
111—12
funeral of, 肯尼迪的葬礼
109—10, 116
hot line and, 热线与肯尼迪
96—97
India - Pakistan War and,
印巴战争与肯尼迪
237
Khrushchev's respect for,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尊
重 52
Laotian crisis and, 老挝危
机与肯尼迪 121—22
missile gap and, 导弹差距
与肯尼迪 152, 367
nuclear test ban and, 禁止
核试验与肯尼迪
99—103, 105, 112
presidential campaigns of,
肯尼迪的总统竞选活动
367
and relocation of soviet
embassy, 肯尼迪与苏
联使馆重选馆址 124
and Soviet military aid
to Cuba, 肯尼迪与苏
联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
69—71, 75—79, 81
and stalemate over
Germany and Berlin,

- 肯尼迪与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陷入困境
64—68, 77, 98, 105—6, 113, 233
- U. S. - Soviet trade and, 美苏贸易与肯尼迪
106
- Vienna summit and,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与肯尼迪
43—46, 52, 59—60, 67, 76, 112—13, 123, 379, 425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争与肯尼迪 115—16, 140, 168
- Kennedy, Robert, 罗伯特·肯尼迪 6, 59 注, 106—7, 642
- and assassination of Kennedy, 罗伯特·肯尼迪与约翰·肯尼迪遇刺 109—10
-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罗伯特·肯尼迪 52—54, 61, 94—95, 100
-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古巴导弹危机与罗伯特·肯尼迪 75—76, 81—90, 92, 96
- nuclear test ban and, 禁止核试验与罗伯特·肯尼迪 98, 101
- planned Soviet visit of, 罗伯特·肯尼迪计划访苏 60—61
- presidential campaign of, 罗伯特·肯尼迪的总统竞选活动 168
- and Soviet military aid to Cuba, 罗伯特·肯尼迪与苏联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 68—70, 81—82
- and stalemate over Germany and Berlin, 罗伯特·肯尼迪与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陷入困境 64—65, 98
- temper of, 罗伯特·肯尼迪的脾气 61, 111
- Khan, Ayub, 阿尤布·汗 237
- Khrushchev, Nikita, 尼基塔·赫鲁晓夫 4, 15, 26, 60—62, 100—07, 112—14, 116—17, 119—20, 133, 219, 467, 469, 609, 615
- arms control process doubted by, 赫鲁晓夫怀疑军备控制进程 147
- and assassination of J. Kennedy, 赫鲁晓夫与约翰·肯尼迪遇刺 109—11
- comparisons between

- Brezhnev and, 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相比较 130—31
-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赫鲁晓夫 52—54, 60—61, 93—95, 100, 110—11
-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古巴导弹危机与赫鲁晓夫 71, 76, 78—93, 95—98
- dismantling detente and, 废止缓和与赫鲁晓夫 472, 474
- dismissal of, 赫鲁晓夫被解职 93, 128—30, 134, 633, 637
- and Dobrynin's appointment as U. S. ambassador, 赫鲁晓夫与多勃雷宁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47, 51—52, 59—60
- and Dobrynin's last meeting with J. Kennedy, 赫鲁晓夫与多勃雷宁同约翰·肯尼迪的最后一次会谈 105—6
- espionage and, 间谍活动与赫鲁晓夫 357
- on foreign policy procedures, 赫鲁晓夫谈外交政策程序 46—47
-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与赫鲁晓夫 37—38
- and Hammarskjold's Soviet visit, 赫鲁晓夫与哈马舍尔德访苏 34—35
- hot line and, 热线与赫鲁晓夫 96—97
- and Jewish emigration from Soviet Union, 赫鲁晓夫与犹太人从苏联移民 267
- J. Kennedy respected by, 赫鲁晓夫对约翰·肯尼迪的尊重 52
- Laotian crisis and, 老挝危机与赫鲁晓夫 121—22
- Nixon kitchen debate with, 尼克松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 197
- nuclear test ban and, 禁止核试验与赫鲁晓夫 100—106
- Paris summit and, 巴黎最高级会谈与赫鲁晓夫 40—42, 251
- and purposes of U. S. — Soviet summits, 赫鲁晓夫与美苏最高级会谈的目的 36
- reforms of, 赫鲁晓夫的改革

- 革 637
- relations between Molotov and, 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的关系 31—32
- R. Kennedy's planned Soviet visit and, 罗伯特·肯尼迪计划访苏与赫鲁晓夫 60—61
- and Soviet fears of nuclear attack, 赫鲁晓夫与苏联对核攻击的恐惧 522
- and Soviet military aid to Cuba, 赫鲁晓夫与苏联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 68—74, 78—81
- and stalemate over Germany and Berlin, 赫鲁晓夫与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陷入困境 64—68, 98—99, 112, 120—21, 233
- Thompson's corn plot and, 汤普森的玉米诡计与赫鲁晓夫 62
- U-2 affair and, U-2 飞机事件与赫鲁晓夫 39—42
- Vienna summit and,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与赫鲁晓夫 43—46, 52, 67, 112—13, 123, 379, 425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争与赫鲁晓夫 116, 121, 129
- Khovostov,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赫沃斯托夫 17—19
- Kirkpatrick, Jeane,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 507, 510
- Kissinger, Henry, 亨利·基辛格 5—8, 178, 194—95, 196 注, 199—208, 220—30, 234, 258—59, 318—28, 376—83, 402, 455, 457, 463—65, 483, 606, 631
- ABMs and, 反弹道导弹系统与亨利·基辛格 213—14, 220
- and agreement on preventing nuclear war, 基辛格与防止核战争协议 273, 277
- Angola and, 安哥拉与基辛格 361—64, 368—69
- anti-Sovietism of, 基辛格的反苏思想 464
- attempts on life of, 企图谋杀基辛格 358
- Berlin issue and, 柏林问题与基辛格 217, 220—23, 229—30
- Brzezinski criticized by, 基辛格批评布热津斯基

397
Carter's election and, 卡特当选与基辛格
378—81
China visited by, 基辛格
访华 224, 226, 234,
241, 243, 257, 285
in comparing Ford and
Nixon, 基辛格将福特
和尼克松做比较
339—41
comparisons between Brz-
ezinski and, 布热津斯
基与基辛格相比较
383, 463
comparisons between
Shultz and, 舒尔茨和基
辛格相比较 521—22,
532
comparisons between
Vance and, 万斯和基辛
格相比较 382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基辛格
53, 199—201, 203—4,
208, 210—11, 213—15,
223, 232, 235—37, 240,
260, 268, 270, 272,
278—79, 287, 289—91,
297, 308, 485, 541, 573
dismantling detente and,
废止缓和与基辛格

469—71
and Dobrynin's dinner
with Rockefeller, 基辛
格与多勃雷宁和洛克菲
勒共进晚餐 323—25
Dobrynin's relationship
with, 多勃雷宁与基辛
格的关系 7—8
and doctrine of limited
nuclear war, 基辛格与
有限核战争思想
307
espionage and, 间谍活动
与基辛格 356—58
and first use of nuclear
weapons, 基辛格与首
先使用核武器 278
Ford's presidential cam-
paign and, 福特的总
统竞选活动与基辛格
348, 350—51, 367—69
Ford's relationship with,
福特与基辛格的关系
319—21, 327
friction between Rogers
and, 罗杰斯和基辛格
的冲突 204
on Gromyko's policy
decisions, 基辛格论葛
罗米柯的政策决定
131
Helsinki Conference and,

- 赫尔辛基会议与基辛格 347
- Hollywood visit of, 基辛格访问好莱坞 259—60
- hot line between Dobrynin and,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之间的热线 250
- human rights and, 人权与基辛格 380—81
- and impossibility of agreement with Reagan, 基辛格与不可能同里根达成协议 540
- India - Pakistan war and, 印巴战争与基辛格 235—38
- and Jewish emigration from Soviet Union, 基辛格与犹太人从苏联移民 268—69, 312, 335—36, 338
- Jewish heritage of, 基辛格的犹太人遗传 303
- in meeting with Vance and Dobrynin, 基辛格与万斯和多勃雷宁会谈 380
- Middle East peace negotiations and, 中东和平会谈与基辛格 204—6, 222, 235, 242, 283, 304, 306, 309, 320, 325, 406
- MIRVs and, 分导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与基辛格 212, 285
- Moscow summits and,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与基辛格 210—11, 213—14, 216—17, 220—22, 224—27, 232—35, 237—56, 258, 308—11, 313, 315—16
- Nixon's China visit and, 尼克松访华与基辛格 226—27, 232, 236
- and Nixon's direct dialogue with Brezhnev, 基辛格与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直接对话 228—30, 232
- and Nixon reshaping of government, 基辛格与尼克松改组政府 270—72
- Nixon's resignation and, 尼克松辞职与基辛格 305—6
- and Nixon's visit to China, 基辛格与尼克松访华 240—41
- and Nixon's visit to Poland, 基辛格与尼克

- 松访问波兰 243
- October War and, 十月战争与基辛格 287—94, 296—301
- political disinformation and, 政治假情报与基辛格 353—54
- popularity of, 基辛格的声誉
- pressure from right on, 右翼对基辛格的压力 364
- raising sunken Soviet sub and, 打捞沉没的苏联潜水艇与基辛格 352—53
- Reagan's presidential campaigns and, 里根的总统竞选活动与基辛格 464—65
- Reagan's peacemongering and, 里根乞求和平与基辛格 548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基辛格 200—203, 207—8, 210, 212, 214—17, 221, 254, 309—11, 313, 316, 327, 330—31, 333, 349, 352, 363—64, 369, 388, 395, 464, 471, 574
- secret Moscow mission of, 基辛格赴莫斯科执行秘密使命 244—45
- sense of humor of, 基辛格的幽默感 201, 274
- SLBMs and, 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与基辛格 215
- and Soviet naval presence around Cuba, 基辛格与苏联海军在古巴周围的存在 234—35
- Soyuz - Apollo docking and, 联盟 - 阿波罗宇宙飞船对接与基辛格 342—44
- structure of Dobrynin's meeting with,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的安排 199
- swan song of, 基辛格的告别谈话 367—70
- U.S. - China relations and, 美中关系与基辛格 202, 207, 221, 224
- U.S. - Soviet trade and, 美苏贸易与基辛格 284, 336
- Vienna summit and,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与基辛格 379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争与基辛格 195, 200, 227—28, 239, 241,

- 243—49, 257, 260—64,
271, 343—45, 358, 368,
469
- Vladivostok summit and,
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
级会谈与基辛格 319,
322—23, 326—28, 330—
33, 335—36
- Washington summit and,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与基
辛格 264, 275, 280,
283—85
- Watergate and, 水门事件
与基辛格 274, 285—
87, 293, 311, 316
- Kohl, Helmut, 赫尔穆特·科尔
631, 635
- Kohler, Foy, 富瓦·科勒 139—
40, 357
- Korean War, 朝鲜战争 22,
25, 36—37
- Kornienko, Georgi, 格奥尔吉·
科尔尼延科 5, 60, 330,
399, 556, 575, 620
-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
瓦最高级会谈与科尔尼
延科 590
- KAL007 incident and,
KAL007 航班事件与科
尔尼延科 537
- nuclear disarmament
program of, 核裁军计划
与科尔尼延科 596—
98
- Kosygin, Alexei, 阿列克谢·柯
西金 128, 142, 214
- ABMs and, 反弹道导弹系
统与柯西金 150, 153,
165—67
- background of, 柯西金的
背景 134—35
- Brezhnev's rivalry with,
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对
立 134—35, 207, 282
- and confusion about
detente, 柯西金与缓和
问题上的混乱
- Euromissiles and, 欧洲导
弹与柯西金 543
- Glassboro summit and, 葛
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与
柯西金 151, 153,
162—67, 180—81
- Hammer and, 哈默与柯西
金 461—62
- Helsinki Conference and,
赫尔辛基会议与柯西金
346
- Humphrey's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汉弗莱
的总统竞选与柯西金
174
- and invasion of Czechoslo-
vakia, 柯西金与入侵

- 捷克斯洛伐克 179
- and Johnson's campaign for additional summit, 柯西金与约翰逊试图额外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 177, 185
- Middle East peace negotiations and, 中东和平谈判与柯西金 204
- Moscow summits and,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与柯西金 218, 248, 251, 253—55, 313
- and Nixon's direct dialogue with Brezhnev, 柯西金与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直接对话 228
- October War and, 十月战争与柯西金
- Reagan's presidential campaigns and, 里根的总统竞选活动与柯西金 458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柯西金 166
- Six - Day War and, 六日战争与柯西金 160—62, 164, 167
- on Soviet Lend - Lease debt, 柯西金论苏联所欠租借法案债务 337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争与柯西金 135—36, 144, 155—56, 162—64, 167, 174, 185—86
- Krylov, Ivan, 伊万·克雷洛夫 17, 387
- Kryuchkov,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克留切科夫 438, 440—41
- Kudryavstev, Sergei, 谢尔盖·库德里亚夫采夫 72
- Kurchatov, Igor, 伊戈尔·库尔恰托夫 23
- Kuznetsov, Vassily, 瓦西里·库兹涅佐夫 83, 91
- Kyrillin,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基林 398
- Laird, Melvin, 梅尔文·莱尔德 240, 340
- Laos, 老挝 43, 111, 121—22, 137
- Laxalt, Paul, 保罗·拉克索尔特 491—92
- Lebanon, 黎巴嫩 5—6, 506, 541
- Le Duc Tho, 黎德寿 245—46, 257, 260—63
- Lenin, V. I., V. I. 列宁 132, 157, 159, 191—92, 397, 461, 519, 617, 619, 637, 641
- Leningrad, Nixon's visit to,

- 尼克松访问列宁格勒
255
- Leonov, Alexey,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 326
- Ligachev, Yegor, 叶戈尔·利加乔夫 617
- Lincoln, 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 323, 639
- Li Peng, 李鹏 637
- Lippman, Walter, 沃尔特·李普曼 61—62, 84, 141
- Litvinov, Maxim, 马克西姆·李特维诺夫 16—18, 48
- Lodge, Henry Cabot, 亨利·卡伯特·洛奇 116
- Lopez Portillo, José, 何塞·洛佩斯·波蒂略 497
- Louis, Victor, 维克托·路易斯 354
- Lukjanov, Anatoly, 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 617
- Lushev, Ivan, 伊万·卢舍夫 625
- McCarthy, Eugene, 尤金·麦卡锡 168
- McFarlane, Robert, 罗伯特·麦克法兰 510, 556, 560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与麦克法兰 573, 579—80, 582, 585
and Gorbachev's invitation to visit U.S., 麦克法兰与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 566—67
on Reagan's readiness to negotiate, 麦克法兰谈里根打算谈判 563
SDI and, 战略防御计划与麦克法兰 579
- McGovern, George, 乔治·麦考文 258, 455
- Macmillan, Harold, 哈罗德·麦克米兰 40—41, 102
- McNamara, Robert,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6—7, 321
ABMs and, 反弹道导弹系统和麦克纳马拉 149—53, 165—67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古巴导弹危机与麦克纳马拉 80
Glassboro summit and,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与麦克纳马拉 163, 165—67
nuclear test ban and, 禁止核试验与麦克纳马拉 100—101
resignation of, 麦克纳马拉辞职 168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

- 器会谈与麦克纳马拉
151—52
- Six-Day War and, 六日
战争与麦克纳马拉
160
- and stalemate over Ger-
many and Berlin, 麦克
纳马拉与德国和柏林问
题上的僵局 64—66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
争与麦克纳马拉 137,
142, 152—53, 168
- Malik, Yakov, 雅科夫·马立克
39—40
- Malinovsky, Rodion, 罗季翁·
马利诺夫斯基 40—41,
73, 194
- Malta summit, 马耳他最高级
会谈 630, 633—34
- Mansfield, Mike, 迈克·曼斯菲
尔德 137, 146, 269, 431
- Mao Zedong 毛泽东 22,
117, 136
- Margain, Hugo, 乌戈·马加因
497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397, 429, 617
- Mathias, Charles McC., 查尔
斯·McC. 马赛厄斯 501
- Matlock, Jack, 杰克·马特洛克
559, 603, 634—35
- Meese, Edwin, 埃德温·米斯
510, 556
- Meir, Golda, 果尔达·梅厄
205, 269
- Mengistu Haile Mariam, 门格
斯图·海尔·马利亚姆
402—3
- Menshikov, Mikhail, 米哈伊
尔·梅尼希科夫 44, 47—
48, 52—53, 57
- Meyer, Agnes, 阿格尼丝·迈耶
62
- Mikhailovsky, Jerszy, 泽西·米
哈伊洛夫斯基 170
- Mikoyan, Anastas I., 阿纳斯塔
斯·I. 米高扬 54, 117
and assassination of
Kennedy, 米高扬与肯
尼迪遇刺 109—10
-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古巴导弹危机与米高扬
85, 89, 91—93
- Vienna summit and, 维也
纳最高级会谈与米高扬
44—45, 113
- Molotov, Vyacheslav, 维亚切
斯拉夫·莫洛托夫 15,
18—20, 26, 28—32, 37
- Mondale, Walter, 沃尔特·蒙
代尔 554, 558
- Morlion, Felix, 费利克斯·莫
林 547
- Moscow summit (1972), 莫斯

科最高级会谈 201—3,
210—11, 213—14, 237—
58, 472

basic achievements of, 莫
斯科最高级会谈(1972)
的基本成就 251—53

and first use of nuclear
weapons, 莫斯科最高
级会谈与首先使用核武
器 278

fixing date of, 莫斯科最高
级会谈(1972)确定日期
232—33

and Jewish emigration
from Soviet Union, 莫
斯科最高级会谈(1972)
与犹太人从苏联移民
268

maneuvering toward, 为举
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
(1972)而采用的策略
216—35

Middle East peace nego-
tiation and, 中东和平谈
判与莫斯科最高级会谈
(1972) 235

Nixon's China visit and,
尼克松访问中国与莫斯
科最高级会谈(1972)
226—28, 232

and Nixon's direct dia-
logue with Brezhnev, 莫

斯科最高级会谈(1972)
与尼克松同勃列日涅夫
直接对话 232—33

planning agenda for, 为莫
斯科最高级会谈(1972)安
排议事日程 239—43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
会谈与莫斯科最高级会
谈(1972) 201—2,
207, 210—11, 214,
216—17, 239, 242, 245,
248, 251—54

Washington summit and,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与莫
斯科最高级会谈(1972)
284

Moscow summit(1974), 莫斯科
最高级会谈(1974)
307—16, 323

and doctrine of limited
nuclear war, 莫斯科最
高级会谈(1974)与限制
核战争理论 307

preparations for, 为莫斯
科最高级会谈(1974)做
准备 307—12

principal failure of, 莫斯
科最高级会谈的主要缺
陷 314

Moscow summit(1991), 莫斯
科最高级会谈(1991)
627—28

multiple warhead missiles
(MIRVs), 分导式多弹头
导弹 104, 153—54,
285, 307—8, 310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
器会谈与分导式多弹
头导弹 212—13,
331, 333 注, 385, 388,
399, 410, 423
Muskie, Edmund, 埃德蒙·马
斯基 5, 211, 455—57
Najibullah, 纳吉布拉 442—
43
Nasser, Gamal Abdel, 贾迈勒·
阿布代尔·纳赛尔 204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
casters, Johnson's
address to, 约翰逊向全国
广播工作者协会发表演说
173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
gelical Christians, Rea-
gan's address to, 里根向
福音派基督教全国协会发
表讲话 527—28
Nguyen Van Thieu, 阮文绍
343
Nicaragua, 尼加拉瓜
462, 473,
493—94, 569
civil war in, 尼加拉瓜内战

415, 487, 494
Nitze, Paul, 保罗·尼采 573
Nixon, Richard, 理查德·尼克
松 5, 186—87, 191—321,
333—334, 337—42, 369,
376, 402, 421—22, 429,
444, 463, 465—74, 498,
511—12
ABMs and, 反弹道导弹系
统与尼克松 213, 220
and agreement on
preventing nuclear
war, 尼克松与防止核战
争协议 273, 275—76,
285
anti-communism of, 尼克
松的反共思想 119, 176,
196—97, 207, 240, 256,
305, 340, 455
Berlin issue and, 柏林问题
与尼克松 217, 221—
24, 229—30, 233
and Brezhnev's attempts
at breakthrough with
Reagan, 尼克松与勃列日
涅夫试图在同里根的关系
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489, 491
Brezhnev's direct dialogues
with, 勃列日涅夫与尼克
松进行直接对话 228—
33

- Brezhnev's exchange of gifts with, 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交换礼物 255—56, 279
- China visited by, 尼克松访华 217, 221—22, 225—28, 230, 232—33, 236, 240—41
- comparisons between Ford and, 福特与尼克松相比较 339—41
- comparisons between Reagan and, 里根与尼克松相比较 458, 571, 578, 606
-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尼克松 53, 199—201, 203—4, 208, 210—11, 213—15, 223, 232, 235—37, 240, 260, 287, 289—91, 297, 308, 521
- daily White House routine of, 尼克松在白宫的日常工作 229
- damage caused to Republican Party by, 尼克松给共和党造成的损失 339
- detente and, 缓和与尼克松 191, 251, 468—74, 476
- Dobrynin's first meetings with, 多勃雷宁与尼克松第一次会谈 197—200
- farewell to Dobrynin from, 尼克松向多勃雷宁告别 605
- and first use of nuclear weapons, 尼克松与首先使用核武器 278
- foreign policy independence of, 尼克松与外交政策独立 229—30
-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与尼克松 582, 585
- Haig and, 黑格与尼克松 482—83, 486, 507
- on how Soviets should deal with Reagan, 尼克松谈苏联人应如何同里根打交道 465—66
- idiosyncrasies and factual delays in foreign policy of, 尼克松特有的风格及在外交政策上的策略性拖延 209
- India - Pakistan War and, 印巴战争与尼克松 235—38
- Iran visited by, 尼克松访问伊朗 243, 256
- and Jewish emigration from Soviet Union, 尼

- 克松与犹太人从苏联移民 268—70, 312, 316
- and Johnson's campaign for additional summit, 尼克松与约翰逊为额外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所做的努力 185
- and Kissinger's secret Moscow mission, 尼克松与基辛格秘密访问莫斯科 244—45
- Kitchen debate of, 尼克松的厨房辩论 197
- last days of, 尼克松执政的最后几天 315—18
- Middle East peace negotiations and, 中东和平谈判与尼克松 204, 206, 217, 222—24, 228, 230, 234—35, 242, 283, 303—4, 308
- MIRVs and, 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与尼克松 212—13
- Moscow summits and,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与尼克松 203, 210—11, 214, 217—22, 224, 226—27, 230, 232—35, 239—45, 247—58, 284, 307—16, 323, 472
- and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尼克松与不扩散核武器 148
- October War and, 十月战争与尼克松 287—301, 525
- Oreanda meetings of, 尼克松的奥列安达会谈 312—13, 315
- pardoning of, 赦免尼克松 334
- Poland visited by, 尼克松访问波兰 243
- presidential campaigns of, 尼克松的总统竞选活动 175—78, 186, 209—11, 218, 223—24, 257—58, 261, 367, 455
- and relocation of Soviet embassy, 尼克松与苏联使馆重新选择馆址 124
- in reshaping administration, 尼克松改组政府 270—72
- resignation of, 尼克松辞职 305—6, 310, 314, 316—18, 333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尼克松 153, 178, 200—203, 214—15, 217, 221, 223, 228,

- 234, 242, 254, 275, 285,
311, 313—15, 323, 327,
332—33, 338, 393—94
- San Clemente meetings
between Brezhnev
and, 勃列日涅夫与尼
克松在圣克利门蒂会谈
257—58, 275, 280—84,
288—90, 292, 492—93
- Shultz and, 舒尔茨与尼克
松 507—8, 515
- on Soviet Lend - Lease
debt, 尼克松谈苏联租
借法案债务 337
- Soviet policy strands of, 尼
克松对苏政策的组成部
分 206
- Soviet visits of, 尼克松访
问苏联 177—78
- structure of Dobrynin's
meetings with, 多勃雷
宁与尼克松会谈的结构
199
- and superpower rivalry in
Third World, 尼克松与
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
竞争 198
- U.S. - China relations
and, 美中关系与尼克松
202, 221, 224, 282
- U.S. - Soviet trade and,
美苏贸易与尼克松
267, 269—70, 284, 336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
争与尼克松 168—69,
186, 194—95, 198, 200,
206, 210, 219, 228, 230,
239, 241, 243—47, 249,
251, 257—58, 260—64,
469
- Washington summit and,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与尼
克松 258, 264, 270,
274—86
- Watergate and, 水门事件
与尼克松 259, 265—
66, 271—72, 274, 276,
285—87, 293, 298—
300, 302—6, 308—11,
313—14, 316, 319, 471
- Non -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Treaty, 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 148, 166,
198
- October War, 十月战争
287—302, 342
- collapse of cease - fire in,
十月战争期间停火遭到
破坏 294—97
- dismantling detente
and, 废止缓和与十月
战争 470
- and first use of nuclear

- weapons, 十月战争与
首先使用核武器 278
- Kissinger and, 基辛格与十
月战争 287—94,
296—301
- Middle East peace negoti-
ations and, 中东和平谈
判与十月战争 283
- U. S. combat alert in, 美国
在十月战争期间进入
战备状态 297—98,
300, 525
- Ogarkov, Nikolai, 尼古拉·奥加
尔科夫 439
- Olympics in Los Angeles, Calif.,
Soviet boycott of, 苏联抵制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奥运
会 553
- Olympics in Moscow,
U. S. boycott of, 美国抵制
莫斯科奥运会 451, 453,
553
- O'Neill, Thomas P. "Tip", 托马
斯·P. "蒂普"·奥尼尔
548
- Oppenheimer, J. Robert, J. 罗
伯特·奥本海默 100—
101
- Oreanda, Nixon - Brezhnev
meetings in, 尼克松与勃
列日涅夫在奥列安达会谈
312—13, 315
- Oswald, Lee Harvey, 李·哈
维·奥斯瓦尔德 107—8
- Pakistan, 巴基斯坦 417
Indian war with, 印巴战争
234—38
and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巴基斯坦
与苏联入侵阿富汗
445, 447, 451
- Panama Canal Treaty, 巴拿马运
河条约 411—12, 415
- Paris: 巴黎
treatment of Soviet citi-
zens in, 苏联公民在巴
黎受到的对待 126—27
Vietnam War negotia-
tion in, 在巴黎举行的
越南战争谈判 174—
75, 185, 244, 257,
260—63, 344, 358, 368
- Paris summit, 巴黎最高级会谈
39—42, 251
- Paul VI, Pope, 教皇保罗六世
414
- Pauls, Rolf, 罗尔夫·保尔斯
223
- Pearson, Drew, 德鲁·珀森
62, 182
- Penkovsky, Oleg, 奥列格·佩
尼科夫斯基 81 注
- Pentecostal Christian fundarn-

- entalists, Soviet Union in granting exit visas to, 苏联向圣灵降临节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发放出境签证 518, 520—21, 530, 534—45
- Percy, Chares, 查尔斯·珀西 485—86, 547, 550
- Perle, Richard, 理查德·珀尔 400—401, 480
- Pershing II missiles, see Euromissiles, 潘兴 II 导弹, 见欧洲导弹
- Peterson, Peter, 彼得·彼得森 270
- Podgorny, Nikolai, 尼古拉·波德戈尔内 97, 128, 398
Brezhnev's criticism of, 勃列日涅夫批评波德戈尔内 282
Helsinki Conference and, 赫尔辛基会议与波德戈尔内 346
Moscow summit and,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与波德戈尔内 248, 251
October War and, 十月战争与波德戈尔内 295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争与波德戈尔内 257, 260
and War between Ethiopia and Somalia, 波德戈尔内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战争 402—3
- Poindexter, John, 约翰·波因德克斯特 510, 602—3
- Poland, 波兰 377, 463, 481, 483—85, 487—88, 490
martial law in, 波兰的戒严令 505, 534
Nixon visit to, 尼克松访问波兰 243
reform movement in, 波兰的改革运动 487—88, 499—500, 632
- Ponomarev, Boris, 鲍利斯·波诺马廖夫 362, 572
and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波诺马廖夫与入侵阿富汗 438, 441
old-line thinking of, 波诺马廖夫的保守思想 575
Third World Policy and, 第三世界政策与波诺马廖夫 404—5
- Popovkin, Aleksandr, 亚历山大·波波夫金 20
- Powers, Francis Gary, 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39
- Press, Frank, 弗兰克·普雷斯 413

-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
防止核战争 277, 285
- Pullman, George, 乔治·普尔曼 55
- Rapacki, Adam, 亚当·腊帕茨基 121
- Reagan, Nancy, 南希·里根
461, 490—91, 498, 503—4, 510, 520, 555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与南希·里根 577, 580, 582
-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4—5, 8—9, 252, 282, 376, 464—67, 477—612, 628, 633
Andropov's death and, 安德罗波夫去世与里根 551
Andropov's guarded attitude toward, 安德罗波夫对里根的戒备态度 513
anti-Sovietism of, 里根的反苏思想 458—59, 465, 477, 479, 481, 484—87, 491, 494, 496—97, 499, 504—5, 509, 516—17, 520, 522, 526—27, 530, 535—36, 540—41, 544—45, 547, 549—52, 556, 563, 566, 568—69, 571, 582—83, 592—95, 604, 606—7
- arms control knowledge lacked by, 里根缺乏军备控制知识 502
- attempts on life of, 杀害里根的企图 491—93, 503
- and Brezhnev - Nixon meeting in San Clemente, 里根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的会谈 492—93
- Brezhnev's attempts at breakthrough with, 勃列日涅夫试图在与里根的关系方面取得进展 488—91
- Brezhnev's death and, 勃列日涅夫去世与里根 511—12
- Brezhnev's unproductive dialogues with, 勃列日涅夫同里根进行毫无成效的对话 478, 481
- Carter defeated by, 里根击败卡特 465
- Chernenko's death and, 契尔年科去世与里根

- 567
- China visited by, 里根访
华 552
- in choosing confrontation
over detente, 里根以
对抗取代缓和 607
- comparisons between
Carter and, 卡特与里
根相比较 484, 489—
90
- comparisons between
Nixon and, 尼克松与
里根相比较 458,
571, 578, 606
- conciliatory television
address of, 里根的调和
性电视讲话 545
-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里根 53,
505, 517, 521, 531,
541—42, 545, 567, 573,
580, 582, 589, 602, 604
- contradictory behavior
of, 里根的矛盾行为
531—32, 594, 606—8
- conventional arms reduc-
tion talks and, 削减常
规武器谈判与里根
527
- dinners for diplomatic
corps given by, 里根为
外交使团举办宴会
503—4
- and discussions on summit
with Brezhnev, 里根就
举行最高级会谈与勃
列日涅夫进行讨论
490, 505
- dismantling detente and,
废止缓和与里根 467,
470, 480
- Dobrynin's farewell
meeting with, 多勃雷
宁与里根的告别会谈
602—5
- and end of Cold War, 里
根与冷战结束 477,
610—11
- Eureka College speech
of, 里根在尤里卡学院
发表演说 501—3
- Euromissiles and, 欧洲导
弹与里根 496, 500—
501, 520, 532—33, 535,
542—45, 547, 552,
598—99, 608—9
- evolution of, 里根的变化
610
- first visit to Soviet
embassy by, 里根第一
次访问苏联使馆
511—12
- foreign policy skills
lacked by, 里根缺乏外

- 交政策技巧 549—50
- Gandhi's proposed arms race discussion and, 甘地建议举行军备竞赛讨论与里根 530
-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与里根 479, 488—90, 564, 571—73, 577—93, 595—96, 598—99, 602—4, 608
- goodwill exchanges between Gorbachev and,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相互表示友好 596
- Gorbachev invited to U.S. by, 里根邀请戈尔巴乔夫访美 565—67, 584, 594—96, 604—5
- and Gorbachev's ascension to power,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掌权 565—66
- Gorbachev's disarmament plan and, 戈尔巴乔夫的裁军计划与里根 596—600, 603
- Gorbachev's reforms and,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里根 632
- and granting exit visas to Pentecostals, 里根与给圣灵降临节原教旨主义者发放出境签证 518, 520—21, 530, 534
- Gridiron Dinner and, 烧烤宴会与里根 490—91
- Gromyko's White House reception and, 葛罗米柯出席白宫招待会与里根 555—58
- Haig's resignation and, 黑格辞职与里根 506—7, 509
- Helsinki Conference and, 赫尔辛基会议与里根 347
- how his belligerence backfired, 他的好战性如何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544—46
- human rights and, 人权与里根 515
- as impervious to diplomacy, 不受影响的外交 499—503
- impossibility of agreement with, 不可能与里根达成协议 540—43
- and Israeli invasion of Lebanon, 里根与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506
- KAL007 incident and, KAL007 航班事件与里根

- 536—40
- Lebanon civil war and,
黎巴嫩内战与里根
541
- and letters to Brezhnev
from hospital, 里根从
医院给勃列日涅夫写信
492—93
- main diplomatic
principle of, 里根的主
要外交原则 608
- military buildup under,
里根任内的军事集结
416, 459, 477—80,
486—88, 496—97, 501,
509, 519, 528—29,
543—44, 547, 558,
563—64, 572, 609—11
- as peacemonger, 里根一味
乞求和平 546—50
- presidential campaigns of,
里根的总统选举
364—68, 370—72, 444,
455, 457—62, 464—65,
479—81, 499, 507,
529—30, 542, 544—49,
554—55, 557—60,
562—63, 607—8
- public opinion on, 舆论对
里根的评价 592—93,
598—99
- public relations knack
of, 里根的公关技巧
587, 608
- in pushing for summit,
里根敦促举行最高级会
谈 553—54, 567—70,
607—8
- and reform movement
in Poland, 里根与波兰
的改革运动 500
- and return of Cold War,
里根与冷战的恢复
477—80
- Reykjavik summit and,
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
谈与里根 604, 609—
10, 620—22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
会谈与里根 464,
501—2, 507, 515, 559,
582, 595, 598—99, 606—
7, 623
- SDI and, 战略防御计划与
里根 212, 214, 527—
29, 531, 544, 558—59,
561, 573, 578—80,
582, 589—92, 595,
608—11, 620—22, 627
- sense of humor of, 里根的
幽默感 550
- Shultz's Helsinki speech
and, 舒尔茨的赫尔辛基
演说与里根 577

- Shultz's relationship with,
舒尔茨与里根的关系
521—22, 542
- Shultz - Weinberger
struggles and, 舒尔茨 -
温伯格斗争与里根 560
- Soviet dissidents and, 苏联
持不同政见者与里根
497—98, 552—53
- and Soviet fears of nuclear
attack, 里根与苏联对核
攻击的畏惧 522—25
- and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里根与苏
联入侵阿富汗 443—44
- Soviets' annoyance with,
苏联对里根感到烦恼
495—98
- Soyuz - Apollo docking
and, 联盟 - 阿波罗宇宙
飞船对接与里根
495—98
- START and, 削减战略武
器会谈与里根 481
- and Stoessel's
assessment of Shultz,
里根与斯托塞尔对舒
尔茨的评价 508
- and talks between Shultz
and Gromyko at UN,
里根与舒尔茨同葛罗米
柯在联合国举行会谈
508—9
- U. S. - Soviet trade and,
美苏贸易与里根
506, 518, 534
- Vladivostok summit and,
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
级会谈与里根 333
- Washington summit and,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与里
根 623
- Weinberger's foreign
policy role and, 温伯格
的外交政策角色与里根
549
- Reedy, George, 乔治·里迪
118
- Regan, Donald, 唐纳德·里甘
556, 566, 598, 603,
621—22
- Reston, James, 詹姆斯·赖斯顿
45
- Reykjavik summit, 雷克雅未克
最高级会谈 591, 604,
609—10, 619—22
- Ribicoff, Abraham, 亚伯拉罕·
里比科夫 269, 312, 334
- Robinson, Thomas, 托马斯·罗
宾逊 163
- Rockefeller, David, 大卫·洛克
菲勒 208, 324, 376—77,
427
- Rockefeller, Nelson, 纳尔逊·

- 洛克菲勒 323—25, 339, 350—51, 377
- Rodriguez, Carlos Rafael,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 497
- Rogers, William, 威廉·罗杰斯 5, 210—11, 228, 233—34, 266, 321
- Berlin issue and, 柏林问题与罗杰斯 222, 233
-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罗杰斯 53, 199
- Middle East peace negotiations and, 中东和平谈判与罗杰斯 204—6, 211, 235
- Moscow summit and,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与罗杰斯 232, 235, 239—40, 242, 251—52
- and Nixon's direct dialogue with Brezhnev, 罗杰斯与尼克松同勃列日涅夫直接对话 231—32
- and Nixon's reshaping of government, 罗杰斯与尼克松改组政府 270—72
- resignation of, 罗杰斯辞职 272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罗杰斯 202, 214
- Washington summit and,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与罗杰斯 276, 283
- Romania, threatened Soviet invasion of, 罗马尼亚受到苏联入侵的威胁 181—83
- Roosevelt, Franklin D. 富兰克林·D. 罗斯福 55, 103, 200, 321, 323, 348, 379, 558, 587, 606, 639
- Roosevelt, 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 19, 386
- Rostow, Eugene V., 尤金·罗斯托 480, 507
- Rostow, Walt, 沃尔特·罗斯托 141—43, 172—74, 179—81, 480
- Dobrynin's amusing run-in with, 多勃雷宁与罗斯托进行逗人笑的争论 142—43
- Glassboro summit and,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与罗斯托 163
- and Johnson's campaign for additional summit, 罗斯托与约翰逊争取额外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

181, 184—85
Six - Day War and, 六日
战争与罗斯托 161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
争与罗斯托 141—42,
174, 185
Rota Naval base, U. S. closing
of, 美国关闭罗塔海军基
地 333
Rumsfeld, Donald, 唐纳德·拉
姆斯菲尔德 330, 350—
51, 364
Rush, Kenneth, 肯尼思·拉什
222, 233, 270—71, 298—
99
Rusk, Dean, 迪安·腊斯克
5, 70, 104—5, 119, 146—
48, 264, 321, 376, 522
ABMs and, 反弹道导弹系
统与迪安·腊斯克
149, 166
and assassination of
Kennedy, 腊斯克与肯
尼迪遇刺 108—9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古巴导弹危机与腊斯克
74, 78—80, 84, 90—91
and Dobrynin's appoint-
ment as U. S. ambas-
sador, 腊斯克与多勃雷
宁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57—58

farewell party for, 为腊斯
克举行告别聚会
187—88
Glassboro summit and,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
与腊斯克 163—64
and Johnson's decision
against running for
reelection, 腊斯克与约
翰逊决定不再竞选连任
173
Laotian crisis and, 老挝
危机与腊斯克
121—22
and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腊斯
克与不扩散核武器
147—48
nuclear test ban and, 禁止
核试验与腊斯克
101—2, 104
and reducing U. S.
military presence in
Europe, 腊斯克与削减
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
169
and relocation of Soviet
embassy, 腊斯克与苏联
使馆重新选择馆址
resignation of, 腊斯克辞
职 174
seventy - fifth birthday

- of, 腊斯克的 75 岁生日
546
- Six - Day War and, 六日
战争与腊斯克 160—
61
- and Soviet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腊斯克
与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
克 180—82
- and stalemate over
Germany and Berlin, 腊
斯克与在德国和柏林问
题上陷入僵局 63—
65, 77, 98—99, 121
- and threatened invasion of
Romania, 腊斯克与罗
马尼亚受到入侵威胁
183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
争与腊斯克 117,
136—42, 144, 149,
155—56, 164, 169—70,
174, 185—86
- Russian Federation: 俄罗斯联邦
dismantling detente
and, 废止缓和与俄罗斯
联邦 468
- economy of, 俄罗斯联邦的
经济 636—37, 639
- future of, 俄罗斯联邦的前
途 638—39
- and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俄罗斯联
邦与入侵阿富汗 443
and problem of European
security, 俄罗斯联邦
与欧洲安全问题 636
- Rust, Mathias, 马赛厄斯·鲁斯
特 625
- Sadat, Anwar, 安瓦尔·萨达特
290—95, 398—99
- Sakharov, Andrei, 安德烈·萨
哈罗夫 158, 217, 350,
386, 389, 391, 497, 552—53
exile of, 萨哈罗夫的流放
512—13
- Salinger, Pierre, 皮埃尔·塞林
杰 52—53, 59, 109,
118
- San Clement, Calif., Nixon -
Brezhnev meetings in,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加
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会
谈 257—58, 275, 280—
84, 288—90, 292, 492—
93
- San Francisco, Calif., Molotov's
visit to, 莫洛托夫访问旧
金山 28—30
- Scali, John, 约翰·斯卡利
94—95
- Schlesinger, James, 詹姆斯·
施莱辛格 298, 307, 309,

350, 353, 375
Scott, Hugh, 休·斯科特
269, 339
Scowcroft, Brent, 布伦特·斯
考克罗夫特 5, 271, 330,
336, 364, 502, 515—16
Ford's presidential cam-
paign and, 福特的总统
选举与斯考克罗夫特
351, 367, 372
Moscow summit and, 莫斯
科最高级会谈与斯考克
罗夫特 315
October War and, 十月战
争与斯考克罗夫特
293
raising sunken Soviet sub
and, 打捞沉没的苏联
潜艇与斯考克罗夫特
353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
会谈与斯考克罗夫特
351
and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斯考克
罗夫特苏联入侵阿富汗
457—58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
争与斯考克罗夫特
344
Semenov, Vladimir, 弗拉基米
尔·谢苗诺夫 214—15

Sevilia - Sacasa, Guillermo,
吉列尔莫·塞维利亚-萨
卡萨 493—94
Shcharansky, Anatoly, 阿纳托
利·夏兰斯基 399—
400, 413, 497
Shevardnadze, Eduard,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
565, 575—76, 620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谢瓦尔德纳
泽 580
and end of Cold War, 谢
瓦尔德纳泽与冷战的
结束 636
and fall of Warsaw Pact,
谢瓦尔德纳泽与华沙
条约组织解体 632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
瓦最高级会谈与谢瓦尔
德纳泽 577, 580,
582, 590—91
German reunification
and, 德国重新统一与
谢瓦尔德纳泽 630
and Gorbachev - headed
meetings of Politburo,
谢瓦尔德纳泽与戈尔巴
乔夫主持的政治局会议
623
Gorbachev's disarmament
plan and, 戈尔巴乔夫

- 的裁军计划与谢瓦尔德纳泽 596—97
- Gorbachev's reforms and,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谢瓦尔德纳泽 634
- and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谢瓦尔德纳泽与入侵阿富汗 441
- Moscow summit and,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与谢瓦尔德纳泽 627—28
- resignation of, 谢瓦尔德纳泽辞职 576
- Reykjavik summit and, 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谈与谢瓦尔德纳泽 604, 621
- Shultz's Helsinki speech and, 舒尔茨的赫尔辛基演说与谢瓦尔德纳泽 576—77
- space weapons talks and, 空间武器谈判与谢瓦尔德纳泽 578
- Washington summit and,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与谢瓦尔德纳泽 624
- Shulman, Marshall, 马歇尔·舒尔曼 398, 413, 438, 450
- Shultz, George, 乔治·舒尔茨 5, 359, 479, 507—11, 520—22, 533—35, 544—46, 549—50, 565—68, 594
- Andropov's illness and, 安德罗波夫生病与舒尔茨 551
- Brezhnev's death and, 勃列日涅夫去世与舒尔茨 511, 514
- Chernenko's death and, 契尔年科去世与舒尔茨 566
- comparisons between Haig and, 黑格与舒尔茨相比较 508
- comparisons between Kissinger and, 基辛格与舒尔茨相比较 521—22, 532
-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舒尔茨 509, 517, 521—22, 531, 534, 541—42, 545, 573, 580, 602
- conventional arms reduction and, 削减常规武器与舒尔茨 527
- Dobrynin's crowded meeting with, 多勃雷宁与舒尔茨举行的内容繁多的会谈 8—9
- and Dobrynin's farewell meeting with Reagan, 舒尔茨与多勃雷宁同

- 里根举行告别会谈
602—4
- and Dobrynin's first
private meeting with
Reagan, 舒尔茨与多
勃雷宁与里根第一次举
行私下会谈 517,
520—21
- Euromissiles and, 欧洲导
弹与舒尔茨 544—45,
623—24
- farewell to Dobrynin
from, 舒尔茨和多勃雷
宁道别 605
-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
瓦最高级会谈与舒尔茨
572—73, 577—85,
589—91, 595—96, 598
- and Gorbachev's assen-
sion to power, 舒尔茨
与戈尔巴乔夫掌权
565
- Gorbachev's disarmament
plan and, 戈尔巴乔夫
的裁军计划与舒尔茨
577, 597, 599—600
- and Gorbachev's invita-
tion to visit U.S., 舒尔
茨与邀请戈尔巴乔夫访
问美国 565—67, 584
- and granting exit visas to
Pentecostals, 舒尔茨与
向圣灵降临节原教旨主
义者发放出境签证
520—21, 534
- Gromyko's talks at UN
with, 葛罗米柯与舒
尔茨在联合国举行会谈
508—9
- Gromyko's White House
reception and, 葛罗米
柯出席白宫招待会与舒
尔茨 555—56
- Helsinki speech of, 舒尔茨
的赫尔辛基演说
576—77
- human rights and, 人权与
舒尔茨 514—15
- KAL007 incident and,
KAL007 航班事件与舒
尔茨 536, 538—40
- pragmatism of, 舒尔茨的
实用主义观点 510
- Reagan's anti-Sovietism
and, 里根的反苏思想
与舒尔茨 509, 535,
595
- and Reagan's push for
summit, 舒尔茨与里根
敦促举行最高级会谈
553—54, 568, 570
- Reagan's relationship
with, 里根与舒尔茨的
关系 521—22, 542

- Reykjavik summit and,
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
谈与舒尔茨 604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
会谈与舒尔茨 534
- Soviet dissidents and, 苏
联持不同政见者与舒
尔茨 552
- space weapons and, 空间
武器与舒尔茨 527—
28, 559—61, 565, 572,
579, 582, 591
- Stoessel's assessment
of, 斯托塞尔对舒尔茨
的评价 507—8
- Weinberger's struggles
with, 温伯格与舒尔茨
的斗争 549, 560—61,
573, 580
- Simons, Thomas, 托马斯·西蒙
斯 554, 560—61
- Sisco, Joseph, 约瑟夫·西斯科
204—5, 235
- Six - Day War, 六日战争
159—62, 164, 167, 204,
290
- Simirnov, Lev, 列夫·斯米尔诺
夫 150, 254
- Smith, Gerard, 杰勒德·史密
斯 203, 214—15
- Sokolov, Oleg, 奥列格·索科
洛夫 5, 60, 533, 535—
36, 603, 605
- Sokolov, Sergei, 谢尔盖·索科
洛夫 576, 624—25
- Solzhenitsyn, Aleksandr, 亚历
山大·索尔仁尼琴
158, 217, 348, 386
- Somalia, War between Ethiopia
and, 埃塞俄比亚与索马
里之间的战争 402—7,
409
- Sonnenfeldt, Helmut, 赫尔穆特
特·索南费尔特 271,
273, 363
- Sorensen, Theodore, 西奥多·
索伦森 59, 67—68, 175
- South Africa, 南非 360—61,
417, 499, 508—9
- South Korean airliner, Flight
007, Soviet shoot down of,
苏联击落南朝鲜 007 号航
班 478, 535—40
- Soviet Union: 苏联
anti - Semitism in, 苏联
的反犹思想 159
collapse of, 苏联的解体
610—12, 615, 628, 632,
635 注, 638
economy of, 苏联的经济
217—18, 636—38
as evil empire, 苏联被说
成是邪恶帝国 527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founding of, 苏联建国
50周年 262

hot line between U. S.
and, 美苏之间的热线
93, 96—98, 160—61,
210

isolation of, 孤立苏联
473—74

Jewish emigration from,
犹太人从苏联移民
158—59, 265—70, 312,
315—16, 329, 334—
39, 348, 350, 365, 368,
372, 460, 471, 473, 518

military — industrial com-
plex in, 苏联的军事工
业联合体 474—75,
611, 618, 620, 622

opening direct air traffic
between U. S. and, 开
辟美苏之间的直接空中
航线 141, 145

shrinking borders of, 苏
联减少边境地区居民
615

U. S.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美国与苏联的文
化交流 125, 145, 445

U. S. drive to separate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from, 美国逼
迫东欧国家与苏联脱离

关系 481, 500

U. 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美国与苏联的经
济关系 562

U. S. raising sunken sub
of, 美国打捞沉没的苏
联潜艇 352—53

U. S. trade relations
with, 美国与苏联的贸
易关系 106, 215, 253,
258, 265, 267—70, 284,
304, 306, 312, 315,
334—37, 348, 363, 366,
368, 400, 403, 425,
446—47, 471, 473,
505—6, 518, 534—35

U. S. wartime alliance
with, 美苏战时同盟
16—17

Soyuz — Apollo docking, 联盟—
阿波罗宇宙飞船对接
342—45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3, 6—7, 25—26, 31—32,
41, 57—58, 128, 134,
158—59, 179, 194, 348,
468, 574, 587, 615, 618

atomic bomb and, 原子弹
与斯大林 23

as dictator, 独裁者斯大林
219

dismantling detente and,

- 废止缓和与斯大林
473
- and Dobrynin's apprenticeship at Foreign Ministry, 斯大林与多勃雷宁在外交部当学徒
20—22
- Dobrynin's diplomatic studies and, 多勃雷宁学习外交与斯大林
15—16
- Dobrynin's face-to-face meeting with, 多勃雷宁迎面遇到斯大林
21
- and fears of nuclear attack, 斯大林与对核攻击的畏惧
525
- Gromyko's relationship with, 葛罗米柯与斯大林的关系
21—23
- and Jewish emigration from Soviet Union, 斯大林与犹太人从苏联移民
267
- 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about, 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讲话
32
- purges under, 斯大林时期的清洗
16
- relation between Molotov and, 莫洛托夫与斯大林的关系
31
- ruble-yuan exchange rate and, 卢布—元汇率与斯大林
21—22
- U. S. presidential campaigns and, 美国总统选举与斯大林
28
- unpredictability of, 无法预测的斯大林
21
- Stoessel, Walter, 沃尔特·斯托塞尔
313, 330, 357, 483, 487—88, 507—8
-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150—54, 189, 191, 193—94, 198, 200—203, 206—8, 210—17, 221, 223, 228, 234, 307—16, 338, 347—52, 363—67, 369—70, 377—400, 402—3, 409—14, 417—29, 453, 459, 506, 519—20, 534, 559, 572—74, 606—7
- ABMs and, 反弹道导弹系统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211—13, 215
- campaign against ratification of, 反对批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活动
427—29

Carter in trying too much
in, 卡特在限制战略武器
会谈中做过分的尝试
392—94

Cater's semi-official
proposals on, 卡特就限
制战略武器会谈提出的
半官方建议 423—24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限制战略
武器会谈 215

Cuban mini-crisis and,
古巴小危机与限制战略
武器会谈 428—29

detente and, 缓和与限制
战略武器会谈 366,
468, 470—72, 476

and Dobrynin's farewell
meeting with Reagan,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多
勃雷宁同里根举行告别
会谈 603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
瓦最高级会谈与限制
战略武器会谈 573,
578—79, 586, 588,
591

Geneva talks on, 就限制
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举
行的日内瓦谈判
310, 316, 395—96,
413—14, 480

Glassboro summit and,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
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166

and Gorbachev-headed
meetings of Politburo,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戈
尔巴乔夫主持的政治局
会议 623

Gorbachev's disarmament
plan and, 戈尔巴乔夫
的裁军计划与限制战略
武器会谈 597—99

human rights and, 人权与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388—90

and Johnson's campaign
for additional summit,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约
翰逊为额外举行一次最
高级会谈所做的努力
178, 187

MIRVs and, 多弹头分导
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与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212—13

Moscow summits and,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与限
制战略武器会谈
201—2, 207, 210—11,
214, 216—17, 239, 242,
245, 248, 251—54,

- 307—9, 311—15, 323
and NATO's attempts to
achieve military
superiority over
Warsaw Pact, 限制战
略武器会谈与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试图获得对华
沙条约组织的军事优势
430
on offensive nuclear wea-
pons, 关于进攻性核武
器的限制战略武器会
谈 211—16
parity issue in, 限制战略
会谈中的同等问题
396, 486, 501—3, 507,
515, 582
public opinion on, 有关限
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舆论
423
Reagan's presidential
campaigns and, 里根
的总统竞选活动与限制
战略武器会谈 464
Reykjavik summit and,
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谈
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621
SLMBs and, 潜艇发射的
弹道导弹与限制战略武
器会谈 215—16
and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限制战略
武器会谈与苏联入侵阿
富汗 444—45, 462
space weapons and, 太空
武器与限制战略武器
会谈 560—62, 579,
595
stalling of, 限制战略武器
会谈陷入泥潭 501
structure of, 限制战略武
器会谈的结构 202—3
three - part package
for, 由三部分组成的限
制战略武器会谈一揽子
方案 396
and transfer of U. S.
weapons to allies, 限制
战略武器会谈与美国向
盟国转移武器 392
and U. S. Forward - Based
Systems in Europe, 限
制战略武器会谈与美国
在欧洲的前进基地系
统 392
Vance's Moscow mission
and, 万斯赴莫斯科的使
命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392—97, 424
Vienna summit and, 维也
纳最高级会谈与限制战
略武器会谈 397—98,
414, 417—20, 422—25

Vladivostok summit and,
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
会谈与限制战略武器会
谈 319, 323, 327,
329—34, 349, 364, 372,
381, 385, 387—88,
392—95, 420, 423
and war between Ethiopia
and Somalia, 限制战
略武器会谈与埃塞俄比
亚和索马里之间的战争
405, 409
Washington summit and,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与限
制战略武器会谈 258,
275—76, 285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treaties, 限制战略
武器会谈条约
I, 第一阶段: 194, 211—12,
252—54, 258, 331—32,
338, 399
II, 第二阶段: 307, 314, 327,
372—73, 375, 385, 393—
94, 399—400, 415—17,
421—24, 426—29, 444,
480, 483, 488, 490, 543,
572—73, 586, 599
III, 第三阶段: 417, 423
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alks, 削减战略武器会谈
481, 560, 590, 627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tar Wars), 战略防御计
划(星球大战) 212, 214,
478, 510, 527—29, 531,
544, 564—65, 608—11,
627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
瓦最高级会谈与战略防
御计划 573, 577—80,
582, 586, 588—92, 595
Gorbachev's disarmament
plan and, 戈尔巴乔夫
的裁军计划与最高级会
谈 597, 599
and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战略防御计划与
太空军事化 558—62
Reagan's presidential
campaigns and, 里根的
总统竞选活动与战略防
御计划 529
Reykjavik summit and,
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
谈与战略防御计划
604, 609—10, 620—22
and Soviet fears of
nuclear attack, 战略防
御计划与苏联对核攻
击的畏惧 523
Strauss, Robert, 罗伯特·斯特
劳斯 124, 460, 638 注
Suslov, Mikhail, 米哈伊尔·苏

- 斯洛夫 7, 362
 and confusion about
 detente, 苏斯洛夫与缓
 和问题上的混乱 408
 and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苏斯洛夫
 与入侵阿富汗 437—
 38, 441
 Israel relations and, 苏以
 关系与苏斯洛夫 162
 Jewish emigration and,
 以色列移民与苏斯洛
 夫 268
 Khrushchev's dismissal
 and, 赫鲁晓夫被解职
 与苏斯洛夫 128—30
 Moscow summit and,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与苏
 斯洛夫 248
 Third World Policy and,
 第三世界政策与苏斯洛
 夫 404—5
 Vietnam War and, 越南
 战争与苏斯洛夫 263
 Switzerland, Dobrynin's
 mission to, 多勃雷宁出任
 驻瑞士公使 23—24
 Syria, 叙利亚 160—61, 204,
 222, 290, 295, 642
 Taraki, Nur Mohammed, 努
 尔·穆罕默德·塔拉基
 435—36
 Teller, Edward, 爱德华·特勒
 101, 105, 527—28
 Thant, U, 吴丹 90—91,
 204—5
 Thatcher, Margaret, 玛格丽
 特·撒切尔 560,
 632—33
 Thompson, Llewellyn, 卢埃
 林·汤普森 6, 62—63,
 98, 106, 120, 136, 144, 169
 ABMs and, 反弹道导弹系
 统与汤普森 149, 151,
 153, 213
 and assassination of
 Kennedy, 汤普森与肯
 尼迪遇刺 109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古巴导弹危机与汤普森
 95
 Glassboro summit and,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
 谈与汤普森 162
 nuclear test ban and, 禁
 止核试验与汤普森
 101—2
 reducing military expen-
 ditures and, 削减军费
 开支与汤普森 133—
 34
 and Soviet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 汤普森与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82
- and Soviet military aid to Cuba, 汤普森与苏联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 70
- U. S. - China relations and, 美中关系与汤普森 224
- U - 2 affair and, U - 2 飞机事件与汤普森 39
- Vienna summit and,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与汤普森 43
- Thurmond, Strom, 斯特罗姆·瑟蒙德 598, 605
- Tito (Josip Broz),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22, 447
- Toon, Malcolm, 马尔科姆·图恩 413, 454
- Treaty on Conventional Forces in Europe, 欧洲常规力量条约 627
- Troyanovsky, Oleg, 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 17, 29—30, 48, 637
- Truman, Harry, 哈里·杜鲁门 3—4, 23, 116, 168, 321, 323, 448, 525, 606
- Tula, Brezhnev's speech in, 勃列日涅夫在图拉发表的演说 379—80, 383
- Turkey, 土耳其 52, 72, 417
removal of U. S. missiles from, 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 79, 84, 86—91, 109
- Tunner, Stansfield, 斯坦斯菲尔德·滕纳 375, 414
-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4, 20, 57, 78, 197
Afghanistan and, 阿富汗与联合国 434
and attempts to trade Soviet spies for dissidents, 联合国与试图用苏联间谍交换持不同政见者 413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古巴导弹危机与联合国 86, 90—92
Dobrynin's appointment to, 任命多勃雷宁到联合国任职 33—35
and famine in Somalia, 联合国与索马里饥荒 407
Gandhi's proposed arms race discussion and, 甘地提议进行的军备竞赛讨论与联合国 530
General Assembly of, 联合国大会 76, 106,

144, 161—62, 205 ,
234, 267, 288, 290, 398,
505, 508, 540, 608, 626

German reunification
and, 德国重新统一与
联合国 629

Gromyko - Haig meeting
at, 葛罗米柯和黑格在
联合国会谈 495

Gromyko - Shultz meet-
ing at, 葛罗米柯和舒尔
茨在联合国会谈
508—9

India - Pakistan war and,
印巴战争与联合国 237

Iranian crisis and, 伊朗危
机与联合国 437

and Israeli invasion of
Lebanon, 联合国与以色
列入侵黎巴嫩 506

and Jewish emigration
from Soviet Union, 联
合国与犹太人从苏联移
民 266—67

Middle East peace
negotiations and, 中东
和平谈判与联合国
204

Moscow summit and, 莫
斯科最高级会谈与联合
国 314

and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联合
国与不扩散核武器
166

October War and, 十月战
争与联合国 288,
290—300

Reagan's address to
Jubilee session of, 里根
第五十届联大上发表讲
话 582

reduction of staff of
Soviet mission to, 削减
苏联驻联合国使团人员
599

Security Council of, 联合
国安理会 22, 74, 86,
91, 158, 160—62, 205,
290—91, 293—96,
298—300, 488

Security Council Resolu-
tion 242 of, 联合国安
理会第 242 号决议
291—93

Security Council resolu-
tion 338 of, 联合国安
理会第 338 号决议
294

Security Council resolu-
tion 339 of, 联合国安
理会第 339 号决议
295

Six - Day War and, 六日

- 战争与联合国 160—62, 164
- and Soviet military aid to Cuba, 联合国与苏联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 74
- tenth anniversary of founding of, 联合国成立 10 周年 28
- United States: 美国
- anti - communism in, 美国的反共思潮 25—26, 107—8, 122, 196, 306, 365—66, 519, 554
- anti - Sovietism in, 美国的反苏思潮 25, 56, 62, 158—59, 348, 350, 416, 446—48, 452—53, 457
- Dobrynin appointed ambassador to, 多勃雷宁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47—48, 51—52, 55—62
- Dobrynin's first impressions of, 多勃雷宁对美国的印象 25
- in drive to separat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from Soviet Union, 美国逼迫东欧国家脱离苏联 481, 500
- hot line between Soviet Union and, 苏美之间的热线 93, 96—98, 160—61, 210
- opening direct air traffic between Soviet Union and, 开通苏美之间的直接航线 141, 145
- polarization of political forces in, 美国政治力量的两极分化 113—14
- raising sunken Soviet submarine and, 打捞沉没的苏联潜艇与美国 352—53
-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 of, 美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194
- 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苏美文化交流 125, 145, 445
- Soviet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苏美经济关系 562
- Soviet trade relations with, 苏美贸易关系 106, 215, 253, 258, 265, 267—70, 284, 304, 306, 312, 315, 334—37, 348, 363, 366, 368, 400, 403, 425, 446—47, 471, 473, 505—6, 518, 534—35
- Soviet wartime alliance with, 苏美战时联盟

Ustinov, Dmitri, 德米特里·乌
斯季诺夫 150, 179, 194
and Andropov's views on
foreign policy, 乌斯季
诺夫与安德罗波夫对外
交政策的看法 513
Euromissiles and, 欧洲导
弹与乌斯季诺夫 543
and fears of nuclear
attack, 乌斯季诺夫与
对核攻击的恐惧 523
and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乌斯季诺
夫与入侵阿富汗
437—41, 443
KAL007 incident and,
KAL007 航班事件与乌
斯季诺夫 537—38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
会谈与乌斯季诺夫
390, 424, 426, 502—3
SDI and, 战略防御计划与
乌斯季诺夫 528
Soviet - China border
disputes and, 苏中边境
冲突与乌斯季诺夫
409
Third World policy and,
第三世界政策与乌斯季
诺夫 405

and troop reductions in
Europe, 乌斯季诺夫与
削减欧洲军队 426—
27
Vienna summit and, 维也
纳最高级会谈与乌斯季
诺夫 421, 424,
426—27
U - 2 incident, U - 2 飞机
事件 39—42, 251

Valenti, Jack, 杰克·瓦伦蒂
118—19
Vance, Cyrus, 赛勒斯·万斯
5—6, 375, 380—84, 522,
532
Carter's Naval Academy
speech and, 卡特在海
军学院的讲话与万斯
411
Carter's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卡特的
总统竞选与万斯
446, 448—49, 453—54
and Chinese invasion of
Vietnam, 万斯与中国
入侵越南 419
comparisons between
Brzezinski and, 布热
津斯基与万斯相比较
382, 386—87
comparisons between

- Kissinger and, 基辛格
与万斯相比较 382
- confidential channel and,
秘密渠道与万斯 485
- and confusion about
detente, 万斯与在缓和
问题上出现的混乱
409—12
- Cuban mini - crisis and,
古巴小危机与万斯
428—29
- espionage and, 间谍与万
斯 357
- first - strike doctrine
and, 先发制人理论与
万斯 469
- human rights and, 人权与
万斯 380—81, 386,
390—91, 410, 413, 497
- Iranian crisis and, 伊朗危
机与万斯 382, 437,
453—54
- in meeting with Kissinger
and Dobrynin, 万斯与
基辛格和多勃雷宁会
谈 380
- Middle East peace
negotiations and, 中东
和平谈判与万斯 395,
398
- and NATO's attempts to
achieve military supe-
riority over Warsaw
Pact, 万斯与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试图获得对华
沙条约组织的军事优势
431, 433
- resignation of, 万斯辞职
382, 453—54, 457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
会谈与万斯 380—81,
388—89, 409—10,
413—14, 417, 420, 424,
427, 453, 574
- and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万斯与苏
联入侵阿富汗 441,
446—51, 453—54, 456
- on Third World confronta-
tions, 万斯论第三世界
冲突 416
- U. S. - China relations
and, 美中关系与万斯
409—10, 449
- Vienna summit and, 维也
纳最高级会谈与万斯
397—98, 413, 417,
419—22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
争与万斯 174
- and war between Ethiopia
and Somalia, 万斯与
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
间的战争 403

- Vanik, Charles, 查尔斯·瓦尼克 269, 366
- Vasev, Vladlen, 弗拉季连·瓦肖夫 5, 60, 438
- Vienna: 维也纳
- Austrian State Treaty anniversary celebrated in, 庆祝奥地利国家条约签订 10 周年 453, 456
 - European troop reduction talks in, 维也纳削减欧洲军队会谈 276, 345, 431, 471, 525, 527, 570
 - SALT talks in, 维也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203, 211, 213
 - space weapons talks in, 维也纳太空武器会谈 567—68, 572
- Vienna summit(1961),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1961) 42—46, 52, 59—60, 67, 76, 112—13, 123, 379, 425
- Vienna summit(1979),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1979) 393, 402, 413—14, 417—29, 435 注, 445, 454
- agenda of,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的日程安排 421
 - Carter's push for, 卡特要求举行维也纳最高级会谈 417—19
 - delay in holding of, 推迟举行维也纳最高级会谈 425
 - domestic implications of,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的国内影响 421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维也纳最高级会谈 397—98, 414, 417—20, 422—25
 - and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与苏联入侵阿富汗 490
 - U. S. - China relations and, 美中关系与维也纳最高级会谈 425—26
- Vietnam, 越南 462
- Cambodia invaded by, 越南入侵柬埔寨 415, 418
 - Chinese invasion of, 中国入侵越南 418—19
-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58, 114—18, 120—22, 129, 132, 134—45, 149, 167—76, 180, 184—90, 194—95, 198, 200—201, 227—28, 239—51, 271, 321, 342—45, 372, 375—76,

- 442, 467, 619
- arms control and, 军备控制与越南战争 152—53
- bombing of north in, 在越南战争中轰炸北方 135—37, 139—42, 144—45, 155—56, 164, 169, 171—72, 174—75, 185, 219, 239, 244—49, 251, 257, 263
- bombing pauses in, 在越南战争中暂停轰炸 139, 155, 185—86, 257, 263
- dismantling detente and, 废止缓和与越南战争 469—70
- enemy escalations in, 越南战争中敌对的升级 135—36, 243—46
- and fall of Saigon, 越南战争与西贡的陷落 343—45
- Glassboro summit and,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与越南战争 162—64, 167
- and Gromyko's assessments of foreign policy, 越南战争与葛罗米柯对外交政策的估计 157—58, 640—43
- and Johnson's campaign for additional summit, 越南战争与约翰逊争取额外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 185—87
- Laotian crisis and, 老挝危机与越南战争 122, 137
- mining and blockading ports in, 在越南战争中布雷和封锁港口 246—47
- Moscow summit and,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与越南战争 210, 218—19, 239, 243—50, 254—55
- negotiating settlement of, 谈判解决越南战争问题 135, 137—45, 155—56, 162, 164—65, 169—71, 173—75, 185, 189, 200, 206, 230, 239, 241, 243—46, 248, 250, 257, 260—63, 344—45, 358, 368, 469—70, 641
- and 1968 presidential campaign, 越南战争与1968年总统选举 168, 172—73
- Nixon's reelection cam-

- paign and, 尼克松再次竞选与越南战争 257—58, 261
- peace treaty in, 越南战争和平协议 263—64
- public opinion on, 有关越南战争的舆论 141, 146, 172—73, 241, 345
- and reducing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Europe, 越南战争与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 146, 169
- and safety of Soviet vessels and sailors, 越南战争与苏联船只和船员的安全 247
- and Soviet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越南战争与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84
- U.S. - China relations and, 美中关系与越南战争 224
- U.S. escalations in,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制造战争升级 141—42, 155—56, 164—65, 168—69, 246—47
- Vietnamization of, 越南战争的越南化 169, 206
- Washington summit and,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与越南战争 258
- Vladivostok summit, 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会谈 319, 322—23, 326—36, 341, 372
- and Jewish emigration from Soviet Union, 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会谈与犹太人从苏联移民 336
- preparations for, 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会谈做准备 327, 335—36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会谈 319, 323, 327, 329—34, 349, 364, 372, 381, 385, 387—88, 392—95, 420, 423
- Vorontsov, Yuli, 尤利·沃龙佐夫 5, 60, 237
- Vyshinsky, Andrei, 安德烈·维辛斯基 19—20, 23—24
- Warnke, Paul, 保罗·沃恩克 375, 385, 389, 396
- Washington summit(1973),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1973) 258, 264, 274—86

- aftermath of,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的后果 284—86
- agenda of,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的议事日程 258—59
- and first use of nuclear weapons,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与首先使用核武器 278
- and Jewish emigration from Soviet Union,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与犹太人从苏联移民 267—68
- October War and, 十月战争与华盛顿最高级会谈 288
- U. S. - Soviet trade relations and, 美苏贸易关系与华盛顿最高级会谈 270, 284
- Watergate scandal and, 水门丑闻与华盛顿最高级会谈 274, 276
- Washington summit(1987),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1987) 591, 623—24
- Washington summit(1990),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1990) 630—31, 634—35
- Watergate scandal, 水门丑闻 259, 265—66, 271—72, 274, 285—87, 302—6, 308—11, 319, 324, 326, 342, 376, 471
- as anti - Soviet pro - Zionist conspiracy, 苏联认为水门丑闻是反苏亲犹阴谋 310
- Moscow summit and,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与水门丑闻 308—9, 311, 313—14, 316
- October War and, 十月战争与水门丑闻 287, 298—300, 302
- Saturday night massacre and, 星期六之夜大屠杀与水门丑闻 293
- televised hearings on, 电视转播的水门丑闻听证会 276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争与水门丑闻 345
- Washington summit and, 华盛顿最高级会谈与水门丑闻 274, 276
- Watson, Thomas, 托马斯·沃森 454, 456, 526
- Weinberger, Caspar, 卡斯珀·温伯格 479, 482, 507, 509—10, 533—34, 556, 611
- anti - Sovietism of, 温伯

- 格的反苏思想 490, 569
- arms control stands of, 温伯格的军备控制立场 483—84
- and Brezhnev's attempts at breakthrough with Reagan, 温伯格与勃列日涅夫试图同里根建立关系 489—90
- foreign policy role of, 温伯格在制定外交政策中扮演的角色 549
- Geneva summit and,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与温伯格 573, 578—79, 585—86
- Gorbachev's disarmament plan and, 戈尔巴乔夫的裁军计划与温伯格 598
- Haig's resignation and, 黑格辞职与温伯格 509
- SALT and,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温伯格 490, 572, 586
- Shultz's struggle with, 舒尔茨与温伯格的斗争 549, 560—61, 573, 580
- space weapons and, 太空武器与温伯格 561, 577—79, 586
- Wilson, Harold, 哈罗德·威尔逊 155, 176
- Yakovlev, Aleksandr,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13—14, 179, 617—18
- Yazov, Dmitri, 德米特里·亚佐夫 441, 576, 626
- Yeltsin, Boris, 鲍利斯·叶利钦 576, 616, 635 注, 638
- Zaikov, Lev, 列夫·扎伊科夫 576, 624—25
- Zarubin, Georgi, 格奥尔基·扎鲁宾 26—29, 48
- Zhou Enlai, 周恩来 226, 243, 285
- Zhukov, Georgi, 格奥尔基·朱可夫 194, 615
- Zorin, Valerian, 瓦列里安·佐林 20—23, 74—75

译 后 记

本书是原苏联资深外交家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撰写的一部回忆录,1995年在美国出版,当年即被《纽约时报》评为1995年欧美最佳图书。

多勃雷宁在原苏联外交界是一位传奇式人物。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他曾连续25年担任苏联驻美大使,先后和六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结识了一大批美国政要和各界名流,参与了从1995年日内瓦第一次苏美最高级会谈到1990年布什与戈尔巴乔夫最高级会谈的筹划准备工作,亲身经历或直接参与处理过战后苏美关系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其特殊的外交工作阅历在原苏联外交界中是无人能比的。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描述冷战时期,特别是作者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苏美关系。由于作者具备独特的工作经历以及掌握着大量第一手资料,因此书中对苏美关系发展状况的分析不仅颇有独到之处,而且还披露了苏美在许多重大国际事件中进行幕后谈判交易的情况。本书对我国从事国际关系,特别是苏美关系历史研究的学者以及关心国际问题的各界读者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肖敏(序言、第一、二章)、王为(第三、四章、附录)、李光明(第五、六章)、王华生(第七、八章)、张扬(第九、十章)、韩光(第十一、十二章)、贾天(第十三、十四章、索引)、李丽(第十五、十六、十七章)、刘莎(第十八、十九章)、汪消(第二十、二十一章)、陈亚丽(第二十二、二十三章)、王晓德(第二十四、二十五章)、吴金平(第二十六、二十七章)、孙和平(第二十八、二十九章)、乔红(第三十、三十一章)、刘庆奎(第三十二、三十三章)。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

作者 =

页数 = 8 1 2

S 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